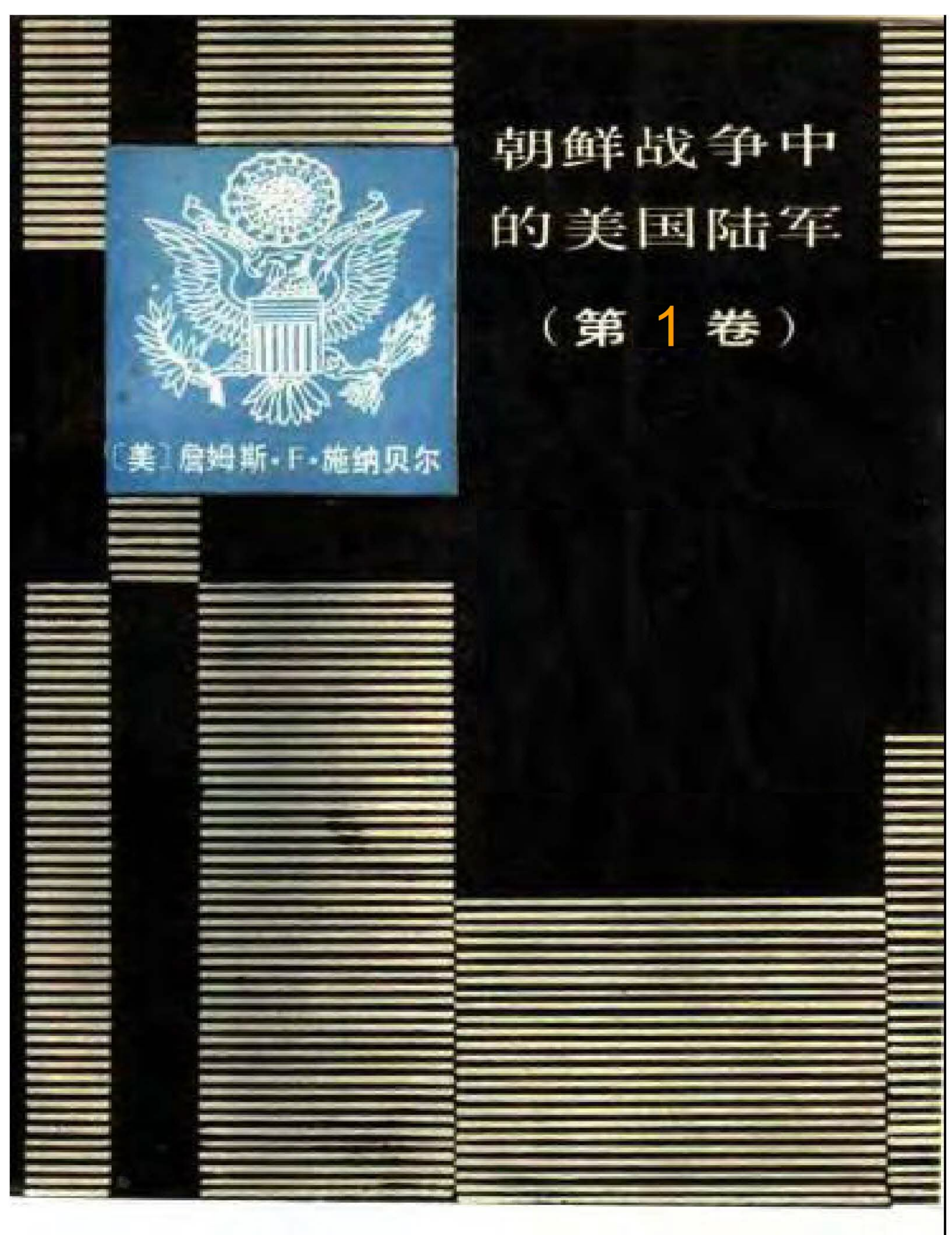

朝鲜战争中
的美国陆军
（第 1 卷）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第一卷）

（美）沃尔特·G·赫姆斯

国 防 大 学 出 版 社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第一卷）

（美）沃尔特·G·赫姆斯

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红山口甲三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安华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434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北京）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ISBN 7—5626—0074—0/E·43
定价：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朝鲜战争经过一年的激烈交战，已失去势头。1951年7月1日，机动作战开始告一段落，一个新的更加稳定的作战阶段开始了。战线稳定下来后，出现了一种要求政治解决武装冲突的趋势。美国战略重点的变化具有新的意义并完全改变了战局面貌。由于战争处于稳定阶段，战斗成为执行政策的工具。

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极不平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作战部队向南发动进攻，1950年6月越过三八线，联合国支持韩国积极阻击共产党部队的进攻。美国担负了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主要义务，击退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但是中共军队于11月参战，阻止了联合国获取作战的胜利，并破坏了联合国统一朝鲜的政治计划。

从这时期开始，朝鲜战争日益复杂。红色中国的参战使战争扩大，也预示将来总有一天苏联也会介人战争。中共军队迫使联合国军的部队撤回到三八线地区，政治上考虑解决朝鲜冲突的主张日益增多，使战场的争夺显得不突出了。击败北朝鲜部队的主要困难是，他们有中国的支持和苏联的支援。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潜力。在联合国军实施的反击将共产党的部队赶到三八线附近地区时，任何一方不以巨大的生命和物质为代价而企图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再也不可能了。重新估计朝鲜战争的前途到时候了。

毫无疑问，朝鲜爆发战争不过是美苏之间更大争斗的一个部分。但是朝鲜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朝鲜仅仅是检验大国作战能力的一个局部地区吗？朝鲜是共产党直接控制下采取军事行动易于突破的一个弱点吗？或者更严重地说，朝鲜战争是苏联在朝鲜遭到挫折，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而采取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步骤吗？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直折磨着美国和它的盟国，并对美国军事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战　　场

1950年中期朝鲜战争爆发前，对朝鲜和朝鲜人民，在西方世界鲜为人知。在战争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了解朝鲜。旧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书籍放在书架上布满灰尘，新的有关朝鲜的书籍迅速大量发行。报纸上刊登大量朝鲜地图。走在街头巷尾的人们越来越熟悉那些著名人物的名字。当朝鲜的地理位置和朝鲜的历史又显示新的重要意义时，人们对探照灯的注意代替了对蜡烛的兴趣。

朝鲜与满洲沿鸭绿江和图们江有一条漫长的共同边界线，并在图们江口与苏联接壤。从图们江北部的弯曲部向朝鲜半岛最南端延伸约600英里，东西宽度在狭窄腰部地区约100英里，最宽处距离约220英里。朝鲜地形的主要特征是多山地，大白山脉覆盖朝鲜东北部，沿东部海岸线向南延伸。正如一名观察员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国家就是一幅风景画，处处是山水"。山向东部倾斜而下直到海边，西部地形较平坦。公路、铁路交通网穿过起伏不平的土地。

朝鲜是一个农业国，它的大部分旱地农作物出产在北

方，南方盛产稻米。它的重工业和水电设施大部分在北方。平均雨量和气温与美国靠大西洋中部各州相似。但是冬季非常寒冷。雨量约有80%集中在3月份至10月份的7个月内。在这个时期洪水经常泛滥。

由于朝鲜拥有如此漫长的海域，所以渔村散布在朝鲜沿海各地。西部和南部海岸有良港，这些地区潮水变化很大。在日本海沿岸没有什么良港，这里潮水起落范围只有3英尺。

朝鲜位于亚洲东部战略要地，它拥有悠久的和灾难重重的历史。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半岛经历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敌对国家之间都为追求霸权进行交战。最后，在7世纪，西列王朝设法取得中国的援助获得了对整个朝鲜的控制权。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促使朝鲜人接受了孔夫子的社会关系伦理体系，并对朝鲜人的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打下永久烙印。尽管朝鲜在以后几个世纪曾遭受游牧民族野蛮的入侵，是朝鲜基本上一直忠实地保持着同中国的"父子"关系，并认为自己是启蒙者的弟子。

当西方国家试图在19世纪中叶同朝鲜建立商业关系时，他们遭到朝鲜人的坚决抵制。朝鲜人不同任何外国人接触。西方国家不熟悉孔教传统，这种传统把朝鲜置于中国兄弟的地位。他们误解了这种关系，认为朝鲜是中国的一个附属国。但是中国否认它对朝鲜拥有宗主权。随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声明积极从事离间朝鲜同中国的关系。

许多世纪在朝鲜获得利益的日本，完全理解朝鲜同中国的儒教关系，但它希望扩充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并于1876年从它的翼侧向朝鲜实施经济渗透。通过向中国施加压力，日本同朝鲜达成贸易协定，使朝鲜一些港口对外开放。

6 年以后，美国也同朝鲜签订了和平协定、友好协议、贸易协定和航空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美国于1888年派出它的第一个军事援助组到达朝鲜，一些美军教官也迅速派到朝鲜训练朝鲜军队。由于朝鲜门户开放引进了美国的援助，精明能干的中国政治家李鸿章企图用美国的商业利益平衡日本的政治野心。

因为李鸿章企图从1885年到1894年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他直接同日本人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对抗引起了战争。日本人获得胜利。通过1895年的协定，朝鲜脱离了与中国的传统的宗主关系。日本试图笨拙地采取收养孤儿的办法接管朝鲜。但是当反对日本人控制的朝鲜皇后被谋杀后，日本的阴谋也遭到挫折。朝鲜人民的反应迫使日本暂时停止阴谋活动。朝鲜国王求助俄国人来抵制日本的影响。

当俄国人迅速在朝鲜取得采矿、伐木和贸易特权时，他们象日本人一样愚蠢。因而，在俄国代表于1898年无意中给了朝鲜国王进一步取得俄国人的援助的机会，朝鲜国王深知俄国人的烦恼，急忙抓住这个时机。

虽然俄国和日本都暂时收敛自己在朝鲜争夺有利地位的计划，但是在以后几年内，他们一直互相监视和猜忌。最后在1904年日本决定阻止俄国人进入满洲和朝鲜。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与此同时，日本决定不丢失利益。日本的行政官、政府官员和警察被派往朝鲜，逐渐对朝鲜加强控制。日本的外交官同英国和美国顺利达成协议，使英、美两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1905年日美达成交易，美国默许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可以否认美国对菲律宾有侵略企图。当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并使其合法化时，除了朝鲜人以外，其他国家没有任何抗议行动。

在以后的35年中，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一些朝鲜人试图发动起义，但日本人很快将反抗群众镇压下去，并加强对朝鲜人的控制。日本政府官员和特务迫害朝鲜人民，并帮助日本警察对朝鲜社会保持严格的控制。同时，他们对朝鲜进行经济剥削，并企图同化朝鲜的文化。他们使朝鲜的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现代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朝鲜变成了一座军营和日本战争基地的一个重要部分。

1943年年末，朝鲜的爱国者第一次从国外得到令人鼓舞的消息。在12月份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的蒋介石发表声明："美、英、中三大国没有忘记受奴役的朝鲜人民，决定在恰当的时候使朝鲜获得自由和独立"。

如果朝鲜爱国者能听到罗斯福总统和苏联首脑斯大林1945年2月在雅尔塔的谈话，他们可能对此不会引起很大的热情。在讨论战后四大国托管朝鲜的可能性时，罗斯福宣布，他认为朝鲜作好实现独立的准备需要20至30年的时间。苏联领导人希望不要用太久的时间实现朝鲜的独立，但是他满心同意罗斯福的主张。罗斯福认为在朝鲜这个已解放的国家内，不应留驻任何外国军队。

当苏联于1945年8月对日本宣战时，遵守1945年7月28日签订的开罗宣言，并联合美国、英国和中国，支持在不久的恰当时候实现朝鲜的独立。

在1945年8月初这段兴高彩烈的日子里，各盟国必须分头负责接受在朝鲜日军的投降成为当务之急。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原子弹，苏联8月8日向日本宣战，这证明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形势需要美国立刻采取行动。美军作战部计划人员建议朝鲜北

纬38度线作为适当的军事分界线。美军将接收38度线以南地区日军的投降，苏军将接收38度线以北地区日军的投降。

8月14日，美军的建议得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务院和美国总统的批准。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建议，三八线应作为美军战区和苏军战区的分界线。8月16日斯大林同意美国提出的建议。美国总统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并对受降的准备工作、接收程序和三八线的有关规定作了详细指示。

由于苏军已先期抵达朝鲜，而美军仍在距朝鲜600英里以外的冲绳地区，三八线似乎成为有利于苏军的分界线。苏军很可能在美军抵达朝鲜半岛前占领朝鲜全部地区，而美军除了把三八线作为恰当的临时军事分界线之外别无其他打算。这条分界线以后成为永久的壁障。

三八线作为分界线是适宜的。它横切许多南北方之间的公路线、河流和铁路，并将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与拥有较多工业的北方隔开。38度线以南地区面积约有3.7万平方英里，人口1,600万。北方约为4.8万平方英里，人口9,00万人。就地区的差异而论，有很多方面和美国国内战争时期相似。朝鲜"北方佬"可能更能辛勤工作、自力更生和经营自己的土地。朝鲜的"南方人"更象顺从的佃农。"南方人"看不起他们的北方同胞，把他们称为粗鲁的捣乱分子，而北朝鲜人则视他们的南方同胞为懒汉。

上述这些地区人们的偏见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扩大，这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朝鲜产生的这种情况是异常的。轴心国的瓦解促使国际力量的平衡状态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美国和苏联甚至在他们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前就存在政

策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出现由于战争结束通常会带来的那种暂时的缓和局面，代替它的是美苏双方互相开始增加压力。在这时期，美苏之间的根本冲突日趋表面化。在这些大国的争斗中，朝鲜只不过是他们争夺的目标之一。

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1945年9月初，当美军首批部队到达朝鲜汉城时，朝鲜国内正处于一片混乱状态。由于朝鲜急需在经济上、财政上、行政上和政治上给于援助，美军指挥官霍克决定临时保留大量日本官员以便在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保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政府工作的连续性。他认为，日本官员将逐渐由美国的民政官员或新训练的朝鲜政府官员接替。

怀有政治抱负的朝鲜人迅速提出抗议，掀起了革命风暴。他们经历了日本人40年的压迫，要求日本人全部撤离朝鲜并尽快遣送他们回国。受到独立前景鼓励的朝鲜人产生的激昂情绪不会容忍在遣送日本人回国的问题上退让。霍克将军被迫加速进行行政上的交接工作和遣送日本官员。这次对美军指挥官成功地运用政治压力成为朝鲜人在以后数年能巧妙地重复使用的榜样。

随着日本官员被遣送回国，美国占领军设立了一种小规模的朝鲜人政体组织。这个组织装备日本的小型武器和步枪，维持朝鲜内部的社会秩序。一夜功夫朝鲜出现了许多政党，每个党派都宣称他们得到多数朝鲜人民的支持。因为敌对的派别组织都需要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当时南朝鲜各派党羽的辩论和示威游行很盛行。但是，霍克将军确信，任何政党都并不拥有他们自称的人民广泛的支持，他们根本

没有承担重建朝鲜艰巨任务必需的政治素质。当时他坚决反对承认朝鲜任何临时政府的主张。

由于俄国人企图移动在三八线制造的人为障碍遭到失败，将日益高涨的朝鲜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到积极轨道的工作，困难越来越多。在军事上做努力以排除政治上的障碍毫无作用。美国国务卿伯恩斯最后直接同苏联交涉。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外交部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达成协议，同意设立联合委会，同朝鲜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协商，以组建朝鲜临时政府。该委员会也提出一项建议，由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为期5年。

南朝鲜政治党派对这项托管原则大多数的反应是强烈的。由于朝鲜人敏锐感觉到他们将获得独立，他们坚决反对外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再实行5年的统治。但是，他们激烈地抗议活动仅仅向苏联提供了政治武器。当联合委员会于1946年3月举行会议时，苏联代表声明，他们不同那些反对对朝鲜实行托管主张的任何政党和组织进行协商。因为这一事件等于取消了南朝鲜除共产党之外所有的重要政党，美国拒绝接受苏联的解释，会议于5月开始无限期休会。

与此同时，在北朝鲜建立了共产党，并让一位曾在国外的朝鲜共产党人、从前的游击战英雄金日成在1945年开始担任领导。苏联面对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制订和执行一项计划，在1946年年中设法从朝鲜撤退1万名军人和全部苏联人。

随后，霍克将军同苏军驻朝鲜指挥官进行谈判遭到挫折，朝鲜南方和北方便形成持久的分裂局面。在朝鲜北方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更加投靠苏联的时候，南朝鲜也越来越

依靠美国的援助。正如杜鲁门总统1946年7月指出的那样：朝鲜变成了两大思想体系斗争的战场，我们在亚洲获取胜利将依靠在朝鲜的斗争。

由于两个大国都争取在朝鲜和其他地区达成自己的目标，朝鲜的统一便日益成为遥远的事件。美国开始集中力量制定健全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方针，并组建南朝鲜政府。然后，详细研究组建南朝鲜部队的问题应运而生。1946年11月，南朝鲜的警察部队扩充到5,000人，奠定了南朝鲜军队的基础。

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再次设法同苏联人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于5月份再次恢复联合委员会的协商会议。但是在协商会议开始后，由于排斥那些反对对朝鲜实行托管的政党参加会议，协商会议又再次破裂。

美国面对可能长期休会的处境，于1947年9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处理。美国不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将使美军无限期地占领南朝鲜。这种方针在美国更加不受欢迎，并使南朝鲜人和美国占领军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另一种选择就是从朝鲜撤退美军。美国没有采取撤退驻朝鲜美军的措施。因为美国在朝鲜若表示虚弱会在远东，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产生连锁反应。美国采取了另外的方针。

苏联采取主动行动，首先提出在1948年初各国驻朝鲜部队应全部撤离。但是美国拒绝改变原来的既定方针。联合国大会经过协商后，同意美国的主张，决定于1948年初在联合国的监视下在朝鲜进行普选，合法政府成立后外国驻朝鲜的部队将撤退。苏联通知联合国，他不允许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北朝鲜地区，也不同意在朝鲜进行大选。

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南朝鲜的情况后，美国开始

扩充南朝鲜警察部队，准备最后从朝鲜撤出美国军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美军将南朝鲜警察部队扩充到50,000人，并用美国的重型武器和轻武器装备这支警察部队。美国还派军政官员帮助警察部队实施训练。

在联合国一个委员会于1948年2月完成调查后，建议应在5月份进行大选以便尽可能让更多的朝鲜人参加选举。联合国大会同意委员会的建议。霍克将军为选举进行了安排。5月10日，南朝鲜参加选举的人约有92%走向投票站，选出了参加国民议会的代表。南朝鲜立即制定和颁布了宪法。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被选举为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

北朝鲜共产党发动大规模运动反对美国在南朝鲜进行选举。他们的企图遭到失败，促使其采取其他措施。当年9月9日，他们建立了自称负有对整个朝鲜的管辖权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他的卫星国都很快承认了这个新政府。苏联随后宣布当年年底以前将从朝鲜全部撤退苏联军队。

尽管美军愿意采取与苏联计划撤军相同的行动，从朝鲜撤出全部美军。但是李承晚总统和美国国务院都不希望这样快地采取撤军行动。他们怀疑新组建的南朝鲜军队维持内部安全和阻止共产党人侵略的能力。而且，美军已同意留驻朝鲜，直到南朝鲜警察部队武装完毕并接受训练后再撤离。1948年底，约有16,000名美军官兵仍然驻在朝鲜境内。

外国军队占领朝鲜的日子快要结束，但是美军希望废除他承担的全部义务。美军认为在朝鲜驻军毫无战略意义。美军应将部队部署在其他地区。麦克阿瑟将军认为，共产党人在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将把美军驱逐出朝鲜。由于军费的限制，美国决定6月底从朝鲜撤退美军。

1949年3月，美国为了解除李承晚总统的忧虑，同意将

南朝鲜军队扩充至65,000人。当美军6月30日开始从南朝鲜撤兵时，美国派往南朝鲜的军事顾问团又重新委派曾在1948年8月组建的临时军事顾问组，帮助南朝鲜军队进行训练。该顾问组共拥有美军军官500人，负责完成对南朝鲜军队的训练任务。

美国军事顾问团面临的困难很多。虽然美国要求南朝鲜新组建的军队能够击退共产党军队的侵犯，但是它也不打算使南朝鲜军队过份强大，以免对北朝鲜发动进攻。因此，在美国的装备指定运往南朝鲜时，美国扣留了坦克、重炮和飞机。甚至援助南朝鲜的装备迟迟才到达朝鲜。尽管南朝鲜陆军于1950年扩充到100,000人，但是这支军队的武器和装备更适于警察部队使用而不适于军队使用。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决定首先使用单个武器训练南朝鲜士兵，取得了一些进展。训练南朝鲜军官的任务十分艰难。按照惯例，南朝鲜军官是政治职位，他们的军事素质很差。此外，美军对他们进行训练需克服语言障碍。美军需要不断努力才能争取时间以便训练已成立的南朝鲜第8步兵师。根据北朝鲜派遣的游击队的活动，美军需要训练南朝鲜军队消灭共产党的游击队和消灭在南朝鲜的歹徒的反抗活动。总之，南朝鲜军队于1950年年中开始成为正规军，但同一个训练有素或装备精良的军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三八线以北，苏联建立起更强大的军队。北朝鲜军队中有的参加了中国国内战争，有丰富经验。他的军队于1950年6月迅速扩充到135,000人。这支军队拥有一些重型武器和装备。北朝鲜军队不仅装备着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而且接受了良好的训练。

1950年初沿三八线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北朝鲜共产党对

南朝鲜也加强了政治宣传攻势。1950年5月在南朝鲜的选举并没有使北朝鲜提高自己的地位，共产党人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要求重新在南朝鲜进行选举，建立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全朝鲜统一的合法政府。当南朝鲜拒绝接受他们的建议时，共产党人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越过了三八线。

三、第一年（1950——1951年）

美国对北朝鲜的入侵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向联合国提出建议。在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的数小时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敌对双方立即停火，北朝鲜军队立即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当北朝鲜军队继续向南发动进攻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通过一项决议，催促联合国成员国向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杜鲁门总统迅速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派空、海军支援南朝鲜部队。当这项措施证明不能阻止快速进攻的共产党部队时，杜鲁门总统通知麦克阿瑟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参战。

由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表明他们打算派特遣部队到朝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美国组建联合司令部和任命指挥官。杜鲁门总统接受这项要求，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第一任司令。麦克阿瑟接受了这项任命。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瓦克和他的第8集团军担负在朝鲜的各联合国成员国派出的地面部队的指挥任务。李承晚随后也将韩国军队交给瓦克将军指挥。

虽然联合国企图支援南朝鲜人加强防御，但是战争继续发展。北朝鲜军队依靠优势兵力实施突然袭击，迅速突破南

朝鲜部队在三八线的防御阵地，以4天时间攻占汉城。南朝鲜部队后撤，防线被突破，部队不断往南溃退。为了迟滞北朝鲜军队成功的进攻，麦克阿瑟将军被迫逐渐投入美军的主要地面部队，并以空间换取时间。最后，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防线退至朝鲜半岛的东南角釜山港周围狭窄的地区。

当战线在釜山周围地区稳定时，北朝鲜军队最初发动进攻时的优势消失了。他们仍对南朝鲜的抵抗实施猛烈进攻，争取在美国的支持发挥作用之前控制整个南朝鲜地区。冲突的扩大暴露了北朝鲜军队的弱点。他们的补给线延长，他们的运输线在联合国空军的攻击下显得很脆弱。他们的小规模海军部队遭到美国海军的打击。美海军封锁了整个朝鲜沿海地区。随着美军增援部队到达朝鲜和南朝鲜军队重新组成有战斗力的作战部队，麦克阿瑟便能计划实施反击了。

麦克阿瑟让霍克指挥美军向釜山周围地区发动地面攻势，他组织一个独立的军，即美第10军，在北朝鲜军队的背后实施两栖作战，9月中旬，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仁川实施登陆并迅速收复汉城。美第8集团军突破北朝鲜军队的防线并快速北上与美军两栖登陆部队会合。由于北朝鲜军队的后方受到威胁，他们迅速撤退到三八线以北，不断遭受挫折，但仍继续顽抗。

朝鲜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北朝鲜军队能重新组织起来并再次发动进攻。目前似乎是消灭敌军和统一朝鲜的最有利时刻。在美国的鼓动下，10月初，联合国军得到联合国的默许，继续向北发动猛烈进攻，以消灭坚持抵抗的北朝鲜军队。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目标是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统一，而不是击退侵略军和恢复原来的态势。美军6月份的进攻企图是有限的，但发展是如此之快，

到9月份美军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随着地面进攻的胜利，美第8集团军继续向鸭绿江进犯，美第10军在北朝鲜的东部海岸再一次实施登陆作战。当10月底得到朝鲜有中国部队的报告被证实时，战争似乎快要结束。麦克阿瑟在对这份报告暂时表示怀疑后，他决定继续向鸭绿江发动进攻。中国人对麦克阿瑟的进攻行动的反应是快速的和激烈的。他们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阻止并击退了联合国部队。12月，中国部队追击撤退的第8集团军，进抵三八线以南地区。1951年1月初，他们重新夺取汉城。随着朝鲜战局的急剧变化，美国被迫对形势重新进行估计。

联合国军司令甚至象北朝鲜军队最初发动进攻时那样进行冒险，企图在苏联人或中国人有效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结束战争，并希望苏联人或中国人不能参战。当中国人的参战补偿了北朝鲜军队的损失时，联合国军损失惨重。中国人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儒教徒的原则，他们似乎对朝鲜承担了古代的兄长的义务，而且在1955年以后他们在决定朝鲜的命运时又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的撤退又促使美国国内各阶层人士和国会对杜鲁门总统施加压力，要求他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早在7月27日杜鲁门曾向记者发表谈话称，他今后不考虑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苏联在1949年爆炸了他的第一颗原子弹而且从此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一事实多少对他的决定产生某些影响。但是，使用核武器对士气产生的影响和战争扩大的实质都可能被当作威慑因素而加以利用。总而言之，当联合国军的部队获得了主动而且在11月份以后中国人的猛烈进攻开始减缓时，美国国内对杜鲁门的压力也开始减轻。但是，杜鲁门于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

一直考虑准备使用各种武器包括核武器，但是他不想看到将核武器用于对付那些与军事侵略无关的无罪的人民。除非那些显然不愿冒扩大战争风险的美国的盟国英国和法国坚决支持使用核武器，使美国感到确实需要使用核武器，否则杜鲁门将不愿将核武器用于朝鲜。如果形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核武器似乎仍将保存在武库中。

1951年1月中旬，中国人的进攻速度开始减缓。中国军队远远脱离了补给基地并遭受严重损失。美第8集团军在新任指挥官李奇微的指挥下，对敌军发起反击。但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再能决定一切。中国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使朝鲜战争出现长期消耗战的前景。联合国成员国都不愿看到朝鲜战争的扩大。由于支援朝鲜战争的国家大多数还承担其他义务，所以很难期待联合国继续给予更多的援助。没有联合国的大力支援，打败中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当战线更加稳定下来时，联合国开始将以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看作为结束战争的最好方法。

联合国在安排停火谈判方面最早同北京政府接触的途径是在没有任何宣传情况下举行的。李奇微将军很快向联合国提供了更强有力的说服。美第8集团军谨慎地向前推进，第二次进抵38度线，给共产党军队以沉重打击。联合国军于3月再次收复汉城并不断对共产党军队施加压力。当联合国军进抵原来的边界线附近时，遭受共产党军队顽强的抵抗，但是战局越来越有利于联合国部队。

在美第8集团军向北推进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自从中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以来，麦克阿瑟一直同总统、他的顾问和参加朝鲜战争的盟国抱不同见解。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李奇微接替麦克阿

瑟职务，范弗里特成为第8集团军指挥官。

共产党部队从3月下旬至5月发动的反攻被联合国军击退。但是美国开始谨慎进行作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在不经过它的同意情况下不准李奇微实施任何规模的进攻。虽然联合国军司令的任务仍然是消灭在朝鲜的共产党部队，但是美国命令李奇微在充分考虑部队的安全和防御日本的基本任务前提下完成作战任务。另一方面，美国指示李奇微进行有限的战术进攻，这既符合美国确保部队安全的需要，又可同敌军保持接触，使敌军失去平衡。美第8集团军将击退敌军的入侵并使敌军最大限度的遭受伤亡。美国企图使用这种战法使共产党部队继续进攻以大量消耗他们的人力，并促使他们考虑用谈判代替战争。由于美第8集团军采取稳妥打法进至三八线附近，范弗里特指挥美第8集团军于6月中旬转入防御。美国返回到它在1947年至1948年曾坚守的位置。美国非常希望结束它在朝鲜承担的义务，但是，让美国政府在国内和国外丢脸那是难于接受的，它不会从朝鲜撤退。

第二章　最初的几次谈判

尽管联合国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朝鲜冲突，但在1951年暮春，以朝鲜的统一、民主、独立为基础的和平解决的前景似乎是暗淡的。1951年的头几个月，对于解决朝鲜的冲突，联合国作过努力，但北平的中国政府未加置理，后来也未见它表示出要讨论停止敌对的倾向，除非按它的条件才可进行谈判。因为北平的条件是联合国部队撤离朝鲜；台湾回归红色中国；中共的代表要占据联合国的席位，所以美国很少可能接受这种条件。面临这种僵局，联合国军司令部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忍耐和继续施加军事压力。

一、初步的安排

击退共产党的5月进攻之后，许多联合国观察家乐观地认为，共产党现在可能已经认识到继续进行战争，在人员伤亡、装备损耗方面代价过高，所以可能接受谈判。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6月初提出了另一个和平建议，联合国的外交人员使建议具有一定的形式，使之适合共产党的口味。

6月23日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在电台上的演说是共产党改变立场的第一个信号。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和平代价”电台节目上发表讲话说，苏联人民相信朝鲜问

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他建议，作为第一步，各交战国应开始讨论停火和停战的可能性，从而各自从三八线撤军。如果双方都有在朝鲜结束战争的诚意，他感到为和平所付的这个代价并不太大，几天之后，虽然北平政府表示赞成马立克的建议，但要注意，它仍然没有放弃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然而尽管中共提出警告，联合国对苏联建议的反映还是谨慎中带着嘉许的态度，愿意谈判就是一个受欢迎的迹象，但需要进一步澄清进行和谈的细节以及拟定共产党人愿意接受的谈判程序。

这件事情费时不久。27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通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伦·G·柯克说，停战谈判应在战场司令官之间进行，谈判内容应严格限定于军事问题，而不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与此同时，国务卿艾奇逊出席了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表示支持所讨论的外援法案，顺便谈到如果共产党撤到三八线之后，并充分保证不再进行新的侵略，则美国在朝鲜所要达到的军事目的已经满足。我们颇有兴趣地注意到谈判开始后，双方都迅速利用所报导的对方声明进行讨价还价。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起进行停战谈判是否具有权威的疑问迅速被联合国法律顾问亚伯拉罕·费勒所排除。他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只要谈判限于军事问题，并把谈判结果向安全理事会报告，那末美国不必得到联合国的进一步授权，就有权签订停战协定。

由于联合国同意美国领导与共产党的谈判，李奇微将军向朝鲜共方的总司令提出了此事。6月30日，李奇微通过电台广播说，他愿意确定第一次会面的日期，并向共方领导人建议，元山港的一艘丹麦医疗船是会面的适宜地点。

同日，李奇微听取了有关美国与共方停战谈判中总的政

策和目的的意见。这方面的指示和意见成了美国谈判中所持立场的要点。

美国的主要军事利益是停止对抗、保证不再爆发战斗和保障联合国部队的安全。美国政治军事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并不想对朝鲜问题谋求长远的政治解决，所以劝告李奇微主要应达成一项美国在相当期间可以接受的军事协定。美国政治军事领导人对远东战场的司令官作了严格的限制，要他小心不要涉及政治，不仅不要提到台湾的意向以及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而且也不要提到三八线，这些问题需要在政治谈判时加以考虑。

美国领导人认为为了灵活地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美国谈判人员若采取主动立场更加有利，但必须注意美国所能接受的最后立场应该亮出来。美国领导人不愿意被人指责在谈判中不守信用。

至于在具体细节方面，美国领导人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双方代表人数相等的停战委员会。此委员会应拥有自主权，可以不受限制地巡视全朝鲜并有权保证实施停战的条件。停战委员会准备就绪之后，停战才能有效。还要按当时停战时的所占阵地为基础，在战场上建立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停战后不得再增加援军和运进物资装备，除非是在一对一基础上的轮换或替代。关于战俘问题，应尽速在同等的基础上以一对一进行交换。与此同时，应当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战俘营，尽其所能进行帮助，直到所有安排都已就绪为止。

李奇微将军接到上述指示以后，就把详细计划的准备和谈判的实际安排的责任交给了以赖特准将为首的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李奇微与这个组密切合作，起草了工作日程，连同他选定的出席谈判会议的代表名单，于7月1日一起向参

谋长联席会议作了报告。他选定远东海军司令C·特纳·乔伊中将为代表团团长，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的老兵。协助乔伊的各代表是：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I·霍迪斯少将，他曾在欧洲战场上指挥过一个团；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C·克雷吉少将，他曾在北非指挥过一个航空联队；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尔林·A·伯克少将，人们称他为"31节"伯克，因为他在太平洋战争中常命令驱逐舰以最高速度行驶；还有朝鲜第1军军长白顺裕，他是一个年轻而能干的作战指挥官。

李奇微还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准备再给共产党发个电报，共产党对他电台广播的讯息，尚未作出回答。他在广播中建议联络军官在元山机场或在汉城、开城的公路主线上进行初步会晤。具体时间、地点由联络军官进行安排，会议日程待主要代表会晤后再定。在李奇微发出第二次信息之前，共产党人通过广播作了回答，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决不全部接受建议。建议代表在7月10日至15日之间于开城会晤，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在汉城西北的35英里处。联合国军司令对于在开城会晤是满意的，不过共产党认为谈判期间战事应当停止，他对于这一点有些惴惴不安。他要告诉共方，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将不停止对抗。此外他想要求对方提前会晤，以便立即开始谈判。

美国领导人对上述要求怕产生宣传上的影响，他们对此很敏感，不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将自己沦为请求者的地位。"我们不要表现出急切地要求提前会晤的日期"，他们告诉李奇微说。美国领导人对于李奇微的其他建议都同意，并告诉他如要提到中国司令彭德怀，应称他为驻朝鲜中国军队指挥将军，而不要称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愿意

这样称呼)。7月4日，金日成、彭德怀同意联络军官于7月8日初步会晤。

虽然共产党人似乎愿意进行谈判，但从前线来的报告表明，他们正集结部队和供应物资拟于7月中旬发动另一次进攻。空中侦察发现汽车、火车不断向南运输，这一点使李奇微怀疑共产党是否有诚意进行停战谈判。面对敌人集结部队和增加装备的形势，李奇微为加强联合国军士气，他建议延迟在战场部署战斗轰炸机联队的原定日期，选择更为有利的时机进行。但是美国领导人考虑到原部署在宣传上的影响，告诉李奇微说，现在延期部署战斗轰炸机联队只能削弱联合国军的态势。

7月6日，李奇微向他的代表交待了对于未来谈判的个人观点。毫不调和地反对共产主义立场是美国的前提，代表们在停战谈判的会议上要从实力出发，不可软弱。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耐心很重要，因为长篇的经常的宣传性发言是在所难免的。他结论说最聪明的办法是不理睬他们。如有机会能离间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集团的关系，或在他们之间加剧紧张的关系，只要不涉及政治，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应争取利用这种机会。

将军继续说，与东方人打交道，要非常小心不要让他们“失面子”。对东方人来说，从当前态势下下台阶，需要一条“金桥”，这一点非常重要。考虑到语言上可能发生一些困难，英文、中文、朝文的译文均需使用，要小心不要因为由于翻译不准确而发生基本的持续性误解。

李奇微结论时指出，如果谈判代表们能成功而熟练地运用谈判技巧，使共产党人在朝鲜军事上遭受失败，那末“历史上将记载共产党在朝鲜的军事侵略已达到高峰，从此共产

党在亚洲就要衰落了。”

李奇微将军为加强对谈判代表团名军方代表的支持，意图将约翰·J·穆西奥大使和美国政治顾问威廉·J·西博尔德留在汶山，该处在汉城以北20余公里，在那里为联合国谈判代表建有帐篷。但是在华盛顿的军方领导人对此建议反映强烈，说这两位著名的外交家将进行政治指导，这样一来会给共产党这样的印象，似乎谈判可以超越军事阶段；而且西博尔德与日本事务和建议中的和平条约有联系，而军方很不愿意把即将举行的日本和约谈判与停战谈判相联系。结果，李奇微要求西博尔德返回东京，穆西奥仍留在汉城。

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美国领导人决定对李奇微作出新的指示。通知李奇微，他作为联合国军司令的任务，就是要使敌人遭受最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并要保持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安全。他的主要目标是为消除敌对行动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为支持这样一个目标，适当的安排是把三八线以南地区全部归大韩民国管辖，非朝鲜部队逐步分阶段撤退，容许大韩民国建立起军事力量以威慑或击退北朝鲜的进一步侵略。规定李奇微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其完成谈判任务，保证其指挥区域的安全，或者还可对敌人进行骚扰。不过对上述行动也作了某些限制，例如对共产党中国、苏联，沿鸭绿江水电设施或接近苏联边界的罗津地区不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不得进行海上或空中作战。也不得在靠近苏联边界12英里之内进行轰炸。一旦苏联介入战争，联合国军司令就应进行战略防御并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准备把联合国军部队暂时撤往日本。

李奇微作为远东美军总司令，他还负有某些美国自身的责任，如以海上和空中作战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苏联进

攻的情况下还需保卫日本。对于李奇微若进攻中国或苏联的领土也作了限制；只有总统才有权下令对集结在中国大陆的部队进行预防性的作战行动。

上述指示是对于李奇微有关谈判问题指示的补充，两者在一起构成了李奇微近期行动的轮廓范围。华盛顿领导人规定的这些限制是需要取消还是严加遵守，这显然要看共产党人在谈判中如何表现而定了。

二、互不相让

7月8日，联合国军司令部联络军官，在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J·金西率领之下，从汶山乘直升机出发，飞到开城降落，共产党人迎接了他们并陪同他们到达会议桌旁进行第一次会议。共产党代表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联络军官就走进会议室面朝南坐下，这在对方谈判代表中引起了骚动，因为按照传统在和平谈判中往往战胜国朝南坐，战败国朝北坐。两天以后，主要代表团开会时，未有机会重现这种情形，在其他几轮会谈中，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是被安排朝北就座的。

开始的会谈是一本正经的，丝毫没有客气和亲切感。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拒绝了对方提供的茶点，迅速排除一切寒暄问候。在第一回合接谈中，金西提交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名单并要求共产党也提出一份名单，但是敌人要先看一看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名单之后，才亮出他们所选好的名单。他们建议休会3小时，以便从他们上级那里领受指示。

此时，为我们联络组提供了食物，饮料和香烟，但我们拒绝了，金西派人乘直升机拿取他们带来的午餐。

休会后，共产党人宣布了代表团名单，团长是朝鲜人民

军南日中将。第一次会议拟于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共产党从开城以东约6英里的板门店哨所起要清扫道路。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车辆要悬挂白旗，共产党保证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在途中和会议地点的安全，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成员除代表本身之外，均需佩戴臂章，以资识别。金西通知共方，运输车队，只要悬挂白旗，并把时间和路线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不会遭受攻击。金西后来报告说，对此共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挂有大白旗的联合国军代表团的车队于10日早晨在板门店哨所停了下来，共产党人要为安全措施进行"准备"。当车队到达开城时，这"准备"的性质就清楚了。有3辆车满载着服装整齐的共方军官大摇大摆地排在车队前面，摆出胜利者的样子通过开城，共方的摄影人员对这支游行队伍进行了大量摄影。

车队在开城郊外小山突出部的一座花岗岩大楼前停了下来。这是给联合国军代表团预备的休息和开会商量问题的场所。但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官怀疑共产党在这里装有窃听器，所以在屋里很少进行认真的交谈。在那里停了一会儿，代表们顺路而下来到会议地点。

战争前，这座被共产党选为会场的茶馆，原是一家时髦的餐馆，有音乐茶座和舞女。现在它弹痕累累，有的部分已被破坏。当代表们被引进内院进入会议室时，见到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共产党卫兵。

南日将军坐在一把高椅上，面朝南，而给乔伊将军在会议桌对面就坐的是一把矮椅子。在座位问题上，共产党也要占便宜，他们就是在小问题上也决不占下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会议桌前面安放了插在铜座上的一面小旗，当天下午开

会时，共产党也放了一面旗，插旗的座子更大，以此作为对策。

代表们在衣着上的对比颇明显。我们除白将军穿着工作服之外，都穿着舒适漂亮的棕黄色夏装。中国人穿着普通的单调军服，不佩带军衔。但北朝鲜人却穿着高领军服，肩章领章齐全，脚蹬高筒皮靴，他们是衣着的冠军。

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人南日将军，除了他那整洁和标准的军人仪态之外，还具有另外的品格，虽然他只有30多岁，他已是北朝陆军的参谋长，也是北朝鲜的副总理。他在满洲受过教育，能讲汉语、俄语和朝语。

会议桌上作为南日助手的是北朝鲜陆军情报部长李相朝，原来当过商业部副部长。少将郑平生是北朝鲜第1军的参谋长，是后来才增加到共产党的代表团中去的。中将邓华是中共第15兵团司令，他1929年参加共产党，经历了长征。少将解方，原是中国东北军的宣传部长，据报导他在1936年绑架蒋介石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代表既有政治又有军事经验，这一点上，两个代表团不一样，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成员都是职业军人。

乔伊上将在开幕词中抵制了对方的这种政治优势。他非常直率地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只打算讨论有关朝鲜的军事问题，而决不考虑政治和经济问题。他继续说，只有在达成停战协定以后，停战委员会成立并发挥职能时，敌对行动才停止。然后他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草拟的九点议程：1.通过议程；2。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并明确访问地区；3。讨论仅限于有关朝鲜的军事问题；4。只有在保证朝鲜境内的武装部队不重新爆发敌对活动的条件下才停止敌对活动；5。讨论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协议；6。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责；7。在停战委员会下面工作的

军事观察小组的视察原则；8.军事观察小组的组成和职责；9．有关战俘问题的协定。

然后南日阐述共产党的立场。基本而言，他的主张是恢复老样子，双方都撤回三八线，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他建议立即停火并沿着三八线建立2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这些工作都做完，才可以讨论战俘问题。中国代表邓华全部赞同南日的建议。

不过乔伊上将此时拒绝进入实质性的讨论，要求共产党提出议事日程。乔伊指出上述南日将军的建议是政治性问题，不属于谈判范围之内。

中午休会以后，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信使在会议区域的自由行动进行限制，这一点引起了乔伊将军的抗议。他还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要随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因为共产党的摄影记者可以充分自由地进入会议区域。南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似乎同意双方派出均等的新闻、摄影记者报导会议情况，但是对于联合国人员自由行动问题却进行推诿搪塞。他辩解说对行动加以限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安全。关于新闻记者问题，他将与他的上司金日成进行联系。

在共产党提出会议日程的建议时，南日遵循了他们“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样一个古老的格言。他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提出的日程计划太长也太啰嗦。他认为由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一事与整个战俘问题有关，所以当考虑总的战俘问题时，才应当讨论访问战俘营问题。联合国军方面提出的第三条是把讨论仅限制在朝鲜的军事问题，南日认为这一条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会议本身就是一个仅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至于第四条，第五条，关于停止敌对行

动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他认为不够具体，应当陈述清楚，然后包括在后面三条中的关于停战委员会和视察小组的补充性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最后讨论的问题是战俘。南日结论时说共产党提出的较为简短的五点日程计划更为合适并应按如下正确的次序进行讨论：1．通过日程；2．规定三八线为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是建立非军事区；3．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武装部队；4．实现朝鲜停战停火的具体协议；5．有关停战以后战俘问题的协定。

如果接受这个日程，那就等于一开始就解决了三八线的问题和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所以乔伊上将拒绝讨论任何具体的军事分界线问题，至于撤出外国军队问题，乔伊上将重申这是个政治性的实质问题，只能在达成停战协议以后才可讨论。他说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会议议程，而接下去可以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提出的第四、第五个问题，即停止敌对行动和有关非军事区的协定问题。

首次会晤结束，共产党在停战谈判中的初步目标似已清楚，即他们要回到三八线，从朝鲜撤除外国军队。一旦达成上述目标，军事均势转变成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步子和爱好来进行其余的谈判了。

7月10日晚上，在汶山的联合国新闻记者对于停战谈判要花费多长时间，大家打赌。“悲观主义者”猜测需要6个星期。但是结果证明，仅仅达成一个一致的会议议程就花了半个月。

11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每一方都为自己提出的议程辩护，而攻击对方的提案。乔伊上将企图将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一事作为人道主义措施迫使对方接受。但是南日

迅速抓住这个论点用以反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他说既然这个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而不是人道主义，他看不出会议日程与人道主义有什么关系。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不讨论军事问题，共产党就是得了一分。

议程上别的议题也毫无进展。对于共产党三八线的主张，乔伊上将回答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对于想象中横贯朝鲜的什么线完全不感兴趣，那一类线对于当前军事态势没有什么军事意义。”

乔伊对车辆的行动受到限制进行了抗议，南日回答时同意标志适宜的车辆可以自由行动，只要共方联络军官事先得到通知。他拒绝联合国新闻记者立即采访会议。由于李奇微以为新闻记者将被容许采访整个会议，所以已经把他集合在汶山了，因此乔伊对共方拒绝联合国记者采访一事坚决不同意。他通知南日说，他们回来时将与新闻记者一起来，不然就压根儿不回来了。这一坚定的立场使共产党大为惊讶，他们要就是接受新闻记者，要就是延迟谈判——他们肩上背起了沉重的包袱。第二天早晨联络军官在板门店会晤时，共产党仍然坚持，可能他们想看看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否虚张声势。但无论怎样，联合国军司令部通知敌人载有新闻记者的车队将于9点到达板门店。如果不让新闻记者通过，整个车队就将退回汶山。

以坚决对坚决，共产党阻止了车队，不让新闻记者进入会议地区，于是整个车队返回了基地营地。两天后，在联络军官会议上，与共产党辩论，他们要求联合国军代表团恢复谈判，而后者则坚决拒绝，除非有新闻记者陪同。

在这个问题上李奇微在华盛顿的上级完全支持他，也支持他坚持在停战谈判中得到互惠待遇。联合国方面感到为了

保证互惠待遇，开城地区应当完全非军事化，而在开城——汶山公路上应当撤除武装警卫。

7月15日，共产党决定让步，而第三次全会安排在下午举行。联合国代表团在20名新闻记者陪同下回到开城，而且催促共方答应在沿途和会议地区给予平等待遇。乔伊上将争辩说在开城周围5英里之内应撤除武装人员，并进一步要求板门店和会场地区车辆应能自由行动而不必事先通知共方。共产党在原则上同意这个要求，建议这个问题由联络军官进行讨论。

由于共产党已经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不在会议上讨论非军事问题，所以乔伊同意从联合国军提出的议程上取消第三个问题。至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问题，乔伊通知敌人，说可以在讨论战俘问题时再行考虑。这样在第三次会议上，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九点议程计划取消了两点。但是共产党坚持三八线问题，并无让步迹象。

停战谈判的幕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紧张地工作着，想从敌人谈判的僵硬态度中寻找缝隙。每天晚上都要有二、三个参谋预测第二天会议的情形，为会议准备采取某种立场所需的文件，其他代表团成员就加以分析研究。经过数小时的严格检验，把文件压缩提炼出实质性的东西之后，才被认为已经准备好，可以向共产党提出来了。要进行长时间的探索检验，还要辅之以非正式的讨论。这在谈判进行之中成了准备工作的一种程式，曾一再使用。

7月15日第四次会议时，共产党的立场第一次有了转变。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重新修正了议程，把它浓缩成四条：1．通过议程；2．建立非军事区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3．具体安排停火停战，避免在朝鲜重

新爆发武装部队的敌对行动而危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a。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责等；b。军事观察小组的组成、权力和职责等；4。关于战俘问题的安排。

共产党经过两个小时的休会进行研究后，第一次真正作了让步。他们虽然在实质性讨论中坚持关于三八线问题的意图，但对于第二个议题的一般性提法是接受的。他们也同意认为第三个议题有改进，将作进一步研究。分歧的领域有所缩小，但撤退外国军队一事仍然是最大障碍，这一点已很显然。

第二天，共产党应用了一种谈判策略，他们总是等着诱使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先发言，这样共方能抓住机会好象可以作出某种让步，这种做法很快就成了他们的准则。当乔伊上将解释了军事停战委员会和观察小组的职责以后，南日将军宣称联合国军司令部提的第三项议程过于具体。他建议应当更简短些、原则些，在18日的第六次会议上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接受了这一建议。大家同意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一、二、三、四项议程之后，正准备进入实质性讨论之际，共产党继续坚持将撤出外国军队一事列入议程。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了坚定立场，南日在下一次会议上又以讽刺的口吻攻击说："战争不是旅行，部队并不是旅行者。如果停火命令已下，停战已经实现，但外国军队仍留驻原地，显然这意图不可能是让他们欣赏朝鲜的美景吧……"南日可能从未见到过美国的征兵宣传画，他的发言并没有给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留下多少印象。

国务卿艾奇逊于19日对报界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声明清楚指出联合国军部队将留驻朝鲜，直到巩固地实现了真正和平为止。艾奇逊坚持他的

立场说，朝鲜的邻国都知道，联合国军对他们并无威胁，“作为联合国最后解决朝鲜问题计划的一部分，外国军队从前撤出过朝鲜，但共产党对这种努力进行挑战，竟对大韩民国发动了侵略。如果重演这种勾当，朝鲜人民肯定不会答应。”艾奇逊作了上述结论。李奇微对于艾奇逊发表声明的时机及其内容都感到满意，并感到这对谈判是有利的。

19日会议结束时，乔伊问李奇微是否停止对话，等共产党提出新建议以后再谈。但是联合国军司令不愿意用这种办法，他要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可是他建议对于共产党近来在会议上表现的粗鲁的不礼貌行为应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在将来，如对方同样挑衅，应以“简短、生硬、有力的语言回答，只要乔伊说得出，就尽管粗鲁。”

认识到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能使会议搁浅，甚至导致与共产党的谈判破裂，所以华盛顿领导人建议可以试验一下采取稍为不同的做法。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可以把议程范围放宽，让共产党单方面去讨论而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不承担任何义务。如果这一点不成，李奇微可以同意在将来讨论相互减少军队的问题。当然华盛顿领导人倾向于第一种解决办法。

7月20日，自然气候不好，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板门店河水暴涨，冲毁了桥梁，联合国军代表团无法过河。我们一个翻译，中尉肯尼思·吴，徒步跑到板门店的岗哨处，把消息告诉共产党。虽然桥在第二天修好了，但在谈判的思想上，双方并未接近一步。会议结束时，共产党又另外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们要求休会4天以便双方重新考虑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团虽不愿意，但也同意了。

25日会议重新举行时，共产党最后企图将撤退外国军队

问题放在议程上。但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代表坚持不同意。在下午的会议上，共产党突然同意不再将外国军队撤退问题列入议程。但又建议要加上第五个议题——向双方有关国家推荐撤出外国军队的方案。他们宣布，准备向政府建议召开高一级会议，以便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考虑迅速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虽然这个建议比较模糊，乔伊上将觉得这是共产党愿意进入实质性讨论的一种表示。乔伊报告说南日在会上表现得更为紧张和胆怯，中国代表似乎起着更为积极的作用。至于让步本身，乔伊相信那是共产党用第五项新议程来换取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上的让步，是一种顾全面子的办法。

华盛顿同意了共产党的新建议，议程问题就算讨论完毕，而第一项议程也就结束。第二项议程是在双方之间划定一条军事分界线，以便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一项基本考虑——建立非军事区。这一点与联合国的立场大致吻合，而我们避免提起三八线。共产党坚持要缩短简化联合国提出的有关停火的安排以及反映其工作的第三项议程——实现停火停战的具体安排，包括执行停火停战条款的监督组织的组成、权力和职责。对于第四项议程——有关战俘问题，以及第五项议程，共产党并未提出什么干扰性的意见。这个议程的争论焦点是撤出外国军队问题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问题。这些问题在唇枪舌战中好象已受皮肉之伤，在今后实质性讨论中还要出现。

三、前线的反应

随着初步谈判，战场上作战的节奏已有所松弛。早日结束战斗的前景，使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们和部队更加急切地避

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不过小规模的有限目的进攻仍然进行，经常派出巡逻哨以侦察敌人的活动状况，并防止联合国部队失去战斗优势。

李奇微将军深知一旦停战，部队士气可能瓦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亲眼见到了士兵的表现的。李奇微预见到了停战谈判可能产生相同的情形，他于7月4日把他的观点告知了范弗里特。有些词句如“让士兵回家”、“厌战的部队”等又在使用了。按李奇微的思想方法，他认为对于自由世界而言，“其悲剧之大”莫过于重演上次大战结束时美国部队的不光彩行为了。李奇微继续说道，要预见到可能故态复萌，要求范弗里特采取措施，以判断力和常识来消灭不利态势的发展。他建议制定一个教育计划，有针对性地提出在朝鲜常备不懈是“绝对必需”，直到所有各方“最后”同意满意的和平条件为止。李奇微认识到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是他坚持说，如果这是“思想控制”的话，那末他赞成这种控制。不然的话，美国就要“懦怯地投降”。李奇微给上级也发出了同样的信函，上级回话向他保证，一旦停战协定签订，在国内类似的松懈态度，也将予以反对。

7月中旬敌人的一次进攻虽然失败了，但是情报说明，共产党正在发挥其潜在能力，如果一旦谈判破裂，他们有能力发动一次进攻。李奇微指示其空、海军指挥官们，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中力量来遮断公路、铁路运输，对朝鲜境内的敌人进行惩罚。应范弗里特的请求，李奇微把弹药供应量调集到足够使用45天的水平。所以第8集团军已准备好对付敌人的大规模进攻。

地面战线战事松懈，但未能阻止联合国军司令采用其他办法对敌施加压力。李奇微在7月21日报告参谋长联席会

议，说他要向北朝鲜首都平壤实施大规模空袭。他用撒传单的方法对若干城市的平民先行警告，说若干天以后，要对其中的城市进行空袭，并说在7月24日以后的适当日子，要用轰炸机、战斗机袭击平壤。共产党在平壤储藏着相当数量的供应品和装备，而且它又是运输枢纽中心。

华盛顿领导人立刻向高明人士探究此时进行大规模轰炸究竟怎样。鉴于牵涉到严重的政治问题，华盛顿领导人延缓对平壤的轰炸。联合国军司令懂得大规模空袭可能使谈判破裂，但是他指出如坐视敌人强大，敌人中断谈判，恢复进攻，那就意味着美国人将遭受重大伤亡。一次成功的空袭自然将减少敌人的进攻能力并将对其谈判施加压力。李奇微虽然承认他的观点是从当地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全球局势考虑问题的，不过他不得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坐视敌人力量壮大是危险的。

两天之后，李奇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说，预先向平民警告的做法可以免去。因为对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空袭，早已有之，人民也早已知道。而且，事先通知空袭将使敌人改善防御措施，降低了进攻的战术优势。

无论如何，美国领导人终于又进行了考虑。他们考虑到事先撒传单并不合适，那样会事先公开进行空袭的意图。他们也并不愿意单独挑选平壤作为全面空袭的目标，因为停战谈判正在进行，在世人眼中，似乎美国在破坏谈判。但是如果李奇微把这次空袭作为使用空军的例行任务，而平壤确是最重要的目标，那末他们也是可以批准的。

由于气候关系，空袭推迟至7月30日才进行。就是在那一天，气候条件也并不理想。所有使用轻型和中型轰炸机的计划都取消了。只是空军出动了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约450架次。

第三章　针锋相对

在开城即将进行实质性讨论的前夕，苏联发动了一个新的和平攻势。苏联建议缔结包括共产党中国的五国和平条约，并提出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作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措施。正当美国准备与日本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会谈签署防御协定之际，泛泛的苏联建议在美国领导人中间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各种情况表明，苏联之所以提出和平动议，很大程度出于对宣传有利的考虑，并以此瓦解美国的行动。

与停战谈判相呼应的共产党的和平运动，并没有改变美国与日本缔结条约或防御协定的计划，对朝鲜谈判也未发生作用。因为敌方代表在开城关于三八线问题所持的强硬立场，很快驱散了任何幻想，他们并不急于达成停战，除非按他们自己的条件。

一、三　八　线

为实现停战而寻求满意的方案，一开始便为双方所采取的强硬立场所阻碍。当议事日程一经定下，南日将军很快便回到三八线问题。因为这条边界在战前已被各国承认作为分界线，南日极力主张恢复此线。控制三八线南面和北面的双方，都不愿意由于改变态势而处于不利地位。南日提议，沿

三八线20公里的狭长地带定为没有部队的非军事区，南日认为重新编组部队和重新调整界线，是公平合理的。

联合国军接着于7月27日反驳这一建议。海军中将乔伊在初步辩驳以后，明确表示赞成以实际战线为基础作为停战线，而不应以三八线作为停战线。鉴于在过去13个月中，共产党和联合国的军队不少于四次越过了三八线，他论述这一事实证明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是不适宜的。乔伊继续指出，有效的非军事区的范围决定于实际的军事战线，而不应由于考虑最终的政治目的而受影响，对于军事停战来说，用想象上的地理界线，如三八线，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

乔伊拒绝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并提出联合国军的建议。他认为，可以考虑有陆、海、空三种战斗地带。联合国部队在陆上占有明确的阵地，他们还在全朝鲜握有空中优势，并且控制整个朝鲜的海岸。当联合国部队的空中和海上力量因停火而受到限制之时，共产党则得到行动上的自由并巩固其占领的地区，所以，由于停战共产党比联合国部队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乔伊建议共产党应该在陆上作些让步，作为对联合国军的补偿。在他向敌方代表提交的地图上，联合国军的参谋们已在联合国部队占领的地面阵地的北面，标出相当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这个最初的提议所追求的目标，远远超过联合国军代表们预期达到的成果。即使如此，它还是一个新的途径——一种打破总的军事平衡涉及其组成部分，并给各自的谈判目的带来好处的一个尝试。

共产党的反应非常之快，并且断然拒绝这一建议。当南日在28日声言，军事力量是所有的武装部队的力量总和时，他评论这一建议是“荒谬的”。他说，联合国军的战线是其陆、海、空军军事力量的集中表现。虽然目前战线是经常变

化的，但南日以为三八线大体反映了目前的态势，并可以定为分界线。

乔伊指责南日的无礼和激怒，并坚决维护联合国军的建议。他论证说，陆上的进展永远不能表示战争的状况，日本战败，并没有一兵一卒踏上日本本土。

南日拒绝接受这种意见。他嘲笑美国人声称的美国曾经击败日本。南日说，任何人都知道，是朝鲜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的战斗和苏联的抵抗，使日本屈膝投降。不是美国对日作战3年没有取得胜利，直到苏联军队参战并给予日本致命的一击才战胜日本吗？他评论说："这些历史事实能轻易忽略吗？"

很明显，由于各方使用了不同的历史书籍，海军将军乔伊没有继续争论这一问题。他继而指出，如果停战签字，将给共产党带来好处，他们可以修复道路、桥梁和铁路，运送有利于部队健康和福利的补给品，并且可以恢复和重建其城镇和设施。

共产党对海军将军的建议不感兴趣。当7月已过，8月的三伏天开始时，他们仍坚持其三八线的意见。每天的会议成了例行公事，因为各方提出同一的争论问题，但互不让步和妥协。很显然，由于马歇尔和艾奇逊的赞成，使共产党方面相信美国定要坚持撤退部队的问题。乔伊向李奇微建议，高级官员支持的代表联合国军立场的第二项议程，也可能产生有利的结果。他感到谈判可能会因这一问题而中断，因为南日甚至不讨论不与三八线有关的提案。

当事情正处于绝境之时，发生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在8月4日午饭时，一支全副武装的中国连队通过联合国军代表团的驻地，显然侵犯了会议中立区。这是双重的侵犯，实际

上不仅会议地点半英里之内不准有武装部队，而且在开城的5英里半径之内的所有部队只许配备腰佩武器。当谈判在当天下午复会时，乔伊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南日则答应进行调查。

不管共产党是否出于宣传的目的想表明他们对会议地点的管制，或是只是单纯地作了一件错事，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奇微将军决定采取强硬立场，并通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合国军代表团在得到对侵犯事件的满意答复、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之前，将不与共产党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来自共产党的第一个答复是：执行警卫任务的部队错误地经过会议地区，并已发出指令防止再度发生此类事件。虽然海军将军乔伊建议联合国部队接受这一答复，但李奇微坚决要求组成同等代表的调查组，在下次会议之前对整个中立区进行全面的调查。李奇微认为，这次侵犯事件不是蓄意威胁就是由于粗心或是缺乏纪律。

在6日早晨，共产党用朝语、英语和日语广播了第二个信息。虽然朝语和英语以有礼貌的言辞请求联合国代表回到开城，但日语广播则以一种傲慢的强制的语句结尾。李奇微请求批准拒绝共产党的答复，但是他的上级认为敌人已经接受了联合国军的条件。他们要求李奇微广播接受共产党的答复，同时告诫共产党在其答应保证开城中立区安全的条件下恢复谈判。李奇微被迫同意。但他在给乔伊的信中发泄了对共产党的不满。他大肆攻击敌人把礼貌当成让步，把让步当成软弱。他吩咐乔伊“掌握你的言辞，你就可以运用共产党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法，并使其尊敬别人。”

会议中断5天以后于8月10日复会。乔伊很快通知南日将军，联合国军代表团讨论或考虑过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的问题。共产党立即抗议企图限制讨论的作法，但乔伊马上指出，他所持的立场仅是联合国军的回答，并不是限制共产党国家关于三八线的讨论。一个非常少有的现象出现了。双方代表经历两小时零十分钟的相对无言沉默，只是偶尔南日以其打火机神经质地敲打桌子。最后海军将军乔伊打破僵局，因为分界线问题达不成协议，他建议与会者转而讨论第三项议程。共产党拒绝这一提议。

李奇微将军再次请求他的上级支持强硬的行动方案。他提议给共产党以72小时时间考虑其顽固的立场。如果他们仍然寸步不让，就告诉他们，正是由于其蓄意的行动才使谈判中断。但是华盛顿的领导者们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他们无意在会谈阶段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谈判破裂，责任自然由共产党承担。最后，他们指出不应使三八线问题谈判破裂，而应给予时间使莫斯科和北平改变其立场。与共产党过去打交道的经验表明，长期的、拖延的谈判是正常的会议程序。冷静、耐心、不屈不挠和坚定应成为联合国代表团所持的态度。他们得出结论，这种作法使敌人处于最大的紧张之中，而同时则可增加联合国军一方的协调和力量。

8月12日，共产党代表恢复了攻击。南日将军在辩论三八线问题时告诫说："你们应该知道真理不怕重复，而且需要重复。"不幸的是这里没有共同承认的"真理"，也不存在谁的"真理"比起他人的是"真正的"真理。南日称联合国关于地面补偿的提案是"悖理的和狂妄的"，而他自己的则是"合理的"；而同时乔伊则攻击共产党是"顽固的和不现实的"，而申辩自己的提案是"合理"的。由于双方互不示弱，得不到相当补偿就不让步，舌战持续几天，谈判毫无进展。

共产党坚决反对给予联合国部队以前方阵地作为补偿。正如《真理报》所载，“朝鲜人民不同意在开城谈判中，在其领土问题上对美国强夺者妥协。”但是联合国军代表团承认，虽然其提出的分界线全部在共产党控制区，并提议按目前的战线和全部军事态势进行一些占领区的调整，但这是根据补偿的概念提出来的。

最后，为了打破僵局，海军将军乔伊提出一个重要建议，以便推动谈判的进行。8月15日，他提出由各方派出一名代表和两名助手组成小组委员会。他相信这种小型圆桌式的交换意见可以导致自由讨论，并可能对解决第二项议程产生可行的方案。第二天，共产党接受这一建议，但要增加代表人数，是二人而不是一人。他们推荐李将军和解将军，乔伊则提名霍迪斯，稍后又指定海军将军伯克作他的代表。在小组委员会提出建议进行工作时，全体会议休会。

第一次小组委员会于8月17日举行会谈，虽未取得具体进展，但气氛是比较缓和的。解将军似乎喜欢用这种方式交换意见。他常常发言，当争论尖锐时他则充当调解者。当谈话围绕小桌前后循环进行时，甚至产生一种倾向，共产党一方已考虑地图上的分界线。

在第二次会议上，联合国军的代表试图刺激一下共产党的代表，提出用投掷钱币的方式决定哪一方提出第一个新的方案。共产党不能想象靠投钱币来决定重要的事物。然而他们还是提供了将其在三八线的位置稍事修改的地图，在东面他们让给联合国部队大约4公里的土地，而在朝鲜西部他们划去同等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前进了一步，他们提出废除以前的所有地图，并开始重新修订。虽然他们拒绝回答就三八线提出的几个问题，但霍迪斯将军和海军将军伯克感到，如

果联合国部队为取得优势先作出牺牲，共产党可能准备讨论其他解决方案。

在19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霍迪斯建议为了进行讨论，与会者可考虑将空军和海军的实力反映在战线上。共产党同意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但在小心地等待联合国部队作出明确的新提案。经过两天无结果的辩论，共产党从其三八线的立场进一步后退。他们指出，如果联合国部队放弃其补偿的观念，他们将提出一个根据实际战线作出调整的方案。由于这是一个明显的可以获得进展的步骤，联合国军的代表们同意这一调整原则。22日的会议在可能即将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休会。

李奇微将军受到鼓舞，由于期待共产党可能同意讨论与"前线一般地区"相应的"接触线"，他提出计划并得到批准，该计划是以接触线为中线，建立不少于4英里宽的非军事区。

不幸的是，小组委员会会议预期的进展是短命的。由于随之而来的被认为是侵犯开城周围中立区事件的发生，使共产党于22日夜宣布中止会议。

二、节外生枝

对侵犯会议地区和中立协定的控诉和反控诉，从和谈开始时即激烈进行。随着共产党拒绝联合国军的新闻记者入场，联合国军代表团坚持就管理会议地区的条例和规定达成一个协议。简而言之，就是以开城十字路的环形交叉口为中心，建立一个半径5英里的中立区。各方在这一地区禁止敌对行动，除了准备执行军事警察任务者外，所有军队一律撤

出。会场半英里之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联合国代表团白天可以在板门店至开城间的道路上自由通行，而不需要事先通知共方。联合国联络军官在7月8日第一次会议上已经通知对方，开往和离开开城的共产党车队，如果标以白色十字，如果联合国部队得知其行进的时间和路线，就不会受到攻击。这些安排似乎是非常明确和简单的，但被认为是违犯规定的事件几乎立即发生了。

7月16日，共产党声称联合国军的士兵向板门店方向射击。虽然无人受伤，也未造成任何破坏，但共产党仍断言，这是武装部队侵犯中立区的行为。联合国部队查明，在板门店地区发生过射击的事，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已射入中立区或由联合国部队所为。但无论怎样，共产党未再追究此事。

5天以后，北朝鲜联络军官张川山上校通知金尼上校说，联合国军的飞机扫射了在黄州和沙里院用白旗作标记的共产党代表团的供应卡车。但是因为共产党没有通知联合国军使用这种护航标志，联合国部队拒绝承担在此情况下造成损失的责任。由于敌人使用平壤至开城间的道路运送部队增强实力，李奇微不打算放行所有带白色标记的车辆，因为联合国军怀疑共产党可能充分利用这种手段向前线偷运人员和物资。而且联合国部队未在会议地区周围进行调查，所以必须接受共产党所说的真的发生过扫射事件。李奇微告诉海军将军乔伊通知敌人，除非事先得到通知，否则一旦发现车辆便要射击。

起先发生的两起事件是比较小的，共产党对此没什么大惊小怪。如前所述，当联合国部队强烈抗议8月4日会议地区遭到一连全副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的侵犯，在得到金将军和彭将军完全保证不再发生这样事件之前停止会议5天，

这些对共产党来说可能感到震惊和意外。由于联合国部队从发生的事件中积累了有利的宣传材料，使共产党处于防御地位，敌人可能决定发起反攻。

8 月 8 日，在继续休会期间，共产党报告说前天发生了两起联合国军侵犯中立区协定的事件。第一件，联合国军的飞机在市边里攻击一辆配有白旗的供应卡车；第二件，大约40余名联合国军已经包围了板门店附近的桥梁，几名人员向非武装的共产党人员射击。联合国军的联络军官尽力使对方相信，前次通知的护航标志是免受攻击的唯一保证，但几经说明，未起作用。共产党坚持白色标记已经足够了。经过对第二个指控的全面调查，海军将军乔伊发现没有联合国军的单位当时在板门店地区，所以对射击不承担责任。由于共产党耽误了28个小时才提出控告，乔伊对其合法性提出异议。

不到一个星期，8 月13日，在市边里附近发生了另一起对 8 辆共产党供应卡车的射击事件，敌人再一次提出抗议。乔伊简短的答辞和部分说明是："由于没有得到车辆运行的通知，联合国部队一方不需要采取行动和予以考虑。"

因为多起事件的突然发生，共产党要求联络军官会面并作出更多的满意的安排。8 月中旬，金尼上校和詹姆斯·C·默里上校(海军陆战队军官)与张上校举行一系列会谈，就议程的数目达成协议。但是正当他们寻求达成最后协议之时，又发生了几起新的事件。

一起是另外的对卡车扫射事件，但第二起事件的性质更为严重。8 月19日，一支中国军警排在中立区松岗里村附近巡逻时遭到伏击，排长被打死，另一士兵受伤。共产党立即抗议并谴责联合国部队违犯过去的协议。当联合国军的军官们对这一指控进行调查时，敌人则充分利用这一事件。在20

日的小组会上，共产党代表提早休会以便参加排长的葬礼，并邀请霍迪斯将军和海军将军伯克与他们一道前往。这样就将联合国军的代表置于为难的境地，因为他们如果接受邀请，共产党一定要拍照并予公布，并且很可能歪曲他们出席的理由。霍迪斯和伯克决定谢绝邀请，并在会议结束时很快走向他们的直升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为避免被拦在路上而一起去参加丧礼，他们终于走向飞机，并尽快起飞飞往汶山里。

尽管证据互相矛盾，调查结果说明巡逻队曾遭伏击，但在当时没有联合国或大韩民国的部队接近松岗里。由于一些目击者谈到事先在此地发现几名身着便衣的突击队人员，联合国的军官们推测，他们是亲大韩民国的游击队，但是独立行动。不用说，共产党不满意这种解释，并充分利用这一事件为其宣传服务。

因这一事件引起的波澜消失之前，共产党于23日清晨从床上唤起金尼上校，向他提出新的抗议。他一到开城，张上校及其中国同事柴成文中校即激动地告诉他联合国军的飞机轰炸了会议地点。金尼及其伙伴不顾昏黑和暴雨，检查了证据。虽然有几个小洞，但所谓轰炸碎片显然是飞机油箱和机舱的部件。共产党认为炸弹中有一枚是凝固汽油弹，但是什么地方也没有因凝固汽油弹爆炸造成的土地严重烧焦的痕迹。在看到此证据之后，金尼称整个事件是“胡闹”。于是张以从此中止所有会议作为回报。

当联合国军调查人员驱车前往板门店时，共产党联络军官赶上来并要求他们返回进行全面调查。金尼打算等到天明，但张和柴坚持说已发现新的证据。金尼勉强返回，并被指明看两个另外的小窟窿、几块小的烧焦的碎屑和一些飞机

金属碎片。那里有一股汽油味儿，从其中的一个窟窿的情况看，可能是一枚劣质凝固汽油弹没有爆炸。当联合国的调查者要求将所有的证据留在原处不动，等到白天再检查时，共产党代表则予拒绝。他们企图收集所有证物以便进行分析，并考虑进行全面调查。

从这一事件的许多事例表明，共产党一方有意制造事端以中断和谈。首先，第5航空队强调没有飞机飞临这一地区上空；第二，如果飞机投弹而使用着陆灯，这种行动也与所有联合国军的惯例相违背；第三，照联合国军调查者的意见，从弹坑的散布面来看，没有任何飞机能炸成这样。除了这些技术的疑点以外，其证据的不足，共产党的匆忙从事及其急切地为分析事件而搜集残片，其下级军官很快以此来中断会议，这些都使人怀疑共产党的动机。正如李奇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的那样，这一决定已于事先由其最高层领导制定。如其所见，共产党采取的行动有三种可能的理由：1．他们企图为其中断和谈辩解，并归罪于联合国军；2．在与日本缔结和约的会谈进行之际，他们希望拖延和谈并配合苏联的和平攻势；3．他们想要中断和谈以加强其宣传地位，并重新获得谈判的主动。

李奇微的见解没有详细论述。这里还有其他几个有趣的事例。美国邀请共产党中国到旧金山谈判对日本的和约问题遭到失败，这件使人失望的事，当时也是李奇微的建议之一。另外一种推论是共产党认为联合国军提出召开小组代表会议，意味着联合国军准备对三八线问题妥协，当这一希望落空时，他们就决定争取时间，以便作出下一步动议。

不管任何动议，和谈都陷于长期的中断之中。联合国军拒绝对轰炸开城承担责任，引起共产党愤怒的反响，但联合

国军仍坚持这一点。与此同时，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几次新的侵犯事件提出指控。他们断言联合国军的飞机于8月29日在开城地区投掷照明弹，联合国军部队于8月30日向一支巡逻队进攻，并开枪射击越过板门店附近的桥梁，以及联合国军的飞机于9月1日再次轰炸开城。联合国军的军官们对这些指控进行的调查表明，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侵犯空域，游击队可能对地面进攻行动负有责任。

李奇微和乔伊两人都强烈地感到，减少更多事件可能发生的最好办法是变换会议地点。前者早在8月初及当月频繁发生事件之后，已建议提出新的会议地点。乔伊坚决支持他的意见。美国领导人希望联合国部队提出建议，但此时他们不愿意以改变会议地点作为恢复和谈的必要条件。

共产党愿意对违犯事件进行舌战，是因为对其存在好处。如果共产党急于完全中断和谈，他们会制造一种情况以便撤出会议，并归咎于联合国部队。尽管他们的多数指控缺乏内容，但他们已经取得宣传上的主动，并使联合国军处于防御地位。联合国部队能够镇定地多次反驳共产党的指控，但是事件的连续发生，已使否认指控成为无足轻重之事。当9月的时光正在消逝，无论从时间或争取主动方面来说，一些迹象表明，共产党已达其目的，并准备恢复和谈。

说也奇怪，此时又发生了一起事件，只有这次才是对中立区的真正侵犯。9月10日，第3轰炸机大队由于领航员导航错误而扫射了开城。幸好未造成损失，但共产党提出正式抗议。当通过调查查明是联合国军的飞机所为时，海军将军乔伊对这一违犯事件作了书面道歉。9月19日，此事可以说得到共产党几乎是友好的反应。鉴于联合国愿意承担此次侵犯事件的责任，金和彭建议李奇微立即在开城举行代表会议

恢复和谈。

但李奇微在实质性的方案取得明显进展之前，不想恢复和谈。共产党早就漠视他的改变会议地点的建议，但他坚持必须在联络军官一级会议上解决复会的条件，而不以代表会议来解决。与此同时，他仍要求对方改变会议地点。

共产党反对改变会议地点，反对联络军官拟定停战地区的中立细则，使会议中断的时间更长。共产党不愿意给予其联络军官对协议的任何一点以批准的权限。然而金尼报告说，在9月25日第一次联络军官会议之后，他们似乎急切地希望代表团会晤。他感到忍耐和坚持将最后赢得满意的结果。

在华盛顿，情报机构并不认为共产党恢复谈判的愿望有任何特殊意义。因为共产党在朝鲜的地位并不恶化，他们认为不需要采取新的行动，苏联可能从其军事或政治目的出发，而指示恢复谈判。

无论怎样，李奇微及其参谋制定了行动计划。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五星上将奥马尔·N·布莱德雷和国务院顾问查尔斯·E·波伦都在远东，李奇微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计划并得到批准。此计划基于共产党的反应提出三点方案：如果他们接受变换会议地点，联合国代表团将提议大体沿接触线划出4公里的非军事区；只要共产党坚持以开城作为会议地点，而不急于中断和谈，联合国部队将提出新的会议地点，也不绝对排除开城；提出的第三点方案是，如果谈判有可能破裂，联合国指挥官则向共产党发出带有地图的信件，标明提出的非军事区，并建议小组代表会议，在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对此进行讨论。波伦晚些时候报告说，李奇微及其参谋感到，联合国部队已经一贯地在程序问题上向共产党作出让

步，而且已可能给人以软弱的观感，这些是与军事地位不相吻合的。波伦支持李奇微新的会议地点的意见，虽然如此，他认为那是多余的做作。

正当李奇微继续向对方施加影响，在高层领导中与金和彭交换信件，在联络军官会议上坚持强硬立场，而此时又发生了几起新的事件。9月19日，一起南朝鲜侵犯中立区的事件发生了。佩有红十字标志的4名非武装大韩民国的士兵，乘坐装有滴滴涕的卡车，因迷路而越过板门店附近的桥梁。手足无措的卫生小组人员及卡车立即被拘留，毫无疑问被怀疑实施生物战，由联合国军的联络军官开据收条后予以释放。

10月7日，一架联合国军的B—26飞机飞越中立区，但无袭击行动。机组被正式谴责为越境飞行。5天以后，一起更为严重的侵犯事件引起共产党强烈抗议。10月12日，联合国军的F—80飞行小队在返航途中飞越中立区。小队中的一架飞机因机枪退弹意外地打死一个12岁的朝鲜男孩，并打伤他的2岁的弟弟。虽然联合国部队承认对这一不幸事件承担责任，并深切表示歉悔之意。但联络军官会议上的气氛急骤变化。

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取得的进展是鼓舞人心的。联合国部队的耐心和坚定，已经使得共产党作出几次让步。在强压之下，后者至少同意在10月7日将会议地点从开城移至板门店，由双方负责该处会议地点的保卫工作。李奇微立即指示范弗里特作好准备，一俟恢复和谈的最后安排付诸实施，立即占领板门店以东高地。

当10月10日联络军官会晤时，共产党人只讨论下次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而拒绝讨论其他事项。张上校对待联合

国军的军官们是颇为粗暴的。但中国联络军官柴上校调解并缓和了这一情况。他接受了由默里上校提交的中立区的文件和地图，随后伴随默里走到帐篷门口，而此时他的上司张默默地站在旁边，这种由下级军官表现的明显行动，清楚地看出真正的力量所在。

当共产党了解到联合国部队在联络军官制定规则和条例之前不打算举行高一级的会议时，他们即不同意在参谋会议上定出细节规定。低级会议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真诚，对复会的条件将很快达成协议也显出光明的前景，但10月12日的事件投下了阴影。从夜晚到天亮，共产党又重复其过去的、索然无味的话题，脾气也变得急躁。从以下金尼和张在漫长的、难以忍耐的第16次会议上的对话，可以看出气氛新变化的朕兆。

金尼：我发现教训我如何对特殊问题进行讨论，已经成为张上校的一种习惯。

张：我感到金尼上校对不应担忧的事情担忧。因此，我不是站在金尼上校的教育者的地位，我不负有教育他的责任。

金尼：我高兴你理解这一点。

尽管人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这样变化，但对问题存在的分歧则缩小了。自从谈判地点移至板门店，联合国部队希望围绕开城的中立区限制在3,000码，而不是5英里。这样缩小中立区将可能减少在此地区发生事件。但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一提议，并且不同意减至3英里以下。联合国军的代表最终妥协，对开城和位于汶山里的联合国营地都接受了这一数字。

一项第二位重要的条款阻碍了就关于侵犯中立区空域问

题达成最后协议。在多次出现联合国军的飞机由于导航错误或因为天候条件而飞越中立区的事件之后，联合国军的谈判人员希望不要把偶然的进人空域当成侵犯事件。共产党则认为这是一种武装部队的敌对行动，但也承认有可能是由于天候或技术条件超出人为控制，在此情况下飞机可能飞越会议地区，但应不是故意攻击或破坏。

10月22日，联络军官签署了新的警卫协议，它包含了联合国部队预期的大部分要点。除了开城地区限制为3英里外，并制定了意外飞越中立区的规定，联合国军对不由其控制的非正规军或游击队的行动不承担责任。另外还有棘手的问题，这使得共产党过去几次提出抗议。环绕板门店周围的中立区划为1,000码，由开城至板门店至汶山的道路两侧划出200米的中立区。双方同意在板门店会议期间，派驻军事警官2人和配以轻武器的士兵15人，其余时间为军官1人和士兵5人。共产党提供代表团会议的帐篷，联合国部队提供地板材料、取暖设备和帐篷的照明，其他方面各方自己照料在会议地区各自的需要。为防止发生侵犯空域的事件，联合国部队同意在板门店设置探照灯和拦阻气球。

在已经取得协议之后，联合国军的代表希望进一步影响共产党。海军将军乔伊预计共产党打算在代表会上再次全面讨论警戒条例，所以他给南日送去批准的联络军官协议的信件，并告知南日在恢复谈判以前他在等待共产党的同意。金尼上校也向张通知：联合国军的警卫部队移至板门店以东高地，以防止在这一地区发生事件。

10月24日，共产党同意协议，南日将军签了字，第一次代表会议预定第二天召开。这样，中断了两个月的会议复会了。但是，与此同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似乎没有什么疑问，

共产党已经重新获得宣传上的主动。导演出来的事件和其他存在的争端，已足够使共产党提出指控。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策略产生了几种副产物。和谈的拖延，导致了联合国军增加对地面和空中的压力，也为南朝鲜部队和日本的国民警卫队提供了多余的训练时间，而且也使得美国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远东的近期和长远的态势。

第四章 进行准备的时间

当朝鲜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改。共产党人于1950年5月至7月发动进攻，当时美国的目标是阻止敌军的进攻，恢复朝鲜的原态势。1950年9月至10月，朝鲜战局好转，美国相应地扩大了目标，准备将整个朝鲜统一起来交给一个民主政权统治。由于中共军队参加战争并发动了进攻，美国企图统一朝鲜的美梦便消失了。美国再次调整部署集中力量，企图重新建立战前朝鲜的政治格局。

在作战计划中也往往反映军队在战场的盛衰兴亡。当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在敌人初期发起的猛烈进攻被迫向釜山撤退时，当时联合国军的紧迫任务似乎是撤离朝鲜和向日本实施全面撤退。美军在仁川登陆获得了胜利，排除了联合国军中的悲观主义，并暂时又激发起联合国军的作战信心。他们相信联合国军定能统一朝鲜。当中国人于11月和12月将联合国军所属部队击退后，中国人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又重新感到他们可能被迫撤离朝鲜。横渡日本海进行战争的难题又再次折磨着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计划人员。

朝鲜战局的变化如同战场的天空，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晴朗明亮，1951年春季敌我双方又形成了均势。当战线在靠近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时，特别是在麦克阿瑟于4月被撤销总司令职务后，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企

图获胜的信心大大减少了。经费开支越来越高，联合国军的冒险行动越来越多。这促使美国领导的思想开始转变，考虑同共产党人进行停战谈判的问题。为了阻止苏联参战和预防世界大战的爆发，朝鲜停战似乎会给美国带来美好的希望和前途，能使美国取消在朝鲜战场承担的义务，从而平衡美国的对外军援，有利于加强欧洲的防务和重建美国国内的战略预备队。

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给那些把胜利作为奋斗目标的美军领导人提出新的和一系列难于解决的问题。停战谈判开始后，联合国军不再设法以进攻行动争取胜利。联合国军不得不痛击敌人以促使敌人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条件，而不致引起敌人实施全面反击和扩大战争。美国需要奋力争取达成和谈协议。

一、战争的指导——华盛顿方面

进行停战谈判的方式和达成令人满意的停战协定的手段由美国总统最后作出决定。杜鲁门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需要对朝鲜战争按惯例进行全面的指导。通过他的办公室表达他的赞同或反对意见。由于联合国授予美国全部权限，让它组成朝鲜联合作战司令部，因此杜鲁门总统没有任何责任需向联合国任何机构说明他的战略决策。即使总统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只限于同意决议或否定决议，他仍对有关朝鲜问题的决策和朝鲜的作战计划一直实行严密的控制。总统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策。

美国总统的主要顾问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

主席。其他执行机构的成员包括：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这些人由总统委派。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估计和鉴定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承担的义务和美国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然后向总统建议采取最适当的行动。

1951年7月，美国总统防务问题主要助手是国防部长文职官员马歇尔。马歇尔领导3个兵种的部长，即陆、海、空军部长。布莱德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空军参谋长作为各军种的代表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是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顾问。他们在准备战略计划对军队进行战略指导方面不受陆、海、空军部长的管辖。在处理兵种勤务问题时，作为参谋长或海军作战部长，他们直接对部长负责。但是，布莱德雷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确没有表决权，他可以主持会议并代表小组同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会谈。

为了保证负责制定朝鲜作战计划和制订军事政策的政治官员和军事官员之间能密切合作，国防部长马歇尔命令恢复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之间的协商会议，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国务院官员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之间的例会，共同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并在向总统提交该建议前向国务卿说明建议的内容。

美国经常使用这种作法促使军队在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政策的战略指导下，形成统一的战略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地理环境设立了许多联合司令部。这些联合司令部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指导下进行工作。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可对那些被认为指挥上归属司令部的兵种行驶职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陆军参

谋长负责指挥远东美军司令部。在美陆军范围内，柯林斯可命令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代理他行使指挥权。参谋人员经常向李奇微传达高级司令部同意的决定和指示，这有助于阐明柯林斯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加强远东美军和加强美军在朝鲜的作战能力的主张。

如果李奇微和他的参谋人员制订了他们希望得到上级批准的计划和行动方针，他们将会按惯例遵循这种程序制定新的计划。参谋人员接到远东美军司令部的建议后，将转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军种进行研究。然后参谋人员将同陆军有关的参谋人员共同协商，准备一份柯林斯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陆军正式建议草案。如果远东美军司令部的建议内容涉及到军事以外的问题，国务院的官员将参加研究，并帮助请求批准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对建议作些修改，在提交总统审批前送交国防部长审查。过程似乎麻烦，但是如果需要紧急作出决策，各有关部门常常会迅速对建议的主张达成一致意见或迅速提交总统批准。因此，朝鲜战争的每一个重要决策的采取都依靠参谋部门的大量工作，包括收集情报、准备材料，协商、估价政策、计划和提出通过军政部门交给总统审批的建议。

并不是所有的计划和建议都由战区提出来，参谋人员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也常常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战区参谋人员在向上级部门提交建议之前常常同远东美军司令部进行讨论协商。

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斟酌

1951年春季，参谋部门对朝鲜战争的下一步行动准备了

许多可选择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把这些方案提交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除非全面大战爆发或苏联志愿军突然大量进入朝鲜，否则联合国军所属部队应继续驻在朝鲜半岛。他们认为，单靠军事行动将不再能解决朝鲜问题了。而且，在世界紧张局势缓和前，朝鲜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解决办法。在这一时期，美军应采取目前的不断对朝鲜的敌军施加压力的方针，以期待能产生不损害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或不让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前提下的最后政治解决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应该发展南朝鲜部队以便在这一时期担负朝鲜战争的主要军事任务。

但是，如果战争扩大，而且中共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地区，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应作好战争准备。6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美驻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制定一个计划，准备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被迫撤出朝鲜的情况下，对中国沿海实施封锁。尽管李奇微坚持说，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在他需要控制太平洋地区的每一艘美海军舰艇以执行撤退美军的任务时，可能需要增加舰只，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准备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拒绝李奇微的建议。他们强调，太平洋海军舰只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特殊指示，李奇微不能调遣任何一艘美驻太平洋的舰只。

如果谈判破裂，从海上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也是一种手段。7月在开城停战谈判开始不久，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马歇尔提出建议，如果敌人在谈判桌上不肯让步，美军将不得不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虽然要避免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美国必需作好应付突然发生的全面大战。如果停战谈判失败，应取消对李奇微计划实施的空中和地面作战行动的许

多限制。美国应尽快扩充日本防御部队和南朝鲜作战部队，帮助他们训练和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美国应立即催促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参加朝鲜战争；支援美军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对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增加驻朝鲜的部队。

经过较长时间的休整之后，11月初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正了原来的某些考虑。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夏季在满洲扩充了战斗部队，命令美空军可以越过满洲边界对共产党飞机实施追击。7月份，这种追击行动是有益的。但目前美军飞机实施追击遭受的损失太大。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不断增强的共产党空军力量已达到危险程度，如果敌空军的作战行动危及美军在朝鲜的部队的安全，美国将被迫使用快速机动部队单方面袭击中国特殊的空军基地。为了对付偶发事件并使李奇微能自由制订在和谈结束时的空中和地面作战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给联合国军司令更多的权力。他们认为，只有大规模增加兵力和武器装备才能获得作战的胜利，但是周密制定各种行动方案也能使李奇微指挥部队灵活地对敌人施加压力。应当指出，如果停战谈判不能成功并需要美国采取必要的能够确保军事上获胜的措施，美国人民可能对一场难于结束的战争日益产生厌倦。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在谈判解决朝鲜问题证明已不可能时，重新考虑美国的政策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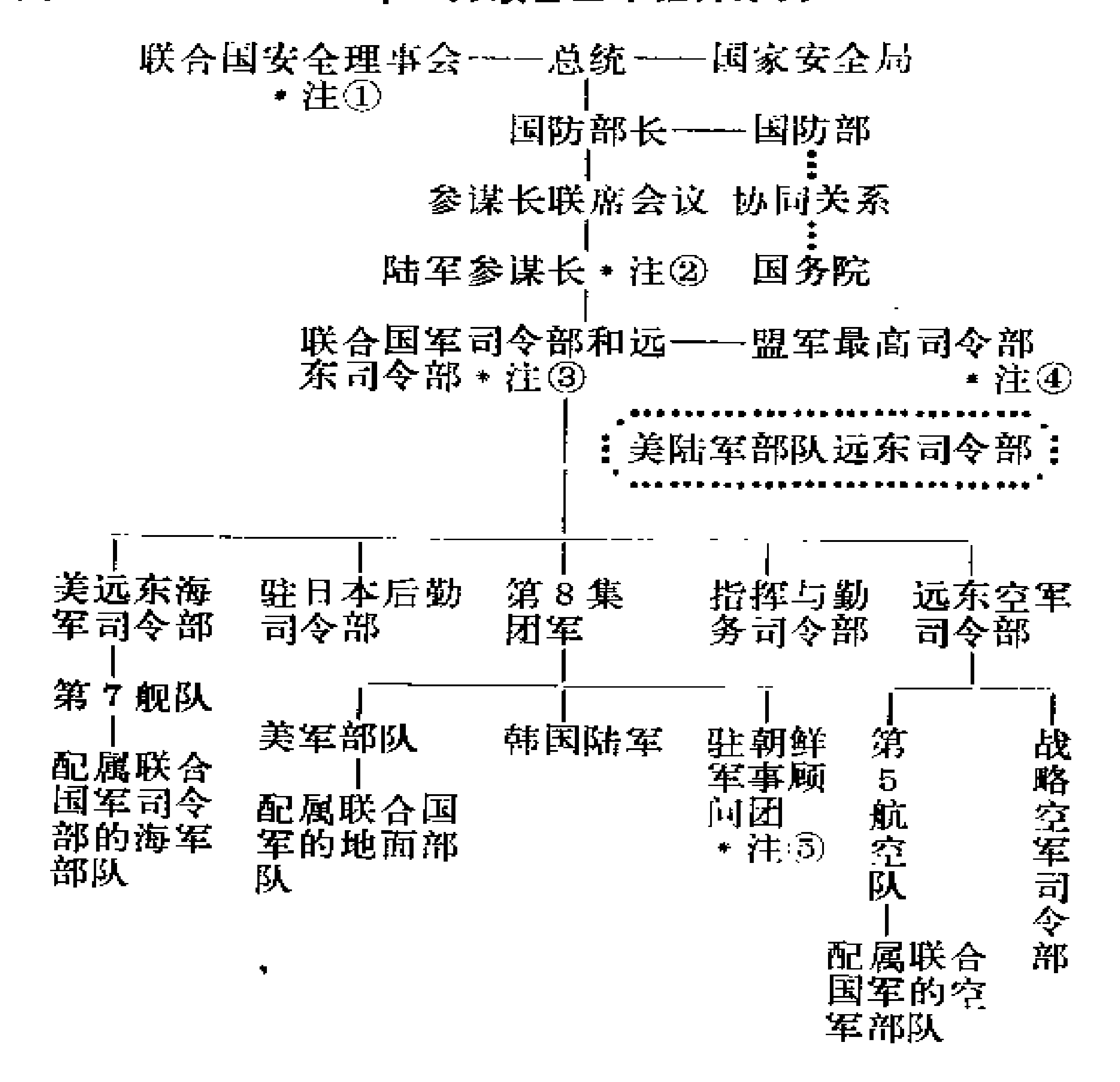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概要是简明的。除非爆发世界大战，否则美军将一直呆在朝鲜，并不断对敌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进行和谈。在这场有限战争中将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联合国军司令将拥有充分的余地使用他指挥的军队。美国的立场是坚持不懈、忍耐克制，迫使敌人达成停战协议。

三、武器和人员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将军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下达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李奇微将军仪表不凡。他胸前常挂上手榴弹，表明他是一位胜任职务的指挥官。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军总司令，负责指挥朝鲜战争，而且作为驻日本美军、盟军最高行政官和美军驻琉球群岛的最高指挥官，负责管理日本和琉球群岛地区的行政事务。李奇微派自己的参谋人员轮流在联合国军司令部、远东美军司令部和盟国军队最高司令部担任职务，比如，希基在上述三个司令部都当过参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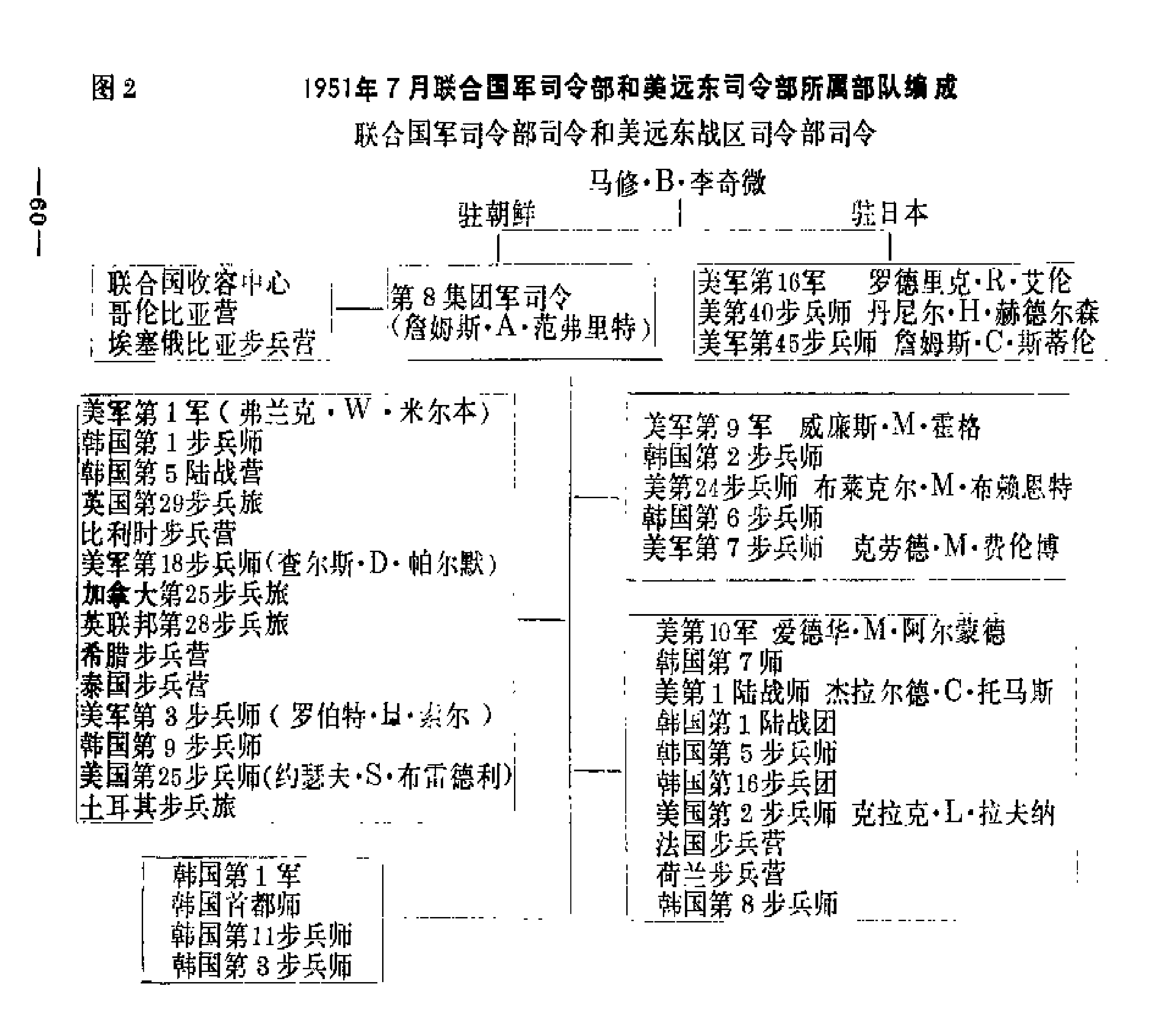
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驻朝鲜的地面部队是范弗里特将军指挥下美第8集团军，包括韩国军队和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部队。该集团军共编成4个军。美第8集团军据6月的统计为554,577人，编17个陆军师，其中7个师为美军作战师，其余10个师为韩国陆军师。此外还有4个步兵旅，1个独立步兵团和9个独立步兵营。美军总兵力为253,250人，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部队共28,061人，韩国陆军260,548人，另有为美军部队服务的12,718名朝鲜人。

图 1　　　　1951年7月联合国军指挥序列



注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无指挥权，但每二周收到联合国军司令部一份报告。
注②陆军参谋长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实施指挥。
注③联合国军司令部和远东战区司令部对所指挥的海、空军部队实施作战控制。
注④虽然美远东陆军部队司令部一直对美远东驻军进行管理，但直到1952年10月它才真正拥有作战指挥权。
注⑤驻朝鲜军事顾问团派往第8集团军司令部。它负责执行援助韩国陆军的任务并沟通第8集团军与韩国陆军的联络。

图 2　　1951年7月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美远东司令部所属部队编成



在共产党军队1951年春季发起进攻期间，美第8集团军表明它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作战部队，能够抗击敌人的打击和向敌人实施反击。虽然第8集团军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确保在朝鲜获得决定性胜利，但是它确能够有效进行防御，使战争一直保持在有限规模内。

在这种形势下，李奇微将军努力增强联合国军的军事力量。随着战线的稳定，他要求增加炮兵的作战力量。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报告，指出敌军部队在进攻时极易被第8集团军的集中火力杀伤。他认为，第8集团军增加5个155毫米榴弹炮营，4个8英寸榴弹炮营，1个155毫米榴弹炮营和2个炮兵观察营，将给敌军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

李奇微要求增加朝鲜战场美军的实力，对这种愿望，在华盛顿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李奇微提出增兵的请求只是他设想扩充朝鲜战场美军事力量的一部分。李奇微要求扩充炮兵再加上他的其他要求，共需增加远东司令部的人员57,000人。正如参谋人员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陆军只能通过全面扩充陆军的办法来满足李奇微的要求。因为这个建议在当时不合乎实际，所以参谋人员建议从美国总预备队中抽调5,000人并按计划从海上输送到欧洲战区的增援部队中，再抽5,000人增援朝鲜战场。这至少可以满足美军远东司令部的部分需要。

扩充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实力的建议受到各军种参谋长的支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8月17日批准李奇微的要求，决定向朝鲜增派5个高射炮兵营和4个野战炮兵营。这些炮兵与其他调往朝鲜的部队共约13,000人，于秋季船运至朝鲜。美国以削减总预备队和拖延向欧洲增兵的办法，尽力满足了李奇微最紧迫的部分要求。

华盛顿的参谋人员担心敌人的作战潜力在增长，他们对形势不存在任何幻想。他们认为，在夏季和谈的拖延使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在任何时候，共产党都可在敌对双方接触地区以4比1的优势兵力，使用46个中共军队的步兵师和朝鲜人民军的步兵师以及1100架作战飞机，向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时间可能会持续一个月。李奇微能集中在朝鲜战场的17个师对付共产党军队的这次进攻，但这是否足以阻止敌人的攻势呢？在美国国内，人们对朝鲜的形势并没有寄予很大希望。1951年9月，美本土共7个陆军师，只有3个师受过充分的作战训练。其中的一个师，即82空降师是美军的战略预备队。另外的2个师即第28步兵师和第43步兵师，都是计划于10月和11月派往欧洲的部队。第11空降师将于11月结束训练然后，担负美军战略预备队的任务。其余3个师即第31步兵师、第47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到1952年初才能提供使用。因此，朝鲜战场发生危机意味美军驻欧洲司令部将会再次拖延向欧洲增兵的计划。

美军在全球分散展开的部队不得不掩护各战略地区，以作好准备应付朝鲜战争的扩大或对付新战争的爆发。每个战区指挥官通常都易于只注意本战区的形势。无论何时战区指挥官总是热衷于解决本战区的问题，往往不注意从全局看待各兵种在全球承担的责任。他易被世俗弊病折磨。但是应该公正地看到，李奇微将军的言行是适度的。他稳健而坚定，勤奋工作以争取支援，尤其是1951年夏季他争取到美空军和海军的支援。李奇微担心苏联对日本的威胁。他要求在战争扩大时要增加远东地区的美空军和海军部队，以阻止苏联的扩张。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承诺，要补充美军在朝鲜战场海上和空中遭受的损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明，李

奇微指挥的部队得到增强，难免将影响美国在其他关键地区的军事部署。而且，一旦美国同苏联爆发战争，美国将需要依据全球的形势部署兵力。这种说明未能满足李奇微的愿望。当年9月，李奇微再次关切苏联可能在对日本签订和平协议时和德国局势的不稳定而进攻日本。他再次要求美国增加远东空、海军实力，但是毫无效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认为，担心苏联的扩张会保证美国武装部队的部署作出任何重大改变。

当国际局势开始稳定时，在朝鲜战场的敌军开始谨慎地扩充空中力量。美国远东空军部队，在韦兰指挥下，使用驻日本和冲绳空军基地的美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的99架B—29型中型轰炸机，对朝鲜战场美军实施支援。美空军第5航空队，编有1个轻型轰炸机联队、3个战斗轰炸机联队、2个战斗截击机联队（全部驻南朝鲜空军基地）和1个轻型轰炸机联队，1个护航战斗机联队（驻日本空军基地），对在朝鲜战场的美军实施战术火力支援。美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大部飞机归属美空军第5航空队指挥。此外，澳大利亚和南非各提供一个战斗机中队。虽然这些飞机的型号各异，有F—51型“野马”式螺旋桨式发动机推动的轰炸机和F—86“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军部队拥有朝鲜战场的制空权。无论这些轰炸机和战斗机，除了在鸭绿江附近上空外都能在基本上没有敌空军挑战的情况下漫游朝鲜战场上空。

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美海军航空中队从日本海和黄海对美军实施空中火力支援。1951年7月1日，美海军第7舰队第77特混部队对朝鲜东北部海岸进行了搜索。美77特混部队由3艘航母（“普林斯顿”号、“好人理查德”号和“拳师”号）、1艘主力舰（“新泽西”号）、2艘重型巡洋舰

(“洛矶”号和“赫勒拿”号)以及18艘驱逐舰组成。从航母起飞的飞机不仅执行对朝鲜战场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的任务，而且还执行侦察和反潜巡逻任务，以及对朝鲜北部铁路线实施空中遮断袭击的任务。

在黄海和朝鲜东部海岸附近水域，美海军第95特混部队由基兰指挥，编成联合国军的海上封锁和护航部队。这支海军特混部队由航空母舰“西西里”号和“光荣”号为主的85艘舰只编成，大部分由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和南朝鲜政府提供，这些海军军舰沿海岸线对岸上部队提供舰炮火力支援，对沿海水域实施巡逻，并控制通往朝鲜北部的所有海上通道。

第3支海军部队为美海军第90两栖登陆部队，部署在日本沿岸和朝鲜沿岸，执行两栖登陆作战任务。这支海军部队将同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海上执行封锁任务的部队协同作战。中国和北朝鲜都没有更多有效的办法对付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的海军部队。虽然苏联强大的潜艇部队在海上潜伏，在朝鲜战争扩大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舰船的主要威胁是共产党军队沿海岸附近水域设置的大量水雷。

在世界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海上和空中力量将继续能保持对敌军的优势。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海、空军部队将能完全控制朝鲜的空中航线和海上航道。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最大的弱点在地面。

四、韩国陆军的发展

李奇微指挥下的地面部队主要弱点是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的17个陆军师中有10个师是韩

国的。由于种种原因，南朝鲜部队偶尔在危机时表现得不可靠。无论停战谈判是否成功，美国都准备让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在南朝鲜担负更多的防御任务。为此，增强南朝鲜部队的素质成为关键的问题。

美国对南朝鲜部队的这种状况至少要负部分责任。美国不愿冒犯苏联人，对南朝鲜的政界领袖也不信任，因此在1945年美国政府只支持组建一支机动的和只有轻型装备的军事警察部队，来维护美军占领时期的南朝鲜秩序，不主张建立精锐的防御部队。甚至在美军于1949年撤离朝鲜时，美军留在韩国的军事顾问团只剩500人，帮助韩国政府训练了这支能迅速在1950年扩充至10万人的陆军部队。

南朝鲜陆军营以上部队缺乏合适的军事人员，也缺乏能帮助南朝鲜军进行系统军事训练的人员，这仅是存在的问题之一。当美军顾问讲解战术或讲出武器的名称时，他们遇到很多麻烦。朝鲜人拒绝用日语，使用朝鲜语言又不适当，影响军事训练。由于美国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限制向韩国提供军费援助，美国不再向韩国提供重型武器装备。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时，韩国陆军基本上没有重型武器和装备。他们在抗击北朝鲜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实施进攻的坦克部队时遇到很大困难。1950年6月，韩国的一些陆军师甚至还没有完成连一级训练任务，许多士兵不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为克服这种缺陷，韩国陆军从基层到最高阶层都任命了领导。从连一级到师一级的指挥官都普遍存在着不称职问题。

北朝鲜军队较容易地击溃了韩国陆军，迫使韩国陆军不得不重新组建新部队以阻止敌人的进攻，紧急征调新兵，发放武器，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然后派往前线以阻止突破口的扩大。韩国为对付这种危机而采取的孤注一掷行动是当时

能够作出的最有效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陆军在指挥、训练和装备方面仍然存在弱点。1950年10月，麦克阿瑟使用韩国5个陆军师投入战场，另有5个师在组建中。麦克阿瑟请求美国政府批准将韩国在战后组建的陆军扩充至10个师25万人。美国总统和美国陆军部于11月初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中共军队参战的压力下，韩国陆军又一次遭到灾难。韩国陆军指挥素质和训练素质不强使他们遭到失败。韩国陆军需要进一步整顿。尽管麦克阿瑟对南朝鲜部队的作用表示怀疑，他仍紧紧控制着拥有10个步兵师的韩国陆军作为击退侵略军和恢复原来态势的重要力量。

韩国政府和李承晚不象麦克阿瑟那样怀疑韩国士兵的战斗能力。美国政府于当年4月召回麦克阿瑟后，韩国政府在联合国和美国进行活动，争取再扩充10个由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步兵师。不幸的是，在4月22日才迟迟提出要求，而此时韩国的一个步兵师被劣势的敌人所击败，人员逃亡。此次事件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防御处于危险状态，使范弗里特促使马奇欧大使同李承晚对此事件进行交涉。范弗里特警告说，不解决领导存在的缺陷，美国将不同李承晚谈判扩充韩国陆军的问题。南朝鲜人需要的是优等的军官、良好的训练和为他们自己国家战斗的愿望。马奇欧于5月5日提交李承晚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三点内容。

范弗里特的警告并没有引起韩国总统李承晚的重视。两个星期之后，李承晚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如果美国能向韩国受过良好训练的步兵师提供武器装备，美军可以撤离朝鲜。美军对促使李承晚作出这种显然是虚伪的声明反应强烈。美军要求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马奇欧以最坚决的言词重申美国对李承晚的声明表示关切，认为这个声明违背事实。

李承晚发表声明的原因在7月开始进行停战谈判时才使人清楚。李承晚和韩国政府决心争取朝鲜的统一。随着战场的敌对双方处于僵持状态，韩国政府害怕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会撤离朝鲜，使韩国难于进行自卫。尽管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马奇欧和其他到汉城的官方访问的美国人员都向韩国保证根本没有撤退美军的计划，但是李承晚和他的顾问们仍持怀疑态度。韩国从政治角度反对停战，并且韩国军队进行扩充，不断增加压力，反映出他们这种意见。如果停战谈判开始进行，那么韩国领导人可能要保证，他们将坚持自卫立场并可能以后要单独争取实现朝鲜的统一。与此同时，华盛顿和美军远东司令部调查了改进韩国陆军在战场上的态势的问题。美陆军作战参谋泰勒5月访问了美军远东司令部，并声称要保护韩国陆军。美军许多人都批评南朝鲜陆军缺乏指挥能力。泰勒向柯林斯报告说，在局势紧张情况下急速对部队实施训练而且缺乏支援部队，这会使指挥官在作战时失去信心。他指出，南朝鲜军队对新兵的基本训练只有10天时间。训练的重点是让新兵能随部队一起行动。南朝鲜军队不注意制定长远规划，用一年或两年时间训练部队使之成为具有战斗能力的作战力量。

李奇微将军在美军远东司令部命令调查如何提高南朝鲜指挥能力的方式。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提出一种办法，即成立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校和补充兵源司令部。范弗里特同意成立训练司令部并选择钱皮尼执行这项计划。钱皮尼在朝鲜进行调查后，迅速回到美国华盛顿调查美国的兵种学校和训练学员的方法。由于他感觉南朝鲜陆军最需要步兵和炮兵军官，他推荐南朝鲜陆军指派150至200名军官组成军官学习组到美国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学习。美军参

谋人员同意他的计划，他返回日本具体制定详细的计划。1952年，钱皮尼估计约有150名南朝鲜步兵军官和100名炮兵军官派往美国专门学习20周的军事专业课。1951年9月，首批学生到学校报到。

当钱皮尼急忙建起美军驻朝鲜兵源补充司令部和新兵训练司令部时，李奇微于7月22日向柯林斯将军提出对南朝鲜陆军的看法。美军远东司令部指挥官开始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组建一个忠实于美军的积极能干的军官和军士团。在南朝鲜陆军中根本没有这种组织、而且要建立这种组织需很长时间。如果美军制定了训练计划，实施兵员补充和期待已久的训练，如果朝鲜战争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南朝鲜陆军在3年内将发展成完全能有效实施战斗的军队。李奇微指出，朝鲜停战协议将签字，联合国军在2年期间将完成任务。他继续指出，南朝鲜陆军军官到美国军校学习的课程从18周扩充到24周，南朝鲜每个陆军师应进行9周的休整。李奇微希望通过在美军兵种学校培训南朝鲜军官和集中南朝鲜陆军全部训练设施，使军训体系的训练效果更好。他继续说明，美陆军部也应给予帮助。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需要更多的人员掌握训练设备，而且美军需要在南朝鲜陆军部队表明他们能熟练掌握美军的武器装备时向他们提供自动武器、大炮和坦克。编成10个陆军师的南朝鲜陆军必须发展自己的兵种。美国需提供武器装备。李奇微最后的建议是，美国应向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南朝鲜政府采取严格的纪律，克服军官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堕落和胆小怕死的不良倾向。

1951年夏季，李奇微和他的参谋人员继续执行他的计划。南朝鲜陆军部队逐渐执行新编制和装备的计划。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参谋部在9月底将军官和人员扩充到

1,308人。南朝鲜陆军训练体系进行了改革。10月初，南朝鲜陆军训练体系开始训练1万多名学员。在兵员补充训练中心，钱皮尼作为旅级指挥官，能领导23,460名受训人员。南朝鲜训练步兵、炮兵和技术军官的学校开学。南朝鲜军事学校、指挥与参谋学院预定1952年初重新开始训练学员。美军规定了这些学校的教学指导方针，并让学校的领导逐渐明确这些方针和改进南朝鲜学员技术训练。一般来说，美军认为他们训练南朝鲜陆军军官取得了成功。在指定的时间训练南朝鲜陆军部队将证明具有象北朝鲜军队一样的作战能力。南朝鲜陆军未来的作战能力尚不能确定，南朝鲜的10个陆军师似乎可以说明，南朝鲜能在2年或3年内扩充自己的军队。朝鲜战争的结局、朝鲜的政治命运，朝鲜同美国未来的政策，短期计划的顺利实施，美国根据它的全球战略要求将能再向朝鲜陆军师提供装备，这些情况都有助于具体落实美国的长远计划。

和平谈判的副产品之一是为美军提供了加强对南朝鲜陆军进行训练的时间。在夏季，虽然共产党部队也得到加强，而且发展成为能发动重大进攻战役的部队，但是李奇微、范弗里特和他们的参谋人员最重视的是南朝鲜陆军能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作战任务。同时，这两位美军将领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联合国部队能同南朝鲜陆军和美军在朝鲜一起战斗。

五、保持联合国的支援

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时，美国一直担心能否尽可能得到更多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援。美国欢迎各国给予军事上的支援和士气的鼓舞以对付共产主义在朝鲜的侵略。联

合国的其他19个成员国逐渐派战斗部队、支援部队和医疗单位同美国与南朝鲜部队共同作战。这些国家派出的部队从编成600人的营一级部队到拥有6,000人的旅级部队。这些不同民族的国家集中派往朝鲜的地面部队到1951年6月底达到28,000人。

联合王国、加拿大和土耳其各派一个步兵旅到朝鲜，英联邦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编成一个第4旅。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荷兰、菲律宾和泰国各提供一个营。印度、挪威和瑞典派往朝鲜医疗队和医院。丹麦派一个医疗船。海上运输部队由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和泰国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联邦提供一个空军中队。

将这些复杂的部队结合成一个整体并成为有效的战争机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每个国家的部队按照战斗准备的程度分批到达朝鲜。由于英联邦的部队受过良好的训练、装备精良，而且很快建立起自己的供应线和迅速准确地部署好部队，所以他们没有暴露什么问题。由于英联邦的部队都讲英语，因此这些部队没有出现什么语言上的障碍或通信方面的麻烦。

当1950年9月菲律宾战斗营到达朝鲜，美军感到需要建立接收装备和训练部队的中心和休整新部队的基地。当年10月，联合国驻大丘接收新部队中心开始工作并帮助土耳其、泰国、印度、荷兰、法国、希腊、埃塞阿比亚、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投人战斗。

当联合国成员国的这些部队被认为作好了战斗准备时，他们便被配属于美军作战部队。美军步兵团配属一些营、美军步兵师配属一些旅。英邦盟派往朝鲜的部队编成旅级单位并配属美军第1军。美军提供行政、后勤、作战方面的支援

和指导。通过长期合作，配属的一些国家的部队和美军发展了有助于协调一致团结战斗的精神。

美军指挥官根据联合国部队执行攻、防作战任务的战斗力使用这些部队。由于朝鲜多为山地，冬季气候严寒，一些国家的部队象希腊和土耳其，容易适应这种气候和地形。而其他一些国家的部队，象泰国部队，他们来自气候温暖的平原地带，到达朝鲜遇到困难较多。联合国许多军队如菲律宾和希腊的部队是由美军军官进行训练的，对美军的武器装备较熟悉，适应美军的作战原则。而其他一些国家不得不在派到朝鲜后重新学习美军的战术和武器装备的操作，语言障碍使这些部队遇到很多困难。

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在组织国际部队方面也发挥一定作用。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使食物供应工作极为复杂。如穆斯林人具有特殊的宗教习惯，土耳其部队不食猪肉，而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不吃牛肉。法国人和荷兰人以及比利时人比美国人更喜欢吃面包和土豆。泰国人喜欢吃米饭。只有在大量储存食物并能够依据各国部队的习惯而及时制造食物时，各个国家的部队才可得到应供给的食品。

虽然联合国军各部队受过不同的训练，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各不相同，而且各个国家的人员饮食习惯也不一样，这些都产生许多困难，但是在经过一段努力克服困难的时期后，联合国军改变了这种局面。尽管卷入朝鲜战争的一些联合国成员国都努力反抗共产党的侵略，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主张采取各种方式使战争早日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拒绝麦克阿瑟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的主张。但是在美国国内仍有许多人认为任何其他途径都不能代替军事上的胜利。

美国各界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共产党中国参战的问

题。一些国家如英国和法国担心美国国内舆论界的压力会促使美国奉行侵略性政策，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轰炸，以及使用蒋介石的部队入侵中国大陆。美军同共产党军队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使人们消除了一些担心，但是停战谈判失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人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长期消耗战和扩大对共产党中国的战争都使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感到乐观。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在朝鲜的规模。虽然麦克阿瑟将军最初建议各成员国应派出装备齐全并拥有自己的支援炮兵的编成约1,000人的部队，但是到1951年春李奇微和范弗里特都认为应该鼓励联合国成员国增加兵力，向朝鲜派出団或旅规模的部队。每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团战斗队或旅战斗队应编成自己建制的炮兵、后勤和行政支援分队或机构，而且应在到达朝鲜之前训练完毕。

毫无疑问这个建议将解除美军部队对联合国部队所负的许多义务。但是人们预期开始进行的停战谈判将会很快使形势发生变化。在停战谈判开始前夕，李奇微突然改变意见，提出在停战谈判的真正结果没有明朗化之前联合国部队不再增加兵力。

夏季，李奇微在维持联合国目前的力量方面遇到了困难。法国和比利时采取特殊的措施向他们的战斗营补充兵力或轮换人员。8月，法国向朝鲜紧急输送补充人员和装备，使法国派往朝鲜的部队达到满员状态。比利时部队存在许多难予解决的问题。由于比利时只能向海外派出志愿兵，所以他们不得不为志愿兵提供额外的奖金并在他们获得其他补充人员之前让这些志愿兵执行短期军事任务。当年10月比利时将志愿兵空运到朝鲜，向比利时战斗营实施了正常的兵力补充。

美军建立了一种有点特殊的供应体系支持了联合国军司令部驻朝鲜的部队的补给。1950年美军首批部队在朝鲜半岛登陆，美军建立了一个后勤司令部向美军提供主要物资的支援。随后，美军延长了供应线，美陆军相应地组建了陆军勤务区和前方补给点。因为朝鲜实际上是一个战区，美军进一步采取措施组建运输区域司令部负责整个后方地域的后勤工作，使陆军指挥官能集中时间指挥前线的作战行动。但是李奇微作为第 8 集团军指挥官仍然坚持他负责的地区是朝鲜沿海。范弗里特也不愿改变这种状况。因此，美第 8 集团军实际控制着朝鲜的铁路网、后方地域的安全、朝鲜的民事、韩国陆军的训练和朝鲜的战俘以及后勤支援等。美军第 2 后勤司令部在杨特将军指挥下，在釜山设指挥部，负责对驻朝鲜美军直接实施后勤支援，并作为美军主要办事处向美军驻日本后勤司令部提出要求。美军有 3 条补给线经过南朝鲜的大门——釜山。一条是美国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的大部分成员国部队的补给线；第 2 条是英联邦派遣部队的补给线；第 3 条是韩国部队的补给线。美国的后勤体系是规模最大的。它负责向英联邦部队提供新鲜食物和油料，除了担负美军和联合国军其他部队的全部补给任务外，还向韩国军队提供全部所需的战争物资。

虽然美国担负联合国军大部分补给品和装备的供应任务并负责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但是美国期待最后联合国成员国会偿还美国为联合国军提供的物资费用和后勤工作费用。美国向联合国军提供物资装备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但在战争中存在着如何能使联合国成员国偿还美国提供物资费用的问题。随后，美军执行记帐制度，以便在需要交涉偿还美国的花费时，美军能公正合理地提出精确的数字。美第 8 集团军每周

和每月都向美国政府报告向联合国部队提供的装备、军火和补给品数量，加上美军的经营管理费用。1951年春，美第8集团军试图建立一种制度，使美军可根据每人每天使用的费用算出全部费用。但在当年6月这种制度被废弃了。美国陆军部决定核算将被偿还的总金额代替成本核算。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由华盛顿的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决定。但是，无论使用什么制度来计算帐目或使用什么方法收回偿还费用，美第8集团军都不得不担负经营管理任务和记帐任务。只要朝鲜战争继续打下去，美国继续负责向其盟国军队提供补给品，美第8集团军担负的经营管理任务和记帐任务便是必需做的一项工作。

1951年夏和初秋被认为是准备进行战争的时机。美军指挥官广泛考虑了在和平谈判失败时进行作战的计划，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都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研究提高部队战斗效能的问题，并制订计划准备扩充可靠的韩国部队。另外，派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联合国成员国都密切注视停战谈判会议的进展情况，因为停战谈判的结局将影响他们的计划和他们下一步的准备工作。尽管和平谈判中有许多欺骗行为，但是反常的信息还是在战场传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的停战谈判使美军难于制定各种计划。虽然美军奉行对朝鲜战场的敌军施加军事压力的政策，但是美国的计划是具有灵活性的和机会主义的而不是顽固不变的。这种作法使人们回忆起1943年至1944年美军对日本军队的作战。美国企图象过去在中国组织地面部队那样扩建在朝鲜的韩国军队。虽然美国一直向战场提供大量人力和资源，但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争取了许多可以协同作战的盟国。美国采取灵活政策和机会主义的措施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中期的基本政策，而

最终目的是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不是通过谈判求得和平。苏联站在一旁观战所起的作用与美国当年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法类似。目前苏联正在发挥坏作用，一旦需要它将参战。

美国和其盟国一直等待和平谈判的结局，人们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景捉摸不定，观望和猜疑的情绪在战场和在谈判桌上都有所反应。和谈真正开始后，军队在前线开始按开城停战谈判会议中的意图采取行动。

第五章　新的战争

1951年春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阻止了敌人进攻之后，第8集团军未曾做发起反攻的努力。问题不在于范弗里特将军的部队缺乏把敌人从三八线赶往北方的能力，而在于把敌人"赶走多远才能造成其最大的损失"。只要从三八线向北方前进就必将缩短共军的补给交通线，而在同时也将延长第8集团军的补给交通线。要恢复北朝鲜已遭破坏的交通并在这些荒凉地区担负起民事管理等任务也绝非易事。最重要的是，范弗里特必须牢记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他缺乏足够的部队以机动和包围的方法来消灭敌人；如果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将军明确的许可，他不能超越跨立于三八线上的"堪萨斯——怀俄明"防线。鉴于这些限制因素，加之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大多数国家不愿再次向鸭绿江开进，因此1951年春范弗里特自然得出结论："继续追击敌人既非可行又不适宜。第8集团军最有利的使命是在三八线以北的有利地形上建立防线，以便从那儿发动有限的进攻，对敌人实施最大的打击，这样对于保存第8集团军的兵力始终冒着最低的风险。"

第8集团军建立防线的决定以及在前线只进行有限规模进攻的决定，标志着朝鲜战争机动作战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新的战争的开始。

一、堪萨斯——怀俄明线

范弗里特选定的堪萨斯防线，始于汉城北20英里的临津江口，沿着该江的南岸向东北蜿蜒伸展，通过荒凉的海拔逐渐升高的山地。山地有中等程度的树木植被。与临津江穿过三八线的地方，堪萨斯线转向东，上伸华川水库，然后转变角度再次越过峭壁及长满树木的南大白山脉折向东北，一直到三八线以北25英里的东海岸。从华川水库到东海岸的地形特别崎岖。山坡陡峭，特别是西坡及南坡更甚，几乎没有道路。堪萨斯防线的防御由于充分控制了沿线有利地形以及无数的水障而得到了增强。

怀俄明线作为保卫西线堪萨斯防线的入口，由临津江口向着乔原沿东北方向屈伸，通过金化以东，而后折向东南，最后与华川水库附近的堪萨斯线相交。1951年春，怀俄明线成为屏护堪萨斯线的前哨。

虽然堪萨斯防线使敌人得以控制所谓"铁三角"乔原—金化—平壤地区，但范弗里特认为，该线向联合国部队提供了有利的防守地形，公路、铁路网以及后勤支援都有利。如果停火的话，6月初他推测说，第8集团军至少还可以前进10英里，做为停火条件的一部分，双方可能同时后撤10英里以组成缓冲区。李奇微同意了这一计划。

与此同时，范弗里特指示各军长增强堪萨斯线的防御纵深，并沿着怀俄明线构筑野战工事，以便敌人到达堪萨斯线之前迟滞并减弱敌军进攻。在前沿的东端，美国的第10军和韩国的第1军应在主抵抗线之前建立巡逻地区，以保持与敌军接触。为了防止敌人从阵地上化装为农民来搜集情报，范弗

里特向所属下令，在作战区要清除所有的朝鲜老百姓，把他们遣送到后方地区。

由于东部地区多山且道路不好，范弗里特已经部署了4个军，韩国第1军组成东部的支撑点，侧翼的美国第10军位于东部中线，美国第9军位于西中部地区，而美国第1军则保卫西部的最宽大地区。前3个军的正面比较狭窄，因为防区内山地崎岖，缺少良好的道路。由于韩国军队生活必需品用得较少，且保障单位也不多，因而韩国大多数的作战师都部署于那些只能保障最低后勤供应的地区。

到7月1日，堪萨斯防线主要工事的构筑已接近完成。为了加快工程构筑，范弗里特向前线派遣了南朝鲜国民警卫队3个师作为劳工部队，也就是说，每一个美国的军配属了一个南朝鲜的劳工师。沿堪萨斯线用圆木及沙袋构筑的掩体以及深而窄的堑壕好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事。掩体通常贴近横向的堑壕之前，用以配置自动步枪和机枪。大多数掩体构筑在山腰或鞍部，而较大的掩体则构筑在山头上，以做为前进指挥所和观察哨。

陆军构筑的掩体通常有坚固的掩盖，并把生活区划分在战斗区之后。每个掩蔽部都很精巧、舒适，例如有吊床、地板以及营具。

步枪手和火箭筒手沿着横向堑壕的胸墙开了口以便发扬火力。在步枪手和火箭筒手的稍后，便构筑了无后座力炮发射阵地并以沙袋加固。在山头的反斜面遮蔽地，构筑有迫击炮发射阵地，并开辟了坦克机动道路，坦克可在筑有胸墙的前线阵地上开火。阵地普遍进行了伪装。

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还在前方设置了有刺铁丝网，并埋设了地雷，以迫使攻击陷人最密集的火力之下。在美国第

1 军和第 9 军的防区内，只占领了怀俄明线，而没有占领堪萨斯线，部队只是标定了雷区，挖了坑，并在附近储存了地雷，一旦必要从怀俄明线撤退的时候即可布雷。

在仓卒建筑起来的工事中不久就暴露了许多缺点。撑木不足致使掩体顶部陷落，6 月的大雨使一些掩体坍掉。只好重新选址重建。随着经验的增加和不断地进行检查又发现了防线的其它弱点。当灌木从自然干枯的季节，阵地的轮廓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掩体、道路口、火力发射阵地等暴露了防线位置。在某些地段上，由于铁丝网设置不当，妨碍了火力的发扬，而有些战术性铁丝网设置的位置太靠近前沿，使得敌人可以径向堑壕投掷手榴弹。但是这些不足到 6 月底都得到改正，堪萨斯防线足以抵抗除敌人大规模进攻之外的其它任何类型的进攻。

第 8 集团军没有按通常的办法组织全般战斗警戒阵地，而是组织了一系列巡逻基地。起初前沿部队修筑巡逻基地，与此同时预备队则修筑防线本身的工事，这样就加大了防线的纵深。这些巡逻基地距制高点上的主作战线足有10英里，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不能相互支援。后来就用预备队的兵力防守这些巡逻基地，通常一个加强连可派出2,000码的距离，营或团可派得更远。巡逻基地的派出距离处于中程支援炮火的范围之内，并与敌保持接触，接触的方法是积极进行巡逻，捕捉敌方俘虏或以抵抗敌方首次攻击的办法来发出战斗警报。绊索照明弹、地雷、带刺铁丝网，计划火力区以及其它的火力支援使得敌人对巡逻基地难以渗透。巡逻基地经常受到中共和北朝鲜的惯用战术——夜间进攻。一旦敌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时，各分队可完整地退守到主抵抗线上。

巡逻基地的建立以及由于停战谈判引起的 6 月的战斗间

隙，使得第8集团军拥有时间以改善怀俄明防线的工事。范弗里特将军决定把怀俄明防线建成永久的防线，加大防御的纵深，并在6月30日通知各军长，应把该防线视为主抵抗线。只有在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才允许第8集团军撤到堪萨斯防线上组织反攻。

截至夏季的中期，防线已趋成型。第8集团军建立了防御工事，这时既可发动局部的进攻，又可击溃敌人试图突破堪萨斯——怀俄明防线的进攻。

二、敌　　情

尽管6、7两月共军不断增加兵力，但预料的进攻并没有发生。敌人在利用铁路和公路运输补给品，并加强防御工事。交战双方由于夏初战斗活动减少，伤亡不大，共军持续进行大量补充，因而进攻的能力随之提高。

据第8集团军估计，7月1日共军在朝鲜的总兵力为459,200人。其中，中国军队为248,100人，其余为北朝鲜军队。此外，在南朝鲜的北方游击队还有7,500人（见表1）

表1　第8集团军对敌兵力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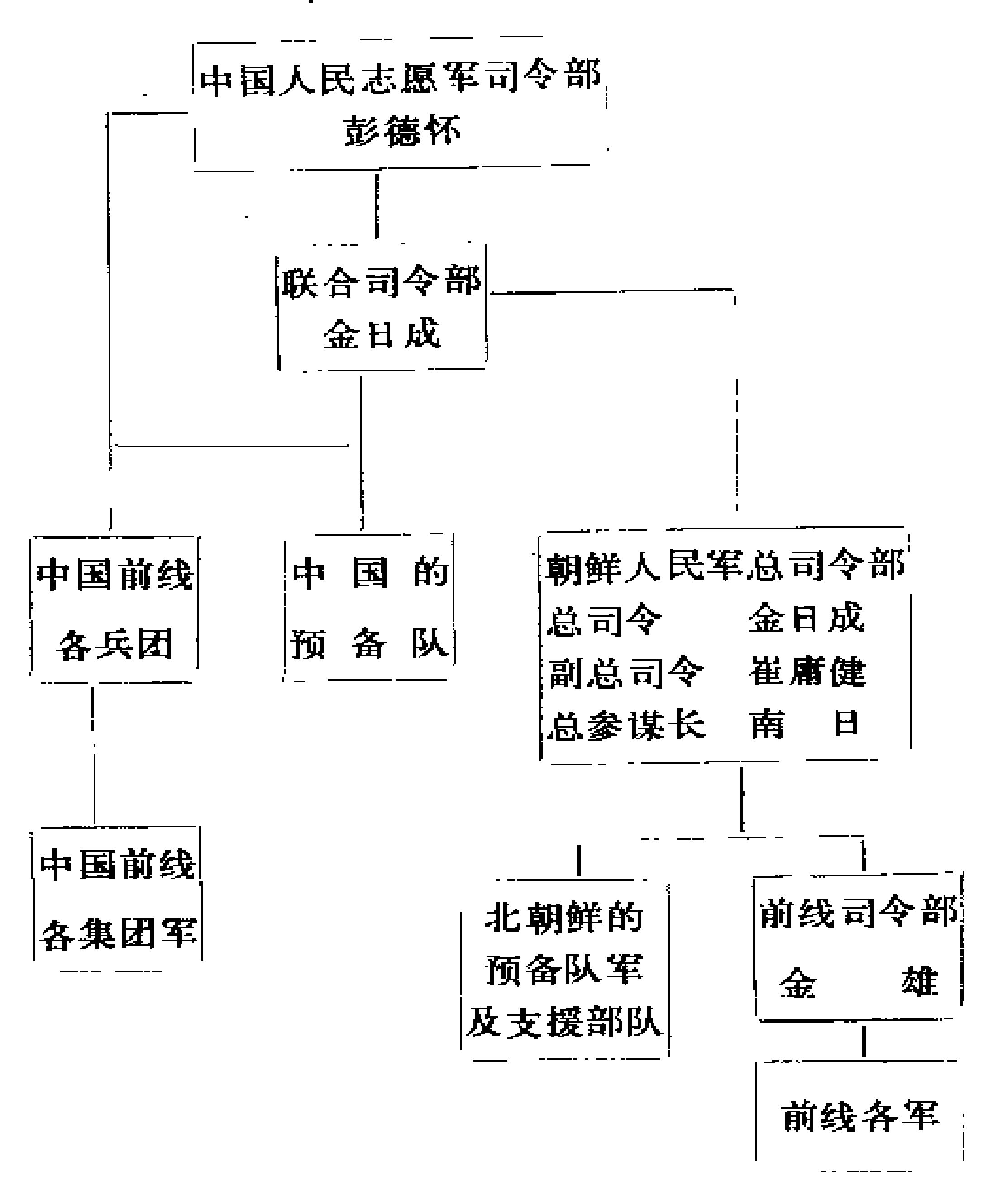
中共军队	248,100人
第12军	
31、34、35师	16,100人
第15军	
29、44、45师	14,400人
第20军	

58、59、60师	16,400人
第26军	
76、77、78师	19,700人
第27军	
79、80、81师	26,000人
第38军	
112、113、114师	13,900人
第39军	
115、116、117师	24,000人
第40军	
118、119、120师	18,500人
第42军	
124、125、126师	29,000人
第47军	
140师	8,500人
第60军	
179、180、181师	13,900人
第63军	
187、188、189师	13,900人
第64军	
190、191、192师	17,700人
第65军	
193、194、195师	16,100人
朝鲜人民军	211,100人
第1军	
8、19、47师	15,800人
第2军	

2、13、27师	18,700人
第3军	
1、15、45师	30,400人
第4军	
4、5、105装甲师	
26旅	29,200人
第5军	
6、12、32师	14,300人
第6军	
9、17机械化师	
18、23师	35,500人
第7军	
3、24、37、46师	
63旅	35,500人
其他部队	31,700人

从理论上说，朝鲜境内共军的指挥权赋予以金日成为首的联合司令部，由北朝鲜和中国的军官任参谋工作。但从实际上看，敌人的作战活动似由彭德怀将军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部位于沈阳。联合司令部只是个情报交换所和信息中心，中国人很明确，他们直接从沈阳接受号令。在前线，中国有5个兵团司令部，每个兵团辖2个或2个以上的军。（见序列表）

1951年6月1日敌军指挥序列



在中国的军事制度中，军一级是基本战术单位。满员编制，它的兵力应为21,000至30,000人，约相当于1.5个或2个美军师的兵力。每个军辖3个师，通常还辖1个炮兵团，1个警卫营、1个侦察营、1个工兵营和1个运输营、1个通信连及1所医院。由于春季攻势的战斗损失，在朝鲜的中国各军于6月1日处于减员状态。有7个军部署在中线附近，其余6个军为预备队。

中共的步兵师是三三制，各团平均约为3,000人。武器装备混杂，有俄国的、日本的、美国的，还有中国制造的仿造品。一个标准团的火力可能组成是：180支手枪，400支步枪或卡宾枪，217支冲锋枪，60挺轻机枪，18挺重机枪，9挺12.7毫米高射机枪，27门60毫米迫击炮，12门81或82毫米迫击炮，4门120毫米迫击炮，6门57毫米无后座力炮，18具火箭发射筒，4门70毫米步兵榴弹炮。每个师配属有1个炮兵团，它通常由3个营组成，编制火炮36门。中国的火炮有俄国造、日本造，还有美国造，大都口径为75毫米至155毫米的榴炮。

中国兵是能干的。在1951年头6个月中，他们一直保持机动作战的态势，并力求诱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扩大军队部署，以便他们尔后各个击破。中国军队不在乎地盘的得失，撤退如同前进一样重要，是战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军队与北朝鲜军队有着显著的不同，北朝鲜军队注意夺取地盘，并始终不愿意放弃地盘。

金日成首相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的挂名司令，他把指挥权交给了副总司令崔庸健元帅及总参谋长南日。前线最高的指挥单位是前线司令部，司令为金雄，他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官。

北朝鲜的军队编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军队不同。军一级是其军队的基本战术单位。在兵力上，通常约等于2个美军师。但军下面所属的师往往各不相同，在这一点不同于中国军队。当战斗需要时，北朝鲜军队的师可在各军之间灵活调动。1951年6月北朝鲜共有7个军，全部部署在前线——西海岸有3个军，东线有4个军。除掩护翼侧防止联合国军登陆之外，也用于防守前线。

虽然共军在人力上可与联合国军匹敌，但他们的火炮与装甲不足。根据敌军炮击报告，6月前线敌共有火炮350门，其中多数为75毫米或76毫米，还有105毫米、122毫米以及少量的155毫米榴炮。中国和北朝鲜的步兵都没有建制的坦克。中国的所有坦克师在中共境内，而北朝鲜唯一的坦克师部署于平壤以北的西海岸。

尽管敌人缺乏坦克和重炮，但6月的进攻能力还是增加了。有迹象表明，共军可能对美远东空军所享有的绝对制空权构成挑战。情报估计，位于满洲境内飞机总数为1,050架，包括595架战斗机，175架靶机，100架运输机，180架训练及侦察机。约有445架战斗机是喷气式的，其中包括俄式米格——15飞机。米格——15飞机在某些方面比联合国军最好的战斗机要先进一些。美远东空军估计，只要中共空军训练出驾驶员及维修人员，俄国就可以提供飞机。

由于敌趋于采取守势并准备重复早先的一种作法，即撤到掩护部队之后再发起下一个攻势，因此第8集团军保持警惕和谨慎。6月24日在接见美1军新任军长约翰·W·奥丹尼尔少将时，范弗里特说："假如敌军只是集结其现有部队，那只能搞成一次有限目标的进攻；但假如敌集中数个新的兵团——敌可能集中两个以上的新的兵团，而我们又毫无

察觉，加上敌后勤供应状况也大为改善之时，敌就可以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但我认为，他们还未到达那种程度，但我们必须准备去应付敌人的最大能力。假如停战谈判失败的话，我们必须准备去应付敌之进攻。”

三、联合国军司令部掌握主动权

虽然范弗里特感到，在目前的情况下，第8集团军可以有效地迎击敌对堪萨斯——怀俄明线的进攻，但他和参谋军官遵照李奇微的指示还是制定了一个进攻计划。6月初便呈交了“压服计划”。计划大意是，当能提供一些满意的条件时，第8集团军即将在9月1日前后发动进攻并攻占平壤——元山一线。假如敌方情况严重恶化，或向北撤退，假如第8集团军的任务有所变化，或给第8集团军增加一些新的兵力，范弗里特则认为，“压服计划”是可行的。

6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撤消了原指示，李奇微必须执行先前批准的一切地面作战计划，但这位远东战区司令对“压服”计划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范弗里特把这一计划与停战谈判的开始联系起来，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可怕的理由，即在目前条件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因此，李奇微决定视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再对“压服”计划采取行动。

范弗里特本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可以发动一场有限的进攻，但把开城选定为谈判的地点，就抵销了他所计划攻击的地点之一。此外，停战谈判又使双方在6月不愿意再牺牲人力和消耗装备。因此，自6月初到6月底，范弗里特才发布了第一道进攻命令。

第8集团军改变消极防御以来，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其情况变好。由于敌人在战场上已经暂停进攻以集结军需物资和使战斗部队得到休整。范弗里特打算侦察共军的防线，测定敌兵力部署，并以干扰的方法使之无法增加进攻能力。此外，范弗里特意识到第8集团军的战斗效能在6月的下半月已经下降。巡逻情况一般，没有抓到俘虏。情报收集的任务日益困难。即使是强化的训练计划也不足以恢复第8集团军的士气和作战能力。懒散加上对停战谈判的希望组成一种很难消除的情绪。正如范弗里特后来所说："敌人一宣传就撤手不干的军队是易于垮掉的……作为第8集团军的司令，我不能允许部队变得软弱。"

在扰乱敌防御部署和磨练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的过程中，范弗里特也期望改善己方前线的防御部署。有几处制高点，如被对方占领之后可对联合国军的交通补给线构成威胁，如我方占领可消除防线中的低凹地区。范弗里特打算消除的一处低凹地位于美第10军防区内的崎岖的大白山脉之中。

在华川水库东北2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的山谷，大家叫"大钵盆地"，周围有很多山，从谷底陡然升高1,000至2,000英尺。照阳江从山谷的南侧向大钵盆地以东流去，而在西侧，舒川江及其支流之一把大钵盆地从后面的一系列山脊分开。6月北朝鲜控制了大钵盆地以西、以北及以东的制高点，因此他们可以观察到联合国军的防线及军队的机动，并能以直瞄炮火轰击堪萨斯线。夺取敌高地上的阵地就可减轻从这些高地上发起进攻的威胁，这些进攻可以割裂美10军与韩国第1军沿着大钵盆地东侧延伸的分界线，这样还可以拉直并缩短防线，并能使范弗里特集结较大的预备队。6月21日范弗里特命令第10军制订夺占大钵盆地西侧地区的作战

计划。

6月晚些时候，第38步兵团夺占了名叫大榆山的1179高地，并在该地建立了巡逻基地，这样由少将克拉克·L·拉夫纳所指挥的美2师就在大钵盆地西边有了据点。一直到8月中旬，天下着大雨，道路无法使用，也限制了空中与火炮的支援，因而推迟了在大钵盆地附近采取进一步的攻势行动。8月4日和8日美1军在西部防区内发动的牵制性的攻击没有遭到敌人的反抗，主要困难来自涨起的河水以及不可靠的道路。

8月18日天气好转，可以发动夏季攻势了。韩国第1军的11师和首都师及美10军的韩国第8师向位于大钵盆地东北方的J型山脊发动了进攻。山脊的最高峰为1031高地，它位于大钵盆地东北边缘约5英里多一点。韩国部队由第1军的培善岳将军指挥。但进攻遭到北朝鲜第45、13和第2师的顽抗，他们挖壕据守在山顶上。培的部队向有坚固防御阵地的北朝鲜进攻了11天。当韩国第8师部队向北面攻打J型山脊的钩角时，培将军的大批士兵从东侧和东南侧展开并攻击山腿。攻击部队曾到达山脊线的目标，但没有及时增援，无法对付随之而来的反冲击。这种没完没了的冲击和反冲击一直持续到范弗里特视察培的指挥所，并指出了他的战术错误之后才停止。第二步，培增加兵力实施进攻，并在8月27日攻占了J型山脊的钩角，并在两天之后又攻占了山腿。由于占据了J型山脊，就可掩护第8集团军沿着照阳山谷走向的供应线，并使韩国第1军可观察和射击位于大钵盆地北面之敌方阵地和机动部队。

8月18日，在攻击J型山脊已经开始之后，韩国第5师的36团也开始了夺占大钵盆地西侧高地的战斗。范弗里特指

示克洛维斯·E·拜尔少将消灭敌重要的观察所，因为这些观察所可为从1179高地以南、向西约2英里处的山脊发射密集而准确的火力轰击堪萨斯线指示目标。范弗里特认为南朝鲜部队缺乏信心，因此他命令拜尔使用韩国部队实施冲击。因而拜尔把第36团转隶给美2师。

目标是东西向山脊的3个高地，其中西侧高地最高，海拔983米。山脊形如H型山脉的横闩，它俯视983高地南约2英里的第2师前进阵地。韩国第36团经过5天的不断冲击，终于攻占了山脊。该山脊后来叫做“血染的山脊”，但在北朝鲜的重压下，又被迫撤出。因此，第2师师长拉夫纳不得不命令美军第9团支援韩国军队，但敌人仍然顽抗。北朝鲜设置了密集的地雷场，并构筑了坚固的掩体，除了炮弹直接命中以外，这些掩体可以抗住各种轰击。他们等到联合国军的炮火和空中支援停止以后，再用弹药充足的自动武器和手榴弹反击。当第8集团军的士兵艰难地爬到距陡峭的山坡只有几码远时，共军迅速进入发射阵地，向攻者射击和甩手榴弹。

由于伤亡持续增加，使韩国第36团的士气低落。8月27日该团的某些分队溃逃了，并在美军第9团的一些分队中引起恐慌。“血染的山脊”战斗情况恶化，促使拜尔将军于8月28日改变进攻方法，决定于8月31日起在正面发起有限的进攻。拜尔期望以向宽大正面上施加压力的方法，迫使敌人分散向“血染的山脊”的火力与兵力增援。因此拜尔重新安排3军的正面上各师的攻击目标。夺占大钵盆地西北边缘的任务交给了韩国第5师，而夺占大钵盆地东北的任务则赋予了美第1海军陆战师。与此同时，第2师重新组织力量攻占“血染的山脊”，而韩国第7师则攻取山脊以西地区。

8 月31日美第1陆战师及配属的韩国陆战队开始进攻，敌方抵抗不甚激烈，但第二天抵抗增加。尽管抵抗趋向激烈，但陆战队可以前进并夺占了大钵盆地北侧边缘上的数个山头。北朝鲜第3军从韩国第1军正面撤出，取代了北朝鲜第2军的防线。当着北朝鲜第2师接替第1师的时候，陆战队攻击了第1师的阵地。当在9月初，换防结束的时候，陆战队已经控制了“血染的山脊”和大钵盆地北侧的另一个高地。由于第10军当面的北朝鲜刚刚在“血染的山脊”遭到失败，范弗里特认为，立刻猛攻可使敌丧失平衡，并可在共军喘息之前夺占新的山脊线。

第10军把夺占“血染的山脊”两侧山峰的任务交给了美军第2师。目标是界于南北走向的西侧的蒙德尼山谷和东侧的萨塔瑞山谷之间的南端。夺占了中央山脊即可阻止敌人利用附近的山谷向大钵盆地西侧第10军的防线发动进攻。

该目标区后来被采访作战情况的新闻记者叫做“伤心岭”，它有三个主峰。南端是894高地，这里扼南部三英里以外的“血染的山脊”的入口；931高地为该岭的最高峰，位于北侧的1,300码处；而在931高地以北2,100码处有象针一样的凸出物851高地。

从“血染的山脊”撤退之后，北朝鲜就扼守既设的掩体、堑壕和火力发射阵地，掩护通向伤心岭的入口，这里的工事构筑与先前第2师所遇到的工事一样坚固，伪装得也很好。“血染的山脊”战斗结束于9月5日，而在8天之后才攻击伤心岭，中间的暂缓使得北朝鲜加强防御并增加守卫部队。在蒙德尼山谷，北朝鲜第3军的第12师控制了沈浦江西岸的山头，而该军的第6师负责防守伤心岭以及萨塔瑞山谷防区。空中照片说明，敌人在伤心岭地区的防御甚为积极，

炮兵群和追击炮阵地位于岭的侧翼谷中。但浓密的树丛使我方无法对敌方工事实施照相侦察，同样还隐蔽了一种情况，即第2师将再次面临着突破敌主抵抗线的任务。

在第2师内，关于敌人对攻打伤心岭可能反应的程度，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炮兵指挥官埃德温·A·沃克认为，北朝鲜会“拚命地干”，而某些参谋军官则推测，敌人不会那么拚命。当时的师长德·谢佐显然赞成后者的观点。他决心使用一个团——第23团担任攻击部队。由上校詹姆斯·Y·亚当斯指挥的第23团应从萨塔瑞山谷东侧通过，在931高地和851高地之间切开伤心岭。尔后以1个营转向北面夺占851高地，同时以另1个营转向南面夺占931和894高地。一旦第23团控制了894高地，由上校约翰·M·林奇指挥的第9步兵团应立即前出并夺占894高地西侧靠南一点2,000码处的728高地。

9月13日第2师的部队进入阵地并准备好了进攻。由中校拉尔夫·蒙索勒指挥的法国营已经接替了第38步兵团在868高地上的防御阵地，868高地位于931高地东面2英里多，而第38步兵师编为师的预备队，负责堪萨斯线的警戒。第9团应在第23团夺取894高地之时，前出到728高地。对第23团的直接支援火力由中校林顿·S·博特赖特指挥的第37野战炮兵营的105毫米榴弹炮担负，与此同时，第503野战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第96野战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第38野战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以及780野战炮兵营的C连（8英吋榴弹炮）负责全般支援。第37和38野战炮兵营位于伤心岭东南3英里。第96和503炮兵营分别位于各自攻击目标以南约7英里和东南9英里，而780炮兵营的炮连位于亚昂尼附近，即伤心岭以南约11英里。

5时30分炮火准备开始了，持续了30分钟，炮弹纷纷落在伤心岭敌阵地及其附近。尔后由亚当斯上校（西点军校毕业生），发出信号，第23团开始攻击。中校弗吉尔·E·克雷文指挥的第3营成连纵队开路，由中校亨利·F·丹尼尔指挥的第2营跟进。当着攻击部队由702高地向北面的萨塔瑞山谷机动，到达伤心岭的入口、东西走向的山嘴时，北朝鲜以浓密的炮火从伤心岭的阵地和萨塔瑞城周围的高地上开始倾泻到第23团的官兵头上。尽管伤亡不断增加，克雷文的部队还是奋力向前，丹尼尔的部队则紧紧跟上。当着第3营到达山嘴并向山头冲击以割裂伤心岭防线时，真是捅了马蜂窝。北朝鲜第6师第1团在一系列隐蔽的、相互支援的掩护体内以机枪和轻武器射击，这些掩体正好卡住了岭的通道。除了敌观察员正引导火炮和迫击炮射击进攻的两个营之外，自动武器与步枪也迫使进攻部队停下来，并在山嘴构筑工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迅速突破敌防线的希望破灭了，第23团面临的是北朝鲜的主防线，而另一个“血染的山脊”隐隐呈现在前头。

当第23团战斗情况报告送达德·谢佐将军的时候，他感到，以前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鉴于由林奇上校指挥的第9团已经进入阵地并准备攻击728高地，德·谢佐将军于9月14日命令林奇把他的团攻击目标改为894高地。夺占894高地如果成功可以减轻第23团的压力。9月14日，第9团2营从亚洞向894高地的西南山脊前进，该营加强有第72坦克营的B连，重迫击炮连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兵营。黄昏时，第2营已经爬到距894高地山顶650码的地方，只遇到敌方轻微的抵抗。9月15日继续攻击，到下午就肃清了敌人。至此，第2营只有11人的伤亡，但在尔后的2天中，当北朝鲜进行

激烈的反冲击企图把第2营从山头赶走的时候，第2营的伤亡达200多人。

第9团夺占894高地的计划没有成功，但当该团企图再次切断931高地与851高地之间的联系时，解除了对第23团的压力。敌炮火把攻击部队压在低坡上。9月16日，亚当斯上校命令他的第2、3营改变在战斗中曾经采用的成纵队并肩攻击的队形。这样当第3营重新向正南实施攻击的时候，第2营便转向西北，并沿着另一个山嘴向931高地前进。与此同时，第1营的C连越过了第9团在894高地上的阵地，并力图从南侧攻占931高地。由于敌火力猛烈，攻击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北朝鲜的防御部队依靠构筑坚固的掩体等待对第2师攻击部队进行的火力与空中支援完了之后，再回到他们的射击位置。当第23团的士兵爬到距山顶只有几码时，北朝鲜以自动武器，步枪和手榴弹开火。由于敌方控制了蒙德尼山谷，该谷又提供了遮蔽的不太深的接近路，因此增加兵力以及后勤供应问题都不难解决。事实上，9月16日北朝鲜第6师师长韩宁在派遣新生力量第13团接替第1团的时候，并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对美2师来说，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伤心岭西南部的皮亚瑞山谷挤满了各型车辆，且暴露在敌炮火和迫击炮火之下。当敌人距离很近时，朝鲜民工经常把所运货物扔到小路旁，或者逃走。为了保持前沿部队的食物、水、弹药及装备的供应，并减少伤亡，经常要求美国的步兵既当运输兵，又当担架兵。地形崎岖，加上敌人就近扼守着伤心岭的通道，使得美军士兵担负的勤务工作既危险，又费时间，从前沿阵地上抬下1个伤兵就需要10小时。

岭上的战斗僵局逼迫林奇上校于9月19日提出增大进攻正面以分散敌人集中防御的办法。他敦促德·谢佐将军让他的第9团1营越过蒙德尼山谷，并分别夺占849高地西南三、四英里的867和1024高地。林奇推论说，如果敌人假定，这次进攻标志着从西面包围伤心岭的开始，那么就可能转移其兵力兵器阻拦这次进攻。但是德·谢佐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第10军军长拜尔将军早已指出，必须首先夺占931高地。

当第二天，第2师新任师长罗伯特·N·扬少将来到时，他裁决林奇的设想是正确的。他命令林奇夺占867和1024高地，于是第9步兵团团长决定9月23日攻击1024高地，待夺占1024高地之后再夺占867高地。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告知拜尔，第10军将其侧翼前出，与美第9军构成调整线。这样，9月22日拜尔指示韩国第7师拿下1024高地西北约2,000码处的1142高地。对于1024和1142高地这种双管齐下的进攻很可能促使北朝鲜认为这一威胁甚为严重，从而放松在伤心岭上的防御。

9月21日和22日，第23步兵团对伤心岭的进攻成效不大。由少校乔治·H·小威廉斯指挥的第1营再从南侧企图夺占931高地，同时丹尼尔斯的第2营则从北面攻击。9月23日第1营的各分队向主峰勇敢前进，但是挡不住敌人的反冲击。北朝鲜第12师第3团的一个连从东面发动一次拂晓攻击，战斗激烈，第1营损失十分之一。当威廉斯部队弹药打完时，不得不撤出931高地。

第9团和韩国第7师越过蒙德尼山谷对1024和1142高地发动的牵制性进攻取得了很大进展。9月25日，第9步兵团第1营清除了1024高地主峰上的敌人，韩国第7师翌日又拿下了1142高地。北朝鲜鉴于附近的867高地受到威胁，而867

高地又是从北面控制山谷的一个关键地形，因此迅速把第6师第3团从伤心岭调到867高地实施防御。

然而北朝鲜这一部署未能阻拦第23团进攻931高地。虽然法国营接替了第2营，并沿着山脊线向南进攻，而第1营则从北面向931高地施加压力，但还是被北朝鲜第15团于9月26日打退了。第23团团属坦克在萨塔瑞山谷里向北面机动很远，并以直瞄火力射击敌人控制伤心岭东面入口的掩体，但对于能阻止第2师进攻的重迫击炮和机枪则无法消灭。

在将近两个星期对敌伤心岭防御阵地实施猛攻之后，9月26日亚当斯上校对扬将军说，继续抱着原计划不放就等于自杀。他的23团的伤亡已超过950人，而在该阶段师的总伤亡已达1670人。象林奇上校的做法那样，亚当斯也主张，增大攻击的正面以分散敌在伤心岭的抵抗能力。他认为，假如伤心岭附近的北朝鲜部队都投入战斗，而对北朝鲜第15团派不出增援部队或接替部队，那么第23团就可以打掉敌该团并夺占伤心岭。

到9月27日，扬将军和军长比尔斯将军同意了亚当斯的意见，第23团对伤心岭的攻击也暂停了。后来，扬将军在分析第2师夺占伤心岭的原来计划时，把这一战斗称之为“惨败”，原因是采取了添油战术，而且未能组织火力支援队。他指出，敌人的迫击炮打得特别准，该师伤亡中的85%均为迫击炮造成的。

在该师作战科长托马斯·W·梅隆于9月下旬制订的新作战计划中，避免了先前的错误。师属所有3个团将发起集中协调的进攻，并以师的全部炮兵进行支援，并把第72坦克营调到蒙德尼山谷实施大规模的装甲进攻，并在萨塔瑞山谷里运用了坦克——步兵特遣队攻击战术。当10月2日师发布

以“底线得分”为代号的作战命令时，扬将军给各团规定了如下任务：第9步兵团在蒙德尼山谷的西侧前进，并夺取867、1005、980和1040高地。第23团的任务是保卫931高地以及山岭西坡的山脊线。此外，第23团应随时准备好攻击728高地，或协助第38团夺占728高地，或当情况需要时夺占520高地和851高地的西部。第38团则保卫485高地，尔后向第72坦克营提供步兵支援。“底线得分”的目标期定为10月5日。

为了做好“底线得分”的准备工作，要求第2战斗工兵营及其营长罗伯特·W·洛夫进行一系列大量的工作。蒙德尼山谷沿线的道路崎岖，第72坦克营的中型“谢尔曼”坦克不易通行，要想使M—4型坦克进入战斗也十分困难。只要工兵营在做准备工作时能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洛夫与他的士兵们还是愿意承担的。

弹坑星罗棋布在道路上，北朝鲜在路上埋设了地雷。在某个地点，北朝鲜堆积了大量石块，足有6英尺之高，还设置了挂有手榴弹的列桩，手榴弹的拉环都处于拉开状态。第2工兵营在这个路障的周围放置了110磅炸药，当炸药爆炸时可起爆那些手榴弹。而敌人的炮火随时都在向山头上甚至往山谷里射击，工兵们修筑了一条能使用的道路。为了消除地雷，工兵们在道路两旁50英尺距离内安放了链式炸药包，尔后引爆附近的地雷。当着弹坑和地雷过于稠密时，工兵们就改道在没有地雷的河床上修路，清除挡路的大石头。他们一边清除大石头，一边向北面前进。

在工兵为坦克部队的进攻修筑道路的同时，第2师的各团得到兵员补充，各营要达到满员，建立食品、装备和弹药供应储备。第23团还把各营从前沿撤下来休整48小时，同时

进行补充。师还在堪萨斯防线的前方设置了供应所，以保证不致因为弹药短缺而招致作战失利。

扬将军希望各营营长有权充分利用火力。规定各营必须上交一份火力计划，说明在“底线得分”作战中打算如何使用坦克、自动武器、小型火器以及迫击炮。另外，还在伤心岭地区的沙盘模型上广泛研究了如何把师的火炮布置在最好的位置上。

10月初3个团进入了攻击阵地。第9团位于右翼，准备进攻867高地，而由上校弗兰克·T·米尔德伦指挥的第38团则向蒙德尼山谷前进。第38团应在894高地西南的赛戈白附近停止前进。第38团第3营定为师的预备队，只有扬将军的批准才允许使用。然而加强给第38团的荷兰营拥有3个实力充足的营。在伤心岭上，第23团把4个营中的2个营部署在894、931、851之间连线上。

为了保护师的右翼萨塔瑞山谷并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在10月3日第23团还组成了一支特遣队，由少校肯尼思·R·斯特曼指挥。它的组成包括第23坦克连、第2侦察连、一个法国工兵排，还有从师的警卫部队抽来的一个步兵连，大家称之为斯特曼特遣队，它有两项任务，摧毁伤心岭东侧敌掩体，并作为诱饵吸引敌火力。

10月4日有49架战斗轰炸机在该师地段内出动，斯特曼特遣队袭击了萨塔瑞山谷。第2师的其它部队为了实施在第2天夜里21时所发起的进攻，正在进行最后的预演。火力支援队也已组成并进行模拟练习，火力支援队通常由迫击炮、机枪、步枪和自动武器组成，当作战需要时按照攻击部队的召唤实施火力支援。为了摧毁敌人的掩体和坚固支撑点，特别需要增加额外的火力。

10月5日下午晚些时候，当师的炮兵营开始射击蒙德尼山谷区域内第9、38团正面的敌人时，开始了炮兵火力准备。从西到东部署的北朝鲜第12师第3团占领867高地；北朝鲜第6师第1团散布在从636高地向西北至974高地一线；而北朝鲜第6师第15团据守在931高地。由于第2师在9月和10月初不断向这些敌人施加压力的结果，敌人没有一个团的兵力达到千人。在“底线得分”打响之前，北朝鲜第12师和第6师都大大减员。

在夜晚发起进攻之前，陆战队航空兵在空袭中向北朝鲜的防线投掷了凝固汽油弹、火箭和机枪弹。在西侧，第9步兵团第3营向867高地进攻，并于10月7日占领该高地，只遇到了轻微抵抗。尔后该营转向西北进攻960高地，而第1营则向北面的666高地进攻。于10月8日攻占这两个高地。第9步兵团尔后向666高地西北面的1005高地前进，在一场白刃战之后于10月10日夺占该高地。翌日，韩国第8师夺占1050高地，金日成的部队与第9团在西侧对峙。

与此同时第38团也取得重大进展。上校米尔德伦的部队当发现敌人已放弃了728高地以南1英里的485高地时，于10月4日得到意外的收获。到10月6日的中午，第1营已由485高地前出并夺占了728高地，只遇到敌轻微抵抗。第2营展开在蒙德尼山谷，攻击636高地，于10月7日夺占该高地。夺占这两个高地之后就给拉夫上校提供了掩护，该团现在可以让第72坦克营尾随前进了。由中校约翰·O·伍兹指挥的第72营于10月7日转隶给了第38团，该团的进攻目标有三点：636高地以北2,000码的605高地；905至974高地之间一线，该线从636高地西北直至金日成山脉的1220高地，以及974高地以北1000码的841高地。

在进攻伤心岭战斗中，第23团具有打赢的能力。亚当斯上校的作战计划已经指示少校威廉斯的第1营从北面向851高地施加牵制性的进攻，同时法国营从南面对931高地实施佯攻，丹尼尔斯的第2营将由南面对931高地攻击，而以克雷文的第3营作为预备队部置在丹尼尔斯的后面。在夜幕的掩护下，和利用师的其它部队给敌人造成的精神错乱，丹尼尔斯的部队出发了。敌人炮火迅即指向该营，但北朝鲜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于该点。在第3营的支援下，丹尼尔斯的部队慢慢地接近931高地。为了保持突然性，没有进行炮火准备。当进攻发起以后，第37野战炮兵营才对已知的敌所有迫击炮阵地开火。火力很有效，使得第23步兵团在接敌运动中只有轻微的伤亡。用喷火器、手榴弹以及轻武器消灭了掩体中的敌人，这些难以对付的掩体数个星期以来一直阻碍第23团的进攻。到3时，第2、3营已经夺占931高地的南部的一半。预料中的敌反冲击开始了，接着被击退。天亮之后又开始进攻。法国营从北面接近，而第2、3营加紧进攻以便会师，到中午时，第23团终于拿下了931高地。

尔后第3营前出并协同第1营攻击伤心岭上的最后一个目标——851高地。在萨塔瑞山谷，斯特曼的坦克部队继续在白天进攻，摧毁851高地东坡的敌掩体。在西部的蠡德尼山谷，伍兹的第72坦克营在等待拉夫的工兵部队发出可以前进的信号。

10月10日工兵部队完成任务，谢尔曼的第72营加强有第38步兵团的L连和一个工兵排，开始向北面的山谷隆隆进攻。非常幸运的巧合，敌人正处于换班之中，即接替伤心岭的北朝鲜第5军的部队。中共第68军的第204师的先头部队正处于接收北朝鲜已经撤出的阵地之中。坦克冲击分队以及师

的其余攻击部队发现中国人尚处于进入新阵地途中。伍兹的坦克手们横扫了蒙德尼城，虽然在路上遭受一些损失，但给中国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割断了他们通向伤心岭西坡的供应和补充路线。坦克的间隔为100码，在山谷北部作战时没有步兵支援，但坦克可互相支援，不时向目标射击。他们完全打断了敌方的换班，并给步兵在尔后几天完成任务减轻了许多困难。显然，敌人认为在蒙德尼山谷中无法使用坦克，拉夫的工兵部队开僻通路的事迹使敌人大吃一惊。

然而战斗还远未结束。第38步兵团第3营利用坦克推进的机会夺占了605高地，但第2营夺占905高地的企图于10月10日受挫。第2天，第2营压住了敌之反抗，第1营夺占了900高地。10月12日，第1营向金日成山脉攻击并拿下974高地，并于10月15日攻占了第38团的最终目标——1220高地。

在伤心岭上，北朝鲜第13师23团在其友邻21、19团的支援下，守住了851高地。21团部置于直接后方，而19团则用于防守萨塔瑞山谷。10月10日，上校丹尼尔尼的第2营已经从伤心岭转下来并夺占了蒙得尼镇以南1英里的520高地。520高地位于东西走向山脊上851高地山嘴的末端。在尔后的雨天作战中，第1营和法国营向北面的目标缓慢移动，一个掩体一个掩体地攻击，在激战中抓了几名俘虏。北朝鲜以及他们的中国盟友在停止抵抗之前就已被击毙或击伤，中国人曾协同北朝鲜保卫951高地。上校克雷文的第3营转向攻击520和851高地之间的山嘴，从西侧施加压力。最后在10月13日，蒙克勒的法国部队冲到了山顶，即在30天的激战之后，第23步兵团终于夺占了伤心岭。

长期的作战使双方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9月13日至10月15日期间，第2师的伤亡为3700多人，第23团和配属它的法

国营伤亡达总兵力的一半。敌方，北朝鲜的第6、12、13师和中国的第204师也都伤亡惨重。第2师估计，敌方伤亡总数近25,000人。其中伤亡的半数是在“底线得分”作战中发生的。

随着伤亡的增加，弹药消耗也急剧增加。除了成千上万的小型武器弹药之外，第2师的步兵受到的炮火支援如下：76毫米炮62,000发；105毫米榴炮401,000发；155毫米榴炮84,000发；8英寸榴炮13,000发。师的迫击炮分队发射了119,000多发60毫米、81毫米和4.2英寸的迫击炮弹，而57毫米和75毫米无后座力分队向敌人发射了近18,000发炮弹。虽然从战区的角度看，某些弹药的供应存在不足，但范弗里特已经向第2师师长授权："只要夺取阵地需要，可以使用所有的弹药。”当81毫米炮弹供应缺乏时，就以4.2英寸的炮弹替代。为了保持4.2英寸炮弹的供应，从釜山进行4天的空运，每天运输2,500发，同时以铁路向前线紧急运输了25,000发炮弹。

为了补充对该师的火力支援，第5航空队向伤心岭地区出动了842架次飞机，向敌人投掷了250吨炸弹，对于深入地下的北朝鲜掩体，除了直瞄火炮射击以外是无效的，但亚当斯上校认为，空袭对于提高士气是颇为有用的。他还称赞了战斗轰炸机，9月27日，在部队换防的时候，摧毁了敌人火炮和迫击炮，因此使第23团得以毫无伤亡地进行换防。

伤心岭与刚刚结束的“血染的山脊”作战二者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点。在这两次作战中，北朝鲜都组织了坚固的纵深防御，并且都有充足的后勤供应和增援部队的遮蔽道路。联合国军则被迫要越过敌炮火和迫击炮火有效控制的暴露的道路。第2师的前进非常艰难与缓慢，只要北朝鲜在数个目标继续

集中的火力得以发扬的话，就很难前进。

在这两次进攻作战中，对敌人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都估计低了。每次作战计划中都是把进攻看作是一次拉直防线突出部的小规模的行动，每次都缺乏足够的预备队兵力来加强并巩固所夺占的目标。在北朝鲜对第8集团军部队实施反击之后，后者则被迫撤退。在伤心岭，军长拜尔斯将军在“底线得分”作战之前，一直不允许第2师动用第38团，只要敌密切注视亚当斯上校的部队第23团就将无法攻占该岭，这种情况显然已存在许久了。尽管战斗情况需要增加预备队兵力，但第38团在10月之前一直作为师的预备队未动。

从指挥的角度看，第2师的领导在两次作战中都发生了更换。当着“血染的山脊”作战还在进行中的时候，德·谢佐将军接管该师；而在伤心岭激烈作战之后，又由扬将军接替了他的指挥。每一次更换都使他所继承的前一次战斗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但每次都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了重大修改。

只有对敌人实施多点攻击，才能达成最后的作战目的。这样敌就无法向所有受威胁的阵地补充兵力或把炮兵和迫击炮兵火力集中到一个狭小的地区，从而不得不撤退到下一道防线。在通常情况下，尽管联合国军徒步的士兵有着炮兵、坦克和空中的支援，但只有受到步兵武器的攻击时，北朝鲜才会从他们的掩体中撤走。在“血染的山脊”和伤心岭作战中，只有当着北朝鲜的损耗很大或我方具有优势兵力时，才屈服，否则至始至终作战决心很大，而且作战勇敢。

由于“底线得分”作战的胜利结束，第10军已经削平了蓬奇鲍地区战线的突出部，并使美第2师和韩国第8师的防线向蓬奇鲍以西地区延伸。由于在前沿推进了大约5英里，这样就缩短了第10军的防线，并使之与西侧的第9军防线相

协调。

四、西线的进攻

9 月伤心岭作战开始之后不久，范弗里特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就在起草另一个作战计划，准备在美 1 军、9 军防线上实施登陆作战。由于重要的乔原——金化暴露在敌人火炮和进攻之下，故“棍棒”作战计划设想，从怀俄明防线向前推进15公里以保卫铁路线，并迫使敌人放弃前沿阵地。此外，在改善朝鲜中部交通的同时，范弗里特还打算依靠这条铁路支援10月份的下一次作战，下次作战已命名为“争吵者”。“争吵者”作战也是一次两栖登陆，其目的在于切断第 8 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 1 军和美国第10军当面的北朝鲜军队，方法是在东海岸实施两栖登陆。假如此役获得成功，第 8 集团军的前沿就可推进到平壤和高城之间。关于登陆部队，范弗里特打算使用美国的陆战队，并以韩国师随后跟进，攻打高城桥头堡。第 8 集团军司令坦率地承认，是役可能成为一次适当的冒险，当两栖登陆部队企图沿着金城——高城道路与第 9 军合会时，可能引起敌人在西侧实施危险的反攻。

虽然范弗里特要求李奇微就“棍棒”和“争吵者”两项作战计划尽快作出决定，但象他本月初取消“魔爪”计划一样，他本人放弃了这两项作战计划。考虑到“棍棒”计划可能带来的损失使他倾向于另一计划，即第 1 军军长奥丹尼尔 9 月底提出的建议。奥丹尼尔的大意是，由第 1 军发动一次纵深为10公里的有节制的进攻，建立一条名叫“詹姆斯敦”的新防线，这条防线可以在冬季缩小卡车的运输量，从而巩固第 1 军的后勤补给线。“詹姆斯敦”的作战地区开始

于汶山里东北9英里多的临津江西岸，尔后向东北三米川江的三米川镇，向东北再延伸10英里入京户洞镇附近的临津江，之后紧靠着欲考春以南约12英里延伸，一直到乔原西北6英里的秋土索，从秋土索再向东偏北延伸10英里，在青山村的乔原东北大约5英里的地方结束。夺占该线的有利地形便可掩护涟川——乔原的山谷交通线，不被敌观察与炮火袭击，并使汉城——乔原——金化铁路线畅通，并使主抵抗线向前推进。此外，第1军的进攻还可使敌失掉平衡，并不使第8集团军的部队过于疲劳。

10月的天气多为干爽气候，因此在中西部前线进行作战是很好的一个月份。便于充分的空中支援，不存在山洪爆发和泥泞不堪的问题。美1军防区内的地形不同，西部是低洼地，中部是陡峭的山头，东部分界线是起伏地。

为了进行这次美1军所谓的“突击队”进攻作战，奥丹尼尔将军计划使用该军的4个师加上友邻第9军的一个师，以削平敌突出部。在军的西侧由准将白林汉指挥的韩国第1师将从怀俄明线出发，越过临津江，向开城前进。由A·J·H·卡斯尔指挥的英联邦师在韩国第1师的东侧，将夺取三米川与京户洞之间的高地。再往东，由托马斯·L·哈罗德少将指挥的骑1师在京户洞与甘沟之间8英里的正面上向西北进攻，在军的右翼，由罗伯特·H·索尔少将指挥的第3师进攻乔原西北6英里的281高地，以及该城西边偏北7英里处的373、324高地。当第25师前进并夺占乔原东北汉滩江与南大川汇合处以北有利地形时，第3师应在青山与第9军第25师会师，第25师由艾拉·P·斯威夫特指挥。

在到达“詹姆斯敦”作战地区之前，中共4个军——65、64、47和42军的一些部队可能被推向后边，但范弗里特9月

30日向报界强调，第8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寻找并歼灭敌人。

当10月3日"突击队"作战开始时，敌方抵抗集中在骑兵师的区域内。而韩国第1师，英联邦第1师、第3师和第25师前进并夺取所受领的"詹姆斯敦"一线的目标时，只遇到了轻微的或中等程度的抵抗，但第1骑兵师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中共第47军的139和141师的部队防守骑1师当面的主抵抗线，他们构筑的防线与伤心岭的工事同样坚固——坚固的掩体互相掩护，有自动武器和炮兵火力集中封锁到山头的通路。铁丝网与地雷掩护着堑壕与掩体，中国人的弹药与补给都很充足。

哈罗德将军编成一支特遣部队在其右翼行动，特遣队的组成有由卡罗尔·小麦克夫尔斯少校指挥的第70坦克营以及第16侦察连。大家叫特遣队为"麦克"，其任务是沿着临津江东岸向京户洞前进，连接向西面运动的第1联邦师，并保护第5骑兵团的左翼。由欧文·莱费尔特上校指挥的第5骑兵团和由丹·吉尔默上校指挥的第7骑兵团越过师的前沿并肩进攻。由尤金·J·菲尔德指挥的第8骑兵团留做师的预备队。所有的师属炮兵营都参战。第61和82野战炮兵营装备105毫米和155毫米火炮，支援第5骑兵团，而第77和79(一)野战炮兵营都装备105毫米火炮，支援第7骑兵团。第1军规定，对骑1师的全般火力支援由下述野战炮兵营或连担任：第936营（155榴炮）；第17营的A连（8英吋榴炮）；第204营的A、B两个连（155毫米炮）。各炮兵营位于主抵抗线附近，距"詹姆斯敦"作战线为4—6英里。

进攻发起前1小时，沿着第1军前沿部署的炮兵开始袭击敌人的防御阵地。尔后于10月3日6时整，联合国军的5

个师出发。骑1师当面之敌反应迅速而激烈。在左翼行动的麦克特遣队碰上了密集的地雷和强大的炮兵和迫击炮兵的阻拦，当天作战结束时，进攻没什么进展。当着由莱费尔特指挥的第5骑兵团攻击该团当面的山头222、272、346、和287高地时，受到了中国军队抵抗。当第5团的3个营冲向山头时，敌方的火炮和迫击炮火力向他们打来。当第1军火力转移时，中国人就迅速进入阵地，并发射猛烈的小型武器、自动武器的火力和用手榴弹，以阻拦进攻。这一天晚些时候，第3营曾6次在272高地取得立足点，但都被敌人压回来了。第5营只有在攻击272高地时才取得持久的成功；而第3营在前沿实施攻击之后，中国人被迫放弃山头，撤向北方。东部第7团的区域内，作战情况大体相同。吉尔默上校的部队以第2营和希腊的第3营并肩突击，企图夺占418和313主峰一线山脊及其高地。中国人对这两个营实施反冲击，这两个营在进攻中伤亡很大。那一个营也顶不住。敌抵抗之激烈程度以拚刺刀为标志，许多阵地于进攻当天曾3次或4次易手。

第一天结束时，支援火炮向敌人发射了15,000发炮弹，中国人则以其第2炮兵师的主力投入战斗以拦阻骑1师的进攻。中国人以其现有的尽可能多的炮兵打击骑1师，同时还比较大胆地使用单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和反击对方的火炮。在此过程中，敌人的炮兵位置暴露了，并很快引起了骑1师炮兵和第5航空队战斗轰炸机的注意。

尽管10月4日战斗异常激烈，但是进攻作战仍无进展。第8骑兵团在右侧加强第7骑兵团，并向418高地西侧的山脊攻击，但敌人顽强据守阵地，当阵地丢失后，便不惜人力重新夺取失掉的阵地。敌每个连有10—12挺机枪和大量的手榴弹。当近战激烈时，骑1师的主要伤亡是由手榴弹造成

的。当天，中国的140师向前机动，加强第139师，因为后者的防御阵地遭到骑1师的持续炮击。骑1师在向约科春和“詹姆斯敦”作战线进攻中，现在不得不与著名的第47军的主力相对抗了。

当10月5日夜间第8骑兵团第1营发现中国军队已从418高地撤退的时候，在中国防线上出现了第一个裂缝。下午第1营进占该山头东北1,400码处，并得以与美3师第15团相连接。尔后，第7骑兵团的第2营向418高地西南山脊进攻，并在没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313高地。翌日，第8骑兵团第2营向418高地西部2,200码的334高地发动进攻，在冲击两次之后夺占该目标。接着又打退了敌人日以继夜的猛烈反冲击。在334高地西北4,000多码的287高地，第7骑兵团的第1营向山顶猛攻，并在夜幕降临时，夺占了该高地的部分阵地。10月5、6两日消息得知，中国军队正在后撤，在西北57,000码的地方构筑新防线，在白天的作战中许多部队已损失十分之一，他们的食品和弹药正消耗殆尽。

10月7日，第7骑兵团拿下了287高地，并派遣第3营攻击418高地西南2英里的347高地。第3营于日终时从南面和东南面开始攻击该山头。347高地的陷落意味着，骑1师现已控制了师正面东北部“詹姆斯敦”作战线一半的高地。

在东北方打开一个缺口对于第5骑兵团当面的中国防线并没有立即产生什么影响，而火炮、迫击炮和坦克炮的无情火力并没有突破可怕的掩体阵地。由于中国人构筑了复杂的堑壕体系和机动道路，大大缩小了空袭效果，所以尽管空投了凝固汽油弹以及千磅炸弹也无济于事。敌人顽强防守，往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骑1师付出了重大代价。情况往往是，美军攻占了作战目标之后，兵力不足以抵抗敌方随之而来

的强大反冲击。

联合国军对346、230和272高地攻击了8天，但中国人始终不退却。但敌方受到了连续不断的打击，人力和弹药储存开始告急。10月12日夜，中国人放弃了272高地，菲尔德的第8骑兵团第二天没经战斗就占领了该高地。

控制了272高地就打开了通向敌其余防线的关键山头——346高地的东部大门。10月15日一个名叫“杆头装药”的新作战计划付诸实施了。给第5骑兵团加强了从美3师调过来的比利时营，其任务是攻取346高地，尔后向“詹姆斯敦”作战线进攻。第8骑兵团将从272高地前进，必要时可协助第5骑兵团的进攻。10月16日拂晓开始攻击，但敌人火炮再次阻挡了第5团的进攻。第8骑兵团向346高地东北侧的进攻有了某些进展，但无法包围作战目标的翼侧。第5、8骑兵团对346高地又连续攻击了两天，但无效果。10月18日，第5骑兵团的第1营向前机动，实际上没经战斗就取得了该高地。当天，第3营还拿下了230高地。到了10月19日，当敌人撤退到约科春以北占领下一道防线时，骑1师就夺占了“詹姆斯敦”作战线的最后一个目标。

“突击队”作战计划虽然完成了，但中国人敏感到骑1师的进攻目标在于上尼翁里的后勤基地，虽然师的巡逻兵在东部主抵抗线之前1000到4000码的区域可自由活动，但敌人对于越过约科春向上尼翁里派遣尖兵或巡逻兵的任何尝试都反应十分强烈。在“突击队”作战过程中，中国人把控守制高点看得十分珍贵。他们首次从基本战术原则的机动防御体系中，转变到坚固防御。很深的掩体，复杂的堑壕体系，以及大规模地在前方阵地上储存食品、供应品和弹药表明，他们企图固守阵地。当骑1师试图攻击敌主抵抗线时，中国人就调

动大量的新生预备队力量，自由发射储存的炮弹，并顽强地据守阵地。只有当着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时才被迫撤退，骑1师才最后得以占领“詹姆斯敦”作战线。第1军司令部的情况报告提出，中国的指挥官中，似乎对于受命在前线抵抗到底的决心不够坚强。根据情报处军官的说法，这一点说明，中国人认为，兵力薄弱的部队除了以强大的反冲击夺回失掉的阵地之外，其它战术是打不赢的。

从各方面说，敌人的损失是相当大的。第1军估计，10月3日至19日期间敌人总伤亡可能达21,000多人，其中包括500多名俘虏。仅骑1师就使敌人伤亡了10,000多人，等于著名的第47军实力的一半。而第1军从来没有未经战斗就逃跑的现象。在17天的作战中，1军伤亡4,000多人，其中骑1师的伤亡总数是2,900人。为了减少损失，美1军已经改善了防御阵地，并使敌人不能自由自在地发起进攻。

当第1军组织进行“突击队”作战时，美第9军也制订计划，向金城发起类似的进攻。10月9日，范弗里特将军视察第9军司令部，并发现威廉·H·霍克以及他的师长们热切盼望在军的正面上发动一次局部进攻。目的是改善各师的前沿防御阵地，并对敌人保持压力。由于这两点正好与第8集团军的指示相符，范弗里特表示赞成。然而，对于第9军的进攻取得成功来说，存在着一条不利的因素，第10军防线上刚刚消灭的一个凹部，将被第9军防线上的一个凸出部所代替。

选定了美第24师、韩国第2师和韩国第6师发动进攻，攻占金城以南约4英里一线。美军师居于韩国两个师的中间，并要对韩国第2师提供坦克支援。10月13日，3个师的部队出发，而在第一天就前进了差不多2英里。当夜中国人发

起了数次反冲击，但均被击退。尽管敌人顽抗，炮火猛烈而密集，但第9军在尔后几天作战中还是逐步前进，并在10月10日到达目标线。这种有利的结局促使霍克下令向金城方向前进。联合国军将在那里构筑坚固的前哨阵地和巡逻基地以保持与敌接触。

在第9军第2阶段的进攻中，与开始阶段的情况差不多。霍克报告说，敌人反应似为一种拖的战术而不是努力防卫前线。中国人的进攻规模，从排一级到营一级不等，且通常在夜间或拂晓发起。敌人反击时伴随以猛烈火炮和迫击炮射击，并投掷大量的手榴弹。到了10月20日，第9军占领了第二阶段目标线，并开始组织防御。在尔后的几天中，第24师曾组织数支坦克突击队，其中一支坦克袭击队曾突入金城，摧毁了数座楼房和遂道。

当10月23日作战行动即将结束时，范弗里特嘉奖了韩国第2、第6师在作战中的英勇表现。他们攻占了目标并打退了中国人的反击。中国军队在10月13—23日期间企图延迟第9军的进攻速度，同样遭到惨重的损失。这说明共军对联合国军在金城地区的试探与进攻十分敏感。

五、内部的变化

10月下旬，当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的时候，第8集团军的有限进攻逐渐停止，在战场上又出现了沉寂。范弗里特利用暂缓的有利时机，把第10军几个经过激战的师调入预备队阵地。范弗里特用美7师接替配属给美第9军的埃塞俄比亚营、美第2师以及法国营，因此得以把后者做为第9军的预备队。他还命令韩国第5师转入韩国第1军的预备队阵

地，并把韩国第3师转隶给第10军。

10月1日发生了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变化。全由黑人组成的步兵第24团宣布撤消，以第14步兵团取代它，做为第25师的第3团。战争的第一年，该师的高级军官对于第24团的作战表现就曾表示过一些不满，但是该团是根据1866年的法律建立的，而对它的处理则有着特殊问题。

在军队中逐渐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在朝鲜处于紧急的战争状态终于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批学者已经就在军队中如何更好的利用黑人作了许多研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1950年1月颁发的陆军条令规定，陆军中所有的人应尽力工作，而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或民族。虽然条令没规定合并单位，但却使它成为可能。在1950年3月，陆军随即取消了限制黑人征兵名额的规定。

由于战争爆发，黑人参军的人数随之增长，驻朝鲜的黑人部队在保持核定的实力方面不存在什么困难。1951年初，第8集团军的人事官开始把额外的黑人分配给兵力不足的白人部队，而其结果，从总体上看，非常令人满意。在合编的作战部队中，黑人的表现强于过去，而在白人中，士气也没有明显的低落。担心在黑人和白人士兵之间产生敌对情绪和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根据的。

在朝鲜合编黑人与白人的经验，促使李奇微将军在1951年5月赞同在远东战区所属的各种部队中使用一定数量的黑人，并以此作为全面提高各部队效率的一项措施。做为撤消全黑人步兵部队的第一项措施，他建议撤消第24团，并把黑人分配到远东战区司令部的全白人部队或合编的部队中去。陆军部于6月1日批准，并在6月晚些时候宣布，远东战区司

令部的作战部队合编问题将在6个月内完成，而服务性单位最终也将进行。

除了第24步兵团从10月1日进行合编之外，其它还有数个全黑人单位预定在1951年夏季晚些时候和初秋分开。第9步兵团第3营的黑人在美2师全师中分配，而第15步兵团第3营的黑人则与美3师的其它步兵部队合编。第64坦克营和第58装甲野战炮兵营的某些黑人将与某些坦克和装甲野战炮兵分队的白人进行交换。在有些地方，标志黑人部队的星号也拿掉了，只要部队一列为预备队时，便进行合编工作，人员的交换也可以顺利进行。

六、空　　战

虽然从8月至10月朝鲜战争的主体是在地面上进行的，但由李奇微将军指挥的远东战区空军和海军对于地面作战还是提供了很大的直接或间接支援。

由埃弗里斯特将军指挥的第5航空队集中大量的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轻型轰炸机，致力于切断共军的运输线。铁路、桥梁、公路、调车场和供应站受到了反复地攻击，以减慢向南方机动兵力和运输物资的速度。8月，埃弗里斯特开始了一项真正的拦阻计划，代号为“绞杀”，强调彻底切断运输线。不久，其飞行员的主旋律就变成了——“我们一直干在铁路线上”。由于集中精力于切断敌后方地区的运输线，因此对前线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数量相对减少了。但是埃弗里斯特认为，对敌后方的大规模空袭可以彻底摧毁敌人的后勤供应。第5航空队的B—26型飞机为了在白天实施空袭，就要在夜间寻找敌之运输汽车。埃弗里斯特期望，空军

能削弱共军的前运锁链，并削弱敌人抵抗第8集团军进攻的能力。由于范弗里特当时正在考虑"魔爪"作战计划，因此他也十分愿意让埃弗里斯特这么干一下。

在取消"魔爪"作战计划之后，埃弗里斯特和范弗里特决心每天以96架次飞机对第8集团军的有限进攻提供充足的空中支援。虽然空军的攻击重点仍然是绞杀计划，但第5航空队司令官希望在遂行支援任务中，维持空军飞行员与地面之间的密切协同。

持续地对敌铁路线施加空中压力在10月份时开始得到报尝。情报表明，铁路线被毁的速度大于敌人可以修复的速度。在开始阶段，飞行员主要注意打击铁路桥梁，但共军善于以新奇的方法越过或修复被破坏的桥梁。他们在重要的桥梁附近事先储存了备件，并得以迅速修复。为了适应各种情况，第5航空队改变了战术，并创造了一系列复式破坏的方法。以破坏或摧毁数十处铁路的方法使敌人的修复速度终于降低了。在这种成功的战术与联合国军在"血染的山脊"和"伤心岭"作战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比较。只要联合国军在某些关键地点集中兵力进攻，敌人就有能力对付。但是，一旦联合国军司令部加宽了进攻正面并在多点实施攻击，共军就将处于困境。他们被迫向山嘴线和调车场补充人员以保持主要交通线的畅通。被折磨的共军只有在天气不能飞行时才得到一点缓解。

与此同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中型轰炸机也参加了对敌人后方的空袭。在7月份第一次空袭平壤取得一定效果之后，李奇微对远东战区空军表示了"强烈的失望"，认为远东战区空军以前未能对平壤实施大规模的空袭。他命令远东战区空军司令韦兰将军准备进行新的空袭，并敦促空军司令

采取一切措施，注意天气是否适于飞行。

8月14日目标区出现了好天气。远东战区空军派遣了66架B—29中型轰炸机和56架战斗机飞临敌首都上空，并取得了大规模摧毁的效果。虽然没看到敌人出动飞机，但敌人的高射炮火力十分猛烈和准确，以至有6架战斗机被打掉。

李奇微还迫切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轰炸北朝鲜紧靠苏联边境的罗津港。麦克阿瑟将军先前没有得到轰炸这一城市的权力，因为可能的飞行错误会产生侵犯苏联边境的危险。8月1日李奇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空中侦察发现在罗津港储存了大量物资，他打算以舰炮和空中轰炸摧毁该港的工业区。他报告说，该城不仅是一个关键的公路和铁路枢纽，而且有大量的石油储存设备和用以支持运输线的铁路修理工厂。李奇微有把握，远东战区空军可以摧毁罗津，但又不侵犯苏联边界。

既然联合国军司令只是使用有限手段对敌施加压力，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他的报告。8月10日，他们向国防部长马歇尔报告，从军事观点上看，李奇微的理由是十分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军事上表现强大有助于联合国在朝鲜达成既定目的，他们劝告国防部长，“在朝鲜境内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威慑共军的供应储备是最有利的办法，并可减少联合国部队可能的伤亡。”

马歇尔和杜鲁门总统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请求，通往轰炸罗津之路打开了。但也施加了某些限制。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不得动用舰炮射击该城，也不准对明确下这任务的空袭散发特别的宣传材料，并只能在目视条件下空袭该城。

与此同时，李奇微已得出结论，罗津转运站是最为有价

值的目标。远东战区司令认为，以B—29型飞机进行常规的轰炸，而不是大规模的轰炸，最为有利。此外，每年的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条件，对于发起大规模的轰炸也不一定有利。

8月25日进行第一次空袭。在良好气象条件下，出动35架B—29型飞机。在24架海军战斗机护航下，中型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取得了良好效果，没损失一架飞机。

谈及敌人的空中活动，8月份是相当平静的一个月，但到9月敌人飞机的数量明显增加。不仅飞机数量增多，而且共军飞行员的作战精神也增强。从前他们只是在满洲庇护所附近飞行，但是在9月的重大空战中，他们进一步向南方游动。

苏制米格—15成为敌空军的主力。米格—15与美式喷气飞机相比较，在爬高、俯冲以及加速方面的性能更为优越，故在秋季来到时，中国的飞行员表现了更高超的技术，敌飞行员利用太阳作幕景以阻挡对方发现，并利用战术上的突然性，变得越来越勇敢了。在10月的第三周，他们尽其所学一下子击落5架、击伤8架B—29型飞机。至此，在整个战争中，只被打掉6架中型轰炸机。

当着和平谈判的代表准备在板门店相会的时候，敌人出动飞机的架次及其进攻精神达到顶点。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在于影响和平谈判呢，还是在于表明敌现在已准备好了对联合国军在北朝鲜的制空权提出严重挑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七、海　　战

在很大程度上，8月至10月期间的海战是对空战和地面进攻的补充。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攻击共军的交通线，补

给地区以及军队配置地域，虽然8月大部分时间天气并不很好，但他们还是出动了7,300多架次飞机。

在8月25日轰炸罗津的过程中，海军战斗机掩护了B—29型飞机，这在朝鲜战争中还是首举。当空军在9月份实施破坏铁路的作战计划时，海军第77特混舰队飞行中队，就立即改变了紧密支援和破坏桥梁的计划，而协助空军削弱敌人的铁路运输。

在英国海军飞机的协助下，第77特混舰队于9月18、19日攻击了元山，尔后又于10月10日在澳大利亚舰载飞机参加的情况下，又空袭了高角。与此同时，陆战队的飞机则集中于对前线实施的有限地面进攻提供积极的空中支援和空袭。

8月，海军的舰炮在韩国第1军的作战地区内恢复了炮击，以此作为海军水面舰艇对地面部队的支援。在8月攻势中，在东海岸制造一种佯攻态势，并吸引北朝鲜部队从第10军和韩国第1军当面调走一些部队，李奇微命令海军上将乔伊在长津地区实施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佯攻。

8月31日，两栖部队到达目标区。火力支援大队首先向海岸倾吐了烈性炸药，战列舰杰赛号大口径火炮也实施了袭击。当水面舰艇完成任务之后，海军航空兵接着以火箭对滩头阵地实施饱和攻击。登陆艇从运输船上开出来，部队进入攻击位置。对海岸经过这一轮攻击之后，部队又回到运输船上，水面舰艇则进行最后的齐射。这次佯攻没有产生任何事故或损失就完成了，可能给长津周围的北朝鲜守军造成了某些焦急情绪。

再往北，联合国海军部队继续攻击元山。敌这一重要的港口每天都受到海军的轰击。在8月，英国皇家陆战队突击队员还两次在元山附近登陆，并袭击了敌军事设施。10月5

日，兴南也受到袭击，该地反抗十分激烈。在这次作战中，美海军“雷达哨”驱逐舰欧内斯特·G·斯莫尔触雷并受重创。

在西海岸，10月3日联合国海军部队在汉江地区发动了一次特别攻击。除了给敌人的军事设施造成破坏之外，这次袭击还证明，联合国军的海上力量具有压倒优势，袭击部队贴近汉江水域活动，并安全返回，无任何损失。

沿海岸线的海军封锁、对敌前线的后方实施水面袭击和轰炸舰炮的袭击与地面的进攻组成了立体攻击。此外还有陆战队航空中队的空中紧密支援、海军的遮断攻击，以及为遮断服务的掩护飞机。在战场之外，海军对驻扎在日本的陆军师还提供了两栖作战训练经验，因此一旦情况需要，陆军即可迅速开赴战场。

在海上，最大的问号是俄国太平洋潜艇舰队。对联合国军的制海权随时存在着挑战。海军司令部在向朝鲜的第8集团军提供水面和空中支援的同时，必须密切注视海参崴苏军的活动。

八、尾　　声

在1951年夏和初秋，美国及其盟国对结束朝鲜战争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开城谈判提供了在停战条件方面达成协议的政治外交办法，同时还在前线发动有限的进攻，并配合以空中和海上攻击，以便向共军施加军事压力，促使其在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就达成停战协议。

第8集团军在8—10月期间推行的“弯管进攻”战术，给敌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北朝鲜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伤

亡。尽管很多消息说，共军继续增加后勤储备，但在10月末，敌人的进攻能力受到很大削弱，而且没有任何肯定的迹象，说明敌人在最近企图发动进攻。很清楚，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并已迫使敌人转入防御。以空袭、试探性进攻和小型的进攻来打乱敌人，这样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已经破坏了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北朝鲜和中国士兵。范弗里特将军的部队已经建立了坚固的防线，尔后便使作战形式转向一种新的样式——争夺高地的战斗。第10军在伤心岭以及在夺占"詹姆斯敦"作战线过程中的作战方法，在尔后的几个月残酷而乏味的战斗中一再地加以重复。在这场斗争中，那一方也无法完全打败另一方，而只是刺一刀或回击一拳以消耗对手。

如果说，敌我双方在作战中有什么可以值得吸取的经验的话，那就是不要犯已经犯过的错误。共军在扼守坚固阵地时充分表现了其韧性和勇敢，联合国军多次犯了过低估计敌人抵抗意志和能力的错误。当着联合国司令部控制了共军粗劣的交通线时，敌人在地面上和空中的力量与资源不得不进行疏散。

尽管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战场上取得了军事优势，但共军仍然占有宣传上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是在长期的谈判过程中发动一些小战斗所取得的。一方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另一方。当着10月晚些时候恢复和平谈判时候，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改善了前线的军事状况，这样就不是协助而是直接加强了海军上将乔伊及其参谋人员的实力地位，以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争论中去。

第六章　恢复谈判

1951年10月，终于达成了恢复停战谈判的协议。当时，国际事态的发展看不出能很快解决朝鲜战争的任何迹象，因为美国和苏联都在加强他们本身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

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国家安全法。10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了70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计划，并根据国家安全法新建立了国家安全局，由其负责协调所有的对外援助计划。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大量军事援助大大地增强了它们的防御力量。10月22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同意接收希腊和土耳其为其成员国，因此大大地扩大了其责任区域。在14个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派遣了部队。

与此同时，苏联在10月爆炸了第二颗和第三颗原子弹，表明它已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核计划。斯大林公开宣称支持共产党中国并接到了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的电报，感谢苏联给予北朝鲜武装力量的援助。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长安德雷·维欣斯基通知美国大使：苏联不会对在朝鲜的共产党谈判代表施加压力来改变他们的停战条件。因此，在恢复谈判之前，很快缔结停战协定的前景就已变得很渺茫了。

一、分　界　线

10月24日，由9辆载重量为10吨半的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帐篷和设备隆隆地驶进了板门店这个小村庄的一片土房住宅区。供会谈代表用的帐篷很快搭起，40个人忙着安装地板、照明和保暖设备，因为寒冷的冬天已临近。第二天就一切就绪。

在主要会谈区还另外搭起了几个公用的大帐篷，其中3个是供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和记者使用的。在其南面半英里的地方，后勤梯队建立了食堂、通讯、保安和工兵设施，以保证谈判的进行和使停战谈判区中立化。一夜之间板门店便闻名于天下了。

10月25日，谈判代表进入举行会谈的大帐篷，场内几乎是座无虚席。共产党谈判代表仍同过去一样，阵容整齐、举止谨慎，唯一的变化是在其谈判桌的一侧换了两个新人而已。南日向对方介绍了中国代表边章武上将，他是接替邓华的。

鉴于双方都接受联络官在长期休会期间所达成的安全调解协议，共产党代表建议成立联络官联合办事处，以监督该协议之细则的执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同意由联络官处理各种事件的调查和在停战谈判区进行检查。解决这个小问题后，南日建议恢复分界线问题的副代表谈判，并指名要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霍迪斯上将和海军上将乔伊以及共产党代表李、解两位上将于当日下午就第二条款举行会谈。

记得在8月的分界线会谈期间，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代表曾放弃他们要在战场上显示其海、空军力量的最初立场，

共产党代表也表示可以不讨论三八线，而讨论另一分界线。共产党代表在中止这次会谈的前夕，还同意李奇微关于建立一条不小于4英里宽的非军事地带作为中间接触线的建议。

休会期间，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还一直在忙碌着。10月中旬，乔伊向李奇微报告说，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起草了一份很短的文件，并根据接触线绘制了一张专门的非军事区地图。他不打算以这张地图作为唯一的讨论基础，但也不允许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线上作任何较大的变动。

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副代表准备在首次会谈时提出一项新建议，但霍迪斯上将和李上将首次交换意见时就发生了争吵。

李将军：将军阁下对军事分界线有什么意见？

霍迪斯将军：我方在休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时曾征求过贵方的意见。贵方能够提出什么意见来呢？

李将军：我们愿意先听听您的意见。

霍迪斯将军：我方已多次阐明了我们的意见，并且征求过贵方对我方意见的看法。这次是贵方提出举行副代表会谈的，因此期望贵方拿出意见。请吧！

李将军：阁下曾经讲过，贵方提出过新的意见，但我们听不出里面有任何可以打破僵局的新内容。

霍迪斯将军：您说对了。但贵方也是如此嘛。

李将军：我方为了打破僵局，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只有当我们拿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意见时，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僵局。

霍迪斯上将：不错。贵方有何建议可以打破这种僵局呢？

激烈的会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

断定共产党提不出什么建议。短暂休会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拿出了他们专门描绘的非军事区地图，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霍迪斯解释到，一般说来，虽然这个地区是根据接触线确定的，但为使双方的防御区更加安全，联合国军将撤离东海岸沿线和汶山地区，希望共产党的部队也撤离开城地区。正如所预料的一样，第二天共产党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并拿出一张由他们绘制的对他们有利得多的地图。他们提出把瓮津部分无法防御的领土让给联合国军司令部，但要求以丁一岭、血岭、伤心岭、大钵、金化和铁原作为交换条件。霍迪斯发现虽然共产党的建议不能接受，但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开端，而且敌方没有提到三八线。

当霍迪斯问到敌人的立场是否要达到讨价还价的目的时，李将军毫不妥协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商人，而是富有革命精神的军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都作了些让步。问题的焦点是开城地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声称必须对其加以保护，因为它是通往汉城的门户。霍迪斯宣称，如果不是把谈判地点设在开城，联合国军可能已经拿下了开城。另外，既然要让联合国军司令部放弃可以控制其临近敌占领土的沿海岛屿，那么共产党也最好放弃开城。霍迪斯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开城和汶山周围地区撤出，共产党也会从中得到好处。敌方不想进行这笔交易，因为它涉及到开城的丢失。由于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占领开城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心理学意义，所以韩国政府一直坚持收回开城。作为一种象征来说，它比朝鲜中部和东部的大片领土要有价值得多。

起初，共产党愿意进行交换，并同意在中部和东部战线上进行交换，以便将其防线拉直。但是，当联合国军司令部

代表坚持要开城后，敌方就取消了这种念头。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讨论后，共产党提出只根据接触线划分一条4公里宽的非军事地带。他们宣称，这是他们能提出的最好的建议，也是最后的建议。

李奇微将军曾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拿出的地图虽然只能作些小的变动，但将是最后的方案。他的上司提醒他说，美国的最起码立场是保证堪萨斯线的安全。如果堪萨斯有一条适当的警戒部队抵抗线，要就地图上的分界线作一些调整看来是可以行得通的。10月30日他们将这一精神通知了远东司令。

华盛顿的指示和共产党在开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李奇微在11月2日发布了新的命令。他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提出第二个方案，即把开城划入非军事地带。李奇微接着说，只要共产党同意在中部和东部战线上进行调整、答应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在临津江西岸部署其警戒部队抵抗线，联合国军将撤离开城地区，但这是所能作出的最后让步。

在随后的两天里，霍迪斯和伯克采取一种蘑菇战术，想以此动摇共产党的决心，但没有成功，敌方坚决不肯放弃开城。11月4日，李奇微和乔伊决定根据战线划分分界线，但必须作一些适当的小调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所希望的最好解决办法。

在第二天的副代表会议上，霍迪斯上将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折衷方案，即同意接受根据签定停战协定时的实际接触线划分一条4公里宽的分界地带，但要作适当的调整。双方各派3名官员共同绘制战线图，并准备在停战谈判结束前交给各方代表团。同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其方案中建议双方谈判代表就其它条款举行会谈。

共产党代表向霍迪斯和伯克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当他们发现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不肯排除今后对开城进行调整的可能性后，便马上不感兴趣了。接着，李将军声明说，在开始讨论其它条款之前，必须先就第二条款达成协议和确定军事分界地带。把这个问题拖到签定停战协定时解决是绝对不行的。李将军和他的同僚解将军认为，仅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是不够的。尽管霍迪斯断言，除非马上签署停战协定，否则目前的分界线是不会有效的，但共产党仍坚持划分一条目前的界线作为分界线。如果不是这样，则必须就一条可以反映战场变化情况的新界线和非军事地带达成协议。

海军上将乔伊认为，敌人的立场表明他们打算把这次划分的分界线作为永久分界线，而不是作为临时分界线。乔伊认为应该反对他们的这一努力。华盛顿的军政头目表示同意，但提出了明确的保留意见。他们对李奇微说，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在开城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和把划分分界线的时间拖得太长，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最后接受共产党的立场时，就会让人觉得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还对李奇微说，面对共产党最近作出的让步，如果因开城而致使谈判中断，国内舆论对此是不会谅解的。因此，如果共产党断然拒绝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推迟达成分界线协议的建议，就应该马上接受敌方提出的开城地区接触线。为了打消共产党把这条分界线作为永久分界线的想法，他们建议李奇微限定完成其他条款谈判的期限。如果在限期期满之时仍达不成协议，就将对非军事地带进行修正。

李奇微将军虽然不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开城问题上的意见，但他强烈地感到，同意将目前的分界线作些较小的调整后作为永久的分界线将是一个错误。在11月8日的副代表

会议上，李奇微指出，共产党方面已经表明他们的态度，认为7月份以来战线上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他们对第8集团军的夏秋季战役采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其目的显然是要顽固地坚持目前所划分的任何分界线。这本身就等于事实上的限期停火，而为了就其它条款达成协议，共产党肯定会要求延长时间，联合国军司令部亦肯定会表示同意。李奇微认为，在谈判期间继续停火，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是极为不利的。如果不得不放弃开城的话。他认为必须以停战协定生效日期时的接触线为分界线，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绝不能作任何让步。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把事情弄得太僵。他们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赶快划分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临时分界线，但又说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后立场。由于共产党在分界线的位置问题上已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应该谋求及早达成一项能够满足联合国军司令部主要要求的协议。否则，敌方甚至可能重新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立场。

当时，副代表会议已陷入僵局，共产党要求根据接触线划分一条4公里宽地带的立场变得越来越强硬，而且不同意目前和今后进行任何调整。霍迪斯指责他们解决分界线的目的是想把时间用在其他条款的谈判上，但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在11月14日的会议上，斗争特别激烈。李将军承认目前的分界线等于事实上的停火线，霍迪斯反对他的这种说法。解将军很生气，并大动肝火，骂霍迪斯是“王八蛋”。这是一句特别具有侮辱性的中国话。接着又说，只有鬼才相信联合国是恪守信义和热爱和平的。解用轻蔑的口气对海军上将乔伊说：“我连贵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字都忘掉了。”

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对共方的辱骂未予置理，但霍迪斯在第二天给南日的备忘录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还击，他说："我相信阁下不会将你们首席代表的名字忘掉吧！"除了这种相互的谩骂而外，谈判本身没有多大进展。

华盛顿的军政头目们越来越有些迫不及待了。为了早日达成协议，他们于11月14日指示李奇微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分界线。其理由是共产党的提案不仅符合美国维护堪萨斯线安全的基本立场，而且为怀俄明线提供了保护，因此他们不认为这项协议等于让步。他们限期一个月完成其他条款的谈判，显然是想以此阻止为想延长时间而放慢作战行动和促使敌方加快谈判的速度。他们一方面告诉李奇微不要减轻对敌人的军事压力，但同时又承认今后一个月内，接触线不可能发生有利于美国的重大变化，另外还告诉李奇微说，海、空军的行动将不受协议的影响。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准备第二套方案的目的，是想从敌人那里捞到一些好处，但是未能成功。每天开始谈判之前，他们总要玩几局单人纸牌或打几盘桥牌，以便减轻一下和其顽固对手打交道时的过度紧张。11月17日，他们终于勉强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符合共产党在分界线上的立场，但坚持30天的谈判期限。

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方案经过几天的讨论和仔细研究后，认为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坚持在解决其他条款之前，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得对分界线进行调整。尽管30天限期期满之时达不成停战协议就标志着接触线的失效，但它在30天以后的时间里仍将对现存接触线之沿线产生心理上的作用。联合国军司令部犹豫一阵之后，还是接受了敌人的方案。11月23日，参谋人员开始忙着描绘战线。

因参谋人员对接触线的实际位置发生争议而未能达成协议，所以只好把它重新提交给副代表处理。就在对此问题的一次讨论中，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由于双方都说己方占领了中部地段的某个高地，霍迪斯上将只好叫会谈代表与守卫这一高地的指挥官通电话。解将军到场后向部队指挥员打电话核实，证明这个高地仍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控制之下。这使他大为恼火，他用中文小声地对他的参谋说："不要紧，我们今晚将它夺过来"。但这句话被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中尉吴翻译听见了，吴翻译马上把这句话告诉了霍迪斯，因此守卫这一有争议高地的联合国军对这次袭击预先得到了消息。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以其优势兵力赶走了这个高地上的联合国军。第二天，霍迪斯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占领了这个高地和必须对接触线进行调整。

11月27日，终于就最后的细节问题取得谅解，并就分界线达成协议。随着任务的完成，负责第二条款谈判的副代表于第37次会议结束时休会。

自8月17日举行首次会议以来，副代表们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起初，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曾想方设法改变敌人对三八线的立场，以便沿着实际接触线解决问题，这一努力成功了。在长时间的休会期间，第8集团军发动了多次进攻，并扭转了其大部分战线上的态势。谈判于10月下旬恢复，此时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想要达到的另一目标是保证开城的安全或至少使开城非军事化。但它违背了接触线的提法，因为开城仍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尽管联合国军司令部作了种种说理斗争和让步，敌人不但依然无动于衷，而且不放弃开城的立场越来越强硬。

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认为他们可能得到开城的时候，

一直愿意马上坐下来划分分界线，但当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时，他们又改变了态度，想把分界线的划分推迟到准备签署停战协定时解决，希望那时形势会发生变化，共产党也可能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开城。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顽固。本来他们曾一度同意放弃三八线而提出了接触线，并且对调整意见表示过一阵热情。当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要共产党让出开城地区，他们这阵子热情便马上烟消云散了，接着顽固地坚持立即解决接触线，而且除了某些涉及不到重要的地方外，不同意进行任何调整。

虽然共产党被迫放弃了三八线，但在分界线的设立上却占了上风，因为这条分界线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海军上将乔伊后来在其文章中写到，他认为这是谈判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军事压力不足以使共产党在签署这一协议后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乔伊认为，这个协议使美国付出了整整一年的战争的代价。不管这种看法确切与否，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仍作出了下述决定：鉴于敌人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这一事实和为了保证早日实现停火，联合国军司令的妥协是应该的。随着第二条款的最终解决，现在可以着手第三条款的工作了，即建立停战协定的执行机构。

二、对第三条款的公开争议

对要列入第三条款的几项重要内容，李奇微早就得到了很明确的指示。他们认为，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观察员小组一定要能自由地出入于朝鲜的所有地方，不能受任何限制，以便为了确保切实遵守停战条款而在必要时进行检查。他们

还通知李奇微，在停战期间不要增加部队人数或武器装备。当然，并不排除人数对等的人员交换或陈旧装备的更新。换句话说，这两条原则就是有权检查和有权更新但不增加装备。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对第三条款之态度的核心。

随着战场上的变化，海军上将乔伊在8月1日建议，除了不增加部队或装备外，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坚决主张不修建或修复任何机场。两个月后，李奇微试图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持的自由而不受限制地检查的立场加以澄清。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虽然敌人已表明他们同意对非军事区进行检查，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在他们控制下的领土进行观察或检查，因此李奇微对有无必要坚持无限制检查提出了质疑。坚持这一原则可能会延长谈判时间，甚至会导致共产党中断谈判。联合国军司令认为，只对地面、海域和机场的某些要塞进行检查就足以保证其部队的安全。而且他认为，如果共产党获得这种不受限制检查的权力，他们就会利用这一权力对情报领域进行不加限制地检查，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奇微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检查所持的基本立场应是：由联合小组对地面、海域、机场等要塞及通讯中心进行监视，并可以自由通过主要运输线；在整个朝鲜的上空进行空中观察和空中照相侦察；对非军事区进行全面的联合观察。作为联合国军代表团的最后立场，它可以放弃空中观察和空中照相侦察。他的上司虽然在几个星期后同意了上述基本立场，但保留在充分揭露共产党的立场之前对任何更改进行裁决的权力。正如第三军作战与训练参谋鲁本·E·詹金斯少将向科林斯上将所指出的那样，空军坚决反对放弃空中观察，因为它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即共产党也提出不建立地面观察员小组。

在11月份结束第二条款谈判时，科林斯上将和查尔斯·L·博尔特中将对共产党接受检查原则尚存一定怀疑。他们觉得，要真正制止敌对行动的再次发生并不取决于检查，而取决于在朝鲜地区保持足够的力量。由于共产党可能宁愿因这个问题而中断谈判，所以参谋长科林斯及其负责制定计划的副参谋长博尔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检查能否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安全，二是使检查得到最好的实施。

李奇微在11月23日的答复中重新强调了他以前的立场。他在对检查的必要性进行辩护时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敌人的空中力量一直在逐步增加，而且近几周来对清川江以南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中力量进行了挑战。如果敌人在北朝鲜建立和保持有空军基地，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它们最终会构成对日本的严重威胁。李奇微认为坚持这一原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因为美国在1946年开始与苏联进行原子能控制的谈判时就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如果不会给今后与苏联的谈判带来麻烦，就不能在朝鲜放弃这一原则。至于检查的技术细节，他认为对整个朝鲜来说，有40个联合小组就足够了，一部分长期驻扎于要塞地方，其余的各种巡回。如果敌人不接受检查，李奇微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有权中断谈判。

几天之后，美国的首脑们通知李奇微可以提出要对第三条款进行检查的初步立场，如果证明有必要再作变更，即放弃空中观察和空中照像侦察，但他们仍然坚决反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承担因此而造成谈判破裂的责任。他们主张任何停止讨论的决定均须由共产党方面作出。

11月27日在板门店恢复全体会议时，会议桌上出现了一位新的代表——霍华德·M·特纳少将，他是接替克雷吉上将的。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第8空军轰炸师，

近来担任过驻菲律宾第13空军师的指挥官。

海军上将乔伊在介绍特纳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为了缩短第四条款的讨论时间，乔伊建议交换包括所有战俘名单与国籍以及战俘营地址在内的战俘资料，以便双方在举行正式会谈之前加以研究。南日接受了这项建议，接着便开始讨论第三条款。

南日认为，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接受他下面提出的五条原则，第三条款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第一，所有武装部队在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停止敌对行动；第二，所有武装部队在3天之内撤出非军事区；第三，双方在5天之内全部从各自的战线后方、沿海岛屿和海域撤出；第四，双方保证在非军事区不得有任何武装部队和出现任何军事行动；第五，双方指派数量相等的代表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各种具体事情的处理和监督协议的实施。

对共产党的建议当时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争议，不过海军上将乔伊马上向南日指出它没有涉及重要问题。他认为，开始停火与从非军事区撤出所有部队的技术细节过于简单，而最重要的是双方采取措施减少发生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在停战期间任何一方都不得在朝鲜集结军事补给、装备或人员，不得修建和修复用于攻击目的的军事设施。乔伊接着说，如果双方接受上述条件，则任何一方都不会占据明显优势。为了确保双方遵从这些限制，他建议设立监督机构和观察员联合小组，并让他们享有足够的权力和行动自由，以便将整个朝鲜置于监督之下。联合国军司令部解决第三条款的七点方案实际上进一步充实和证明了共产党的五条原则。

敌人很快就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其初

步方案所增加的内容，并于28日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七点方案发起非难。南日的攻击矛头直指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不得增加兵力、补给、装备、设施以及允许观察员联合小组进入朝鲜任何地方。南日宣称，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他们认为外国部队撤出朝鲜是最终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必须条件。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在停战以后通过政治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限制和裁军的问题属于政治会议讨论的问题。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设立观察员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限制不适合军事停战协定，因此不需要进行检查。结果共产党借反对限制亦把检查的原则否定了。

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进行还击时，海军上将乔伊说，共产党关于外国部队撤出朝鲜的建议是不恰当的，因此不予考虑。乔伊接着说，敌人的五点计划的范围太局限，起不到"为和平搭桥"的作用，"为和平搭桥"是共产党的一句口头禅。接着乔伊开始详尽地解释联合国军的七点原则，他特别强调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够接受的任何停战协定中必须有限制集结部队的内容。

这时争论的主要焦点已十分明朗。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占有军事上的空中优势，因此想维持现状，以便在停战期间继续保持其空中优势。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不增加军事设施（主要是指机场）。要保证敌人不破坏这一原则，就必须包括检查。另一方面，共产党为了利用停战期间的机会加强它的空中力量，也坚决反对任何限制。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原则，就没有必要坚持检查。

第二周，双方继续为各自的立场进行辩解。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维护其七点方案，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双方在停战期间可以减少其兵力。但由于不知道停战时间的长短，所以

不破坏军事力量的平衡对保证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敌人代表进行反驳时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是企图阻止朝鲜的重建和恢复，是干涉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内政，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场予以拒绝，并宣称唯一受到限制影响的是机场，公路、铁路和其他设施都可以恢复。

12月3日，共产党首先作出让步。他们提出将其原来的五条原则扩大到七条。第6、7两条原则的内容如下：第6，为了确保军事停火的稳定性以促进双方举行更高级的政治会议，双方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将武装部队、武器和弹药运进朝鲜。第7，为了监督第6条款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朝鲜战争中立国家的代表组成一个监督机构，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经双方商定的后方要塞进行必要的检查，并向联合停战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共产党的新建议一下子便将联合国军司令部置于被动的地位，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提出的严格限制一切军事力量和装备以及邀请中立国家执行检查任务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短暂休会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提出一系列问题，要求对新提出的两条原则加以说明，并接着建议将第三条款移交给副代表团解决。由于联合国军代表要研究共产党这一行动的意图，因此有时间得到华盛顿的指示。

12月4日，敌人接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设立副代表团的建议，并指定李、解两位将军为其代表成员。海军上将乔伊指定特纳和霍迪斯两位将军担任代表成员。在当天下午举行副代表团会议时，李将军明确表示，按共产党的方案不得调动任何人员和补充任何装备，不得对北朝鲜重建设施进行任何干涉。因为后一条纯属内政问题，所以根本谈不上接受检查。在下次会议期间，李又说，他们还未充分发表他们

对组成和利用中立国小组的看法。接着又说，双方可能会邀请3—5个中立国，除双方确定的要塞外，这个中立机构可以自由行动；但军事停战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将严格地限制在非军事区。

在研究共产党对中立国家的作用的说明后，乔伊和其参谋人员处于一种既存有希望又不敢相信的矛盾之中，但他们仍觉得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达成协议。正是由于他们对敌人的种种许诺没抱多大希望，而且认为共产党最后会以种种办法限制对分界线纵深部位的有效检查，因此觉得由中立国完成这个任务或许符合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军事停战委员会的要求。在没有接到华盛顿的具体指示之前，乔伊承认联合国军司令部所能办到的一切，就是通过对共产党的建议提出质疑和进行非难的办法达到拖延时间和敷衍的目的。为了争取主动，乔伊竭力主张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一项包括以下内容的反建议：坚持人员调动和补充武器的主张，同意建立中立国机构代替军事停战委员会，停战之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放弃继续占领分界线以北沿海岛屿的要求，不再提出对修复机场的限制而只提出反对修建新机场。在乔伊看来，这样就会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它所想要的一切，而且很难被共产党拒绝。

李奇微将军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尽快表明立场，否则就会引起整个自由世界不满。12月7日，他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无论如何，得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哪些条款上不会作出让步。他认为，首要的是使中立国检查小组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分离开。李奇微的看法与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截然相反，他准备完全拒绝共产党建议中的这部分内容，因为他觉得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就等于允许对与军事停

战协定无关的所有政治问题进行检查。

鉴于李奇微的电报没有得到马上答复，所以副代表团仍觉得犹豫不决。在12月6日的会议上来了两位新军官，一个是海军上将利比，另一个是克劳德·B·弗伦博，他们是来熟悉情况与共产党的谈判手法的。在未制定出新政策之前，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讨论只能是含糊其词，不可能认真研究每个问题。

但是，不能因此而产生一种误会，以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此期间未进行有效地工作。因为制定政策必须有国务院参加，加之12月初美国正忙于和英国进行政治的与军事的非正式会议，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小心谨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愿在谈判的这一阶段提出那些没有回旋余地的主张。

和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认真商讨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2月7日提出一项新方案，并要求总统批准。他们向总统指出，第三条款中应包括下述四个主要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兵力调动和补充的立场不能改变，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在允许修复设施的问题上，可以作出某些让步，但任何有关机场的让步决定如果成为停战协定的最后障碍，则必须向华盛顿报告；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撤出分界线以北的岛屿和使用中立观察员小组；对派遣观察员之中立国家的选择必须经双方同意，中立国观察员小组必须向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指挥与监督。

起初，杜鲁门总统不赞成允许敌人修复美国及其盟国用惨重生命和物质代价所摧毁的公路、铁路与其它设施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接着指出，尤其是国务院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烈的看法：停战协定可能是在朝鲜达成的唯一的长

期协定，因此不可能长期限制他们对上述设施的修复，而且美国本身也打算在南朝鲜执行一项重建和恢复计划。听了上述解释后，总统才点头同意，并于12月11日批准了对李奇微的新指示。

这一天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将谈判延迟一周可能是有好处的。为了交换战俘资料，联合国军司令部一直在敦促共产党组成第四条款的副代表团；敌人终于同意在这一天碰头，由李将军和蔡上校参加第四条款的谈判，解将军和张上校继续参加第三条款的谈判。

在此后的辩论中，是解将军首先打破了僵局。他用试探的口气问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如果共产党就兵力问题上的立场作出让步，而且同意由一个指导机构而不是两个机构监督停战，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否接受由中立国进行检查的意见。虽然解的用意显然是刺探美国的立场，但现在毕竟有了妥协的可能性。

由于有了华盛顿的指示和解的共产党可能同意改变立场的暗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于12月12日提出了一揽子新建议。其主要内容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放弃沿海岛屿和分界线以北的领海，同意由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国家派遣观察人员。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允许人员调动和补充、同意中立国小组下属于军事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机场的立场没有改变，重建和修复仍被禁止。特纳告诉解说，鉴于这是一揽子建议，要么全部接受，要么根本不接受。

在下次会议上，解首先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方案发起攻击，接着特纳进行反驳。在对方对兵力调动和补充的原则进行攻击时，特纳指出，接受共产党的意见将形成事实上的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因为除了当地部队外，最终不会再发生什么摩

擦了。敌人同意不在第三条款而在第五条款讨论这个问题，因此特纳认为他们赢得了一分。

12月14日，解方又提出一个建议，即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让步并允许联合国军司令在1个月内轮换5,000名人员。特纳对这么少的数字报之以嘲笑。当进一步细问他时，解承认即使每月的5,000名轮换人员也必须经过军事停战委员会同意，而且只要共产党认为必要就完全可能对任何轮换加以否决，因为他们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占有一半的成员。这使得敌人的建议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谈判开始再次陷入困境。

直到12月中旬共产党对检查才表现出妥协的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头目们曾担心这个问题会成为达成第三条款协议的最大障碍。对于中立国机构的组成成份、职责以及它与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关系，确实还有许多细节问题尚待解决，但至少这一原则已被接受了。只要能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敌人亦愿意放弃其反对轮换的极端立场。他们作出这种让步的条件是：允许在停战期间修建和修复机场，但这正是联合国军司令所坚决反对的。

12月17日，李奇微将军飞往朝鲜。他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成员详细讨论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他对形势的估计。由于分界线谈判的30天限期已经临近，他对其上级说，除非延长期很短，并可望在延长期内结束谈判，否则将会对联合国军部队产生不利的影响。李奇微承认，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对共产党的意图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都认为揭露它们的最好办法是用毫不含糊的语言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坚决主张，他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注意，联合国军司令随时都有可能面临谈判破裂的危险，他认为应该提前作出应付这种危机的决定。李奇微特别反对实行过去那种放弃立场的政策，因

为他认为，这种政策只能使敌人越来越顽固，胃口越来越大。

在谈到目前的问题时，李奇微坚决主张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其在机场和轮换问题上的立场。此外，联合国军司令部还应坚持由中立国进行空中观察和空中照像侦察以监视敌人的机场和保证中立国观察员小组自由通过整个朝鲜的主要交通线。要使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观察员小组所承担的任务带有强制性，以免共产党阻拦它们的行为。李奇微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关键问题是机场和是否以完全接受或不接受这一原则来达成停战协定。

三、国内问题和国外压力

与国务院协商和经总统同意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次日向李奇微作出答复。华盛顿的领袖们对李奇微和联合国军代表团不顾重重困难而正在进行的良好努力表示赞赏。但官方的一致看法是，在停战后召开政治会议可能不会成功，因此停战协定很可能是以后能达成的唯一协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使其性质具有较大程度的长期性，所规定的条件必须是能长期实施的。美国的军政领袖们认为，共产党可能采取下列方式破坏停战协定：示威、威胁和转嫁责任，但不是再次发动侵略。他们认为，在朝鲜再次爆发敌对行动的主要障碍是共产党意识到再次挑起侵略将受到全面的惩罚。美国正为此在拟定一项声明，并将尽一切力量动员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在上面签字；这项声明将在缔结停战协定之后发表。英国已经表示她将支持这一声明。

根据上述考虑，美国的领袖们不愿对目前正在讨论的全部问题发表其最后看法，因为要是共产党提出新的条件，这

就会使美国丧失应变或调整的能力。他们也不愿意提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中止谈判的肯定意见，而他们却列举了一大堆李奇微及其参谋人员目前应该支持的主张。由于限制修复机场已经不现实，所以他们同意对部分机场、包括适用于喷气式作战飞机的机场进行修复和保养。至于空中观察，虽属需要，但并不重要，因此不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后主张之列。任何一方的人员轮换都应得到批准，或只要不全面增加兵力，就根本不必加以限制。关于补充问题，重要的是不增加作战飞机。在这个问题上李奇微应寸步不让。华盛顿的领袖们同意中立国观察员小组驻扎在主要的要塞地方，同意他们在需要履行其职责的地方自由行动。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后，则不必所有的观察员小组都坚守其岗位，但军事停战委员会和部分观察员小组则要坚守岗位。如果在临近12月27日的限期时谈判仍未取获进展，李奇微有权提出15天的延长期。

从李奇微与其上级的这种对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对与共产党谈判这一复杂任务的方法上存在着分歧。远东司令官及其参谋人员认为，一再让步只能说明对敌人的软弱。因此，最好是采取实力和强硬政策。只有当共产党意识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心坚定不移地坚持其原则、不会再作任何让步时，他们才会真正采取认真谈判的态度。另一方面，华盛顿的领袖们也倾向于根据签订长期停战协定的实际需要而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这就是说，他们可玩弄转嫁责任，搞平衡和要手腕的把戏，以便占些便宜，同时避免提出可能导致谈判中断的无活动余地的主张。坚持这种态度的目的是希望能最后达成一项结束朝鲜敌对行动的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停战协定，并让人们知道：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愿意继续谈判，就

会使共产党不得不承担中断会谈的责任。后一问题将对华盛顿政府的决策活动产生长期的重要影响。

美国国内的情况是，要求通过停火和缔结停战协定来达到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压力越来越大。从12月中旬以后，要求制止日益增加的伤亡人数和要求美国与联合国的军队撤出朝鲜以便将其重新部署于其他地方的呼声亦越来越高。由于谈判的进展十分缓慢，所以美国的盟国越来越不愿与共产党中国作对，更不想派更多部队去朝鲜。很明显，只要战争一天不停止，美国就得将大量的资源倾销到这场热战中去。因此，只好限制对正在进行冷战的地区的军事援助。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停战的办法使朝鲜战争得到最低限度的解决和通过政治的方法实现朝鲜的统一。

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2月建议美国坚持这样一种政策：即避免与中国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谋求一种既不损害美国对台湾、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与苏联秘密会谈的立场又可以接受的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看来在近期要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愿意继续目前所执行的方针，即在缔结满意的停战协定之前，打一场有限战争和对赤色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因为这一方针得到了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然后再努力谋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与此同时，将加强大韩民国的军队实力，做好抵抗或击退共产党妄图夺取南朝鲜的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认识到，经过适当的训练和装备，大韩民国的军队终于能够担负保卫南朝鲜的重担。要是停战谈判失败，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考虑采取其他动员措施和各种形式的军事压力来应付这种局面。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阻止了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和将空

战延伸到满洲里。由于美国没有意识到当时联合国会支持对中国进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所以执行上述决定似乎不会捞到多少好处。

也许英国的情况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生动例证。当时英国正在经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危机，因此它不想对其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行其他限制。如果给中国共产党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关心共产党对香港的态度，而且会十分不安地看待敌人在朝鲜日益增长的空中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迫切的希望是在谈判桌上达成停战协定之前，最好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

由于英国吃不准美国的政策，这才导致了12月下旬至次年1月在华盛顿的会谈。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与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进行会谈的同时，英国的军事领导人也在和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一起讨论对共产党中国扩大联合国行动的意图。

从根本上说，美英两国在政策上的分歧产生于它们对共产党中国和中华民国的态度。由于英国已经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且与之建立了贸易关系，所以他们倾向于把新政权视作永久性政权。而美国则认为，只要共产党中国不停止侵略和不转变对西方的态度，就根本谈不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各种利益，如在联合国的席位或正式的贸易关系。此外，美国还得对蒋介石和台湾政府履行某些难以推卸的义务。鉴于美国承认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英国也必须理解美国对该地区必须承担的主要责任和为承担这种责任而提供的力量。

虽然会谈并没有改变美国和英国的政策，但却消除了彼此间的相互猜疑。双方都不希望延长朝鲜战争的时间。只要

谈判不彻底破裂，他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意见分歧是可以得到调解的。此外，双方还就如果敌人不同意签署停战协定或签署后又撕毁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由于美国对另一种行动方针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因此不可能有可靠情报透露给英国。

如果形势不发生变化，实际上美国似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但仍有一部分人认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作出解决朝鲜冲突的军事决定，哪怕它意味着与共产党中国较量。负责制定计划的副参谋长博尔特在12月底向他们提出了严肃的劝告。他对陆军部副部长本德森说，美国目前不具备作出一项有利于远东的决定的军事力量，而且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这种力量。只有彻底改变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全面动用国家资源，才能很快增加美国的军事力量。正如博尔特指出的那样，第一种方针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第二种方针会引起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这两种方针可能都会正中苏联的下怀。

博尔特的立场从李奇微将军那里得到了证实。联合国将发表停战后声明。声明威胁说，如果共产党签定了停战协定又予以撕毁，联合国将会扩大战争。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又显然把他们的愿望寄托在这则声明上。博尔特对此进行评论时毫不掩饰地指出："……良心促使我重申我的坚定看法：就目前能动用的军事力量来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既不能构成对共产党中国的威胁，也不足以阻止共产党中国再次发动侵略"。

但是，正如科林斯将军1月10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指出的那样，拟议中的联合国声明未对今后爆发对朝鲜的敌对行动加以必要的限制，这一事实的本身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新

问题。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的决定，大韩民国的军队将得到增加、训练和装备，以让其承担保卫其本土的责任。如果共产党撕毁停战协定，美国就可视当时的情况而决定是否再次对朝鲜进行干预。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不论形势如何，他都得拟定美国进行干预的应急计划。

但只要谈判仍在继续，看来增加美国在朝鲜的力量的前景就很渺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告诉人们，只要能达成停战协定，就将转向逐步脱离战斗。但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世界形势好转之前，必须将军事力量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不管总统或者国会同不同意进一步增加武装部队，都需要设法打破朝鲜的这种僵持局面。

由于战场上的行动迟缓而不景气，加上没有多大希望加快它的速度，因此在谈判桌上的争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于机场问题未能就第三条款达成协议，在战俘处理问题上又将爆发一场新的战斗。

第七章　战　俘

表面上看战俘问题似乎很简单。美国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因后来爆发战争而使该公约未被批准。1950年战争爆发后，北朝鲜外交部长便马上宣布他的政府将遵守这个公约。由于该公约的第118条的开头就明文规定："停止敌对行动后应立即释放和遣返战俘。"因此这似乎是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但由于掺入这一问题的情感成份太重，所以从一开始讨论战俘的交换时间便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越来越大。因此在个别战俘和大多数战俘的权利、人权和法权、人道主义和共产党的傲慢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由于争论成了直接的谈判内容，下面将对其引起原因逐一地作一简要回顾。

一、自愿遣返

美国在其早期就已经接触过自愿遣返的原则或每个俘虏愿否回家的选择权。在革命战争结束时的1783年巴黎条约中明确规定："双方的俘虏都应予以全部释放……"。数千名英国和德国的士兵决定不回欧洲，而留在美国生活。

但这仅仅是一种例外，通常的作法是在冲突结束后交换全部的俘虏。在制定1929年日内瓦公约时，理所当然地同意强迫遣返的原则，因为大多数俘虏都愿在战争结束时回家的

观点得到了普遍地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在战俘的处理后面增加新的一章，因为苏联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还扣留了大批德国和日本俘虏，帮助苏联恢复建设。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1949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又充实了遣返这一条款的内容，这样它就在实际上成了规定尽快与强迫遣返的一纸声明。虽然他们有保护每个俘虏尽快返回家园的权利的热情，但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他们没有把下面几种可能发生的例外情况写入逃跑的条款中：害怕被遣返的俘虏，失掉其本国政府同情的俘虏，更喜欢捕获者一方的习惯的俘虏。

这种遗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暴露出来。但共产党是不会让他们吃半点亏的。他们从1950年中期开始集结俘虏时起，就对俘虏进行再教育，并尽量将原大韩民国的士兵编入朝鲜人民军。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扭转了战局。这时再不会允许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处理战俘了。联合国军司令部遵照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将其日益增多的大批俘虏、军人和老百姓送到俘虏拘留营，并如实地向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了名单。联合国军当然抓到了一些前大韩民国的士兵，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宣称，他们是被强行编入共产党部队的。这是最先遇到的麻烦问题。

1950年年底中国人参战后，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军队中，有许多人以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成员。在国内战争时期，有大批人向共产党投诚或投降，共产党将其全部编入了他们的军队。一旦他们成为联合国军的俘虏，其中有些人就会马上表现出一种他们不愿再受共产党控制的情绪。

由于俘虏的人数越来越多，成分越来越复杂，因此对他

们的最后处理便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开始停战谈判的前夕，也就是在7月份，陆军准将、陆军心理作战处处长罗伯特·A·麦克卢尔表示了他对停战后前国民党士兵的可能命运的关心。他对柯林斯将军说，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被迫加入中共军队的。如果现在采取强迫遣返，他们就很可能受到严重惩罚或甚至被处死，因为他们已经投降了联合国军。为了阻止这种情况，麦克卢尔提出了一个巧妙的但多少有些争议的解决办法。如果给予大批前国民党士兵选择机会，他们可能会选择去台湾，因为官方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他极力主张将这一部分人遣返到台湾。这样，美国就能避免重蹈第二世界大战时同意苏联强迫遣返俘虏的覆辙。与此同时，麦克卢尔继续说，今后要加强进行心理战。因为如果敌人的士兵确信他们不会被遣返，他们就可能宁愿投降。

柯林斯认为，麦克卢尔提出的方法需要进一步讨论，并于7月6日将其详细报告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柯林斯和陆军军法署署长认为，虽然美国没有批准日内瓦公约，但应受到公约中各种原则的约束。另外，参联会认为，只要有充分的保护措施保证联合国军俘虏安全回返，李奇微将军就可以根据台湾仍属中国一部分的法律依据，将要求得到国民党同情的全部中国俘虏遣返到台湾。柯林斯甚至愿意走得更远。如果这样作不使尽快重新获得联合国军俘虏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他建议未经中国或北朝鲜俘虏的完全同意，就不得强迫他们回到共产党控制下的领土。

台湾提案符合日内瓦公约的宗旨并可以受到保护，而参联会提出的志愿遣返显然不符合该公约的条款。当有人请李奇微将军对此进行评论时，他马上就指出了这一点。李奇微

宣称，在这种时候采取志愿遣返会开创使美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先例。而且共产党可能会利用这点进行反宣传，以达到感化那些不赞成共产主义的毗邻国家。虽然存在着上述不足，但李奇微认为，其优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志愿遣返的进一步支持来自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顾问团——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这个问题应该在比较高的政府级解决，因为它超出了军事问题的范围。其结论是，最后应在联合国大会通过。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詹金斯将军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觉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根本不会形成基本政策的任何决定。他的理由终于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柯林斯将军授权通知李奇微：他可以根据志愿遣返的原则拟定联合国军司令部主张的计划。

在因开城事件而导致的长期休会期间，国防部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罗伯特·A·洛维特在9月17日接替了马歇尔将军的国防部长职务。当谈到6月30日向李奇微下达的战俘交换问题的指示时，他指出共产党可能不同意达成对等交换协议，而完全可能坚持达成全面交换协定。这种可能性马上给志愿遣返原则蒙上了一层阴云，因为首要问题是保证联合国军司令部全部俘虏的尽快遣返。如果进行对等交换，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全部俘虏被遣回之前，则很容易将那些不愿再回到共产党方面的敌方俘虏扣留下来；而实行全面交换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10月初，詹金斯将军建议参谋长承认洛维特协议时，对这一新的舆论作出了如下的反应：如果敌方拒绝讨论其他条件，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做好同意全面交换的思想准备。由于为了恢复停战谈判要准备对李奇微的停战指示进行修改，加

之志愿遣返又与日内瓦公约相矛盾，所以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认为，不应重申这一原则。柯林斯及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僚们亦表示同意。

看来，志愿遣返问题之争已到此结束。在东京的李奇微将军也改变了他的主意。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如果不是对等交换，他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将那些不愿被遣返的俘虏扣留下来。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其心理作战计划中就回避了不遣返的问题，而且没给共产党士兵提供庇护所。但我们却向他们提供食品、医疗和各种优待，而且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北朝鲜人返回家园，并且向中国部队提供抢救其士兵生命的方便。

虽然现在已不再强调志愿遣返，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战俘营中的俘虏的重新分类工作却取得了某些进展。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所俘虏的数千人中，有许多人声称自己是南朝鲜人。这些人被分为以下五类：1、志愿参加北朝鲜军队的老百姓；2、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的老百姓；3、被俘后被强行编入敌军的韩国陆军士兵；4、因掉队后被误送入俘虏拘留所的韩国陆军士兵；5、混入战俘中的无辜者，闯入俘虏拘留所混饭吃的人，以及怀疑其是穿便衣的北朝鲜士兵而被捉来的人。远东司令部宪兵司令马歇尔将军和军法署署长均认为，只有第二类和第五类能被重新归类于被拘留的敌侨；其他类将保持不变。

据李奇微估计，当时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拘留所里大约有4万南朝鲜人被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李奇微便着手将此类人员重新归类为被拘留的敌侨，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将其中部分人逐步移交给南朝鲜政府的地方官员。

11月下旬开始讨论第三条款。接着李奇微于28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他对解决战俘问题的建议。在未接触实质性问题之前，他打算坚决要求敌方交出全部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的名单、人数和地址。最初他同意进行对等交换，因为一旦成功，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可随心所欲地扣留俘虏。如果遭到敌方拒绝，他就同意进行全面交换，哪怕它意味着要移交被审查的战犯、谍报人员、曾经帮助过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士兵及不愿被遣返的人员。

面对是否决定牺牲那些不愿被遣返的人这一紧迫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进行了辩论，但仍未形成决议。因为从良心上讲，他们要关注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的安全；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又不愿强迫敌方俘虏返回到共产党方面。虽然他们绞尽了脑汁，也找不出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良策。他们建议李奇微同意在释放俘虏之前，由联合小组对全部俘虏进行审查。如果在审查期间，有人提出不愿被遣返，可以根据其捕捉者的管辖权限留下。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表示，他们对此是否成功并不抱很大希望，因为他们曾经通知国防部长和李奇微将军，他们对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建议都将表示欢迎。与此同时，他们还授权联合国军司令在其11月28日建议的基础上继续提出新的建议。

到12月11日第4条款副代表会谈开始时，志愿遣返原则已被置于一种令人难以思议的位置。它既不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计划之内，也不在其计划之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说来，这是他们最希望达到的目的。但是能否达到和怎样达到，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另外，万一共产党方面设置障碍或有意扣留联合国军司令部俘虏进行报复，似乎也提不出坚持这一原则的充分理由。随着谈判的开始，志愿遣返的命

运似乎主要取决于今后共产党在处理战俘问题时的行动和反应。

二、调 查 时 期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为同时开始第三、四条款的讨论所作的反复努力终于在12月11日结出了果实，因为共产党方面同意在这天下午举行副代表会议。谈判桌对面坐着的是两位谈判老对手李相朝少将与柴成文上校。这说明敌人指派了两位善于谈判的能手。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代表是才正式接替海军上将伯克的海军少将鲁思文·E·利比和乔治·W·希克曼上校。利比是一个凶狠老练的家伙，非常善辩。因此他和敌方最善于谈判的代表打交道是不会吃亏的。他思维敏捷、能辞善辩、精力充沛，是与共产党打交道的一名最理想的谈判代表。希克曼上校聪明能干、具有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因此使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小组的平衡力量加强了。

出示证件之后，李将军抢先发言。他说，如果在停战后释放全部战俘并允许他们返回家园，战俘问题就会很快得到解决。他认为，只要双方代表同意这一原则，其他任何问题均属细则范围，因此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在没得到敌方提供的新近俘虏名单前不准备开始实质性讨论，所以利比对共产党代表的上述发言未予理睬。但是利比坚决要求交换战俘资料和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视察战俘营。在此后所进行的初步辩论中，利比曾暗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战俘问题上所持的总的立场是在适当的监督之下平等而公正地交换俘虏和保证他们被遣返之前受到人道主义的优待。利比对李说，当然，联合国军司令部希望确定优先移

交伤病俘虏的原则。

李很想弄清利比在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案时所使用的某些模棱两可的词语的真实含意，但这位海军少将不愿马上对其作出具体解释。因此，李唯一能够明白的是，“平等而公正地交换”意味着在最终缔结和平协定之前，如果恢复敌对行动，任何一方都不得对对方构成明显的军事优势。

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海军上将乔伊告诉李奇微，看来共产党将赞成全面交换而反对对等交换，不管后者有何变更。但是李奇微当时积极主张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战俘营，并正在设法得到其上级的强有力支持。他的上级当然也很想敌方向联合国军司令部做出这种让步，但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端。

此后几天时间里是相互进行试探和攻击。利比集中指责共产党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虽然北朝鲜在1950年曾保证遵守日内瓦公约，但他们只在战争早期报告过110名俘虏的姓名，此后就终止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后来不得不通过共产党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搜集战俘的资料。利比认为，在对整个战俘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前，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掌握敌方俘虏拘留所中全部俘虏的姓名、地址和国籍。他提醒李将军注意公约中有关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的条款。

李非常乐意用公约作为其辩论的根据。唯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最适合其口味的有关条款。首先是第118条，因为它赞成采取强制性的全面遣返。毫无疑问，共产党将反对对等交换的任何建议。李千方百计地想弄明白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否打算坚持这一点。虽然利比在争议中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但敌人的立场却是很清楚的。李接着在12月12日提出了一项具体建议，主张双方都接受全面交换的原则。如果联合国

军司令部接受这一原则，共产党将愿意提供战俘名单，并在板门店开始进行实际的俘虏移交。他们仍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视察。李明确地表示："这办不到！"

由于未进入实质性讨论，所以在12月中旬的会议上，差不多都是相互攻击对方的立场，只是偶而出现气氛缓和的情况。由于共产党拒绝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战俘资料，利比指责他们这是"没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立即反驳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愿过河而已。李声称，最重要的是释放俘虏，而不是过多地关注相互交换俘虏名单。总之，双方都竭力想把对方的建议说得一文不值。因此，最大的问题是确定哪一方的建议一文不值。

12月18日，共产党同意提供战俘资料。接着休会4天，以便让双方对战俘资料进行核实。敌方提供的名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大失所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共产党通过其新闻报道和无线电广播所公布的俘虏人数是65,000余人，但在他们的名单中仅有韩国士兵7,142人，联合国军人员4,417人，总计11,559人。而韩国陆军在战斗中的失踪人数是88,000多名，美国是11,500多名，与共产党方面提供的俘虏名单相比悬殊太大；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记录相比，则相差更远。在共产党的188,000名失踪人员名单中，联合国军司令部拘留的战俘有132,000多名，另外还有37,000人最近被重新分类为被拘留的敌侨。

在共产党仅提供少数俘虏名单问题上的首次冲突逐渐平息后，海军上将乔伊和李奇微将军决定致函敌方首脑，要求对此予以解释。在未接到答复之前，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将继续对全面交换方案进行抨击和进一步试探敌方的态度，也不提出任何反提案。

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提供的名单也不感到十分满意。12月22日恢复会议时，李将军指出，有一份名单中少了44,259人，另一份中少了1,456人。利比解释说，由于大部分失踪的人都是以前的韩国居民，他们是在可疑或战争条件下被俘的。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于1951年春季对其进行全面审查时，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交战时被俘或被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的。上述俘虏已和那些志愿加入共产党军队的分开，其中有37,000人被重新分类为被拘留的敌侨。另外，利比接着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在对已经证实是韩国居民的另外16,000名俘虏进行审查，他们也不在被遣人员之列。

李将军对这种单方面的行为马上提出反对，并污蔑利比的上述解释是"装腔作势和奇谈怪论"，李认为，决定遣返与否的条件不是他所居住的地方，而是他在哪方的军队中服役。

利比拒绝对此进行辩论，而对另一个问题进行抨击。他质问共方代表准备拿出什么理由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用其手中1万多名俘虏与联合国军司令部手中10多万名俘虏进行交换是公平合理的呢？利比一方面提请李注意，解将军在讨论第三条款时曾明确指出，停战之后双方不得增加任何军事力量；并同时指出全面交换将使共产党的军队增加相当于10个师的力量。在谈到战俘名单时，利比说，敌方声称他们俘虏了数万名韩国士兵，但在他们提供的名单中仅有7,142名俘虏。因此他要求李作出解释。

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情报部门的报告和对战俘的采访中完全证实了北朝鲜将大量原韩国陆军人员编入了共产党军队。虽然他们被遣返的前景很暗淡，但乔伊和李奇微仍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谈判代表至少应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与此同

时还提出以遣返原韩国陆军人员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向敌人遣返37,000名被重新分类为被拘留敌侨的交换条件。

圣诞节会议期间，利比将军加强了他的攻势。他告诉李说，共产党并没有全部报道他们所拘留的俘虏，但马上遭到了共方代表的竭力抵赖。李宣称，他们提供的名单上人数不多的原因是他们对俘虏进行了重新教育，并在前线释放了成千上万的俘虏。如果说这也是真话，利比马上接着说，哪为什么只有177人回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前线呢！他认为，共方提供的名单上的人数之所以很少，是因为他们将许多韩国士兵强行编入了共产党的军队。李仍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将那些愿意加入其部队的人编入了他们的军队。

在试探阶段，大部分争论都围绕着双方未给对方提供准确的情报。我方在战斗中的失踪人数与共方所报道的俘虏人数之间的悬殊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不得不怀疑敌人在提供名单时抱有诚意。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它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所呈报的俘虏人数远比它目前实际拘留的人数要多。这是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对战俘的两次初步处理已将其中2000多名遣返给敌方。由于许多共产党士兵在提供其身份方面的情况时不予合作，很难对这种误差作出更正。加之还有许多敌方俘虏逃跑和失踪，就更加大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之统计数字方面的矛盾。乔伊明白，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要求对全部战俘进行一次全面的统计，这样他就可以向敌方提供一份准确而完整的名单。

在进行上述统计时，乔伊希望能更多地搜集到中国和北朝鲜俘虏对遣返态度方面的情报和了解韩国政府对遣返拘留

在敌方的韩国老百姓的态度。了解这些情况的目的是要提出志愿遣返的问题，因为不对可能拒绝遣返的敌方战俘人数做出估计或不了解韩国官员对志愿遣返原则的反应，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新年伊始，海军少将利比便提出了被拘留的敌侨问题。这是一个政治色彩大于军事意义的棘手问题。但李将军早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过，他不反对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在讨论过程中，双方同意签定停战协定后，允许逃离的老百姓回到他们愿去的地区。利比将军陈述了他的主张。由于军事指挥官要负责监督老百姓的迁移，所以他坚决主张将此协议写进停战协定的条款。

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利比将军就准备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第一项实质性建议，解决双方争执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双方都希望释放全部战俘，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求按平等的条件进行；第二，处理曾被强迫编入北朝鲜军队的原韩国士兵，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求恢复所有这些士兵的战俘身份；第三，用什么标准确定俘虏应归属哪一方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主张按其居住地确定，共产党方面则坚持按其被俘时的所在部队确定其国籍。

利比接着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通过公正的折衷方案来解决上述分歧。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下述原则，即被俘的士兵获释时，可以有权选择回到己方部队或加入另一方部队；并希望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有的俘虏，即包括被俘的士兵和老百姓。利比建议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监督对战俘的口头审查。对等交换后剩下的全部俘虏可凭誓获释，但不得再与俘获其的一方打仗。利比最后说，凡是拒绝遣返的人均不允许拿起武器与另一方进行战斗。

这一步棋走得十分漂亮。由于共产党方面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允许被他们俘虏的韩国士兵加入北朝鲜军队或选择在前线释放，所以已在实际上实行过志愿遣返。这在当时是有利于补充他们的兵员或减轻他们看守大量俘虏之负担，但现在则对他们不利了，因为它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了宣传工具和一批为数不多的俘虏进行讨价还价，因而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手中的大量俘虏拒绝回到共产党方面，他们就难以进行反宣传工作，不管其理由是何等的头头是道。虽然志愿遣返的原则不同于其他原则，但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肯定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具有感召力。因此，要想随意对它进行抨击就得提出法律的依据。但能否赢得全世界的舆论支持还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

与此相反的是，现在自愿遣返已正式将美国及其盟国联结在一起。虽然这是一种试探性的结合，但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旦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结合就可能不会破裂。

三、共产党反对自愿遣返

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1月2日建议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出人意外的。李将军于第二天早晨对此发起了攻击，说这个建议“荒谬绝伦”，坚持要进行对等交换。他在全盘否定这一建议时，振振有词地说：“战俘的释放和遣返决不是贩卖奴隶”，“20世纪也不是野蛮的奴隶制时代”。他既不理睬利比所进行的解释，也不置理利比所尖锐指出的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的立场，即他们曾在朝鲜战争中执行过志愿遣返，而现在又对其进行攻击。

但利比也不是一个善罢干休的人。他指责李将军对士兵

缺乏最起码的感情。他提醒李说，按照你们自己的说法，毕竟中国部队是一支全部由志愿人员组成的部队，是一支完全由热心为朝鲜人民军而战的人组成的军队。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利比接着说，他很难理解共产党为何要对这些不愿返回家园的志愿军如此担心呢。但李将军矢口不谈这个问题，而继续污蔑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是"贩卖奴隶"。利比则反唇相讥："阁下的分析牛头不对马嘴，论点模棱两可，结论站不住脚"。他对李说，"除此以外，你的发言可谓一篇杰作"。

虽然共产党方面竭力反对和诋毁自愿遣返，但海军上将乔伊透过表面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他发现，虽然共产党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贬得一文不值，但他们却又迫不及待地讨论它的可取之处。

在副代表会议上，利比将军对联合国军司令部1月2日的建议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想以此消除李将军的部分敌对情绪，但效果甚微。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李的抨击也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因此，好几次利比都不得不回击他对李奇曼雷、蒋介石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污蔑诽谤。

在共产党已经提出并执行自愿遣返原则之后，再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前后矛盾的立场并无什么好处。因为李将军可以毫不迟疑地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战俘开展政治教育是为了左右他们对遣返的选择。虽然这位将军曾经在过去的一次会议上承认，共产党对许多联合国军俘虏进行教育后在前线予以释放。另一方面，连李自己也会明白，他在辩论中不时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在1月11日的会议上，李在为共产党的俘虏教育方式辩解时，口口声声称它是正义的和仁慈的，而且笑得前府后仰，几乎中断了他的发言。

当利比指责北朝鲜将数千名韩国士兵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时，李却矢口抵赖。他板着脸说，在共产党军队服役的只有志愿人员。虽然战争爆发以来，共产党方面已多次违反日内瓦公约，但他们仍在宣传和辩论中千方百计地利用对他们有利的条款，而对其他条款则完全置于脑后。

第四条款的谈判在1月中旬也未取得什么进展。利比将军力图向共产党说明，如果他们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就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但李将军对此非常怀疑。他提醒利比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未做过任何一件有益于共产党的事，它根本不可能违背其自己的宗旨和利益。当利比进一步证实共产党的担心即允许中国战俘在共产党中国和国民党中国之间进行选择时，柴上校顿时变得怒不可遏起来。他声明说，中国人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他们将斗争到底。但当人们问及他时，柴上校拒绝说明他的声明是代表在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代表全中国人民。

鉴于谈判处于这种僵持局面，李奇微将军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提出最后的立场。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能提供的只是半个最后立场。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同意接受全面交换，条件是不准强行遣返战俘。但由于这是一种在万不得已时才能采取的立场，加之社会压力又可能使总统中途改变这种立场，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实际上并未产生任何结果。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准备继续争取就遣返被共产党所俘虏的联合国与韩国老百姓达成协议。为了使共方相信，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没有以志愿遣返为借口而扣留大量俘虏。我方提出，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由李奇微负责在战俘中进行一次民意测定，以确定要求得到遣返的大致战俘人数。我方还提出，

在适当的时候，李奇微可以将战俘问题移交给全体委员会讨论，并准备和共方进行一笔交易，即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机场问题上作出让步，共产党方面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俘虏问题提出的建议。这是对准备要在4月份进行的一揽子交易的首次说明。

联合国军司令在1月19日的答复中认为，一并提出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固然可以，但必须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不同意在战俘中进行民意测定，因为他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战俘必须在有双方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在场的交换地点提出其选择。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已经否认存在着任何诱使或强迫战俘作出选择的计划，所以共产党肯定会利用在战俘中进行民意测定大作文章。把它说成是干扰战俘自由选择的一种手段，并借此拒绝承认它的结果。如果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这项工作，又肯定会进一步加深共方对其中立立场的怀疑。因为共产党已经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言人，根本未把它看成为一个中立组织。另外，李奇微最后说，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共产党并不真正关心有多少俘虏能够回到他们那边，“骂娘是他们的一种天性，因为个人与国家的问题是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差别”。

在副代表会议上，李将军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缺乏道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混淆视听的发言完全可能使临时观察员相信，是共产党在关心每个俘虏的处境。但当利比将军要求他说出真凭实据时，李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通过自己问自己几个问题结束了他那长长的发言。下面的对话反映了当时会谈气氛的紧张和共产党的谈判手段。

利比将军：“你们有两大绝招。一是拒绝对我方所提出

的任何问题作出直接回答；二是你们提出两三个问题对我方提出的问题进行搪塞，尔后则要求我方作出回答。这就是贵方对待这次谈判的整个态度。贵方对我方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什么不道义呀，缺乏人道主义呀，不公正呀，不可思议呀，等等。可是当我们要求贵方指出最简单的真凭实据时，你们不是使用金蝉脱壳之计，就是置之不理。你们不回答是因为你们无法回答”。

李将军：“我们在会议上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凡是贵方要拖延会议时间时，贵方就说我方未作出答复，即使我方确已作出答复时也是如此；当我们采取明智态度讨论问题时，贵方则说我们是在施放烟幕弹……。这似乎就是你们的唯一武器，也唯独你们才使用这种看家本领……。我们一向光明磊落，我们热爱真理和正义，并且坚持真理，我们从事着我们的事业；我们讲的是正义和真理，我们坚持的也是正义和真理”。

共产党是坚持真理也罢，是践踏真理也罢，这都无关大局，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不会承认志愿遣返的原则。他们顽固而公允地提出，志愿遣返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为了给利比将军提供一部分反驳的论据，国务院于1月22日对日内瓦公约进行了解释。公约的第六条款指出，只要在公约的其他条款中没有剥夺战俘的权利，冲突的双方可以就战俘问题达成专门协议。由于日内瓦公约的精神是保护每个战俘，所以国务院认为，志愿遣返与其有关条款不存在什么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国务院的解释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提供了部分法律上的和大量人道主义的依据。

共产党不仅反对志愿遣返，而且坚决反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中提出的凭誓释放。因为凡是准备凭誓释放的俘虏都

是共产党人，所以共方代表宣称这是对其提出的单方面要求。因此，海军上将乔伊倾向于同意他们的意见，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即要么授权他将凭誓释放扩大到双方，以保证被遣返战俘不再被迫拿起武器与对方进行战斗；要么就允许他完全放弃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凭誓释放的主张。由于韩国政府反对战俘的凭誓释放，共产党可能不会让其限制他们对获释战俘的重新使用，所以李奇微同意由乔伊按其自己的意见进行处理。

事实上，即使是在细小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也是与海军上将乔伊的一贯立场背道而驰的。乔伊和李奇微都发觉共产党把让步视为软弱的表现。乔伊在1952年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说，在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前提下，耐心和坚定不一定是左右共产党的两大要素。他在军事上处于相持态势时，为签定一项有效而稳定的停战协定正在全力进行谈判。乔伊主张，在敌方自觉转变其立场之前，必须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促使这种转变。

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代表在1月遇到的障碍之一，是不能向共方提供一份全面而准确的俘虏名单。造成这种迟延有两个原因。一是要对上万名的男女俘虏进行必要的核实；二是油印机的技术故障使印出的俘虏名单模糊不清。由于共方代表不停地敦促利比将军履行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提供一份经校正的俘虏名单，利比将军只好转而向第8集团军司令部施加压力，以从速提供资料。直到1月28日利比才向共方递交了新的俘虏名单。按此名单统计，联合国军拘留的俘虏中，有20,720名中国人，111,360名朝鲜人，合计132,080名，比1951年12月的名单中少394人。利比解释说，因为这394名俘虏已被重新归类为被拘留敌侨。利比还告诉李将

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完成了44,000名俘虏重新归类为被拘留敌侨的工作。如果共方同意就其拘留的65,000名俘虏提供类似的资料，他准备在72小时之内与共方进行交换。

虽然李将军对利比最后一项建议未予置理，但他确已开始流露出一些准备恢复谈判的迹象。并于2月3日提出了一项反建议，除志愿遣返问题外，同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中的绝大部分条件。共方表示，他们愿意接受不让任何战俘重新参加战争行动，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与中国和北朝鲜的红十字会代表一起视察战俘营。但他们仍顽固地坚持全面交换。

利比注意到共方代表这种比较合作的态度后，就准备着手解决一些细则问题。他对李说，凭誓释放的范围不宜过大。第一，它只限于军人而不包括老百姓；第二，它只限于朝鲜战争。因为有一部分士兵是职业军人，如果限制他们今后参加战争行动，就会使他们失去生活出路。利比建议由参谋人员拟定具体细则。李将军于2月5日正式同意，另外他还同意凭誓释放只限于士兵和只对朝鲜战争有效。但他再次警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共方将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为中立机构。

2月6日开始举行参谋人员会议时，海军上将乔伊就第四条款提出了一份坦率的报告。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觉得共产党方面不会再提供另外的俘虏名单，但他们认为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在90天内处理完它收容的大量战俘，就可以有把握照现在的俘虏名单接回其全部被俘人员；但要求敌方在30天内移交回被他们拘留的俘虏，因为他们拘留的俘虏人数比我方拘留的要少。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相信共方作出的大量保证，代表团认为，就可以将遣返居住于分界线以南并

要求遣返的所有韩国老百姓的条款写进停战协定。至于目前仍在北朝鲜军队中服役的原韩国士兵，乔伊及其参谋人员均认为毫无希望得到解决。因此要求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停止提出这个问题。华盛顿的官员们同意他的上述看法和意见，但要求将归还朝鲜和联合国老百姓的规定写入停战协定的条款，不管有无专门的保护措施。

从乔伊的报告和他与参谋人员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是否能与共产党方面在最近的将来缔结一项满意的停战协定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他不仅相信敌方决不会对志愿遣返让步，而且认为联合国坚持这一原则也缺少充足的根据。他认为，绝大部分俘虏之所以投降，是因为他们吃不饱、武器差或没有弹药，而不是因为答应了他们不被遣返回国。乔伊认为，由于共产党的阵地稳固，补给、粮食、装备和弹药充足，他们会满足于保持现状，并会将谈判一直拖延到他们取得优势时。过去，谈判一直受着瞻前顾后的影响，而不是让军事力量左右它，尽管它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问题。乔伊认为，在停战谈判集中寻找一种能直接解决上述遗留问题的简单方法之前，谈判就不会成功。他相信，如果这种直接努力失败，谈判就会终止。

由于志愿遣返威胁着板门店谈判继续取得进展，所以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麦克卢尔将军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可以完全避开志愿遣返的提法。他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进行全面交换。因为有许多俘虏将宣布他们是被迫服役的或是说他们不居住在共产党的控制区内；另外还有一部分俘虏将要求政治避难。因此可以将上述两类俘虏扣留下来，然后在第五条款中向有关政府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麦克卢尔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给共产

党留点面子，因此应提交给参谋人员辩论。

1952年初，华盛顿方面就不愿被遣返人员的问题提出了一项更为大胆的解决办法。由于2月中旬陆军部助理部长厄尔·D·约翰逊和陆军副参谋长约翰·E·赫尔正好在东京，他们便开始与李奇微将军讨论单方面释放全部不愿被遣返人员的问题。一旦俘虏被释放，联合国军司令部即可向共产党方面宣布这一既成事实，并做好一切准备以应付随之而来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个办法也有利于给敌人留些面子。但李奇微仍无意放弃他的一贯立场，因为他不赞成把俘虏的重新归类和释放某些类俘虏的计划视为单方面的。虽然他不热心于在交换俘虏之前对他们进行甄别，但如果非这样做不可的话，他赞成用一天时间公开对他们做出迅速甄别。并告诉每个俘虏，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选择机会。一旦决定后，便马上将他们分开。

着手进行甄别之前，李奇微想用重建机场与志愿遣返做一笔交易。如果这笔交易不成，他便立即开始甄别俘虏，然后提出对剩下的俘虏进行全面交换。如果共产党方面坚持要重建机场，他将作出最后一次让步。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就可能使谈判中断。

李奇微认为，在这种时候要手腕会有损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支持志愿遣返中所赢得的声誉，这是他反对释放那些已表示坚决反对遣返之俘虏的主要理由。另外，他担心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种行为会被指责为背叛和欺骗行为以及共产党手中之俘虏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同时提出志愿遣返与机场问题。如果敌方拒绝接受志愿遣返，就将授权联合国军司令部宣布它反对任何强迫遣返的最后立场。

尽管李奇微提出了上述种种理由，总统仍决定马上实施解除那些因害怕遣返回国身遭不幸而坚决拒绝遣返之俘虏的战俘状态。如果共产党方面拒绝就志愿遣返与重建机场达成交易，李奇微将从战俘名单中除去那些坚决拒绝遣返者的姓名。并且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愿意根据修正后的名单进行全面交换。这就是美国方面的最后立场。一旦采取这种立场，就会出现各种可能性，因为它意味着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单方面处理战俘问题时将利用敌方的策略。至于共产党方面对此会作出何种反应，谁也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会提出强烈抗议。

时至3月1日，第四条款的谈判已集中到一个问题，即志愿遣返或强迫遣返。一旦交换原则确定下来，其细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共产党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志愿遣返的强硬态度有丝毫改变，不管其以何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在一、二月份也变得强硬起来。虽然全面实行志愿遣返的理想目标似乎难以实现，但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遣返之主张终于得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支持，并有权对拒绝遣返的俘虏单方面予以释放。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向不可抗拒的势力让步还是向坚定不移的目标让步，或者是向二者都作出让步。

第八章　一揽子建议

冬天的几个月中，战俘问题的戏剧性发展使双方在板门店的代表团所面临的一些技术性较强的问题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被监禁于铁丝网后面的俘虏的命运，牵动着人类的各种情感，而相比之下对机场的修建和修复问题都显得不怎么感兴趣。但在会议帐篷内，围绕第三条款所展开的斗争之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在俘虏问题上的争论。因为双方的代表都是军事上的专家，所以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不管最后决定以何种方式处理战俘问题，它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问题。另一方面，遵守停战协定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问题，因为它将在今后若干年中影响朝鲜的局势。面对这种情况，重要的是要确保将充分的保护措施及保证写入停战协定。

一、缩小争论的范围

到十二月中旬，双方的主要分歧已表现在第三条款的讨论中。首先是机场问题，这是一个已经引起了大量争议的棘手问题；其次是轮换问题，中立国家观察员小组的成分问题和准备用于处理轮换和人员与补给的港口数量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最难解决的，因为双方所持的立场相去甚远。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正是在此关头又减少了一位有才干的代表，因为在海军上将伯克刚被调任几天之后，又调走

霍迪斯将军。这是两个能干和难以对付的谈判代表。他们二人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证明他们毫不逊色于敌方派出的最好谈判代表。接替霍迪斯将军的是费伦博将军，他已跟着霍迪斯将军见习了几个星期，12月17日与特纳将军同时成为正式谈判代表。这位新的陆军代表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不仅要接替霍迪斯将军，而且要与共方的谈判能手解方将军进行周旋，此人虽然有时言语粗野，但他一贯足智多谋。

由于至今仍不断发生各种小冲突，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了坚决反对修建或是修复机场的强硬立场。共产党方面对任何限制他们修建和修复机场的言论则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在12月下半个月的讨论中，解将军曾多次明确表示，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愿在机场问题上做出让步，则共产党方面将不再对人员的轮换与补充问题提出反对意见。但他的这一建议没有引起我方的任何反响。

为了打破这种僵持局面，谈判代表们决定将此问题交给参谋人员讨论，看他们在几天之内能否在不太正式的气氛中缩小双方的分歧，但结果证明徒劳无益。分界线谈判的30天限期于12月27日到期时，谈判和战场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人们已经充分预感到，在鉴定协定之前，这条分界线完全可能成为一条永久性的分界线。

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2月底终于表示愿做出让步，即如果共产党方面接受对机场的各种限制，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放弃空中侦察和空中照相侦察的飞行。敌人的反应似乎是任凭李奇微和乔伊对凭空让共产党方面得到一次占便宜的机会的愚蠢行为而牢骚不迭。解将军欣然接受了我方的让步，但却毫不改变他对机场问题的立场，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特纳说：

"你们是想骑在别人的头上，等到你们下来时才说，这是对你们的让步"。其言外之意是说，联合国军司令部纯粹是自己的立场毫无道理和站不住脚才做出让步，而根本不是提出有什么价值的建议。在海军上将乔伊看来，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场的动摇只能招致敌方越来越强硬地要求我方在机场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

共产党方面对这个问题是经过了充分酝酿的，因为在12月的下半个月，联合国内坚持严格限制机场之修建和修复的决心犹如江河日下。这种情况一直可以追溯到下面这种主张的提出，即一旦签定停战协定后，就依靠美国方面发表一项"大规模制裁"的声明。由于主张在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时，将重点从对朝鲜局部局势的控制转移到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威胁，而尤其是当时已经认识到，一旦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即使有可能但也很难阻止敌人修复和修建机场，所以机场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这种趋势使李奇微感到焦虑不安。他不明白，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中力量保持在现有水平上或减少的情况下，如果让敌人随心所欲地加强其空中力量，一旦以后爆发敌对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怎能构成一种威慑性的力量。李奇微认为，共产党方面已经觉察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机场问题上没有形成最后的坚定立场；并且认为，美国方面的新闻报道明确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在考虑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是不利于当前形势的。

李奇微要求采取强硬而稳妥的立场为时已晚。1月10日，美国的军政领袖们通知他，如果机场的修建或修复是签定停战协定的唯一障碍，他的最后立场是放弃任何限制。但在共产党方面表明这将成为他们的转折点之前，不应做出任

何公开让步的表示。他们建议，双方代表团在解决第三、四、五条款中的全部遗留问题之前，不再进一步讨论机场问题。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在此期间签定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则不再提出机场方面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在做出让步之后便可马上由联合国发表一项包括“大规模制裁”的扩大战争的声明。此项声明的发布将抵消敌人企图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机场问题上的退让中捞到好处而进行的宣传。

李奇微带着满腹疑虑接受了上述决定。他虽然不相信其上级真正了解联合国声明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但仍然建议，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就应将机场问题搁置起来。他特别担心，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方面会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他认为，在做出进一步让步之前，他们将拒绝讨论新的问题。

由于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所以华盛顿的指示并未马上对板门店帐篷中的谈判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特纳和费伦博仍继续在与诡计多端的解方进行着辩论。只要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一提出机场问题，解方便以“不准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号为掩护拒绝进行讨论。解方对北朝鲜主权受到侵犯所表现出的担心使特纳对他的诚意提出了如下质疑：特纳质问道，由于北朝鲜的空军已被消耗殆尽，解将军究竟是在关注北朝鲜的主权呢，还是在关注中国的主权。这位中国将军对此未予答理。

1月9日，共方代表团就第三条款提出了新的建议，此建议与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寻求的目标较为接近。但作为策略来说，特纳仍然对敌方建议中的一些弱点和遗漏进行了抨击。特纳对解方说：第一，他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会允许中

立国观察员小组对战线后方进行视察，因为按照解方的说法，这是明目张胆地干涉内政；第二，他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至今还对限制机场犹豫不决。但解方看不出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什么前后矛盾的地方。他坚持认为，中立国家是作为一项排除外国干涉的措施而被接受的。

在共方的建议中，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限制机场的条款，但同意在不增加数量的情况下，补充军事人员、飞机和武器弹药。由于这一直是联合国军司令部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主张，所以特纳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宣称这根本不是什么让步，而只不过是承认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之立场的正确和合理而已。虽然特纳因共方的建议未提及机场问题而予以拒绝，但双方的分歧范围正在日渐缩小。敌人不再坚持其反对人员补充的顽固立场不但抵偿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放弃空中侦察和空中照相侦察，而且表明，只要在讨论第三条款时回避机场问题，甚至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管怎么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从1月中旬已开始逐渐转向争取改变敌人的态度。其谈判代表集中火力抨击共产党方面坚持重建机场自由权的动机，但他们为制服解将军所进行的努力一无所获。解方坚持认为，不提出在朝鲜增加飞机数量的协议是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反对意见打掩护。但他拒绝详细说明共产党为什么在停战期间不愿增加他们的空中军事力量，从而将该问题的解决置于双方的真诚信誉之上。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愿在解方的身上孤注一掷，所以谈判未取得什么进展。

解方将军并非一个甘处守势的人。因此他大肆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停战之后维持朝鲜军事力量平衡的主张。他极力坚持那些尽人皆知的主张，即彻底消除战争状态，撤离

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这种主张至少在表面上听起来是合情合理的。这位中国将军宣称，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扩充南朝鲜的军队已经开始着手增加其停战后的力量，因此，不可能在停战期间维持现状。虽然解方将军只字未提共产党方面也照样在扩充北朝鲜的军队，但他的确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1月下旬，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将拟定第三条款细则的工作移交给参谋人员。这样不但可以按华盛顿首脑们所指示的那样进一步推迟机场问题的讨论，而且可以就双方都比较重视的部分次要分歧问题举行谈判。解方于1月27日同意在参谋人员完成其工作之前，不再举行副代表级谈判。如果参谋人员能够解决除机场问题以外的其他全部问题，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届时就可处于一种更加有利的地位上提出其最后的主张。

二、第五条款的解决

当参谋人员开始举行会谈时，李奇微将军和海军上将乔伊决定建议同时举行第五条款的讨论。人们会记得，第五条款只是在7月以"对双方各有关国家之政府的建议"的形式提出过。当时是有意这样含糊其词的，因为除了军事停战协定之外，美国事先不准备对各种政治问题表态。

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在12月初就起草好了一份初步建议，几乎和7月的方案一模一样。双方将建议各有关政府召开一次政治会议，讨论停战协定尚未解决的有关问题。这是一项非常含糊其词的微妙建议，因此不会遭到任何一方的反对。

两周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提出在朝鲜建立统一和

独立的民主政府，并指示李奇微将这一内容纳入他向共产党提出的第一方案中。如果敌人坚持提出撤出外国军队，他们授意驻远东美军司令将其写进协议。几天之后，他们提醒李奇微不要对任何准备参加政治会谈的国家承担义务，也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这些细则问题应留给签定停战协定后的政治会议解决。

开始，李奇微对上述指示没有表示什么怀疑，但到1月底他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质问他的上级，如果共产党要将准备参加政治会议的国家名称写进协议，他究竟是一个也不同意呢还是仅同意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由于敌人很可能要求在90天的限期内召开会议，联合国军司令官认为，只要提前采取这一行动，他便可以使联合国的建议更加适合共产党的味口。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反对他提出的后一项建议，但不同意在协议中提及有关国家的名称。另一方面，他们表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在政治会议上就处理军事停战协定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具体步骤向各有关国家提出建议。但只能将苏联称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不能把它称为一个单独的政府。

因此，在2月初重新召开全体会议的前夕，美国对第五条款的态度特别审慎。由于早期和满意解决朝鲜政治局势的前景不令人乐观，所以美国的军政首脑们宁愿慢慢地等待机会。由于他们意识到，在朝鲜的未来问题上将要和共产党进行长期而复杂的较量，因此他们赞成采取灵活的态度，少或不预先提出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达不成最终协议，就应该千方百计地寻求权宜之计。

由于共产党方面坚持要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第五条款中所涉及的各项原则，所以2月6日再次举行了双方代表团全体

成员会议。乔伊向南日将军介绍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两位新成员：小威廉·K·哈里森中将和俞在恒少将。哈里森中将接替费伦博将军；俞在恒少将接替李亨坤将军。

乔伊刚介绍完毕，南日便开始提出共方对第五条款的解决办法。他建议在签定停战协定之后的3个月内，双方各指派5名代表举行政治会议。并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三个问题：第一，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第二，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建议；第三，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经过3天休会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了一项反建议。李奇微认为，由于双方的分歧不大，因此，他主张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建议时应尽量采用共产党的措词，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他的主张。但是他没有提及5名代表问题，并将"撤出外国军队"改为"撤出非朝鲜军队"。共产党方面提出讨论的第三个问题，经联合国军司令部改变措词之后则变为"与和平有关的其他朝鲜问题"。韩国是作为军事指挥官建议的接受者与联合国一道被提名的，与政治会议有关的部分则更加含糊其词。

虽然大部分改动都不大，但共产党方面仍坚持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因此又进行了一周的辩论。联合国军司令部明确表示，它不打算建议政治当局讨论任何不直接与朝鲜有关的问题，因为这已超出了它的权限。共产党方面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代表整个联合国以及上述提法不妥时，乔伊则反诘他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不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对南日说，即使你们提出这种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也不同意在建议中提到任何具体政府。

最后，共产党方面在2月16日提出了以下经过修正的建议：

为了确保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指挥官特此向双方有关国家的政府建议：在签定停战协定并开始生效后的3个月内，由双方分别指派代表举行较高级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

在弄清"外国军队"是指"非朝鲜军队"和"等"不包括朝鲜以外的问题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于2月17日全部接受了共产党方面的建议。

乔伊向李奇微汇报时说，共产党方面的声明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因此几乎可以按任何方式进行解释，因为它至多也不过是一纸建议而已。

仅仅用11天时间便就第五条款达成了协议，打破了谈判以来的最高纪录，甚至比确定议事日程的时间都短。也许是由于这项声明的措词非常含糊，所以双方都容易接受。因此，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和带来任何希望。如果以后变得不适用或不必要，可存而不论。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发现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可召开会议讨论。虽然第五条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总算完成了三个条款的谈判。尽管第三、四条款是最重要的，但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可以在近期内就其达成协议。

三、一笔讨价还价的交易

由于盘根错节的机场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所以参加第三条款谈判的参谋人员能够在1月下旬集中讨论争议较小的细则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参加谈判的是唐·O·达罗空军上校、金尼空军上校、霍华德·S·利维陆军中校；共产党方面

参加谈判的是北朝鲜陆军的张上校、中共甫山陆军上校。总的看来，这是一批非常有才干的官员。

为了尽早开始上述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已起草好了停战协定的草案，其中包括了要在第三条款中讨论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包括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希望解决的下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人员轮换；用于人员轮换与补充的港口数量；中立国监督机构和观察小组的组成成份；控制仍有争议的沿海岛屿。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交的停战协定草案为参谋人员会议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出发点。

在接着进行的第一轮会谈期间，停战谈判的帐篷中出现了一种令人精神振奋的气氛。共产党方面的高谈阔论少了。他们的参谋人员神态严肃，意欲取得进展，他们倾向于尽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措词；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则常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变视为谈判所取得的进展。

虽然共产党方面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但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其原则的。一开始讨论人员轮换时，他们就说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每月轮换75,000人的巨大数字感到非常吃惊。大家也许还记得，他们在早些时候提出每月可轮换5,000人，联合国军司令部则宣布这个数字远远不够。在接着开始的讨价还价中，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人员轮换和港口数量应能满足人员流动的需要，并与装备紧密联系起来。共产党方面的参谋人员打算把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使用12个北朝鲜港口和10个南朝鲜港口的建议与轮换75,000名人员的建议归人到一个类别中。

双方的分歧渐渐缩小。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轮换人数是25,000名，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双方各提供8个港口，它愿将原来提出的轮换人数降至40,000

名。共方张上校在提出一项反建议时指出，他们提出的25,000名轮换人员中不包括正在休假、已登记休假和正在执行临时任务的人员在内。但他坚持双方提供的港口不能超过3个。

这时，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准备采取最后立场，即坚持双方各轮换40,000名人员和各提供6个港口。他们认为，只要我方的态度坚决，共产党方面就会让步。在华盛顿，国防部和国务院希望不要因这样一些次要问题引起谈判的破裂。他们同意，只要共产党方面不提出最后通牒，就坚持双方各轮换40,000名人员和各提供6个港口。

到2月中旬时，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宣布将双方提供的港口减到7个，轮换人员减少到40,000名；而共产党方面也在其建议中提出，将双方提供的港口增加到4个，轮换人员增加到30,000名。这种讨价还价的妥协又继续一周时间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将轮换人数降至35,000名，港口降至6个；共产党方面则将轮换人数增加到35,000名，港口增加到5个。

现在，只是因为一港之差的问题阻碍着双方达成协议。于是李奇微将军在3月7日指示乔伊接受双方各提供5个港口的条件，只要他认为这样做时有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当时，李奇微所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方面正准备利用中立国检查小组对一些保密设备进行严密的检查，以此达到搜集技术情报的目的。因此，李奇微认为，停战协定的措词必须保证不发生此种事情。

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转变，因为共产党方面一向反对检查，提出只要双方恪守信义就行。金尼上校在参谋人员的会议上向张上校指出：早先，共产党方面曾设法限制检查小组的一切活动，但现在又坚持检查小组完全有权对一切设备进

行严密检查。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不能不令人怀疑贵方的诚意。接着，金尼上校提出，只要共产党方面同意放弃严格检查的要求，就可以接受双方各提供5个港口的条件。张上校在3月15日表示接受。不管共产党是否正在单方面利用检查来达到讨价还价的目的，终于就人员轮换和港口问题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每月可轮换35,000人和各提供5个港口。

至于沿海岛屿问题，共产党方面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他们于2月3日同意让联合国军司令部重新控制朝鲜西部沿海一带有争议的5个岛群。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初以为在停战协定的这一条款上会有相当一番较量的，但敌方却出人意外地决定不提出异议。

对联合国军司令部规定的以海水退潮时的海岸线为基准的3海里近海海域问题进行了一般的辩论。但共产党方面不愿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双方停止海上封锁和停止在对方的海域中巡逻，距离长短则无关紧要。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官员坚持限制于3海里以避免无意中侵犯对方海域时，共产党方面又突然提出划分12海里的区域。由于美国方面不希望在朝鲜开创接受12海里近海海域的先例，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得不改变当初那种急于求成的打算。最后，双方同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在参谋人员希望解决的四个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存在着争议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而第四个问题即中立国监督机构与检查小组的成员构成问题，很快变成为一个难关。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之大仅次于机场问题。也许大家还能够回忆起，共产党方面最初提出的中立国监督机构成员国的建议是笼统和含糊的。共方代表李将军给中立国下的定义是：没有

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他指出，根据上述解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瑞典都属于中立国家。

当李奇微请求上级做出指示时，他们很快做出了回答：如果瑞典、瑞士和挪威愿意，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选择，这三个国家是可以接受的。至于共产党方面可能选择哪几个国家，在这些卫星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因此任何三个国家都会被同意。但他们特别提醒，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苏联为中立国家。这就是第四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存在着苏联没有正式干预朝鲜战争这一事实，但美国方面断定苏联正在给予中国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美国的军政首脑们决不会将苏联看成为中立国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他们早就下定决心否定苏联的中立状态。美国手中的一张王牌是与共产党方面达成的中立国家必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因此，俄国人长期以来最喜欢使用的武器——否决权这时已变得对苏联不利了。

12月，通过与瑞典、瑞士和挪威的外交接触已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因此授权李奇微在适当的时候提名这三个国家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选择的中立国家。一直等到2月1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参谋人员会议上才获得提名这三个国家的机会。但共产党方面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虽然经过多次提醒和催促，他们仍拖到2月16日才提出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联合国军司令部马上做出答复，同意接受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接受苏联。

由于李奇微的上级希望共产党方面不再坚持提出苏联，因此他们偏向于通过贬低苏联参加战争的重要性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拒绝接受苏联的理由。如果共产党方面不再坚持，他们将不做任何说明；如果共产党方面

要求做出说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以苏联最近的所作所为和它过去卷入朝鲜战争的记录作为不承认其是中立国家的理由。

根据当时的情况，李奇微和乔伊表示同意上述看法。但提醒他们说，参谋人员怀疑敌人正准备通过在人员轮换和港口问题上做出让步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接受苏联的条件。如果真有此事，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最好明确告诉共产党方面，在他们以其声誉做出保证之前，将断然拒绝接受苏联。但只要还有一点其他可能的办法，就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因此，华盛顿的首脑们通知李奇微说，只要共产党方面同意不提名苏联，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可以不提名挪威。

2月25日，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提出上述建议之后，共方张上校和他的助手们拒不对此作出答复。由于他们继续坚持提名苏联，所以李奇微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最后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同僚们协商并经总统批准后通知李奇微说，美国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拒绝接受苏联的坚定和不可改变的立场。如果李奇微认为可以达成协议，在他提出拒绝的同时可以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其他办法。他们建议由双方选出组成监督机构和检查小组的国家，而不管这些国家对朝鲜战争持何种态度。这样，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就可以提名美国，共产党方面就可以提名苏联，如果他们愿意这样的话。因为这样可以避开苏联是中立国家的问题，所以就可以对苏联参加监督机构和检查小组不提出反对意见。

由于共产党方面对组成非中立性团体执行监督和检查不感兴趣，所以参谋人员只好将这个问题搁下来。但通过他们积极而认真的努力，终于解决了人员轮换、港口和沿海岛屿的

争议问题以及第二条款的若干次要细则问题。因此到了3月中旬，仅在机场和苏联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了。

第三、四条款的谈判陷入停顿之后，海军上将乔伊和他的参谋人员对整个停战谈判形势进行估计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要想同敌人达成一项满意的停战协定，可以采取两种有效的办法。比较严厉的解决办法是在向敌人提出做了某些让步的完整的停战协定文件的同时发出最后通牒。共产党方面要么在规定的限期内予以接受，要么终止谈判和恢复敌对行动。这一方针需要由上级作出决定。如果敌人拒绝最后通牒，上级必须具有甘愿冒重新开战的决心。乔伊认为，这种方针将为尽快和满意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最大的可能性。

第二种选择是只向共产党方面提交一份完整的停战协定文件而不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通知敌方代表：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做出的最后努力，并只允许在措词上作一些很小的改动；全体会议将暂时休会，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拒绝参加进一步的实质性辩论。虽然由于联络官仍在继续进行协商，谈判并未破裂，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不会改变，也不会再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简言之，乔伊和他的同僚主张诉诸武力威胁，或者是同时利用休会和在重大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来促成停战协定的签定。正如李奇微所指出的，这两种方针实际上都是最后通牒。其主要区别在于第二种方针没有限定接受时间而已。不管是哪种方针，只要它引起谈判破裂，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受到指责，因为这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的。尽管乔伊的建议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李奇微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提出公开的或隐含的最后通牒都为时过早。

以上就是李奇微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板门店提出的大胆

而冒险的建议中所起到的缓和作用和影响。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李奇微这位战区司令违背了华盛顿决策者们的旨意。这位敢作敢为的司令官竭力主张采取果断的行动，以便让敌人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再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仅隔一天之后，他就对乔伊说，他在停战谈判中应继续执行目前的行动方针，并坦率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

李奇微在3月11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时说，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不知道共产党方面是否打算签定停战协定，也不知道他们对当前问题的真实看法。另一方面，敌人的态度显然变得越来越不可一世和顽固，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代表的境况却每况愈下。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的发展，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在华盛顿官方和尽可能多的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参加国的支持下，采取公开的、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或者是诉诸武力。这样就会引起共产党方面的极端重视。由于后一种办法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李奇微强烈主张，公开宣布断然拒绝苏联成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并以此作为实施最后立场的第一步。

华盛顿的陆军参谋人员支持联合国军司令对板门店谈判采取强硬立场的主张。但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对这种逐一处理问题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陆军作战与训练副参谋克莱德·D·埃德尔曼少将对陆军参谋长说，如果一揽子提出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影响将会大得多；如果共产党方面不接受或终止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由于已为打破这种僵局做出了努力，所以会处于一种更加有力的地位。埃德尔曼少将补充说，国务卿艾奇逊、柯林斯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都赞成提出全面建议的主张。在拟定全面建议之

前，他们希望把问题减少到绝对最低限度。当副代表级谈判陷入僵局和李奇微准备对不同意遣返的战俘进行隔离和重新分类时，联合国军司令将召开全体会议。乔伊将把李奇微要求亲自与南日和彭德怀这两位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件呈交给他们。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李奇微将向他们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揽子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将在机场问题做出让步，也希望共产党方面在强迫遣返和苏联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华盛顿方面继续建议说，虽然不对上述建议进行实质性辩论，但联络官将继续保持接触，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愿意随时就其提出的建议进行说明。

李奇微对华盛顿方面提出的上述新建议感到吃惊，因为他刚拒绝了乔伊提出的类似解决办法。但不出一周时间，又从他上级那里得到这样一份他更难于接受的建议，当然会使他感到吃惊。不论怎样，他还是很快清醒过来，并提出了强烈反对。他认为，他和南日、彭德怀会谈将意味着承认共产党方面存在着某种权力和导致谈判的无限期迟延，而且要求敌方在两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只在一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也是行不通的。至于对战俘进行隔离和重新分类，他反对采取任何这类行动，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共产党手中的俘虏的生命受到威胁。不管以什么为条件，他都坚决反对接受苏联。如果要向共产党方面提出一揽子建议，必须允许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拒绝接受就意味着谈判的终止。最后，他说他对自己提出的建议不作任何改变，即首先拒绝对苏联的问题进行辩论，然后再提出一揽子建议。

美国的军政首脑们同意接受李奇微提出的部分反对意见。如果他不想和共产党的司令官会谈，举行全体代表会议也行。他们认为，李奇微的出席将有助于突出最后建议的严

肃性和它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未发现能早日解决苏联问题的任何迹象，但他们希望能在提出一揽子建议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醒李奇微说，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苏联参不参加监督委员会，而是承不承认苏联是中立国家。因此，凡是能够避开后一问题的折衷方案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处理这个问题后，华盛顿的首脑们便开始认真对待一些严酷的事实。他们不希望在提出一揽子建议时发出公开的或隐含的最后通牒。由于美国和其盟国都不愿意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支持最后通牒，因此它只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如果因为提出一揽子建议而出现谈判破裂，责任一定要落在敌人身上。

参谋长联席会议毫无隐讳地承认，不管是美国还是它在朝鲜的盟国都不愿意恢复全面的敌对行动，也无意造成共产党方面会作出反应的毫无价值的威胁。自从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上述问题后，对最后通牒的谈论便日渐减少了。虽然李奇微仍坚持不遗余力地反对苏联成为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但从这以后，他也开始趋向于赞成一揽子建议可能给达成停战协定带来最大的希望。

到4月1日，参谋人员已进行了九个多星期的会谈。虽然他们在第三条款的一些次要问题和许多细则上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在机场和苏联问题上仍无任何突破。因此从4月3日开始恢复副代表谈判，并由哈里森将军接替了费伦博将军。联合国军司令部接受解方提出的如下建议：批准参谋人员达成的协议，但不是最后的协议。于是他们开始重新辩论过去搁置下来的问题，而且会谈的时间越来越短。4月14日的会谈创造了从开始到结束仅用15分钟的记录。由于双方都

寸步不让，所以参谋人员于4月20日又再次进行会谈。当时战俘问题的辩论已进入到新的阶段。

四、战俘的甄别

在2月，参谋人员就第四条款一共进行了22次会谈。尽管他们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仍未能在争执的焦点即强迫遣返问题上有所突破。虽然解决了一些细则问题，但在确定其指导原则之前，共产党方面不愿再讨论其他次要问题。由于在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前，双方都不想做出进一步让步，所以和一月之前一样，到2月底时协议仍显得遥遥无期。

3月上半月，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副代表会谈，但和2月一样，毫无结果。利比将军坚决要求交换伤病俘虏和遣返全部战俘，以及组成联合红十字会小组视察战俘营。但李相朝将军拒绝对此发表任何具体意见。

相反，李相朝将军却大肆攻击美国反对任何强迫遣返的立场。他把美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说成是玩弄文字游戏，而不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做出的让步。他再一次地指控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旨在将中国俘虏移交给中国人民的敌人蒋介石。正当李相朝与利比将军就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时，在巨济岛发生了战俘骚乱。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对2月18日发生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战俘营的骚乱事件进行了大肆宣传。

事实上，李相朝变得特别激动起来，以致于利比不得不要求他小声一点。这位海军将官说，我不是聋子，也不懂朝鲜语，而且翻译时又未将大部分情感效果表达出来。

经过两周毫无结果的辩证之后，又将此问题移交给参谋人员继续辩论。在1到4月期间，副代表和参谋人员交替对

上述问题进行的辩论，就如同咖啡馆中有两支交替进行演奏的管弦乐队而使舞蹈从不间断一样。但由于两个乐队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所以无法跳出步法一致的舞蹈。

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李奇微决定在3月中旬的参谋人员会谈中试探另一种办法。大家还可能记得，曾允许李奇微移交那些因害怕取消其战俘状态后产生不测后果而坚决反对遣返回国的俘虏。由于心中有了数，李奇微现在想搞清，通过全面审查将这类人员全部删掉后的战俘名单，是否能为共产党方面接受。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可以称为特殊难民或与此相类似的名称。其余的全部俘虏都可以交换。李奇微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单方面对俘虏暗地进行甄别，可能会严重危害被敌人捕获的联合国军俘虏的安全返回，甚至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危险。他们认为，共产党方面可能赞成对俘虏进行公开的甄别。

李奇微的上级对此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李奇微企图公开删掉共产党俘虏名单中的某些俘虏，敌人就可能马上修改联合国军俘虏名单。李奇微反驳他们说，恰恰相反，共产党方面决不会接受通过单方面的秘密行动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因此，只有消除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两面手法的怀疑，才能够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免遭报复行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敌人可能同意进行试探性的甄别。

在参谋人员会谈中，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方面正在改变他们的主张。他们在3月22日暗示说，对目前的俘虏进行核实之前，需要对某些俘虏进行特殊考虑的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他们还明确表示，进行秘密的内部会谈可能有助于畅所欲言。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官员马上建议，在任何一方

要求举行公开会谈之前都采取内部会谈。共产党方面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表明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但共产党方面又马上提出，他们将只给予原是韩国老百姓的俘虏特殊考虑。他们坚决不同意把北朝鲜人或中国人归入这一类。因为他们憎恨蒋介石和担心将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人送往台湾，并在3月下旬的参谋人员会谈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修改战俘名单之建议的严重缺点之一，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俘虏拒绝遣返回国。据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希基将军估计，在132,000名军事人员中，有28,000人不愿回国，但反对遣返回国的可能只有16,000人；在37,000名被拘留敌侨中有30,000人不愿回国，其中2,000将为反对遣返回国进行坚决斗争。他认为，有10,000多名中国俘虏将利用一切手段进行顽固抵制，因为他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而且是由同情国民党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所指挥。

4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希克曼上校对其对手柴上校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愿通过民意测验对要被遣返回国的军人人数作出大概估计，但大约有116,000人可能被交换。它显然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兴趣。这可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个策略性错误，因为它使敌人误认为他们可以从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领回这个数目的俘虏。柴上校于4月2日建议双方马上核实各自的俘虏名单，并将原则方面的辩论推迟到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共产党方面想知道坚决反对遣返回国的俘虏大概有多少，并明显地希望这个数字不超过16,000名。两天后，希克曼表示同意柴上校的建议，并问共产党方面是否准备在甄别之前发表一项大赦声明，保证俘虏回国后不会

受到任何惩罚。虽然敌方官员认为，根本不需要发表这样的声明，因为共产党方面希望的就是要使他们恢复太平的生活，但他们仍不失时机地于4月6日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措词讲究的大赦声明。为了鼓励尽多的俘虏回国，甄别前在所有战俘营中对这项声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共产党方面要坚持了解一个大概数字，意味着他们默认了甄别程序和放弃了反对修改战俘名单的大部分意见。李奇微在汶山里与乔伊协商后，提出了对战俘进行口头审查和隔离的计划。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被遣返回国者和不愿意遣返回国者的甄别与分类将同时完成。一旦他们作出选择后，将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主意。他接着又说，不管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何种数字，共产党方面都会接受。因此一旦通知敌人以后，就不再需要做任何修改。他认为，甄别只是迟早的问题，只不过越早越好而已。他坦率地承认，战俘营中存在着一种爆炸性的局势，而且联合国军司令部现有的力量又不足以将战俘营化整为零分散成小单位以减少这种危险。

一旦甄别工作完成后，李奇微就准备将遣返回国的总人数告诉敌人和解除不愿遣返回国者以及不想回北朝鲜的韩国居民的战俘状态。如果共产党方面承认这些数字，他就接着争取在机场限制与不提名苏联问题上与共产党方面达到交易后结束整个停战协定的谈判，如果共产党方面不承认这些数字，李奇微将为着同一个目的提出一揽子建议，而且决不让步。

4月8日得到立即开始甄别的许可。两天后，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开始执行这个计划。此计划旨在使遣返回国的战俘数达到最大限度。事先警告所有战俘，在接受口头审查之

前，不得和其他俘虏议论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以免当他们受到暴力威胁和损害时被迫改变主意。要特别强调指出，该决定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俘虏三思而行。由于每个俘虏进入口头审查区时可携带其衣物设备，所以如果他表示不愿返回，就不需要再回到其原先的俘虏营。在接着进行口头审查时，不带任何武器的审问官或管理人员将向他们指出拒绝遣返的害处和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提醒他们，拒绝遣返可能给其家庭带来的后果。然后再次向他们宣读共产党方面发表的大赦声明，并提出以下七个问题：①你愿意被遣返回北朝鲜或中国吗？②你坚决反对遣返回国吗？③你仔细想过这种行动给你家庭造成的影响吗？④你意识到那些选择遣返回国的俘虏回到家园后你仍将留在巨济岛吗？⑤你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保证将你送往某个地方吗？⑥你仍然决心坚决反对遣返回国吗？⑦如果决定将你遣返回国，你准备如何办呢？在提问过程中，一旦战俘表示他愿被遣返回国，则不再继续往下问。另一方面，如果俘虏提出自杀、斗争到底、逃跑等，则将其隔离和送入新的临时战俘集中营。

范弗里特于4月8日开始甄别。一般说来，进展比较顺利，在完成愿遣返回国者和不愿遣返回国者的分类过程中没发生严重事件。但关在7个战俘营中的37,000多名顽固的北朝鲜共产党分子不让联合国军司令部小组对其进行甄别。其中有一个战俘营中的俘虏与韩国看守人员由争吵发展为扔石头，最后不得不用机枪射击。战斗尚未结束，已有7人死亡，65人受伤。

尽管遇到了顽固共党分子的反抗，头3天的甄别结果甚至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都感到大吃一惊。在132,000名战俘中，大约完成了一半人数的口头审查，其中有40,000多名俘

虏表示坚决反对遣返回国。战俘中表现出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情感力量一定会使心理战专家们感到振奋，但它马上给停战协定的前景投上了一层阴影。因为即使未经甄别的全部战俘都愿被遣返回国，其总数也和共产党所期待的116,000名差得太远。

在此后的几天中，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打算对7个抗拒甄别的战俘营中的战俘进行甄别，而直接将他们送入关押同意遣返回国者的战俘营中，剩下的战俘和被拘留敌侨按口头审查结果分类。到4月15日，李奇微便能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共产党方面要求得到的大概数字。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在被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俘虏的170,000多名军人和老百姓中，如果不采取强制性措施，大约只有70,000人愿回到共产党方面。由于他意识到敌人对上述数字是不会满意的，因此建议说，如果共产党要求重新甄别，可允许国际中立机构或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对所有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重新进行甄别。如果共产党方面拒绝这一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将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一揽子建议。

虽然这70,000名俘虏决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马上将其通知共产党方面，以免泄露给新闻界。在4月19日的参谋人员会议上，希克曼上校镇静自若地通知柴上校：7,200名被拘留敌侨，3,800名韩国俘虏，53,900名北朝鲜俘虏，5,100名中国俘虏，一共70,000名俘虏将能够被遣返回国。希克曼的话引起了戏剧性的效果，柴上校竟一时气得哑口无言。当他终于镇定到可以讲话时，他马上提出休会，以便对上述数字进行研究。柴上校那种大为吃惊的神色表明，共产党方面对我方提出的这个大概数字毫无思想准备。他提出马上休会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不但可以使他恢

复镇静，而且可以得到其上级的新的指示。

他们第二天得到的指示的大意是极其明白的。共产党方面觉得，联合国军司令部先前估计有116,000名俘虏遣返回国，这是蓄意欺骗他们，所以柴上校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的70,000名这个数字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歇斯底里地叫嚷，他们对这个数字根本不予考虑，指责我们自食其言。希克曼在反击他时指出，当共产党方面在去年12月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11,559名俘虏时，我方亦有过类似的不愉快。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不但以尽可能公平的方式对战俘进行了甄别，而且共产党方面可以领回的俘虏数远远超过他们准备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数字。

通过以后连续几天的辩论，出现了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事情。即共产党方面觉得在甄别程序上受骗上当了，并不愿再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拒绝我方提出的由中立国机构或红十字会小组重新对战俘进行甄别的建议，并坚持要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当初看来，甄别过程似乎是打破僵局的一种方式，但结果却使僵局越加严重。平心而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言而有信的。遗憾的是他们最初提供给敌人的大概数字是根据既不全面又不准确的情报所估计的。在对战俘进行口头审查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小组想方设法地劝阻不同意遣返回国的战俘，并鼓励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觉得受骗上当和误入了我们的宣传圈套。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之动机的固有怀疑态度必然会导致他们朝最坏的方面着想。

五、一揽子建议的提出

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甄别结果的强烈反对决定了板门店谈判的事态发展。假使战俘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李奇微本来可能通过在修复机场问题上的让步作为共产党方面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条件来结束停战谈判的。拒绝接受反对强迫遣返的概念意味着一揽子建议必须包括三个问题，而其中一方必须在两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了，因为在两个问题上得到让步的一方将获得明显好处，所以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在一揽子建议中再增加一个问题，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以便使敌人觉得容易接受。

当敌人正在对甄别程序发起接二连三的攻击时，李奇微也正在为提出一揽子建议做最后的准备。他打算在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一揽子建议的同时发表一项强硬的声明，好让共产党方面相信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最后立场。敌人必须在不加辩论的情况下接受整个建议，否则将承担延续敌对行动的全部责任。李奇微要求美国政府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他的这一立场。

但是，李奇微的上级并不愿意走得太远。他们指出，只要停战谈判仍在秘密进行，就不可能公开发表声明。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李奇微或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因为这种声明可以被说成为最后通牒。强硬的声明可能减少共产党方面接受一揽子建议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敌人拒绝接受，就会在

国内和国际上引起马上采取军事行动的种种猜测。不管怎样，他们终于缓和了李奇微的态度，同意在一揽子建议中不包含任何最后通牒的意思。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参谋人员正忙着与政治顾问们一起起草一份将由杜鲁门总统发表的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场的声明。

从共产党方面在参谋人员一级会谈中的行动来看，秘密会谈即将结束。4月24日，柴上校威胁要恢复公开会谈，并于第二天开始付诸实施。他们抢先发表了对4月事态发展的看法。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反驳他们时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公开辩论业已重新开始，所以希克曼上校提出休会，以便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为正式提出一揽子建议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这时，李奇微将军和海军上将乔伊对秘密或者公开会谈已毫不在乎。他们认为，由于已经向新闻界完全公布了一揽子建议的各项具体内容，所以根本没有保密的必要。但是，华盛顿的军政首脑们不同意他们俩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公开会谈只会使争论更加激烈而不会使其趋于缓和。如果共产党方面为争取宣传上的主动，无视或者拒绝秘密会谈的建议，则将由他们承担不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全部责任。

经过联络官的协商，双方同意在4月28日举行全体会议。在双方代表碰头时，海军上将乔伊提出进行秘密会谈。休会后，共方代表同意接受乔伊的建议。于是乔伊详细列举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已经写入全面停战协定草案，但草案中将有关修复机场的内容全部删去了，并提出由瑞士、瑞典、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有关战俘处理条文的全文如下：

“从停战协定生效之日起，关押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战俘将被尽快释放和遣返回国。战俘的释放和遣返将严格按照签定本停战协定之前双方所交换和相互核实的战俘名单予以实施。”

实际上，这意味着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用其手中愿意被遣返回国的70,000名俘虏与敌人手中的12,000名俘虏进行交换，因为它准备同时解除那些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的战俘状态。

一揽子建议犹如投入大海之中的一粒石子，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南日只是说了一句“我方看不出贵方今日上午提出的建议对全面解决遗留问题有什么真正的帮助”，接着便提出无限期地休会。处于当时那种情况，共产党方面作出这种反应并不使人感到突然。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上述建议之前，已向美国与联合国的新闻界公布了它的各项具体内容，所以没有什么内容超出敌人的预料。如果说它解决了什么问题，那就是提出了被遣返回国的战俘数字，因为另外两个问题已经相互抵消。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只提出遣返70,000名俘虏，共产党方面则要求遣返116,000名俘虏，因此，只要不缩小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早日达成停战协定的希望就很渺茫。

尽管敌人对一揽子建议的反应极为冷淡，但谈判已进入到关键时刻。联合国军司令部已正式确立了其最后的和不可改变的立场，辩论时期已经结束。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既没有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在前线加剧威胁活动，但它已不再左右徘徊，而是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今后的谈判斗争中，我们使用的主要武器将是耐心和坚定不移，而不是武力。同时将和去年整个冬天一样，前线的战斗仍将继续，

只不过双方都基本上转入了防御战。虽然是在限定的范围内和默认的原则下进行战斗，但仍在进行积极的防御战，而且每天都有伤亡。

第九章 “积极防御”

1951年底，在板门店重新恢复停战谈判时，第二条款——军事分界线仍在争论之中，解决第三、四条款谈判中出现的棘手问题亦无多少眉目。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要想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战协议，看来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第8集团军慢慢向敌人阵地推进时所发起的攻击无疑严重削弱了共产党方面的攻击能力，并且迫使他们回到了谈判桌上。但他们是准备缔结协议还是继续进行辩论尚难预料。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联合国军司令部面前的有两种行动方案：（1）由第8集团军继续保持夏季战役对敌人构成的压力，直至达到满意解决为止；（2）可以将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视为他们现在愿意结束战争的一种迹象。如果后者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是沿着前线划分分界线，那么继续战争和承受严重伤亡将是一种不必要的消耗。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想利用谈判来赢得喘息时间，补充他们的战斗力和加固其防御工事，从长远观点来看，第一种方案具有某些优点。这样，在签定协定前，继续维持目前这种有限的攻击力量和主动性，其代价就要少得多。但决不允许共产党恢复其元气并决心打一场长期消耗战。

一、作出选择

10月27日，恰好是重开停战谈判的第三天，范弗里特将军提出了进攻西部铁三角和越过东部金城的计划。他打算使用美军第1和第9军夺取铁原——金化铁路以北的高地并沿着平康以南金城以北的德卢思防线建立稳固的屏障。第9军夺取金城周围的制高点后，将沿着东北方向向通川推进。与此同时，韩国第1军将沿着东海岸向通川运动，以便在通川南面与美第9军会合。

称为"日规行动"的通川作战计划，排除了一度准备在东部沿海实施的两栖作战的"牧马者"行动。但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切断受到双重包围的北朝鲜军队和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而事态发展的结果是，"日规行动"是短命的。10月31日，范弗里特受命推迟向德卢思防线的攻击，直到他接到李奇微的进一步命令时止。对非军事分界线的争议是推迟行动的原因。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最终不得不改变它的立场而向南撤退数公里。要是果真如此，那么，就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以极大的伤亡去夺取一块很快就要撤离的领土。

11月5日，范弗里特想再次争取被批准向德卢思防线推进，但没有成功。李奇微一直到11月11日才取消这次行动。由于没向德卢思防线推进，所以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日规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制定一项取消"德卢思——日规行动"的新的观望政策。

如果分界线对战场产生了影响，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指挥部的计划就可以应付意外情况。如果谈判

破裂或变得毫无希望，就可以发起攻击并重新提出向元山平壤或鸭绿江推进的计划。但李奇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以很大的伤亡去发动这种攻势是不值得的。

11月12日，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采取"积极防御"。这明显地反应出，在讨论分界线时，他并不热衷于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根据目前的整个战场态势，范弗里特将夺取最有利的防御地形。因此，他准备只用不超过一个师的兵力发起攻势去夺取前哨阵地。同时，第8集团军司令准备根据有利的机会给对方以沉重打击。

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行动方案。他们认为，可以接受以当时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而且下月的接触对此不会有什么影响。可继续进行地面活动，因为胜败对确定分界线都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李奇微一致同意在前线不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而只采取有限行动，所以前线的战斗又恢复到小规模的行动和巡逻。

显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都认为，共产党准备同意达成协议，或者说我们主观上是这样希望的。不管怎么说，李奇微向参谋长柯林斯报告时说，他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攻势使共产党遭到了严重打击，并希望尽快停止敌对行动。他特别提到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11月8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和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的报告。因为前者在讲话中建议10天内停止朝鲜战争；后者在报告中指出，敌人似乎希望立即实行事实上的停火，这表明共产党方面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华盛顿的陆军情报机构亦倾向于接受他的看法，尽管比较谨慎。

根据东京和华盛顿这种总的乐观看法，第8集团军产生

一些自满情绪是不足奇怪的。11月27日，刚就分界线达成协议，范弗里特就通知第8集团军的各军长，要他们使每个联合国军士兵都知道签定停战协定之前，战争仍将继续。然后向他们作了如下指示：

第8集团军应明确表示愿意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无限期地延长，则必须做好发动进攻的准备。并将采取以下行动表明我们是愿意达成协议的：把作战行动减少到仅能保持目前态势的最低限度，而不管已经商定的军事分界线。除非接到司令部的其它命令外，进攻仅限于收复被敌人占领的主要地形，而且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范弗里特的命令实际上限制了对敌人的作战行动，基本上等于敌人要求停火就停火。由于范弗里特的命令规定只许小股部队出击，所以几乎没有指挥官愿拿他的士兵的生命去冒险，除非是绝对必要时。但当朝鲜的战地记者了解到范弗里特的命令后马上予以了披露，指控这个命令“结束了朝鲜地面战争，至少是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

由于指控基本属实，所以使华盛顿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美联社指出，停战命令可能是来自白宫本身。因此，总统于11月29日发布了严正声明以消除影响。另一方面，李奇微很快解释说，第8集团军的命令完全超越了他们的职能范围，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消除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影响。于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线上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李奇微于29日报告说，他已派出68个巡逻队，并以两个班到一个团的兵力发起了14次攻击。由于披露这一新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但使实际上的停火宣告终止，而且必须在口头上公开保证，敌对行动将持续到停战协定签署之时。

由于华盛顿的领袖们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在30天的期

限内完成分界线的划分，而且一致认为，除非共产党中断谈判或使谈判陷入僵局，将不会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所以很快做出了抉择。只要敌方同意继续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重新在战场上施加强大地面压力的可能性就不大。但不限制从空中和海上施加压力。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不会造成多大伤亡。目前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可以根据停战协定最终结束真正的战争状态。因此除非是划分分界线后马上在板门店签定停战协定，否则在即将来临的整个冬天，地面部队可能会遇到一系列挫折。

二、阵　地　战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对入朝后的第一个冬天及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历历在目。1950年底向北朝鲜的快速推进和随之而来的快速后撤打乱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补给线，造成前线一些部队的冬衣和装备的严重不足。1951年秋，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方完全掌握了局势，比较容易地解决了供给问题，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使服装和装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和与改善。

隆冬季节的到来似乎略有利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占据的大都是高地和山岭的南面，很少积雪，加之阳光充足，所以气候比较暖和。而敌人在山的阴面，根本见不到阳光。在后方地区，联合国军的膳食供应也要比共军好得多。

但是敌人战胜气候和地形条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的能力终于抵消了联合国军所具有的上述有利条件。由于大部分共军士兵已经适应了北朝鲜和中国北方的气候，所以他们在

1950年至1951年冬季所忍受的痛苦要比联合国军方面的少得多。在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凭着野菜、树皮以及不及大部分美军部队最低配给量的食品充饥。虽然饥肠辘辘，但仍英勇战斗。

虽然联合国军部队获得了足够的服装和防冷设备，但其作用如同使用他们的人一样。因为要想在极其寒冷的朝鲜高山上停留一会儿，就需要进行特别严格的耐寒训练。如果士兵没有备用的干鞋垫与袜子和不经常换洗，发给他们绝热靴又有什么用呢？据华盛顿派遣的冬季环境考察组报告，许多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都害怕发生冻伤，而且缺乏如何预防冻伤的知识。因此，冻伤的发生率很高，并不得不缩短巡逻和埋伏的时间。冬季环境考察组还报告说，甚至连地下掩体和前线掩蔽部的设计也是极不合理的，缺乏最起码的防冻常识。

随着地面冰冻的发生，又给步兵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地面冰冻未超过 8 公分时，还能用一般的工具挖战壕，但已经相当费劲，要克服许多困难。因此，最好是用镐和铁锹，但其太重，部队带不走。所以每个步兵单位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只好配给每个士兵一个两磅重的梯恩梯炸药包，以爆破被冻的地层表面。

联合国军部队对冬季作战的厌恶情绪是地面战争的另一种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双方都不愿彻底打破谈判期间的现状。寒冷的气候加上非正规的地面演习，使整个战场在 7 月呈现出一派平静景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马上在人数大大减少的伤亡报告中体现出来。

在11月27日达成分界线协议之前，双方为争夺有利的阵地确实在前线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斗。主要是为了争夺一些高地，战斗进行得很激烈。韩国第 9 师11月的经验是反

复越过战斗的终始线，在争夺美军第1军防区铁原西北的395高地（白马山）的战斗中，韩国第9师于11月5日失守，但第二天又重新夺回了这个高地；11月16日再次失守，11月17日再次夺回。贯穿着整个冬季的主要命令是：反攻！夺取395高地！坚守395高地！

第8集团军白天派出巡逻队和发动小规模的袭击，但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截击。另一方面，敌人主要是在夜间采取行动。由于夜色的掩护，空中侦察不起作用。共产党方面的行动主要限于巡逻和侦察联合国军的防御阵地。

11月的主要冲突发生在第9军防区的金城东侧。11月17日至18日，韩国第6师和配属于它的韩国第21团战斗队在美军第24步兵师的两个坦克连的配合下，开始从正面向7公里宽的新防线推进。尽管受到了中国第68军所属部队的激烈抵抗，该师仍向前推进了2公里。18日进入新的防线后，便开始挖战壕以对付中国军队的反攻，并且成功地击退了他们。

当11月底分界线的讨论结束时，中国方面改变了他们的策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已开始改变根据初秋流动作战特点而制定的那套惯用战术。12月的平静局势使他们有条件从流动战转为固定的阵地战。由于采取了纵深防御形式，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开始加强他们的防线。他们一方面补充枪炮，一方面在山上挖战壕、交通壕及供给壕相通的个人掩体。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如木料、石块和沙子覆盖在掩体的顶部，以避免部队受到任何直接打击。并在掩体后面斜坡上挖了5—6英尺深的壕沟，每隔15—20英尺在其后壁挖一个单人掩体。他们在整个山顶上挖满了类似的战壕，有的通到前沿阵地的机枪和步枪火力点，有的通到后方的炊事班和弹药补给点。有时，他们在高地之间挖通了地道，并

修筑起巨大的地堡。他们充分利用地形特点配置火力网，并常常利用个人掩体改变他们的射击位置。用大炮很难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更不要说用迫击炮了。

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敌人加强其防御的种种努力很少进行破坏。这倒不是因为限期30天确定分界线标志着敌对行动的结束，而是由于我们自己限制在12月采取大规模行动排除了有重大战术意义的任何推进。第8集团军"在本月减少了攻势，以此表明我方的诚意"。共方军队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前哨阵地主要是发起连、排规模的进攻，很少发动营规模的进攻。

为了不使第8集团军完全失去其优势，范弗里特命令其各军军长通过伏击战加强他们抓获战俘的计划，使其部队在与敌人打仗的火药味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如果和谈失败，将在12月20日左右制定1月发动一系列有限攻击的计划，目的是巩固我们的防御阵地。由于共产党方面在不断地完善和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要象8—10月那样向前推进，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至于为了从俘虏口中获得情报，我们在12月份通过伏击战抓获了一些战俘。

当解决分界线问题的30天限期于12月27日期满时，李奇微要求范弗里特提出恢复攻势计划的报告。第8集团军司令的答复清楚表明，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打算在近期采取任何攻势行动，因为他手下的指挥官认为，以小规模的进攻来巩固联合国军司令部目前的阵地不但会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起不了多少作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防线很巩固，可以顶住敌人的进攻。很明显，共军方面有着牢固的战壕的保护，根本不怕一般炮火的轰击。因此，只有采取大胆的出击，才能把敌人赶出阵地。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很大的。范弗里

特最后说，以如此大的伤亡代价去赢得胜利是完全不值得的。

向平壤——元山线推进的计划也遭到类似的反对。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认为，虽然这种行动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得到后勤保障，但它可能意味着联合国军将近要增加20万名伤亡人数。远东空军司令韦兰将军也不赞成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线延伸到离共产党满洲里空军基地太近的地方。因此，他建议有节制地向前推进。海军司令指出，如果敌人从北朝鲜的空军基地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海军舰队和两栖部队可能受到很大损失。在目前的条件下，要考虑在1951年底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因为这样做的损失太大，而且不知道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只要继续存在着通过谈判解决战争的希望，除了允许小规模的地面活动外，其它行动都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战场上的平静确实更加引起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注意。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自朝鲜战争以来就一直感到伤脑筋的问题。因为在南朝鲜战线的后方有8000名游击队员活动。据说其中5400名有武装，他们主要在朝鲜西南部崎岖的智异山中活动，使韩国政府长期感到焦虑不安。虽然他们主要是进行骚扰性活动，但在发动大规模攻势时，他们常可以对补给线、交通线和战线后方造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在11月的突击行动的高潮中，游击队对铁路沿线和军事设施发动了多次非常协调的进攻行动。幸运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兵力，这种袭击未能持续下去，我们才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范弗里特认为，消灭这种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11月中旬，他命令韩国陆军成立一支机动部队，由韩国首都师和第8师组成，但不包括这两个师的炮兵部队。范弗里特希望尽快将这个队伍组织起来，以便在12月1日前扑灭游击

队的活动。由于智异山是游击队活动的中心，范弗里特决定，机动部队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是控制晋州西北连绵20公里的智异山区。

12月1日，韩国政府采取的第一步是宣布在朝鲜西南部实行戒严。这项命令限制了老百姓的行动，实行了宵禁，村与村之间安起了电话。以其司令员朴顺玉中将命名的“朴顺玉机动部队”开始了反游击战役，即所谓的“灭鼠者”行动。朴顺玉所指挥的机动部队包围了方圆为163英里的智异山。韩国第8师从南面朝山顶推进，首都师向北推进与其会合。由当地国民警察、青年团和警戒部队组成的阻击部队被部署在战略要地以切断敌人的逃跑路线。当袋口越收越小时，游击队员被迫以10—500名为一组地向外突击，但他们的抵抗并不激烈。经过12天时间，朴顺玉中将所指挥的机动部队于12月14日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共击毙1,612人，俘虏1,842人。

第二阶段是向北面的全罗北道省搜索，以全州周围的山区为主要目标。从12月19日到1月4日，韩国第8师和首都师在山里进行搜索，追剿隐藏在山里的游击队员。至12月底，估计击毙了4,000人和俘虏了4,000人。

第三阶段作战行动于1月6日开始，机动部队返回智异山追剿第一阶段行动后又返回到该地区的游击队员。1月19日，首都师进行了一次意义非常重要的作战行动。当韩国第26团占领山北的阻击阵地时，韩国第1团和骑兵团从南面发起进攻，以形成对敌人的双重包围。虽然有小部分敌人突破了第一道包围圈，但仍被第二道包围圈上的部队俘获。我们确信，在这次大规模行动中，已将南朝鲜境内的主要抵抗力量消灭或俘获。当第三阶段作战行动即“灭鼠者”行动于1

月底结束时，有19,000多名游击队员被击毙或俘虏。因此，最后阶段的作战行动荡涤了各种分散的抵抗力量。韩国第8师于2月初返回前线，首都师的机动部队继续追剿游击队的残余力量。

当朴顺玉指挥的机动部队在南朝鲜进行作战时，前线的行动仅限于巡逻中的冲突和小规模的袭击。这是防御战和阵地战的特点。1月初，中国军队向分池里附近西线上的韩国第1师的阵地发起了攻击，企图将韩国军队赶走。1月下旬，由麻芳里南侧的美第45步兵师所属部队发动的袭击遭到了敌人的激烈抵抗，但接触线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

虽然战场上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在冬季几个月中进行了几次有意义的试验。范弗里特对其炮兵部队没有什么起色而感到相当失望。他在12月写给李奇微的信中说，直至10月初，还一次没用155毫米自行火炮以近距离的直瞄射击摧毁敌人的工事，虽然这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创并被广泛用来摧毁齐格菲防线的一种方法。

因此，美第1军的炮兵于1月开始实施“高脚柜计划”。重型火炮和装甲车被布置在山顶，因此，能够直接摧毁用普通炮火不能摧毁的敌人阵地和工事。范弗里特发现，这对摧毁敌人修筑在陡峭山坡上的堡垒体系有一定效果，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第二次试验更富有迷惑力，但效果要比第一次小得多。为了迷惑共产党和使他们中计，从2月10日至15日沿前线实施保持沉默的“沉默行动”。沿20,000码长的前线，不派遣一支巡逻队，不打一发炮弹，不进行任何空中支援。使用这一战术的目的是为了使敌人捉摸不透，并使他们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已经从其阵地上撤出。当敌人派出巡逻队进行侦察

时，联合国军通过伏击可以抓获大批俘虏。事实上，敌人并未中计，并利用这个喘息期加固他们的防御工事。当第8集团军在这一行动结束重新恢复全面巡逻时，只抓到了少许俘虏。以后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战术。

第三战场的战果要可观得多。朝鲜的复杂地形证明最适于使用直升机。容易操作的轻型飞机可以降落在面积不大的空旷地，既可以后送伤员，又可以为一些独立的作战部队提供急需的补给。在朝鲜，第8集团军还很快发现了直升机的另一种用途。11月11日，海军第161直升机运输中队将950名士兵空运到前线，又从前线运回了950名士兵。12月通过空运完成了一个营的换防任务。

海军直升机的出色表演使李奇微将军相信，在朝鲜特别需要多用途的飞机。他建议将4个陆军直升机中队增编入远东司令部的海军直升机中队。为了确保飞机的不断补充，他建议马上批准飞机制造厂开始大规模扩大飞机的生产。

海军和空军的直升机在12月创造了新的记录。1951年夏季，在医院船"美国安慰号"上设置了直升机的着陆甲板。圣诞节期间和1月初，"安慰号"停泊在三八线附近的朝鲜东海岸的一个小港里，共接收了从前线急救站运来的245名伤员。他们全是急诊病例，救治的早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关系到是失去还是保留一个肢体的问题。直升机从船上到急救站往返一次需5分钟，从飞机上卸下伤员到再次起飞只需要45秒钟。即使是在波浪滔滔的大海和不能使用小船时，直升机也能执行任务。"安慰号"的船长对这次行动的成功非常满意，因为这是几年来处理战伤伤员的最大进展之一。

虽然紧急后送伤员到医院的设备有了改进，但仍有许多

伤员得不到医疗救治。巡逻和侦察任务既单调又害怕。单调是指每天都要执行例行巡逻；害怕的是每天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多。不管指挥官怎样千方百计地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敌人的大炮和迫击炮常常发现它们的目标。而且敌人的伏击和侦察造成了更多的伤亡。这是一个战争受挫的时期，即板门店的谈判陷入僵局，前线处于僵持阶段。1952年。朝鲜的地面战争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反常，人们好象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而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战场的平静、带有铁丝网的纵深防御工事、交错的战壕，主要使用大炮和迫击炮炮击，长期的巡逻和袭击，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回到了1914—1918年的年代。当然，有许多不同点，因为后来飞机变得特别重要，而毒气弹已不再时兴了。良好的卫生设施和滴滴涕的发现在朝鲜的价值比其在法国时的重要得多。但对下面这些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相似之处，部队和军官在运动战中受到了锻练，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需要一个调整时期，要重新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教训。

在大多数情况下，谈判的拖延和前线的平静都可能引起士气的低落。但在3月，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詹金斯证实，范弗里特公开宣称第8集团军的士气是高昂的。当他沿着战线视察时，发现各级指挥官和部队信心百倍，相信他们有能力抵抗敌人发起的任何攻势。范弗里特认为，他的部队之所以处于健康的精神状态，是因为在1951年初采取了自由轮换政策的结果。

为了能在1951—1952年冬天轮换，每个士兵必须在朝鲜战场服役9个月，或者是得到36分。在前线服役一个月得4分，在朝鲜其他地方服役一个月得2分。从1951年夏季开

始，符合轮换条件的人数日益增多。从1951—1952年秋季和冬季开始，每月轮换15,000—20,000人。这是保持部队士气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轮换大大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只要经常保持部队的流动，就难以达到训练标准和难以形成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对补充人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和考察，直到他们具有作战经验后，才吸收新的一批补充人员。幸运的是，当时的战争形势并不需要太多的老兵，所以轮换工作完成得相当顺利。

前线的平静并不意味着不进行部署。相反，在1951年冬季和1952年初春，范弗里特的参谋人员向李奇微提交了若干份准备实施的各种有限行动的计划。2月初提交了第一份计划，称为“棍棒行动”。目的是破坏共军以市边里为基地的补给系统，第8集团军的左翼向礼成江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夺取开城，击溃中国的4个军。估计联合国军要付出11,000名以上伤亡人数的代价。根据目前的能力，大约可望在4月15日开始实施“棍棒行动”。为了取得成功，可由第1海军陆战师在东海岸发起登陆佯攻。

在华盛顿诞辰那天，范弗里特提出了第二个建议，即称为“返校节行动”的有限行动，并只准备使用韩国部队。“返校节行动”的目标与“棍棒行动”的相似，即都是向礼成江推进，向市边里进攻，但不进行登陆佯攻。将重新夺取开城，因为范弗里特认为，收复朝鲜的昔日首都对韩国军队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如果“棍棒行动”被取消，范弗里特准备在4月1日左右实施“返校节行动”。

由于2月底板门店谈判取得了某些进展，李奇微不赞成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伤亡的行动。他在3月初通知范弗里特“处于待命状态”，“进攻行动将限于侦察。为了确保你部

的安全，可进行必要的反击”。

尽管他的进攻计划没有得到李奇微的积极支持，但未能阻止范弗里特在4月1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仍然想用他的两个韩国师发动一系列有限目标攻击，并提出了“6号筷子计划”和“16号筷子计划”。前者是准备用韩国的一个加强师实施对平康南面高地的包围；后者是由两个师发起攻击，将朝鲜东部南江东南两侧的敌人击溃和赶走。在这两个计划中，韩国军队将得到有力的空中和炮火支援。还可以趁这种越野作战的机会使部队得到非常有益的训练。由于李奇微对实施“6号筷子计划”之防线的地形不满意，所以没有批准这个计划。李奇微于4月16日批准了“16号筷子计划”，并同意由范弗里特实施，条件是不动用美国部队和接到通知后才能开始实施。但象过去经常发生的一样，范弗里特于4月29日即在板门店提出一揽子建议的这一天决定无限期推迟“16号筷子行动”。谈判再次对战场产生了影响。

三、夜间巡逻

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在1952年春放弃有限目标的进攻，这意味着在共产党改变战术之前，第8集团军将通过巡逻和袭击继续与敌人接触。从侦察的角度看，巡逻和袭击常常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但抓不到多少俘虏，而且不会和敌人发生遭遇。但部署和实施这些行动能使前线部队保持警惕和取得有益的实战经验与受到实战的锻炼。

1952年4月，在前线的第8集团军各团一般每天夜间至少要派出1支巡逻队和进行几次设伏。由各团的营、连轮流担任日间巡逻任务。通常是提前2—3周确定出担任巡逻任务

的官兵名单。因此，在3月底，K连、第15步兵师和第3步兵师得知，他们将从4月16日开始担任巡逻任务。威廉·T·穆尔上校指挥的第15步兵师占领了铁原西南和涟川以西的防区；西尔韦纳斯·史密斯中尉指挥的K连被布防在涟川以西的大约8英里宽的前沿阵地上。这块阵地正好位于临津江转弯处的大马蹄形之西，其地形特点为中间是许多小山，西翼是种上水稻的平坦谷地。

由于巡逻任务是抓俘虏，因此，目标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在K连的巡逻范围内，中共军队仅坚守了三个阵地，而且双方都很熟悉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结果是，第3营营长吉恩·R·韦尔奇选择了位于主要抵抗线以北1,500米之处的由中国一个加强步兵排防守的阵地。敌人的前沿阵地位于一座高约150米的称为意大利山的马蹄形山上，因此，可以严密监视位于其南面的我第3步兵师的活动。意大利山之东500米处是希腊山，它因其外形酷似希腊半岛而得名。这两座山的中间是一片开阔的稻田地，并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溪流过。

史密斯中尉拟定了巡逻方案，并且得到了营部和团部的批准。该方案准备由两个步兵排和M连的一个加强机枪班分三路向意大利山出击。由加强机枪班和一个步兵班组成的警戒组将夺取意大利山和希腊山之间谷地上的128高地，担任火力组的一个步兵排向意大利山推进和阻击中共军队前沿阵地上士兵的火力。一旦火力组进入阵地，突击排将从西南面向敌人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每个战斗小组都配有一部EE—8型电话机和一部SCR—300型电台，以便互相联系和在必要时请求营部支援，或沿巡逻路线按预订计划进行炮击。电话机的摇柄已被卸下，以免它发出的响声暴露巡逻队的位

置。虽然准备了信号弹，但在巡逻期间没有使用。为了提供炮火准备，在火力排进入意大利山上的阵地后，将由两个155毫米的炮连和一个105毫米的榴弹炮连炮击5分钟，接着由两门105毫米榴弹炮继续炮击，直至突击排准备对目标发起攻击时止。

由于准备在夜间进行巡逻，所以被选来担任这一任务的步兵将继续接受严格的夜间射击技术的训练。我们利用小电灯泡模拟敌人的火力，训练步兵如何瞄准和掌握跳弹射击技术。仔细研究了巡逻路线和目标的沙盘模型，使巡逻队队长熟悉整个地区的地形特点。由于大部分人员都已多次到过这个地方，所以在4月16日傍晚向巡逻队员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并同时通知他们一个团巡逻队当夜将在希腊山进行伏击。

大部分步兵配备了M_1式步枪、140发子弹和2—3枚手榴弹。火力组配备了轻机枪、1000发子弹，还每人配备一支卡宾枪，每个人都穿着防弹的尼龙背心。警戒组在最后将重机枪换成了轻机枪，因为准备用它们完成固定支援任务，加之轻机枪的枪架较重，便于进行准确的超越射击和间接射击。

4月16日一场大雨把大地变成一片泥海，夜间一片漆黑，刮着大风，使人感到透骨的寒冷，气温只有零下25度左右。由史密斯中尉指挥的警戒组于21时穿过连队阵地前面的铁丝网和布雷区，后面跟着由军士长乔治·柯里率领的突击组。该组由第二排的26人和3名卫生员及连部2名通讯员组成。由约翰·A·舍泽少尉指挥的火力组通过泥泞的道路进入下面的谷地，火力组由舍泽少尉所在的第1排中的26人、1名卫生员和2名通讯员组成。随突击组和火力组一起的还有由12名朝鲜人组成的担架队，以应付发生伤亡。

史密斯中尉率领的警戒组很顺利地占领了128高地并架好了机枪。但在前面的连阵地上的地雷区突然响起爆炸声，阻止了突击组的前进。军士弗雷德吾克·O·布朗和威廉·厄普顿返回去侦察时发现一名卫生员和一名朝鲜担架员出发晚了。由于天黑迷路，误入地雷区而绊着了地雷。幸好地雷滚进了前面的一个散兵坑，爆炸点离他们较远，因此并未受伤。由于布朗发现了地雷爆炸的大致位置，所以通知营部去营救他们。

半小时以后，布朗和厄普顿两人回到了等待他们的巡逻队。当突击组继续前进和向128高地迂回时，由于发生了另一件事，又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当他们转身向西向通往希腊山和意大利山的谷地前进时，从1营防区的右侧升起一颗颗的照明弹，正好照着我们两个排。每次照明弹升上天空时，巡逻队都必须匍伏在地，一直等到照明弹熄灭。要求营部停止发射照明弹亦毫无结果。

由于遇到房子被烧坏的地方，部队都不得不停下来，使前进速度本来就慢的巡逻队越发变慢了。下士威廉·奇尔奎斯特带领的先遣班仔细搜查这些房子，直到确信没有敌人潜伏在这些被烧坏的房子中。由于照明弹的关系和对沿途的三排房子进行搜索，所以巡逻队一直到当夜23点才接近意大利山脚下。

由于突击排要穿过一片比较宽的开阔地才能到达预定的意大利山脊，所以火力组沿着穿过谷地的小河两岸架起了4挺轻机枪。奇尔奎斯特带领的先遣班走在前面，中士柯里带领的班跟在后面，成一路纵队沿着最上面一条不太泥泞的田埂越过开阔地带。突击排人员之间保持3码的距离开始登上意大利山的第一个小山丘。当先遣班登上山丘顶上时，一个中

国人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几秒钟后便响起了激烈的冲锋枪枪声。当中国军队跃出其伏击地点时，希腊山脚下面的机枪和步枪火力象雨点般地射向他们。显然，敌人在意大利山和希腊山之间的谷地的南北两面设下了埋伏，一心等着巡逻队从这条路线接近他们的前沿阵地，因为美国军队过去许多次都是选择的这条路线。正是由于巡逻队选择了山脊而没选谷地作为到达山顶的路线，才没有发生重大伤亡。

敌人的突然射击，使突击排的4人受伤。一颗步枪子弹穿透了一等兵约翰·L·马斯纳里的防护背心和胸腔。他是一名白朗宁自动步枪射手。由于他受了致命伤，所以他告诉他的伙伴们不必对他进行急救。他用微弱的声音呻吟和祈祷上帝，没有几分钟便牺牲了。在穿有防弹背心的士兵中，他是在朝鲜最先丧命的。其余三个人分别是头部、手臂和大腿受伤。虽然疼痛难忍，但伤势并不严重。

当中共军队的猛烈攻击暂停下来时，突击排义愤填膺，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向敌人开火。中士柯里想用电话报告其它小组和营部他的处境，但电话机失灵了。无线电台也失灵了，因为天线被中方军队的子弹打断。当时，突击排只好完全独立作战。

回到营部时，韦尔奇上校才知道出了问题。但在确定巡逻队的位置之前，他拒绝炮击，否则，会炸伤自己的人。同时，当敌人向我火力组的人射击时，他们就跳入齐大腿深的水中隐蔽起来，因为附近没有岩石、篱笆，只有一棵树可以掩护身体。一名机枪手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他的大腿中弹4—5发，是舍泽所率领的排里的唯一伤员。

K连参加战斗的两个排与中共军队激战10分钟后，敌人便撤退了。柯里率领的排里有4人伤亡，联络中断，弹药所

剩无几。因此，决定撤回加入舍泽小组。由于战斗开始后朝鲜人担架员丢下担架，转身向联合国军前线一方跑去，所以柯里率领的排不得不自己抬着死伤者。他们用M_1式步枪和野战短外套做成临时担架，开始轮换抬着伤亡者下山。敌人再也没有向我们射击。

午夜刚过，两个排会合在一起，并与指挥部重新取得了联系。不管中士布朗如何强烈要求停止发射该死的照明弹，1营仍继续发射。这意味着每发射一颗照明弹，巡逻队和其它伤员就不得不马上停止前进。这不但减慢了巡逻队的返回速度，而且更增加了伤员的痛苦。另外，火力排的人员站在水里，因衣服湿透而觉得寒冷。但他们终于一步步地回到了L连的阵地，在这里抬着担架通过铁丝网比较容易。在凌晨3点半钟，疲惫不堪的巡逻队员终于进入了第3营的防线，喝着为他们准备好的可口的热咖啡和狼吞虎咽地吃着炸面饼。

同时，在希腊山上设下的团伏击队向前移动，夺取了中共军队用来伏击K连巡逻队的伏击区，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第二天早晨，营袭击队在希腊山上发现了一顶带有血迹的帽子和许多有血的绷带。这说明第三师巡逻队向敌人射出的8,000发子弹打伤了一些共军。

头天下午对巡逻路线进行侦察时，发现中共军队显然每天傍晚都在这个地方设下了埋伏。舍泽少尉建议，以后在派出主要巡逻队之前应先派出掩护部队，以防止受到敌人伏击。营长决定，以后巡逻时，白天将沿巡逻路线派出掩护部队，直至夜间巡逻队开始行动后方可撤下。

第8集团军在1951年冬和1952年春经常遇到K连的这种情况。有些巡逻行动比较成功，抓回了一些俘虏；而另一些巡逻行动除了与敌人接火和造成一部分伤亡外，没有和敌人

真正接触。许多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他们没有抓到俘虏，甚至未开一枪。共军和第8集团军一样，同样采取了巡逻、偷袭和伏击行动。因为这是这一阶段地面战斗的一个特点。

从整个形势来看，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4月的地面战斗并没有使双方控制的防御阵地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军队白天固守在山洞和各种工事里，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而美军主要是依靠空军在白天进行搜索。随着地面战斗压力的减轻，重点将转向空战。因此，在漫长的冬季将主要由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飞机发起攻击。

四、封锁与袭扰

就朝鲜的空中封锁战役来说，使用攻击力量这个术语可能会使人产生某些误解，因为这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行动，目的是为了阻止共产党军队得到发起总攻势的足够补给和军火，而不是为联合国军发起攻击作准备或提供支援。空军和海军从1951年夏季和初秋就开始注意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此，当10月重新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和地面作战处于基本上停止时，将封锁行动或"绞杀战"置于首位是不足为奇的。

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充分利用它对北朝鲜的空中优势和以空军为代表的机动火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补给站。破坏敌人的装备和作战物资可以阻止敌人增加持续攻势所需要的预备补给物资；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将使共产党方面所面临的后勤问题更加困难。只要联合国军的飞机不停地在他们头上盘旋，即使是按最低标准，近40万共军的吃饭和补给就是一

个令他们非常头痛的问题。

1951年11月到1952年4月，远东空军平均每月出动9,000余架次封锁和武装侦察飞行，每月出动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架次不等，最低为339架次，最高达2461架次。虽然范弗里特赞同实施封锁战役，但远东空军司令韦兰将军对其则持有不同看法。关于这个问题，他后来在制定防御部署计划时重申了他的下述看法：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记住，我们的空军及其力量是有限的。沿着平静的前线连续给于近距离空中支援需要对定点目标实施散射和持续的射击，而使用常规武器对付敌人的重要据点又没有机会发挥空军的机动性和火力。当形势比较平静时，近距离空中支援比炮击的代价要大得多。要用空中封锁和武装侦察削弱敌人持续作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切断敌人的后勤补给和制止敌人的活动，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只有大规模的近距离空中支援配合以坚决的地面行动，才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在1951年秋季不集中我们的主要力量摧毁敌人战线后方的遮断目标将是十分愚蠢的。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发挥我们的全部火力去摧毁敌人前线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目标。这样敌人就可以任意集结用来发起和坚持总攻势的所需物资。如果有足够的补给和弹药支援这种总攻势，就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决战。不了解或看不见这些事实就会对给于陆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意义产生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

就这个时期的地面战争的形势来看，韦兰将军的上述意见无疑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所有重要的地面攻势都没有超越试验性计划或应变阶段，而且自1951年11月后很少对有限的

目标发起攻击。由于敌人有上乘的堑壕和坚固的掩体，除非准确的直瞄射击和被炮弹直接击中，否则不会有任何效果。飞机不能进行平伸射击，因此对这些经过精心伪装的小目标很难进行准确的轰炸。只要战争继续停留于平静阶段，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空中力量的最有效使用似乎就是实施空中封锁。

问题的另一面是封锁战役对敌人所造成的影响。自11月加快"绞杀战"的速度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便企图破坏北朝鲜的铁路。战斗机和轰炸机频频起飞攻击敌人的载重汽车、火车和各种车辆运输，但共产党的空军却没有作出反应。轻型轰炸机（B-26型）在夜间对敌人的主要补给线进行轰炸，中型轰炸机（B-29型）的轰炸除使敌人的机场陷于瘫痪外，而且还对编组车场进行了轰炸和完成了近距离空中支援的任务。11月18日，舰载飞机开始实施破坏桥梁和铁路的联合计划。海军喷气式侦察机在战争中首次用1000磅重的炸弹定期轰炸敌人的铁路设施，结果证明对切断敌人的交通非常有效。到12月，这种轰炸常常要使敌人用3天时间才能修复被炸坏的铁路，而过去他们只需要一天时间就可以修复。尽管如此，敌人的铁路运输并没有中断。虽然共产党方面不得不常常用人力一点一点地运输，但他们仍成功地给部队发放了冬衣。封锁虽然给他们运输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并不能中断他们的运输。

"绞杀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诡计多端的敌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使封锁计划失去了效果。据空中侦察报告，位于平壤东北的顺川主要铁路枢纽的铁路桥尚未投入使用，因为有两个桥墩之间的桥面被炸断了。直到通过夜间照相侦察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才发现共产党军队每夜都

在这两个桥墩之间搭上了活动桥，而且在一直不断地使用这座铁桥。

1 月初，李奇微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他对封锁计划的评价。他认为，空中战役减慢了敌人的补给行动，延长了敌人将补给送到前线所需要的时间，迫使敌人从前线抽调一部分人力物力去维持和保卫交通线。由于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烧毁了敌人大量物资，从而加重了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提供设施的负担。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李奇微接着又说，但处在一种稳定的防御形势下，共产党仍能够为其部队提供充分的物资需要；而联合国军司令部空军的现有能力则无法阻止他们继续提供这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敌人将设法在前线储备物资和集结部队。因此，联合国军司令认为，随着共产党军队之对抗措施和修复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进一步削弱今后封锁计划的效果。换句话说，虽然封锁计划使敌人遭受着损失和阻碍了其人力物力的集结，但李奇微认为，除非战场上的形势发生变化，迫使共产党军队增加其补给和弹药的消耗，否则他们最终会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并将这种攻势持续下去。

但与事态的一般发展相反，不但未向坏的方向发展，反而向好的方向转化。1 月，“安提坦号”、“埃塞克斯号”和“福吉谷号”航空母舰集中火力切断敌人的运输线。每艘航空母舰负责 2 — 3 个12哩的防区，海军飞机的活动范围为1,500—4,000码，这种集中轰炸几乎摧毁了全部路基。接着进行不断地侦察飞行，以阻止其很快修复。这一战术的变化显然使敌人措手不及，被破坏的地方十天之后尚未修复。在 1 月的后两周，从高原——元山的铁路线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应付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挑战，敌人将其高射炮调到受威胁的地区，并开始不断击落我方的攻击机。海军飞机则集中轰炸敌人的高炮群。他们用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敌人的高炮群，用螺旋桨飞机轰炸铁路线。这种办法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预先对敌人的高炮阵地进行了空中照相侦察时。

共产党方面除了增强其高射炮的火力外，还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人力资源。北朝鲜铁路局投入三个编制为7,700人的旅昼夜抢修铁路，给每个大站派遣50人处理技术难度较大的问题，每隔4哩有一个10人的小队。只要铁路巡视员发现什么地方被破坏，这些部队便立即进行抢修，而且民工也马上被运往现场填补弹坑和修复路基。夜间，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部队便开始铺设枕木和铁轨。据空军5师估计，在反击"绞杀战"中，共产党方面一次可以投入500,000士兵和民工。

共产党部队和民工效率的日益提高在2月得到了海军飞行员的证实。他们说："共产党部队总是能在12小时或更短的时间之内抢修好被破坏的重要铁路线。有时我们发现他们能在我们进行轰炸时抢修铁路"。虽然他们使用的工具和方法很原始，但总是能设法很快恢复铁路的运行。这就是这场以机械化对人的战争的全部奥秘所在。

共产党军队白天充分利用山中的许多隧道隐蔽他们的火车，他们将弹药车厢和油料车厢挂在火车的中间部位。因此，即使联合国军将炸弹丢在隧道口，也仅仅能起到暂时封锁洞口的作用。由于共产党利用当地的民工，所以能很快清除隧道口的碎石，并能在黄昏时继续通车。

面对共产党军队的反击措施，"绞杀战"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代价则越来越大。似乎连天气都变得越来越对敌人有

利。随着地面冰冻的开始，联合国军投下的许多炸弹从冻硬的地面上弹起来后才爆炸，因此一点作用也没有，甚至有时向上飞起的弹片击伤了低空飞行的联合国军飞机。最后，3月地面开始解冻之后，远东空军决定实施一次新的行动，即所谓的“饱和行动”，它是根据1月的海军作战经验制定的。远东空军希望通过投入其全部力量在24小时内不停顿地对敌人的某一特定地段铁路进行轰炸而使其受到彻底破坏。但3月25、26日对清川至新安州铁路线的密集轰炸使人大失所望。虽然出动了307架战斗轰炸机、161架战斗机和8架B—26型轻型轰炸机进行轰炸，但共产党方面仅用了6天时间就抢修好了。与此同时，敌人铁路系统的其他部分却一点未受到干扰。

攻击敌人铁路期间的致命弱点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未能想出在夜间和气候恶劣的条件继续这种轰炸的有效办法。尽管白天对敌人的铁路和桥梁不断地进行破坏，但敌人已经组织起来对付这种空中攻击，而且能在夜间和不适合飞行的气候期间很快修好被炸坏的铁路和桥梁。到4月底，封锁战役已陷入绝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李奇微将军所掌握的空军显然无法继续这种旨在使敌人铁路瘫痪的行动。另外，要在此时得到充分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增加的大批空军也显然是不可能的。

3月中旬，第8集团军对这次封锁行动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下面这段经过认真推敲的文字是他们呈交给李奇微将军的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评价这次封锁计划是否成功的最好办法是假定没采取这次行动。要是没有采取这次“绞杀行动”，现在敌人在市边里的附近就一定铺上了很好的双轨铁路，而且还会在平康

与洗浦里之间铺上另一条重要铁路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炮和追击炮炮弹的消耗就会增加若干倍以上。

虽然空中封锁计划未能在平静的局势下阻止敌人将补给物资送往前线，但它在阻止敌人发挥其前线大炮和其他武器之火力优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也削弱了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能力”。

对这次空中封锁行动尽管越来越议论纷纷，但海军的水面舰只确实在这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北朝鲜的东部沿海一带。在遇到不适合飞行的气候时，海军驱逐舰一直用五吋口径的大炮袭击沿海的铁路。虽然其拦阻性炮击并不能使铁路受到严重破坏，但其扰乱性炮击有助于切断火车的运行。

海军的重型舰船集中攻击了东部沿海一带的军事目标。在11—12月期间，支援位于轰炸线附近的韩国第1军的有战列舰“新泽西号”和“威斯康星号”，重型巡洋舰“托莱多号”、“洛杉矶号”、“罗彻斯特号”和“圣·保罗号”以及轻型巡洋舰“曼彻斯特号”。12月英国皇家海军登陆袭击队对谈川和元山港进行了多次袭击。与此同时，共产党军队却在西部沿海一带变得十分活跃起来。他们利用夜间的掩护不断派遣袭击队登陆对韩国部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的沿海岛屿进行袭击。由于这些岛屿很容易被敌人夺占，所以海军上将乔伊不得不设法加强游击队的力量。乔伊希望通过派遣韩国海军陆战队增援游击队来加强他们的防御能力。因此在1月6日，将守卫三八线以北沿海岛屿的任务移交给海军，第95特混舰队负责为守卫前沿阵地的韩国海军陆战队和游击队提供支援。

由于加强了海岛上的守卫力量，共产党军队在两栖作战

中遇到了比较强大的抵抗。2月，共产党军队对东部沿海城津东北20哩的羊岛发起营规模进攻时，韩国海军陆战队和游击队在美国与新西兰海军水面舰只的支援下击退了他们的进攻，海军炮火击沉了11只舢板，75%以上的进攻部队被击毙。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后，敌人的攻击又移回到西部沿海地区。3月，他们出动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夺取了位于镇南浦以南20哩由韩国海军陆战队守卫的虎岛。虽然敌人在3天之后撤出了此岛，但由于该岛离大陆太近，以后容易受到袭击，所以我方未重新占领该岛。

当海岛之战尚未结束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战争形势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2月初，他们建议空军和海军对中国沿海实施一次战斗巡弋，以迫使中国恢复和平谈判。但国务院不愿给丘吉尔首相造成尴尬的局面，因为英国反对党领袖一直在攻击丘吉尔1月访问华盛顿时同意在朝鲜战争中采取新的行动方针。因此，国务院认为，这种时候对中国沿海实施战斗巡弋就等于证实了英国反对党领袖的上述怀疑。

3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阿瑟·W·雷德福再次主张对中国沿海实施战斗巡弋，但李奇微仍感到犹豫不决。他对雷德福将军说，一方面他赞成在适当时机采取这种行动，但另一方面他觉得如果要在当时实施这一行动，将会产生不利于美国的政治反响。面对这种情况，李奇微将军宁肯继续等待板门店谈判的进一步结果。

航空母舰战斗巡弋的延缓使海军作战步伐直到下月才出现改变。4月中旬，航空母舰"拳师号"和"菲律宾海号"对重要交通枢纽清津市进行四次攻击，投下重磅炸弹200吨。巡洋舰"圣·保罗号"和另外3艘驱逐舰用其5—8吋口径的大炮对清津市炮击了一整天。这次行动不但严重破坏了该

市的各种设施，而且使海军飞行员从单调的铁路封锁战役中解脱出来。

1951年11月至1952年4月的海上作战没有取得什么特别令人鼓舞的战果。北朝鲜的元山港天天受到轰炸，并有扫雷艇定期通过其沿海。几乎每月都有共产党的海岸炮兵连的炮弹落在联合国军的舰船上，但损害一般都不严重，伤亡人数亦很少。由于封锁战役投入了绝大部分舰载飞机，所以海军陆战队航空中队的绝大部分攻击都是执行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任务。但仍如过去一样，继续执行一般的封锁和侦察任务，以严密监视敌军的集结。虽然这段时间里共产党的空军力量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可能突然发生猛烈攻击的危险性是始终存在的。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海军部队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准备对付敌人空军的行动。

五、兵力对比的变化

停战谈判对战场的严重影响在1951年冬和1952年春不时表现出来。虽然在一片混乱之中对一个又一个进攻方案进行了审议，但不是因其伤亡太大遭到否定，就是因其可能对谈判进展产生不利影响不了了之。虽然实施"积极防御"的部分细节问题已与地面、空中及海上战役一起进行了讨论，但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值得进行审议。

战争一进入稳定阶段后，伤亡人数即开始明显减少。据估计，1951年10月共产党方面的伤亡人数是80,000，11月下降到50,000，12月和1952年1月分别下降20,000，1952年2月至4月停留在11,000至13,000之间。联合国军的战斗伤亡人数1951年为20,000，11月下降到11,000，12月和1952年1

月分别下降3,000，1952年2月至4月停留在2,500以下。

随着伤亡人数的日渐减少，需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即扩大补充兵员集中待命处，确定每月需要的补充兵员人数以保持前线部队的战斗力，开始实施前线部队换防的轮换计划。共产党方面为改变其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态势，决定采取第一种行动方案。11月1日，共产党方面的部队只有377,000人，到12月1日大约增加到了570,000人，到1952年1月1日其总数已达到642,000人。在195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北朝鲜的部队显然只维持在225,000人左右。

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司令部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在1951年11月1日至1952年4月30日，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则从264,670人减少到260,479人。每月有16,000至28,000的补充兵员从美国送往朝鲜，在前线服役时间达到轮换标准的被送回美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政策虽然有利于保持部队的士气，但也相应地削弱了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对共产党部队的作战实力。虽然其他联合国成员国派出的部队人数只有很少增加，即从33,258人增加至35,912人，但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4月在韩国的地面部队差不多增加了60,000人，即从原来的281,800人增加到341,113人。因此，敌人在数量方面仍继续占据着优势。

自7月开始谈判以来，敌人在其军事态势上究竟有多大好转，1952年4月底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亚历山大·R·博林少将作出了比较明确的估计。在这10个月中，敌人的兵力从502,000人、72个师增加到866,000人、82个师，炮弹从8,000发增加到40,000发，整整增加了5倍；中共的炮兵部队加上部分装备不完善的北朝鲜炮兵部队已从4个师增加到8个师，另外还有4个装备精良的北朝鲜炮兵旅。1951年7

月，中共还基本没有装甲部队，目前已有了2个装甲师，1个北朝鲜装甲师，1个机械化师。大约有5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俄国设计或制造的。在谈判中断期间，中共部队的补给问题得到了缓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共产党方面充分利用了停战谈判带来的喘息机会。只要于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继续保持这种僵持局面。

空军方面也出现与上面相似的情况。据博林估计，共产党在满洲里空军基地的飞机已从1951年7月的500架增加到1952年4月的1,250架左右，其中约有800架俄国喷气式战斗机，另外又增加了75架运输机。实际上，共产党空军力量的增加速度和其地面部队的差不多。虽然他们的空中力量增加得很快，但在1951年冬和1952年春并没有向联合国军司令部进行认真的挑战。在12月，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最多只起飞了4,000架次，而到1952年4月其起飞总架次已降至2,300左右。从1952年1月1日起，他们基本上没有使用北朝鲜的飞机场，仅有极少几架敌人战斗机越过新安江以南。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一样，在战争处于平静阶段时，似乎只是一种潜在的而不是一种明显的挑战。

尽管敌人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但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正担心着敌人空军力量的增长。他在12月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说，他认为，他需要8个F—86式佩刀式战斗机联队，才能在数量上与敌人的战斗截击机保持平衡。但华盛顿对其电报未作出什么反应。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指出，李奇微已经拥有5个F—86战斗机中队或一个多联队。要另外给他提供6个多F—86战斗机联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责成美国每月生产13架飞机，加拿

大每月生产20架飞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他们无法答应李奇微的要求，但他们将设法制定一项少量增加的计划。1月初，一艘航空母舰受令驶向太平洋，如果李奇微需要，可交由他指挥；另外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喷气式飞行中队将在1月飞往西太平洋，亦可受远东司令部调遣。

虽然采取了上述临时措施，但空军参谋部经过一番调查后，又马上提出了下面几项建议：①可以从美国防空司令部抽调3个F—94式星火全天候战斗机中队。但这意味着将已完成了在朝服役期的飞行员再次派往朝鲜；②空军准备与国务院商量，如果有飞行员，将在英国的75架F—86战斗机和在加拿大的75架F—86战斗机用船运往朝鲜。但这等于将加拿大的防空力量削减到了最低限度和延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军力量的充实。在这种情况下，陆军计划参谋部同意空军参谋部的意见，支持李奇微关于迫切需要增加空军力量的要求。

上述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同意适当增加李奇微将军的空军力量。由于涉及到种种复杂的因素，所以这种结果仍属比较满意的。2月，一个F—94飞行中队被派往远东司令部。美国政府也和加拿大政府达成了购买60架F—86战斗机的协议（每月10架），加上美国自己生产的，到7月李奇微即可拥有两个F—86战斗机联队。

航空母舰“菲律宾海号”于2月驶抵远东，从而完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另派一艘航空母舰的许诺。但海军作战部长威廉·M·费克特勒将军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由于当时正在实施过渡计划，航空母舰面临退役问题。因此，除非让海军保留2艘航空母舰，否则是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局面的。但空军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海军可以从大西洋地中

海上抽调两艘航空母舰听候临时调遣。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未就这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最后国防部长洛维特裁定：只要未出现解决远东问题的迹象和继续存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海军坚持在远东保留2艘航空母舰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如果削弱美国在欧洲地区的海军力量，就会产生非常不利的政治反响。总统同意了洛维特部长的裁定。因此，李奇微得到通知，他一直可以保留其航空母舰，直到达成停战协定或其空军力量增加到不再需要航空母舰时。

李奇微请求陆军参谋长增派高炮营未获得批准。我们都记得，柯林斯将军曾答应过李奇微在1951年中期给他增派5个营，有4个营已于11月份到达远东战区。但由于敌人的空军力量增加了，加之联合国军司令部又新修建了好几个机场，因此对防空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远东司令在1月份要求尽快给他增派9个营。在这种情况下，他碰壁了。柯林斯通知李奇微说，鉴于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承担着义务，因此一个高炮营也抽调不出。

由于在战场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想大量增加兵力的前景很暗淡，但容许司令部作了几次调整。毫无疑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调整是将美第45和40步兵师从日本调到朝鲜接替第1骑兵师和第24步兵师。

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轮换，实际上却有着相当的背景。第40和第45步兵师是1951年4月被派到日本进行训练的两个国民警卫师，并附带担任日本的警戒任务。鉴于国会对国民警卫师投人战斗很重视，所以陆军在7月得到李奇微的肯定答复，他不打算将其中任何一个师投人零星的战斗。

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这两个师完成训练

任务后，他们准备让其参加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司令同意这一安排。但夏季攻势的发展使李奇微改变了原来的意见。只要存在着敌人发动反攻的危险，他就不愿让未受过训练的部队接换其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调动开始时，他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种调动至少在3个月内将削弱他保卫日本的能力。

在华盛顿，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詹金斯不同意李奇微的意见。他认为这两个师调离日本使日本的防御受到的暂时和部分影响要比朝鲜受到的威胁小得多。他向柯林斯进一步指出，40和45步兵师中的许多国民警卫队员到1952年8月都将服役期满，届时将不得不送回美国。因此，他建议将一个国民警卫师派到朝鲜，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可以撤离一个作战师轮换到日本。以后可按此法轮换第二个作战师。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于9月中旬批准了这项建议。

但李奇微的思想仍未通。他认为，至少在11月15日之前苏联对日本采取行动的危险是仍然可能发生的。苏联对日本和平条约的反应还不清楚，德国的形势亦难以预料。因此，他坚决主张将一切调遣活动推迟到11月重新复议这个问题之后。根据李奇微的复议申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征求总统同意后最后取消了对国民警卫师的调遣命令。

11月初，李奇微终于改变了反对将这个师调到朝鲜的主张。虽然第8集团军这时已完成其秋季攻势，但李奇微不想减弱部队的战斗力，因为有可能采取其他行动以便在谈判桌上向敌人施加压力。因此，他坚决主张取消使用国民警卫师替换的限制。

柯林斯将军不愿插手这件事情。他认为，不使用这两个师肯定会引起国会的激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国民警卫师经

过一年训练之后仍不适合于参加战斗。他通知李奇微说，在其训练期满之前，看来非得尽快按作战部队使用这两个师不可。

参谋长的上述意见终于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11月20日这天，希基将军通知范弗里特，第45师将在12月开始接替第一骑兵师。

实际调动开始时，远东司令部采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使用过的一种方法。1944年，用船将38师运到夏威夷后让其上岸接管第6师的全部营房、装备和武器。待第6师的全体人员登上这些装运过38师的船只后再驶向西南太平洋。用这种办法装运轮换和被轮换部队而不带走其各种重型装备和补给，轮换部队就只需携带各自的武器和个人装备。由于不装卸师的装备，因此不但经济，而且加快了整个轮换过程的速度。

第45师和第1骑兵师于12月初开始其轮换。第一梯队是第180步兵团，12月5日到达后被编入美第1军，两天之后第5骑兵团驶往北海道被编入美第16军，第179团于12月17日到达仁川，第7骑兵团第二天便离开朝鲜开赴日本。最后一个梯队是第279团，于12月29日进入朝鲜，第8骑兵团于12月30日离开朝鲜。轮换至此宣告结束。这时第180团已进入前线阵地接受炮火的洗礼。

总结这次轮换的经验后，远东司令部便开始为第二步做准备。第40师和第24师轮换的预备命令于12月下达，1月初便开始了行动。第24师将其第5步兵团留在朝鲜，原因是在日本训练的第34步兵团本属第24师的编制，因此应重新归其指挥。2月初，第40师被编入美第9军，接替了原24师在金城附近担任的任务。一位从事射击任务的炮手的一篇关于第24

师炮兵部队的报道反映了这次行动的顺利。他庄严地将拉火绳交给前来接替他们的第40师后，在一排礼炮声中走向正在等待着他的汽车。

总的说来，这次师的轮换进行得非常顺利，基本上没有影响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在4月评价40师和45师的作战能力时，第8集团军的作战与训练参谋指出，经过短期实战锻炼后，这两个新师的战斗力并不亚于第24师和第1骑兵师。

虽然在这半年中只进行了这4个师的大规模轮换，但还利用战争的平静阶段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轮换。韩国第8师在3月完成反游击战后便接替了在前线的美第10军的第1海军陆战师。范弗里特于3月25日将第1海军陆战师调到西翼接替韩国第1师。他认为，这不但可以发挥海军陆战部队的两栖作战能力，还可以更好地保护汉城。

轮换计划还涉及了部分入朝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联合国部队。11月，范弗里特确定了在朝的非美国军队的轮换方式。法国政府希望在3个月内将它的一个营从前线撤离下来，在此期间它派出补充人员，重新组建一个营。但范弗里特表示坚决反对，他坚决主张参战国家派遣到朝鲜的轮换部队必须是经过训练的。这样，一旦他们到达后，便可在直接战线后方进行轮换，因此不会削弱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范弗里特的建议获得了批准。因此，今后将按他提出的这种方式轮换联合国的部队。

3月底，埃塞俄比亚的第一批轮换部队一个营到达朝鲜，被轮换的埃塞俄比亚士兵乘坐同一批船只回到埃塞俄比亚；4月，澳大利亚政府送来了另一个步兵营，即皇家澳大利亚团的第一营，被编入了该团的第3营。

战场上的平静，为范弗里特将军在4月初重建韩国第2军提供了机会。原韩国第2军经与共产党军队两次遭遇后已经覆灭，一次是在1951年秋，另一次是在1952年初。新组建的韩国第2军包括韩国第3师、第6师和首都师，由朴顺玉将军担任军长。重新划分了韩国第2军和美第9、10两军之间的防线，韩国第2军是控制金城至金城东南15哩一带的防区。

毫无疑问，由于没有地面行动，部队的轮换和重新组合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从其总的效果来说，至多只能是维持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现状；如果从最坏的角度来说，它可能会削弱李奇微部队的力量。因为轮换使他失去了有经验的作战部队，而补充进来的是一些未经战争锻炼的士兵。

与此同时，敌人却改进了他们的防御工事，增加了部队，储存了补给。历时半年之久的"积极防御"只不过是一场敌人固守在其经过精心准备和构筑的防线后面的阵地战而已。巡逻和伏击如同19世纪的印度战争一样，主要是进行地面活动，而且即使这类遭遇战也被限制在很小规模。

由于双方都谨慎地限制了地面部队的活动，所以注意力转移到空战。但由于封锁战役严重破坏了共产党方面的运输和补给网，敌人的战斗力严重受挫，因此他们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大了。

虽然到1952年4月，敌人比过去强大了，准备亦比较充分了，但他们仍不急于改变战争的进程。只要谈判不破裂和战场上不出现严重压力，共产党方面似乎会继续维持前线的目前这种态势，而在谈判中和宣传上发起攻击。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除了继续沿所有前线进行防御外，还可能进行空战和海战，因此可以称为攻守兼备。但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战线的后方，因此而出现了战争平静阶段而带来的其他一些问题。

第十章　在战线的后面

无论是在停火谈判中达成协议，还是继续这场热战，都可能使某些在1951年冬季引人注目的问题黯然失色。但是，由于在板门店和战场上都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人们更加注意后方事态的发展。毫无结果的争论和相持不下的战局都不排除在幕后做出决策的需要。尽管最终将在板门店达成协议，做出详细规定，但是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威胁这一基本问题将继续存在。到1951年11月，军事力量显然已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停火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各地美国一直是反对共产主义传播的主要力量。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了抵制共产主义在欧洲进一步扩张的核心。至1951年底，美国已将其在欧洲大陆的部队增加到6个师，并且还在要求其它北约成员国加强各自的军事力量。但是各国行动迟缓，因为重新装备和维持部队需要大笔经费，加之战争的威胁在欧洲还没有使人感到迫在眉睫。但一个对于北约组织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1952年在里斯本举行的北约会议通过了一项部署50个师地面部队的计划，其中将第一次包括德国部队在内。西德重整军备并将参加北约行动的消息激起了苏联的抗议，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对此拒不理睬。西德加入北约的行动在欧洲的防线上增加了一个新的联结点。但是这个联结点将增加还是削弱北约的力量，尚不得而

知。

但是在远东美国却在孤军奋战。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东南亚承担着殖民地义务，美国无法期望在近期获得它们的有力支援。除非美国愿意继续承担这一重负，唯一的出路就是利用远东潜在的人力。要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有决心同共产主义的蚕食进行斗争的部队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时间。但是这却比在该地区维持一支庞大的美军部队省钱。有幸在韩国，国民党中国，菲律宾和日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军事援助顾问团已经开始其发展各国武装力量，抵御侵略的长期工作。主要的问题将是怎样加强和加速军事援助，以便美国能最终移交保卫远东，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义务。

一、加强韩国的陆军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韩国就仍将成为整个战线中最关键的一环。这里存在着对一个由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国家的直接威胁——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威胁，否则将危及美国在整个远东的利益和地位。为了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在远东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都投入了1950年的战争，接着又从国内调来增援部队，因此消耗了战略储备。以韩国军队替换美国士兵似乎是停止这种损耗的唯一希望。但是在韩国军队能够接防并且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自由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正如上文所述，韩国军队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在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他们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提高韩国陆军的素质和战斗力。陆军部长佩斯和参谋长本人都关心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有助于排除某些

以前曾经阻碍了执行该计划的障碍。

时间问题一直是主要障碍。在战场上的压力减轻之前，部队无法撤换下来接受训练或更换装备，屡有缺乏战术训练、不懂武器性能的兵员被紧急派往前线。这是一种浪费现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又必须这样做。

6月战场上的局势有所缓和，李奇微和他的顾问们开始更加注意让士兵和部队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虽然韩国提供的新兵大多数都营养不良，但是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如果指挥得法，韩国青年普遍表现得有勇气，有耐力，并且极富有本民族特有的耐心，在防御战中，这些卓越品质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朝鲜军队在战争的第一年中，战斗力时强时弱，变化无常。然而军事观察家们确信，他们的绝大多数失败都可归咎于指挥失误和缺乏训练。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正是针对这些弱点，大力开展自己的工作。

李奇微1951年7月提出的计划，主要目的是重新建立和振兴南朝鲜的军事院校，纠正指挥中的失误。既然有时间，他希望最终建立起一个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和军士组成的军团。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就南朝鲜经济通货膨胀的趋势而言，韩国陆军官兵的薪金微薄。为了维持生计，许多军官竟使用了令人生疑的权宜之计。他们视个人利益重于军事需要，从而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尽管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不断施加压力，要求韩国政府对腐败的军官施行严厉的纪律制裁，但是在这些军官领到足够养家的薪金之前，这个问题将继续存在。

建立一个能征善战的军团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增强各级人员的信心——士兵对军官的信心和

各级军官对自己的信心。南朝鲜军官一般都很年轻，许多团长还不到30岁。青年人活跃好动，但是这些军官却都小心谨慎。如果没有直接领导人在场或是上级的指示，下级人员往往不愿积极采取行动，唯恐触犯上级。弥补缺乏主动性所造成的损失绝非易事。媚上欺下是朝鲜人强调军阶和职位所带来的最大弊端。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就几乎没有军官甘冒触怒上级的危险而采取独立行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将不得不以最大的耐心，竭其所能，改变这种倾向。

在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向高级军官灌输信心和主动性、传授指挥艺术的同时，为了保持士气，战地训练司令部在后方开始了自己的工作。韩国陆军的每个师都轮流参加了为期 9 周的基础训练，学习使用最新式的武器，接受最新战术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由于这次训练成绩显著，1951年 9 月在三个军团的驻地又分别新建了一座军营。

组织军校和训练系统的工作到1951年11月初已取得很大成绩。查帕尼上将领导的巡回训练队和军校指挥部已得到了人员补充，做好了开展大规模训练的准备。为了集中训练设施，该指挥部建议将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和通信学校都迁到南朝鲜釜山西面约120英里的光州。合并后的这所学校于 1 月初开学，2 月改名为韩国陆军训练中心。这所学校一期可以培训1500名学员。

为增加新上任的连级军官的训练课时，预备军官学校的学制由18周延长到24周。1951年 1 月 1 日，设在釜山附近的镇海的韩国军事学院重新招生。该校模仿西点军校设置了一套充实的 4 年制课程。为培养校级军官在设在大丘的司令部参谋学校也于1951年12月11日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150 名韩国陆军军官被派往佐治亚州本宁堡步兵学校受训，另有 100 人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炮兵学校学习。陆军希望将来能从这批在美国军校学习的人员中为韩国陆军招募教官。总的说来，被选派美国军校学习的都是学习成绩优秀，出类拔萃者。语言不通照例是他们最大的困难，必须为他们派遣口译人员。学员中也有许多人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了一些英语。由于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学朝鲜语，他们所学的这点英语，回国后就派上了大用场。韩国士兵与美国士兵之间的思想交流一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尤其是涉及到技术问题时，这种障碍就更为明显。1952 年 3 月，第一批韩国军官结束了在美国各学校的学习，当月第二批250人就离韩赴美，参加下一期的培训。

为加强韩国陆军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加重了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负担，导致李奇微要求扩大该团的编制。11月10日，陆军部批准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增加800多名成员，将总人数增加到1800多人。

正当韩国陆军的素质有所提高时，代理国防部长威廉姆·福斯特提出该军究竟最终应有多少人的问题，12月10日，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战后韩国防御部队的任务和规模。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一直赞成保持一支10个师、25万人的陆军，尽管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已经决定要扩大韩国的军事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建议要坚持这一数字。1952年 1 月下旬，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国防部长，韩国的经济在近期内还无力承担大规模的扩军。他们认为，如果训练得法，装备齐整，指挥正确，韩国目前的部队能够有效地制止敌人进一步的入侵；一旦需要，还可以延缓共产党人的进攻，直至增援部队赶到。诚然，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韩国政府陷入了

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无力追加大笔费用。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不应忘记，美国已经承担了向他的许多北约盟国提供军需物资的义务，而且还准备支持复兴日本的防卫力量。看来，由于美国国内生产既要满足国内又要满足国外的巨大需求，还没有达到支援全面战争的规模，扩大韩国陆军不得不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韩国政府和它最雄辩的发言人李总统并不认为一支由10个师组成的陆军就足以保卫战后的南朝鲜。但是直到3月下旬，这个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海军部长丹·金布尔在韩国视察时发现，范弗里特将军赞成再组建10个韩国陆军师。他回国后向陆军政策委员会汇报了自己的发现，众人惊愕不已。这是陆军第一次得到坚决支持韩国陆军扩编的暗示。它真有些使人难堪，陆军竟不得不向海军索取有关情报。赫尔将军要求李奇微无论如何要立即就此作出解释。

李奇微惊讶之状毫不亚于他的上级，他当即就此质问范弗里特。最后，他通过这条间接途径得知，第8集团军司令最不赞成将韩国陆军扩大到20个师。范弗里特认为，韩国具有继续打下去的人力和愿望，美国援助韩国部队要比在朝鲜维持美军部队经济合算。作为这场闹剧的尾声，范弗里特告诉他的司令官李奇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请查阅刚刚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发表的，记者对他的采访报导。

无论李奇微内心对事件的这一转变有何反应，他都尽力克制自己。他告诉赫尔虽然自己没有看过对范弗里特的采访报道，但是坚决不同意他的下级应该将韩国陆军扩大一倍的看法。他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韩国经济无力维持更多的军队，而且是因为目前应该优先发展日本的防卫力量。训练10个师的韩国陆军的计划现在刚刚初见成效，还需再用10个月

才能完成这项计划。如果美国现在开始新建10个师的部队，它们要经过18个月的训练才能参加战斗，而且美国必须提供所有给养，服装和军饷。尽管他非常尊重范弗里特将军，李奇微还是向赫尔报告，“然而，依我看来，由于朝鲜局势对美国的影响，他的目光在这个问题上，很自然地几乎完全局限于朝鲜局势本身。我无法相信日本，国民党中国和东南亚的军事计划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些都是美国承担的义务或者已在研究之中”。

李奇微将军的反对意见足以阻止扩大韩国地面部队。在他 5 月离开远东司令部，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时，韩国陆军的规模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在韩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方面，他碰到的问题更为棘手。韩国空军规模很小，装备的是螺旋桨驱动的飞机。一支由17架正在被淘汰的战斗机和29架混杂型号组成的空军。在他看来，面对共产党空军，不可能构成实际反抗，很可能一触即溃，全军覆没。李奇微又说，维持一支弱小无能的空军毫无意义，因为一旦再次受到侵略，美国仍须为韩国提供空中支援。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有一支战则必败的空军比没有更糟。”但是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发现，一旦一个军种获得了立足点，就几乎无法再取消它。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意自行改编韩国空军，没有人根据李奇微的建议采取行动。

他提出的在战后取消独立的海军陆战队的建议也同样受到冷遇。在他看来，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师就须有一笔单独的军费和一套与陆军后勤分队相重叠的后勤系统，美国的纳税人将不得不负担这些毫无必要的费用。然而李奇微的呼吁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海军已经在 2 月成立了援韩海军顾问团和海军陆战队顾问团。

虽然李奇微限制韩国武装力量规模的种种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和他的部下的确成功地在韩国部队中，实行了一些旨在提高战斗力的改进。李奇微11月授权范弗里特将韩国后勤部队扩大到6万人。这将使作战地区的所有劳动力和运输工具都有可能被组织起来，并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纪律约束。这还将保证战斗部队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李奇微计划最终把韩国后勤部队的编制扩大到7.5万人。

这位联合国军司令还努力弥补韩国陆军的致命弱点——缺少必要的炮火支援。过去，韩国陆军各师在进攻和防御中都被迫依赖美军的炮火支援。每个韩国陆军师仅配备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而美军一个师就配备了3个105毫米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除此之外，美军在作战时，各师还能得到坦克和几个重迫击炮连的支援。在此之前，第8集团军和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曾认为，由于地形复杂，缺少公路，难于运输，加上没有受过训练的炮手和必要的装备，不宜于发展韩国的炮兵。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它进入相持阶段后，上述障碍大都得到了解决。在年底以前为韩国组建4个155毫米榴弹炮营的命令于9月颁布。美军对这几个营进行了为期8周的训练。在11月又成立了3个司令部直属炮兵连和6个105毫米榴弹炮营。这些新成立的炮兵部队于1952年1月开始训练。李奇微最终在3月批准在韩国的10个陆军师里各成立3个满员的105毫米榴弹炮营和1个满员的155毫米榴弹炮营。5月，陆军部临时授权远东司令部继续执行这项计划。

到1952年4月，加强韩国陆军的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军校已经开始上课；为提高指挥水平，增强部队信心而制订的训练计划也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并已取得明显的效果。更多

的人力，物力正在被组织起来，为参战部队提供后勤服务和战斗支援。如果时间允许，韩国陆军可以成为一支在远东的不败之旅。

二、与韩国的关系

在盟国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战争，军事行动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正如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在中国的各次战役中所发现的那样，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似乎与前线的压力成反比。如果战斗激烈，外部危机占统治地位，国内政治的作用就下降，不引人注目。但是僵持着的战争却使国内党派纷争公开化，解决这类战争问题通常需要采用谨慎的外交手段。在停火期间，南朝鲜的局势即是如此。这将给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又竭力要缔结和约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带来许多棘手的难题。

刚刚开始谈判，李总统和他的政府就反对同共产党人签定一项妥协条约。他们不愿恢复战前令人不满的原状，它认为在韩国目前占优势的兵力情况下统一朝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只要会谈尚有微小的进展，他们就缺乏充足理由采取过激行动。在8月谈判中断期间，一位韩国发言人直言不讳地表示欢迎事件的这一转变，并且声称共产党人纯粹是利用谈判为他们集结军事力量做掩护。

9月20日李提出与敌人谈判的条件——共产党人只有承认战败才能接受的条件。首先，中国人应从朝鲜撤出而且要解除北朝鲜的武装。在此之后，北朝鲜将在朝鲜国民议会中享有自己的正式席位。这样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韩国总统认为，应该给共产党人规定一个接受这些条件的最后期

限，否则就应立即停止谈判。在他看来，敌人正在利用谈判，使美国在共产主义世界面前蒙受耻辱，信誉扫地。

10月谈判复会后，韩国政府以多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们最常用的办法是举行类似学生11月初在釜山举行的那种“自发”的抗议集会。那次有近500名学生手举“不统一就不停火”的反停火标语，游行穿过市区。每当板门店似乎有可能达成协议时，韩国都会及时地发动这种“群众性”的反对停战会谈的抗议集会。

韩国政府不断地煽动群众示威和李承晚暗示他的政府有可能不遵守停战协议的规定惹恼了李奇微将军。人们也许还记得，联合国军司令部对韩国部队的控制来自于李承晚1950年6月写给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授权麦克阿瑟或他所委托的任何人仅仅在战争期间指挥韩国部队。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韩国政府忠实地遵守了这项保证，无人认为有必要为此签署一项严格的条约。但是，1952年初，李奇微感到应该得到一份适用于停火阶段的正式协定，以先发制人，防止韩国采取违反停战协议的单独行动。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在停战协议签定后继续控制韩国军队，停战就很可能短命夭折。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奇微极力主张通过政府间的高级接触，制止韩国的反停火运动，达成一项有关武装力量指挥权的书面协议。

虽然美国军政领导人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是他们怀疑目前就未来对韩国军队的控制同韩国政府谈判，时机是否成熟。此时韩国政府激情日盛，要达成一项协议，很可能导致联合国军司令部被迫接受过于苛刻的条件。因此，他们倾向于首先制定停战条件，然后再利用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存在和为韩国部队提供军用物资及训练为理由，说服韩国政府，使

其依从。

他们更倾向于建议杜鲁门总统呼吁李承晚制止韩国境内对停火的大肆攻击。3月4日，总统通知李，美国政府为韩国对停战的态度担忧。他指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目的始终如一。偏离这一目的就会影响联合国的援助。他紧接着又发布了一项照会，提醒李：

在抵抗侵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以及今后医治这场侵略战争的创伤中，贵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继续获得的援助，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贵国政府所表现出的责任心，它保持朝鲜人民团结一致的能力，以及它对民主理想的忠诚。

总统强调韩国的行动与联合国援助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对李和他的同僚产生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爆发期间，美国为南朝鲜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战争开始时，又是美国率先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为千百万颠沛流离的难民和伤病员提供食品、衣物和日用品。这并不仅仅是出自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且是由于认识到，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防区内如出现骚乱和疾病将使当时的军事行动复杂化。美国还定有战后立即由联合国出面主持的救济和复兴的长远规划。美国首先提出成立联合国朝鲜复兴局。该局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美国支持这个组织并为它提供了大笔经费。

尽管战争迟迟不能结束，联合国朝鲜复兴局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联合国军司令部还是于1951年初成立了由第8集团军领导的联合国驻朝鲜民援指挥部，以预防疾病引起的动乱。为保卫后方安全而成立的联合国民援指挥部，主要从事救济工作，为民众提供消费品，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停战谈判期间，前线的局势比较稳定，重建和恢复工作得以在战争尚

未结束时开始。1951年底，李奇微与联合国朝鲜复兴局的官员达成协议，允许该局在征得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后，开始执行一项有限的重建计划。

这样在战争期间和停战协议签订后的6个月中，联合国军司令部实际控制着对南朝鲜的救济工作和经济援助。毫无疑问，这样做增强了李奇微同韩国政府打交道的力量。但是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和大量美元、美货和美军涌入朝鲜，美国重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的经历。韩国不发达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在战争中全面崩溃，无力承受大笔军费开支带来的额外购买力。韩国政府为了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求助于印刷手段，大量发行货币，而它又无法增加工业生产或大量进口消费品，回笼流通领域中日益增多的货币。美国的援助对于缓和这一矛盾多少有些帮助。到1951年9月15日美国已经花费了1.5亿美元，此外还提供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交通设施和1000万美元的原材料，但是这也并没有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

韩国的金融形势到1952年1月已经危如累卵。韩国政府醉心于赤字开支，允许扩大银行信贷，加剧了通货膨胀。但是韩国官员却将主要责任归咎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满足军事需要预支了朝鲜圆。他们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如约以美元支付已经发行的朝鲜圆，并且暗示从2月起，他们将无法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更多货币。

根据1950年7月28日签定的一项协议，韩国政府应该保证提供联合国军司令部所需要的货币，由此而产生的偿还要求将推迟至双方都认为满意的时候结算。韩国政府不能履行自己义务的暗示使李奇微担忧。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能继续对韩国的外汇有所控制，他并不反对逐月以美元结算预支的

朝鲜圆。他提议，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联合国军司令部向朝鲜居民出售进口商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以最优汇率购进朝鲜圆，为韩国货币担保。此外，李奇微还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实行转帐结算，实际上不使用任何货币，这样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量。

但是韩国政府不愿让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对它的外汇的控制。双方的谈判于2月中断。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月购进了价值800万美元的朝鲜圆，而上年12月仅购进价值600万美元的朝鲜圆。李奇微要范弗里特亲自过问此事，减少使用朝鲜圆的各项开支。从1951年6月1日到1952年3月1日期间流通领域中货币量的增加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严重性——由1220亿增至8120亿朝鲜圆。

财政谈判中出现僵局，通货膨胀与日俱增，韩国对停战持反对态度，政府中围绕国内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李奇微和穆西欧大使鉴于这种情况，在3月初建议华盛顿派遣高级代表团，就联合国军司令部与韩国的关系达成全面协议。陆军部意识到李奇微这一要求的急迫性，立即着手为代表团的出发做准备。国防部和外交部很快就同意了这项建议。3月18日总统任命驻奥地利的共同安全管理使团团长克拉伦斯·迈耶为代表团团长。由于代表团受命就“财政、经济和其它适当问题代表美国或联合指挥部广泛地同韩国谈判并签定协议”，国务院同意为代表团作顾问。

谈判所取得的最后成果是联合指挥部与韩国之间于5月24日签定了一项协议。考虑到政治动乱在南朝鲜的蔓延和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热情，迈耶协议主张合理的妥协。最重要的条款是规定成立由一名联合指挥部代表和一名韩国代表组成的经济委员会，以增进有效的经济合作。该委

员会将提出紧缩外汇开支的建议，并把外汇开支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援助计划相结合。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借支的朝鲜圆，联合指挥部同意以6000圆对1美元的汇率结算1952年1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的所有借支款。1950年至1951年的借支款则推迟到以后解决。今后的借支款将以1：6000更接近实际的比率结算。韩国政府将注销月借支款额的10%，以此做为它的战争专款。此外，韩国政府还同意采取内部措施控制通货膨胀，联合指挥部也将尽可能多地运入适销商品，吸收市场上的朝鲜圆。

如果双方都真诚地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在不远的将来，朝鲜的经济形势就会有相当大的改善。至于这是否会对政治问题和停火问题也产生有利的影响则又当别论。1952年5月停火谈判再次出现僵局。虽然韩国的反停火宣传煽动已有所收敛，但是李总统和他的政界同僚之间的内部冲突却愈演愈烈，大有再次发生危机之势。总之，也许联合国军司令部刚刚解决了经济纠纷，又要被拖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是，这次谈判至少已除掉了韩国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关系中的一棵蒺藜。

三、日本的介入

李奇微在后方遇到的问题并不都是直接与韩国有关，但是很多问题都影响到在这个半岛上所发生的事件。1951年底到1952年初，在日本海的彼端又产生了新的复杂因素。自战争爆发后，美国一直把日本群岛作为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部队的巨型集结和补给基地。作为联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可以使用在他看来是适当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在日本的设施和便利条件，支援联合国军的行动。然而，1951年9月签定的和

平条约预示着将出现一个转变阶段。军政府结束了它的统治，文职官员重新获得对国家的领导权。双方必须在过渡时期做出安排，明确美国军政双方的代表同日本政府的关系，并且必须为日本提供防护。

根据9月8日签定的美日安全条约，美国有权在日本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日本有能力防卫自己为止。两国将签定一项管理协定，规定在日本布置美国和使用日本设施的具体条件。

结束朝鲜战争遥遥无期，只要冲突继续存在，美军就必须使用日本的设施和港口。因此安全条约为美军继续留在日本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需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训练和装备起一支足以保卫自己的部队。而日本宪法有关断绝战争联系的规定又使发展武装力量成为棘手的难题。

有幸的是，早在1950年中期，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组织、训练自己的防卫力量。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不得不将手下的大部分美军调往朝鲜，他授权日本官员组建一支7.5万人的国家警察后备队。成立这一组织名义上是为了维持国内秩序，但是所有应征者都接受了为期13周的基础训练，熟悉各种轻型武器，然后又参加一项18周的集训，着重进行小分队训练，在这次集训中他们使用了机关枪和火箭筒。1950年6月，警察后备队举行了营级对抗演习。6月停战谈判开始后，后备队被编组为4个各为15,200人的步兵师。但是它们没有重型装备，所接受的训练也只能胜任国内治安工作。

尽管后备队有这些弱点，杜鲁门总统还是于1951年5月批准了为它们提供物资的计划和预算，要在1952年6月1日

以前装备10个师的日本警察后备队。李奇微在研究了有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后，于9月建议分期分批地组建一支10个师，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他看来，难办的是怎样使日本的公众舆论做好准备，不因训练配有重型装备的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而哗然。此事将由日本政府处理。

正当东京方面在为扩大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做准备时，陆军部却发生了令人困窘的事件。柯林斯将军通知李奇微，由于经费短缺，可能被迫大幅度削减扩大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计划。陆军在1953财政年度预算中已经削减了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经费，从共同防御援助计划中也得不到任何经费。在这种情况下，柯林斯劝告李奇微修改他的计划，根据现有拨款，尽力而为。

李奇微惊叹不已，"真让我难以相信，在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我们竟无法找到相对很小的一笔经费，援助日本迅速地建立一支小规模的陆军……。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组建日本的军队，每花费一美元所能得到的安全保障，是同样一笔开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得到的"。他又说，唯一的选择是美国将支付比这要高得多的费用，维持在远东的美军。他认为美国没有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自己无法同日本政府进一步讨论建立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问题。如果美国有意放慢扩大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速度，那么可能恰好与日本人的愿望相吻合。但是李奇微认为建议削减拨款"十足是危害我国根本利益的一场大灾难。"

远东司令的反复请求立即在华盛顿引起了反响。到11月23日，柯林斯已经有办法减轻李奇微的忧虑。洛维特部长同意将为日本防御计划提供的30亿美元列入陆军部的预算。

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得到这个重申的保证

后，再次审定了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计划，于1952年1月1日建议，在扩编的第一阶段应首先加强诸如防空、坦克和炮兵这类非师级的战斗部队，而不是组建新的师。但是华盛顿暗示不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按目前的文本执行该计划，于是双方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文电互访。结果以威廉·马奎特少将为首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代表团被派往美国，通过讨论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经过5星期的协商，陆军和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采纳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李奇微将装备完毕4个已经成立的师，并保证使它们做好战斗准备，在今后做到召之即来。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中将增加到6个师，其中包括附属的支援部队。在1954和1955财政年度中，美国能够提供经费和装备，后备队将增加到10个师。

双方做出放慢扩建计划的决定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因为缺少经费和装备。原来日本政府根本不愿迅速重新武装本国。日本首相不同意让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人数在1953财政年度中超过11万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极力劝说日本政府将后备队增加到10—18万人，但是在1953年初举行大选之前，首相一直拒绝做出任何许诺。就此计划而言，日本人不愿迅速地重新武装自己恰好解了美国人经费不足和生产吃紧之围。因此，放慢发展一支足以防御日本自己的军队的速度，大概体现了一种可行的妥协。

与此同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可以做好准备，以适应日本重新在远东担负责任这一地位的需要。美国打算帮助日本，保证其获得可靠的原材料来源和市场，鼓励日本工业生产重新防卫自己所需的装备。为了帮助日本的军火工业起步，可以先安排在海外订购一些弹药和装备，但是陆军部认为，主

要的工作还得靠日本人自己去完成。

日本重新作为主权国家出现引起了许多其它问题。李奇微将军作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军和联合国军未来在日本的地位。和平条约批准之后，占领状态就将结束，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也将解散。李奇微希望在此之前确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和远东司令部同日本政府的关系。

9月18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略述了自己的态度，指出日本在理论上将享有全面的政治自理，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将依靠日美双方的军队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远东司令认为，基于这种军事上的现实，他应该有充分的权力抵抗任何威胁他手下的美军安全的行为，就所有军事问题直接同日本政府磋商。给他的命令应该同以往一样，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它的上级。当然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他都应同美驻日外交代表团团长配合。

军事占领即将结束。与文官管理制度一同恢复的还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美国大使在政府间交往中所起的突出作用。12月22日陆军部通知李奇微，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将他的大多数建议呈交国防部长，但是外交代表团团长处在优先于他的地位，除纯粹的军事问题外，所有政府事务都通过这条渠道处理。

2、3月间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代表详细地制定出了进一步妥协的方案，但是直到4月他们才达成了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并获得总统的同意。该协议规定由驻日大使负责两国间的所有政府关系，李奇微在军事问题上不受他的领导。远东司令可以就安全、防卫和军援事务直接与日本政府谈判，并且有权任命新近成立的共同委员会中的美方成员。

李奇微曾坚持要求他直接受命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它的

上级，现在司令官的这条渠道继续不变。正象他所期望的那样，李奇微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了挑选共同委员会中美方代表的权力。成立共同委员会是根据美国和日本1953年2月28日在东京签署的一项管理条约所决定的。在制定有关美军继续留在日本，参加日本防务的条款的过程中，为了协商怎样执行该条约，成立了由一名美方人员和一名日方人员组成的共同委员会。由于这些条款涉及到使用港口和其它设施，海关规定，税收、邮政优惠和法律裁判权等复杂问题，双方都认为有必要成立共同委员会，消除不一致的看法。

4月28日美军对日占领结束，作为客人和盟友，而不是占领者，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但失去了以往的优越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将依靠美军保卫自己的安全，远东司令和他的下属继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虽然李奇微和他的继任者丧失了许多权力，但是在日本的防卫力量能够担负起保卫本国的责任之前，李奇微和他的继任者在日本事务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重新确定了文官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随着日本减少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靠，美国大使的作用必将日趋重大。

与此同时，远东司令遇到了难题，不知日本军队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应处于什么位置。一旦爆发战争，他们是单独参战还是与美军配合？他们是归美国最高司令官指挥还是继续由自己的上级领导？两国政府至今尚未就日本保安部队的指挥权做出安排。《管理条约》仅仅规定，如果出现战争威胁，双方政府应该进行磋商。李奇微将军认为日本保安部队的发展与韩国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必须立即明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以防它们失去平衡。美国援助的这两个国家彼此怀有反感，除非双方军事力量的发展并驾齐驱，否则一方军力过于

强大，最终将导致这里的局势不稳。事态到4月底已经很明显，尽管正式出场的是日本人，美国将为他们提供押宝所需的赌注。美国人的一项任务是保证日本与本队的其它队员合作，不起内讧。

四、弹药匮乏

弹药匮乏是个错综复杂迷宫般的问题。与此相比，同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打交道的复杂性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1953年春，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举行了冗长的听证调查会，听取了范弗里特，爱德华·M·阿尔蒙中将和国防部官员的证词。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当时对造成弹药缺乏的原因和由此所造成的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现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背景缺乏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手中还存有大量军火，但是这些库存弹药的数量不均，有些堆积如山，有些数量很少。接踵而来的复员工作，匆忙地遣散了军职和文职人员。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几年，装在布袋里的火药和用代用金属制造的引信就已变质失效。陆军在训练中大量使用这批弹药，但是并没有采购弹药补充消耗掉的那部分，没有采取措施使库存弹药保持平衡。由于没有人员进行彻底的清查，军队中又在开展节约运动，人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弹药的造价很高，手头现有的数量在和平条件似乎还够使用多年。

战后的军火工业因缺少订货而一落千丈。各家厂商纷纷转产民用产品，将剩余机床抢购一空，制造在战争无暇生产而目前又供不应求的消费品。美国在1950年突然介入朝鲜争端。当时生产军火的设备利用率低，工厂衰败不振。面对当时普

遍存在的繁荣景象，商人们不愿让他们的工厂再转产军用品。另一个妨碍工厂立即转产军火的因素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朝鲜战争不久就会结束，这场战争没有为美国工业大量转产提供成功的保证。即使在中国人参战打破这种谬见之后，美国仍然执行"黄油加大炮"的政策，没有大规模地动员工业转产。

自鸣得意的情绪在朝鲜战争的初期遍布全国，美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宝贵的时间被浪费在帮助衰败的军火工业恢复元气上。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国会通过拨款后要用18至24个月才能批量生产出成品弹药。国会直到1951年1月初才通过了第一宗大笔拨款，这意味着，即便是诸事顺利，这笔钱购买的产品也要到1952年底或1953年初才能运抵前线。

在此期间，美军和韩国部队只能依靠库存的弹药作战。有幸的是，除了成品军火的供应外，还有大量零配件可供使用。战争的特征在最初几个月中表现为高度的运动战，较少使用炮兵，库存的炮弹加上现有的生产能力似乎可以维持美军和它的盟友打完这场战争。

随着战争在1951年中放慢速度，炮兵开始发挥新的重要作用。阵地战要求炮兵骚扰和封锁敌军，担负更多的战斗任务。这意味着必须提高日补充基数，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单炮预计的日发射炮弹发数。由于日补充基数决定着远东司令部的炮弹储存量，所以库存量也要增加。对库存弹药的需求增加和至少在1952年底以前不可能重新补足大量消耗掉的炮弹，构成了1951年秋度所发生的各项事件的背景。

在1951年8、9月间争夺血岭的战役中，战区炮兵的情况开始令人担忧。第2师的炮兵在战斗中发射了15.3万多发炮弹，第15野战炮营在24小时内发射炮弹14,425发，创造轻炮

营纪录。战役结束时，战区炮弹存储量锐减，但是除了对当时极缺的照明弹外，没有规定任何定量。

尽管各师都否认有使用炮火不当或浪费炮弹的现象，但是在血岭战役中有成千上万发105榴弹徒劳地倾注在敌人的钢筋水泥掩体上。高弹道发射减少了这些炮弹直接命中共军据点的机会，而且还降低了炮弹的穿透力。只有使用口径更大，命中率更高的8英寸榴弹炮，低弹道发射装有延时引信的混凝土穿透弹才能摧毁这些碉堡和钢筋水泥掩体。有趣的是，这次战役后范弗里特发布了一道命令，告诫各部队要节约使用8英寸和105毫米榴炮的炮弹，因为当时这两种炮弹都供应不足。与此同时，第8集团军司令提倡使用155毫米榴炮做为替代手段。

然而，在进攻伤心岭的战斗中，范弗里特没有对第2师的炮兵实行任何限制。由于消耗过大，出现了局部弹药短缺。例如当81毫米迫击炮没有炮弹时，只得使用4.2英寸的迫击炮。为了保证4.2英寸迫击炮弹的供应，又不得不安排去前方的空运和铁路运输。炮兵分队很快就耗尽了它们储存的弹药。这并不使人惊讶，因为攻占伤心岭的计划最初估计这是一场比较容易，耗时不多的战斗。

第1军突击队在10月的行动表明弹药短缺问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当共军集结大批炮兵，企图阻止这次进攻时，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炮兵却耗尽了各弹药供应点的炮弹，第1军不得不限制对它的炮兵分队的弹药供应。该军将领事后指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使弹药储备恢复到标准点，而且也是为了迫使各部队用掉在正常允许量以上储存的弹药。囤积弹药的做法由来以久，已经是习以为常。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或在后勤供应暂时中断的情况

下，解一下燃眉之急。

联合国军在8月至10月这段时间的遭遇与每天大量炮击所引起的局部暂时弹药短缺有关，李奇微将军决定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注意这个问题。不断撤退导致了战区炮兵的弹药储备减少，李奇微认为这暴露出，在朝鲜战争中采用二次大战时的日单炮发射率的危险性。二次大战中各部队所配备的炮兵营比在朝鲜的部队所配备的多得多，保持较低的日单炮发射率就能胜任相同的战斗任务。在朝鲜的美军炮兵部队必须提高发射频率，因为它们的火炮门数较少，而共军的炮兵却在日益增加。李奇微急切地要求增加他的8英寸、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的日供弹量，并且增加他的155毫米榴弹炮的数量。他指出炮兵与战场伤员之间的严酷联系：

无论迄今为止我们在朝鲜的战斗中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炮兵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共产党人的死神，美国和盟国士兵的救星。弹药供应点的炮弹堆与尸体登记集中点的尸体堆有着直接的联系，前者越大，后者越小，反之亦然。

增加大口径的榴弹炮和其它火炮仅仅是李奇微的要求的一部分。如果得到这些火炮，他希望尽快将炮弹储备从75天增加到90天。他将把储备在朝鲜的供应量从30天增加到40天，在供应线上保持20天的供应量，只在日本保存30天的储备。就在李奇微提出这个要求的同时，他通知范弗里特，第8集团军在11月必须依靠自己的弹药供应作战。重新恢复战区的弹药储备要用相当长的时间，“绝不可幻想要求补充弹药的请求获得批准，但是一旦库存出现不足，这些弹药就会被运来。你们目前的弹药来源和预计的弹药来源同上文所提到的情况一样。增加弹药供应在本战区是力所不及的。”

李奇微的要求在10月20日获得批准。当然这没有立即改

善他的弹药供应局面。但是，由于结束了秋季战役，双方就分界线开始谈判。战线比较稳定，战斗的激烈程度也有所缓和。近期内有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使范弗里特在12月初极力争取李奇微同意将他的弹药储备从30天增加到45天。范弗里特唯恐共产党人会将在目前水平上冻结弹药储备的条款写进停战协议。他认为不如在此之前先扩大自己的弹药储备。

1951年底弹药问题又有了新的变化。显然夏季战役和秋季战役中消耗的弹药记录引起了李奇微的关注，使他深感不安。虽然对消耗了的弹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已为时过晚，但是远东司令仍然断定出现这种惊人的高发射率“或是由于肆无忌惮地浪费炮弹，或是由于滥用炮兵，或是由于二者皆有。”炮弹消耗过多对美国的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原材料供不应求。李奇微告诉范弗里特要不间断地监督各部队，以防重蹈覆辙。

这是一个严厉的指责，范弗里特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他不认为自己的部队有浪费或滥用炮弹的行为，反对不加分析地将朝鲜战争中的炮弹发射率与二次大战时的发射率相比较。他说：“根据二次大战时在欧洲的标准，我看第8集团军大约缺少70个野战炮营。当在前线配备的野战炮营每英里的密度大幅度下降后，要获得所需的炮击效果就需要提高单管发射率。4营炮兵一次齐射的威力远非1营炮兵4次齐射所能相比。”他承认在进攻中没有限制使用炮兵，但是又反唇相讥地提醒远东司令，如果他在夺取这些目标时限制使用炮兵，第8集团军的伤亡人数会大量增加。最后，范弗里特坚持说，他一直密切注视着弹药消耗水平，在10月到12月间，他已经储存了数量可观的炮弹。

李奇微与范弗里特之间的信电往来反映出远东司令部对

弹药供应情况的担忧与日俱增。华盛顿的后勤官员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希望，1952年年底以前，各种一直供不应求的炮弹的供应情况不会好转。在冬季，追击炮，8英寸大炮和15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也不象过去那么充足。大口径火炮的炮弹供应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善。

1952年初，从拨款生产弹药到成品发货之间所需的时间拖得更长了。虽然已经签定了数十亿美元的合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获得成品还得半年或更多时间。在这期间远东司令部比过去更难向议会和美国公众解释缺乏弹药的原因。尽管朝鲜前线战事不紧，而且部队也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炮击，但是柯林斯将军仍然觉得炮弹消耗太大。他指出1953财政年度中陆军申请的35亿美元采购费里有25亿必须用于购买弹药。柯林斯请李奇微调查一下，如果不重新开始大规模的战斗，是否应该立即大幅度地减少炮击，保持低消耗。李奇微把这个难题交给范弗里特解决。

就1952年初几个月中创伤敌人的数字之小而言，第8集团军炮兵的弹药消耗量显得很高。但是范弗里特当即提醒李奇微，第8集团军在冬季所使用的弹药还不到分配给他们的60%，按照目前的发射率，第8集团军在1952年将消耗价值7.5亿美元的弹药。重型追击炮弹的供应已经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再减少了。范弗里特又说，如果要强制节约弹药，他唯一可以减少的是封锁炮击。第8集团军的任务中有66%是封锁敌军，19%是还击，15%是打击敌人的进攻。李奇微准备命令各军军长将封锁射击减少20%。他所能做的仅此而已。

李奇微4月9日答复柯林斯，他已经将1952年的弹药消耗预算增加到略多于10亿美元。报告了范弗里特即将减少20%的封锁射击后，李奇微指出问题的实质：

"在我看来，人们为了追求节约往往掩盖了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因素。我们在朝鲜是处于战争状态，必须供应充足的弹药，满足最低的消耗和储存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节约就不成其为应该考虑的因素。否则只能以牺牲性命节约美元。"

事情到4月底已经明朗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大批库存弹药既是福源又是祸根。这批弹药提供了美国赖以维持朝鲜战争的大批应急之物，但是这批弹药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却无人注意。正是这些库存弹药使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盲目乐观情绪。认为这是一场短期战争的想法助长了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使人们容忍了延缓重建军火工业的作法。战争爆发后，没有动员工业生产导致争取弹药的斗争遇到更多的困难，使形势恶化。与此同时，暴露出弹药储备不平衡的问题。1951年中开始炮战后，主要是缺少迫击炮弹和榴弹炮炮弹。1951年底至1952年初被报刊引用的弹药计划耗资极高，反映出战争放慢了速度。这成为降低弹药消耗的理由。降低日发射率将缓和基本弹药储存量减少的矛盾。但是限制日弹药发射数引起前线将士报怨，并引起国会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注意。

在这场关于弹药问题的自由辩论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时间不足是最难克服的困难。弹药危机将一直持续到生产规模不但能够满足战斗需要而且可以充实库存为止。1951年冬和1952年春实行的定量供应是缓和日益减少的库存与新产品供不应求这个矛盾的权宜之计。在完成工业转产之前，弹药不足将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采取权宜之计也在所难免。

1951年和1952年的弹药形势清楚地表明，即使是打一场

小规模的战争，没有坚实的正在迅速发展或能够迅速发展的生产基础是多么不利。为了填饱远东司令部的辘辘饥肠，美国耗尽了国内储备，并不得不削减对驻欧洲美军部队的供应。扩大这场战争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场灾难性的悲剧，因为无论怎样努力，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时间这个无价之宝。

有幸的是，共党分子同联合国军司令部一样，不愿加剧战场上的争夺或扩大战争规模。看来只要战斗继续保持这种平稳的步伐，美国的弹药供应就足以维持现状，直至军火生产重新振作起来。

五、宣 传 攻 势

1952年初前线普遍存在厌战情绪，但是这仅仅限于前线，没有影响后方争取世界舆论支持的斗争。舆论宣传在1951年夏秋两季已显示出它的威力，共产党人因此再次开始加强他们的宣传攻势。板门店谈判中暴露出双方的看法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基本分歧。敌人故伎重演，制造了一系列新的“事件”，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施加压力。

尽管已经出现了数起违反中立区规定和双方在板门店地区护送车队协议的事件，敌人在12月到1月间的反应一直是温和的。12月11日，由于领航错误，一架B—26轻型轰炸机扫射了开城防区内的一辆卡车。1月17日另一架飞机的驾驶员误将一枚炸弹当作副油箱投在开城。第二天，护送共产党代表去板门店的车队，在驶近开城北面约18英里开城河上的一座桥梁时遇到一次预定的空袭，有一辆卡车被击毁。敌人接受了我方对这些事件所表示的歉意，没有利用它节外生枝，大做文章。

2月间板门店谈判在讨论协议的第三、第四条时陷入僵局，有迹象表明将开始一场新的宣传战。苏联代表雅各布·马利克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虽然以前也有这种指责，但是这次是由马利克亲自出面，似乎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的指责在华盛顿引起慌忙，因为这可能是一个警告，表示共产党人自己正在准备进行毒气战；此外，敌人可能已经发现李奇微命令他的部下组织，装备和训练各部队，以防受到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武器攻击，并由此推断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在准备采取新的战争形式。李奇微的命令不过是例行公事，而敌人却无法确信这仅仅是例行公事。

很明显，共产党人极为谨慎，他们力图排除打一场化学战争的可能性。其实远东司令部根本无法发动化学进攻。首先，在战区无法储存化学毒气。其次，在远东的部队至少缺少5万套防毒面具。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常常丢弃装备的防毒面具，在朝鲜没有把防毒面具发给士兵，而是储存在兵站。这些兵站在24小时内即可将防毒面具发到士兵手中。远东司令部既没有打化学战的武器，又缺少防化学装备，事实雄辩地反驳了共产党人的指责。但是，就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无论多么站不住脚的谎言都要留下隐患。

毒气骚乱还没有完全平息，敌人又在另一条战线上发动了全面进攻。2月下旬，莫斯科，北平和平壤的电台广播公开指责美国在朝鲜和满洲里进行细菌战。敌方各报纷纷捡起这条消息，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如何播撒带菌昆虫，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大炮怎样向共产党地区发射装满带菌物的炮弹。一篇配有插图的文章“证实”，2月17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架飞机在平壤北面投掷了一枚细菌弹，里面装满可以在

冰天雪地里生存和飞舞的可怕的带菌苍蝇。

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判断，共产党人不仅力图通过这种宣传战诋毁美国，而且企图以此掩盖他们在预防和控制流行病方面的无能，在中国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同情者中煽动支持朝鲜战争的热情。1951年北朝鲜曾出现大面积流行的斑疹伤寒、霍乱、伤寒和天花。敌人估计这些疾病很可能还会再次流行，迫切期望找到一只替罪羊。

尽管国务卿艾奇逊和其它华盛顿官员都断然否定有使用细菌武器的行为，但是有迹象表明，一些亚洲国家正在听信敌人的宣传。宣传攻势日趋激烈，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开始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指示李奇微一旦共方在板门店提出这个问题，要尽力明确否认。与此同时，国会向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表示美国欢迎由一个公正无私的机构全面调查共产党所提出的指控，以揭穿敌人虚伪的宣传。国际红十字会于5月中旬接受了美国的邀请，但是共方认为该组织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理人，不是公正无私的机构。共产党人同该组织的代表打交道的希望很少。

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暗示，要在另一个领域开展反对细菌战的运动。他在一次广播讲话里含蓄地说，一旦抓住在中国上空投掷细菌弹的美国空军人员，中国人民将把他们作为战争罪犯对待。对于这样的威胁空军不能置若罔闻，不加反驳。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发布一项强硬的声明，坚决要求共产党人承担公正对待战俘的义务；同时他可以再次否定这些指控，并且警告敌军不得以有流行病为借口，虐待俘虏。陆军部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认为，这可以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宣传上获得主动，转守为攻。

在李奇微起草这项声明的同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上

动提出为北朝鲜派遣技术人员，帮助他们同疾病和瘟疫作斗争。美国当即同意世界卫生组织直接就此同共产党人联系。如果敌人拒绝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队，人们就会怀疑他们提出的指控，并谴责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

共产党人的宣传攻势在3、4月间愈演愈烈。他们不断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在北朝鲜和中国境内播撒带炭疽病菌的蜘蛛、蚤子、硬壳虫和带鼠疫病菌的田鼠，甚至说有带毒药的蛤蟆。但是共产党人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派人调查这些事件，拒绝这两个组织帮助他们控制疾病的蔓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他们以后的宣传效果。几个月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俘营里一直酝酿着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共产党人即将得到更强有力的宣传武器。

第十一章 巨济岛

战俘营里的形势直到1952年5月才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但是在此之前就有大量迹象表明战俘营里存在着潜在的危险。骚乱、示威和暴力现象在关押共军的战俘营里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通过谈判很快就能达成停火协议，因而无须采取严厉措施的想法促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执行了拖延政策，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缺少强硬手段，致使共军俘虏愈发得寸进尺和更加蛮横，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放松了控制，敌军俘虏在那里计划发动一次突然袭击，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全部战俘问题上来。

战俘同俘获者进行一系列争取平等权利的交涉。这些转变是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开始的。

一、播下种子

突袭仁川以后，第8集团军继续向前推进，北朝鲜陆军开始溃退。在高速行军中，大批敌军被俘押往后方。从1950年8月，俘虏从不到1000人上升到同年11月的13万多人，遗憾的是事先对此几乎毫无准备，一时没有地方关押这么多的俘虏，也没有被服和粮食。更糟糕的是没有足够的兵力看押这些俘虏，被派出执行这项任务的士兵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在

以后的几个月里，治安部队数量不足，素质不高一直是使战俘营司令头痛的问题。

战俘被关押在釜山附近时，在北朝鲜被强征入伍，又被联合国军俘虏的前韩国人往往在临时战俘营里充当各级领导。这些前韩国士兵宣誓要反对共产主义，一般都赢得了韩国看守的好感，并能获得有实权控制的地位。

1951年1月战俘总数达到13.7万人。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将被俘人员隔离到朝鲜南部沿海的巨济岛。但是在转移之前，南、北朝鲜战俘被分别关押，许多战俘营里因此突然失去各级领导，出现了权力真空。

治安问题在巨济岛上比较好解决，但是要在岛上施工必须克服大量困难。岛上几乎没有天然水源。第一任战俘营司令哈特利·戴姆上校不得不修筑水坝，积蓄雨水，为11.8万本地居民，10万难民和15万战俘提供生活用水。联合国军司令部于1月开始修筑第一道战俘营的围墙，月底就有5万多名战俘从大陆转移到巨济岛。

顷刻间在该岛北端石砾遍野的两座山谷中就建成了各含8个战俘营的四道围墙。原定每个战俘营关押700到1200人，但是各战俘营很快就被塞进了5倍于设计关押量的战俘。岛上可以利用的土地极为有限，战俘营之间的空地不得用来关押战俘。这样做虽然不必增建各种设施，也不必增加看守人数，但是却使拥挤不堪的战俘营里的管理工作复杂化。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块窄小的地域里，各战俘营之间仅仅用刺铁丝网分隔开，他们能够自由地交换思想，有机会策划和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暴乱。守卫部队人数有限，战斗力一般都不强，难以在事端初起时恰当地加以控制，事发之后就不可收拾。即将停火，很快就能解决战俘问题的希望时隐时现，联

合国军司令部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纠正这个错误。

应该指出，在巨济岛战俘营成立后的第一个月中，岛上时有骚乱现象而且爆发了几起抵抗运动，这些早期发生的问题多数都可以归咎于大量使用了韩国卫兵。他们和北朝鲜战俘互有怨恨，动辄就谩骂威胁大打出手。出现这种紧张局势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战俘领到的给养比卫兵的好。但是后来对此进行了调整。美军治安部队不懂或几乎不懂朝语，而且不愿意干预这种两败俱伤的争端，他们是在不利的条件下采取行动。然而，卫兵与战俘之间的流血冲突还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签署有关战俘问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但是自愿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然而日内瓦公约旨在保护战俘的权力，完全没有预料到象1951年到1952年间巨济岛战俘营中滋生出的这种战俘集团。他们有组织，顽固不化。它没有为俘获国处理战俘抵抗这个棘手问题提供保护。各签约国在条约中详细地写出了对战俘的优惠条件和对俘获国的限制，热心地保护战俘，使他们不吃苦，免受不公正或野蛮的待遇。但是他们明显地无法想象出战俘组织起来对俘获国构成威胁时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军司令部每次以武力对付战俘的暴力行为都使自己倍受指责。尽管战俘一再寻衅闹事，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却似乎成了虐待毫无反抗能力的战俘的武装暴徒。共产党人借此大做文章。

开城谈判之前，战俘公开的抵抗活动和大吵大闹的行为都是无计划的。谈判开始后，战俘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取决于谈判结果。很多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害怕再回到共产党那边去，而其他期待着被遣返的战俘则明显地倒向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被派到前线的北朝鲜特工人员故意

让自己被俘，以便潜入战俘营。他们能通过难民，当地居民和游击队与总部保持联系，随意计划，组织和制造战俘事件。战俘在营地里使用可视手段传递消息，在各营地之间，他们或是投掷石块或是口头联系。战俘营医院成了情报交换所，是共产党人的一个抵抗中心。北朝鲜特工人员在战俘营里握有实权，但是他们通常都隐蔽在徒有虚名的指挥者背后，小心行事，力图隐瞒自己的身份。在幕后指挥这些特工人员的不是别人，正是出席停战会谈的北朝鲜首席代表南日中将和李相朝少将。板门店与战俘营之间的密切联系再次证明共产党人是无休止地以各种手段向谈判施加压力。

正当共产党人力图夺取对战俘营的控制时，非共产主义者发动了一场防卫性的反抗斗争。原中国国民党士兵和北朝鲜反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的对立面发生了流血冲突。一旦他们不能互相说服对方，双方立即诉诸拳棒，甚至使用自制的武器。战俘组织了“袋鼠法庭”（译者注），审判不听调遣的战俘。他们审判的速度很快，一般都是判处死刑。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人员在夜间不进入战俘营，战俘往往不是不敢揭发就是不愿揭发，所以，打人凶手和杀人凶手都逍遥法外，不受惩罚。应该提到的是，即使有时被殴打的战俘愿意出庭作证，战俘营司令也无法起诉凶手，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不允许用司法手段对付战俘中的罪犯。战俘营司令部被剥夺了这个整顿纪律的手段，被迫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管理战俘。

上级机关不自觉地加剧了战俘营里的不满情绪。为了让战俘进行有益的活动，1951年执行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即是一例。方向课成了共产党人攻击谩骂的对象。尽管这些讲座完全是自愿参加，但是它们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与共产主义的谬误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人对此表示强

烈抗议。而教育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战俘学习职业技能，掌握获释后的生活手段。共产党人乐于学习金属加工技术，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制造各种武器，而不是生产卫生器皿、火炉或花匠工具。一有机会，他们就用这些武器夺取战俘营内的控制权。

一个自封的人民法庭在1951年9月杀害了15名战俘。当月19日，78号营地发生暴乱，有3人死于非命。为了恢复秩序，转移面临死亡威胁的200名战俘，必须立即调来紧急增援部队。由于战俘营里的骚乱与日俱增，负责所有战俘营的第二后勤部请求范弗里特增派保安人员。第二后勤部参谋长指出，由于旷日持久的监禁，前途不测和共产党人的反宣传和对教育计划煽动，战俘营里的紧张局势日趋严重。他还提请范弗里特注意，守备部队的素质还远不符合要求。

范弗里特在9月的动乱之后视察了战俘营，重新组织并加强了保安力量。从1月战俘营成立到9月中旬小莫里斯·菲茨杰拉德出任司令，其间共有8位司令，几乎是一月一换。正如菲茨杰拉德事后所说，"巨济岛是司令官的坟场。"范弗里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0月组建了8137宪兵大队。除已派遣到岛上的3个营外，又有4个警卫连被调入该大队。11月步兵第23团的一个营到达巨济岛。到12月岛上已驻有9000多美军和韩国人员，但是这仍然比所需要的人数少大约6000人。

争斗的双方——共产党人和反共产主义者，在12月里大打出手，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夺取对战俘营的控制权。12月18日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石块战，紧接着又发生了骚乱和示威，有14人丧生，24人受伤。

暴力事件增多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

战俘营里开始进行甄别。负责第二后勤部的杨特将军事后对远东司令说："在开始执行甄别计划之前，美方人员可以随时进入战俘营，他们对战俘营的管理虽然不无有待改进之处，但是还能使人满意。"

有3.7万多名战俘在11、12月间受到甄别，被划为被拘留敌侨。当有更多战俘暗示不愿意被遣返或者表明他们同情反共产主义者时，战俘中的共产党人对甄别活动更加敏感。巨济岛战俘营司令于1952年1月初决定再次甄别已被定为被拘留敌侨的战俘。这时战俘营里已经是危机四伏，冲突一触即发。韩国地方工作人员再次单独接见战俘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第一次单独会见时造成的差错，把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分开。

尽管战俘营里冲突事件屡见不鲜，但是除了62号战俘营里的5600人外，从1月初到2月中旬，所有战俘都受到了甄别。共产党人在这个战俘营里控制严密，拒绝甄别工作队进入战俘营。这个战俘营里的领导人声称62号战俘营里的所有人都期望着重返北朝鲜，在这里搞甄别毫无意义，纯粹是浪费时间。韩国甄别工作队要完成自己任务的决心也不亚于共产党人。2月18日凌晨，第27步兵团第3营被调来，在该战俘营正面进入阵地。四连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横穿战俘营，将其一分为四。但是共产党人面对武力警告，拒不低头。他们从临时营房里鱼贯而出，手握镐把，利刃、斧头，链枷和帐篷杆，将步兵团团围住。其他人一面投掷石块，步步逼近；一面大声嘶叫挑衅。约有1000到1500名战俘参加了进攻，士兵们被迫使用气浪手榴弹，当气浪手榴弹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时，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不得不开火射击。55名战俘被当场击毙，22人死在医院里，另有140多人受伤。

美军有1人被打死，30多人被打伤。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微不足道。无论如何，共产党人总算赢得了他们的胜利。步兵撤走了，这个战俘营没有受到甄别。

联合国军司令部担心这一事件在被传到共方的过程中会受到歪曲，就此发布了官方声明，公正地将责任归咎于该战俘营的共产党领导人。陆军部指示范弗里特要讲清楚，参加暴动的只有1500人，他们中间没有战俘，都是被拘留的敌侨。鉴于共产党代表必将在板门店就此提出抗议，专门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被拘留的敌侨可以看做韩国政府的内部事务，不是停火谈判的内容。

但是62号战俘营里那场战斗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在板门店的抗议。2月20日，范弗里特任命弗朗西斯·多德准将为战俘营司令，以整顿纪律。一周后范弗里特收到东京发来的指示：

关于对巨济岛战俘的控制。第62号战俘营最近发生的暴乱有力地说明，许多战俘营可能是由共产党人或反共产主义者的暴力领导所控制。这种颠覆性的领导极为危险，尤其是你如果命令下级在近期内大规模地甄别或隔离战俘，会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停战谈判中遇到更多的麻烦。我希望你亲自制订这项计划。兹指出再次发生暴乱的严重后果和对战俘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管理措施的迫切性。

李奇微的命令包括共产党人和反共产主义者双方，但是后者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之间有合作关系，他们只是在战俘中遇到同情共产主义者时才变得残酷无情。3月15日在这两个相互仇视的集团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狂热的共产党人用石块攻击一队途经他们营地的反共产主义者和他们

的韩国卫兵。韩国卫兵没有接到命令就开枪还击。当他们被控制住时已有12名战俘被击毙，26名被击伤，企图劝止这场枪击的一位韩国人和一位美国军官也被打伤。

对巨济岛上的战俘来说，4月是个重要的月份。4月2日共方表示希望得知如果进行甄别，愿意回到他们控制中的战俘的确切人数。这表明敌人也许愿意打破谈判自愿遣返问题的僵局。为了获得确切的数字，联合国军司令部于4月8日开始执行新的甄别计划。在此后的日子里，除关押在7个战俘营里的3.7万北朝鲜人拒绝甄别队进入外，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工作队会见了所有战俘。正如上文所述，甄别结果让最乐观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士也感到惊愕。17万军方和非军方战俘中仅有7万人表示愿意重新回到共产党方面。敌人一直期待着甄别结果会是比这高得多的遣返率。他们先是惊惶失措，继而恼羞成怒。板门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共产党人重新开始全面攻击甄别。共产党人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甄别所得出的不利结果非常忧虑，考虑到敌方谈判代表与战俘营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忠于共方的战俘营里迅速出现了同样的情绪就不足为奇了。

范弗里特在甄别战俘的过程中就通知李奇微，他正在隔离反共的战俘，把他们转移到大陆上去。他认为疏散战俘可以减少发生骚乱的可能性，虽然这意味着要增加管理人员监督和组织新建的战俘营。隔离和疏散战俘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巨济岛上由亲共分子取代了被转移走的反共战俘，这非但与事无补，反倒加强了共产党人对战俘营的控制。他们现在不必再进行两败俱伤的争斗。在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斗争中，他们确信能够得到同营战俘全力以赴的支持。主要敌对力量被转移到大陆上以后，岛上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共

产党控制的各战俘营比以前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发动一场诋毁甄别计划的有力运动。

除了共产党人控制的战俘营里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不安定外，4月初一个引起战俘不满的偶然因素又使局势复杂化。在此之前，韩国陆军一直负责按战俘定量供应各种粮食。但是韩国政府在3月通知第8集团军，他们无力继续承担这一重负。因此，范弗里特告诉第三后勤部，今后将不得不通过美国陆军这条渠道保证粮食供应。不幸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提前定货，联合国民助总部无法按规定的大米和其它粮食各占50%的比例供应粮食。4月配给战俘的定量是大米、小麦、大麦各占1/3，战俘营里因此一时怨声载道。

到4月底，在关押共军战俘的17座战俘营里，已经甄别了10座，其它7座战俘营拒绝接受任何单独谈话。范弗里特几乎确信不疑，只有使用武力，引起伤亡，才能甄别这些顽抗的战俘营。4月28日，他在制定使用武力的计划时报告李奇微，一旦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进人顽抗中的战俘营，已经受到甄别的战俘可能举行暴力示威。范弗里特预计会碰到麻烦，将步兵第9团3营调到巨济岛，加强步兵38团，并且命令步兵第15团1营和韩国的第20团在釜山集结。他采取了防范措施，打算过了5月1日就开始进行甄别。

面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暴力冲突，李奇微决定请求允许取消这次强行甄别：

这些战俘营里组织严密，必须使用近乎野蛮的武力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它们，这可能导致大量战俘伤亡。虽然我可以进行这种强行甄别，但是，我认为由于有在战俘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之间引起暴力冲突的危险，这将是不明智的做

法。而且，不利的宣传报导可能引起……，立即为共产党人提供可以充分利用的材料……

这一要求和李奇微提出的，将未甄别的战俘营里的战俘都列为希望被遣返者的计划都获得批准。由于没能同这些战俘营里的战俘逐一谈话，很可能有些人无法表达自己不愿遣返的愿望。但是，李奇微的上司认为，如果这些战俘坚决不愿回到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总会设法让人知道自己的愿望。

巨济岛上的紧张局势理应随着强行甄别的提法被人忘却而出现缓和，但是，远东司令部宪兵主任罗伯特·卓别林上校5月初视察战俘营后汇报说，在共产党人控制的战俘营里缺乏秩序，非常危险，那里的战俘甚至拒绝领取自己的给养食品。由于有可能再次发生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窘境，尤其是在板门店陷入窘境的骚乱事件，李奇微提醒范弗里特，无论是否进行甄别都一定要维持正常的秩序。实际上最使范弗里特担忧的不是战俘营里的局势，而是卓别林上校没有首先向第8集团军报告他对战俘营的印象。他在5月5日告诉李奇微，对于巨济岛的形势不必“大惊小怪”。

实际上第8集团军的将领坦率地承认，联合国军司令部官员不能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进入共产党人控制的战俘营检查卫生，监督医药供应情况和管理战俘，他们只是从外部控制这些战俘营。就此而言，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保安部队倒的确防止了战俘外逃。这样到5月7日忠于共产党的战俘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间似乎已形成了对峙。前者在战俘营里有控制权，但是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走出战俘营；后者在战俘营外有控制权，但是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进入战俘营。取消强行甄别后，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宁愿接受现状也不愿再在战俘

营里引起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态的发展将取决于共产党人的行动。

二、时机成熟

没过多久共产党战俘就开始行动了。事后的调查表明，他们已经熟悉了战俘营司令多德将军的习惯，整个春季都在密谋一项计划，到5月初计划已经修订完毕。他们不仅非常清楚多德急于缓和战俘营里的紧张局势，而且知道他经常不带武器来战俘营的出入口同战俘中的领导人谈话。多德通过这种私下接触详细地了解到战俘营里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也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在巨济岛上只有卫兵携带武器。因为总有工作队进出战俘营，所以各营门都不上锁。保安人员除非是出于自卫，或是在极端紧急的情况才许开枪射击，他们的弹膛里也不许压子弹。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绑架了几名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尽管事后当他们的要求被反映上去以后，共产党人没有伤害就释放了他们，但是这种做法已不是新鲜事了。由于以前的几次绑架证明这种做法有利可图，敌军俘虏显然决定要撒开他们的大网，捕捉一条最大的鱼——战俘营司令。他们利用他乐于接近战俘的弱点，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5月6日傍晚，第76号战俘营的一队战俘劳工拒绝进入战俘营，他们要求见该战俘营的指挥官第74宪兵营营长威尔伯·雷文中校。这些战俘对雷文说卫兵殴打了该战俘营的成员，并对他们搜身，寻找禁运物品。雷文答应调查此事，战俘们似乎很满意，但是他们要求在第二天见多德将军，讨论一些重要问题。雷文对此未置可否，因为他不愿让战俘觉

得他们可以随意召见战俘营的司令官，但是他答应向将军转告此事。

战俘们表示如果多德前来同他们会谈，就愿意登记自己的姓名并按手印。他们在陷阱里狡猾地放了一块诱饵。多德刚刚接到命令，要他编造一份包括所有巨济岛上现有战俘的准确的花名册，并弄清楚他们的身份。这样一个不流血就能获得成功的机会太诱人了，不能错过。

5月7日，刚过14时雷文就结束了同76号战俘营中的战俘领导人的谈话。几分钟后，多德驱车前来。他们同往常一样，隔着没上锁的大门交谈。共产党人先是就他们认为应该发放的食物和被服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转到政治方面，打听有关停战谈判的情况。他们反复邀请多德和雷文到战俘营里去坐，说是为了在更轻松的气氛中会谈。雷文以前曾经遭到战俘绑架、关押，所以，直接了当地回绝了邀请。与此同时，许多战俘凑到出入口周围，多德允许他们走近来听这里的对话。会谈期间，一队上交救援帐篷的战俘来到出入口，为了放他们出去，守卫打开了外面的那道门，事后也没有关严。战俘们向多德和雷文身边靠拢，似乎是要结束他们之间的谈话。突然，他们一拥而上，将两位指挥官往战俘营里拖。雷文抱住一根柱子，死不撒手，卫兵赶来用刺刀驱退了战俘。但是多德很快就被拖进了战俘营，三下两下就被搡进了一座为他准备好的帐篷。战俘们对他说这是有计划的绑架，别的战俘营如果有同样的机会也要试图抓住他。

共产党人完成第一阶段的计划后立即着手执行第二阶段的计划。多德被绑架后仅几分钟，他们就升起一面大信号旗，宣布"我们抓住了多德。只要我们的要求得到解决，他的安全有保证。如果发生开枪射击这类野蛮行为，他的生命

就危险”。接着，多德传出他的第一张便条，说他没事儿，要求在17时以前不要派部队营救他。显然多德将军认为他能在此之前说服战俘放他出来。

与此同时，多德被绑架的消息立即传给了第二后勤部部长杨特将军，并通过他传给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当即命令杨特，没有第8集团军的允许，不准以武力营救多德。杨特派遣他的参谋长威廉·克雷格乘飞机去接管巨济岛战俘营。杨特重申范弗里特禁止使用武力的命令，他对克雷格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当然，如果有人组织大规模的暴乱，我们毫无疑问要反击……。除非他们企图暴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用武力征服他们，要等待他们的屈服。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地对待这一事件，如果我们刺激他们，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次谈话处处体现出对战俘可能集体越狱和由此引起伤亡的担忧，反映了多德的上级对可能出现暴炸性局势的最初态度。大规模的暴乱意味着使用武力，产生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不利舆论。

多德在76号战俘营里同意为战俘做中间人，向外界传达他们的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他安装了一部电话。根据多德的建议，其它各战俘营的代表被带到第76号战俘营，商讨即将提交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各项要求。克洛格上校试图让一位北朝鲜的高级将领李汉其说服76号战俘营的战俘，释放多德。但是李一获准进入该战俘营就呆在里面不出来了，成了战俘的代言人。

共产党代表在7日晚开会，多德极力主张不要派部队来营救他，他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这是有根据的推测，因为如果多德受到伤害，共产党人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在这一点上，多德的请求与杨特和范弗里特的希望不谋而

合。克洛格上校正在拖延时间，他同意坐以静观。5月7日夜晚格外漫长，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彻夜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共产党人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他们不但设法绑架了多德，而且成功地利用他开始了谈判。狡猾的战俘利用联合国军司令部唯恐发生集体越狱和多德的生命受到威胁，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战俘代表第二天再次开会时，交给多德一份他们的要求。战俘提出的当务之急是成立战俘联合会，并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承认这一组织，在几个战俘营之间架设电话，提供两部汽车以解决各战俘营之间的交通问题。尽管多德无权签署协议，但是他还是同意提供大多数战俘坚决要求获得的器材设备。会议结束后，各战俘营的代表要回去向战俘传达会议内容，因而又拖延了一段时间。杨特将军拒绝让战俘代表离开76号战俘营，直到当天下午范弗里特否决了他的这项提议，他才放行。各位代表同他们的同营战俘商议后返回时，暮色已经降临在巨济岛上。

在战俘们开会期间，克拉克将军正在调来训练有素的机枪射手，调运手榴弹和防毒面具。步兵第9团乘坦克登陆艇由釜山向巨济岛开来。韩国海军舰艇包围了该岛，以防发生集体越狱。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飞机都处于戒备状态。从步兵第3师调来的第64中型坦克营B连，直奔釜山。范弗里特调美国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管战俘营，搭救多德。选择一位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解决这场危机，意味着现在将要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这场危机。科尔森在接到任命之前对巨济岛的形势一无所知，对板门店正在讨论的各项问题也不甚了解。

科尔森出任司令坚定了范弗里特的信念，现在将要采用武力手段。他给杨特的第一道命令明确地指出将要采取的各项步骤，给76号战俘营发布一道正式书面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释放多德。与此同时，通知战俘们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无权做出任何决定。如果他们拒绝释放多德，杨特将确定一个最后限期，警告共产党人，一旦使用武力，他们要为多德的安全负责。最后限期一到，杨特就将强行进入该战俘营，营救多德，夺取对战俘营的全面控制权。5月8日晚，杨特向科尔森转达了范弗里特的命令。

在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其它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多德在76号战俘营里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战俘们竭尽全力为他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允许给他送治疗胃溃疡的药物，没有对他使用任何刑罚。但是他们明确表示要毫不迟疑地用暴力回击任何以武力营救多德的企图，多德就会成为第一个伤亡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期望多德会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协定，多德决定唯命是从。

5月9日凌晨，科尔森签发了第一道正式命令，要求安全释放多德，6小时后他又签发了第二道命令。李汉其上校终于有了回音，他拒绝执行命令，说多德已经承认他有行凶暴行，“惨无人道地屠杀战俘”。李认为科尔森是新上任的战俘营司令，要求他在战俘营的会议上与多德见面。显然共产党人在同联合国司令部取得一致看法之前，不打算释放多德。

战俘拒不执行命令本应导致科尔森发出最后通牒，但是科尔森决定从大陆上运来坦克后再使用武力。这批坦克要到9日晚才能运到，所以第二天晨才能开始解决战俘营的行

动。扬特和第8集团军参谋长奥兰德·穆德少将一致同意推迟行动。科尔森决定，在此期间不再对战俘进一步妥协。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制止战俘代表在他们的营地与76号战俘营之间自由返往。

科尔森的态度逐渐强硬，联合国军在战俘营周围公开准备采取行动，共产党人对此焦虑不安，露出了紧张的神情。他们让多德问科尔森，是否可以继续会谈，有无中断的危险。他们再次保证，会议结束后，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他们将释放多德。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5月10日以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战俘们可以继续放心地开会。

战俘们9日开会时对俘获多德又有了新的看法。他们告诉这位人质，他们不但要讨论成立战俘联合会，而且要讨论在会上提出的迫害战俘的野蛮行径，以及遣返和甄别问题。我们很难确定共产党人提出自己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利用多德获得了成功，联合国军司令部又愿意谈判刺激了他们呢，还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行动——很可能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给他们壮了胆，要试试自己的运气。

战俘自己成立了人民法庭，列举了19条伤害战俘的罪行，要求多德逐一解释这些战俘死伤的原因。虽然他们通常都愿意接受多德的解释，并倾向于撤回他们的控告，但是在被关押在重兵包围下的战俘营里审判被绑架的战俘营司令，在现代战争史上还是个绝无仅有的奇观。

在共产党人审判多德期间，科尔森派步兵第38团加强了各战俘营的看守力量，并在每个重要的位置上都设置了两件自动武器。他命令38团团长小威廉·克南制定一项使用坦克、装甲车、喷火器、催泪弹，50毫米口径的短筒防暴枪等武器强行进入76号战俘营的计划，预定的进攻时间为5月10

日10时。

当天下午范弗里特乘飞机来到巨济岛召开会议。他此行之前与李奇微和刚到远东的他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讨论了局势，他们一致同意对这一紧急事件不做任何报道，禁止拍照。他们要求科尔森在攻打战俘营的战斗中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参战的战俘有和平投诚的机会。范弗里特补充说，他认为美军应首先从战俘营外用火力压服战俘，把他们赶进小型战俘营，然后再进入。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批准战俘的要求，同意他们成立战俘联合会，并为其提供器材设备。但是他提醒科尔森，为营救多德，整顿纪律，确保对战俘营的正常控制，他有全权使用各种必需的武力手段。无论这一事件的后果如何，范弗里特要求疏散战俘。他让科尔森确定对76号战俘营采取行动的时间，但是谈判阶段应于5月10日10时终止。

由于翻译过程费时耗力，对多德的审判拖了整整一个下午。黄昏时，多德见当夜显然已无法结束审判，就打电话请求科尔森将时间延至次日午时。他觉得他们会遵守诺言，会议一结束就释放他。但是第8集团军拒绝改变10时这一最后期限，科尔森将此转告了多德。正是在这时，共产党人宣称他们原打算这个会议要开10天，但是考虑到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他们将争取在次日上午结束自己的工作。

5月9日晚至次日晨，有20辆坦克到达巨济岛，进入阵地，其中5辆装有喷火器。通讯兵架设了备用线路。为容纳76号战俘营的战俘，准备了16座小型战俘营。各种枪炮都已进入阵地，并且给士兵发放了防毒面具。最后的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后，部队稍事休息。多德和科尔森在当晚最后一次通话时互相告别，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次军事行动结束时，多

德将已经不在人间。

天黑不久就下起了大雨，持续了一夜没停。天刚拂晓，浓雾又笼罩了整个战俘营。科尔森不顾天气恶劣，决心开始行动。他向杨特表示，对于共产党人会释放多德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愚蠢”的行为，他不相信他们的诚意。

但是，就在阳光冲破迷雾照射在这座局势紧张的岛屿上时，科尔森收到了共产党人的最新要求。由于多德和他都已经基本上同意了有关成立战俘联合会的11条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就此再耗费时间，而是将攻击矛头指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俘政策，要求遣返战俘，反对甄别。下面是战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的全文：

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对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你们应根据国际法保证战俘的人权和个人生活。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自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调查甄别。

4．立即承认由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代表组（委员会），你方司令部要与它密切合作。这个代表组在收到你方宣布对上述各款令人满意的解决后将交还美国准将多德，我们将等待着你方热情、真诚的答复。

共产党人的目的现在已十分明显，联合国军司令部若承认头三条要求的合法性，甄别工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在板门店坚持的遣返政策都将信誉扫地。如果联合国军司令

部是象战俘指控的那样，在战俘营里违返日内瓦公约，实行恐怖统治，那么世界各国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它所公布的甄别数字呢？

科尔森已经向76号战俘营发出最后通告，要求他们释放多德，但是由于收到了这4条要求和另外两份情报，他又变得踌躇不前。情报表明，其它所有战俘营都已做好准备，一旦他发动进攻就集体越狱，似乎是为了证实这条情报的可靠性，战俘营附近的村庄也都空空如也。双方都将可能遭受重大伤亡，多德将军的性命难保，促使科尔森下定决心。由于战俘提出的指控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他和杨特通话，告诉他科尔森可以直接通知多德，这些控告与事实不符。科尔森愿意承认战俘联合会，但是他无权决定遣返问题。科尔森认为，如果杨特能够获权取消战俘注册登记甄别，他可以做出战俘所能接受的答复。穆德将军觉得可以停止战俘注册登记甄别，批准杨特自己酌情处理。

共产党人自然要求科尔森做出书面答复，这样就绝无可能在十点钟以前结束谈判。由于某种原因，科尔森所能找到的译员翻译得又慢又不准确，延长了谈判的进程。科尔森不顾一切地推迟采取行动，答复战俘提出的要求：

1．关于来涵之第一条。我必须告诉贵方，我们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犯过任何你们捏造的过错。我可以向贵方保证，我们将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战俘在这个战俘营里可以期望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

2．关于贵方提出的第二条，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一事。这是板门店谈判正在讨论的问题，本人无权对此做出决定也无法施加影响。

3．关于贵方提出的第三条，强行甄别一事，我可以通

知贵方，在多德安全获释后，这个战俘营里将不再强行甄别，也不试图进行任何核实花名册的甄别。

4．关于贵方提出的第四条。我们不反对由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组成一个组织或委员会，并且愿意在多德获释后，尽快讨论有关细节。

科尔森又补充，必须在12点以前释放多德，不准拖延。

科尔森的答复除了第3条中“不再”一词外，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共产党人拒绝接受这个答复，拒不释放多德。共产党人决心从联合国军司令部获得更多的好处再交出他们的王牌。双方从早到晚讨价还价，战俘对科尔森答复的措辞咬文嚼字，争论不休。

巨济岛上双方围绕具体措词唇枪舌剑，不善罢干休，李奇微和范弗里特越来越难于搞清正在发生的情况。在上述4条传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总部之前，李奇微曾企图制止科尔森做出答复，但是已经为时过晚。他意识到承认战俘提出的指控将带来的舆论后果，但是范弗里特向他保证，科尔森的答复不带有任何承认犯有不合法行为或应该受指责行为的暗示。天色渐晚，东京还没有接到有关科尔森与共产党人谈判的报告，李奇微变得烦躁不安。他抱怨没有从巨济岛发来的消息，指出一旦科尔森接受了战俘的要求，将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事业带来无法计算的损失。“我至今仍未能得到一份你战俘营司令对共产党人的最新要求采取了什么措施的及时准确的报告。我因此极为不便进一步下达命令。”

实际上范弗里特所了解的情况并不比李奇微多。科尔森忙得不可开交，就连杨特也无法完全了解事态的每一步发展。最后期限12点钟到了，双方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多

德给科尔森打电话陈述战俘的理由。他争辩说过去有过战俘被杀害的事件，但是科尔森的回答对此一概予以否定。多德承认最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措词。但是这些困难不解决，共产党人是不会释放他的。多德在电话上将自己的想法和坐在他身边的战俘领导人的建议告诉科尔森，以便他以战俘所能接受的形式做出答复。他又主动要求写进战俘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改动部分。科尔森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将战俘的反对意见向杨特做了大概汇报。

科尔森在第二稿仍不能满足共产党人的要求后，企图明确地同意他们的要求，以杜绝任何进一步拖延的借口：

1．关于贵方信中第1条。我承认发生过联合国军部队打死、打伤战俘的流血事件。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原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我将在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杜绝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如果今后发生类似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2．关于贵方来函之第2条，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一事。这是板门店谈判正在讨论的问题，我无法控制或影响和平谈判将做出的决定。

3．关于贵方来函之第3条，强行调查（甄别）一事。我可以通知贵方，多德将军安全获释后，这座战俘营将不再强行甄别战俘，不再征集战俘人伍，也不进行任何核准花名册的甄别。

4．关于贵方来函之第4条。我们同意根据被我批准，由多德将军同意的各项细则，成立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小组或委员会。

由于翻译和讨论这些修改部分耗费了大量时间，释放时间被推到晚上20时。

到傍晚时战俘才研究完最后的译文。共产党人企图在这出被杨特称之为“喜歌剧”的事件上再最后添上一笔东方色彩。他们想再扣留多德一夜，以便第二天早上举行一个小型仪式。为了表示感谢多德所做出的努力，他们要用花朵装扮多德，护送他到战俘营出口。但是科尔森已经受够了，不愿再做任何退让。他要求根据协议，当晚就放多德出来。共产党人已经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他们认为可以做出这个让步。20时30分，多德走出了76号战俘营，他当即被带走，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这出充满悲剧泛音的喜歌剧因释放多德而达到高潮，但是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引人入胜。然而简要地分析一下该事件也许有益于我们讨论它所造成的影响。

毋庸置疑，在这次绑架发生之前，李奇微和范弗里特清楚地了解巨济岛上的形势。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已有几星期被禁止进入许多战俘营，这里可能发生暴力事件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远东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都清楚，巨济岛象一位慢性阑尾炎患者，迟早都必须接受彻底治疗，可是他们宁愿等病情转为危急时再动手术。

既然战俘已经明确地制定了绑架多德的计划，他们也许最终总是会抓住他的。他要保持与战俘之间的联系就难免要遭他们绑架。除非他使用武力把战犯领导带出战俘营，他要么自己找上门去同他们谈话，要么断绝与他们的联系。考虑到多德命令对所有战俘造册登记并按指纹，但是他又不愿意使用武力，他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如果加强保卫措施，在大门上锁，谈判期间在多德与战俘之间设置一道卫兵隔离层也许能防止发生这次绑架事件。但是多德却对此掉以轻心，过分信任战俘的真心诚意。

事实上绑架多德事件本身也许并不重要。共产党人完全是由于巧妙地利用了多德这个人质，并且威胁要举行集体越狱，为绑架做后盾才得以如此大胆地敲诈勒索。尽管岛上有11000多名受到坦克和其它武器支援的武装部队，尽管李奇微和范弗里特有指示，如果不释放多德就使用武力，共产党人还是胜利了。一个已开始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军事问题变成了按俘虏条款解决的政治问题。共产党是从不放弃他们所取得的主动权的，他们以大规模抵抗作为威胁的武器，成功地制止了动用武力，并且利用了科尔森想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

在谈判的最后一天里，多德作为中间人的作用变得更为举足轻重了。由于推迟行动带来了新的生机，他热情地帮助制定接受俘虏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他极力主张科尔森在有争议的条款上做出让步而同意共方的立场。时间紧与翻译的匆忙则加大了含混不清的程度。很显然，共方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知道多德和科尔森对防止伤亡要比对否认政治和宣传有利于敌人感兴趣得多。

遗憾的是，这种匆匆进行的继续谈判使上级司令部得到的情报减少了，很可能被对方抓住了某些易被歪曲和曲解的谈话。结果证明，科尔森以多德的生命作为宣传武器，这对共方来说，要比其战俘的生命有价值得多。

如果不提与多德事件相联系的两个问题和随之而发生的事件，就此结束那将是不公正的。要是动用了武力，显然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第一，共方很可能对控制的联合国军俘虏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共方在这些谈判中达到的目的很可能会削弱战俘集中营后来的抵抗。虽然很难对上述可能情况之重要性做出判断，但也不应忘记或忽视它们。

三、苦　果

尽管范弗里特想贬低科尔森之来信的价值，但克拉克及其在华盛顿的上司们对此则非常重视。他们意识到，共产党肯定会利用不利于美方的种种解释。例如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的话，意味着战俘在过去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不再对本战俘营中的战俘进行强行甄别或不予重新武装”的保证将给人留下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因为从来就没有重新武装过俘虏和已经停止了强行甄别。

由于新闻界急于发表这方面的消息，克拉克决定发表对该事件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谈到了战俘的要求和科尔森的答复。多德还同新闻记者见了面，简述了自己被俘及被释放的经过。对事件及信件的反映对我们很不利，而共产主义者在板门店的代表又抓住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大肆宣传。

杨特在第二后勤部建立了一个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组，结果发现，多德和科尔森是无可指责的。但范弗里特并不罢休，他认为多德指挥不利，他当时对科尔森的建议也不适宜，因此范弗里特建议对多德采取行政措施，对科尔森应给予处分。克拉克更加严厉，他建议将多德和科尔森降为上校，给杨特行政处分，因为他未能发现科尔森声明中的各种错误说法。国防部采纳了克拉克的建议。

虽然对与事件有关的主要人员都及时作了处理，但并没解决如何处理科尔森声明本身的问题，也未触及存在已久的集中营战俘问题。尽管华盛顿的头目不想否认科尔森信件这一事实，他们却指使克拉克否认信件的确切性。原因是：首先信是被迫写的，其次科尔森无权接受共产党违反原则的各

项要求。第一点是事实，而后一点很值得研究。

柯林斯知道只是否认应付不了新闻界，于是他在5月27日授权克拉克发表了一条简短、纯报道式的消息。柯林斯参谋长认为联合国军一贯遵守日内瓦公约，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定期进入战俘营。他指示克拉克在报道中强调这一点，还应着重指出事件是由狂热的共产党顽固分子引起的，报道的结尾应说明远东司令部正在采取的各项措施。

巨济岛骚乱后，联合国军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贯态度强硬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首次披露釜山的第10战俘营为战俘医疗地，当谈到病人和其他细节时还透露，对第1、2、3战俘营的3500人尚未进行甄别隔离。为了抢先行动，战俘营司令约翰·博斯蒂克在5月11日通知战俘，只在新的战俘营供给水和食物。他打算在新的战俘营对战俘进行全面审查，将病人隔离起来。第3战俘营的战俘无视布置在三个战俘营周围的三个步兵营，提出了先经过谈判才能接受审查和转移。博斯蒂克拒绝会见第3战俘营的代表，其他两个战俘营对他的命令未提异议。

一个似乎安静的夜晚之后，战俘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写了标语牌，挥动着旗子，高唱着爱国歌曲开始了示威。15团的士兵手持刺刀枪包围了战俘营，坦克也出动了，但并未进行大搜查。

示威者不顾其他战俘的反对，拒不服从博斯蒂克的命令。5月12日晚，第3战俘营里有人准备了沙袋，但事态并未扩大。第二天，扩音器里反复叫喊着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并说明已在新的集中营里为战俘准备了饭食、香烟，但战俘们对此置之一笑。

14日，一些士兵放了几发流弹，战俘们向他们投掷石

块，但僵局并未打破，为此，范弗里特同意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会见战俘。第1战俘营的战俘首先要求会见红十字会的代表，其他集中营随即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同红十字会的代表见过面之后，战俘们略有稳定，但仍不想服从博斯蒂克的命令。5月15日，杨特征得博斯蒂克的同意后，决定暂不进行审查，先控制局面，在板门店达成协议前，对未经审查的战俘先不予登记。于是，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5月17日，博斯蒂克与第1战俘营的代表达成了协议，该集中营的战俘同意在不经审查、不附带其他条件的前提下转移到新的战俘营。

范弗里特原指望其他战俘营的战俘会按照第1战俘营的方式同意转移，但事实并非如此，5月19日，范弗里特决定使用武力。第二天早晨，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步兵进入了第3战俘营，准备镇压战俘的反抗。战俘们手持石块、链枷、削尖的帐篷杆、钢管和大刀边喊边骂着迎敌。士兵们表现了良好的战斗素质，他们用催泪弹冲散了战俘的队伍，把战俘驱赶到一个角落，然后强迫他们转移。结果11名战俘死亡，29人负伤，联合国军中只有1名美国士兵受伤。第2战俘营的战俘慑于第3战俘营的情况，5月21日当他们转移时没进行反抗，双方均无伤亡。

多德事件后，对战俘是否进行审查成为次要问题，范弗里特最关心的是如何重新控制各战俘营。5月中旬，他让参谋部认真分析了形势，5月16日参谋部提出了三条建议供选择。一，将全部战俘转移出朝鲜。二，将战俘在朝鲜内疏散。三，将第1、2战俘营合并，把多余的战俘疏散。如果把战俘全部撤离朝鲜，第8集团军司令便可以腾出手来把精力集中在主要工作上，同时还解除了后顾之忧。如果采纳第三条

建议，部分转移战俘后至少可以减轻第8集团军的压力。开始范弗里特打算采纳第一条建议，后来觉得第三条更合适，因为在朝鲜境内将战俘疏散更容易控制，当然，这会增加后勤和安全部门的负担。克拉克也不同意将战俘撤离朝鲜，他指示范弗里特尽快实行疏散方案，并表示愿意派遣187空降团的战斗队协助，如果需要还可增派坦克支援。

除了加强巨济岛的武装力量外，范弗里特还打算在战俘转移之前在各战略要塞设置路障和关卡。新的战俘营将设在巨济岛、济州岛及大陆上。范弗里特计划建24个战俘村，每个村容纳4000人，各村之间至少相距1英里半。村内每个战俘营不超过500人，各战俘营之间设双层栅栏或铁丝网。整个工程完成后，范弗里特将设法诱使战俘代表带领其他战俘转移进去。一旦遭到战俘的反抗，范弗里特觉得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他将断水断粮，宣布只有在新的集中营内才供给水和食物，万不得已时他将使用武力。克拉克及其同伙知道整个计划可能会招致恶名，需谨慎从事，但为了打破共产党人控制巨济岛的局面，必须如此。

范弗里特接受了建议，决定尽量多使用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员，同时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其他分队派到巨济岛。该岛上已有荷兰的一个营，还将调英国、加拿大、希腊各一个连到岛上，以显示“联合国军”的招牌。对于新闻界一般性的报道也将提供方便。

为了确保战俘能顺利转移，范弗里特任命原第2师副师长海顿·博特纳为巨济岛新的司令。博特纳决定士兵和工程技术人员并用，还命令施工部队实行两班工作制，每班12个小时，他还把6000多名居民迁离该岛。

6月初，博特纳经过各项准备后决定检验一下能否全面

控制战俘营。战俘们并不把他的命令放在眼里，第85、96、60战俘营的战俘还不顾多次警告，挂起了共产党的旗帜。6月4日，38团的步兵在两辆坦克的援助下很快进入了85战俘营。坦克车撞倒了旗杆，士兵们捣毁了标语牌，火烧了共产党的旗帜，并解救了10名被共产党人捆绑的战俘。半小时后，他们在96战俘营取得了同样的胜利，还发现了75名不愿参加示威的战俘。唯有第60战俘营仍挂着共产党的旗帜，对此士兵们没借助坦克，仅用催泪弹就冲入战俘营，砍倒了旗杆，结果双方均无伤亡。虽然第二天战俘们重新树起了旗杆，这次行动的经验还是有益的。

博特纳对此很满意，他决定下一步就实行整个计划。6月10日清晨，他命令李·黑克·库把第76战俘营的战俘按150人一组集中起来准备迁移。战俘们手持大刀、长矛、帐篷杆守在壕沟内准备反击。精锐的187空降团战斗队随即赶到，他们未发一枪，用几颗手榴弹、催泪弹、刺刀、拳头把大部分战俘从壕沟里驱赶出来，接着，6辆坦克开进战俘营，机枪对准在壕沟里坚持战斗的300名战俘，结果战俘的反抗被摧毁了。克鲁耐尔被捉后不得已也出了战俘营，还有两名战俘被推入卡车带到新的战俘营，然后按了指印，发给了新的衣服。在这次两个半小时的战斗中，31名战俘死亡，139名受伤。美军方面1人被长矛刺死，14人受伤。清理第76战俘营后，发现该地共有3000支长矛，4500把刀，1000发汽油弹，还有不少棍棒、斧头、铁刺连枷和锤子，这些武器是战俘用废料或在帐篷杆上装上金属头制成的。

其他战俘营的战俘很快接受了教训，第77、78战俘营的领导目睹了76战俘营的战斗，很快同意服从博特纳的命令，当局还在第77战俘营发现了16具尸体。看来显示一下武力对

消除共产党的核心作用是很有效的，并为巨济岛其他战俘营以后的转移铺平了道路。

疏散方案胜利实行以后，克拉克决定取消第8集团军管辖战俘的任务。7月10日成立了朝鲜战区后勤地带部，隶属于远东司令部，接管了第8集团军的后方管辖权。巨济岛事件的一个教训就是军方长官不应承担后勤地带的行政事务，因为分散精力必然会妨碍主要任务——与敌作战的工作效率。

这件事还有其它深刻的教训。一般说来士兵被俘后最多不过是想逃跑，至于共产党战俘，他们的服役期不因被俘而结束，往往是随着被俘开始了另一种“服役”。在战俘营里，共产党战俘的责任由单纯军事的变为军事加政治的，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分子善于组织自己，又具有良好的纪律，对他们要严加控制，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地位进行宣传活动，如果认为值得，他们愿随时准备去死。因此任何软弱只会使他们更加无礼和不顺从，唯一可考虑的只能是武力，因为他们也知道武力的厉害。显然要控制共产党战俘，需要各种高水平的工作人员，领导和防守人员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否则共产党人会利用每个机会制造麻烦。另外，当时缺乏战俘营内部的情报也是一个教训，今后应选派经过训练的情报人员潜入战俘营，了解战俘的活动，给司令部提出适当的建议，防止发生象多德被扣押那样的意外事件。

在评价巨济岛事件时，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事件极大地妨碍了国际援助。联合国军总部一直打算实行审查方案，并试图将战俘遣返回国。事件发生后，英国有人在国会里提出4月份的审查工作进行得很不得力，日本报界舆论也反映出人们日益怀疑美国当局已无力进行审查工作，并怀疑美国总

愿朝鲜共和国直接或间接地阻挠遣返战俘，正象詹金斯将军6月初对柯林斯说的那样："积蓄已久的感情作用可能会使联合国军关于不使用武力遣返战俘的原则黯然失色，同时使能否停战的关键取决于那不光彩的审查方案，而该方案的结果如何是大可怀疑的。"

在釜山和巨济岛的行动中，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介入并未给联合国军司令部带来好名声。虽然他们对如何重新控制局面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虽然他们承认战俘有许多非法活动，但是他们对联合国军的作法坚决反对，他们严厉指责暴力行为，拒绝向战俘提供食物和水（尽管我们在新的战俘营里提供这些东西），他们还谴责对生病的战俘使用暴力。他们给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的报告肯定会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反映。

尽管将战俘从巨济岛集中转移的结果确使共产党战俘处于更严密的控制下，但在巨济岛事件上仍然笼罩着令人疑虑不安的蘑菇云，从而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在板门店的任务更加复杂了。

此，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集中力量，毫不动摇地处置战俘问题了。

尽管敌方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提案的前景渺茫，但是李奇微将军认为他享有美国最高地位的强硬后盾，他可以得到联合国参战国的有力支持，大大地改变目前的局势。他提议发表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奉告共产党这是最后的机会。然而，不管是军事机构、国务院，还是美国的同盟者都不想铤而走险，他们全然赞同发表一个公报，表明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场的支持，同时也暗示这是最后的、最合理的提案，但均不打算把事情置于可能被认为是最后通谍的极坏境地。假如谈判发生中断，他们仍然期待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

总统并不阻挠乔伊在一揽子提案的条文里使用“最后”和“不可撤销”的字眼，但是在他自己5月7日正式宣布的声明里却反映了一个更为和谐的调子，这里面没有生硬的断言，没有说明这是谈判的结束，而是为今后的交涉留有余地。

共产党代表坚持他们的反提案立场，坚持以他们拘留的12,000名战俘交换联合国军司令部监禁的132,000名战俘，鉴于这种情况，李奇微和乔伊都认为再也不存在召开内部会议的必要。5月6日，乔伊告诉南日将军，联合国军司令部希望恢复会谈，共产党方面表示同意。第二天的复会没有任何进展，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由红十字会以及中间代理人庇护非遣返战俘，共产党对此置之不理，相反，却控告联合国军司令部有意阻拦10万战俘返回家园。

在此关键时节，多德事件以及柯尔逊的信给敌人提供了攻击庇护政策的新弹药。5月6日，南日发动了以下攻势：

此，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集中力量，毫不动摇地处置战俘问题了。

尽管敌方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提案的前景渺茫，但是李奇微将军认为他享有美国最高地位的强硬后盾，他可以得到联合国参战国的有力支持，大大地改变目前的局势。他提议发表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奉告共产党这是最后的机会。然而，不管是军事机构、国务院，还是美国的同盟者都不想铤而走险，他们全然赞同发表一个公报，表明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场的支持，同时也暗示这是最后的、最合理的提案，但均不打算把事情置于可能被认为是最后通谍的极坏境地。假如谈判发生中断，他们仍然期待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

总统并不阻挠乔伊在一揽子提案的条文里使用“最后”和“不可撤销”的字眼，但是在他自己5月7日正式宣布的声明里却反映了一个更为和谐的调子，这里面没有生硬的断言，没有说明这是谈判的结束，而是为今后的交涉留有余地。

共产党代表坚持他们的反提案立场，坚持以他们拘留的12,000名战俘交换联合国军司令部监禁的132,000名战俘，鉴于这种情况，李奇微和乔伊都认为再也不存在召开内部会议的必要。5月6日，乔伊告诉南日将军，联合国军司令部希望恢复会谈，共产党方面表示同意。第二天的复会没有任何进展，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由红十字会以及中间代理人庇护非遣返战俘，共产党对此置之不理，相反，却控告联合国军司令部有意阻拦10万战俘返回家园。

在此关键时节，多德事件以及柯尔逊的信给敌人提供了攻击庇护政策的新弹药。5月6日，南日发动了以下攻势：

只要你方不改变目前专横跋扈的态度，放弃你们不合理的提案，我方将在这次的会议上继续揭发你们的无理提案；你们将无法逃脱你们如此执意不改的必然后果，所谓庇护的结果完全是由你方一手策划的，更是荒谬无理的；你们的被俘指挥官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你们提案的彻底破产。

4天以后，他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们提出申诉如下：

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宁死也不愿意留在你们那里充当炮灰，而你们的被俘官员们已向公众承认不存在我们被俘人员拒绝回归的事实。我们的被俘人员无视你们的威胁和暴力，他们大义凛然地站立起来和你们的强迫性庇护政策作斗争。相反，你们被俘人员里的司令官们只好在全世界面前供认你们对待战俘的非人道待遇，为了达到强制性地庇护和重新武装战俘的目的，你们使用了疯狂的暴力，你们所做的一切是有罪的。

对于诸如共产党的这些接连不断的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很难加以反驳的，在国际上，就其在对待遣返和庇护战俘的问题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声誉受到严重的破坏。尽管在巨济岛事件上共产党已捞了一笔油水，但他们仍然永无休止地节外生枝地制造事端。5月11日，南日声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轰炸了共产党的一个战俘营，炸伤了不少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第二天，南日通知乔伊，载有货物的车辆在驶往板门店的路上受到袭击；5月14日，联合国军的照明弹落在中立会谈地带，随后对该地区进行了扫射。面对共产党的无理取闹，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们一边拒绝承担其中的一些被控责任，一边继续采取防守攻势。

正当共产党围攻之际，上将乔伊结束了他在板门店作为主要发言人的旅行。在5月22日的告别词中，乔伊竭力回击

敌方，重申他在1951年7月曾强调过的论调——“今天在此开幕的谈判会议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与会代表们的诚意。”他指出这一希望已成为泡影。乔伊敦促共产党接受一揽子提案，他最后说：“经过十个月零十二天，我觉得我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也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了，现在我把这个无人羡慕的工作交给少将威廉·克·哈里森，他将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高级代表接替我的工作，他将进一步和你们打交道。愿上帝保佑他！”

乔伊在逆境中作出了努力。尽管骚扰不断，他却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在艰难的情况下尽了责任，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共产党的争辩出现弱点，他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在他带领代表团参加谈判的10个月里，除战俘遣返问题外，所有磋商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即使在战俘遣返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上，争论也已告结束。假如任何一方都不作妥协，停战协定是无法签署的。在离开远东之际，乔伊颇为满意地思量着自己所做的一切。谈判限于僵局并非他的责任，其它所有问题都已成功地达成协议。在许多事例上，他已取得了比他意料多的东西。如果说在某些方面美国已经作出了比他预料要大的让步，这也是谈判的正常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放弃了重大的目标。

毫无疑问，乔伊对其上司小心谨慎地对付共产党的行为早已很不耐烦，他期待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他坚信，与共产党的争论无休止地拖延下去，只会被共产党看作是软弱无能的表现。然而，即使如此，他还是强忍和抑制自己的情感，始终耐心地参加谈判。

5月下旬，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作了几次人事变动。哈里森将军被提升为主要代表；5月28日，准将李汉林接替

少将余家恒成为韩国陆军代表。所有这些新上任官员的职别都比他们的前任低，这很可能是因为和谈已告尾声，而主将们到别的地方会更有用场。但无论如何，人事的变动丝毫没有改变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停战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

二、主题的变化

正当共产党代表抓住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薄弱环节进行旁敲侧击之际，司令部内部对是否采取一个更强硬的政策仍存有分歧。哈里森将军坚定地支持乔伊，反对任何软弱的表现，在他们看来，与敌方日复一日的会谈只能导致共产党认为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会谈并没有结束，仍存在继续讨价还价的余地。实际上，无论是乔伊还是哈里森，他们早就想立即无限期地休会，直至共产党打算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

克拉克将军很快也表示赞同在板门店会谈者们的态度。他承认与敌方的正常会谈的确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了足够的机会向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世界上的其他人士说明，4月28日提案是公平合理的。然而，当此同时他又指出，巨济岛事件的确也向共产党提供了挖联合国军司令部墙脚的绝妙工具。共产党的控告象连珠炮似地接踵而来，使得事态的发展更富有戏剧性和新闻性。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俗套话翻来覆去，尽管其内容颇为动听，但结果，其新闻价值却在递减；与此相反，共产党却一直保住了他的主动权。

为对抗共产党的挑战，使他们看到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可动摇的立场，5月底，克拉克设想可能存在的几种做法，他认为这些做法可能会被共产党接受，可能会取代无限期地中

断会谈。这些做法是：把遣返战俘一事转交给联络办公室；休会一周；在共产党计划召集会议以前马上采取拖延战术；向敌人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但克拉克并没有推荐这些做法。相反，他认为，在完成登记所有愿意回归共产党阵营的战俘花名册前，联合国军的代表应该尽可能减少接触共产党的和谈代表。一旦遣返战俘花名册准备就绪，新的确凿数字就应该公布，假如共产党不接受这一数字，联合国军代表则将单方面宣布休会，直至他们接受为止。

5月期间，为公布更改后的遣返战俘人数，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很明显，自4月底5月初实行庇护政策以来，愿意回归的战俘和被拘留的敌侨人数已不是7万而是8万。向敌人披露这一变大了的数字必然会立刻构成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将很有可能认为这又是一个临时的数字，并因此而采取拖延政策，谋求更大的遣返数额。另一方面，得悉遣返战俘人数上升了2%，共产党将很有可能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上将乔伊和哈里森将军企图通过联络官员向敌人递交更改了的数字，但是他们的上司却不愿仓促从事。他们指出，由于受到暴力的威胁，许多战俘，包括新入册的愿意遣返战俘当中，许多是没有经过彻底审查的，在交换战俘时刻，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会拒绝返回，共产党将认为这是一种失信行为。

巨济岛事件发生后，华盛顿领导人越发反对向共产党透露8万遣返人员数字，在他们看来，这只能使他们更加武断地认为，庇护政策是行不通的，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这样一来，就会削弱美国同盟国以及一些中立国对美国的支持。

由于美国领导人拒绝披露新的遣返数字，联合国军司令

部和谈代表就只能局限于4月28日提案。5月23日，也就是哈里森出任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第二天，共产党代表在休会3天期满后提出复会的要求，尽管华盛顿方面一度表白只要共产党愿意，会谈就应该正常召开，哈里森还是把复会日期推迟到5月27日。美国领导人对哈里森的行动表示怀疑，但是克拉克则认为：由于对方已答应休会3天，在这种情况下，哈里森的行动是再合适不过了。从技术上说，联合国军代表也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继续休会4天时间不够的话，他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谋求共产党让步。

在其它方面，华盛顿政治和军事首脑们对付共产党的做法看来很可能过于小心谨慎或者说过于忧虑，但是在1952年令人心烦意乱的5月里，在国际舞台上，却有几个因素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行动。6月初，华盛顿领导人告诉克拉克，由于巨济岛事件，来自各方对联合国军司令部非强迫性遣返战俘政策的支持已变得越来越小。不少美国的主要同盟者敦促联合国军司令部要从速采取某种形式的甄别，而不能等停战以后再做这件事情。如果在这一紧要关头，美国实行单方无限期休会，苏联很可能会趁此机会把事情搬到安理会的桌面上来。依美国领导人的观点看来，遣返战俘的人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假如包括中国人在内，全部遣返数字为10万，共产党是会接受的，但是“8万”这个数字只会引起共产党对我们庇护政策更多的疑惑。

为稳定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地位，同盟者们建议采取措施迅速改变现状。即在停战以前，可以要求非参战国组织一些代表前往审讯非遣返战俘，可以允许共产党的观察员在场，由双方核实审讯结果。假如敌人拒绝参加，联合国军司令部则可以单方面行动，把正确的数字告诉共产党，假如他们仍

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则可以无限期地中断会谈。

6月6日，华盛顿领导人对其国内所面临的困境作了解释，并且提出了可能解决目前谈判陷于僵局的建议。同一天，他们通知克拉克，他们打算发动一场抵抗共产党宣传潮流的强烈运动。他们说，共产党正在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反美”运动，他们运用攻心战，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假如克拉克同意，他们准备建立内部监督委员会，由国防部、国会、中央情报局等各方代表迅速交换情报，为控制共产党播下的“怀疑”和“仇恨”的种子而制定反方案。

克拉克将军马上同意成立该委员会，但仍认为对付共产党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还是真理。他相信，排除来自各方的“神秘气氛”将能确保军事上的安全；从长远的利益看问题，及时地向新闻界提供充分的、真实的情报将会最有效地获得国内外人士的支持。他指出，尽管巨济岛事件的种种传说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脸上失去了光彩，但是形势正在好转，赋于新闻界更多自由将有助于事态朝着越来越有利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的宣传运动产生了一个他们预想不到的副作用。3、4月，看来有机会达成协议，李奇微决定在最后协议达成之后才释放所有在押敌侨。他不愿意冒险释放这些企图留在韩国的普通百姓。但是到5月，和平停战的前景暗淡，拖延释放这批在押敌侨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原先要求立即释放的威慑因素——干扰谈判的因素——也由于板门店的不景气，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正如哈里森于6月初告诉克拉克一样，共产党在接受12月18日的战俘名单时，就已经同意特别安置和对待这批在押敌侨。他认为共产党不会冒风险中断释放在押敌侨的谈判，

也不会把联合国军的战俘拘留着不放，因为这样做是违反他们所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哈里森继续说，毫无疑问，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将大肆宣扬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一单方面行动，把拖延和阻止停战的实现归于联合国军一方。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此刻多少诸如此类的宣传也是无关重要的。在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释放这批在押敌侨时，克拉克对哈里森的解释表示同意，并补充道，继续拘留这些敌侨会进一步引起李承晚和韩国人的不满。他认为在这个时候释放这批人对韩国内部危机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而只会大大地减少强加在远东司令部头上的后勤负担，还可以大大节省严重不足的管理人员。在陆军表示同意克拉克的意见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会和总统于6月10日也表示同意释放在押敌侨。两天后，克拉克呈递了与韩国政府一起共同宣布释放约27,000名在押敌侨的计划。他指出，释放人数的多少取决于韩国接收的能力，况且，最少需要60天才来完成这一工作。由第2后勤部起草释放名单，提供所需的车辆和粮食；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民事部和韩国政府联系，确保没有任何军事行动的干扰；发给每个释放敌侨30天的口粮，协助韩国政府把这批人送回他们的家眷所在地。为了避免释放一事影响那些尚未审核的在押敌侨，克拉克建议在释放27,000名敌侨前，务需对那些未经审讯的人进行审讯。6月13日，通过了克拉克的计划。

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在押敌侨进行审讯可算是克拉克6月期间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巨济岛方面，勃列德里将军仍然控制着几个拘押共产党战俘的临时战俘营；克拉克希望审讯工作能尽快完成，然后对剩余的未经审讯的战俘实行登记，一旦这一工作宣告结束，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拥有更确切的

遣返战俘的数字。克拉克认为，假如美国希望在停战前由中立国对不愿遣返的战俘进行审讯的话，这工作就会变得简单得多，因为所有共产党的顽固分子都关在临时战俘营里，对他们没有必要进行甄别。

美国领导人对此表示同意，克拉克于是向他们报告了第8集团军关于隔离战俘的计划，总的情况和程序问题与4月的计划是一致的。战俘首先进行登记和按手印，然后送到审讯房；假如某个战俘拒绝回答问题，或者表明他将不以武力反对遣返，他将被列人遣返名单之内，被送至遣返的战俘营里。

6月底，最后一个战俘营的审讯工作结束，总共大约分离出83,000名遣返者，于是是否把这一新的数字透露给共产党的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布莱德雷将军终于和克拉克以及哈里森达成一致的见解。他们认为，潜在的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钻空子或通过他们颇有效力的情报系统得到准确的数字，然后在板门店要求公布数字，故此可以考虑透露新的数字。但是陆军部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假如共产党发现内情，就有可能更进一步破坏原有的“甄别”审讯，由中立国出面的审讯工作也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就只能敦促联合国军司令部公布83,000这个新的数字。

7月3日，华盛顿领导人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授权克拉克，仅仅是在共产党坚持要讨论这一问题时，才能向共产党披露更改了的数字。

与此同时，克拉克以及他的下属也结束了释放在押敌侨的准备工作。6月23日，在板门店，哈里森悄悄地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打算在近期内释放27,000名在押敌侨。正如所预

料的那样，共产党抗议这一单方面行动，并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但哈里森对此全然不作解释和辩解。直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注意到此事，他才告诉南日这是内部事情，只是作为向对方透露的点滴消息，并非供双方商讨的主题。一周后，为数1,800人的第一批在押敌侨返回了家乡，他们是途经永川随后回到南朝鲜各地的；随后到7月中旬，近1万名敌侨得到自由。

总的说来，6月的板门店是不平静的。尽管南日极力反对，哈里森几次提出为期3天的休会，谈判仍未有所进展。6月8日到10日的休会招致了金和彭（金日成和彭德怀——译者注）的一封抗议书，但克拉克给予了简要、强硬的答复，他重申假如谈判没有效果，任何一方都有权要求休会。正如克拉克和哈里森所估计的那样，共产党只能同意休会，因为他们担心和害怕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会与他们中断关系，他们也不愿意失去他们发牢骚和申辩的论坛，但休会却丝毫无损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利益。

6月底7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组成发生了两大变化。6月22日，精力旺盛的能干的利比上将出席了他在板门店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二天就由少将约翰·C·丹尼尔接替了他的职务；7月初，该代表团的另一名老代表也结束了他作为谈判代表的工作；特纳将军因常常为空军另外三项条款与解方发生冲突而辞职了。接替他的是准将约瑟夫·T·莫尼斯。由于特纳的离开，哈里森就成为该代表最高权力人物——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6月底哈里森向克拉克呈交了一份计划，该计划反映了板门店谈判的停滞不前现象和暗淡的前景。在这个计划里，哈里森建议把新的数字告诉共产党。假如他们拒绝在此基础

上达成协议，那么就将由中立国出面再次甄讯战俘。经过再甄别以后，公布最后的确凿数字，假如敌人仍然拒绝达成停战协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只好单方面释放和凭誓释放所有那些不愿遣返的战俘。在共产党作出让步和签署停火协定以前，将不举行任何谈判。哈里森的上司不提倡再次单方释放非遣返者，但对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是感兴趣的。虽然敌人会肆无忌惮地反对这一做法，但也必须允许他们保住面子，使其慢慢地放弃其全部遣返政策。

随着7月的到来，板门店也出现了短暂的兴奋时期。除第51条外，其他条文均达成协议。7月1日，在会议上，哈里森敦促敌方接受下列条文："一旦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在押的所有战俘应该尽快地给予释放和遣返。凡属释放和遣返的战俘，应该以签署停战协定前，由双方交换和核实过的名单为依据。"这立即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因为他们终究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抛出这一问题，可能是要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而在另一方面，哈里森也变的很乐观，他认为这一举动能讨得南日的欢心，说明敌人确实也是需要停战的。鉴于敌人希望10万多人得到遣返，哈里森建议修改数字，允许共产党挽回面子，即直接遣返人数为83,000名，等待释放的敌侨为26,000名，还有 11,000 名南朝鲜人也将获得自由，总共数字为121,000，其中只有83,000名是真正要求遣返的。

无论是克拉克还是华盛顿的首脑都没有支持哈里森的这个想法，他们认为敌人是不可能改变立场的，他们劝告哈里森，要更加密切地注视共产党代表团的行动。正如华盛顿指出的那样，哈里森的设想并没有解决中国战俘的处置问题，而这又是达成协议的最基本点。

讨论第51条的成绩是显著的，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

的攻击逐渐减弱，慢慢也变得和言细语了。7月3日，共产党要求第二天举行立法会议，以便彻底讨论第51条，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表示同意。但是中断已久的会议刚一开始就暴露了在第51条内容上，双方的距离是何等之大。双方都同意纸上写的条文，但对之所作的解释却相差很远，其中“当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在押的”这样的字眼是争论的焦点。对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来说，他们意图在停战生效前对那些不希望遣返的战俘重新命名，使他们摆脱战俘的地位；但对于共产党来说，条文里说的是12月18日名单上所包括的所有战俘，他们同意把三八线之下的战俘排除在外，但其他所有的战俘必须计算在内。当共产党发现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递交那份以甄别结果为基础的名单时，他们丢掉了一切幻想。南日7月6日坦率地告诉哈里森，假如联合国军司令部能拿出包括所有中国战俘在内的近11万名战俘的数字，签署停战协定将不成问题。

以后的几天仍争论不休，但是双方都不作让步。共产党在等待着联合国军司令部作出让步，对玩弄数字游戏没有兴趣——他们需要的是11万个人的遣返。双方僵持一周后，克拉克和哈里森得出这样的结论：拿出83,000名战俘的数字只指望打破僵局。华盛顿的首脑为了避免日后由中立国出面审讯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他们最后也同意公布数字。

7月13日，哈里森通知南日，在更改了的数字中有朝鲜人76,600名，有中国人6,400名要求遣返，并暗示最新名单已准备好。经过5天休会研究这些数字，南日彻底拒绝这一做法。他说，他希望重新核实数字，但这一数字应该是11万。

共产党又一次拒绝接受这一新的数字，使得华盛顿深感

后悔。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建议暂时不必释放在押敌侨，这样最终的遣返数字可望有所增加。克拉克否决了这一点．他指出，对于敌人来说，重要的是中国战俘而不是朝鲜战俘，他们对那些敌侨的命运看来并不那么关心；另一方面，克拉克接着说，改变释放计划只会引起韩国政府的不满，他们将对敌侨的释放问题纠缠不休，共产党又可以趁机大肆宣传．陆军则会更不情愿参与这些行动。

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消息也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释放所有中国战俘，允许敌人派代表前来说服他们回家。当然，不允许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可以邀请中立国的观察员前来监督行动。当哈里森得悉这一计划，他大发雷霆。在他看来，敌人的代表将钻到战俘当中，想赶也赶不走他们。哈里森辩解道，假如敌人代表成功地说服一大批人回家，这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甄别”审问和“自愿遣返”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克拉克对此计划的可行性亦持有观望的态度，但是他认为，由于前面的方法均遭失败，他愿意对此办法作一尝试。为了避免过于冒险，克拉克主张在停战生效以后，在一特定的时间内，由共产党派代表说服他们的不愿遣返者，并限定共产党代表的人数。回想起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注意：当那次战争结束时，苏联人在奥地利曾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他们的人跑到了战俘营里，采取了一切颠覆手段，其中包括间谍活动，在他们那种威胁性的压力之下，紧接着是一场自杀风，克拉克担心这可能会在此重演。

新建议的产生反映了美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中国人对新的数字并不感兴趣。7月18日，缓和了几天的气氛又紧张起

来。共产党通过报刊、电台在板门店大肆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周后，南日提出于26日停止立法会议，恢复代表们的会议，讨论停战的详细问题。

鉴于敌人坚持不作任何妥协，克拉克的上司认为已没有必要召开内部立法会议，他们同意恢复公开的讨论，并授权克拉克和哈里森马上行动，处置联合国军司令部有关遣返战俘问题。假如他们俩人认为有必要，只要时机成熟，随时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休会。

7月26日，哈里森通知敌方代表团，重新召开官员的行政会议，但与此同时，全体会议休会7天。南日反对中断高级会谈，但哈里森给予扼要而又尖锐的反击。他说：

在这一系列会议上，我们一直试图严格地遵重事实，没有言过其实的现象；但是，你们却使尽了夸张之能事。你们说过我们要拘留你们的人员，但就我们和全世界所知的事实是，你们这些战俘害怕回去。

说毕，哈里森补充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将于8月3日撤回，然后不等南日回答，他和他的官员们起来，步出了帐篷。

为期一周的休会开始了，3个月来的讨价还价也宣告结束。4月28日提案导致了3个突出问题缩减为1个，到7月份战俘问题还是和4月时一样，没有任何进展。据估计，长达一年的谈判耍弄文字达200万，纠缠不休的会议达800个钟头。

经过协商，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现在双方却都在盘算如何限制谈判继续进行。尽管如此，人们仍在继续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战争这样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死伤不断增加，要求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呼声越来越

高。

三、缩小选择面

整个夏季，为结束这场朝鲜之战，无论是人民还是国家都实行了许多计划，采取了不少的办法，但是没有一个办法能使双方都满意，但至今也没有一个办法是直接与他们的宗旨相违背的，究竟应该怎么办呢？随着夏季的消逝，无论在满洲里、在东京还是在华盛顿，人们都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从8月2日开始，在和谈地点，每隔8天开一次会，总共已召开了4次全体会议。除了听到共产党的谩骂之外，就是哈里森的一番徒劳言词。他企图通过强调中国战俘的重要性和散布在朝鲜人的生命无足轻重等论调，在中、朝间制造分裂，但是全体会议人员对所有这些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有意中断会议，也不愿拿出什么新花招。正当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这一程序企图要共产党相信，他们的立场是坚定不移时，克拉克想尽办法请求向敌人的目标施加最大的空中压力。美国领导人不想使共产党太失尊严，以致停战会继续拖延下去，他们只允许联合国军司令部作例行的空袭，而且必须要有地面部队的密切配合。

为配合向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克拉克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仍旧关押的11,000名南朝鲜人是否予以释放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8月初，他的法律顾问告诉他，采取这种行动的合法依据可以在日内瓦条约的第5条找到，那里面阐述了一些疑难案件。根据第5条，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把主管权转交给“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庭”，由他们来决定这些疑难案件的

处理方法。假如“法庭”认为这些人够不上战俘条件，他们应该得到自由。鉴于这种情况，克拉克告诉哈里森，符合以下简单3个标准的在押犯可予以释放。1．1950年6月25日以前居住在三八线以南；2．经甄别审讯后，决定不返回共产党阵营的；3．为韩国效忠的。

克拉克接着说，这种“法定法庭”可以由美国和韩国人组成，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包括联合国其他代表在内。至于告诉共产党的方式，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草率地作个声明，解释这是有法律为依据的，或者根本不提这事。假如敌人反对这一计划，哈里森可以就在押敌侨一例进行辩解，说明这仅仅是内部问题。哈里森对此表示欣赏。

8月25日，克拉克为谋求其计划在华盛顿得到通过而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当他提出要求时，国会和国防部都正在考虑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会谈的重要意义以及发表总统声明的问题。国会反对任何不利于这个声明的事情。

9月初，国会放弃了原来反对由总统释放战俘的计划。9月8日，国会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新建议准备和共产党交换战俘以前，应该释放南朝鲜人。一周以后，克拉克授命执行，但没有按照“法庭”程序行事；相反，为了加快速度，他只好遵循释放敌侨期间所确定的方针。正如陆军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指出那样，假如克拉克再次把11,000名战俘划分为在押敌侨，那么，他应该尽快对这批人加以审讯并释放他们，不必经过繁琐的“法庭”。

直到9月20日全体会议结束前夕，克拉克才宣布，由于1950年底至1951年初人口的大动荡，其中有11,000名南朝鲜人被错误关押，现在已把他们划分到在押敌侨的范畴之内。

这批人的释放工作将在10月1日开始，历时6周可以完成。出于意料之中，拖延宣布这一计划使得共产党无法利用9月20日的会议提出抗议，但是南日在9月24日向哈里森发出了一封措词强硬的抗议书，谴责这一单方面释放战俘的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对此置之不理，他们继续执行计划。

正值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空中行动和释放在押敌侨向共产党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克拉克以及他的随从们开始探讨解决战俘问题的各种方法，其中包括6月哈里森提出的由中立国代表审讯战俘和释放所有不愿遣返战俘的做法。正如克拉克8月对形势所估计的那样，当时是集中联合国军司令部所能接受的各种意见的时候，应该把最后的一揽子提案递交给共产党。假如共产党予以全面拒绝，联合国军司令部要么就无限期休会，要么就结束谈判。

当克拉克和哈里森商量时，哈里森对许多供共产党讨论的提案方式保留了意见。他不愿意让不愿遣返者置于某个国家的恩惠之中，那样共产党会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也不愿意停战后召开政治会议决定战俘的命运，必须在停战协定签署以前确定。假如共产党坚持打着各种幌子诱劝其不愿遣返者，哈里森仍然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应该让这些人获得自由。

尽管克拉克不打算接受哈里森的最后建议，但是他终究同意不把战俘问题拿到晚些时候的政治会议桌上来。9月1日，他向共产党递交了他的最后提议，以公众和国际舆论为后盾，其主要宗旨依然保持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坚定立场。他指出，自4月28日以来的绝大部分提案，不管是相似的还是作了更改的都遭到了敌人的拒绝，他认为，任何新的建议也只能使共产党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尚未作出最后的决

定。

因此，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克拉克说，哈里森将用仔细挑选过的语言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后提案作序，他将阐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共产党在对待战俘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指出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仍是14,000名中国战俘问题，也可以说是志愿军的问题。哈里森讲完这段话后，回顾了他们早先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后被共产党否决的事情，然后又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接受的又一建议。这一建议的所有内容都是以首先签署停战协定为原则，当然，也必须与“自愿遣返”的方针相一致。

在克拉克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存在5种可能性：（1）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将送到非军事区域并在那里给予释放；那些非战俘人员不必经过甄别审问，由他们自己选择去向；监督人员可以是军事人员或者一般平民，也可以是参战国成员或中立国成员；（这都是共产党所期待的）（2）所有不愿遣返者将送至非军事区域，把他们交给中立国代表，由这一组织审讯他们，经双方同意，解决这些战俘的去向问题；（3）双方均要同意，一旦停战协定达成，应该把对所有不愿遣返战俘的监视，控制和责任全部交给中立国代表；（4）在中立国作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决定以前，双方都不能单方面释放不愿遣返的战俘；（5）不愿遣返者可以送到朝鲜境内或境外的中立国的集中营，由他们释放这些战俘。关于最后的4个建议，克拉克接着说，将需要一定的时间限制，必须在政治会谈以前结束。递交提案后，哈里森可以单方面休会，让共产党有足够的时间充分研究此办法。与此同时，美国和联合国必须相应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给予强大的支持。假如敌人否决这一提案，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无限期休会，直至

敌人接受或者书面呈递新的解决办法。

就克拉克所言，共产党将会激烈的反对，这标志着谈判即告结束，因为继续协商已没有意义。假如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计划以这种方式实行，克拉克最后说，共产党将不得不最后表明他们是否真正需要停战。

显然易见，不管是克拉克还是哈里森都不会相信共产党会接受这提议里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都确信，把战俘问题拖到停战以后再处理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的话，趁政治会谈讨论战俘的去向问题的机会，共产党将可以大大地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而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不可能依赖他们空中和海上力量谋取问题的迅速解决。

9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国会又在讨论一个提案，以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拘押的83,000名战俘交换共产党关押的12,000名战俘，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下为后来的遣返备用，克拉克对此表示冷漠。两天后，克拉克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假如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这将说明，在所有其他办法都遭到拒绝以后，这可算是最后的一张王牌了。国会仍不同意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来处理，但是他们颇为同意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送到非军事区域，不必经过任何甄别审讯，在军事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释放他们，由他们自己选择去向。

9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防部长均支持克拉克，反对停战以后的“继续会谈”。在国会和国防部官员参加的会议上，国防部长洛弗特和上将费茨特拉和利比反对国会的建议，他们不同意总统发表公告，按照墨西哥人的意见，急于交换自愿遣返的战俘，把不愿遣返的战俘事宜拖延到后期考虑。费茨特拉和利比均认为，一旦停战协定达成，

美国公众将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的士兵送回家乡，这样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地位就会越发动摇，而共产党则增强他们的优势。等到停战后会谈走上正轨，共产党将已经获取了他们军事上的优势，他们将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这张王牌赢得这场赌注。

由于无法调解国会和国防部之间的分歧，9月24日，杜鲁门总统不得不作出决定，他同意采纳国防部的意见，排除了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问题拖延到停战以后的可能性。第2天，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为克拉克准备了一份计划草案，得到了总统的批准。

经总统批准的这份计划总的宗旨仍紧紧遵循着9月1日克拉克意见的精神。但鉴于没有通过把不愿遣反的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处理或停战以后再商议，克拉克原先提出的5点解决办法变成了3点。在准备把这一新建议告诉共产党时，克拉克提醒哈里森，要谨慎行事，对不允许将中国俘虏送至台湾一事不必加以评论。

在板门店会谈开始的前一天，杜鲁门先生给克拉克写了一封私人信件，鼓励他照此办理。在这封信里，他希望联合国军司令部提案必须“措词最强硬不留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假如共产党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将无限期休会，总统又说，在这段时间里，最重要的是“不能减少军事压力”。

9月28日，也就是4月28日一揽子提案公布达5个月的日子，在全体会议开始时，哈里森再次扼要强调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为打破战俘问题僵局所提出的各种提案，然后，他又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接受停战以前做到。（a）所有战俘将送到非军事区域，由红十字会和联合军事代表团对他们进行审核后作遣返论处，假如这个时候

有战俘提出他希望留在拘留他的一方，他可以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可以获得的公民权利，不再参加朝鲜战争的战事行动。（b）所有希望遣返的战俘应该迅速交换，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将分批送到非军事地区，非武力释放他们，然后由非参战国代表审讯他们。所有这些行动可以在有或者没有军事代表的场合进行；可以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派出联合代表团监督执行；也可以象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联合军事代表团可以参加这一行动。（c）所有愿意遣返的战俘应该尽可能快地交换；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将送到非军事区域，在军事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释放他们，不必进行甄别审问，任何一方获准释放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的去向。假如共产党愿意，此计划可在军事和非军事观察员的监督下实行。

为给予敌方代表团足够时间研究新的办法，哈里森提议休会10天。但南日要求当天下午召开会议。此时，他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议表示失望，他说："你们只不过使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装饰你们过去所一直坚持的无理要求。"他最后指出，共产党需要的是全部战俘的遣返，但是他同意休会10天，以便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重新考虑其基本立场。

在10月8日的会议上，共产党再次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予以否决。等南日说完，哈里森则开始了34分钟的讲话，他指出共产党要承担起这场朝鲜战争的责任，并重申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合理解决争端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作出更多的提议。况且，联合国军司令部到板门店的目的并非只是听取共产党代表团的谩骂和谎言。因此，哈里森接着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将宣布休会，直至共产党愿意接受联合国军

司令部其中的一个计划或者递交一份书面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建议为止。说毕，哈里森及其代表团的成员站起来，离开了会谈帐篷。

谈判阶段宣告结束，事态的发展使得双方“要么全力以赴，要么索性放弃。”停战的前景仍然和4月一揽子提案出来时一样遥远。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非强制性的“自愿遣返”，共产党就死死咬住“全部遣返”不放。假如任何一方在政治上都不作出让步，和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美国还是共产党，看来都不打算以足够的武力谋求军事上的胜利，因为那样做将很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失败。在前线，防守力量每月递增，虽然对敌方不断空袭，但是令人越来越怀疑的是，是否仅仅具备这一点就能向共产党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停战？没有一个强大的刺激因素，共产党将继续我行我素，不可能有特别的兴趣去谋求和平。

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限制，联合国军司令部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究竟要多少军事压力才能而且一定能使敌人作出让步，并且不会再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第十三章 僵 局

一些所谓的军事专家说，在我任职期间，只用有限的武力，无需扩大战争的规模，在任何时候，胜利都是我们的，我非常不赞成这种说法。我们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享有雄厚的力量，他们不仅可以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还可以夺取小规模的胜利……。为了结束这场战争，需要我们训练更多的士兵；增加更多的空、海力量；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牺牲；同时也需要我们撤销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禁令——禁止进攻鸭绿江以北的敌人后方阵地。

在停战协议签署几个月后，克拉克将军说出了这一番令人费解的话。事实上，他所说的无非是指华盛顿一直无视他上任1年来的要求，他们不准备为实现军事上的胜利去冒风险，也不愿意付出代价，配备给第8集团军的最大军事力量说明，他们并不准备全力以赴去对付共产党。与此同时，金、彭共产党的力量也明显受到限制，他们不打算进攻位于日本的美军后方基地，以免联合国军司令部也找到进攻满洲里的借口。在前方，共产党强烈反击，但尚无准备恢复大规模进攻行动的迹象。但是，不言而喻，从1952年中期的情况看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流血战争，而绝不仅仅是一场冠军争夺赛。

一、守住防线

前线上敌对的双方势均力敌。从西海岸到太白山脉驻守着中国人的 8 个军，估计拥有 270,800 人的兵力，而防线的东端又被北朝鲜的 3 个军团占领着，大约拥有83,000人的兵力。面对敌人的是 4 个美国陆军师，第 1 海军师，联邦师和 9 个韩国师，总共有 247,554 名士兵。在纵深地区，共产党的兵力享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一个总共有 422,000 名中国人，185,300 名北朝鲜人以及 10,000 名苏联人或卫星部队的军队遍布整个北朝鲜，这支力量支援着前方战斗。这样，敌人后方军队的 617,300 人加上前线上的 290,800 人，使得在北朝鲜的共产党军队达 908,100 人左右，这是1952年 5 月 1 日所统计的数字；而这期间，在南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队总共不到700,000人。

4 月下旬，一揽子提案的产生对前方的总的战事行动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前方尽管防守积极，但也只是些小型的地面行动，比如巡逻、侦察、偷袭以及一些有限的进犯行为，只是一些小小的摩擦，任何一方都不想激怒对方而引起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鉴于战场战事暂时停息，第 8 集团军的战斗部队也可以稍喘一口气了。范弗里特指令其部队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加强他们的防御工事。注意到许多工事因为当时仓促设计与施工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他命令在高地的最高位置的下面重新挖掘堑壕，并装上自动武器，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瞄准和射击作用，并在地堡里配备轻炮和迫击炮。此外，他还要求架设更多的具有战术意义的铁丝网，并要充分考虑到，

在雨季到来之前，解决壕沟和地堡的排水装置问题。

有情报透露，敌人也在采取类似的行动。从审讯共产党俘虏时得知，敌人并不打算在近期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是他们正在改善堑壕的质量，布下地雷和安装更多的有刺铁丝网。在许多地方，敌人把他们的防御工事一直修到离后方仅20英里远的地方，交通联络都颇为方便。

也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在1952年春季，敌人在稳步增加他们的炮兵力量。从4月到6月，敌人的大炮从710门增加到884门。共产党大炮的主要任务是为步兵的进攻和防守提供近距离的支援，而且炮火越来越猛烈，因为他们采用的是8到10门密集火力射击技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部队很难找到敌人的准确火力位置，因为敌人采用多变的战术，如变换火力点、扩大火力点之间的距离、增加火力点以及采用一定数量的流动炮等。由于经常移动大炮，不是长时间地集中在某个地域，敌人有效地回击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进攻。据有关情报估计，仅仅在5月，韩国第2军团对面的敌人就有500个准备好的火力点。另外，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投放在联合国军阵地上的炮弹也越来越多。从4月到6月，敌人平均每天发射的炮弹从2,388发增加到6,843发，弹药消耗量的增加表明了敌人在这几个月内已逐渐向前线增加了炮兵力量。

为对抗敌人日益增强的炮火，克拉克对2个使用280毫米口径的炮兵营作了调查，然后从美国组织力量向第8集团军提供更多的弹药和远射程武器。遗憾的是，直到1952年底，这些炮兵营的力量都没有得到充实，参谋长们一直不愿意首先承诺这一义务。

敌人不仅在春季改进他们的炮战技术，而且在5月，在韩国第1师的阵地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夜间偷袭行动，当敌

人进犯时，韩国部队采用诡术造成敌人严重的伤亡，韩国部队开始时往往抵抗5到10分钟，然后稍作撤退，等共产党军队占领了这块阵地，原先沉默的炮兵向这个阵地猛烈开火，往往半小时到1小时之内，敌人就开始撤退，尽管韩国方面使用的炮火不大，但相比之下，敌人的伤亡惨重。

5月，由于双方都担心交战规模会变大，第8集团军曾一度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也停止了，然而，到6月初，局势又开始紧张起来。

美国第1军第45师占领在主要的抵抗防线，从铁原东北面5英里的281高地一直延伸到铁原东面大约11英里的村庄。除占领281高地之外，整个第45师的力量遍布了驿谷川南面的阵地，这阵地蜿蜒穿过四周是丛林山丘的稻田低畦地。在他们的北面是中共部队的第38军和39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离第45师的主要防线很近，足可以观察该师的活动，便于他们派遣人员进行夜间偷袭和侦察行动。敌人的有利因素成为5月底新任该师师长戴伟·L·鲁弗勒少将的一桩心事，因为他的防线上缺乏强大的防御工事。假如第45师能沿前线建立坚固的工事，就能避免敌人从他们控制的阵地对该师进行监视，还能为该师的防守阵带增加深度。

6月初，鲁弗勒和他的下属在该师前面的战术要地选择了11个目标，决定从6月6日夜起在24小时内把它们占领过来。战斗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袭击预定目标以外的敌阵地，然后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夺占所确定的11个目标，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反攻”。预计敌人可能会很快就采取猛烈的反击，鲁弗勒指令他的团级指挥官们在天黑以后即开始行动，随后马上赶在天亮以前抢修工事。

第279步兵团，由上校普列斯顿·J·C·墨菲带领，控制

了该师前线的东半部分，准备占领第1到第6个目标；第180步兵团，由中校伊利斯·B·里奇带领，准备占领第7、9、10、11号目标，称为依利工事的第8号目标将在晚些时候再占领。

面对第45师，从东到西是中共部队第38军第113师的第338团和第339团；第39军第117师的第350团和第349团以及第115师的第344团。上述中共各师的其他步兵部队都属后备力量。在前线，中国人拥有10个营以上的炮兵力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6月6日拂晓时分，在靠近目标的地方，被查清的敌人碉堡遭到了空袭，随后，等到天黑，墨菲和里奇派遣他们的部队，以班或连为单位，占领了这些工事。显然，敌人没有意料到这种行动，除255高地的10号工事和266高地的11号工事外，其他阵地上均没有进行抵抗。前者，即后来众所周知的猪排山高地，是在和敌人2个排交锋55分钟后，由第180步兵师第1连的2个排占领的。在266高地，也就是人们称之为“老秃山”的高地，大炮和迫击炮毁掉了制高点上的树木，然后，第180步兵师A连的2个班用轻武器和自动武器与敌人的2个班交火后撤离，用炮火直接炮轰中国人。

第17野战炮兵营的前线观察员一等兵詹姆斯·奥特加跳进堑壕，指挥炮兵用密集炮火向高地的敌人发出了500发炮弹，炮轰完毕，A连的士兵再次向敌人阵地迫近，面对敌人的密集炮火，军士长约翰·奥·怀特带领1个班，配备勃朗宁自动步枪和机关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我们看见一群战士，开始时还以为是我们的人，但当我们靠近离他们不到25英尺的地方，我们听到中国人说话的声音，随后我们就开火，只见有5人逃跑并中了弹。”敌人的抵抗逐渐停息，A

连的步兵们朝着‘老秃山’的山峰挺进。敌人的炮火马上开始轰击，没有地堡和堑壕可钻。军士长杰拉尔德·马林后来回忆道，“当炮弹在我们周围开花之时，我们才开始挖工事，我恨不得钻到钢盔里去”。冒着敌人的炮火，A连这个班的士兵坚持战斗，刚过午夜便拿下了“老秃山”。

一旦攻占了敌人的工事，就必须组织修建防守工事。由韩国军队出动人马支援，第279和第180步兵团负责收集修筑工事的材料，一直干到天亮。他们把地堡筑得比人还高，这样敌人追近工事时，他们的大炮可以使用无线电引信炸弹。他们在工事的周围架上有刺铁丝网，在各通道埋上地雷并装上自动武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在阵地上安放机关枪和无后坐力炮，在必要时支援毗邻的阵地。通信兵把联络线一直装到后方，通过电台和电话与别的阵地取得联系。负责搬运人员把弹药堆积起来。在主要的防线后面，步兵、坦克兵以及炮兵都已制订了计划，用猛烈炮火支援这些阵地，只要敌人进攻 预先准备好的加强部队就会立即奔赴前线。到早晨，经过24小时的工事修筑，防御已准备就绪，各阵地留有18人到40人左右的力量等待着敌人进攻，同时第279和第180步兵团的大批人马已经撤回到二线阵地。

尽管共产党不断增加他们的炮兵和追击炮的力量，但是他们的侦察和偷袭都未能成功。在猪排山高地上的第180步兵团打退了敌人几次以连为单位的进攻。

6月11日，鲁弗勒将军指示第2天开始实行该计划的第2阶段行动。第245坦克营的2个排发动了一次牵制性进攻，第180步兵团损失了3个步枪连的力量才占领了第8号工事，摧毁了覆盖镇附近敌人的武器装置。

凌晨6点，第245坦克营B连的2个排，由中校尤基恩

·S·凯恩特纳带领，向五里亭发动了进攻，在路上被敌人的地雷炸坏了6辆坦克，但是其余的坦克仍向敌人的地堡和火力点开火，然后他们又从五里亭以西的高地上撤离，有5辆坦克后来被修好了。与此同时，第180步兵师K连，由上尉里查德·J·肖带领，出动相当于1个坦克连的力量向覆盖镇的北面地区进攻。当步兵靠近敌人后，他们发现在该地的东面高地上中国人挖有象蜂窝似的密密麻麻地堡、堑壕和坑道，鉴于无指望拔掉和炸毁敌人在高地上的坚固防守工事，袭击部队停止了攻击，撤回到原阵地，有4人受伤，1辆坦克受到破坏，而敌人伤亡达65人。

经过第5航空队战斗机的空袭以及大炮、迫击炮火的猛烈轰炸后，第180步兵团的E、F连分别在中校约翰·D·施格德利和上尉杰克·M·蒂拉的带领下，冒着敌人轻武器、自动步枪、大炮和迫击炮的密集火力攻克了这些工事。第180步兵团的G连，在中尉里查·M·里的带领下，在敌人反击开始以前，迅速前往接应其姐妹连。中国人猛烈回击，双方伤亡严重，第180步兵团顽强抵抗，直至敌人停止了交战。在这两天战斗中，中国人始终未能把第45师击退。

但从后来获取的一份中国文件里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评述：

“从1952年6月12日凌晨5时开始，敌人（即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我190·8高地发动了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5天，到16日，敌人死伤2,300人，9辆坦克遭受破坏，我们取得了辉煌战绩。

1952年6月12日凌晨5时50分，敌人在空袭我第1连和第50连的同时，出动7个连以及74辆坦克的兵力向我190.8高地进攻。

双方进行了交战，到早上9点钟，敌人占领了190.8高地。190.8高地上的防守部队，也就是第1连的五六个班开始了地道战，当夜22时37分，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第3连进行了反攻，再次夺回了该阵地。敌人伤亡人数为772人，损坏坦克8辆。

13日拂晓，在12架飞机的掩护下，敌人出动5个连的兵力和13辆坦克对我1号、2号以及无名高地上的1连阵地猛扑过来，激烈的战斗持续到15点。我军第2、第5和第1连先后进行了反击，造成敌人伤亡600人，损坏了2辆坦克。

从14日到15日的2天时间里，敌人接连不断地进攻我2号无名高地，但被打退了，敌人伤亡为56人。

15日夜晚，在大炮和坦克火力配合下，敌人用7个连的兵力占领了我第50、51连的高地，但我第50和51连给予猛烈的回击，对该高地猛烈轰击35分钟以后，我们突然冲上去，大约到6月16日凌晨1时30分，我们大战告捷。

据估计，参与攻打高地的1,000多名敌军全部被我歼灭。

与此同时，在另一战场，由4个班组成的分队勇敢地开展地道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胜利。”

当中国人采用地道战时，联合国军堵住了一些地道进、出口。

6月16日，第179步兵团，在中校约瑟夫·C·桑达林的带领下，前往接应第180步兵团，夺取了“老秃山”。在以后的10天里，敌人的反攻力量从排发展到营，表示了他们夺回这些阵地的决心。第45师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击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同样表现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决心。

6月26日，“老秃山”争夺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该高

地是东西走向山脉的最高点，也是控制北、西、南各战术要地的制高点，在该制高点西边不到1,000英尺的地方，共军构筑了工事，这些工事在这个地区无时不在威胁着第45师和第179步兵团的阵地。桑达林中校决定摧毁敌人的这些工事。凌晨，第179步兵团撤出在“老秃山”的阵地，飞机、大炮、迫击炮火对敌人的工事一齐狂轰滥炸；第5航空队的8架轰炸机投下了炸弹，火箭炮随后，第45师的大炮、迫击炮就开始以密集的炮火轰炸敌人的阵地。

179步兵团C连（加强连），由中校约翰·B·布劳特带领；第180步兵团F连，由蒂拉上尉带领，在大炮、迫击炮轰炸以后发动进攻。C连从左边迫近，F连跟在1辆坦克的后面，也向“老秃顶”的右边迫近，这支突击队伍很快就进入了敌人的火力圈，中国人用2个连组成防守力量，以轻武器和自动步枪向进攻的部队报以猛烈的回击。经过1小时的战斗，中国人突然后撤，以所有的大炮和迫击炮对我进攻部队猛烈开火，当炮火刚停息，共军迅速返回，继续攻击，越来越逼近堑壕的C、F连。下午，第179步兵团A连，在中校乔治·L·沃恩的带领下，前往增援，因为当时敌人火力很猛C、F连难以前进，更难冲上制高点。步兵团重新组织力量由F连负责攻占“老秃顶”的左、右侧；C连攻打第11号工事；A连负责袭击敌人的右翼。战斗进行了2个小时，中国人用手榴弹、机关枪打退了步兵团的多次进攻。晚些时候，2辆坦克缓慢地往山上冲，企图压制敌人的火力，一辆翻了，另一辆履带脱了，但在他们完全失去控制以前还是极力进行射击。敌人终于撤出了这块阵地，第179步兵团一面派出他们的工程师修理坦克，一面又派出更多的坦克向制高点冲击。

从6月26日夜晚到第2天，3个连队开始在“老秃山”深

挖堑壕，加固工事。6月27日下午，由中校威廉·T·莫洛尼率领的第179步兵团L连夺取了制高点，第180步兵团的F连回到了增援的位置上。C连和A连的精锐部队占领了位于制高点西北面的一块阵地。

夜幕降临，“老秃山”周围的敌人开始活跃起来。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向第179团的阵地炮轰，照明弹表明他们正在运动之中。当夜22点，敌人从东北和西南方向对L连的防御阵地发动袭击。估计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逼近制高点，然后他们陷入了火袋。我方来自纵深的大炮、迫击炮、坦克和步枪等火力铺天盖地而来，挡住了敌人的去路。L连牢牢地堵住敌人，使他们无法再继续前进，敌人只好撤退，但于当天半夜敌人又一次发起冲击。

第2和第3次反击形式大致和第1次相同。6月28日清早的每次反击都持续1个多小时，每次敌人都无法突破防线。估计敌人大约死伤达250人到325人，最后共军不得不停止战斗。据第179步兵团统计，他们有6人死亡，61人受伤，这就是3次交战的结果。

6月28日后半夜，“老秃山”上的共军炮火标志着又一次攻击的开始。当夜22点，敌人派出4个班到第179步兵团的阵地进行侦察，双方相遇，展开了一场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的遭遇战。约1小时以后，敌大规模进攻开始，大约有2个加强营的兵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从东北和西北方向进攻。这一次，敌人穿越了铁丝网，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半夜刚过，联合国军司令部出动了照明飞机，照明弹把整个战场照的通亮，来自我方纵深的炮火及来自高地上第179步兵团3个连的轻武器和自动武器火力交织在一起，使敌人处于困难的境地，共军只好向北撤退，估计伤亡达700人之多。

我方第179步兵团死伤43人，其中有8人当场死亡。

6月底，尽管第45师中有许多部队缺乏战斗经验，但他们还是打退了敌人20多次进攻，使敌人遭受到3,500人的伤亡，受到了范弗里特的好评。从7月3日到4日夜晚，敌人企图再一次把“老秃山”从45师手里夺回。他们发起了3次冲锋，最后一次是以营为单位的，但都遭到了同样的失败。在这些战斗中，该师组织防御工事和采用的战术对各级指挥官都是一个考验，也鼓舞了士气。

但在另一个战场，第15师就没有取得这样大的成功。6月8日，克拉克指示范弗里特准备一个在铁原地区捕俘的计划。克拉克想了解敌人兵力在那个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他们的作用。几天以后，范弗里特递交了两份计划，一是有关利用韩国第9师1个团的设想；二是从第45师组织1个加强营的计划。准备给后者配备坦克、空军以及大炮的力量，并授权第45师尽快落实行动。

6月22日早晨，第279步兵团第2营出发到Yokkok-Ch'on北边抓捕俘虏。有关抓获这些中国俘虏过程中所遭受的困难，后来第8集团军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的：“袭击部队破坏了敌人的工事，造成敌人不少伤亡，抓到了3名俘虏。然而，这3名俘虏都未能接受审讯。原因是：有2名在被送回的路上被敌人打中，当场中弹身亡；另1名在被捕后企图扔掷手榴弹，被打死。”尽管为抓获俘虏在小范围内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整个6月，第279步兵团的唯一战果就是6个俘虏。

这不仅仅是因为第279步兵团在这方面经验不足，另外也有中国人宁可被打死也不愿被抓捕当俘虏的原因。这一存在的事实使得鲁弗勒将军在6月向其所属部队发布了一封

信，信中说，任何1个士兵，只要抓到1个俘虏，就可以有权取得一个特别的假期，或者到日本去休养。这充分说明了问题之紧迫性和重要性。

尽管如此，7月，克拉克又宣布了一个计划，这一次，是由韩国第1军团的第11师去捕获北朝鲜人。7月8日，按照大号铅弹16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代号），1个加强营来到了南江的西边。双方交战，该营33人死亡，157人受伤，36人失踪；敌人90人死亡，82人受伤，没有1个士兵被俘虏。

所有这些袭击行动使克拉克不得不承认，为抓获俘虏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值得的。7月19日，他拒绝了范弗里特的请求，范打算在第1联邦师地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假如不是第8集团军已感觉到敌人进攻迫在眉睫，克拉克是不会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军队损失如此之大而放弃类似行动。

对于范弗里特来说，他可能曾经希望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以后，他在前线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不致于再受到那么多的限制，但是6、7月的情况已使他的希望破灭。6月底，范弗里特计划让美国第9军向平壤北边的新阵地挺进，以便控制整个铁三角地区，但遭到克拉克的冷遇。在第8集团军司令看来，此行动可以提供有关敌人阵地的情报；丰富联合国军司令部军队的经验；摧毁敌人的弹药库；让韩国人出面攻击。但是克拉克认为，此行动有可能给谈判带来反作用，引起其他友军的伤亡；假如敌人举行大规模反攻，联合国军的后备力量将会产生不足，平壤以远的资源得不到进一步的开发等等。他不同意范弗里特的计划，他认为不利因素远远地超过有利因素。很明显，新上任的总司令和他的前任李奇微一样顽固，他们都不愿意仅仅为了扩大一点地盘而加快这场地面战争的速度。

克拉克之所以不同意进攻一些有限的目标，是因为他意

识到，自从谈判开始以来，敌人的地面和空中力量已经翻了一番。前线上的共产党队伍正严阵以待，他们以满洲里为基地的空中力量已增加到2,000架飞机，其中一半是喷气式飞机。另外，敌人拥有越来越多的火箭炮，野战炮兵、大约400辆坦克，弹药供应有所好转，防御工事更加坚固。在这种种情况下，克拉克认为，惩罚敌人最好的办法是让敌人自己来冒犯，而绝不是相反。

故此，7月18日，克拉克对范弗里特下达其各军的指令表示异议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些指令里，范弗里特通知他的官员们，有迹象表明：敌人在一些战区，已经而且正在调遣他们的兵力，前沿阵地的部队也已撤离了不少。假如战事爆发，他希望坚持与敌人交锋，起码在24小时内把敌人撤出的阵地夺到自己的手里。范弗里特继续说，所有指挥官必须准备应付敌人强大的反攻，制定全面的火力计划以及确保交通联络事宜。当克拉克一听到这消息，他马上指令其下属讨论是否允许第8集团军采取这样的行动。他自己的反应是：所有这些以营或营以上为单位的进攻行动均应该首先交远东司令部通过。7月底，他告诉他的下属，他不打算在近期内进攻象“老秃山”那样的高地。克拉克主张联合国军司令部应积蓄自己的力量，而让敌人来冒犯。

7月中旬对“老秃山”地区所采取的行动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注意到了夺取象“老秃山”这样丘陵地形的高地的好处。在美国第2师接防第45师以前，敌人一直没有夺回高地的企图。第8集团军各军团采用的是定期轮换的战术，当时第45师已经在阵线上度过6个多月。7月17日到18日夜里，敌人利用第8集团军换防的机会发动了2次进攻，力量超过了1个加强营。E、F连迅速加强“老秃山”的力量和增加密

集防御炮火，击退敌人的第1次冲锋。但是在第2次冲锋时敌人在山坡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他们马上加强力量，然后开始利用这一立足点继续进攻。中国人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异常猛烈，炮击后敌人步兵迅速跟上，抢占了这一制高点。在飞机、大炮和迫击炮的配合下，第23步兵团进行了反击，但也无法把敌人从这个刚刚占领的高地上赶下去。到7月20日，第2师的精锐部队再次拿下了“老秃山”东翼的一部分。月底，随着雨季的来临，战斗变得异常艰难。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倾盆大雨把朝鲜战场变成了一片泥淖，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其在“老秃山”上的损失进行了统计，到7月21日，总共死亡39人，受伤234人，失踪84人；估计中国人死伤共1,093人。尽管战斗激烈，死伤人数并不比以往多，尽管如此，也不难理解克拉克将军为什么对为一二个高地付出的代价如此关注。

6天来连续不断的暴雨使大小河流河水泛滥，桥梁也被冲垮。雨水渗透到土地里，引起土地崩陷、道路中断或严重的水土流失。要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首先必须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阻碍。共产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双方都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一共同的“敌人”身上，战场上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7月底，雨季过去了。第23步兵团照样还想再次占领“老秃山”。防守制高点的是中国人的2个排，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后，第23步兵团派出2个加强连沿着山坡往上冲，当这支部队到达敌人的堑壕时，他们使用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敌人的防御工事开火。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这2个连终于于8月1日清晨夺回了制高点，他们随后开始挖堑壕，以便应付敌人惯用的反击。这一天，增援部队发射了

300多颗照明弹，出动了42架次飞机。当天夜里，敌人开始用追击炮，后又改用大炮袭击制高点，大约有2500发炮弹在23步兵团阵地上爆炸。然而敌人的反冲锋还是被击退了。

8月2日，联合国军依靠地雷、地道和更多的铁丝网来增强他们防守“老秃山”的力量，于8月4日，他们用最大的火力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进攻。这以后一直到9月，敌人都没有再攻下“老秃山”。

9月中旬，敌人出动2个加强连，在大炮、追击炮和2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竭尽全力企图夺回这个双方争夺的高地。9月18日，敌人穿插部队打人了第2师的阵地，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由于敌人来势很猛，防守部队只好撤离到制高点400码的地方重新调整力量。9月20日，第38步兵团未能包围这些中国人，但是第2天，1个坦克排前往支援，他们利用两面夹击的战术，迫使敌人又一次撤退。

“老秃山”之战可谓1952年夏、秋期间所有战斗的典型。为了多占领一个高地，双方进行的是一场惨无人道的，远没有休止的搏斗。况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可取的方式改变这场战争的打法。

二、上山、下山

1952年夏，前线战事频繁，板门店谈判前景暗淡，这使得好几家情报机关只好唱低调。华盛顿以及远东的策划者和情报专家们预计，战争的局势将不会有任何缓和的可能。在他们看来，敌人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他们已经扩充了空中和地面力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准备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有关停战条件；另一方面，共产党也没有再次发动大

规模战事的打算，他们似乎已经满足了他们目前已经增加了的力量。并且自信他们的力量是可以和联合国军相持下去。情报官员们认为，除非联合国军司令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扩大这场战争的范围，否则，即使使用足够的军事压力，也不能使敌人迅速结束这场战争。鉴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没有扩充军备力量的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发动大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的，战斗仍只能限制在一些小范围内，由此可见，要想使这场战争的局势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前景仍是渺茫的。只要共产党不放弃其目前的地位，战争的第二年将仍是高地争夺战的继续。

"老秃山"之战可算是整个夏季里最引人注目的战斗了，但是在其他战区，零星战斗也不断发生。7月初，在美国第1军的阵地上，韩军第1师以1个营的兵力成功地袭击了上永里以南，离铁原东南面大约17英里远的中国军队的阵地。两天以后，也就是7月3日，第1海军陆战师派遣1个连去袭击中共部队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叫潘吉利，离板门店东北面3.5英里。海军部队击溃了敌军，破坏了他们的堑壕，然后又撤回到主防线。

其他战区的战斗没有这样幸运。在韩国第11军团前线，韩军直属师企图占领金化东北面15英里远的、靠近尤沙利的共产党的高地，但是失败了。韩军第1军团第5师也遭到了北朝鲜人的强有力反击，他们企图把敌人从东海岸线上的锦山以南7英里远的奥姆永附近的一个高地赶走，但是北朝鲜人于7月10日向附近一个被韩军第5师占领的高地发动反攻，他们占领了这个高地，然后又被迫撤退了。

8月，为促进板门店谈判的进展，联合国军司令部向敌人施加了有限的地面压力，然而，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几起小

型的要地争夺战。8月9日，驻守在板门店以东4英里的第1海军陆战师的阵地被中国军队占领，以后的两天里，这块阵地上双方之间交手5次，但最后还是共产党占了上风，于是这支海军部队把他们的进攻转移到附近的122高地，从这里，可乘敌人不备之际攻打58高地。从8月12日到14日，1个海军加强连击退了敌人高达1个营的兵力进攻。8月16日和25日，敌人无视遭受的失败，再次反冲锋，死伤惨重，始终未能把海军赶走。在这些反击战中，122高地由此而赢得了一个骄傲的名字——“堡垒山”。

在大约离锦山东边7英里远的地方是韩军第2军团的所在阵地，韩军直属师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从该师的阵地上观望，可看到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国会山”，敌人在那里保持着他们的防御工事。8月5日到6日夜里，该直属师偷袭了敌军所在阵地，拔掉了他们其中的2个工事。敌人马上给予反击。共产党的士兵向韩军阵地猛扑过来，双方整整进行了4天的拉锯战，最后还是韩军第26兵团顽强战斗，赶走了敌人。8月10日，共产党停止了进攻，在死伤达369人以后，又死了450人，受伤190人。而韩军第26兵团只死亡48人，受伤150人，得到了范弗里特的赞扬，称赞他们已拥有鼓舞人心的防守力量。

8月，板门店谈判为每周一会，与此同时，受到朝鲜雨季的影响，前线战事有所缓和。9月初，气候转晴，中国军队又开始攻打“国会山”。他们曾一度占据了这一制高点，但到9月9日，韩军第26兵团在韩军第1兵团的配合下，又夺回了这一高地。有一次敌人多达3个连的部队冲上了山顶，但韩军部队拒不退让。

在“国会山”以西2英里的地方有一个长条的，手指形

的山脉，后来人们很自然地称之为“手指山”。9月6日，敌人向“国会山”发动攻击，同一天，他们占领了直属师骑兵团的一个阵地，骑兵团猛烈反击，但鉴于敌人加强了他们的防守力量，骑兵团不得不撤退。从9月一直到10月，仇视的力量始终在交锋着，为了控制某个高地，上山、下山，双方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到10月中旬，“手指山”又一次回到了直属师的手里。

当8月的暴雨停息，中国军队又开始向第1海军陆战师防守的“堡垒山”（也就是122号高地）发动攻势。9月5日，敌人首先以密集炮火狂轰第1海军陆战师阵地，然后派出1个营冲过去占领了这一阵地，争夺制高点的战斗持续了2个钟头，双方不分胜负，但最后还是中国军队先收兵。在后来的10天里，敌人发起了一连串的冲锋和冒险行动，但是每一次都是以海军陆战师的成功防守而告终。

9月中旬，敌人继续在联合国军的防线上寻找突破口。位于詹姆斯顿防线上的美国第3步兵师战区拥有许许多多的工事，这些工事都设在主防线前面的一些低矮的山丘上，分别由班、排、连驻守。其中的一个叫凯利工事，位于桥洞以南3英里远的地方，离临津江u形流域的西面有1英里。9月17日，在第65兵团第2营的配合下，C连保住了这一高地。

面对第65兵团的是中共第39军第348团的第2和第3营。9月，敌人派出不少巡逻部队偷袭第65兵团所在地，并常常向这个地方发射炮弹。所有这些意味着敌人将要发动一场进攻。

9月17日夜晚，敌人第348团的第2营偷袭了凯利工事。当C连请求加强力量击退敌人的偷袭时，上校朱恩·C·科

迪罗，第60兵团的指挥员，命令B连去接应其姐妹连。B连拿下了这一高地，并于9月18日晨把这一阵地交给第2营的指挥官，中校卡罗斯·贝特思——拉米勒斯。

敌人的迫击炮向高地整整袭击了一天，B连连长，中校威廉·F·尼尔逊在当天黄昏时候请求炮火援助，他请求在敌人发动进攻时，给其阵地配备好各种定时引信炮弹。在他提出请求不到1个小时，来自第348团第2营的大约2个连的力量从西南、西北以及东北方面向高地扑来。东北方向的进攻尤为使尼尔逊中校及其随从们感到惊讶，因为中国人从高地后坡冲上高地后占领了高地西北角的B连机关枪火力点。他们打死了机关枪手，沿着壕沟步步逼近。负责机关枪火力点的中士在中弹以后企图逃跑；高地与营部之间的联络也已中断，到半夜，局势陷于混乱，但有报告说中国人押送着美国俘虏下山，这表明共产党已占领了这一阵地。还有情报说，中国人正穿着美国士兵的制服，但弄不清他们是在进攻前还是进攻后穿上的。

为了弄清敌人是否打算占据这一阵地，兵团情报官员命令第2营派出1个排尽快地去侦察情况。这支侦察分队在19号拂晓以前离开了主防线，但很快就陷入了机关枪、步枪和手榴弹的火力圈。

证实敌人准备在高地逗留以后，上校科迪罗对形势作了估计。他认为，激烈的炮火以及后来的进攻已经大大消耗了B连的兵力，高地上仅有他们的一些残余力量。他估计目前敌人将会以轻武器，轻机枪和轻迫击炮去坚守高地。围绕着这高地的制高点是齐胸深的壕沟和四个地堡。在山脚下，在所有的通道上，敌人已经建立了以班为单位的战斗工事。

9月20日晨，第2营营长，上校贝特斯命令E连出动2

个排向高地进攻。下午后半晌，其中的1个排在连长中校哈罗德·L·詹斯姆的带领下，冲上了山顶。但是另1个排仍然象老牛拉破车一样迟迟没有进展。然而，共产党却丝毫不打算让出高地的所有权，他们马上派出力量前往增强防守。由中校詹斯姆带领的那个排也开始遭到轻武器，机关枪以及迫击炮的袭击，造成一定数量的伤亡；另1个排在前往制高点的路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射击。面对敌人的奋力抵抗，这两个排的死伤人数在增加，于是他们便撤退到主防线。

同一个时候，由少将阿伯特·C·戴维斯指挥的第1营也准备经过第2营的阵地进行反冲锋。9月20日夜里，由中校圣克莱尔·斯特雷带领的A连出击，准备从南面发动反击；由中校罗伯特·E·史蒂文斯带领的C连向高地前进。当这些人经过通往高地的山谷时，敌人的炮火变得很激烈。

当这2个连正准备上山时，B连前往支援。此时敌人炮火密集，这个连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最后，B连只剩26人，被迫放弃该连的使命。

A、C两个连也遭到了中国军队轻武器，机关枪以及迫击炮的沉重打击；另外，当第1营士兵向山顶冲锋时，中国人使用了定时引信炮弹。无数炮弹在A、C连上空爆炸，使得他们惊惶失措。中校斯特雷被迫后撤，重新组织A连的力量；与此同时，中校史蒂文斯和他的2个排被困在高地的一侧，在这一紧要关头，斯特雷和史蒂文斯各人只有大约60人的兵力，而敌人估计在高地上有300人，而且随时都在补充力量。

9月21日，联合国军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出了猛烈的炮火，但当A、C连的残余部队向中国军队逼近时，敌人再次使用轻武器和手榴弹反击。C连的2个班在快到中午时几乎

到达了制高点，只是因为遇到了敌人的密集炮火，他们才又被迫退回壕沟里。敌人的炮火刚停息，他们的反冲锋就开始，迫使C连彻底败退。下午前半晌，少将戴维斯命令其A、B和C连返回连部所在地，在高地争夺战中，A、B、C连共死伤70余人。当天晚上，第3营接替了第1营，高地的战斗缓和下来，共持续了7天之久。

第3营接管了第1营的阵地，9月20日刚上任的第3营营长，中校劳埃德·E·威尔斯和他的下属一起起草了一个重新夺取高地的计划。鉴于前面以1个排到4个排的兵力进攻都未能使共产党退出高地，中校威尔斯请求使用他的3个步枪连。K连，由上尉威廉·C·恩格里斯指挥，将从东路进击；L连，由中校弗烈德里克·伯格尔指挥，将从西路进攻；I连，由中校本·W·奥尔普特指挥，将作为预备队。

9月24日凌晨5时20分开始，以营长中校马里尔·迪梅尔为首的第58野战炮兵营向高地和高地周围的中国阵地发射105榴弹炮火达30分钟之久。与此同时，第64坦克营的1个排的坦克向高地僥镜行驶，准备支援第3营的进攻。凌晨5时40分，K、L连来到了他们的反击位置，向敌人阵地冲锋达半个钟头。在上尉恩格里斯和他的K连士兵接近高地时，中国军队用密集的轻武器，机关枪、大炮和迫击炮向他们猛烈开火，很快就把K连困住。敌人的猛烈炮火以及K连本身伤亡惨重使得该连士兵心慌意乱。为防止连队溃散，控制伤亡人数，恩格里斯请求撤退，重新组织力量。晨7时，上校科迪罗回绝了这一请求，命令部队继续进攻，此后不久，与该连的联络也中断了，炮兵前沿观察员设法召集了该连的10个士兵，但是，该营营长，上校威尔斯命令他带着这

一小股力量继续战斗。

在西坡，L连在晨6时35分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动了攻势。冒着猛烈的迫击炮火，其中1个班于7时20分到达制高点，然后迅速请求坦克炮火；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这个班的士兵无法前进，被迫停止在南坡上的壕沟里，这时中国军队的炮火变得更加猛烈。

直到早上8时，也未能与K连联系上，上校科迪罗命令I连向105高地的背面移动，准备接管K连的阵地。中校奥尔普特带领他的人马向105高地出发，但是敌人的炮火使得他们寸步难行，并且受到了几次沉重的打击，士兵们纷纷溃散，向主防线逃跑。上校威尔斯派其三等中士，上尉鲍尔·O·恩格尔前往重整该连力量，因为在敌人狂轰以后，他们与中校奥尔普特已经失去了联系。上午9点钟，上校威尔斯离开阵地前往组织I和K连的残余力量，这些人为迅速逃回主防线，一个个丢盔解甲，狼狈不堪。

由于其他2个连队已被打得溃不成军，山顶上也只剩下L连的一些残存力量，局势看来相当严重。L连的2个班被困在高地南坡的壕沟里，上校科迪罗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战斗。

上午10点钟，上校威尔斯终于与中校奥尔普特取得了联系，I连也已重新组编了2个排的力量，其他的士兵则去向不明。上校威尔斯电话请示助理师长，准将查理斯·L·达谢尔，告诉他该营已经有将近2个排的力量可以参加战斗。准将达谢尔告诉威尔斯停止进攻，继续组织力量。在这次战斗中，这个营伤亡达140人。下午上半晌，L连的人马后撤完毕，开始重新组编散落人员。但是师长、少将罗伯特·L·杜兰尼决定该营不再进攻高地。9月24日夜晚，第3营回

到后方，这一段，第65团只局限于日常的一些侦察巡逻任务，9月30日，韩军第1师接替了第3师。

从9月17日到24日，在夺取和围歼敌人工事的战斗中，第65团伤亡人数大约为350人，也就是说损失了10%的实际力量，但这并不说明该团在战斗中存在什么不足之处，上校科迪罗在其月终总结时说，他的部队在此期间战斗失调是由于实行轮换制度所致。

从1952年1月到9月这段时间里，上校科迪罗指出，他的团总共轮换了将近8,700人，其中包括1,500人未经委任的军官，而目前可以用来接替这样的军官却只有435名，在许多步枪排里，连长们只好把一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当作一等兵来用或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在上级授以该团的811名三级上等兵中，经过正式授军令的只有381人，而这些人大都是在最近轮换时才提升的；科迪罗上校又说，尽管兵团里的许多波多黎各人高度团结一致，但一旦连、排领导遭到伤亡，部队的战斗指挥能力就明显下降，而且每当连、排军官有所损失，进攻行动就难以维持，军队就变得涣散无力。上校科迪罗要求每月给他的团提供400名士兵，包括三级上等兵在内，只有这样，他才能改善目前部队存在的不足之处。

虽然上校科迪罗没有提到语言的障碍，但不能忽略的是，团的绝大多数士兵讲的是西班牙语，使说英语的军官们无法与那些讲西班牙语的士兵们交流。

在这场赌注中，该团面临的对手是中共第348团的具有技术的英勇部队，他们守住了高地，因为他们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大炮、迫击炮、自动武器和轻武器，他们有效地加强了自己的后备力量，成功地阻击和打退了第65团的进攻。因

此，第65团夺取这一高地的失败有以下两方面原因：自身人员的不足以及敌方强大火力的攻势和使用武器的技巧。

三、白马山战斗

由于敌人企图在冬季到来以前改善其防守力量，共产党的活动于1952年初秋就开始猖獗起来。在所有这些高地争夺战中，第8集团军只参加了这场战斗。也许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战斗要算10月初发生在铁原以西，美国第9军团战线的一场战斗。

10月3日，第8集团军得悉，敌人准备进攻白马山（395号高地）。该高地在韩军第9师前沿阵地上，离铁原的西北面大约5英里。从白马山的西北方向一直到东南方向大约有一条长达2英里的丛林山丘地带，而白马山又是这片地方的最高点，从山上俯视山谷，可以清楚地察看通往铁原的西向通路上的动向，假如失去这一高地，第9军团就只好撤到驿谷川以南的另一块高地上，使得第9军团无法利用这块地方的道路交通网，就可以给敌人的进攻和侦察大开方便之门。

其他情报来源也证实了这个消息。第9军团马上加强韩军第9师的力量，由少将金中沃任师长，地面方面额外配备坦克、大炮、火箭发射器以及高射炮等。金将军派遣2个步兵营防守在该高地的第一线战斗区域，1个步兵团加1个营的力量为预备队。在白马山的两侧，并配备了坦克和高射炮，准备夹击通向山谷的道路。天黑以后，探照灯、照明弹照亮了整个夜空，1架照明飞机也准备随时提供必要的更大程度的照明。第5航空队也出动飞机对白马山邻近的敌人阵

地进行空袭，当进攻时刻逼近，韩军第9师及其下属各部队均已准备就绪。

10月6日，在敌人准备向白马山进攻时，他们把潘纳河水库的分洪闸打开了，该水库位于高地以北大约7英里的地方。显然，他们是想让流经韩国第9师和美国第2师的驿谷川河的水位猛烈上升，在关键时刻中断我方的后备力量。水位马上上升了好几英尺，一瞬间，就给我方带来了战术障碍，但中国军队不仅仅依赖自然条件，他们向山谷对面，白马山东南面2英里的281高地（又名箭头山）派出了1个营的兵力，企图牵制高地两边的1个法国营和占领第2师的阵地。黄昏到来以前，他们又派出另外6个连参加这一行动。法国人死死守住阵地，并向进犯者猛烈回击，造成敌人的严重伤亡。随后10月9日和12日，敌人发动了类似的冲锋，但都遭到同样惨重的打击。在这一次牵制性战斗中，281高地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代价是昂贵的。

与此同时，中共部队第38军第114师第340团的2个营向白马山西北端移动。在强烈炮火对韩军第9师的阵地狂轰一阵后，中国军队3次试图突破韩军的防线，每一次他们都被韩国第30步兵团击退，头一天夜里，敌人死伤达1,500人，而韩国部队只死伤300人，第二天，中国军队无视这一惨重损失，召集了原来2个营的残兵败将，并从同一个师里调来2个营加强他们的力量。中国军队突破了韩国一个连的工事，强行驱使韩军第30团撤出制高点。在遭受惨重损失后的不到2个钟头，韩军第28团的2个营发起一次夜间冲锋，把敌人从韩军的阵地上赶了下去，敌人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第3天，军团前线的其他各路佯攻均停息下来，主要力量都放在395号高地上。每天，中国人的大炮和迫击炮平均

发出4,500发炮弹支援步兵的进攻行动，并且不断组织力量准备战斗。10月8日，分别从第112师第334团和第114师第342团派出2个营前往接应白马山附近被打得溃不成军的部队。第342团的精锐部队于当天下午冲上了制高点，只是因为韩军第28团的反攻而又败退了。

中国人毫不畏惧，第2天，他们又组织另1个营发起冲锋。韩军第9师师长，金将军，出动其第26团2个营的兵力前往395号高地支援那里的第28团。整整一天，双方犹如坐在跷跷板上，一会你占上风，一会我占上风。10月10日清早，第29团报告，他们控制了山头。

据后来获悉，10月9日联合国军的部队显然是幸运的。在395号高地的北边的一块高地上，第5航空队的飞机碰上了112师第335团，由于对该团实施了突然袭击，造成该团重大的伤亡，拖延了他们进攻的时间。

到10月10日，战斗又全面展开。面对伤亡，敌人毫不畏惧，他们继续派出密集步兵队伍向高地进攻。显然，每一次都担负着一项任务，尽管损失很大，他们还是坚持完成任务。在白马山，中国军队一直坚持汇集他们的战斗部队向西面通路进攻，在那里，第8集团军的大炮、坦克以及空中力量可能会给予狠狠地报复。敌人急于求成想夺取白马山，结果却使其步兵马上可拿到手的猎物跑掉了，因为第9军团动用了所有口径的大炮，以压倒优势的密集火力进行了全面的最大袭击。

10月12日，激烈的战斗终于平息下来。韩国第30团穿过第29团的壕沟进行反冲锋。当天早上，第28团穿过第30团所在地，强行进攻。韩军第9师一次又一次地交互使用主力团和替换团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造成敌人重大伤亡。至10月15

日，白马山之战结束了。

在这场长达10天的争夺战中，中国人出动了大约15,000名步兵和8,000名援兵，但是他们未能使韩军第9师挪动一步。在这次战斗中，韩军发起冲锋9次，共产党发起28次冲锋；韩军虽损失达3,500多人，但是他们并没有遭到中共第38军的致命打击；在中共第38军的9个团当中，有7个团参加了白马山以及281高地的战斗，死伤人数将近10,000人。

战斗自始至终，金将军都及时地给部队更换新生的进攻和防守力量，这都大大地鼓舞了韩军部队，促使他们作出更大的努力。韩国部队顶住了中国步兵的猛烈进攻，在整个战斗中承受了敌人55,000发炮弹的压力。韩军第9师的战斗表现对该师的领导方式、技巧和经验都是一次绝妙的考验，事实证明韩国陆军是大有前途的，范弗里特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

第9师得到了空军、装甲兵和炮兵等后备力量的强有力支持。白天，第5航空队出动了669架次飞机，夜间，他们又派出76架次轰炸机执行任务。10天里，空军投下了2,700枚炸弹和358枚凝固汽油弹，发射了750枚火箭炮炮弹，所有这些攻击目标都对准敌人士兵密集的地方或是防守工事。仅第9军团炮兵就向敌人发出了185,000发炮弹。坦克和高射炮保卫了高地的各个侧面，防止敌人各个击破。在白马山战斗打响以前，因为有可靠的情报做依据，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加上部队都受过训练，士兵技术全面，又得到空军、装甲兵和炮兵的大力支援，防守战斗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白马山之战看来就是克拉克将军初夏所强调过的典型的战斗。

四、杰克逊高地

除对281高地发动进攻外，中国军队还企图通过威胁391高地上的韩军防守工事来瓦解韩军第9师的力量，391高地离白马山东北面大约7英里，位于该师的东边前沿阵地。激烈的战斗从10月6号一直打到10月12日，敌人的炮火向高地铺天盖地而来，在韩军部队后退后，美国第7师的1个加强连企图于10月13日夺回失去的阵地，但落空了。

10月16日，白马山战斗刚结束，韩军第9师马上派出其第28团的1个营袭击391高地。该营顺利到达山顶，并一直控制了山头。从10月20日到10月22日，敌人不断反冲锋，重新夺回了高地。10月23日，经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后，韩国第51团士兵又把敌人赶下了山，接着敌人又发动了一次反冲锋，韩军部队被迫撤离。第二天夜晚，第65团接防第51团。

自从在争夺战中被挫败以来，第65团一直在从事各种训练，指挥员是新上任的上校查斯特·B·德卡夫。然而，两个月的紧张训练也未能改进该团的不足之处——缺乏排一级有经验的官员，但是，该部队还是再次被安排担负主防线上的一部分任务。

从10月24日到25日的夜晚，在上尉齐治·D·杰克逊的率领下，G连占领了391号高地正南方的一块高地，很快人们就称之为杰克逊高地，这块地方有许多地堡，足可以在里面设立3个步兵排的指挥部、连部和前线炮兵观察所等，但是没有一个适用于发射炮位。上尉杰克逊企图改善一下这些防守工事，但未能如愿，因为敌人炮火猛烈，而且周围高地上的敌人对G连的动向了如指掌。

在该连的对面，是中共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的第3营。第87团的指挥员是霍英华。25日下午，在大炮的火力支援下，第87团开始从驼峰岭向杰克逊高地发射76毫米的炮弹。随后敌人的80毫米以及120毫米迫击炮开火，到黄昏时刻，G连共遭到250发迫击炮和大炮炮弹的袭击，死伤9人。

当天晚上，敌人派出巡逻队侦察G连部队分布情况，并且继续以猛烈炮火袭击杰克逊高地。上尉杰克逊用60毫米的迫击炮和前来支援的大炮等猛烈开火，粉碎了敌人的侦察。

10月26日下午后半晌，敌人从驼峰岭发出260多发76毫米的炮弹，造成14人以上的死伤。当天晚上，连部监听所提供情报，报告中国人在附近一带活动着，并正在挖战壕。高地西南侧的监听所报告有2个中国人进入了手榴弹投掷范围，值班的监听人员随后获准用手榴弹回击这2个入侵者。这两个士兵仓促逃跑，迫击炮向他们发射炮火，他们跑得更快了。

半夜刚过，敌人的1个排袭击了杰克逊高地的北面通路，随后遭到炮火的袭击而后撤了。1小时以后，另1个排在北面出现，并逼近手榴弹范围区。经过15分钟的交火，中国人撤退了，估计死伤达17人。

随后相对沉静了8个钟头。约在10月27日上午9时30分，驼峰岭的76毫米炮火又开始了。其中一枚炮弹正好落在迫击炮弹存放处，顿时，除剩大约150枚炮弹外，其余炮弹几乎同时爆炸。当夜幕降临，中国军队继续炮击杰克逊阵地。此时，杰克逊阵地，只剩下1个拥有2门迫击炮和7个士兵的迫击炮排，另1个排又失去了排长和中士。杰克逊上

尉报告第2营，他需要援助，需要向高地发射烟幕弹，防止敌人察看该连的行动。营部告诉他要保持冷静，烟幕弹及其他援助都已开始进行。

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差不多。就在杰克逊请求援助1小时以后，他们向G连阵地发出密集的炮火，然后估计有1个连从北面向高地移动。杰克逊和他的士兵们用剩余的迫击炮、自动武器、轻武器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这次冲锋。

当天夜里，敌人发起了第2次冲锋。开始中国军队的炮兵在半小时内大约向杰克逊高地发射了1,000发炮弹，随后大约1个连从北面出击，另一个连从南面扑过来。杰克逊请求对该地区进行最后的援助，局势终于明朗化，杰克逊的炮弹堆放处又着火了，这时，敌人成扇形展开，从各个方向向杰克逊高地扑来。

此时此刻，连队联络中士终于报告，在这个地区他们只剩下3人了，他请求撤退。尽管弄不清中士的行动是否自发的，营长贝特斯上校估计这是连长的请求，他命令G连撤退。当上尉杰克逊得悉后撤的命令，他企图想更改这一做法，但是联络线中断，无线电联络系统效果也极差。

但不管怎样，上尉杰克逊还是向其排长们转达了撤退的命令。第1、2排从高地东侧下去，他跟着第3排从西侧下山。他所在的排在半路上遇到了敌人猛烈的轻武器袭击，在战斗中，他和他的士兵们走散了，但最后还是回到了主防线。

当上校德卡夫得悉G连撤退的消息以后，他迅速命令中校约翰·D·鲍特费尔带领A连接受上校贝特斯的反击战斗的行动安排，准备重新夺取高地。A连只参加进攻阶段的行动；F连将由上尉威尔斯·D·克罗海特指挥参加进攻行动

并负责修建防守工事；C连由中校史蒂文斯指挥，假如有必要增加后备力量的话，他们将准备接受第2营的战斗行动安排。

28日拂晓，上尉克罗海特带领F连向杰克逊高地攻击。中国人用轻武器，自动武器和手榴弹给予反击，但到上午10点钟，F连控制了制高点。与此同时，由中校鲍特费尔带领的A连受到敌人炮火的袭击而停滞不前。但是后来，其中2个排冒着敌人的炮火向上冲，在山顶与F连汇合，其余的排被迫击炮火压制在山腰。

看来大局已定，但是中国人的炮火使A连军官们指挥失灵，其中一个排长被炮弹打中，当场死亡；然后又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连部指挥所的中心，中校鲍特费尔和前线观察员当场死亡，剩下的那个排长受伤，指挥系统所遭受的损失马上明显地在连队引起影响，A、F连的士兵开始“逃窜”。他们有的独自跑下山，有的则三五成群后撤，终于都跑回到主防线。到下午后半晌，只有上尉克罗海特和连级军官们留在山上，其他所有士兵都已尾随A连跑走了。

第2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些逃窜的士兵召集在一起，企图再度把他们送回杰克逊高地，但一切都趋于徒劳。这些士兵此时显然把高地看作是自杀的场地，他们拒绝返回。当夜幕降临，上校贝特斯命令上尉克罗海特和其他军官全部撤离高地。

第2天，第65团再度为夺取杰克逊高地而努力。上校德卡夫命令第一营的营长戴维斯少将负责这次行动。10月29日清早，戴维斯派中校史蒂文斯带领C连向杰克逊高地挺进。该连爬上山顶，在没有任何敌人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高地，情况看来很顺利，敌人的大炮都在沉默着，没有任何反攻迹

象。突然，恐惧来临，士兵们乱作一团。中校史蒂文斯及其随从官员发现他们周围只剩寥寥无几的士兵。他们再度召集分散的士兵，命令他们上山，但竟有50多人拒绝。少将戴维斯最后不得不召唤中校史蒂文斯和他那少得可怜的人马，让他们退回屯防线。

这说明第65团已无力再去夺取杰克逊高地。师长，少将乔治·W·史密斯命令第15团于当天夜里接管第65团的任务。11月，第65团又被调回接受一次紧张的训练。史密斯将军要求，在第65团接受再训练期间，必须由一个受过训练的、具有战斗力的团长取代该团团长，或者起码在四个月内接管这个部队。假如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他继续说，他赞成重新改编这个团，保留60%的原建制人员，把其他人员编到别的步兵部队去。

总之，10月底，美国第15团接管了第65团的防守任务。11月上旬，杰克逊高地上的防御工事常常受到敌人的袭击，到11月中旬，杰克逊高地的工事只有两个仍掌握在第3师的手里。11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高地上的工事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并有几次进犯，但是第15团的精锐部队竭尽全力，直到月底都紧紧地保住了这一珍贵的阵地。

五、"摊牌"战役

9月底10月初，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范弗里特对此表示越来越大的关注。在10月5日写给克拉克的信中，他敦促尽快通过一项在美国第9军团前线发动一切有限目标的进攻计划，他说："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使

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最惨重的伤亡。”

为避免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范弗里特建议采纳第9军团名为“摊牌”的行动计划。他认为那样将会改善金化以北防线的情况。范弗里特指出，在该城以北不到3英里的地方，第9军团和敌人的军队都设有工事，双方间隔只有200码。在598高地和该高地东北面大约1英里多的地方有一条从西北伸向东南的狙击岭山脉，那里的敌对力量正好卡住了我方的咽喉，故此死伤就相应要大得多。假如能把敌人驱逐出这些山头，范弗里特继续说，他们将不得不后撤到1,250码以远的另一个防守阵地。考虑目前弹药库存所能提供的最大火力以及空中力量的最大近战支援，第8集团军司令对“摊牌”的可能性是乐观的。

虽然克拉克在过去曾反对过夺取高地的冒险行动，但是他也终于表示，“摊牌”将可以非同寻常地创造一个好机会，可以不付出过大的牺牲就能拿下一些阵地。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仅美国第7师和韩军第2师的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使命。野战司令官们估计，此行动将进行5天，会造成200人的伤亡。由于有多达16个炮兵营的280门大炮和200多架次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援，估计步兵不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总之，10月8日克拉克批准了“摊牌”计划，但仍提醒范弗里特对该行动只作例行的新闻报道，同时要特别考虑夺取高地的战术意义。

然而“摊牌”行动一开始就挨了中国军队的当头一棒。由于白马山战斗的需要，炮兵的支援不得不中断，准备好的5天空袭行动也只好减为2天了，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并且很

快就表明他们打算继续占据598高地——狙击岭一带地形。

598号高地是美国人的进攻目标，它位于一个V字形山脉地段的最南端。在其左翼的最末端是笔峰，在其右翼，从北到南是两座小得多的基督珍妮·罗素山和桑德山。由于598高地地带很象一个三角形，所以很快它就被说成是“三角山”。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的一支精锐部队，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的1个营夺取了这一地带，和以往一样，中国人在山上深挖堑壕，配备足够的弹药装备，封锁了增援的路线。

7师师长，韦恩·C·史密斯少将把占领“三角山”的任务交给了由劳埃德·R·摩西率领的第31步兵团。虽然原先计划只用1个营的兵力进攻，但是摩西上校及其官员们估计敌人的反击一定会比预计的要强烈，只用1个营的兵力去对抗敌人是不现实的，他们把占领“三角山”右翼的任务交给了迈伦·麦克卢尔中校指挥的第1营；把占领左翼的任务交给了罗伯特·H·纽博尼指挥的第3营，也就是说主攻力量在行动以前就增加了一倍。

经过一番轰炸以后，炮兵把一吨吨的炸药“搬到”了“三角山。”纽博尼少将命令第3营以连为纵队向“三角山”的制高点进攻。由勃纳特·T·布鲁克斯中校为首的L连首先出发，紧接着是查理斯·L·马丁带领的K连，由马克斯·R·斯托瓦带领的I连则留守作为后备力量，随时准备支援它的姐妹连——L和K连。

正当布鲁克斯中校带领他的连队跨出阵地，他们立即就遭到伏击。598高地上一个碉堡里的中国士兵用手榴弹、自动武器、爆破筒和石块等阻击L连的进攻，不到半小时，布鲁克斯以及他的全部排长们都陆续阵亡，剩余的人被压制在

敌人碉堡下面的一块小小的凹地里。

趁火力稍有停息，马丁中校带领他的K连前进，此时坦克朝敌人阵地开火，把一直射击着的碉堡炸平了，马丁与L连汇集后，继续带领士兵进攻。

这2个连队的不少士兵拼命往598高地上的壕壕冲击，但是中国人显然没有撤出阵地的意图，他们的手榴弹雨点般地飞落下来，轻武器、自动武器和爆破筒接连不断地向第3营袭击过来。

鉴于死伤人数上升，进攻速度再度减缓，纽博尼少将命令I连投入战斗。斯托瓦上尉带领他的士兵经第1营占领的桑德山前进，然后沿着西南方向通往598高地的山路移动。因为中国人隐蔽得很好，所以I连不得不放慢步伐，边走边消灭壕沟里的敌人。黄昏，敌人集中火力进行反攻，斯托瓦的士兵开始遭到越来越猛的炮火的攻击，斯托瓦请求炮火援助。共军第135团里的2个连，冒着各方支援第3营的密集炮火冲过火线，用轻武器、自动武器和手榴弹打击I连。

敌人的顽强抵抗以及第31团死伤人数的剧增使得摩西上校和纽博尼少将商议决定于当天晚上的上半夜把3个步兵连撤回主防线，到21点，第3营重整旗鼓，拿下了阵地。

在第1营阵地，麦克卢尔上校选择了A连，加强兵力后，由爱德华特·R·肖沃尔特中校带领，开始向珍妮·罗素山和桑德山发动进攻。B、C两连分别由威廉·B·扬和罗伊·W·普雷斯顿上尉带领留守待命。

第1营的遭遇和第3营有一些类同。敌人用轻武器、自动武器迅速把肖沃尔特的人马阻击住，肖沃尔特首先阵亡，部队被迫撤退。麦克卢尔上校不得不下令B连和C连加强进攻，命令他们继续挺进。当天下午上半晌，B、C两个连的

战士冲上了珍妮·罗素高地的山顶，并且马上准备防御工事，应付敌人即将发动的反击。

果然不出所料，在珍妮·罗素山失守以后，敌人组织了4次强大反攻，企图重新夺回阵地。每一次都是以密集的炮火打头阵。在敌人的第3次冲锋趋于尾声时，麦克卢尔的人马陷于困境，原因是弹药供应中断，朝鲜运载货物的车辆实在不愿意驶往那炮火连天的阵地。

正当第135团的1个加强营准备第4次冲锋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军队的袭击部队穿过他们自己大炮和迫击炮以及第1营最后救援的火力网，他们置个人安危以度外，一些战场观察家认为这很可能是他们服用药物的结果。这些中国人步步逼近战壕，双方展开了一场白刃战。此时第1营弹药已尽，摩西上校决定撤回主防线，抬着伤员，扛着仅有的一点武器装备，这3个连队于半夜回到了防线。

第一天的战斗结束了，结果表明中国军队为了占据三角山高地是愿意付出代价的，冒着重大的伤亡，他们阻击了第31团2个营的进攻。下一次行动就看第7师的了。

10月15日，史密斯将军指派2个新编的营去夺取"三角山"。第32团的第1营（在这次战斗中属第31团指挥），接受了占领珍妮·罗素山和桑德山的使命。至于攻占598高地的任务，摩西上校指派沃伦·B·菲莉斯少将带领的第2营负责。

菲莉斯少将决定重复纽博尼少将前一天的计划，以连为纵队发动进攻，E连打头阵，随后就是F、G连。

首先，准备好的大炮、迫击炮向高地狂轰滥炸一阵，接着中校威廉·C·克勒普带领E连直冲山顶。冒着敌人的炮火，克勒普和他的士兵们到达了外围壕沟，他们开始破实

敌人的明、暗碉堡。没有遇到敌人的强烈抵抗，他们就占领了598高地，然后继续向笔峰进击，在那里，他们发现中国军队挖有很深的洞穴和壕沟，完全有可能使整个部队都隐蔽在里面。

同一时刻，约瑟夫·V·吉思曼上尉带领的F连穿过E连在598高地上的阵地，沿着东北山脊向桑德山前进；G连冲上了598高地的制高点，准备在其姐妹连遇难时加强力量，并协助加固防御工事，以便应付敌人的反扑。

第32团第1营营长西摩·L·戈尔伯尼少将也指令其连队展开纵队形向珍妮·罗素山进发。中校鲁多夫·M·特玛斯带领的连队冲在最前面，紧跟着的是上尉詹姆斯·E·厄尼带领的C连；中校约翰·H·格林为首的B连则作为预备队。

起初，进展很顺利。A连由B连协助，只碰上轻微的抵抗。但当他们接近山顶时，第135团的1个加强营向他们猛扑过来，展开了一场强有力的反攻。敌人的反扑迫使第1营退却并重新编组，第31团的I连归戈尔伯尼少将指挥，随后，他们配合第2营在桑德山准备抵抗敌人的反冲锋。

10月15日下午，第2营加上I连都归属第32团，由约瑟夫·R·拉斯上校指挥，此刻，负责夺取"三角山"战斗的指挥员就是拉斯上校了。

10月15日到16日夜晚，敌人密集的炮火不断轰击着"三角山"的美军阵地，随后他们以排为单位向"三角山"进攻，但他们很快就被打退了。

10月16日清晨，史密斯将军批准第17团的第2营归属第32团指挥，准备当天下午对珍妮·罗素山发动攻势。第2营由路易斯·R·布克勒带领，不费很大力气就拿下了高地。

然而，在“三角山”的左翼，第31团的第2营却没有任何进展，他们无法拿下派克山山峰。10月16日黄昏时刻，中国人开始对邻近山峰的第2营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在这些战斗中，具有骑士风度的E连连长克勒普失去了生命。第2营向中国人开火，企图驱赶敌人，但恰恰相反，直至10月17日，他们也未能把这些中国人从山峰上赶下去。

在此危急时刻，上校拉斯发现他的3个营冲上了“三角山”。他所在的第1营在598高地上；第31团的第2营在面对派克山山峰的左翼上；第17团的第2营控制了珍妮·罗素山。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派出第45师第134团投入战斗，他们仍然控制了象碉堡般坚固的笔峰。

10月17日下午，第17团第3营由中校詹姆斯·L·斯波尔门率领接防第31团第2营的阵地。同一时刻，第32团的第1营被迫从“三角山”撤退。因此，当战斗进入第5天时，拉斯上校负责指挥第17团2个营的行动。

斯波尔门上校所在的营负责在10月18日占领最后的目标——派克峰。预先准备好的炮火射向中国军队的阵地。中校威廉·E·坎茨尔带领L连冲上了山顶，并开始组织防守力量；I连，由上尉约瑟夫·H·霍夫曼带领，穿过L连阵地，占领了堑壕，企图把中国军队赶下山。但中国军队又一次表明，他们是撵不走的，I连只好停止进攻。

10月19日天黑几小时后，共军第134团的2个连向L连所在的阵地蜂拥而上，双方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从后来证实的消息中可知，共军是授命战斗到死的。斯波尔门上校马上请求加强连的援助，当时坎茨尔中校已被击中，敌人又攻下了笔峰。来自17团的M、H连队的士兵跑步前往支援L连；此时，L连的全部军官不是阵亡就是失踪，该连士兵

正在往598高地的东南方向退却；更为甚者，支援第3营的大炮、迫击炮弹却开始捉弄性地落在撤退部队的附近，因此，为了稍为稳定局势，他们只好停止炮击。

拉斯上校马上派出第32团第1营的2个连前往支援被围困的第3营；他们集中所有的大炮、迫击炮轰炸“三角山”的左翼，阻止敌人疯狂的进攻。前往支援的部队终于慢慢缓息下来，中国军队也停止了战斗。10月20日晨6时左右，斯波尔门上校报告有一些敌军部队正在退却，他请示以强大的密集炮火轰炸通往派克峰的退路。当敌人开始大批撤退时，斯波尔门要求各团“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轰炸派克峰”。后来人们发现在第3营的战斗日记中有这样一条简单的留言：“照办”。结果，中国人后退了，他们纷纷钻进了在派克峰上的防空洞和战壕里。

随后炮火停息了。第32团的第1、3营前往接防第17团。10月22日，第32团第2营由约翰·M·萨拉斯少将率领接防在“三角山”左翼的第1营。由普默西·W·布朗带领的第3营驻守右翼。

10月23日，战斗又一次打响，中国军队企图再次用武力把第32团的部队从高地一带撵走。黄昏，中共炮兵部队向“三角山”的第32团阵地开火，炮轰达1小时之久，随后，大约中共第45师的3个到6个连的兵力从派克峰向F连发起进攻，敌人使用轻武器、自动武器、机关枪和手榴炸，步步逼近。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G连士兵只好向F连方向移动，赶在中共部队减缓进攻以前增援F连。

在珍妮·罗素山，大约有2个连的中共部队也在袭击第2营的同时发起了进攻。但第3营防线只受到部分的突破，而且当支援力量赶到时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当韩军第2师于10月25日增援第7师时，中国军队仍然占领着派克峰。该师的9个步兵营有8个营参加了这场为期12天的战斗，死伤人数达2000人之多。

在其它高地争夺战中，“摊牌”行动吸取了不少早先的教训。这一点，在史密斯将军对此次行动所作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他说，所有的武器装备和部队都应参与类似地形高地的争夺战，以便每个士兵、每个部队才会明确他们的目标对整个行动的成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强调迅速接近敌人以及持续不断发动进攻的重要性；他认为，假如进攻部队的官员们不要求部队作牵制性的进攻，在整个战斗中，伤亡人数就会减少；他又说，一旦部队夺取了制高点，他们必须迅速深挖战壕，建立防御工事。他认为，敌人之所以能够在他刚刚夺取过来的阵地上发射密集炮火，迅速地组织反攻，是因为他们能够很快地组织防守力量，迅速挖掘战壕。

为了保持部队在前线始终精神振作，防止战斗的损失严重地影响士气，史密斯将军时而轮换其参加“三角山”战斗的部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金将军在白马山的做法相同。他认为斗志昂扬的部队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夺取这种地形的高地，才能有效地驱逐敌人。第7师师长指出，后备部队应该集结在军事上难以取胜的地形附近，因为他们不宜夜间长途跋涉，而中国军队又往往在这个时候出击，从而使得他们无法准时赶到实施支援；最后，他又指出了指挥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在进攻部队里颇有点名声的官员们，他们应该能够有效地指挥战斗。

“摊牌”行动得到了一个令人嘲讽的结局。10月25日，韩军第2师接替了美军第7师的阵地后，又开始参加夺取狙击岭的激烈战斗。中共部队和南朝鲜军队为占领高地打了好

几个回合，但任何一方都未能取得对高地的完全控制权，所以当韩军第2师授命去攻打“三角山”之际，它仍然没有摆脱狙击岭的战斗。

10月30日，中共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把598高地从韩军的手里夺了过去；11月1日，敌人经过一场激战后又占领了珍妮·罗素山。此后，中国军队对韩军穷追猛打，死伤人数剧增，11月5日，詹金斯将军中断了对“三角山”的进攻。

攻占狙击岭的战斗持续到11月8日，这时韩军部队是“摊牌”以来第14次部分占领高地。在这后半个月，来自中国军队的压力减弱了，威胁韩军的巡逻队以及探照灯也减少了。

至此，6个星期的艰苦奋战过去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控制了狙击岭的一部分，但失去了整个“三角山”。在“三角山”5天战斗中，他们由最初的2个营的兵力发展到2个师以上的兵力，死伤人数由200人增加到9,000人。尽管中国人大概在这场战斗中耗费了19,000名士兵，但是他们丝毫不感到缺乏兵力，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为夺取有战术意义的高地，他们是愿意付出重大牺牲的。“三角山”之战，中国军队以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扭转了白马山之战的败局，挽回了面子，并且迫使联合国军停止进攻。

双方的激战于10月中旬开始，于11月平息下来。天气渐冷，前线又恢复了原来的巡逻、侦察和小规模的遭遇战。颇为令人费解的是，尽管10月战斗区域活动频繁，但是共产党在前线的兵力实际上要比他们5月时少得多。在这6个月里，中国人已经在后方建立了大约拥有36,000名士兵的后备军，补充了4个武器装备及人员充足的炮兵团。然而，到

10月底，在面对联合国军强大力量的前线，他们只出动了为数不多的80,000多名士兵。这一数字的变化将意味着共产党在今后的战斗中要弄什么新花招，至今仍不详知。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有可能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他们总的兵力在同一时期已增加到6万人以上。敌人兵力大揽在手，在即将来临的寒冬，他们将是以攻为守还是以守为攻呢？！

第十四章　1952年中期的海战和空战

一、战略和战术意义的空战

虽然共产党在地面兵力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依然控制着北朝鲜的领空。尽管敌人在满洲里建立了他们的空中力量，但在1952年春，共产党在空中力量方面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是无法伦比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歼击机、轰炸机任意在空中飞行，只是偶尔才和敌人有一场小型的遭遇战。

5月，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战行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铁路系统的封锁计划和停战谈判同等重要。每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破坏了共产党的铁路运输线，他们就只好出动修理部队把它修好，由此可见，“进一步对铁路系统发动进攻，事实上，就是拿技术熟练的飞行员以及现代化的先进空中装备去对抗未经训练的、用锄头和铁锹武装起来的东方苦力。”假如要继续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接受停战，看来必须改变目前对铁路系统封锁递减的状况。

这样一来，5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对铁路系统的封锁范围就扩大了。在前线，第5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集中力量袭击敌人的弹药库、设备以及攻击人员密集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型轰炸机开始把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机场、铁路系

统、弹药库和联络中心上。空中行动的第一步是：5月8日485架战斗轰炸机在离平壤东南40英里远的地方——遂安上空进行了时间长达13个钟头的轰炸，大面积地摧毁建筑物、弹药库、车辆以及炮火阵地，造成了开战以来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

北朝鲜发电厂

随后对破坏铁路系统的兴趣逐渐减弱，空战策划者们开始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目标，他们又一次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尚未受到破坏的北朝鲜水力发电厂上。位于鸭绿江边的细湖堤坝和工厂也是他们感兴趣的目标，因为这些工厂给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提供能源。为了避免让中国人找到干预的借口，美国领导人曾于1950年11月6日公布过一道禁令，禁止轰炸鸭绿江沿岸的堤坝和工厂，并且一直没有收回此令。后来谈判开始，他们重申了这道禁令，但一字不提发电厂的事情。

唯恐破坏发电装置的行为会给和平谈判的进展带来副作用，李奇微不同意空军去轰击它们。1952年3月，他通知韦兰德将军，假如共产党有意通过拖延达成停战协议来加强他们的进犯能力，他将改变主意，但目前他不同意采取任何进犯行为。他认为，只要能源工厂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国民经济，破坏性行为似乎就是不合理的。

但韦兰德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在给华盛顿空军计划建议的答复中，他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摧毁水电站的同时应该发动其他的空中进攻，切断敌人的能源，使得敌人无法在那些小小的工厂以及铁路隧道里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韦兰德又说，通过破坏共产党小规模范围内的生产，可以向共产党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加快谈判速度；至于方法问题，韦兰德认为，选择几个适宜飞行的好日子，出动500架战斗轰

炸机和180架中型轰炸机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任务。

很自然，韦兰德应该迅速通过空军把这一计划报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李奇微和韦兰德之间对此分歧时，李奇微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联合国军司令告诉他的上司，在一般情况下，与其要他们向水力发电装置发起进攻，还不如遵循正常的做法等待时机的成熟；李奇微最后说，他一直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除非不得已，否则不必发动进攻。

5月12日，克拉克接替了李奇微的工作。此后不久，他研究了形势，决定尽可能地强化空中优势。他发现其中最有利的目标就是这个尚未接触过的水力发电厂。尽管他没有轰炸鸭绿江边水力发电装置的权力，但是他指令韦兰德作出计划，准备摧毁其他所有主要的水力设施，由空军协助战斗，而海军则一开始就参加这场即将发动的进攻。

当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得知克拉克准备袭击水电目标时，他们通过国防部长取得了总统的许可。总统同意撤销对细湖工厂轰击的禁令，鉴于这是北朝鲜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发电厂，总统批准以空中力量毁灭整个工厂。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要他自行决定，随时行事。但联席会议同时提醒克拉克，对苏联边界12英里以内的地区的限制行动仍然有效，注意不要误炸满洲里领域。

约瑟夫·T·克拉克中将于5月20日被任命为第7舰队司令，他渴望海军部队参加攻打细湖以及其他能源目标的战斗。他飞抵汉城，同时很快说服了少将格伦·O·巴克斯，要他同意让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加入第5航空队的袭击部队。6月23日，35架海军轰炸机（AD型空中袭击机）和35架黑豹喷气式战斗机（FgF's），从“普林斯顿”、“博克

沙”和“菲律宾海”等航空母舰上起飞，在空中歼击机（F—86's）飞行中队作俯冲轰炸时，对细湖工厂狂轰；在黑豹喷气式战斗机压制高射炮火力时，海军俯冲轰炸机投下了炸弹。海军飞机刚完成任务，79架雷电式喷气机(F—84's)和45架击星战斗机(F—80's)紧紧跟上，并且投掷了炸弹。共产党停放在鸭绿江对岸机场的200多架战斗机无法抵抗，纷纷匆匆起飞，飞往内陆。

后来的三天，第5航空队的700多架战斗轰炸机、200多架歼击机以及海军的500多架次飞机对能源系统进行了轰炸。根据飞行员的报告，细湖发电站遭到严重破坏；其他10个能源工厂也停工了；2个水电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黑暗笼罩着北朝鲜达两个星期之久，随后逐渐得到恢复。

轰炸水电工程一事立即引起英国工党和报界的强烈愤慨。因为仅在前不久，英国国防部长亚力山大伯爵才访问过克拉克，英国人感到沮丧的是国防部长并没有得知这些预谋行动的消息。实际上，在亚力山大6月18日离开朝鲜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才通过克拉克的报告，但这一点很难使英国人相信。一直到国务卿艾奇逊在伦敦承认美国有错误，它应该事先和英国商讨此事时，丘吉尔政府才勉强通过了工党的指责。艾奇逊说，虽然美国并非一定要把轰炸能源工厂一事通知英国，但是作为礼节，应该事先让他们知道。

看来，英国人最担忧的是，电站的破坏很可能会导致中国中断停战谈判或者要求全面遣返战俘。克拉克随后指出，他对此举在英国引起的骚动表示惊讶，但表示，今后在任何地方，只要他们认为是值得的，就将继续采取同样的行动，直至达成停火协定。他告诫人们，尽管共产党指责美国人的

行动横蛮无理，但他们却没有中止会谈，也没有寻求报复行动。

在美国，情况却正好与联合国的反应相反。国会及其他一些团体责问：为什么不早些日子就轰炸发电厂？克拉克无力帮助参谋长联席会议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找不到拖延行动的任何理由。7月19日，洛弗特告诉一位国会代表，阻碍这一行动的7个不利因素是：1．战后的建设问题；2．一些工厂遭到破坏后刚刚修复；3．工厂电容量过剩问题；4．可能造成美国空军的损失；5．北朝鲜利用在满洲里和苏联的能源，有可能对工厂所遭受的损失向美国人进行报复；6．估计对和谈会产生影响；7．首先考虑了其他目标。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这其中的一些因素显然被估计过高，或者在当时就已经过时。

导致这种不满情绪的另一个因素是委任一名英国代表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成员。这件事原先讨论过，并予以否决，原因是李奇微认为破例地重用英国人将会导致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同盟国代表提出同样的要求。当亚历山大访问朝鲜时，克拉克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可能存在不利的因素，他愿意接收英国人为司令部成员。为制止这种抵触情绪所招致的非难行为，丘吉尔7月1日声明，英国代表将在近期内接受任命。实际上，还没到这月的月底，少将史蒂文·N·苏史密斯就被指定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个副代表。但是，他的委任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而已，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联络网象过去一样，还是通过在朝鲜和华盛顿的正常的政治和军事渠道进行。

总之，轰炸发电系统已变成了空中战斗的既定部分。细湖发电站于9月11日到12日遭到了B—29的空袭，其他的工

厂每当准备恢复生产时就遭到袭击。

5月期间，远东空军部队也打算对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发动又一次进攻。韦兰德报告克拉克，该城附近新的军事目标已被发现并可能被摧毁。克拉克并不反对轰炸平壤，但是他担心共产党设立在该城附近的第9号战俘营的俘虏。由于无法对战俘营进行空中侦察，克拉克指示远东空军借助附近的海上航标照明指挥战斗，使该战俘营免于损失。

时机看来已成熟，7月5日，克拉克批准对平壤采取行动。7月11日，在长达11个钟头的时间内，出动飞机达1254架次。第5航空队的尖刀机、雷击机；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战斗机；英国的流星机以及来自第7舰队的海豹机和海盗机分别从3个方向对该城的40多个目标发动进攻。当黄昏来临，B——29's来到专门留给他们的目标进行轰炸，后勤兵站、工厂、部队营房、铁路中心以及作战阵地全部化为灰烬；共产党电台控诉道，1500座建筑物已夷为平地，其他900座遭受了1400吨炸药的狂轰，共有23000加仑的凝固汽油弹降落在这个首都城里。出动的飞机中只有1架空军的和2架海军的战斗机失踪，有8架空军飞机受到严重破坏。

8月4日，第5航空队向平壤出动战斗轰炸机达273架次，炸毁了建筑物、汽油库、炮火阵地以及军事人员驻地。8月29日，对该城进行第3次轰击，当时，苏联和中国代表正在莫斯科开会，克拉克和韦兰德认为这是开展心理空袭战的好时机。他们又一次出动1403架次空、海军飞机，分3路向首都铺天盖地而来，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经过这一场狂轰滥炸，平壤这个城市几乎已不存在任何价值，没有必要再采取大规模行动了。

空中压力以及空——陆援助

克拉克将军懂得，在陆地方面，他无法向朝鲜境内的共产党施加压力，但是他可以给空、海军打气。鼓励他们加快空中行动的步伐。1952年9月期间对发电厂和平壤的进攻无疑是最可观的，但无论如何，这也是最后一张王牌了。

7月底，63架B—29's飞机向他们最大的目标出击，这个目标离鸭绿江不到5英里，是一个铝合金工厂，即东方轻金属公司。敌人出动喷气式和螺旋桨夜间战斗机，但未能加以有效的阻击，该工厂损失惨重。

7月27日，位于细湖的一个铅锌矿厂遭到来自博霍姆·里查德海军战斗机的袭击，第二天，位于吉州的一家菱镁矿厂也遭到来自普林斯顿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轰炸，9月1日，来自艾塞克斯、普林斯顿和博克沙等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袭击了仅离苏联边界8英里地方的阿吾地炼油厂，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准许海军派出1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对原先没有受到破坏的供油中心攻击，据送来的报告所示，遭受破坏的面积很大。

整个夏季，空、海军的行动步步逼近中国边界，颇有影响的中国空军力量也只是飞越了鸭绿江，敌方的空中行动显著减少。MIG——15's总是避免空中交战，因为空中交火已造成大部分飞机的损失。随着7、8月对工业目标轰炸的增加，敌人的飞机开始频繁活动起来，但已经没有作战的意图。一旦他们开火，尖刀机总是把他们致于死地。

1952年夏季期间，共产党甘心情愿让其部队、城市以及工厂遭受挨打，相比之下，联合国军司令部却趁此机会补充地面力量。尽管如此，陆军司令官们还是抱怨不断，指责范弗里特——埃弗雷斯特合约的规定，即在目前地面行动有限的条件下，每天派出96架次近战飞机配合第8集团军的行动。

早在1951年12月，范弗里特自己就曾为此白费力气，他企图为他的每个兵团安插一个战斗轰炸机的飞行中队，坚持这样做会改进空中近战行动。空中作战部队的这种做法与空军的宗旨背道而驰，并且遭到地面部队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不灵活，无效力，在必要时，这种飞行中队不能转移到更活跃的战场。但是范弗里特并不就此罢休，在克拉克上任为总司令后，他又卷土重来。6月初，他建议把第1海军安插在第8集团军的行动管辖范围之内。

范弗里特的计划从本质上看还是和6个月前一样，那就是把一个飞行中队置于每个兵团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联合行动中心，以便控制每个兵团司令部下属各海军部队的作用。为抵制空军制度欠灵活的论调，他打算维持第8集团军的充分控制权，把使用不得当的飞机转移到其他兵团或送回第5航空队。第8集团军司令认为，关键问题是缩短请求飞行和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允许飞行员熟悉他们将要进攻的地形，熟悉他们将要共同作战的地面人员，把飞行站设立在兵团前沿阵地附近，增加每天的飞行架次，排除目前牵制飞行的航空观察点，保证更好地控制空袭行动。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克拉克与范弗里特有同感，但他丝毫不计算在具有战术意义的航空问题上，再搅起空、陆军两家结世怨仇。7月1日，他拒绝了第8集团军司令的提案，命令他的下属为实行空——陆联合行动方针而作出进一步努力。

6个星期以后，克拉克发表了改变局势的计划。他没有从根本上指定目前制度的错误，他指出，目前令人头痛的是下级对空军缺乏武器装备一事不理解，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空中作战方针只有在空军和陆军司令官们协商以后

方能奏效。克拉克意识到陆军司令们常常在他们自己的主要炮兵力量可以胜任的情况下请求空中力量。他又说，远东司令部的空中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担负着许多任务。陆军无法采纳也不准备接受海军的空——陆联合行动的做法，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依靠各种大炮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克拉克认为，具有战术意义的空中行动实际上带有三重任务——空中阻击战、地面反击战以及拼搏战。尽管地面支援似乎总是最后使用，但并不说明它是可以忽略的。他认为空、陆军的合同训练可以更多地消除诸多存在的糊涂概念，他建议采取措施，达成双方更多的相互理解。

与此同时，在6月，范弗里特和第5航空队司令巴克斯将军进行磋商，讨论对战斗前沿附近的敌方强大空中力量发动最大规模进攻的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在紧靠前线的地方集结力量预示着雨季以前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因此，他敦促再一次封锁铁路系统的计划，增加近战空中援助，另外，范弗里特请求克拉克批准，出动正在满洲里边界附近对敌人夜间战斗机进行阻击的B-29's，要他们利用夜间雷达控制轰炸技术轰炸共产党的驻地、弹药库以及靠近前线的武器装备。

巴克斯表示同意，他通知范弗里特，从主防线往后延伸，在40英里以内的地区，空军力量正在大幅度增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他接着又说，因为敌人隐蔽得很深，要破坏他们的集中地和弹药供应点相当困难。此时第7舰队司令克拉克上将表示欣然相助。5月，他到第8集团军前线一行，和范弗里特举行了会谈，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需要摧毁敌人集中地和弹药供应点时，航空母舰尤其适合于这种定点轰炸。范弗里特和他的陆军司令们赞赏这种海、空援助，于是

第7舰队的官员们着手拟订支援近战的计划。

随着空中援助任务的增加，战斗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开始向敌人最近的后方投放炸弹和扫射。范弗里特振作起来了，在7月雨季到来之际，他成功地从巴克斯和韦兰德那里得到了轻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的援助，因为只要有合适的目标，他们是乐意合作并出动大批飞机的。

毫无疑问，对陆军来说，对铁路系统的这一封锁行动，开创了一个空中之战的更令人满意的新阶段。头顶上的飞机越来越多，严惩了那些跨越防线的敌人，前线再也不是士气低落，而是大快人心。10月的战斗更为激烈，联合国军司令部空军派出将近4500架次的飞机近战支援，袭击敌人的集中地、设备、弹药库以及碉堡等，仅仅最后一次支援行动，就出动了2200架次轰炸机。第9兵团司令詹金斯将军给第5航部队送去了感谢信，赞扬他们非同寻常的援助。

随着陆、空军两家官员互派代表视察前线和空中控制中心，他们之间的一些误解慢慢消除了。陆军部队懂得在空袭以前用无线电引信帮助驾驶员阻击高射炮的炮火；在近战援助过程中，友军的飞机损失越来越大，炮兵为排除危难作出了努力，为此，他们得到了空军的赞赏。据空军官方观察家报道，另一个表示这种情况好转的征象来自范弗里特自己，到秋天为止，他再也不催促把空军飞行中队安插在他的各个兵团里，这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改观。

二、吉它演习

1952年夏季的海面行动主要是对朝鲜海岸进行巡逻和封锁，扫荡矿山，炮轰海岸线上的军事目标，骚扰和中断敌人

的交通联络等。对韩国第1军团的炮兵来说，海面火力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方面都给予了力量雄厚的支援。

但是海上规模最大的行动要数朝鲜东海岸的吉他。克拉克于7月会见海军司令罗勃特·P·布里斯克中将，提出第1骑兵师第8团进入朝鲜时，采取登陆行动是否有经济价值的问题。由于在日本住宿存在问题，克拉克决定让第1骑兵师的3个团先后分3批进驻朝鲜。自从第一批部队决定于10月从日本换防到朝鲜后，克拉克认为这是警告共产党的机会，不能错过。

布里斯特中将衷心拥护采取行动，并建议水、陆同时行动。他说，可以想象得出，这是一种引蛇出洞的办法，敌人将会暴露他们的兵力，遭受空、海两面的夹击；还有，这将给整个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带来一个绝妙的训练机会。这大大地鼓舞了克拉克，他指示海军司令马上制定计划，配合第8集团军和第16军团的行动，加强第1骑兵师的力量。

在第7舰队司令克拉克上将的领导下，水陆联合第7任务队成立了，并确定10月15日为进攻日期；准备在吉它附近同时采取陆、海、空闪电式行动。为了达到蒙蔽敌人的目的，只是最高级的指挥官才知道这次调动只不过是一次演习而已。

第187空降团准备撤退时投掷炸弹；第8集团军准备配合登陆部队采取进攻行动，克拉克告诉范弗里特这仅仅是为了混淆敌人情报人员的视线，他们并不准备大规模地轰炸地面目标。

10月12日在江陵采取的演习行动因遇风浪而不得不停止。以后的3天里，远东空军和海军的飞机轰炸吉他周围敌人的阵地；由“洛娃”号战船率领的航空母舰袭击了海滩地

区。10月15日下午上半晌，突击部队打开了一个登陆通道，接着，突然而来的疾风严重地阻碍着登陆船只，但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对于这样一个精心炮制的计划，敌人的反应是冷淡的。几乎看不到共产党调遣象样的部队，沿海炮兵也只是向登陆强攻部队回敬了几个炮弹。究竟敌人是缺乏快速反应，还是等待联合国军部队登陆以后才发动攻击？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后来，佯攻的假象被识破，全体联合国军人员真相大白，情绪变得更加低落。尽管实施这样的计划和采取升级行动曾提高了联合国军的威望，并且此次演习证明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士气低落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以上这一切。

秋天，战斗逐渐减少，从5月到7月，战斗成果甚微。虽然空战活动曾一度引起板门店共产党的抗议，但对于联合国军提出的早日停战的条件，他们丝毫没有改变固有的强硬态度。

在地面上，高地争夺战使得敌人的伤亡比联合国军的要大，但双方都未能取得大的进展，双方都无法宣告胜利。6个月以来，共产党在人力、物力、弹药以及装备方面损耗巨大，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需要停战。从各方面看来，僵局将持续下去，战争并没有结束。

第十五章　有限战争的问题

1952年中期，美国在板门店以及朝鲜战场上所遭受的挫折并没有摆脱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当他们在朝鲜战场取得军事胜利时，美军士兵的来源、资金的调拨以及物质的供应都不成什么问题；但一旦决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反对潮流就逐渐形成。美国政治、军事界领导们不得不着手处理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即有限战争及其一切细节问题。随着时间的消逝，从1951年到国会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撤职一事所进行的调查以来，对战争的非议，一直在持续着，并且随着停战谈判的失败而日益加剧。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朝鲜的冲突已得到了它应有的结局。北朝鲜已经退到三八线以内，共产党知道如果他们不停止侵犯，美国就会战斗下去；另一方面，美国及其同盟者也懂得不能低估中国的军事力量。各种迹象表明：双方都希望和平，僵持下去将不会有任何好处。然而，唯独在制定遣返战俘的原则问题上，双方之间的分歧很大，不仅不能尽快签署停战协定，相反，伤亡人数越来越大。

如何越过这一障碍尚不清楚，但朝鲜问题的解决必将成为1952年总统竞选运动的突出内容。围绕白宫竞选所进行的辩论、人选以及政治形势等对战争的本身无济于事，但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背景。无论是共和党后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是他的民主党对手阿德拉·E·史蒂文

生都把和平作为他们竞争的主要论调。两个政党对军事上取胜的兴趣逐渐淡漠，双方都声称他们有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要求执政党和立法党严格审核有关增加兵力、开支以及物质的要求。由此看来，竞选年的气氛加剧了对当局政策的批判，假如共和党人取胜的话，指导战争的政策将很可能会改变，对这一点，军队是很清楚的。1952年的中期是多么令人徬徨不安的时期！

一、再次面临选择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尽管战场上的军官们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约束而感到恼怒，但除了一些细节问题外，他们无法改变战争的前景。事实上，没有克拉克将军的命令，他们是不能扩充军事力量的。自1951年以来，第8集团军一直在坚守防线，惩罚敌人。然而，众所周知，他们也只好如此而已。有限战争意味着有限的军事力量。在制定军事计划时，华盛顿和远东的策划者们一直存有这样的设想，这就是他们所表白的，远东司令部的军事力量要维持其固有的相当力量，只有当共产党恢复全面大规模的战争或者中断和谈，这种政策才有可能改变；正如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似乎满足于现状。

由此可见，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拟定的计划，反映了朝鲜战场的僵局以及美国的政治气候。联席会议的策划者们坦率地承认，以目前限定的三军力量去作战，朝鲜战争不会有成功的结局。假如增强派往朝鲜的力量，美国的战略后备力量就会削弱，派往欧洲的力量就不得不缩减。补救的办法是从速调动兵力，但这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联席会议的

参谋们均认为，要持续不断地、狠狠地向共产党施加军事压力，就必须保证增加陆、海军的力量。但是在国会明确美国在朝鲜的长远和暂时利益前，即使就是这样有限的支援也是不可能的。正如他们于1952年5月所陈述的那样："目前，在朝鲜，我们面临错综复杂的情况，从军事的观点来看，这一切可能会妨碍战争往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必须明确我们的切身利益以及行动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国际威望以及长远利益。"

华盛顿策划者们看来注定要遭到他们与远东司令部的同伙一样的挫折。除非共产党在朝鲜实行军事上的升级，完全拒绝谈判，否则，美国除了空中势力之外，看来无需考虑强化和扩大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假如战争升级，第8集团军将不能遏制敌人的进犯，这场争夺战将超越朝鲜，自然而然地发展为全球性的战争。然而，假如共产党拒绝继续和谈，增加军事压力的问题将再度变得很关键，这就会暴露美国军事实力的软弱性，说明它并不具备迫使共产党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停战条件的雄厚力量。任何增加人员和武器的举动都起码要1年时间才能奏效，需要作一些工业以及劳动力方面的额外调配，而且首先需要对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驻守在欧洲的防守力量作出变动。

诚然，美国拥有原子武器的最大实力，但是在北朝鲜这样的多山地区是否适宜使用核武器仍然有争议。另外，从道德观念上看，假如美国受到攻击，它是否可以再一次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没有解决。人们担忧，假如美国对朝鲜这样一个顽固、僵化的敌人发动一场原子战争，就会削弱美国在朝鲜这场赌注的力量，人们将会认为，中国确实需要和平，远东

司令部所能施加的军事压力未必能保证和平；而且，韩国和日本的防卫力量将会进一步期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势必也能排除共产党的威胁。事实上，这也是美国用于对付漫无边际的朝鲜战争的保险政策，因为最后不管停战与否，非朝鲜军队将逐渐撤出这个半岛。

限于这种种情况，策划军事上的胜利似乎只是一纸空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计划并和克拉克司令协商。在东京，远东司令部检查了颇有规模的作战纲要，它表明了美国将向敌人增加军事压力或者由第8集团军执行任务直至取得胜利。但严峻的事实说明：按克拉克的指令行事，所有这些计划都是行不通的。9月23日，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发表了万一谈判失败所要采取的可能行动的意见，克拉克说，他在地面战线上已无能为力了。

我们面临着士气高昂的敌人，他们力量相当雄厚，他们占领了第一流的、结构完善的有防御纵深的阵地，并且源源不断地得到后勤力量的支援。显而易见，在这些情况下，以目前有限的力量去指挥当前这场战争，要想发动积极的进攻，谋求军事上的胜利，以我们的条件达成停战协定是行不通的。只有增加兵力，解除某些限制，远东司令部才能发动强化战争，才能在不"付出很大生命代价的同时有希望获得成功。"

克拉克认为，除非远东司令部打算把这场战争打到鸭绿江，否则，它不应该在决定性进攻时承受固有的损失。他觉得，攻打不大不小的目标将使美军损耗很大，况且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克拉克不相信在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时，苏联会出兵朝鲜，但是他意识到，在竞选前夕以及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军事胜利并不为人所接受，因为它狠狠地打击了那股热衷于通过政治行动迅速肃清朝鲜约束的潮流。克拉克充分准

备对付这种预想不到的变化，但是变动的可能性是渺茫的。继续在战场上施加有限的军事压力，通过政治谈判达成停战，选择这种政策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兵力，更多的伤亡，更多的开支以及物资。到1952年，事态的发展变得更明朗化了。随着战争的爆发，相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援助时代已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紧缩开支。在这种条件下，持有大规模地扩大和强化战争的言论者也就变得寥寥无几了。

二、预算、人力和资源

1952年1月总统预算数字预示着一个财政开支紧缩的时刻到来了。在早先的预算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希望在1954年以前可望建立一支具有相当防守水平的军队。当前的总统预算紧缩使这一希望破灭，因为总统削减了部队需要的资金。由于缩减了军费开支，总统把1954年到1956年说成是战备阶段。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眼光看来，这意味着：假如苏联在1956年以前全力反攻，美国是远不足于抵抗的。节制开支使空军起码丧失了126架现代战斗机的所有权，陆军也只能各自勒紧腰带，应付局势。

压缩开支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使武装部队产生误解，因为他们会由此而产生一种愿望，即朝鲜战争到第一财政年度末就会结束。1952年6月30日以后的战争延续只不过是为了需要所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附加的合理行动，处置一些尚未完成的事情。柯林斯将军以及他的下属觉得难以在节制开支的基础上制定他们的财政计划，于是在5月份，他强烈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转告国防部长，要他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下一年度，在各个财政季度开始阶段，敌视行为都会继续。到6

月底，国防部长洛弗特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在考虑1954年财政年度开支计划时，可以假设战争将延续到1953年6月20日。

尽管如此，1953年财政年度军费开支被总统和他的预算顾问由原来的22.2亿美元裁减为14.2亿美元，国会把7月份的开支删减了近2亿美元之多。这意味着军队的战备期限推迟到1956年的财政年度；诸如车辆、坦克和大炮的军工扩大生产将会削减，另外，部队人员也将得不到补充。

就洛弗特部长看来，开支的缩减只好怪军队本身。他告诉陆军作战部长，国会坚持要求陆军出证人解释：假如军需如此之大，事先为什么不预算一笔资金呢？显然，证人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满意的回答，因为只要未经批准的资金继续积压的话，生产部门就无法快速把钱变成有用的东西。部长先生认为陆军所谓"没有资金"的借口只不过是乏味的俗套话而已。

陆军事先未能获取国会通过的所有资金，部分原因是行政上的拖延，他们习惯于与几百家公司安排和签订合同。鉴于这种情况，陆军洽谈合同时过于小心谨慎，导致他们很快失利。到第一财政年度开始时，陆军认为日后要把战争进行下去，不必把所有的钱都攒在手里，相反，必须再次依赖附加的拨款来弥补开支的不足。

这种零敲碎打地资助战争的应急措施使得陆军的决策人难以制订强硬的方针，因为往往要花费1.5年到2年时间才能确保许多物品的生产，况且，又极少有人能猜出，战争究竟还要拖延多长时间。但是可以意料，假如战争确实需要，钱是可以拿到的，这一点起码可以放心。但是人力方面则陷于更难堪的局面，前景是令人沮丧的。

至1952年底，绝大多数于1950年应募入伍的士兵将服役期满。在100名曾经受过训练的士兵中几乎有3/4将离开部队，取而代之的是万名新兵。要训练如此众多的新兵，仅仅是应付这一任务，陆军就得拿出25%的人力。假如战争短期内结束不了，美国陆军的有效力将只剩1个空降师的力量。由于大量换入未经训练的士兵，为了补足一些师人力的不足或抽出一部分力量去训练新兵，将解散一些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柯林斯将军于6月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同意他的要求，给陆军增加9.2万名人员。尽管洛弗特先生努力争取军队扩编，但遭到了财政部和国家安全物质董事会的反对，并以失败告终。从1952年4月到10月底，部队人员从大约170万人逐渐下降到158万人。

部队人员的减少要求军官人数也相应减少。由于财政预算的缩减，远东司令部的官员差不多减少了600人。对此，克拉克予以强烈抗议；但是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会议于6月通知他：世界范围内的军队编员已减少了5%，在远东司令部方面，朝鲜人已被撤消，在日本和琉球群岛，军官力量确实减少了不少，否则，与别的地方相比，这里的官员是多了些。

7月底，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建议克拉克，他可以减少训练日本部队的官员，把更多的责任交给日本营或营以下教练员。假如美国高级官员能限制在一定数字以内，那么，节省下来的经费就可以弥补官员们已知开支的不足。在他的回答中，克拉克断言：1952年底，当两年服役期满时，日本军队将会大量补缺受过训练的人员，并且准备大量训练武装力量，美国军官人数将暂时不能缩减。在8月1日给克拉克的信中，柯林斯将军坦率地与克拉克探讨未来一年

的前景，他指出，美国军队损失了一半力量，又面临着训练所有新兵的极其严重的问题，这将严重影响美国后备部队的地位和质量。他又说，每个月军队都必须向国外派出4万名新兵，这种情况到11月将会中断，随后，远东司令部力量将趋于下降。柯林斯体会到，这是一个困难时期，假如陆军准备要成功地度过难关的话，很大程度上将要依靠各级部队领导的作用。

在给克拉克的信中，柯林斯所持的调子无疑说明了军队兵力形势将进一步恶化。韩国军队经过训练以后表现出他们可以担负更重的任务，他们将在前线取代美国军队，假如美军在朝鲜的地位继续发生变化，美国的负担就会逐渐减少。

5月，美国在资金以及兵力方面所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迹象表明，一旦停战协定达成，共产党有可能在北朝鲜建立空军基地，克拉克对此表示关注。为对付这一威胁，克拉克请求为其作战力量增加4架截击机和8个自动武器装备营，联席会议参谋对此表示有同感；经过对F—86型飞机以及高射炮生产部门的仔细考查，他们估计可以给予有限的支援。7月上旬，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2月许诺的F—86型尖刀战斗机到10月就可以交货。另外，65架尖刀战斗机以及175架F—84型飞机将从别的地方调入，用它们来充实远东司令部的空中力量，并提供50％的后备力量，为协助日本防卫方面摆脱困境，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说，一个拥有60架F—84型战斗机的空军联队将交替派往日本。在高射炮力量方面，将向他们提供一个90毫米机炮营和两个自动武器装备营，这些力量均来自美国大陆的国防力量。虽然提供这一切意味着要承受风险，而且这些散落稀疏的飞机和装备也无法扭转朝鲜战争的局势，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起码要满

足远东司令部的部分要求。

三、弹药再次出现问题

1952年夏、秋，弹药的供应又一次使军队发生困难。正如前面所述，在年底以前，不能指望局势会有任何可观的改变；况且，假如战争进一步白热化，补充的这一点军需装备将远不足以战争的消耗。

从4月底的一份情况报告里，华盛顿的联席参谋长们获悉：战场主要缺乏5种东西——60毫米、80毫米和4.2英寸迫击炮，105毫米、155毫米榴弹炮。假如1953年1月1日欧洲爆发战争，美国只能派出用这5种型号武器武装起来的5个师的力量，而1年以后，将需要15个这样的师投入战斗。到1953年初，美国目前的军工厂将全力生产弹药，这以后，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有新的设备和工厂投入生产。当陆军作战部长听到这消息时，他指示重新核实扩大军备生产的全部事宜。

5月初，从朝鲜又来了一条不可调和的消息。一家报纸宣称：美国士兵在战场上使用的是转手武器，而且供这种武器使用的弹药也不足，军队请求远东司令部作出评论，远东司令回答：弹药是充足的，定额分配是正常的。这情况与柯林斯司令所持的立场看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会确实保证增加军费开支，师属以及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要求远东司令部作进一步的解释。鉴于这种情况，作战官员们根据战场的行动情况作了基本估计，他们认为4到5月战争会逐渐减缓。如果要加速战争，必须迅速改变目前弹药供应情况。作战官员们最后说，美国目前计划生产的155毫米榴弹炮将落

在谁的手里看来还是个谜。

依赖前线减缓战事来限制弹药的供应到6月初又迫在眉睫。在范弗里特前往其军团司令部时，他发现有必要马上限制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运往其他军团，保证美国第1军团有足够的弹药完成战斗任务。同时，由于增加和建立了更多的韩国部队，军团司令部意识到未来的形势将会愈发复杂。

6月底，为了155毫米榴弹炮的供应问题，克拉克变得更加忧心忡忡。共产党在这一个月内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大炮和迫击炮火，迫使第8集团军不得不加强防守力量。如上所述，105毫米榴弹炮不具有对付敌人地堡掩体作战的威力，射程也不够远。克拉克指出，一旦韩军105毫米炮营投入战斗，远东司令部就必须把榴弹炮的数字从378门增加到486门。尽管按规定每天供应每门大炮40发炮弹，但是克拉克已经不得不把炮弹消耗的数目限制在15发或略多一些。如果在整个夏季还是按计划只供应远东司令部14万发炮弹的话，那么他们还将要更进一步减少炮击的次数。9月1日，克拉克说，库存炮弹已减少到35万发，供应期限也由原来的90天改为62天。

6月初，柯林斯将军就意识到远东司令部的局势是很不理想的，他向克拉克报告了如下几个军备生产的棘手问题：目前，每月只能生产10万枚155毫米榴弹，在一年之内，大约能逐步增加到每月65万枚；按每日向克拉克的486门大炮提供每门40枚计算，每月需提供58.3万枚，如此下去，这种情况维持不到1953年的3月；为了使欧洲方面的军事演习不致于发生军火短缺的现象，美军将在1952年的7月1日到10月31日期间，先后尽可能提供40万到50万枚炮弹。当然，

柯林斯接着说，假如敌人来势迅猛，第8集团军将必须竭尽全力阻击，但是要保证每天供应15枚以上炮弹，这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办到的事情；假如6月2日开始的钢铁工人罢工再持续一段时间，柯林斯认为要想改变现状需耐心等待。

事实上，位于匹兹堡的克里斯特·帕克钢铁厂在罢工的头一个月就已经损失了6万锻件的生产，这个工厂担负着生产155毫米炮弹的60%的任务。7月5日，作战部长敦促洛弗特先生，要求劳工和管理部门关注这一损失，不再使情况恶化。

几天以后，朝鲜战场的各军、兵团均反映155毫米炮弹供不应求的情况，范弗里特通知部下，10月的供应将缩减为每天6到8枚，这样一来，第8集团军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能使用155毫米炮弹，只要战术上有可能，就要用别的武器来代替。

7月13日、14日，柯林斯和他的副手列德将军参观了第8集团军，并确切告诉范弗里特，包括韩军新编部队在内的每门大炮每天配备的炮弹将不少于5枚。为了摆脱困境，建议范弗里特把105毫米炮兵单位改编为8英寸榴弹炮兵单位，因为8—英寸榴弹炮是充足的，这种炮弹也很多。

克拉克为炮弹的每日供应量急剧下降深感不悦，8月初，他正式要求范弗里特把每日每门大炮的炮弹量增加15枚。这一个月，柯林斯将军大大削减了其他部门的军火，保证了克拉克的这一请求。

为缓和供不应求的危机，克拉克曾请求批准在日本生产60万枚155毫米炮弹（爆炸力稍小些），但是军部发现其生产成本比在美国生产要高出60%，最后予以拒绝。

然而，到8月中旬，军部还是同意在朝鲜生产这批弹

药。这象征着在朝鲜地区，3个月以后，每天供应每门大炮40枚炮弹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到这个时刻，克拉克将只要求得到战场上实际使用的军火。

随着9月到10月前线战斗的升级，双方耗费的军火也迅速增大。仅9月的一个星期，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向敌人发出了37万枚炮弹，敌人共回击18.5万枚。在炮火连天的10月，仅6天时间，第8集团军就向敌人发出105—毫米炮弹42.3万枚，155毫米炮弹1.8万枚。

10月炮弹的消耗由9月的8枚155—毫米上升到18枚，这给克拉克的心头又罩上了一块阴影。假如战况如此继续下去，库存的弹药将维持不到11月底，也就是说只够用26天，而不是66天了。鉴于这种情况，克拉克敦促军队从速运送弹药，增加库存量。他同时指出：令人担忧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155—毫米炮弹，迫击炮使用的81—毫米高效爆炸轻弹以及155—毫米高效爆炸炮弹也姗姗来迟；更严重的是，从8月15日到10月7日远东司令部接到的具有杀伤力的手榴弹也只有355枚。

在陆军部给克拉克的答复中，它肯定地告诉克拉克，他们一直在尽力改变现状，供应情况将逐步好转。钢铁工人的罢工已造成了155毫米炮弹生产的损失，并在关键时刻耽误了交货日期。然而在这个战场以及其他战场同时处于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远东司令部却独占鳌头。事后，列德将军加以评述，他认为真正的危险在欧洲，在那些军火短缺，风雨飘摇的地方，假如战争爆发，即将大祸临头。

纵观朝鲜战争最后两年的军火局势，有两点是要铭记在心的。第一点，士兵手里不缺乏任何应急的武器，任何时候，只要需要，第8集团军都可以使用任何它需要的弹药；

第二点，在相当被遏制时期，尽管每门大炮每天配备的炮弹受到限制，但是第8集团军的进攻炮火大大压倒了敌方的回击，而且这都不包括来自联合国军空军的炸弹、机关枪以及火箭炮等方面的火力。诚然，对于军队来说，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得到所需的火力，但情况也并非一片漆黑。美国全球军需景况之惨淡远远超出了朝鲜的现状。假如朝鲜战场的需求继续维持目前的水平，紧张局势只有到1953年，等所有的生产设备都开足马力才能得到缓和；与此同时，必须继续有效地限制弹药，围绕军需不足的争论仍将持续下去。

四、韩军的扩充

针对朝鲜战争而展开的诸如：经济预算、人力安排、物资利用等国内讨论在继续着，有一个问题几乎是难以回避的，这就是朝鲜部队在战争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由于美国准备逐步移交其在远东的义务，来自韩国、日本、中国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其他第三国的武装力量就变得愈发重要。美国资金投资于南朝鲜部队可以得到几倍的利润，因为拿花在美国士兵身上的钱可以训练和装备更多的远东国家军队，而且这样做可以使美国逐步减少其在朝鲜战争中的义务和人力。扩充的这些本地部队是否也能成为高质量的军队，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1952年中期韩国部队的良好表现确实也是令人振奋的。

自从5月克拉克将军接任李奇微将军以来，对待扩充韩军的态度就有所变化。人们曾记得，不管是麦克阿瑟还是李奇微都满足于成立10个师，配备25万人的规模和力量。但是克拉克一开始就倾向扩充韩国部队，在他上任司令的头两

个星期内就曾多次强调韩军规模越大越好。

事实上，韩国军队已逐步扩充，早已超过了25万人的力量。仅在李奇微离任之前，他就递交了一份新兵名单，总共补充36万名新兵，分布在扩编的炮兵、坦克兵和安全部队里，还提供了成立10个步兵团的兵力。尽管10个师的纪录没有被突破，但是一旦条件成熟，这些独立兵团就可能变为新的以师为单位的骨干力量。

克拉克完全赞同这一扩充计划。正如6月他向华盛顿官员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韩国陆军已经把其国家警察部队安插到美国兵团的所在地，而且已经开始履行更多的安全义务，如：保卫作战人员的安全，镇压游击队骚扰等。此外，扩充和训练系统每天向部队派来700名韩国士兵，以至后来，由于前线消耗率降低曾一度产生人员过剩的现象。为此，克拉克辩解道，解散这一有生力量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为战争频繁时期作好了准备。克拉克最后说，由于韩国根本没有退伍军人管理局，名册上尚有3万名病号有待于得到关照。考虑这种情况，克拉克认为陆军部应该正式授以他一批9.2万名士兵，其中19,458名士兵用以成立6个独立兵团。

4天以后，克拉克又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求在部队名册上增加2个韩国师的力量，把后备力量从36.3万人增加到41.5万人。克拉克一直认为，由于成立新的以师为单位的力量，与共产党作战的亚洲力量势必增加，美国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减少。韩国陆军可以扩充额外的师的力量，成立6个独立兵团，由此而充分利用南朝鲜的劳动力。

事实说明，扩大韩国陆军是不适时的。朝鲜（指南朝鲜）驻美国大使尤昌阳敦促国会、空军为从战术上加强韩国的空军力量而实行3年计划。如上所述，李奇微反对规模

小、效力低的韩国空军的存在，他认为这样的力量刚抬头就会给占有优势的共产党空中力量歼灭。扩充陆军力量也同时遭到各方面的非议。由于炮兵装备及弹药短缺，在这种部队里扩充韩军力量就有可能需要削减目前美军及联合国军的弹药装备来满足韩军的需要。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以及后勤参谋人员均认为，假如准备扩大韩军力量的话，最好是扩建独立的兵团，而不要把这些力量分插到各个师里。

6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尚未准备通过扩大韩国陆军力量的计划，他们决定维持10个师，包括25万人的陆军和当前存在的海、空军力量。

7月中旬，柯林斯将军访问朝鲜，他批准在每个美军师里补充2,500名朝鲜士兵，在当时，这算是他的最大努力了。克拉克不得不通知范弗里特停止建立更多的轻武器步兵团，他认为韩国部队不得超过362,945人。为保证扩充和受训的士兵总人数不超过这一数字，克拉克通知第8集团军采取行动，把体弱以及一些没有用处的韩国士兵从美军部队里分离出去。

柯林斯于8月初到朝鲜一行，并与克拉克、范弗里特达成一致意见，他同意接受一大批达91,200人的南朝鲜士兵，命令其军队为扩充2个韩国师而作出努力。展望这批扩充力量，柯林斯认为，在目前开支预算以及后勤资源供应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积极的，也是合适的。他觉得这样做将有利于向战场提供有经验的韩国士兵，为美军逐步撤退和重新部署兵力铺平道路。

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扩充2个韩国师事宜，当时这支部队已发展到35万人以上，由于韩国陆军部队并未全部编入这支美军韩籍部队，范弗里特请求克拉克把扩充的人数

再增加27,000人。克拉克同意并敦促陆军允许28,000名美陆军韩籍士兵分插到联合国军各部队。他辩解道，这样做，不仅将扩大联合国军各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他们可以在这些部队里接受训练，成为优秀的骨干力量。

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远东司令部扩充韩国陆军和成立美军韩籍部队的要求，与此同时，克拉克也向会议提出了有关把韩国海军从12,376人增加到19,800人的建议。6月，由驻美大使提议，联席参谋长们召开会议协商是否允许韩国空军力量也扩大的问题。9月中旬，他们决定坚持原有的立场，使韩国空军力量维持现状。

第2周，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克拉克的计划，同意在美军里扩充韩国陆、海军力量，使军队人数达到了46.3万人的顶点。在写给洛弗特的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支援和装备这样大的韩军力量，意味着美国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操纵着50%最大限度的非常规武器，这样一来，必然要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里撤出105—毫米榴弹炮；必然要从一些流动的弹药库里拨出其他非常规武器。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趁此机会，补充更多的亚洲人去与共产党相斗是值得的。

紧步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的后尘，10月1日，克拉克递交了一份请求，他迫切要求通过扩充韩军武装力量的决定，即每天向韩国陆军接收的700名新兵提供有效的训练武器。从7月到8月，第8集团军曾巧立名目阻止这些新兵大批大批地涌入他们的部队，他们认为，这些新兵大都是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照此发展下去，部队将会超编。实际上，第8集团军并不反对新兵稳定地输入队伍，而是认为在此问题上要博一输赢，就必须完全彻底地审核任何韩国陆军

部队扩编的请求，只能吸收受过训练的士兵，一旦批准韩军扩编，就必须训练人员，然后把这批人编人新的部队。

这样做有某些好处，可以把那些体力不合格，不理想的士兵剔除出去，免得他们钻进部队里。但是华盛顿对此却迟疑不决，仍至产生了一场难堪的局面。因为训练周期只有8周，9月，第一批受训新兵将结束他们的训练，正式分插到部队里。鉴于伤亡人数不多，新加入的人数很快就会突破目前韩国士兵的最高纪录。克拉克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假如他们不准备扩编韩国陆军，他将不得不把补充的新兵人数限制在当前部队损耗的水平上。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在作出支持扩充韩军的决定以前，他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比如，有关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日本的防卫力量，中国志愿军的力量以及美国对南亚各国军事方面的援助等等。勃列德里将军很快就向他报告，假如类似105—毫米、155—毫米榴弹炮以及75—毫米无后坐力炮等常规武器要调配给韩国陆军的话，运往其他国家的武器就要耽搁2个月，这将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对欧洲以及内陆地区的弹药供应。至于其他所需的武器弹药，可以从部队的流动和兵站仓库得到。

10月25日，洛弗特先生向总统呈交了一份建议书，他建议把韩国部队扩大到46.3万人的最高纪录，5天以后，杜鲁门先生批准了这一提案，与此同时，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发表了他的著名声明，那就是，假如他当选总统，他将到朝鲜去敦促扩大韩国部队的力量。10月29日，在一次政治演讲中，他宣读了范弗里特给其前任，穆地将军来信的片断，在这封信里，第8集团军司令表达了他惯有的思想，即韩国陆军应该由10个师发展到20个师，这样，美国军事力

量就可以撤退。尽管这次竞选的政治压力对杜鲁门总统的决定是否有好处尚难以确认，但是这将可能加速行动往有利的方向发展。

总之，建立一支更有威慑力量的韩国陆军部队的第一步已经迈出，而且，11月初，艾森豪威尔在民意测验中取得了胜利，这意味着新上任的总统只不过是前总统同一路线的继承人而已。

1952年的夏、秋，人们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扩充军备上，这种情况逐渐在韩国的其他方面也有反应。4月，由2个榴弹炮营组成的韩国第1野战炮兵团集训完毕，于5月开赴前线支援那里的韩国第6师。到10月，有8个韩国炮兵团待命出击，留下的2个团也将在年前出发。在装甲兵方面，4个韩国陆军及1个海军坦克连于10月底就开始行动，另外还有3个连正等待着从美国运来的坦克。已任命为韩国陆军6个155一毫米榴弹炮营的军官们在6月派到6个美国师里，到11月，他们准备率领他们的炮兵营作实战演习。

在美国各炮兵单位安插韩国陆军炮兵营的做法使得美国军队的问题大大复杂化。除了要克服语言障碍外，美国炮兵司令仍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训练韩国陆军的人马，还得在他们常常拥挤不堪的阵地上为韩国武器装备找到合适的火力点。

为改善韩国陆军的骨干力量，6月，克拉克请示陆军部，请求到1953年财政年度把在军队里现有美国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增加到581人。3个月以后，他要求炮兵学校分配100名，步兵学校150名，这样就可以满足1953年3月所要补充的名额。

10月，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科尼利厄斯·E·赖恩准将率领近2,000名美国人员前往韩军协助新兵训练，但由于士兵人数已达到16.3万人的最高纪录，仅仅2,000名美国人是远远不够的。范弗里特从他的兵团和师里抽调了24名军官，并从他所管辖的情报系统里调出了68名情报人员协助韩军的训练工作。但是1952年的后半年，由于实行轮换制度。美驻朝军事顾问团已经失去了许多官员和士兵，继续抽调人员，将会造成该团人员的严重不足。

9月中旬，范弗里特通知韩国陆军把韩国服役人数从75,000人增加到10万人，他计划组织6个新的团，加强现有力量。由于韩国服役期为半年，所以他们务必每周都要征集4,000人员，计划才能得以全面实施。

五、后方的危机

除了支援和为前线训练人员以外，韩国陆军必须同时处理安全问题。其中战俘以及前线联络安全保卫就是目前的两大任务。韩国士兵和联合国军其他部队共同担负着监视战俘营的任务。这些战俘营是在5到6月先后建立的。在那些农村地区，分不清是游击队还是匪徒，常常出来威胁交通联络；在某些地区，天黑以后道路更不安全，许多农民甚至在白天在有卫兵保护的情况下也不敢出来耕地。

然而游击队的活动只不过是一些扰乱行为而已，1952年春，匪徒们在重要的釜山港口所采取的行动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韩国政府内部的危机。对国内问题的争论造成了李总统及其国会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当全国大选最终决定在夏天举行时，李总统决心改写宪法，即总统的当选将由公众的选

票而不是由国会的选择来决定，他的对手也下同样的决心在立法范围内维持他们的利益。

5月24日，事情有了眉目。李把釜山划入军事戒严区内，并逮捕了一些在国会的对手，很明显，他这样做的企图是解散原有国会，选出一个新的国会，修改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制的立法，由公众来选举总统。总之，他要控告国会被捕人员犯有和共产党同谋罪，并且要继续确定军事戒严区，以此来对抗釜山地区游击队的活动。李的行动立即引起朝鲜国内外的惊恐。联合国的政治、军事代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谋求说服他停止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做将会导致朝鲜国内机构力量焕散。克拉克和范弗里特建议让国会出面处置这些问题，于是，在李中昌将军的陪同下，范弗里特于5月28日亲自访问了李，努力说服他撤销戒严令，李答应加以考虑，但事后全然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范弗里特采取防御措施保护联合国军人员和装备，加强安全保卫，制定计划确保联合国军的安全使其人员、车辆、财物免受暴力的践踏。由于第15步兵团的第1营正位于釜山的战俘营执行任务，范弗里特命令该部队作为流动的后备力量撤退到位于大丘的联合国接待中心。他警告第2后勤司令部的尤恩特将军，在那些危及不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安全的地方，要绝对避免与民众发生冲突。为了加强安全防御，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克拉克，假如政治局势恶化，他可以从日本抽调1个相当于团的战斗部队。

由于釜山港是南朝鲜的主要港口，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军需品由此输送各地，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最关注的事就是把军需品不断地运往前线；但是，国会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全力支持，努力改变李在戒严区和国会方面所采取的顽固立

场，柯林斯指示克拉克要坚定不移地作美国政治代表们的后盾。

6月2日，杜鲁门总统给李去函，对其不信任现存的朝鲜领导班子的态度表示异议，要求李在穆希尔大使从美国返回以前不得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杜鲁门的这一请求很可能使李踌躇，因为尽管他没有撤销戒严区，但最后他决定不解散国会。

6月，李及其立法机关着手商讨双方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僵局有所缓和。7月3日，宪法修改案产生，在诸多事宜中为公开选举总统、副总统以及成立第二立法机关作好了准备。李取得了压倒对手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到7月28日，他还是取消了戒严区。

5月底6月初是紧张时期，联合国军司令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危机对军需战线以及韩国陆军的影响。由于政治派别已放弃了对军需后勤的干预，范弗里特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反对以政治手段篡夺韩国陆军的领导权；克拉克和范弗里特都倾向于保持沉默，让朝鲜人自己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他们忠实地支持美国政治代表们，可以说，假如他们不是激情百倍的话，也是竭尽全力去结束这场朝鲜政治战争。

游击队的威胁是李用以强行戒严区的理由，实际上，在当时这一威胁无论对韩国政府还是对联合国军司令部都无足轻重，但是到了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小股匪徒活动日益猖獗。6月24日，分不清是一帮游击队还是匪徒炸坏了一辆火车，烧毁了11节车厢，炸死了40多个旅客。

韩国陆军以及警察部队向这伙强盗不断发出小规模进攻，在他们看来，这伙强盗的主要目的是抢劫粮食和衣服。尽管遭到韩国部队的严重打击，游击队仍设法补充新的力

量，并继续扰乱袭击。7月，韩军第1师被迫撤离防线，被调遣到朝鲜西南部帮助镇压捣乱分子。这种情况已有先例，只是作些不痛不痒的摩擦，现在，韩国第1师估计他们只不过是重蹈覆辙；但是当该师及其从属的国家警察局的队伍开发到智异山山区时，他们遭到了零星匪徒的打击。游击队遵循他们惯用的分散和回避战术，事先把队伍分成若干小组，等韩国部队通过，他们立即汇集各路人马，开展他们的掠夺活动。第1师与这伙神出鬼没的匪徒整整周旋了3个多星期，才回到了前线；国家警察局重新担负起他们对后方地区的义务。从8月到10月，据报道，约有300—400游击队被击毙，每月有100人左右被捕，然而，游击队的力量并没有任何被削弱的迹象。

很显然，这一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相反将很可能继续发展。但这在克拉克看来，追捕游击队，就象解决政治纠纷一样，是南朝鲜军队的内部事情；9月，他通知新成立的朝鲜通讯联络地区司令汤姆斯·W·哈伦少将，美国士兵可以担当警戒战俘的任务，由他们自己来保卫财产，维护运输路线以及联合国各国人员的安全，但不能去追捕匪徒。

联合国军司令在南朝鲜内部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他认为很难避免卷入韩国与日本国之间的纠纷。日本声称它在朝鲜拥有既得财产的权力，两国因此争论不休，相互怨恨，现又因日本人到朝鲜近海捕鱼一事而使关系更加恶化。9月，几艘日本捕鱼船，到朝鲜领海捕鱼，被韩国海军抓获，由此事态变得更加紧张。9月22日，克拉克被迫在朝鲜近海道成立海上防守区域。公开表明要保证联合国军交通联络线的安全，防止敌人情报人员登陆，但实际上，却是谋

求在韩国和日本海军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在李决定结束联合国军在朝鲜雇佣2,000名日本兵时,紧张局势似乎并没有丝毫的缓和。这批日本人的大多数被安排在港口地区工作,他们安装设备,训练朝鲜新兵。对于日本人如此受到重用,朝鲜人表示愤慨,以致后来李下令逮捕所有未经韩国政府批准而登陆的日本人。克拉克针对这一情况,指示除非情况非常重要,否则,所有的日本雇佣兵都呆在船里。鉴于陆军部不希望克拉克对此情况发表声明,柯林斯告诉他要继续努力,用朝鲜人取代日本人,并为此而制定一个李所能接受的计划。10月初,克拉克向哈伦将军转达了这一指示,建议他把重点迅速放在训练扩充的朝鲜人方面,强调温和地解决所存在的争论问题。

第十六章　资源的保护

1952年11月，战场上又恢复了一些零星战斗，板门店联络官员的会议中断了，这一切预示着未来的冬天是漫长的，一场灾难即将降临。从1952年到1953年的冬季，人们将继续把相当的注意力都放在这场有限战争上。空袭、巡逻、小规模行动将是前线战事的特征；双方还将会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违反会议的中立立场，谈判者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僵硬。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远东，人们都持有一种保守的调子，那就是保护美国奉献给这场战争的最珍贵的东西——人力。他们认为，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再也不是存亡攸关的事情，已没有必要再扩充美国士兵，也没有必要继续要老兵去充当战争的苦力。在前线战事平静的情况下，可以更多地训练和使用韩国士兵，部队也可以经常性地实行轮换制度。这样做可以储备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减少战场上美国士兵的伤亡。目前美国既不能结束这场朝鲜战争，也不能从半岛上撤退它的力量，这样做可以让多方面来承担损失，让每个士兵都务必去分担风险。

一、悬而未决的形势

1952年后期，美国第8集团军轮换的士兵里有的是该军的主力，也有的主要是病弱，这似乎有些矛盾，但为了保持

士气的高昂，轮换制度起到了关键和必要的作用，因为战争处于僵持的局势，士兵们变得颓丧不振，而轮换的做法可以使地面部队渡过这一难关。由于部队定期换出换进，改变了原先单一的例行巡逻和防御性战事的局面，战场情况大为改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规定，每个在前线服役的士兵服役期满就可以尽快获准返回家乡。

1951年9月以前，朝鲜战场的每个士兵起码必须在1个战斗师里服役6个月，或者在1个后备部队呆上12个月才许轮换。新的标准是8月制定的，并颁布了一个积分制。内容是：在战事频繁地区，每个士兵每月可得4分；在后方地区，每个士兵每月可挣得2分；在远东司令部的其他部队服役每月每人可得1分。9月，要求军官们9个月为55分，普通士兵为43分。

随着1951年秋季军队力量增强，积分标准尺度有所下降，军官为40分，士兵为36分。到12月，军官的标准又上升为45分，目的是应付计划中的1952年初军官替换不足的情况。

1952年3月，轮换制度作了全面的修改。新的制度从4月1日开始生效，即在战事频繁地区仍然每人每月为4分，但在师后备部队，也就是现在的紧急战斗地区，只得3分。6月计分标准是军官得37分，战士36分。一般说来，一个士兵在1个战斗师里从轮换之日起，在朝鲜的时间总共不到1年。很自然，积分制就成了战斗部队里的主要话题。毫无疑问，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这将是维持第8集团军士气的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与此相反，在坚持这一做法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不利之处。为满足替换的要求，每月要向远东司令部提供2万到3万的新兵，这就向军队的兵力来源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正象赫尔将军10月初告诉克拉克那样，在未来的几个月

里，为确保远东司令部的定额，必须从内地部队和装备单位里大量抽调人力；他又说，人员欠缺在欧洲司令部方面已经有所反应，海外各地战区的弹药供应也相应拖延了6个月。为保持冬季战斗地区积分限度仍为36分，克拉克不得不从日本和冲绳岛向第8集团军调集兵力，与此同时把后方地区的积分限度增大到38分，随后又改为40分。

12月，克拉克提出增加新兵以满足替换的要求，柯林斯将军答复道：美国军队提供兵源的能力受到了财政预算的限制；制定积分制是为士兵替换创造优生条件，在这一限定的范围内，美国陆军不能考虑提供更多的新兵。但是从柯林斯的话里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他通知克拉克，一到2月送来的新兵将大大超过8万人，这样就可以弥补11到12月间的不足。

在前线，轮换的做法给战场带来不良的效果。到1952年10月，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轻军官期限一满就回家，而接替他们的往往只是缺乏经验或者从未接触过战斗的官员。

许多从美国派来的士兵缺乏野战训练，不得不在战斗期间艰苦磨练。一旦他们成为有用的战士，分数积累够了，替换的条件也就具备了。如此这般，反反复复，结果战士的合格标准很难维持，尤其炮兵和技术兵的情况更糟。为此，范弗里特大为不满，他说，炮兵已经失去了快速和准确射击的能力，并把这归咎于轮换制度，他认为这一做法夺去了炮兵部队的有用之才。

轮换做法还产生了另外一些副作用。象1952年朝鲜的这一场保卫战，必须具备以下几点：深挖坚固的防御工事；仔细安排火力网；认真计划布雷区；建立有刺铁丝网以及碉堡和哨位。敌人施展了他们高水平的技术，建立了他们的上等

防御工事。在许多次战斗中，敌人都在他们前沿阵地的同一防御区内长时间地防守；他们相当熟悉地形，每当他们估计尚能在阵地上抵挡一阵，他们就士气大振，得寸进尺，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

对于联合国军的部队，情况却正好相反。他们的士兵往往不能在同一防御区内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只是尽可能少地布下几个地雷，装上几个有刺铁丝网，省得让巡逻兵为陷于危险而担忧。由于全套人马常常在防御线上搬出搬进，部队很难熟悉地形。

相比之下，敌人要更为熟悉和习惯这种地形。联合国军的阵地常常设立在高地的顶端、山腰或前坡上，这些地方都颇为容易暴露给敌方；而敌人常常在他们的后坡上睡觉，往高地的深处挖隧道、建地堡；当敌人的工事全部修建完毕，他们就把火力点隐蔽起来。相反，联合国军的堑壕常常挖得很深，很陡，不易发射火力。敌人随时都可以用自动武器的火力攻破和炸毁这些又长又陡的堑壕。这个时期的敌人和联合国军对待防御的不同态度就象一家旅馆主人和一个过夜的旅客一样，敌人很快熟悉了他周围的一切，高度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财产；而联合国军的部队只是短暂逗留的寄居他人屋檐下的过路客。

二、炮战方面

有了“轮换”这根胡萝卜棒在眼前晃动，每个士兵在其服役期间，主要关注的莫过于保命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对激烈的行动都不感兴趣，保命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由于不愿冒险的思想抬头，大家都希望用加强火力

来代替增大兵力。10到11月，联合国军炮手们用8发火炮弹和4发迫击炮弹回击敌人的每一发炮弹。到12月，虽然迫击炮发射率降为3比1，但是在联合国军里占优势的火炮发射率却为19比1。为把敌人埋葬在千万吨炸弹的灰烬之下，他们曾做过一些有趣的尝试。

1952年秋，范弗里特对第8集团军大炮的使用颇为关注。9月，他和他的军团司令部商议此事，然后决定把155—毫米大炮的发射率用在8—英寸榴弹炮上。当时，第8集团军拥有44门8—英寸榴弹炮和28门155—毫米大炮，而且正在把1个155—毫米炮团改编为8—英寸榴弹炮团。范弗里特制止了这一改编行动，相反却下令把1个105—毫米榴弹炮团改成8—英寸炮团。当改编完毕，第8集团军将拥有48门8—英寸榴弹炮和36门155—毫米大炮。范弗里特相信，这样的比率将会使其重炮得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其最优越的炮火能收到最大的效益。

重新改组重炮以后，范弗里特马上决定推行他的计划，集中重炮火力向敌人的大炮进攻。他选择了美国第9兵团所在的地区为试验场地，把从属于美国第1和第10兵团的第1观察团、2个8—英寸榴弹炮团和2个155—毫米大炮团的精锐部队编入第9兵团。在这场保卫地形复杂的高地的长时间艰难斗争中，范弗里特写信告诉克拉克，每当联合国军占领了高地，密集的炮火就彻底地摧毁敌人的工事；每当敌人向山顶移动，联合国军的炮火总是迫使他们后退；他接着又写道，要打退敌人接二连三的进攻，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敌人的大炮，这样，韩国第2师就有可能抢夺和占领这个双方激烈交火的阵地。

克拉克赞同范弗里特这一反攻计划，并支持他作5天额

外的火力演习。但是在他获悉此行动取得相当成效之前，他不希望韩国第2师再次参与这一阵地的战斗。假如为保住这一阵地需要付出过大的伤亡和过多的弹药，他表示反对这一行动。

利用航空照明及声音侦察，闪光及雷达绘图，再加上炮击报告，第8炮兵团绘制了一张敌军火力点图。11月3日，向敌人发出了进攻，3个8—英寸榴弹炮兵团的大部分力量以及3个155—毫米炮兵团向敌人炮兵阵地进行了单发和齐射炮击。此后的一周里，为了消灭这一带敌人的炮兵力量，重炮共发出了近2万发炮弹。然而，成功率是有限的，炮兵观察员估计：敌人巧妙地利用了穴洞、堑壕和坚固的过人高的防御工事，差不多50发炮弹的猛烈炮火才能拔掉敌人的1门大炮。在这一演习阶段，敌人250多个炮位受到破坏，但只有39门大炮和19门高射炮受到损失，共产党炮兵没有沉默，占领高地的战斗仍在进行。

克拉克将军不反对继续推行反击计划，但他于11月10日通知范弗里特，在重炮弹的全面供应增加以前，给第8集团军的弹药不得超过正常供应量。

9到10月，第9兵团在前线所进行的第二次演习取得了较好的成功。第5航空队司令，巴克斯将军要求第8集团军配合其轰炸机的近地面轰击，出动高射炮狂轰。他认为，在飞机轰炸之前以及轰炸过程中，使用大炮攻击敌人的高射炮将会减少第5航空队飞机的损失。范弗里特批准从9月25日起为期25天的演习阶段。当轰炸机向第9兵团战区目标飞行时，大炮向敌人的高射炮阵地发出无线电引信；当飞机接近目标时，大炮就开始猛烈开火，一直到空袭结束。演习到10月25日结束，据第5航空队汇报，只失踪1架飞机，13架飞

机在这期间遭到破坏。而前一次，据统计，飞机共出动1,816架次，失踪4到5架，约有64架飞机受到破坏。在这一试验过程中，第5航空队飞机没有受到第9兵团炮火的射击。为使这一做法在地面双方力量均衡的情况下获得有利的效果，巴克斯和范弗里特指示他们的部队，要求他们为战事的进展制定高射炮狂轰的规划标准。

鉴于10月弹药严重消耗，第8集团军副军长约翰逊在10月下旬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给第8集团军提供足够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弹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约翰逊要求柯林斯将军，只要有可能，就要用迫击炮代替火炮。他指出，不仅迫击炮炮弹相对便于生产和运输，而且这些炮弹将会在朝鲜发挥更大的杀伤力。

当柯林斯把约翰逊的建议转达到野战部队，他们立即加以反驳。他们提出，就算每个步兵营能补充2门或2门以上的81—毫米迫击炮，但是火炮和迫击炮的作用大不相同。拿仅适用于短距离的迫击炮代替长距离的火炮，其结果只会导致火力的全面亏损，失去有效的战斗力。野战部队不相信迫击炮比大炮更富有杀伤力，因为从战俘那里他们得到了完全相反的事实。

为表示对弹药供应的减缓表示关注，11月21日，洛弗特写信给克拉克，在信中他说，2年来，为供给计划的付诸实行已拨出了一大笔款子，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弹药欠缺仍是一个问题；洛弗特又告诉克拉克，他将行使自己的最大权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保证不影响美国部队的战斗力；为满足远东司令部的需求，他已经制订了一个最大的货单，假如有必要，他还可以向别的战区提供货物等等。为有助于克服美国作战部队弹药不足的问题，洛弗特要求克拉克

呈递一份有关联合国军司令部弹药情况及其效果的完整报告。

2天后，在克拉克的回信中，他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即根据军部批准的每日供应量，目前向远东司令部供货90天的决定是可行的；但是，他又说，问题是许多武器的供应都不到90天，而且下一步的可能增加量也无法弥补前些时候严重不足的情况。由于大炮的密集炮火能使友军免遭严重伤亡，他为155—毫米榴弹炮的每日发射量从15发减到9.4发而感到痛惜；经常监督和节制使用弹药已经影响了他的指挥能力，限制了出击有限目标的主动性，他又说，更糟的是：当共产党进犯时，弹药的不足尤使联合国军难以招架；他最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性地增加生产，继续以军部规定的供应率向远东司令部输送弹药。

洛弗特向克拉克许诺：假如美国充分调动生产力，以压倒优势的优先权投入军需品的生产，军队弹药欠缺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然而，他又说，有一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远东司令部应该收回用过的105—毫米炮弹的黄铜弹药筒，因为目前没有生产这种东西，克拉克马上通知范弗里特尽可能100%地重新利用黄铜弹药筒。他告诉范弗里特："我们的道路远没有尽头，但是我相信，我们对增加弹药供应量的反复要求终究会打动美国政府的心，我们前面的道路将会顺利得多。"1951年政府通过拨款扩大弹药生产，到1952年底1953年初，此举动终于结出了硕果，军需供应得到了缓和，前景变得光明了。

与此同时，远东司令部以及第8集团军凭借"替换弹药"的做法度过了这一艰难时期。1953年1月，当时81—毫米迫击炮弹不足，处于前线的第8集团军授命改用4.2—英

寸的迫击炮或大炮，这种情况一直到战场库存完毕为止。与此同时为减少155—毫米榴弹炮炮弹的消耗量，克拉克再次寻找解决的办法，他把他的2个营改编成240—毫米营，据说，如果每天发射15发的话，凭这种口径大炮用的炮弹完全可以满足2个营使用。军部通知他，这种炮的装备和零件将于3月到达。

1953年初，弹药形势有所好转，范弗里特回到美国休养。从3月到4月，他几次出现在国会会议上，提出了不少有关朝鲜战争局势的问题。他声明，弹药的不足已经给他为期22个月以来就任司令的工作带来不利，他愿意把这个问题交给会议讨论，为此，陆军不得不出来声明他们是如何处置这一问题的。

柯林斯马上要求克拉克准备一份文件，这位远东司令3月16日照办了，他对形势的估计如下：

战场上的小型武器不缺，但如下所列的弹药供不应求。但是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战场库存和运输线上，前方的战斗部队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我目前所注意到的，第8集团军从不“缺乏”弹药，在战术局势需要的情况下，一直得到上级拨来的适量弹药的补充；据目前所能了解的情况看，朝鲜战场上没有任何1个军事单位因为要完成某个任务而缺乏弹药的。

就在第8集团军从未中断过弹药的同时，战场上的一些部队却因弹药的不足而限制了战斗力；敌人炮兵活动不断增加，使得友邻部队的死伤也相应变大，这就需要第8集团军加强反攻力量，包括军团、师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的使用，由此必须耗费一批应急弹药；另外，向壕沟深处的目标进攻，要摧毁敌人的工事，也需要弹药。由于应急弹药不

足，生产也有限，对日复一日弹药的使用必然就有所限制，人们也就注意尽量节省弹药，但在需要的时候，是不能限制的。

假如敌人发动和坚持一场全面的进攻，战场库存就会严重短缺，因为这种行动消耗的弹药量将是陆军部所能提供的3—4倍。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将无法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依靠我们的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

他列举了在各个时期欠缺的弹药种类，然后继续声明，目前战场上库存的弹药还可以维持当前的局势，假如“现有的财产够用90天的话”对付共产党的全面进攻将不成问题。

对于弹药欠缺的看法众说纷纭，要想计算出弹药不足的精确数字是相当困难的。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是否增加这些稀有重要弹药就能使这场战争的后2年形势有所改观呢？因为战事的进展受到限制不仅仅是弹药供应问题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受到当时美国及其联合国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的影响。只要他们愿意在会议桌上结束这场战争，减少他们对朝鲜战争的义务，即使弹药供应充足也不可能造成什么不同的结果。共产党无视生命的损失，他们拖延战争，在他们看来，仅仅再死伤几千人，也不可能使他们加快解决这场争端的步伐。

三、壁垒在加固

如上所述，美国要减少其在朝鲜的义务，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加强韩国的战斗队伍。10月底，杜鲁门总统批准把韩

国陆军部队扩大到12个师，不久，韩军的第12师、第15师和其他6个独立团相继建立。第8集团军估计第12师和3个独立团将在12月底参加战斗，第15师和另3个独立团将在1个月以后参加行动。

11月初，韩国陆军拥有46.3万名士兵的最高纪录。但是，依克拉克看来，一个拥有12个师的部队只是一个权宜措施，11月1日，他呈交了一份计划，准备到1953年8月把整个陆军扩大为20个师的力量。韩国军团也从2个增加到6个。新师士兵经过6个星期训练以后，最晚的也可以参加1953年底的战斗。克拉克告诉柯林斯，随着韩军部队的组建、装备和训练工作完毕，每2个新成立的师就可以安排1个美军师或其他联合国军的师作为后备力量；到1953年5月，他就可以开始分批解散美国人所在的师，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地方服役。假如一切顺利，到1954年中期，至少有4个美军师和2个军团的力量可以重新部署。

克拉克提醒道，扩编韩军也有不利的一面。军事顾问团将必须扩大，承担的责任会更大，500名军官和士兵将来源于战场之外。假如美国部队撤离主要防线，最后撤出朝鲜，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也会施加压力，他们也要减少在朝鲜的义务，这样一来，韩军就要开始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为了坚守防线，美国将不得不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由于大部分的原料、装备来自远东司令部的战略库存，这将会影响日本的防卫力量，如果韩军力量增长一倍，它的战斗效力也会因为大批有经验的军官的离职而减弱。为了防止事态往不利方向发展，克拉克建议，假如美国后勤能力允许，应该保持计划的平衡，在精简美国人员的同时，注重发展韩军的有效骨干力

量。

在华盛顿，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通过了克拉克的建议。埃德曼将军指出，韩国部队的兵力并非一个有限的因素，但是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将会因为缺乏有经验和有能力的军团以上的领导力量而受到限制。美国必须向他们提供大批包括装备在内的后勤力量，韩美互相防卫援助协定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军备扩充将会拖延。埃德曼敦促采纳克拉克扩编韩军的折中计划，并且指出，在目前有限的情况下，美国陆军所不能接受的有关预算开支的问题应该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

陆军部长培伊斯和柯林斯将军均认为：统盘考虑南朝鲜部队问题的时刻到了。由于落实扩编20个师的计划超出美国陆军的权限，11月17日，培伊斯把这一问题交给了洛弗特。培伊斯声称，从各方面扩大韩军的力量势必影响朝鲜战争的全面行动，影响政府和互卫基金会受援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陆军部还是赞同由韩国人尽可能快地去占领整个战场。

虽然洛弗特先生在12月已把此问题转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是在1月新的行政机构接管以前，看不出有作出新规定的任何迹象。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防部长查理斯·E·威尔逊在他们的过渡时间均对韩军扩编一事表示冷淡。柯林斯将军指出，必须考虑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以及某些类型的弹药是需要装备和提供的最重要的项目，但主要的问题仍是财政开支问题。总参谋长认为过去对韩国的支援无需经过国会的特别规定，但是国会是默认的，在它接到通知后则投票拨出一笔款子供韩国扩充军备之用。柯林斯觉得这个扩充计划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是可行的。这些情况

是：僵局持续下去，敌方不大规模地增加兵力；1954财政年度给陆军部的预算增加20亿美元；支援建立20个师的经费能够预先拿到；按计划延期完成北大西洋公约；延期向韩国所有的师提供正常的4个炮兵营的力量。

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为首的共和党1月执政以来，就介入了这场反对还是拥护韩国军队扩编的争论之中，而朝鲜所发生的事实又加剧了这场争论。

正当韩国招兵机构有效地工作着，继续以高速度训练新兵之际，1月中旬，克拉克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假如按目前的速度招募新兵，到该月底，韩国陆军的主要部队就要大大超员，从根本上看，这和原来未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两样。假如晚些时候再次打起来，新兵训练就会受到干扰，时间就被担搁。鉴于配备2个师以上的军官和士兵已准备就绪，克拉克建议批准韩国出动2个师于1月参加战斗，不把美陆军韩籍人员计算在内，他们的兵力可达46万的最高纪录。如果可能的话，他将制定方针，正式通知韩军扩充力量，增加战场库存，装备第11、12师的全套人马。

正值作出决定前夕，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克拉克，在他作出有利可图的行动以前应该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1月31日，克拉克指示范弗里特马上行动建立韩军的第20和第21师。3天以后，总统批准共成立14个师和6个独立团，包括美陆军韩籍人员和海军在内，最大兵力达到507,800人。2月9日，范弗里特正式组建这2个师。

看来，阻挡韩军继续招兵买马组建部队的压力并没有排除。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热衷于更多地利用本地兵力，减少对美国的需求，未来的主要问题将和过去一样，仍然是扩编的时间以及资金问题。同一时候，韩国陆军开始成为装备完

善的部队的一部分；1月，原来的10个师有5个分到了3个105—毫米和1个155—毫米榴弹炮的炮兵营；另外的5个师进入前线时由4个韩军炮营作后备；7个韩军坦克连开始行动，每个连配备22辆口径为90—毫米的M36中型坦克。预计第8和第9坦克连将在3月和4月参加行动。

虽然克拉克和范弗里特曾赞同建立韩国第2海军团（小于1个营），并给其增加1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和23,506名海军战士，但是他们反对更进一步的扩充。他们认为，小小的韩国海军并不具备人力或海上运输来支撑一个很大的海军团，他们表示不再过问或参与更进一步的扩充行动，他们又说，假如提供更多的装备去发展海军部队，韩国步兵师的计划就会拖延实行。克拉克还指出必须维持韩国空军的力量，保持8,600名人员和1个F—51空军飞行联队。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空军人员可达9,000人，而韩国政府所要求的是11,550人。

韩国军事力量的越发强大伴随着经济财源开发的日益增大。由于韩国资源丰富，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原料都资助了这场战争，由此而来的便是通货膨胀。为支撑联合国军的力量，美国给韩国大量贷款。这使得财政地位动荡不安的韩国大为不满；为了帮助稳定朝鲜经济，美国继续在冬季拿出更多的美元，12月，克拉克补充给韩国10、11两月的贷款达850万美元之多，使得整个贷款数字超过7,400万美元。

虽然非正式的兑换率为2万多元换1个美元，韩国官员们还是坚持保留原来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打交道时的兑换率：6,000元换1美元。1953年1月，韩国和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时，韩国仍然坚持在1952年12月16日以前预支8,700万美元的贷款；从2月底达成的协议中可以看到，美国同意从2

月7日起预付韩国8,580万美元的贷款，但韩国必须答应调整1/4的兑换率，这样才能更精确地反映韩国货币的确切价值。2月，美元大量涌入韩国，韩国货币以100对1的比率与美元兑换。估计这对危机会有所缓和，起码在短时期内有点作用。但随着春季的来临，迹象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韩国政府有企图趁美国加强对南朝鲜战争的支援达到缓和内部经济局势的目的。

对于大海对面的日本，美国为加强它的堡垒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却遇到了不同的反应。日本人似乎对他们拥有11万人的4个师的力量表示满足。除非政治气候有助于宪法的更改，否则日本的武装力量没有希望合法地扩充。与此同时，在达成日——美双边协议之前，为装备计划中的日本10个师的力量而拨出的那笔款也中断了。1953年2月，据陆军部估计，因为日本人拒绝更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力量，第一财政年度原打算拨给日本的5.286亿美元将只有3.5亿美元了。这样一来，韩国的军事装备就将独占鳌头，日本和韩国之间武装力量的不平衡越发严重，而日本人的冷漠只会更进一步促进韩国军事力量的发展。

四、远东指挥部的改组

1952年到1953年冬季，华盛顿以及远东的美国领导人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为保存前线的兵力而努力，因此，自然而然，他们也就同时考虑在后方精简机构以及节省房子管理费用等问题；克拉克上任不久，就决定对远东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作一认真调整。

巨济岛危机已经暴露了第8集团军及其后方地区关系不

妥的弊病。克拉克决定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于1952年7月10日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联络区，为消除范弗里特对其联络系统、后勤援助、战俘以及内务问题的忧虑，克拉克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要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战斗，不必过多地花费精力顾及后方地区所发生的事情。"

韩国联络区的司令部设在大丘，在海伦将军的领导下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韩国以南2/3的地方。其新任务是负责战俘营、补给、库存、港口、铁路运输、部队换防以及再建设等问题。假如可能的话，现存的介乎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其他联合国同盟军之间的权力机构也可以分担责任。

正值韩国军队的战斗独立性在朝鲜半岛发生作用之际，克拉克决定重新把他的东京司令部组建成一个真正的联合指挥部。由麦克阿瑟以及李奇微领导，远东司令部人员几乎全部都是由陆军军官以及现役人员组成。李奇微曾考虑建立一个联席会，但在他离职前也未能说服司令部使其计划生效。

前面已讨论过司令部的指挥系统问题，1951年，名义上有一个远东美国陆军部队，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人员，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相反，尽管在指挥环节上，第8集团军不如远东海军和远东空军，但它和它们一样参加军事行动。这种安排可能已经引起海、空军司令员的不满，为消除怨恨，克拉克决定给远东司令部配备陆军，并把它和海、空军的最高指挥一视同仁。他将和过去一样担任远东美国陆军的最高司令，避免安插一个比范弗里特地位高的"四颗星"高级将领。8月20日，克拉克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指出，远东美国陆军指挥部将逐步取代日本后勤指挥部。这将可能导致取缔诸如北、中、西南指挥部和东京军事指挥部等从属领导。

10月1日，日本后勤指挥部解散，它的一切义务转交给远东美国陆军。同一时间，日本后勤部从属的北部指挥所也被废除了；克拉克任命哈罗德将军为他的副手；远东司令部的参谋机关也开始以新的机构行使权力。该月下旬，克拉克组织了人力资源委员会商讨远东美国陆军所需要的人员以及远东司令部参谋联席会的其他问题。他估计重新组合的工作到年底才能完成，这样做的结果，一开始就可以免去1,100个军事人员，将会大大节省美国和日本公民服役的人数。

远东美国陆军组建完毕，克拉克又着手另一项任务，即把远东司令部建设成为一个联合机构，假如另外两个军队同时承受任务并感到人力不足时，他希望，“陆军可以加强它的效力，这也是朝鲜当时求之不得的事情。”他首先设想把人事、战事、内务等方面事情交给陆军官员；把情报交给空军官员；把后勤交给海军官员。但到1953年1月1日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时，人事、情报以及战事均由陆军主管，后勤和内务由海军来负责。直到停战协定签署，空军司令才接管了战事工作。在总参谋长希克手下设有来自三军的3名副总参谋长，业务上的工作比原来增加了3倍。

远东司令部终于以联合指挥部的形式跨进了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这种组合对缓和僵局究竟能起多少真正的作用，尚难以估计，最后争夺战的前景似乎还很渺茫。不过，随着海、空军官员坐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席位上来，陆军将可以指望进一步裁减人员。假如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克拉克的队伍将很可能以更整齐的阵容组织防守力量，更迅速地向敌人发动进攻。

第十七章　寒冷的前线

在1952年10月和11月初的苦战之后，冬天再次降临，前线的战事规模随之迅速减弱，敌军退回到深深的地堡和山洞中去过冬。战斗平静下来，代之以从前例行的突袭、巡逻和小规模交火。双方仿佛满足于沿着战线警惕地监视着对方，保存自己的实力，耐心地等待停战谈判休会得以结束。任凭联合国军空军竭力摧毁共产党的补给仓库和通讯线路，战斗的减少使敌人有可能补足给养和兵员。集结看来不是为了重开大规模的战事，而是例行公事。当寒冷的天气来到了，前线上处处感到它的影响。

一、军事胜利的破灭

尽管双方僵持不下，克拉克将军仍然没有放弃策划一场打击敌军的大规模行动的想法。在10月那次显赫一时的行动中，他对参谋长流露出心中的忧虑：没有对共产党人足够的军事压力，联合国军就不能达成停战。克拉克告诉柯林斯，由于目前的兵力部署是不能发动主动进攻的。但是他有一个能迫使敌人寻求或接受一项停战协定的行动构思。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一设想，远东司令部参谋部就会制定出具体的部署方案。

10月中旬，由3名远东空军军官组成的特遣队抵达华盛

顿，为克拉克的建议游说。这项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分3个阶段向平壤——元山一线发起攻击，每一阶段持续大约20天左右，包括地面部队包围共军，发动一次较大的两栖进攻，一俟时机适宜，空军加入这项行动，从空中和海上向中国境内的目标进攻。战争升级需要扩充远东司令部的兵力，需求量是很可观的。除了那些在联合国指挥下可以成功抵抗敌人进攻的兵力之外，还需要3个师的美军或联合国军（1个步兵师，1个空降师和1个海军陆战队师），2个南朝鲜师，2个中国国民党师。12个野战炮营和20个高射炮营。

据克拉克后来讲，每一位远东司令部下属指挥官都非常赞同这一行动的方针。由于美国行政当局可能出现的变化，和一位军人上升到国家的领导岗位，在朝鲜加紧另一次战争的前景看来已经明朗。克拉克评论说，如果事态的转变需要更强有力地进行战争才能实现，我们得事先准备好方案。

远东司令部的军事长官们注定是要大失所望的。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2月2日到达朝鲜，随同前来的一大批显赫人物中有尚未赴任的国防部长查理斯·E·威尔逊、布莱德雷将军和莱特福德海军上将。他访问了前线，会见了李承晚总统，同许多前来拜访的人会谈，却一次也没有提到在朝鲜争取军事胜利的问题。12月5日，当选总统在他对朝鲜访问的最后1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他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魔棍来结束战争。克拉克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中意义最深的是克拉克本人未能得到机会对需要兵员的估计作进一步的说明和系统地解释对敌军加强军事压力的计划。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谈话使克拉克清楚地认识到新任总统将遵循杜鲁门先生制定的方针去寻求体面的和平。这样，以联合国军胜利的军事解决的最后希望破灭了。很明显，政界首脑们，无

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想要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冲突。

二、冬季作战

只要谈判僵持不下，战争的下一步方针就不过是过去方针的重复。据估计敌人在10月的损失使他们的兵力从1,008,900人降到月底的972,000人。但是当11月战斗逐渐减少，敌人总兵力再次缓慢上升。

前线来的报告指出共产党人正在深掘战壕以长期呆下去。尽管挖掘巨大的山洞需要3至5个月，他们一直在把有战略意义的山挖空用来安置整班或整排士兵。这里既能防御联合国军的空军和大炮的攻击，也能御寒。敌人可以舒适地度过整个冬天。对俘虏的审讯得不出全面进攻的消息。敌人沿着前线部署的兵力显得没有超过防御的需要。到了1952年11月1日，邻近的战线上有7个军共16.6万人，2个北朝鲜军，49,700人。后半月战线的最东端稳定下来，多达35万人的10个中国军和4个北朝鲜军的14万士兵处于后备状态。他们既可增援前方，又可抵御联合国军可能发起的两栖登陆。与他们对峙的是联合国军的18个师和后备部队，共有35万人。

随着地面战争的减少，11月中旬，敌军努力重建库房，共产党的交通运输也忙碌起来。从此朝鲜上空出现更多的飞机，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要采取进一步的挑衅活动。这个月共发现了1,227架飞机，却只有395架同联合国军的飞机交战。据估计有21架敌机被击落，另外有4架大概被击落了，19架被击伤。

11月，敌人方面进行了一次重要换防。中共第47军进入

临津江防区，第39军撤回作为后备力量。在联合国军方面，美国第25师在11月12日替换了第7师，南韩第9师在11月24日也接替了第2师。这两次换防是美国第9军各师的例行调换。

美军第9军10月在“白马山”、“三角山”和“杰克逊高地”受到中国人的正面攻击，但是在11月中旬以后，沿着该军驻守的前线一带的压力已经缓解。只有在昆华北部的“狙击手岭”防区，中国人不断对南朝鲜占据的高地上的前哨显出他们的敏感。

12月2日，敌军1个排侦察南韩第9师在狙击手岭上的哨所，随后另1个排也加入了这一行动。大炮和迫击炮的炮火一度猛烈地对射。接着中国人攻占了顶峰。但是不久联合国军以密集的炮火使中国人为他们刚刚到手的阵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中国人撤离之后，南韩部队又回到了前哨。短暂的平息之后，中国人发起了第2次进攻。手榴弹使南韩的守卫者再度后撤。次日，2个排南韩士兵同敌人进行了7个小时的战斗，收回了山顶。接下来的10天里，中国军队向“狙击手岭”展开了40次攻击，但毫无结果。据报告12月沿着该军前线受到114次试探性进攻，有105次中国人将南韩第9师作为主攻目标，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1月这类战事持续不断。中国人不断派遣小股部队袭击“狙击手岭”前哨，兵力增加为3个排，但是未获成功。在南韩第9师防区之外很难发现中国军队。第9军各师在1月里共派遣了2,668次夜间巡逻队，只有64次与共产党军队遭遇。

2月和3月，该军派遣了2,500次巡逻队进行搜索、伏击和侦察，和敌军遭遇还不到100次。整个3月只有一支巡

逻队抓到1名俘虏。双方都没有兴趣来打破中部战线上的平静状况。这使第9军能够进行2次师与师之间的换防。一次是在12月底将韩国第2师替下美军第3师，另一次是在1个月后将美军第3师调回前线以便使第25师撤下作为后备力量。这2次换防都平安无事。

一般的步兵连在上一年冬天的情形如何呢？25师第35步兵团1连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个团的3营驻在防守阵地的主要战线上，离铁原大约有6英里。左翼是配属的第1营的B连，I连在中央，K连在战线的右翼。I连的阵地长达1500码，从山谷中的平地一直到高出山谷100多米的南北走向山岭的顶部。这意味着连指挥部和迫击炮手是前线丘陵地带背后山坡上仅有的兵力，不得不承担通常由后备排担负的反击任务。

中共第15集团军第44师130团的下属部队控制着I连阵地以北高地。从高地上可以一清二楚地观察到这个连的全部阵地。特别是位于山谷平地的阵地。在这个连阵地东端的丘陵地带，中国军队的阵地相隔只有500码。敌军把大部分掩体和战壕挖筑在山的背面，正面山坡的洞孔巧妙地被伪装起来，从那里可以开火射击。

特维斯·杰·达尔中尉指挥这个连。他是部队中几位具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有5名军官，174名士兵和48名韩籍人员。1名军官和13名士兵是黑人，10名波多黎各籍人，1名爱尔兰人和1名夏威夷人。

达尔中尉将韩籍人员安插在前线上。每个韩国人指定给一位美国“伙伴”。这种“伙伴”制使美军士兵能用美国方式训练和监督韩国人，照管武器，同时，教他的“伙伴”一些英语词汇。在很大程度上，语言障碍使两国人员不能成

为亲密的伙伴。并且在这个连许多美军人员采取一种家长式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伙伴"。

这个连沿着战线有39个相隔一定距离的地堡，34个地堡配备有自动武器，5个仅用来当作营房。许多地堡分为作战和为2至7人宿营两部分。80%都位于地下，并且可以从与这个防区的整个战线沟通着的战壕出入。粗大的圆木和沙袋被炸开的一层松散的沙土、石头和树枝掩盖着，保护着地堡的顶部不受大炮和迫击炮的袭击。最初的地堡被修筑在接近山顶的位置，这些地堡未曾移动过，其余沿陡峭崎岖的地势修筑的地堡使配备在那里的自动武器控制着流弹所及的一片地带。

由于I连防守在很长的战线上，它配有附加的自动武器以控制敌军前进的道路。在这些地堡里有1门50毫米口径，6门30毫米口径的重炮和12门30毫米轻机枪，并配备着15支自动步枪。配置在炮台上还有3支5.7毫米无后座力步枪，3支火箭发射筒，2支M—2火焰喷射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5支30毫米的重机关枪和6支30毫米的轻机关枪构成连锁火力。这些武器属防区所有，I连调离后它们将被留在原地。附加的武器使达尔中尉在遭到攻击时能将"大量的钢铁"掷向敌军。

团属坦克连的3辆坦克在山上处于射击状态。山的背后接近该连的中间地带，筑有反坦克工事。M—4型坦克上装备着76毫米炮。除了连里的60毫米迫击炮外，L连的60毫米迫击炮，M连81毫米迫击炮，第27步兵团的迫击炮和第64炮兵营的105毫米榴弹炮在该连阵地遭受攻击时能够直接予以支援。

I连阵地前沿由1至4列双重顶形铁丝网掩护。达尔在

铁丝网前后又设置了蛇腹形铁丝网作为进一步的防卫。沿着前线有4个哨卡横跨在中国人前进的路上，每个哨卡包括4个容纳2人的散兵坑。这些散兵坑是按钻石的形状修筑的，尖部指向北方。蛇腹形铁丝网，双重铁丝网，地雷、绊索照明弹环绕在前哨周围，这些哨卡只在夜间由3个分队轮流把守，一旦遭受攻击将坚守并一直战斗到接到后撤的命令。

由于该连大部分士兵缺乏经验，他们只携带M1型步枪而不是卡宾枪。达尔中尉感到这些不习惯作战的新兵经常有"一种癖好，一种致命的癖好：在战斗最初的2、3分钟之内将所有子弹打完。M-1型步枪的弹药夹内装的子弹比卡宾枪少，它们的弹药就不能这么迅速地耗掉了。每个排有2支装有红外线望远镜的步枪，所有武器每天进行试验射击。步兵们天天拆卸擦拭武器以保证在敌人进攻时立即使用。

除了武器，对士兵来说另一个最重要的装备就是防弹背心。I连大多数人更喜欢海军陆战队式的防弹背心。这种背心比其他类型穿上更舒适并且保护得更严密。海军陆战队式防弹背心没有袖子，在上胸和肩部有尼龙衬垫，在下胸、背部和腹部由纤维玻璃粘附着松脂的铠甲覆盖，陆军防弹背心依仗着层层尼龙编织材料来应付弹片。不论何种防弹衣都不能挡住子弹从近距离射入体内，但是它们都有助于减少在迫击炮、火炮和手榴弹攻击下的伤亡数字。I连普遍认为防弹背心在许多情况下拯救了前线兵士的生命。

I连的官兵还喜爱山地睡袋和橡胶战斗靴。他们称这种靴子为"米老鼠"。这两件物品出色地帮助抵御朝鲜冬天的气候。

入夜，第35步兵团3营的3个步兵连派出巡逻队。团长奥瑞特.杰.马昂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前一天就为巡逻队制定出

计划。他们定下防区、路线、目标、任务、人数、出发时间和巡逻队会遭遇到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变所需携带的装备。3营营长维克多·吉·康利中校经常事先向达尔中尉挑选出的巡逻队长就重要任务作简短的指令。这个营的1个连提供在流动基地上的战斗巡逻队而另外2个连提供掩护巡逻队。有时，战斗巡逻队深入到主要防线前方1000码或更远的地方而掩护巡逻队只行进到500多码的地方。

士兵至少要在前线呆够10天才能参加巡逻任务。在此之后，一般情况下他可望在7至10天内执行一次巡逻。其余的时间将在战壕里执行警戒任务，守候在地堡里，或是在夜间守卫前哨，在冻土上挖掘战壕或是在山坡上架设临时的铁丝网。由于是处于半警戒状态，2个人合用一个睡袋以阻止夜间值勤中的任何开小差行为。连里的工作有80%是在夜间完成的。

宿营条件需要士兵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地堡中宿舍的面积几乎没有超出5×8呎。一般的规格是由圆木、钢桩和电话线建成两重或三重地堡。包装电池用的塑料袋充当窗户，草席作屋顶，夜间暗淡的蜡光在地堡里摇动，大部分情况下是用煤油炉来取暖，但他们也使用安置在地下的烧木炭和柴的炉子以使地面保持温暖。

早餐和晚餐是在两个集中地区供应热食，午饭只是装在盒子里的野战干粮。热食放在金属罐里由连队吉普车从伙房送到战地食堂去，I连有20名朝鲜服务队队员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担负所有伙食内务工作。

为了确保清洁，每个士兵至少隔5天洗一次淋浴。士兵们分批乘车去营淋浴室，并在浴后从里到外换上干净的衣服。要求每人天天换袜子以防战壕足病。另外，连卫生员每

天对全体官兵的脚进行检查，卫生员每月在地堡里喷洒清毒剂和投放鼠药以控制老鼠咬坏物品。

虽然在I连提高士气的最好办法是实行轮换制，此外，还有几种安排使士兵能够改换战场生活。战线的后方有一间温暖的地堡用做娱乐室。士兵们在那里读书，写信，洗衣服和理发。通常每个士兵隔3～4天就可以去温暖的地堡里度过几小时。每天有10名士兵到后方的团服务机构休息24小时。在I连值勤期间，每人一般可望获得5天在日本休息和恢复元气的假期。这种优待有助于减轻对轮流探亲的期待心情。

当I连的士兵接近获得轮休资格的神奇的36分时，往往不让他继续参加战斗巡逻队。这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照顾到他的时间已不远了，其二是考虑到巡逻队中其他人的情绪。因为获得高分的人在战斗中变得谨慎和不可靠。

考虑到每连使各排轮换上前线，每营轮换各个连，以此类推直至军的下属部队也实施这种轮换。因此在战场上这段相对闲散期间每个人生存下来的机会相当大。这一前景对第8集团军的其他单位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有限战争的性质和前线这种平静的状况也有不利的一面。敌军空中攻击的减少造成一种表面上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能成为灾难。它使共产党人能对战场和补给线及中心地区到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袭击。军队被南韩上空敌军行动减少所麻痹，对使用伪装漫不经心，主要港口和仓库堆放了大量的供给品和装备。幸运的是共产党人没有利用这一弱点。但是遭到一次突然和惨痛的教训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那时才会懂得分散和隐蔽的优越性。

南韩服务队是另一件事情中的不幸。他们帮助士兵从许多令人厌恶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对士兵却产生了腐蚀和削

弱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在欧洲时，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取代了战俘，而他们服务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其它时间里，或许找不到佣人来做这些令人厌烦的杂务。

平静的战线产生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一般部队和个人收集了大量物品。额外的装备和衣物可以毫不费力地留在身边，尽管有时它们远远超过了编制和装备所规定的数量。只要流动性不大，多余的物资就显不出有害的一面。但是部队需要转移以对付敌人的威胁，这就证明过多的物资是不利的了。在三角高地战役中，第7师的1个野战炮营用了3天时间将部队和个人的辎重从铁原防区搬运到金化地区。流动中的损失表明应当定期对前线部队财物和个人装备进行检查，以制止未经批准的财物的积聚。

11月里，在美军第10军防区只有一次重要的冲突发生。美国第40师160步兵团2营被调派到第8集团军前线，在851高地伤心岭地带。2营防守阵地北面的地带由南韩第3军第1师14团驻守。在11月最初几天里，北朝鲜的大炮和迫击炮部队对851高地的注意力不断增长。从逃兵那里搜集的情报和从1具北朝鲜士兵的尸体上发现的文件证明敌人打算向2营阵地进攻。

罗伯特·赫·佩尔中校是这个营的指挥官。在营防线上从东到西部署了他自己的E连和F连，并配属了C连和A连。143野战炮营，1个排的42毫米迫击炮，H连的81毫米迫击炮和第140高射炮营的1个排为第2营提供直接的火力支援，G连和配属的1营B连在851高地南侧处于增援状态。

11月3日，敌人野战炮和迫击炮的火力变得密集起来。晚上大约有4,500发炮弹倾泻在2营的阵地上。晚上8点半，

北朝鲜第14团的1个加强营从北面向2营防线发起全面攻击，向沿着南北走向的山脊到直通2营阵地的关键地段进攻。北朝鲜人接近E、F和C连防区并取得了几处小的突破。根据后来审讯战俘得到的口供，敌人显然是打算占领并守住851高地，进而向南攻占930高地。

4个前线连没有请求增援就阻止了敌军的进攻，使北朝鲜的行动归于失败。来自支援部队的直接火力有助于瓦解敌人的攻击并将1/10的北朝鲜士兵击毙。4小时后敌军被击溃，伤亡共计140人，2营俘获7名战俘。第160团在战斗中伤亡73人，其中19人阵亡。

在11月余下的日子里和12月大部分时间是相对平静的，只有间歇巡逻。在此之后，共产党人选择了圣诞节来进行又一次的猛烈攻击。在812高地上，美军45师第179步兵团K连部署在高地北坡的前哨阵地上。圣诞节清晨，北朝鲜的轻重武器突然开火，250发炮弹落在K连的阵地，在炮击中，北朝鲜第45师的1个加强连从附近的一个称为卢加棒子堡的石头山攻下来并侵入K连防守的前沿阵地。该连指挥官安德鲁·杰·卡特西斯上尉要求大炮和迫击炮予以防御炮击。第179坦克连的坦克也加入了炮火反击以阻止敌军的入侵。

卡特西斯上尉然后派出由鲁塞尔·杰·麦肯中尉率领的第2支分队进行反击。麦肯的分队逼近北朝鲜人并使他们后退。在战壕里的肉搏战中，麦肯中尉被打死了。团长杰弗逊·杰·欧文上校同意将A连配属给K连，如果需要的话，L连也做好准备去支援K连。在早晨的几个小时内，北朝鲜人派出了3个排的士兵发起数次进攻，2,000多发各种迫击炮和野战炮弹向K连的守卫者袭来，但是并没有将卡特西斯和他的士兵赶出阵地。在圣诞节期间的战斗中，该连伤亡25

人，其中 5 人阵亡，敌军估计伤亡36人。

12月27日，新组建的韩国第12师开始接管第45师防区，到12月30日，换防完全结束。

两星期之后，韩国12师受到了战火的洗礼。北朝鲜的 1 个营向854高地前哨阵地发动了突然攻击。敌军 3 个连攻向51团的下属部队并在左翼得到了一些进展。在反击中，北朝鲜的军队被击退了，接着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尝试，然后就撤退了。联合国军向敌人阵地发射了19,000发野战炮和迫击炮弹及坦克炮火。韩国部队报告说北朝鲜军队遭受了200多人伤亡。

2 月初，北朝鲜人又回到812高地。2 日晚上，韩国第12师37团报告说敌人的部队正在集结以进行一次攻击。密集的炮火倾注在敌军集结地带，但是北朝鲜的 1 个营冲上高地。一场激烈的手榴弹战爆发了。直到韩国军队的 1 个连前来增援才阻止了敌军潮水般的进攻。北朝鲜在这个月最猛烈的行动中使用了7,000发弹药，据估计有100多人伤亡，他们从联合国军方面得到了两倍的回敬炮火。

在 2 月余下的日子里以及 3 月，第10军防区的战事或多或少稳定下来，巡逻队被定期派出去执行任务。和敌军的遭遇战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与此同时，北朝鲜军队在东部海岸南韩第 1 军的战线上频繁活动。南朝鲜军队的主要防线位于鼓山南部不到 4 英里的昂克山（351高地）。11月 9 日，2 营北朝鲜士兵进攻昂克山并将南韩第 5 师的守卫者赶下山脊。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南韩军队进行了 2 次近距离的猛烈反攻将北朝鲜人驱赶出去并收复了阵地。同时在南面北朝鲜军队迅速派遣了几个排的兵力对离昂克山不到 2 英里的268和345高地进行攻击。

起初他们赢得了一个短时间的立足点，但是在11月10日被赶了出去。当敌人攻近345高地，防守的火力将他们驱散了，但是北朝鲜的军队毫不退怯。11月11日，他们出动了大批军队攻击两处高地，同南韩军队交战了1.5小时之后撤退了。

北朝鲜军队这次的失败标志着南韩第1军前线相对平静时期的开始。小规模的战斗不断发生，对整个局势并未产生影响。1月初，南韩第5师的巡逻队在靠近昂克山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地道口和通风门，敌军正在挖掘从这里通向南韩军队阵地的地道。1月7日，敌军的工兵先遣队进入地道，一支南韩巡逻队炸毁了通道口和炸掉了通风门。敌人在几天内再次打开通道口，于是南韩人要求空军轰炸并将其封闭。

一直到3月底，南韩第1军防区几乎没有什么异常活动。韩国第15师在1月下旬结束了组织和训练阶段并接替了第5师在战线东北端的阵地。

3月30日，南韩11师第13团对敌军在南江以西的高地发动了2次袭击。该团攻占了位于新岱里南面不到1英里的350高地顶峰。大约6,000发迫击炮弹提供了火力支援。傍晚他们撤回到自己的主防线上。

南韩第2军在11月和12月进行了积极的巡逻，不过人员配备仍然保持在小规模上。最大的挑战出现在1月中旬，敌人对位于Kulnsong东南3英里的394高地的前哨增加了炮击，使南韩第6师警觉到有可能发生突然攻击。师指挥官命令他的炮兵部队处于戒备状况并将3辆坦克调到支援阵地上。

1月17日晚上，敌军向南韩位于394高地附近的阵地发射了5,000多发野战炮弹和迫击炮弹。在炮火掩护的后面，4

个排的中国兵冲上来同南韩士兵交战。当南韩的大炮和坦克向敌军开火并阻止了敌军的攻势，中国人又派了 2 个排增援。南韩的炮火是如此猛烈而又准确以至于仅有 7 名共产党士兵攻上南韩防线，而他们都在肉搏战中被击毙或俘虏。在重新整顿之后，敌军再次进攻，都遭到了相同的结局。南韩士兵估计在这场冲突中他们打死了125名中国人。在自己一方，3 人被打死，14名受伤。经过这场短时而又痛苦的行动，该军前线的活动又减少到以往一样。遭遇战偶尔发生，不过只有小股士兵被卷入进去。

在1952年最后 2 个月里，处于西翼后面的美国第 1 军并未遇到很多军事行动。美军第 2 师在猪排山的前哨由 1 个泰国营守卫，11月上旬，这里受到两次攻击，一次是由 1 个中国连，第二次有 2 个连的中国士兵。11月 7 日，猛烈的野战炮和迫击炮火集中在猪排山，表明中国人开始进攻。45分钟的交火之后，敌军停止攻击，重新组织部队后再次猛攻，可是又被打退。4 天之后中国人以对猪排山的炮击开始了第二次进攻。2 个连敌军从北面，东面和南面逼近并攻上泰军战壕，随后被打退。当晚中国军队又作了两次尝试以突破猪排山阵地，结果完全失败。

英联邦第 1 师在11月18日开入阵地带来了一点儿士气。当时敌人的火炮轰击突然增加预示他们即将开始行动。在向皇家利物浦团第 1 营进行炮击以作佯攻之后，中国人迅速地将攻击转向一个被称为钩子的小山。它坐落在三川和临津江的汇合处西北 4 英里处一个东西走向山脉的一部分，由号称“黑哨兵”的第 1 营守卫。接着是45分钟猛烈的炮火，随后敌军的 1 个连试图接近“黑哨兵”。但是联邦部队隐蔽在附近的地道里，炮火直接轰击进攻的部队。炮火刚一停顿，

“黑哨兵”掌握住主动，将中国人赶下钩子山。当共产党人试图在邻近的山坡重新组织起来，大炮和坦克的火力将他们驱散。

第2天，中国人调来增援部队并派2个连进攻钩子山，英联邦的坦克和增援部队迎了上来，双方猛烈交火，在肉搏战之后，英国部队将中国人赶了回去。中国人再一次重新组织并迅速调遣了1个连去突破“黑哨兵”防线，第三次尝试攻破了纵深100码的地带随后被阻挡住了。最后，帕特里夏亲王的加拿大轻步兵团第3营发动了一次反击，在双方近距离的战斗中，将敌人逐出阵地。战斗后清点到100名中国人死在战场上。英联邦部队伤亡85人。中国人确信英国人要坚守钩子山，因此直到第2年3月，即美军第2师接管英联邦师防区之后，他们都没有再发动猛烈的攻击以夺取这个山岭。

12月最初10天几乎没有迹象显示敌人想要试试临津江双马蹄形的江湾附近南韩第1师的防御能力。江流蜿蜒曲折形成第一个马蹄形，西面伸展出一片丘陵起伏地带被称为诺里。山岭西半部叫做大诺里，东半部是小诺里。南韩第15团守卫在这些山上的哨所里以及小诺里南0.75英里的贝蒂山和小诺里西南大约1英里的105高地。中国人控制着诺里北面和西面地域的前哨，在12月初他们在那个防区里相当沉静。

但是，到了11日，中共第47军140师420团的2营兵力在大炮和迫击炮向南韩军队的小诺里，贝蒂山和105高地发射了800发炮弹后，立即向上述地区发起进攻。主力有2个连兵力冲向小诺里要将南韩第15步兵团的士兵赶走。在3小时近距离猛烈交火之后，15团的士兵得到命令撤到离小诺里东面300码的69高地。在重新编队之后，15团发动了2次反

击。但是进行反击的2个排未能将敌军赶出高地。南韩11团替换了15团，它的一支分队在接近正午，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收复了小诺里。

与此同时，南韩部队还控制着贝蒂山，但是在105高地上的部队却暂时退却了。中国人向105高地的发起行动很明显只不过是转移，因为敌军不久以后就离去了。南韩部队未放一枪就重新控制了阵地。

11日晚上，中国人投入2个连的兵力开始向小诺里强攻。随后进攻兵力增加到1个营。南韩部队再次撤到69高地。调来空中支援的6架B-26轰炸机向这个山投下了100枚260磅杀伤炸弹。12个营的野战炮不停地轰击，炮弹象冰雹一样落在中国人的阵地上。12日南韩11团发动的4次反击都失败了。中国人始终坚守阵地，不顾轻重武器的惩罚性打击和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他们毫不退却。

12月12日夜间和13日凌晨，密集的炮火不停。当黎明到来时，南韩11团的1个营和2个连一起发动攻击，战斗持续发展，他们夺回了小诺里，但是清除大诺里敌军的企图却收效甚微。13日晚上，南韩士兵挖好战壕等待着预料中的敌人的反攻，夜间，2个连中国士兵徒劳地试图突破南韩军阵地。14日清晨破晓时分，争夺变成僵局。

尽管冲突延续了只不过4天，统计数字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大、小诺里的全部行动发生在宽300码，纵深200码的地区。在交战期间，联合国军的大炮发射了120,000发炮弹，31,000发迫击炮弹，坦克发射了4,500多发90毫米炮弹，形成了毁灭性的火力打击。空军出动了177架次飞机用凝固汽油弹，高效炸弹和火箭向敌军阵地进行了39次猛烈的轰炸和扫射。南韩军队从中国炮手那里得到了18,000发大炮和迫

击炮弹的轰击作为回报。空中轰炸不计在内，联合国军与共产党军的炮火比例为8比1。这是空军，炮兵和坦克协调行动支援步兵的最好范例。韩国遭受伤亡共750人，其中237人被打死。据估计敌军伤亡在2290至2732之间。据1月间从中国420团来的逃兵说，由于该团伤亡严重，从前线被撤换下来作为后备。

1月里，诺里防区的军事行动平息下来，代之以巡逻和偷袭。1月23日，南韩第11团派出了一个有3个排兵力的袭击队攻打大诺里。空中和地面炮火，包括12辆增援坦克的火力使得偷袭的士兵攻上山顶，摧毁敌军的地堡，然后平安撤回。

在6个星期的相对平静时期之后，中国人选择了圣诞前夕向美军第2师在猪排山的前哨发动攻击。猪排山的南端设有前哨，位于大约距猪排山2英里处。12月23日，38步兵团B连的2个排，在该处北面，中共第38集团军113师338团的2个营守卫着自己的阵地。

那天早上截获的敌军电讯表明中国人可能筹划在23日晚上或是24日清晨发动攻击，因此所有的营都警戒待命。不顾警告，中共338团的7、8、9连完成了袭击的兵力部署，并在午夜前后发动了进攻。中国人背离了他们惯用的战术，在突击前没有用大炮和迫击炮进行猛烈的攻击，而是切断铁丝网，成功地绕过潜听哨，穿插到B连的前哨，从四面八方冲到交通壕并同B连守军展开了肉搏战。为了防止由罗伊·埃·布鲁克斯中校率领的38团1营前来增援，敌军设置了狙击部队并向附近的38团前哨发射了2,000多发大炮和迫击炮弹。很明显，中国人期望将哨所孤立起来直至他们占领全部山区。

38团指挥官阿奇博尔德·W·斯图尔特上校迅速下令要他的第3营营长乔治·C·福尔杰将其4个连派上去增援第1营，这就打乱了敌人的计划。2个班出发去前往增援，与此同时，C连的1个排前往增援。

战壕里的战斗不利于中国的攻击者。B连要求直接的防御炮火以阻止敌军增援袭击的部队，然后着手消灭前哨阵地上的中国人。防御炮火和由B连发动的顽强的抵抗是十分成功的，这一点可以从12月24日清晨几小时内截获的敌军通讯联络上看到：

零点26分：立刻派增援，大约有30名敌人现在上来了——停顿——现在很多敌人上来了。

零点40分：增援部队什么时候能到？

快了，他们跑步上去，他们现在俘虏了很多人，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回来。

零点50分：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到25号，即使没有俘虏他们自己也下不来。

零点52分：你们下来了吗？

没有。

情况允许就再试试，没有增援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1点20分：增援部队现在在哪儿？我肯定他们不久就会到你们的阵地上。现在有很多敌人，我们都被包围了，我看我们的增援部队不能打破包围，也上不来，我们这里相当危险，我们还要看住俘虏，一旦情况紧急，这些俘虏怎么办？

1点30分：如果可能，你的人最好自己下来，战俘和伤员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或是把他们留在那儿，这是命令，你们必须下来，否则我们不再联系。

1点32分：再派增援部队来，否则我们不可能带着俘虏

回来。

2点17分：我们的900圆（9连）大概全军覆灭900圆的1名战士逃了出来，报告了这个消息。

4点35分：数一下我们还有多少人，我数了700圆（7连）有17人，800圆（8连）13人，900圆不知道。

2小时之后，敌军又得到2名从第8连生还的士兵，但是九连还没有消息。这个营在战斗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清点到了11具尸体，据估计伤亡高达500多人，第38团伤亡47人，包括突围中被打死的6人。

当第2师指挥官詹姆斯·C·弗赖伊准将获知敌军与38团之间伤亡的高比率时，他评价说："干得不错。"他很欣赏他的下属军官"在战壕里报告发生的事情。"

B连的士兵勇敢地作战，有条不紊地清除敌军的偷袭者。但是倘若没有野战炮、迫击炮、坦克和高射炮部队向第38团提供强有力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展不会这么顺利。敌军不顾一切地想要增援攻击部队，但是却无法穿过后备力量直接提供的火力网。公平而论，胜利属于步兵和炮手们。

12月29日，美军第7师完成了与第2师在这个防区的换防。中国人显然决定趁机利用这次换防。那天晚上，1个敌军加强连攻击亭子的一个前哨，把守卫者赶走。但由于美军炮兵部队已组织好与这个哨站的协同，他们开始对共军集中火力，最后惩罚性的打击迫使中国人撤离阵地。

第7师在1月参加了一项空中——坦克——炮兵——步兵的协同作战实验。这项行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2月中，美国空军联席会议在汉城决定采纳克拉克将军的指示，发动一系列的空中地面协同作战实验。他们制定出了3项实验计划。A、24架战斗轰炸机带着简单的指令和事

先由空军人员侦测好的目标进行轰炸。B. 由师一级的战术空中控制组指挥的不带任何预先指令的8架战斗轰炸机进行轰炸。C. 与上述计划B相同，但是由4架战斗轰炸机来执行。

当第8集团军的作战参谋人员就此事同第7师的史密斯将军交涉，他建议用这种空中努力与坦克——步兵袭击以抓获俘虏相配合，准备作战的任务落在了第31步兵团肩上，S-3霍华德·H·库克塞上尉在1月15日将一次被称为斯麦克行动的计划制订了出来。

选择试验出击的目标是一座称为斯巴德山，是敌人在猪排山后东面的一个防守战术据点。在出动了125架次战斗轰炸机和8至12架由雷达操纵的轻中型轰炸机对猪排山地区选定好的目标攻击之后，大炮继续轰击。在主防线的后面，1个野战炮营和6个拥有78门轻火炮和32门中型火炮的其他部队从自己的阵地上向进攻部队提供直接和全面的火力支援。

在1月12日至20日这段时间里，第57野战炮营在对31团提供支援中单独向猪排山地区发射了近10,000发105毫米炮弹，想要摧毁敌军的地堡和迫击炮阵地，消灭敌军的自动武器，以便为进攻作好准备。当D日——1月25日临近时，空军军官们访问了第7师指挥所，接受他们的指令并侦察了目标地区。

由于这项试验保证对空军和陆军双方都有利益，巴库斯和他的第5航空队参谋人员来到战斗地点，同行的还有史密斯上将和第1军指挥官保罗·W·肯德尔中将和他的参谋人员。大约有12名记者随行。为了有助于来访者明了这项试验的安排和目的。第7师准备了一个描述有关试验主要进程方案纲要的综合日程，这份6页的情况汇编的封皮有3种颜

色，显示第7师黑红两色臂章加在蓝色的朝鲜地图上。选择这个三色封面和使用“方案说明”这个词作标题被后来的结局证明是不幸的。

1月24日空军向所有目标投下了136,000磅炸弹和14个凝固汽油箱。第2天早上，步兵和坦克来到集结地区，空军开始了18次轰炸的第1轮。8架F-86雷电式喷气机每架携带2枚1000磅炸弹，飞过诺里交界地区，投下了它们的炸弹。上午10点钟左右，24架雷电式喷气机以每8架为一编队，对敌军在诺里的阵地进行轰炸。随后，另外24架雷电式喷气机进行密集轰炸，投下了48,000磅炸弹。这样就完成了计划A和B。在坦克和步兵出动之前，24架雷电式喷气机编为2队攻击了目标。

当进攻部队最后准备时，坦克开动以转移敌军注意力，用炮火来迷惑敌人，然后第73坦克营（M）的15辆增援坦克出发了。在坦克隆隆驶向他们的阵地时，2组各由4架F-84雷电式喷气机编队开始了计划C，第1编队的炸弹没有击中Spud山，第2编队只将携带的8枚凝固汽油箱中的1枚投中在目标上。在空军的最后一次轰炸过后不久，8架F4u海盗式飞机在坦克和步兵前施放烟雾弹以掩护他们的进攻。但是有些飞机将烟雾弹投掷得过早而有些未能将弹药投在正确的地方以掩护进攻部队。

当空中阶段一结束，沿着主防线的增援大炮，迫击炮、高射炮和各种自动武器一齐开火。当助攻坦克开到接近阵地时，他们加入了对敌军战术据点和地堡的炮击。在所有支援部队，火力指令中心，2营指挥所和步兵火力协调中心之间设立了通讯联络网以协调有效的炮火。2营指挥官菲利蒲少校从他的营部指挥这场战斗。身边还有1名炮兵联络官。

为了强攻山头，菲利蒲少校下令E连提供1个排。连长选择了他的由小约翰·R·阿布卡斯特少尉率领的2排去完成任务。这个排已经在类似的地区进行了9次作战演习，知道如何去做，为了增加取胜的可能性，2支火焰喷射队随同这个排加入了战斗。

由于步兵必须等待空中轰炸结束，攻击未能按原定时间发动，而是根据菲利蒲少校的命令开始。不幸由于无线电故障，进攻命令迟到了15分钟，阿布卡斯特和他的士兵出发晚了。当他们携带个人装备向山脚前进时，支援的坦克和大炮仍然向目标和附近敌军阵地猛轰。

阿布卡斯特的排到达山脚后迅速下车并分为两个组，2个班从北面开始向山上冲锋，其余的2个班从南面往上攻。在他们上山的时候，除了3个坦克排炮火外，助攻炮火转而轰击北面的据点。

当2排向山顶前进时，小型自动武器零乱地开火来迎接他们。中国人直到这几个班在接近两个指形山脊的地方重新聚集时，才开始猛烈地反击。突然，机关枪的火力变得密集起来，迫使2排的士兵躲进两个指形山脊中的隐蔽峡谷，即地使阿布卡斯特的士兵在机枪扫射下获得喘息的机会，但使他们又陷入另一危险之中，受困在一小块地方，他们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国人从山顶上的战壕里投出的手榴弹的牺牲品。

手榴弹连续不断地落在受困的士兵中间，伤亡人数接连上升。阿布卡斯特少尉胳膊受了伤，但是他拒绝撤出战场。手榴弹爆炸后到处飞舞着碎片，担架兵面临着来不及将越来越多的伤兵运走的困难。

派了2队火焰喷射队上来以打破手榴弹攻击，当1名喷射手向山上行进时，他立即被步枪子弹击毙。第2名喷射手

向敌军喷射了一会儿火焰，随后喷射器出了故障。火焰吞没了中国人的战壕，只持续了几秒钟，短期内制止了敌军投掷手榴弹。火焰退后，中国人向凹地投出了更多的手榴弹，伤亡人数继续上升。

看到突击排受阻，菲利浦下令1排前去增援阿布卡斯特的残兵。1 排沿着同样的路线爬上指形山脊。但是敌军的机枪迫使他们纷纷躲避。援助的坦克试图消灭敌人自动武器火力，由于烟雾和灰尘遮住了坦克手的视线，成效微乎其微。每隔半小时，4 架雷电式喷气式飞机向猪排山地区投下炸弹，不过他们的战斗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阿布卡斯特少尉试图使他的士兵冲出困境。就在他组织一次冲锋的时候，手榴弹碎片又击中了他的面部和眼睛。尽管他起初拒绝撤退，严重的伤势不久迫使他让步。随排医生和几个班长都已丧失了战斗力。

由于2个排现在都被阻挡在目标前，菲利浦少校决定将第 3 个排投入战斗。但是结局相同。从敌人的战壕里自动武器和步枪的火力伴随着手榴弹阻止了第 3 排前进并使之遭受了很大的伤亡。

当团长威廉·B·克恩上校获悉第 3 排的命运后，他取消了这次进攻并下令残余士兵撤退，这时所有 3 个排的长官都受了伤，伤亡总数达到77人。

斯麦克行动的弹药耗费也是相当昂贵的。除了在进攻前一天投下的炸弹和凝固汽油箱外，1 月 25 日空军又投下了224,000磅炸弹和 8 个凝固汽油箱。助攻的大炮发出了12,000发105毫米炮弹和155毫米炮弹，以及将近75,000发50毫米和40毫米炮弹。坦克发射了2,000多发90毫米的炮弹和75,000发直径较小的炮弹。1 个重迫击炮连又射出了4,500多发迫

击炮弹。步兵进攻部队射出了50,000多发机枪和轻型武器子弹并向敌人投出了650枚手榴弹。即使对敌军伤亡的最高估计是可靠的，中国人所有伤亡也不足65人。最后，由于步兵根本就未能接近敌人，1个俘虏也没有抓到。

出了什么差错了呢？回顾一下，人们可以找出各种原因，空中轰炸明显地对很深的防护战壕和山洞里的敌人几乎没有影响，而且对步兵主攻目标的周围地区轰炸过多。第二，在轰炸之后，步兵出发向主要目标进攻时间晚了，这就使敌军有时间来准备应付攻击。由于狭窄前线的进攻，就象早些时候在血岭和伤心岭的那次行动一样，敌人可以集中牵制小股进攻部队，后者还是相当生疏，指挥在战斗一开始就受到了削弱，当这个排受阻，敌军使用手榴弹发挥了有效的杀伤力。另外，能够扭转局势的火焰喷射器出了故障，一些自动武器又卡了壳，主攻排为这次行动演习多次使人觉得有些过分了，而后来投入的2个增援排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演习和指点。总的来说，斯麦克行动是一次惨败。

全部行动若是在很小范围的一些步兵和仅与卷入的坦克有关，它就可能记下得到的经验，不声张地过去。可是还有一个积极热心的记者。尽管这位记者不过是在近期抵达朝鲜，也没有来到军事行动的现场，在他写的报道中，参加试验的空军，陆军高级军官，在情况汇编使用3种颜色封面和“方案说明”一词都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一部含有不必要牺牲的电影为来访的军官们放映，这种暗示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动并导致国会进行简短的调查。

范弗里特的司令部发表了正式声明和柯林斯将军在国会军事委员会前露面足以将斯麦克行动用正确的观点看作是对敌军前哨阵地发动联合进攻的一种协调方法的试验，而不是

娱乐观众的好莱坞式的格斗演出。国会领袖们接受了军方的解释注定要到霤的斯麦克事件完结了。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教训，再次证实了无论是从空中或是从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在挖得很好的战壕里的敌人消灭。这场有限战争的优势是在防守的一方。

在美国第1军战线的其它地方，军事活动在1月主要限制在小规模的冲突上。海军陆战队第7团的1个排在1月8日占领了67高地。该处距板门店东有1英里半。攻占伴随有空中，大炮和7辆火焰喷射坦克的支援，然后就撤退了。1个星期之后这个团的3个排攻打这个高地和附近另一个高地，战斗长达3个小时，然后停止了。1月24日，隶属于美军第7师的埃塞俄比亚营的2个排在战斗了45分钟之后占领了老首尔第南的一个高地并击退了反击者。第2天，敌军和埃塞俄比亚人都集结了队伍。2个中国连试图从4排埃塞俄比亚人手中夺回这个高地，后者表现不凡，他们没有被打乱，直到接到命令才撤退。

快到月底时，克拉克将军警告范弗里特有迹象显示敌军会利用地面解冻之前这一时期向汉城发动攻击。冬季里共产党人在朝鲜集结军队，到了2月1日据估计总兵力有1,071,080人，并在前线贮藏了弹药和食物。1月，在前线上的3个中国集团军和1个北朝鲜军被全部装备和受过战斗训练的部队所代替。前方剩下的几个师的力量也由于后备人员的加入而得到加强。当然可以完全相信共产党人的准备实际上仅是防御，因为相当多的宣传已经显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新的美国共和党政府要改变朝鲜战争的进程而转为进攻。

范弗里特并不担心在1月底进行师之间的换防日程，并

告诉克拉克将军第8集团军加人了后备力量之后状况比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好。他确信第8集团军能够应付敌军强加给它的任何事变。在他作为第8集团军总司令的最后一段时间，范弗里特充满了自信心，由于他的指导而建立的这支有能力可信赖的军队足以迎击敌军在任何时候发动的进攻并取得胜利。这位斗志旺盛敢做敢为的老战士始终保持着给予敌人以丧失战斗力的军事出击的魄力和愿望。他不断显示出要求等待和防御时的耐心。但是在一点上他从不动摇，即努力使第8集团军保持高效率以应付美国或共产党决定改变战局的任何事变。当他退休离去并于1953年2月回到家乡，没有人怀疑他使自己的军队成为美国派出的集团军中最好的一个所做出的贡献。

尽管有范弗里特的保证，克拉克告诉韦兰德上将加强对平壤——开城一线共产党地面部队供给和装备的高空侦察。远东司令对敌人不断增长的空中攻击能力显得忧心忡忡，并下令要他的部下采取各种能采用的防空措施以应付空中敌人的进攻。如果麻烦继续增长，克拉克希望采取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以减少攻击。同时他准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将第1机械化师和187空降团战斗队调回朝鲜。克拉克在2月初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共产党在近期的兵员和飞机的扩充有可能仅仅是为了防御，但是联合国军方面弹药缺乏，兵员不足，后备师的软弱以及集结北约兵力上的困难，联系到联合国军的扩编和由于行政当局的改变而采取的进攻行动，这些公开的情况可能会对敌军动用他的攻击力量产生影响。

由于有喷气轰炸机和战斗机使敌军得到了广泛的空中攻击能力，这显示了共产党人空中力量的增长。如果中国人用米格机为喷气轰炸机护航来进行低水平的突然袭击，克拉克

觉得他们会击中联合国军方面的截击机基地，并获得喘息的时机修复在北朝鲜的机场。这又转过来导致由活塞战斗机、轰炸机和地面攻击机支援下的地面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要求得到保证当联合国军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就攻击中国人的空军基地。

过去华盛顿的领导人对此虽赞同可是态度又不明朗。他们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不过告诉克拉克，他们希望在卸任之前得到最新形势的报告。

克拉克的空军司令韦兰德上将同他的上司一样对共产党的空中威胁十分关注，但却毫不怀疑联合国军有能力击退敌人。他在2月11日告诉克拉克："我并不感到担心，敌军不会占领汉城地区。事实上，我相信共产党人若试图发动地面和空中进攻，这对他来说将是一场代价很高的冒险，并为联合国军取得辉煌胜利提供机会"。

随着2月的流逝，没有发生较大的敌军攻击行动，克拉克的忧虑减弱了。2月11日，吉·马克西韦尔·泰勒中将取代了范弗里特上将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并着手向部队施加自己的影响。他强调需要制定计划和训练巡逻队，提供一个完整的计划以使后备师在回到前线之前得到8个星期的训练，不时地移动炮营以保持他们基地的流动性；为高地上的部队提供更好的隐蔽措施，他还决定取消第8集团军"朝鲜"的番号。后来，番号就简单地变成美国第8集团军。

尽管2月初战斗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敌军对任何挑战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应。2月3日第5海军陆战团的一支坦克——步兵部队在空军和大炮的支援下向汶山里北面10英里的101高地和云谷发动攻击，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摧毁了一些设施并击退了敌人数次强大的反击，然后按命令撤退。在这

次战斗中，据估计敌军死亡人数达400人左右；而海军陆战队方面有15人阵亡，55人受伤。

2月20日，中国人派出2个连沿猪排山腰攻击并与第7师的伏击巡逻队遭遇。第17步兵团的增援部队冲上去支援这支巡逻队。后来1个坦克排开上去掩护并帮助运送伤员。尽管巡逻队所有的士兵非伤即死，他们无疑阻止了敌人1个营的兵力的攻击。

越过山谷在鳄鱼领下方，2月24日，另1个中国连与第7师的1支战斗巡逻队遭遇并与之进行了猛烈的战斗。战斗平息下来之后，这支巡逻队的20名士兵都负了伤。1天前，在第1海军陆战师前线，1支坦克——步兵巡逻队在90高地被敌军包围，该地离板门店东有2英里。1个增援排迅速赶上去帮助他们突破敌军包围圈。接下来就是肉搏战，海军陆战队士兵边战边退向他们的防线。2月25日，1支海军陆战队的巡逻队出发去抓俘虏并摧毁钩子山西南1英里多的底特律山上的设施，他们遇到了前来增援的1个连中国士兵。海军陆战队队员使用火焰喷射器向山洞和地堡里喷射以肃清中国士兵。进攻者在45分钟艰苦的战斗之后撤退了。

中国人对第1军的攻击的敏感日益增长，接着敌军改变了他们的战术。进入3月份，中国人开始转入进攻。当然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敌军开始利用冰雪初融时节的优势以扭转初冬期间的被动局面。中国人派出较强的兵力以期重新获得主动权，对第1军前线的压力上升了。

3月1日，在密集的炮火轰击之后，中国的1个连向法国营的阵地发动进攻。法国人是附属于美军第2师，目前配置在原先由英联邦第1师守卫的前线阵地。他们阻止住中国人的进攻，在短暂的肉搏战之后，将中国人击退。2天之

后，中国人在钩子山向38团前哨阵地进犯，3月6日，战斗转向了南韩第1师的战线。中国人向11团前哨阵地以1个连的兵力发动了2次毫无结果的攻击。当天晚上，美军第7师31步兵团的1个战斗巡逻队阻击了1个据猜测是去攻击猪排山的中国营。突然的遭遇战粉碎了中国人的计划。夜里，中国炮手向猪排山发射了8,000发大炮迫击炮炮弹。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认真地试图进攻第7师的前哨。

由于冬末雨水降临，沿着前线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车辆的运行被泥泞的道路所限制，但并不能阻止敌人在3月中旬以后恢复攻击。在诺里山区西南大约3.5英里的355高地被称为小直布罗陀。3月17日，由美军第2师第9步兵团的部队守卫的355高地受到了敌人1个营兵力的进攻。敌人攻破铁丝网，穿过布雷区进入第9步兵团的战壕。1个排的阵地被攻占但是其余的排坚守自己的阵地直到援兵到达。当中国人开始离去时，第2师的炮火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这场战斗使得第9步兵团伤亡超过100人，但是敌人的损失估计超过400人。

4天之后，第2师又卷入了另一场行动，2个中国连在钩子山附近袭击1支巡逻队。这支巡逻队顽强地抵抗中国侵犯者时，大炮和迫击炮开火，增援部队也冲了上来。中国人在第2天早上撤退了。

3月20日，第7师得知敌军计划向猪排山地区进攻。大炮和迫击炮对这个师在这些长期争夺的山上的阵地的轰击增加通常意味着共产党人开始进攻在这个防区抓住的2个逃兵使人们更加相信军事行动就要来临了。

猪排山地区由科恩上校率领的31步兵团的附属的哥伦比亚营控制着。科恩上校将他的第2营部署在左翼，中间是哥

伦比亚营，包括猪排山，第3营在右翼猪排山防区。第1营的1个步枪连部署在3个前线营后面的封锁阵地上。

2个军的中国部队与第7师对峙。中共第47军141师被派到西线的阵地上，中共第23军67师守卫从猪排山区到东线的地域。

3月23日夜间，中国人向猪排山同时发起了攻击。141师423团的1个混合营实施进攻，并在哥伦比亚营援助山上前哨连的途中与之遭遇。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火集中向阿尔伯特·瑞兹—诺欧中校的士兵袭来，中国人紧紧跟随着炮火，杀开一条血路冲进战壕。为了增援哥伦比亚人，科恩上校将31团B连置于瑞兹中校的作战指挥之下。B连指挥官杰克·M·彼得森中尉在21点30分率领自己的士兵从东南邻近的称为西岭的小山逼近。当B连接近前哨时，中国人先是要求密集的炮火袭击进攻路线，然后用轻武器，自动武器和手榴弹打击彼得森的士兵。凌晨2点，B连缓慢地冲上地堡，并着手将它们从中国人手中一个一个夺过来。B连是上来对付中国人在猪排山的主力，不过进展缓慢，最后停了下来。

在猪排山第3营的防区，约翰·N·达维斯中校的L连受到中共67师201团的2个连的攻击。中国人首先用猛烈的炮火集中轰击L连的阵地，然后开始进攻。弗罗斯特·奎特恩顿中尉是该连连长，他率领着自己的士兵战斗直到弹药越来越少而不得不从山顶撤退以等待援军和供给。当弹药被送过来时，无线电引信炮火直接落在猪排山，杰拉尔德莫斯中尉的A连前来援助L连。猪排山东南1英里的200高地据报告也受到了攻击，I连的部队被派去保卫那个高地。

达维斯上校不得不等待到3月24日清晨才能对猪排山发动一次反攻。莫斯中尉的连在支援L连的路途中由于无线电

引信炮火受阻了2个小时。在右翼同A连并肩进攻的2个连在山顶上只受到少数剩下的中国人的轻微抵抗。他们报告说猪排山成了一个屠宰场，到处是燃烧的地堡，到处是尸体和伤兵。达维斯上校派遣后勤工兵排去修理毁坏的地堡并派出战地救护员和担架队清理尸体和伤员。

与此同时，刚刚担任第7师指挥官的阿瑟·G·特鲁多少将来到31团指挥所，他下令乔治·贾斯卡连中校率领的32团的1营向前移动并置于31团的指挥之下，在第37坦克营B连的支援下，1营发动反击以收复失地，坦克从山谷中的阵地向高地的东北面开炮。

32团B连在威拉德·E·史密斯中尉指挥下，于3月24日上午从西南面为1营的攻击开路。73坦克营的2个排和31坦克连的1个排参加助攻。中国人的炮火迎击攻上来的B连，然后轻重武器一齐开火，使史密斯中尉的士兵遭到重大伤亡。1营的进攻被阻止在指形山脊处。

贾斯卡连中校重新组织了他的队伍，并派出杰克·L·科恩中尉率领B连和A连在24日下午发动第2次进攻，这2个连到达彼得森中尉的31团B连阵地，从那里穿过去。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经夺回了老秃岭1/4的阵地。但是由于敌人的抵抗，他们还得挖战壕并据守阵地。彼得森中尉的下巴在战斗中被打坏了，不得不退回战场。

3月25日4点30分，贾斯卡连中校派出罗伯特·C·格特勒中尉率领C连从右翼去进攻指形山脊。中国人再一次有效地使用个人和小组的武器，并增援他们的部队，以阻止1营的进攻。9点30分，贾斯卡连报告说B连和A连在左路指形山脊向上爬了1/3路程，但受到轻型武器和手榴弹的阻击，C连“挨了一顿好打”，不得不退却重新组织，这个连的一

些士兵仍然受阻不能脱身。贾斯卡连中校要求坦克支援以摧毁中国人的地堡。敌人正是利用这些地堡来阻击C连留在山上的30—40名士兵。

尽管有坦克支援，到了13点15分1营的局势未见好转。贾斯卡连中校的3个步枪连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但是A连只剩下2名军官14名士兵，B连和C连共剩2名军官和40名士兵。中校要求施放烟雾弹并提供医务救护兵以使他能将他的伤亡人员转移。

由于1营的有生力量减少到不足60人，肯上校命令贾斯卡连在3月25日夜间和26日凌晨撤退。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攻击机和轰炸机对附近山地进行空袭，在同一夜间还袭击了战斗据点和补给线，接着在1营第二天早上撤退之后对这个高地进行轰炸。后来从受到中国人控制高地时躲在地堡中的哥伦比亚营的报告中看到在空袭的时候中国人撤退了。顺便提一句，这使哥伦比亚营能够在3月16日回到联合国军前线。

第1军司令肯德尔将军在演习之后安排3月27日或28日进行另一次进攻。为了实施这一攻击，特鲁多将军选择了32步兵团2营。这个营于3月底进行了2次演习，作好准备实施进攻。但是在3月30日，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将军来到了特鲁多将军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考虑到这项既定的行动会产生心理上、战术上的无可怀疑的伤亡诸方面的问题，泰勒将军认定该防区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取消了这次攻击。

在猪排山的两天战斗使第7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人数上升到300多人，其中还包括在战斗中失踪的人员。尽管中国人据估计损失了600至800人，敌人依然责成它的部队不顾一切坚守。中国人不惜动用主力部队的决心同联合国军方面

不愿冒生命危险去攻打战斗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第1海军陆战师前线，中国人也加快了速度。3月18日，朝鲜第5海军陆战团的一个前哨落入了2个排敌军手中，第二天中国人派出2个连进攻第5海军陆战团的前哨阵地，这一次被击退了。海军陆战队迅速发起反击，占领了中国人的阵地。这又反过来引起了中国人的报复。3月22日晚上，他们向距板门店东4英里处的第1海军陆战团的前哨和主防线发射了1700发炮弹，并派了2个连的兵力发动攻击。肉搏战和猛烈的交火接着而来，然后中国人停止了攻击。在冲突中1架联合国军的照明飞机和探照灯使战场亮如白昼并使海军陆战队员准确地测定敌人的位置。

这个月最大的一次攻击行动发生在3月底。在几个牵制班攻击了海军陆战队的前哨之后，中共第40军120师358团向板门店东北10英里和钩子山西南2至3英里的第5海军陆战队前哨部队发起进攻。威加斯前哨在157高地上，凯诺哨在西边不到0.5英里的148高地上，加松哨在凯诺南面700码的无名高地上。战俘和后来的情报来源指出358团的任务是攻占并在预期中的联合国军发动春季攻势之前控制这3个前哨。3月26日，中国人在激烈的近战之后控制了威加斯和凯诺。海军陆战队撤退并迅速地在丧失的阵地和主防线之间布置了封锁阵地。尽管在夜间增援部队到达了，但是由于敌人猛烈的炮火和轻重武器的火力，夺回威加斯和凯诺的努力失败了。3月27日，海军陆战队第7团的1个营被附属于第5团的调遣，尽管部队的力量加强了，反击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天过去了，3个轻武器营，2个中型武器营，2个8英吋的炮兵连，1个4.5英吋的火箭炮连，1个发射25磅炮弹的炮营连续向敌军阵地轰击。空中支援寻求摧毁敌军的战

术据点。多达100,000发野战炮弹,54,000发迫击炮弹,7,000发90毫米坦克炮和426吨炸弹直接落在共产党人阵地上,而中国人向海军陆战队回敬了45,000发炮弹。联合国军方面决定在目前不去夺回凯诺,而将海军陆战队集中向威加斯前哨,并增加2个营的步兵加强了攻击力量。由于中国人的火力很猛，杀伤力很大，海军陆战队直到3月28日下午才打回到山顶。

3月28至29日夜间，敌人迅速地发动了一连串的反击，但是在防守者的火力前被粉碎了。不顾中国人的压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努力牢牢地控制威加斯。当共军攻上来时，海军陆战队要求照明飞机支援以便将敌人暴露在士兵的自动武器和轻武器之下。中国人集结后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进攻就被火箭炮火消灭了。在3月29日敌军停止战斗前，海军陆战队驱散了数次以营为单位的进攻并使敌人遭到估计有1,300人的伤亡。海军陆战队方面的损失是118人死亡，801人受伤，98人在战斗中失踪，数字说明了战斗是艰苦的。

三、空战和海战

地面军事行动的不稳定的进程也在1952—1953年冬季空军和海军的行动中反映出来。在1952年11月的零星战斗中，远东空军出动了3,000架次飞机支援地面上的白刃战，还有几次执行封锁任务。轰炸机组继续除了对沿着战线的战术据点进行攻击外，还对进攻路线、仓库、修理库、供给中心和部队集结地点进行轰炸。

根据远东空军直到1952年年底都有效的基本作战方针，空军试图：保持对共产党军队的压力，对停战谈判施加影

响，这样联合国军方面就能获得最有利的条款。保留在全面紧急的情况下采取其他行动的能力，防止或减少敌人对联合国部队的空袭，向联合国军提供支援，包括对近战的支援，阻断敌军后勤和联络系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战斗形势需要，首先保持空中优势，其次向地面行动提供支援，在冬季的几个月内，由于重点放在密切支援和炮兵在空袭期间成功地摧毁防空炮火，促进了较好的空中与地面的关系。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11月里也对支援地面行动作出了贡献。第77特遣部队代替第8集团军出动了一半的兵力参加乔基轰炸。乔基轰炸是事先指定好的对友军阵地前沿固定目标的轰炸，它不同于有规则的空中支援，不是由弹着观察机指示轰炸目标，通常由空军派出1架操纵导弹的飞机去测定目标和估计由轰炸造成的后果。

除了乔基行动，海军的飞机连续猛烈地轰炸朝鲜东北部的工业中心。11月17至18日，他们轰炸了清津、吉州、镜城和其他沿海的铁路、工厂和矿山。在这些行动中分散的目标被指派给每艘航空母舰的空军大队以消除指挥官们临时交换情报，而过去指挥官们得到命令去轰炸同样的目标，通常是在空中才采取协调行动的。清津受到了5次机群轰炸，密苏里号战列舰和海琳娜巡洋舰集中火力予以配合。18日第77特遣部队派出了64架攻击机，16架活塞式战斗机和24架喷气战斗机攻击鸭绿江上的会宁。对石油化工厂、补给库房、发电厂、钢铁厂和这座边境城市的其他设施都是靠目测的方法轰炸的。

12月9日，350架次飞机从航空母舰奥里斯坎尼号、理查德号和艾塞格斯号起飞去轰炸罗津和茂山。一个星期之后，从上述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到满洲里边境轰炸了至今还未受到破

坏的榆树屯铁路。

尽管情报指出共产党的空军力量在满洲里不断增长，敌人的空中行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几个月中却始终不振。12月侦察机发现在接近边境地区的苏制伊尔28双擎喷气轰炸机数量的增长，这对联合国军机场进行突然袭击的威胁也越大。联系到联合国军飞行员的报告说他们的米格对手显得愈来愈有能力截击F-86，这就引起了关注。但是如同较早时注意到的一样，共产党军队并没有显示出地面或空中进攻行动的兴趣。到了1952年底，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再次驾驶着飞机对北朝鲜的铁路和公路网大肆攻击。

在此期间空中进攻最典型的例子是1月9日开始的对新安州地区的轰炸。17架B-29轰炸机发动攻击，接下去的6天内空军第5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每天攻击重要的货场和引桥。1243架次飞机支援了这次破坏新安州交通运输线的行动。1月14日，战斗轰炸机试图使所有通往该城的桥梁无法使用。新安州到平壤的铁路中断了大约11天，共军不得不尽力使用卡车来继续缓慢的运输工作。

在攻击新安州期间，F-86受到几架米格飞机的阻截。1月14日，F-86战斗机声称他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报告说有8架敌机被击落，大概还有2架也被击毁，8架被击伤。但是除了前面所讲的个别的情况，中国空军在1月并没有显示出要进行战斗的迹象。

1个月后，2月16日，海军庆祝在美国海军历史上最长的有效围攻第2年结束。从1951年2月起几乎每天都有成群的海军的飞机飞过重要的港口城市元山，飞机上的机枪向这座被毁坏的城市扫射。1月31日和2月9至10日，航空母舰肯萨基号、菲律宾海号、奥里斯坎尼号对元山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战列舰

密苏里号和其它舰只也加入了1月的军事行动。

将克拉克将军流露出的对共产党人空袭能力的忧虑同春天冰雪消融之前敌军攻占汉城被证明毫无根据这一点联系起来，空军和海军司令们不顾一切代价加紧对共产党发动连续的攻击。2月18至19日，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511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攻击了平壤附近的坦克步兵学校，投下了541吨高效炸药。24架战斗轰炸机再次对细湖进行了1次低水平的突袭。尽管在细湖周围有密集的防空炮火，但是没有1架飞机被击落或击伤。

在3月5日空军第5军的24架雷电式喷气机来回飞行了800英里对离苏联边境大约63英里的田津城的工业设施进行了轰炸。仅仅过了16天，从3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69架次飞机对这个城市又进行了轰炸，在弹药库地区再一次引起了巨大的爆炸。与此同时，3月17日空军第5航空队派出了26架B—29轰炸机去歼灭新义州附近的部队和破坏工厂区。轰炸手声称有147座建筑，4座仓库和1个制造厂在这次轰炸中被完全摧毁。

在12月至3月期间，重点仍然是空中封锁。过去的1年里，空军试图切断铁路，但没有成功。如今的方案不同了。空军的目的在于轰炸和摧毁敌军薄弱的目标，这样不仅阻止共产党人赶运补给品，而且能对他们施加压力以结束敌对活动。由于通讯联络中心和补给设施（工厂、仓库、兵站）等被摧毁，敌人维持前线部队的工作日益困难。不过在大部分时间内沿着战线处于平静状况，这并不需要额外的材料和弹药的开支。尽管空军的努力，共产党人还是能够在前方贮存足以维持30至45天的补给品。

敌人在3月里增加了它的地面行动，这样使得空军和海

军双方加强了空中支援和乔基式的飞行任务。猪排山和Ve-gao爆发的战斗大量要求从空中对中共战术据点、供给品堆集处和前线附近军队集结地的袭击。3月最后的一个星期里远东空军派出了483架次战斗轰炸机，87架次轻型轰炸机和11架次中型轰炸机。这些飞机向敌军地面阵地上投掷了大约400吨炸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又加上了77吨炸弹和66吨凝固汽油弹。

春季的来临和敌军在3月最后几天加快了军事行动的进展仿佛预示着冬季几个月中稍微有点平淡的格局已经过去。在此期间战事不时地激烈起来，但规模从未超出暂时取得对方的1个高地。随着城镇和军事设施受到摧毁，空中和海上的行动给敌人造成了相当的压力。但是共产党人有足够的恢复能力去调整他们的损失和伤痛。4月到来时，军事上保持基本上未改动的局面，双方都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也不想去冒遭受致命打击的风险。这场格斗还在继续，对抗的双方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去结束竞赛，但是要为自己一方的目的去获得满意的条款。由于不顾诉诸军事决定，停战谈判的帐篷似乎为能达成一项协定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场所。

第十八章　结局的开端

当哈里森将军和他的同僚在10月8日走出板门店的帐篷时，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时候将会回来，也不知道究竟是否还会回来。要共产党人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改变态度，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显得极其渺茫。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期待的向共产党人施加军事压力并没有使敌人的立场有所改变。由于联合国军方面转而回到最后谈判的立场上，辩论阶段和试探阶段都已成为过去。除非双方的强硬态度突变，否则达成和解的前景还是很遥远的。

与此同时，双方的联络官继续在板门店开会并提供了一个接触地点以反映情势的改变。在战场的活动，特别是在10月到11月的行动期间提供了另一个接触地点。在北朝鲜的空中，远东空军尽全力迫使敌人及早认识到达成协议是必需的。为了抵销军事压力，共产党人恢复了他们过去惯用的政治战和心理战。不过联合国军或是敌军的方法能否奏效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双方都曾试过这些方法并发现不合需要。

一、长期休会：第一阶段

共产党人在10月第1次非军事攻势是针对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的策略。当哈里森的代表团刚一离开帐篷，敌人立即指责联合国军方面中断了会谈。对于华盛顿的政治和军事领袖

来说破坏谈判这个责任总是一个敏感点，他们立即指示克拉克在联合国军的声明中不要使用“无限期休会”一词。他们告诉他除了板门店以外没有其他地点可以用来进行停战谈判。美国在联合国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在谈判中达成一项协定。

10月，通过双方联络官的信件往来，敌对双方采取的方针已经很清楚。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是，由于共产党人既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的任何方案，也提不出自己新的或是合理的建议，因此联合国军代表团宁愿等待直到敌方对上述两点中的一项作出令人满意的表示后再恢复会谈。哈里森和克拉克一再否认联合国军方面中止了会谈。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继续两项策略。在他们强烈指责联合国军方面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引用事实上和传闻中的联合国军队在板门店中立区附近的侵犯。由于在战俘营中暴力事件又开始增加，敌方谈判人员强烈指控联合国军虐待共产党战俘。

为了减轻共产党指责的影响并向全世界解释联合国军司令部在谈判中的立场。10月24日艾奇逊国务卿对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发表讲话，回顾了会谈开始和争论的进展情况。他承认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争论不休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和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感到惊异”。他指出苏联的立场是前后矛盾的。他们反对在朝鲜不强迫遣返战俘这一观点，而在过去不同的场合他们又确认战俘有权决定是否愿意接受遣返。在讲话结尾，他强调联合国军司令部时刻准备在板门店重开谈判，任何时候，只要共产党人愿意接受“不强迫遣返这一基本原则”。

当联合国大会就美国反对强迫遣返战俘的议案进行辩论

时，其他建议和提案也被提了出来。其中之一是加拿大代表提出的非正式建议，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寻求停火并将遣返战俘问题留到较晚的时候谈判。军方和国会反对这一程序。放弃军事威慑就等于放弃了联合国军最有效的武器。他们坚持说共产党人在此期间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联合国军俘虏作王牌。敌人会在拖延讨论处理战俘的同时修复机场、道路、桥梁，充实自己的补给仓库。一旦谈判毫无成果而敌对行动再次发生，共产党人的军事阵地就会大为可观，联合国军的士气将会降低。

几个星期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递交了关于此事的意见。他们赞同军方和国会人士的观点。他们告诉范弗里特，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放弃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空中优势，除非共产党人接受非强迫遣返战俘的观点。

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向联合国提出他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方案。印度提案同意美国在辩论中的观点，即不应强迫阻止或影响战俘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与共产党国家的立场不同，他建议成立一个由2个共产党国家和2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组成的遣返战俘委员会，在非军事区接受所有的战俘。象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战俘在那里将根据国籍和居住地分类，并自由返回家园。每一方将有向战俘解释的权力自由。所有在90天后仍未决定遣返回国的战俘将被送交停战协定建议成立的政治协调委员会。万一遣返战俘委员会的4个成员国不能就处理战俘的细节的解释和他们的安排布置达成一致意见，将由联合国大会提名一位仲裁人去打破僵局。

尽管美国的大多数盟国赞成印度的建议，至少是原则上同意，美国官员立即表示反对。美国反对的意见是担心遣返战俘委员会执行的责任和职权模糊不清和在处理战俘的程序

上没有限期。不仅90天的期限作为讯问期过长，而且美国仍然反对将未遣返回国者提交政治协商委员会。

但是共产党国家的反应显得更为强硬。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严厉地谴责印度提案。周恩来在11月28日拒绝这个提案并声明由苏联倡议的提案是唯一合情合理的。12月3日就提案表决时，联合国大会以40票对5票否决了苏联的提案，并以54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只有共产党集团赞成苏联提案反对印度的提案。后一个提案规定如果和平委员会在30天内未能解决遣返回国者的命运，战俘将被转交给联合国安排。

共产党人除了猛烈抨击之外，对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丝毫不予以重视。但是他们对印度提案的严厉批评产生了两点作用：疏远了支持印度提案的某些中立国家的舆论，并有助于掩盖美国对此提案所持较温和的反对立场。

无论如何，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得到的不利名声很快就被由于发生在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不幸事件所聚积起来的风暴抵销了。尽管共产党战俘被重新安置在较小的容易管理的小组里，并被分散在一些小岛上以减轻一致行动的威胁，中坚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并不想结束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战斗。

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维持秩序和纪律在共产党战俘的集中营里充满着危险。宽容的政策和松懈的纪律使热心的党徒有充分的机会去控制和掌握战俘营。另一方面，冷酷强硬的政策和严格控制的纪律意味着不断的冲突和流血杀戮。共产党人仿佛欢迎暴行——甚至怂恿暴行。被联合国军致残或杀害的每1个战俘都让敌人获得了宣传材料。共产党战俘使联合国军在后方保持强大的守备力量，他们的煽动使联合国军必须加强守卫力量，以便镇压。因此，他们的行动如同一

种双重武器。

当联合战略计划和行动组在10月初建议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应当寻求一项先发制人的措施以阻止共产党人在宣传上的胜利，指责他们在战俘营里每次发生骚乱的时候都推波助澜。代表团承认这个方法有其优点。但是他们指出抓住这种主动大概既不能阻止共产党人制造混乱又不能制止他们为了适应自己的目的以发展壮大。代表团感到如果联合国军想要就敌人煽动麻烦而进行指责，就要拿出具体的事例去证明这些指控。这就意味着要提供截获到的指令、战俘的坦白书、暴露的计划和其他证据并将之公布于众。远东司令部对敌人掌握战俘营的技能的忧虑在较晚的时候才会产生结果，不过在目前却什么也干不了。

与此同时，敌人几乎一参加联络官会议就指责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对待战俘的条款或指责联合国军空军或地面部队对板门店附近中立区的侵犯。11月30日，共产党人宣称联合国军在5天前在巨济岛打伤了32名战俘。他们继续声称在10月和11月总共有542名共产党战俘被打死打伤。到了年底，南日将军指责说从1951年7月起联合国军在战俘营中打死打伤3,059名战俘，并特别指明从1952年2月以来共产党就此提出了45次抗议。

12月初，战俘营中伤亡人数的上升使联合国军的长官们忧心忡忡，公开反抗命令成了家常便饭。通常的对策是直接使用武力去镇压。从联合国军司令部来的指示表明在战俘中酝酿在12月初从营里集体越狱的计划是值得重视的。最糟糕的出事地点之一是离巨济岛不远的一个叫做峰岩岛的小岛上的敌侨拘留营。

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峰岩岛被选来作战俘营的地点。这

个岛很小,集中营就只能被建在陡峭的阶梯山的一侧。由于战俘都被安置在上边的坡面上，进入营房的通道只能一层一层向山上走。共产党俘虏得到地形上的优势,在一段时期里，峰岩岛的战俘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组织并进行了军事演习,无视联合国军的命令，随意举行示威,在岛上9,000名拘留者中有许多人参加了1952年10月巨济岛发生的越狱。岛上由1个南韩安全防卫营看守，还有一些美国的管理人员。

12月14日，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大约在6个集中营的3,600名战俘被命令解散他们的训练以阻止引起一场骚乱。相反他们却手挽着手在上面的坡地上站成了3排。其它人则聚集在入墙后面。当南韩军队上山去恢复秩序，他们向南韩军队投掷石头。本来可以使用震荡弹和无毒的烟雾弹，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战俘们会将投掷弹扔回山下，强烈的侧风使烟雾发挥不了作用。在命令和鸣枪警告被置之不顾后，南韩士兵开始把枪对准了上面团结一致的挑衅的行列。在很近的射程内，枪弹把手挽手的人群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抵抗被瓦解了。但是当这场混战结束时,85名战俘的尸体躺在地上，113人被送进医院，100多人受了轻伤。南韩管理人员中只有4名受了重伤。

峰岩岛事件又一次引起了在战俘问题上的紧张活动。克拉克告诉范弗里特要千方百计将1营美国士兵调到南朝鲜联络区去执行24小时的警戒任务,授权哈恩将军把第1机械化师的1个营派到战俘营去执行任务。当哈恩将军要求提供直升飞机向暴动者投催泪弹以驱散他们又不导致伤亡，克拉克同意了他的请求。即使不能处理起因，这些措施有助于妥善处理由战俘煽起的动乱。

为了加强控制，防止战俘营中的越狱事件继续发生，克

拉克重新要求上级成立一个联合国军事委员会以试图使战俘面临再次被捕的罪名。尽管有柯林斯将军的支持，他在7月和8月里的极力敦促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答，援引峰岩岛传来的消息为例，克拉克提醒他的上级，缺乏适当的司法机构使集中营的长官们的惩罚手段减弱。考虑到合法性和对于审判战俘引起的复杂的政治局面，美国政治和军事首脑们在过去不愿使用这个武器，由于克拉克的一再恳求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快速批准这样一个权力机构的行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要在最高层检查全部的战俘问题，这意味着新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需要考虑，并且这需要时间。

峰岩岛事件导致了共产党人的抗议和国际红十字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使用的方法的批评。由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崇高威望，来自他们的抱怨是很难对付的。就回答红十字会断言联合国军对战俘的管理过分严格，治安人员不必要地折磨战俘一事，克拉克发表声明为联合国军的行动辩护并抨击共产党战俘的所做所为。他提醒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联合国军一直自觉自愿地遵守日内瓦公约，而共产党人却漠视这个公约。当故意违抗的事情发生，如一方面由于叛乱、暴动或是拒绝执行命令，另一方面是由于营房内的恐怖活动，联合国军使用了武力，但这只是在所有其他方法都被证明无效后才使用的。克拉克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坚定不移地为战俘营寻求物质上的便利条件和生活用品的改善。只有那些从不承认自己战俘身份的亲共产党的被押者才求助于组织暴力。

尽管敌人在1952年晚些时候提出大量的抗议，克拉克不认为敌人打算停止谈判。在他看来，敌人继续发泄不满好象

是计划利用美国盟国的恐惧并为共产党对战俘问题的立场获取同情。

不过远东司令部采取一些措施以减少战俘们煽动骚乱的机会。为了排除夜间去厕所，看守长官在简陋的营房里安置了马桶。在营房之间的走廊上，卫兵们携带着滑膛枪，一旦战俘不服从宵禁而四处游荡，他们便会被大号的铅弹击中，不过不会被杀死或受重伤。

1月上旬，陆军部和远东司令部决定应该揭露共产党在战俘营里制造麻烦的方法和手段了。军事情报部，远东司令部作战与训练参谋部接受任务：编制一份报告，揭露敌人组织和控制他们的追随者当联合国军司令部试图解决麻烦时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示威。研究文件的最后文本在1月底印制出来，关于"战俘营中的共产主义战争"这一标题。这一报告的发表，在美国国内新闻界得到普遍的好评。但是全部文本在那里不易得到，这个研究文件也就达不到预期的全部目的。

在1953年初，敌军仿佛在施加间接压力的战斗上保持上风，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仍然保留了几种尚未使用的武器。在12月中旬，联合国军司令部高级联络官理查斯·W·麦卡锡上将极力主张联合国军反击。在写给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的信中，他指出联合国军飞行员使共产党人每天利用平壤——开城公路向停战区派去得到护送的车队。麦卡锡继续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敌人使他们的供给线全天开放而不顾停战谈判休会这个事实。他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允许敌人车队的次数削减为一星期3次或更少一些。并要求敌人每次得到允许的运输都要遵守严格的时间表，这种行动会对敌军起抑制的作用，并使国内的人士了解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共产党的幕

后策略并未采取被动的态度。

这样，当联络官们在1月15日开会时，麦卡锡将军的继任人威廉·B·卡洛克上将把联合国军的新政策告诉了取代张将军职位的朱龙上校。从1月25日起，共产党人在谈判休会期间每星期只能通过2次车队：每星期天早上1支车队从平壤出发，另1支车队从开城出发，2支车队都被要求在晚上8点钟走完它们的路程。为了防备共产党人抗议联合国军司令部无权单方面撕毁1951年11月协议，卡洛克将军说，并不存在一个给予共产党人豁免权的协议，因为敌人对联合国军方面并未给过任何相同的照顾。

二、共和党人上台

1月20日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迪安·艾奇逊出任国务卿，查理斯·E·威尔逊出任国防部长。然而如前所述，美国在与朝鲜战争有关范围内的政策并没有基本的改变。新的行政当局拿不出灵丹妙药来迅速结束这场冲突，也不打算扩大军事行动以使共产党人接受一项协议。大体上共和党人采取了杜鲁门政府实行的观望等待态度。

新总统迅速地改变了杜鲁门在任职期间采取的一项步骤。所有重要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情报不再被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以获得最后批准，这项工作主要地落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肩上。杜勒斯在1953年最初几个月里制定朝鲜战争政策的作用得到了增强。

实际情况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要迅速地从他前任的路线中脱身。2月2日，艾森豪威尔先生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

中透露出他已经决定结束对台湾的海上封锁。

总统声称美国第7舰队不再作为防止中共的屏障，也不再阻止蒋介石攻击大陆。如同预料中的，对这一转变的反应十分强烈，褒贬不一。麦克阿瑟将军，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蒋介石和李（承晚）总统都支持取消这项封锁，而民主党领袖，英国和印度的主要报纸立即表示他们担心这将会使战争扩大到台湾地区。总统的支持者们欢呼这一决定解开了蒋介石军队的束缚并赞扬艾森豪威尔抓住了与共产党作战的主动权。但是，如果这项行动使敌人困惑不解，不得不猜测美国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那么也应该说明还有其危险的一面，可以想象得到共产党中国有可能进攻台湾。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新政府没有与盟国磋商而作出的单方面决定相当冷淡，并警告说这一步骤可能会"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在印度，一家报纸指责总统是在"持枪去搜索和平"。

尽管总统的这项声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台湾地区并未爆发突然的战事。国民党中国的部队仅仅有少数几艘登陆艇，也仅有少量的部队受过两栖作战的训练。没有美国在装备上有力的援助，没有为强行登陆而扩充更多的师，国民党人的恐吓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放蒋出笼"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将世界上政治和外交的一潭死水搅动起来。而这时台湾的武装力量却保持平静。如同研究远东海军的历史学家评论的，尽管对这项决定的忧虑会延续很久，它并没有直接的象预期的那种战略意义。从策略上讲，它对"福摩萨巡逻"军事行动也没有产生影响。

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逐渐更加了解朝鲜问题，并开始考

虑采取可以被接受的政治结构的积极步骤去打破僵局。单方面释放未遣返的战俘以给共产党人再一次提出一个既成事实的想法，就这一设想向克拉克征求意见。由于对此事的敏感，克拉克派遣他的参谋部的一位成员阿瑟·W·科斯达特中将去华盛顿陈述他的看法。科斯达特在3月初会见了华盛顿的官员并告诉他们克拉克完全赞同释放朝鲜被监禁的人员。他不认为这种步骤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停战的前景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中国未被遣返的战俘的安排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这有政治含意。科斯达特后来报告说与会者之间的一般观点是赞同克拉克的主张，但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杜勒斯先生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制定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可是他正忙于联合国大会，在3月上旬没有时间来过问战俘问题。另外，3月5日约瑟夫·斯大林因脑溢血突然死亡，将一些新的人物推向世界政治领袖行列之中，在着手大胆冒险之前需要时间来对他们作出估价。无论如何，时间超过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关心的单方面释放战俘的范围，下一次，它就要上升为首脑，并忍受辛格门瑞的脸色。

与此同时，战俘营中大量事件仍旧层出不穷。克拉克在2月初作出决定，就战俘在扣押期间的敌对行动对他们进行审判这一老的问题向新首脑们试探。克拉克指出关于共产党战俘问题的报告的发表在新闻界和他自己的部队中产生为什么不惩罚战俘领袖的疑问，他要求立即考虑这一紧迫的问题。

2月下旬，远东司令得到一点安慰，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他，万一联合国军的保安人员受到明目张胆的攻击，克拉克可以将冒犯者送交法庭审判。但是对审判不要作过分的报道。这不过是折衷的措施。由于大多数暴力是在战俘内部而不

是针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克拉克立即表示反对。面对这种徒有虚名，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联合国军司令部获得了审讯被控在1952年7月以后攻击同伴的战俘的权力。

尽管得到了这种表面上的胜利，一些事件又导致了推迟对战俘营中共产党捣乱分子的审讯和惩罚。在远东司令将第1批案件送交法庭之前，国会想要从在朝鲜的美国同盟国那里联合起司法上的赞助并一起参加审判。但是到了3月底，只有4个国家同意参加军事委员会。这种对审讯在押期间犯罪的战俘不情愿地分担责任和在3月末从谈判中传来的迅速进展，仿佛使审判暴行的头目这一希望变得极其微弱。

在前一章里提到共产党人在2月对汉城的威胁使得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就中立城开城一事交换意见。在1951年11月的协定中，开城受到保护不受联合国军的攻击。然而，在2月上旬克拉克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敌军正在利用这座城市集结军队，补充给养并作为一个谍报总部。克拉克要求一旦他认为大规模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即将发生，有权废除1951年的协议并攻击开城。2月9日，在初步要求提出2天之后，联合国军司令请求开始对开城发动进攻。

克拉克的建议被送交华盛顿进行讨论，杜勒斯先生极力主张假使敌人师一级或更大规模的进攻迫在眉睫，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单方面废除1951年安全协议，从特定的日期起取消开城和汶山中立城市的地位，但不包括板门店。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这一决定转达给克拉克，指出这种行动有助于缓和不利的军事形势，并减轻谈判完全停止的政治影响。后来的结果表明，共产党军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克拉克也没有取消开城的豁免权。

三、重大突破

为寻求对敌军进行压力的方法和手段并加强克拉克在这场冲突中的王牌，联合国军司令部作出了相当敷衍塞责的姿态。当时就仿佛是不会作出赞同的答复。回溯12月，克拉克读到了来自日内瓦的一条快讯报道说红十字协会执行委员会在12月3日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立即交换受伤和生病的战俘。克拉克提出根据共产党人过去对类似建议的反应，他不认为对方会接受这种交换，他觉得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应该支持这项决议，因为它有心理上和宣传上的价值。

直到2月，对他的建议才有了行动。后来，国会了解到在2月24日联合国大会开会时大概要提出交换生病和受伤战俘的问题。有美国建议和支持这类议案在政治上的优势是明显易见的。国会几乎没有困难去获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克拉克的同意。

因而在2月22日，远东司令部向金和彭发出信件要求立即交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他相信对方会拒绝，就象他们以往在这一点上所做的一样。

这个问题在本月底和3月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下文。与此同时，敌人继续指责战俘事件，指责美国空军侵犯了极其重要的地域，甚至再次指控联合国军采用细菌战。2月24日，克拉克发表声明驳斥中国人所声称的被俘美军人员承认使用了细菌武器。他指出共产党人明显地希望在春季有新的疾病蔓延，试图以此来掩盖他们对付流行病的医疗条件不足。最后他重申联合国军在朝鲜从未使用过细菌武器。

随着3月的到来，一些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形势。

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在3月5日开始执政，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开始了。目前还不知道以马林科夫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政策与斯大林的政策是否有根本上的区别，但是不言而喻需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时期以建立马林科夫和他的同僚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他的盟国谨慎地等待马林科夫的统治被取代的趋势的迹象。

尽管共产党战俘看上去几乎没有受到斯大林之死的影响，并在3月7日在延祖岛上对看守长发起一次攻击，这次攻击导致23名战俘死亡，60多名受伤，有迹象显示苏联的战略上改变的可能正在来临。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承认美国和英国在战胜轴心国上起了作用，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是首次。俄国人还同意居间调停以使自朝鲜战争爆发后被监禁在北朝鲜的9名英国外交人员和传教士获得释放。苏联对西德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的反应相当温和。共产党人新的和平攻势的可能性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外交界中唤起了希望。

3月28日，重大的突破到来了。金和彭在对克拉克要求互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的回复中说他们完全希望就这一点执行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然后继续声明说“同时，我们认为在合理解决在战争时期互换双方生病和受伤战俘的问题应当导致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从而在朝鲜达成停战，因为这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

共产党领袖模模糊糊提到的“全部战俘问题顺利解决”的含义是一件引起猜测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交换伤病战俘促进了乐观主义。克拉克立即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要通过联络官先行商定安排伤病战俘，但是拒绝恢复全体会议，直到敌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是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提

出的建议。上级在答复中建议克拉克在复信中要暗示如果谈判重新开始，共产党会遇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战俘的坚定立场。这样，重担就会落到敌人肩上，要么同意承担这一重担，要么公开承认他们在遣返战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华盛顿的首脑们的结论是重开谈判决不能作为同交换伤病战俘联系在一起的一项条件。克拉克遵循这一指令，迅速地在3月31日将他的答复送交金和彭。

当东京和华盛顿正在衡量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时，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作了澄清。3月30日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谈到谈判的过程和已经取得的一致，然后周提到战俘问题并作出了明显地是关键的让步。他敦促双方"应该着手在停战之后立即遣返所有在押战俘中坚决要求返回家园的人员，并将剩余的战俘交给一个中立国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返问题"。唯恐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敌人放弃了他们对遣返战俘上的观点，周坚定地断言共产党人相信"在对方的恫吓和压力下"，战俘中充满着恐惧，不敢返回家乡。他确信一旦对战俘作出解释，他们很快会决定接受遣返。无论如何，周的建议第2天就得到了金日成的赞同，展现出自1952年4月以来解决朝鲜战争最光明的希望。

华盛顿对周的信息的最初反应仍然是谨慎的。美国首脑们坚持要共产党人就落实他们的建议提出进一步的具体方案，但不否认它有希望。他们预见到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诸如周所指的中立国家是谁？中立国在什么地方接管战俘，在朝鲜还是朝鲜以外的什么地方？谁来决定对未被遣返回国人员作出最后安排？如果共产党人在交换伤病战俘方面显示积极态度并发表有关细节的声明以表示他们真诚地希望全面解决问题，美国领导人愿意在交换伤病员的同时就周的建议

进行商讨。

克拉克完全同意要敌人在全体会议复会之前必须作出具体方案以供讨论，并在完成交换伤病员的交易中显示出他们的诚意。4月5日在致敌方领导人的一封信中，他建议联络官在第2天会晤，并要求金和彭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更多的有关共产党人处理未遣返回国人员的细节。

在双方联络官就安排交换伤病战俘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克拉克和他的参谋人员系统地提出联合国军的一项计划，它规定每1名被交换的战俘应被带到板门店，戴有健康状况和得到治疗的标记，以及没有徽记的耐穿的服装。没有被指控在俘虏后犯罪而致残的战俘会由于这种原因被扣押，这种情形也不会出现，因为战事罪行法庭并未成立。为了保证敌人交还最大数量的联合国军人员，克拉克告诉哈里森避免使用"重"伤病员这个词。克拉克想要保证新闻记者和其它新闻媒介观察全过程以报道通过交换将战俘交还给联合国军司令部，但是数目在板门店限制在50名，只允许采访由医务人员选择出来的体力和神精上适合被提问的战俘。

四、"小开关"行动

丹尼尔海军上将和李相朝上将领导双方联络官小组，4月6日在板门店会面。为了减轻分组会议的工作和减少驳斥指责与抱怨，代表们迅速地开始认真着手工作。丹尼尔海军上将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作了阐述。联合国军司令准备立即着手在板门店为移交和接受伤病员提供一切必需的便利条件，在协议被执行的7天内每天移交500名战俘。为了加快速度，丹尼尔建议各方交出要交换的战俘的名单和国籍，

任命军官来讨论管理上的细节。李指出共产党人想要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和110条款遣返所有合乎条件的生病和受伤的战俘。

开始有些犹疑不决，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仔细地审阅了日内瓦公约后，丹尼尔在4月7日通知共产党人他们一方准备遣返所有符合这两条款项的战俘，附带的条件是遣返不能违背本人意愿。丹尼尔强调说，可能的话，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就"伤病员"这一词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

联合国军司令促使敌人交还尽可能多的战俘的努力得到了令人失望的回复。当李在4月8日宣布全部伤病员包括450名南朝鲜人和150名非南朝鲜人时，丹尼尔称这个数字是"难以置信"的小。事实上，考虑到敌军归还他所掌握的12，000名战俘中的600人，也就是5%，同联合国军方面提出的交换数字相比是有利的，后来打算从监禁的132,000名战俘中交还给敌方700名中国人和5,100名朝鲜人，仅为4.5%。然而，丹尼尔再次要求共产党人把他们对伤病人员的等级更公开一些。会后他告诉克拉克说，当联合国军透露了自己一方的数字，敌人联络官不自然的态度看得出是松弛了下来。他觉得应当施加更多的压力以使全部人员的数字上升到联合国军能接受的地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各种细节逐步地制订出来了，板门店的保安人员在交换期间增加至每方30人。联合国军同意共产党人沿着醒目的路线用5辆汽车护送战俘，将他们移送到会谈地区。

4月11日签订的协议完成了全面的安排。板门店交换在10天之内开始，敌人每天交送100名，联合国军方面每天交还500人，每次一组25人，根据国籍订出花名册，包括姓名、

军衔，每一组的号码顺序相连，每组的收据交给对方时要签字。

4月20日被确定为“小开关”开始的日期，联合国军司令授权这一行动。征集来的卡车和火车开始将共产党战俘从巨济岛和其他沿海岛屿向北运送。4月14日，23辆运输车载着首批联合国军伤病员离开了北朝鲜的战俘营。5天之后，第一列车的敌人战俘离开釜山去汶山。但是就在共产党伤病战俘准备回家，他们仍然试图给联合国军制造麻烦。一些人拒绝穿上新服装，因为代表俘虏的P字不是被印在衬衣上，其它人则不让联合国军人员向他们喷洒DDT药粉。示威爆发了，呼喊声和歌声此起彼伏，直至看守当局警告头面人物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人将会失去他们被遣返的机会。当战俘们登上等候运送他们去陆地上的登陆艇时，他们扔掉了配给的牙粉，肥皂和带有放在烟盒里的宣传广告的香烟，指责美国是以“饥饿，压迫和用残暴的手段对付朝鲜人民”。在釜山，他们要求有权检查医院的设施，在他们上岸之前，不得不向他们发出警告，否则就强行将他们送走。一些中国人开始以绝食来示威，因为他们说食物中被下了毒药。当从釜山开往汶山的最后一列火车开动的时间到了，许多战俘扯开钮扣，割断大衣上的带子解开鞋带以试图加深他们受到虐待的迹象。

当联合国军集合起所有作为交换的共产党伤病战俘，发现人数超出了应被遣返的5,800人，问题立即出现了，是将多出的550名共产党人作为交换一起遣返，还是坚持原来的数字，克拉克将军觉得为显示联合国军的诚意和促进敌人增加遣返总人数，将多出人员一起遣返是有利的，他的上司对此也默认了。

4月20日，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当联合国军的伤病战

俘被送到板门店，他们便匆忙地被送到汶山作初步分理，一些人接着被空运到日本休养和治疗，准备海运回国，韩国的伤病员转送到南朝鲜战地医院。当记者突然采访战俘请他们叙述一下在共产党人控制下的体验时，真相大白了，其他的伤病战俘仍旧被扣押在敌人的战俘营里。哈里森立即建议联合国军用多出的550名共产党战俘作为使更多的联合国军人员脱离敌军控制的手段。但是克拉克只允许哈里森简单地要求共产党人去再检查一下是否有许多伤病战俘不宜移交。

不论敌人是受到联合国军方面意想不到的多交还550名人员的影响，还是受到新闻报道联合国军伤病员仍然受到共产党监禁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影响，不管怎样，4月23日共产党人的确宣布他们还能超过原来提交的600人这个数字。

为了使共产党人进一步降低他们的标准，联合国军方面又在名单上增加了更多敌军战俘。但是到了4月26日，李将军突然宣布他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交换工作。丹尼尔海军上将抗议说根据联合国军方面的情报表明，仍然有大约375名联合国军伤病战俘能被遣返。李声称这是没有根据的指责并拒绝考虑此事。面对这种顽固的立场，联合国军方面在5月3日停止遣返最后一组应被遣返的共产党人。

最后交还的总数是：联合国军方面释放了5194名北朝鲜士兵和1,030名中共士兵及其446名被扣押的平民，总数为6,670人。357名病人是用担架抬着。作为回报，敌方将684名各种伤病人员带到板门店，其中94人躺在担架上。

可能共产党人不象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慷慨大方，但是至少他们执行了自己作为交易的一方去讨价还价并增添了一点额外补贴，根据这一行动和表面上敌人的意向，结束朝鲜残杀的战争，恢复全面谈判看来是时候了。

五、恢复全体会议的准备

当共产党人通过“小开关”交换伤病战俘以显示他们的诚意时，克拉克将军和他的顾问们正试图从周恩来3月30日声明中发现更多的目的和让步的范围。如同已经指出的，中国人的声明在非共产党世界中造成了一种混杂着希望和谨慎的气氛，但是它的措词是如此含混不清以至于引起的问题比它回答的还要多。克拉克在4月5日写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中要求得到进一步的细节和澄清。

4月9日南日作了答复，实质上是重复周恩来使用过关于共产党人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和让战俘尽快返回家园的同样措词，南继续写道：

遣返所有战俘原则基础是明确的。我方坚决主张扣押的一方应当保证不采取任何强迫手段去阻挠所有战俘返回家园……。朝中一方不认为有些战俘据所称的不希望被遣返回国。因此据说的强迫遣返或由暴力遣返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并且我们从来反对这种主张。基于我们的这种立场，我方主张我方被扣押的人员中那些充满恐惧和由于受到恫吓和压制而害怕回国的人应被移交给一个中立国，通过我方的解释，逐步摆脱恐惧。

根据南日的答复，问题相当简单——如果联合国军方面能停止试图强行扣押战俘并将他们移交给一个中立国，共产党人不久就会说服被称为非遣返回国者他们的恐惧是不必要的。所有的人都会高高兴兴地回国。这是一种圆滑的幌子，以挽回面子，并且只做程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让步。

尽管南日的信没有答复华盛顿早些时候提出的中立国的

问题或是如何处理被移交给一个中立国的非遣返回国者的问题，这些仍然是全体会议应当解决的细节。但是为了坚持主动，联合国军司令部在4月16日通知南日，由于他的信件中没有提供具体的建议，共产党方面被认为或是准备接受联合国军方面较早时候提出的计划之一或是提出自己的建设性的提议。为了使敌人对联合国军方面考虑的建设性有些概念，哈里森举瑞士作为中立国，这是由于瑞士长期以来的状况和公认的中立立场。并主张中立国在朝鲜本土接管不遣返回国者。60天作为说服不遣返回国人员的限期是足够的了。在结尾，哈里森警告说，如果全体会议在合理的时间内未能达成可接受的协议，联合国军方面将再次休会。

在"小开关"行动前夕，丹尼尔海军上将建议4月23日作为全体会议复会的日期，但是共产党的代表主张4月25日，以后他们将日期推迟到4月26日。

在第一次会议之前的几天是重要的准备和指令的繁忙时期，克拉克告诉哈里森拒绝接受将苏联或他的任何一个卫星国作为中立国的人选，并坚决要求讨论在朝鲜不遣返人员的问题。在对远东司令要求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国家的提名的答复中，他的上司指示将瑞士或瑞典列入名单。他们觉得他能同意将90天作为中立国监管不遣返回国人员的期限。作为论据，柯林斯告诉克拉克，联合国军方面应当强调这一事实，它有完全的合法权利去提供收容所和作主要让步允许中立国去控制不遣返回国者。

为了将现行的解决朝鲜问题方法的政策通知克拉克，参谋长联席会议在4月23日发出了一些基本指示作为他的方针。前面两条是直接继承了前行政当局的政策，并重申达成可以接受的停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是在不放弃非强迫

遣返的原则下。指令规定，共产党的建议可根据表面价值予以接受，除非证明是意思相反。然而，美国不能赞同长期无结果的争论不休。由于美国通过哈里森4月16日的建议已经把握主动权，它应继续保持有利的地位并使敌人处于守势。指令断定，过去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任何建议作为协议的基础都是令人满意的，但是限制中国人处理非遣返者的工作和不再起诉而赦免北朝鲜战俘可能是行得通的。

这样，在休会的6个月中，美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改变了，但是政治活动仍然在原地徘徊。新领导试行了几次小的计谋以诱使共产党人停止在朝鲜的战斗，而敌人却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压力作为报答。在一般情形下，这场搏斗会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得不到一个结局。但是由于斯大林的逝世，天平转向有利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苏联在3月和4月的行动看来似乎是结束了诸如消耗俄国物力的朝鲜事件一类的对外发狂，在巩固权力期间需要一个新的有力的观念。共产党人在非遣返战俘问题上的让步是新的和平攻势的一部分，或者象杜勒斯所称在斯大林驾崩后开始的和平“防御”，这使解决冲突的希望出现在美国和他的盟国眼前。然而基于过去的经验，联合国军方面适当地谨慎地去探讨共产党人头脑里究竟在想什么。在南朝鲜的一股越来越强的反对接受一项分裂朝鲜协议的潮流使得停战的光明前景又黯淡下来。在以后关键的日子里，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发现应付战线后方的纠纷比对付敌人更为困难。

第十九章　共产党同意达成协议

为对付大韩民国政府坚决反对和谈而造成日益紧张的局势，4月26日板门店重新召开全体和谈代表会议。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面临非常困难的任务。韩国人声称如果和谈会议决议不能满足韩国的要求，他们将要单独进行战争。共产党人面对韩国人的战争威胁，而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要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是困难的。对韩国总统李承晚及其同伙所持感疑态度象阴影罩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们的头上。由于共军喜欢看到联合国军处于不能控制仆从的困境，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成员不得不开会寻求克服最后障碍面达成协议的问题，即关于战俘的遣返问题。

一、探　索　阶　段

自1952年10月最后一次会谈以来，双方都调整了大批人员。令人生畏和动辄骂人的解方已不再是敌方代表团的成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上将边长武和北朝鲜人民军少将徐辉已另任新职。南日和李相朝手下的新成员并非都是不熟悉者，前联络官张春山和柴成文已晋升为将军级和谈判代表，只有接替边将军的丁国钰将军是新的谈判代表。张、柴两位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谈判，对所有的重要问题都了如指掌。

联合国军司令部在谈判桌上的形势则完全两样，哈里森

上将和丹尼尔海军上将手下的3名成员均未参加过以往的谈判。接替李翰林、莫里斯和麦康内尔3位将军的是南朝鲜陆军少将崔德新、美国空军准将埃德加·E·格伦和美国陆军准将拉尔夫·M·奥斯本。所以，共方代表团在应付复杂谈判方面的经验要比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丰富得多。

南日介绍其新伙伴之后，马上提出了共产党方面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6点建议：①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之后的2个月内，双方应遣返所有愿意回国的俘虏；②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后的第3个月内，应将所有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移交给中立国看管；③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后，在6个月内，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的所属国应提供向其谈话的机会和设施。并劝他回国；④凡在此段时间内改变其主意的俘虏将被遣返回国；⑤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后6个月解释期结束时仍在中立国看管下的俘虏的处理，将由停战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决定；⑥不愿被遣返回国之俘虏在中立国的全部费用将由俘虏所属国家承担。

共方提出的6点建议，有两点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接受的，哈里森将军马上予以拒绝。他告诉南日说，将不愿被遣返的俘虏送到中立国用长达6个月的时间劝其回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他接着又说，劝说工作只要60天时间就足够了，中立国可以在朝鲜接管看守工作。考虑到共方没有提出行使中立国职能的国家，哈里森提出瑞士是最合适的国家。

南日立即表示反对。他说，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已选择瑞士作为监督委员会的提名国之一。所以由它来行使中立国的职能是不适合的。他坚持需要6个月时间才能消除俘虏的恐惧心理，这是他们长期被拘留的结果，所以需要时间消除他们的恐惧。

临近第2次会议结束时，双方的分歧已非常明显。选择中立国、拘留地方和时间、以及解释期后不愿被遣返回国之俘虏的处理等问题仍待解决。虽然共方不同意瑞士作为中立国，但他们也没有提出其他国家的表示。他们继续坚持在对不愿被遣返者进行解释的同时要对其进行长期拘留，而且最好是将俘虏从朝鲜送到中立国。如果共方的提案完全如愿以偿，在不愿被遣返回国的战俘问题上就不会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只要他们有机会和那些顽固的俘虏谈话，后者全都会愿意回国。

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同意共方的上述看法。经过过去2年的等待和犹豫不决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不希望将不愿被遣返的俘虏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再拘留他们6个月，让共产党的劝说人员瓦解他们的抵抗。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60天时间已足够敌人和他们谈话，解释可以在朝鲜进行。

所以，在表明最初的立场之后，代表团便开始集中研究对方将作出更大程度让步这个难题。哈里森将军认为，共方已准备进行讨价还价，并希望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反建议。但哈里森在华盛顿和东京的上级决定在选出中立国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首要的问题，并且讨论应局限于设法使敌人同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国家。

4月29日，共方代表首次表示最好是由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但拒绝提出具体的国家。南日亦表示，考虑到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同意6个月解释期，可以对其进行讨论。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在未选出中立国之前不能提出反建议，哈里森第2天才反驳敌方的意见。他指出，共方在战争初期阶段已在前线释放了大批人员，因此现在释放所有愿意留在南朝鲜的俘虏将是适当的和人道的。不需说，南日肯定不会接

受哈里森的建议。但共方知道，如果再度出现谈判陷入困境的危险，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会就此采取最后行动。

直到南日在5月2日的会谈中提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为合适的亚洲中立国家以前，敌方一直坚持他们的意见。在哈里森还未要求共方对上述4个国家中的任何1个表示态度之前，南日则想说服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送到所选的中立国家，但未成功。

虽然美国本想瑞士或瑞典为中立国，但也准备同意巴基斯坦为中立国。所以，在5月4日开始谈判时，哈里森告诉南日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提名巴基斯坦。

接着进行了2天多毫无结果的讨论，直到敌方确信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确定中立国之前不会再作什么。最后，共方代表团在5月7日提出了经过扩充的8点建议，并在建议中作了几点让步。

二、妥　协

敌方在其新建议中，放弃了早先要将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送到中立国的要求，并将解释期从6个月减少到4个月。为了处理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南日建议成立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5国组成的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这5个国家将提供同样数量的武装人员和分担不愿被遣返回国俘虏原拘留地点的看守任务。如果共方的建议被采纳，他们将要求向俘虏宣读其全部条款。

由于共方已对其原先建议最有争议的部分作了让步，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其部分高级政治与军事顾问在华盛顿开会讨论了共方的最新建议。由于受到共方5月7日建议中所

表现出的让步精神的鼓舞，他们同意这是敌方态度的一个明显转变，并且为谈判出一个可接受的停战协定提供了基础。他们发现共方的建议近似于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提案。但有几点还需要澄清，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与决定不愿被遣返回国俘虏之处理的政治会议相一致的时限和共产党部队驻扎在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后方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顾问们没有考虑到这些难以克服的问题，他们觉得，只要遣返委员会的其它4个成员国默认，选择印度作为该委员会的第5个成员国是可以接受的。当政治和军事首领们在仔细讨论敌方建议的时候，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亦在研究其细节。哈里森要求南日提供更多的信息，尤其是有关政治会议与不愿被遣返俘虏最后命运之间的联系以及遣返委员会之工作方式方面的信息。南日在回答上述问题时重申，只要共产党有机会和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进行交谈，他们都愿回国是没有问题的。在谈到遣返委员会将如何展开工作时，南日认为应以多数票通过而形成决议，并且要制定其本身的工作程序。

通过以后几天的辩论，很显然，共产党认为应该由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下一步行动了。他们不理睬哈里森提出的反对意见和问题，认为这是一些以后可以解决的小问题，并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了旨在阻挠达成停战协定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这时双方在绝大部分观点上都已十分接近。5月10日柯林斯将军告诉克拉克说，如果联合国军司令可以保证就下述问题与共方达成协议，美国将愿意就战俘问题达成协定。第一，除在程序问题上以多数票决定外，遣返委员会应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行使其职责；第二，必须在30天之内召

开决定不愿被遣返回国之俘虏命运的政治会议。超过这一限期后，应释放俘虏，并使其获得居民身份；第三，印度应提供承担看守任务的全部武装人员和管理人员，并应担任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和执行代理人；第四，虽然可以允许共方向俘虏解释的时间达到90天，但美国认为最好限制为60天。

当联合国军司令部认真研究其反建议时，南朝鲜的事态发展发生了严重变化。事态朝着可能即将签定停战协定的方向发展，这使李承晚变得不安起来。随着南朝鲜政府中不安情绪的日益高涨和南朝鲜城市游行示威的新高潮的出现，克拉克决定亲自会见李承晚。5月12日他飞往朝鲜和南朝鲜总统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讨论。克拉克将这次会晤中出现的两个问题报告了华盛顿：第一，李承晚极其严肃地表示，他反对将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释放到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尤其是不能释放到被共产党控制的国家；第二，李承晚认为印度不是中立国家，也不想让印度的部队进入南朝鲜的任何地方。考虑到李承晚的强烈情感和基于对其立场的同情，克拉克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提出一旦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就马上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的建议。他认为这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办法，而且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坚决坚持，共产党是会接受的。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还可以减少不愿被遣返的非朝鲜俘虏的看守人数，并可能消除李承晚的部分反对意见。

虽然华盛顿方面做出了迅速反应，但只准许克拉克以暂时的立场提出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与此同时，决策者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这样，在联合国军司令部5月13日提出的反建议中便包括了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这一条。此外还提出：由印

度担任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和提供看管部队；解释期将限定为60天；在解释期结束之时释放仍不愿被遣返的全部俘虏。

敌方对上述几点建议的反应并不怎么热烈。由于共方已在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所以显然是希望他们的建议将使对方也作出某些让步。但联合国军司令部则是先按照共方的模式接受其作出的让步，然后再提出更多的要求。南日和他的代表团成员马上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种不合作态度，并且特别严厉地谴责了一定要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的企图。南日指控说，这是一种倒退行为，是为强行拘留作的再一次努力。当哈里森再一次指出共产党已在前线释放了50,000名联合国军司令部人员时，南日不予理睬，认为他的话毫无根据、毫不相关，根本不值得一驳。

由于没有料到共方会做出上述反应，哈里森将谈判推迟到5月16日进行，因为到那时在华盛顿和远东的军事政治首领已开始集中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后立场问题。在他们为这一最后立场进行准备时，哈里森首先提出休会4天；当他发现4天不够时，又提出再延长5天，一直到5月25日。

如果敌人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的最后条件，将出现又一次长时间休会。克拉克为此制定了扩大空中行动、撤走开城的警戒部队和接着在开城周围进行有限地面战争的计划。如果仍不能打破板门店的僵局，他还要求其上级同意他单方面释放不愿被遣返的35,000名北朝鲜俘虏。

克拉克认为，采取主动行动迫使共产党在接受停战协定条件与继续坚持其错误信念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已经到了。他在评论联合国军司令部5月16日提出的最后主张的内容时，要求去掉5国遣返委员会，而由瑞典或瑞士承担不愿被遣返俘虏的看守任务。如果共产党方面坚持的话，可以增加1

个亚洲中立国家看管在朝鲜或在其它国家的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俘虏。在90天解释期满之时，应再有30天时间举行政治会议以就仍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处理问题达成协议。要是不能就此达成协议，则应释放他们。克拉克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应以要么接受要么放弃为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上述建议。然后他将单方面宣布休会，直至敌人接受或提出详细起草新方案时止。

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于5月23日结束了讨论，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其讨论结果告诉了联合国军司令。其它各方面的问题和压力显然对其决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和克拉克的提案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首先，他们希望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要将其视为最后通牒，所以哈里森准备在一次非公开的秘密会谈中提出这一建议。第二，由于美国是支持印度12月3日提案的，所以盟国向美国的领袖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美国严格坚持该提案中的各项原则。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最后提案中的条款需与印度提案的基本一致。这样，如果敌人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可以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终止谈判。

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在5月25日恢复板门店谈判时提出6个重要问题。如果所有武装部队和管理人员均由印度提供，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接受5国看管计划。这表明没有改变5月23日的建议。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不再坚持一旦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就立即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并同意将这些俘虏移交给遣返委员会。对需要由遣返委员会决定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共方提出的按多数票通过而不要求一致通过。第4个问题是在遣返委员会执行看管任务期间的战俘处理。为了确保不使用威胁和强迫手段，应限制被允

许接近战俘之共产党解释者的人数。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观察员将与遣返委员会的成员一道参加与俘虏进行的谈话。关于劝说人员的谈话时限问题，总统希望可以90天为限。最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将不愿被遣返的战俘的处理问题移交给时限为30天的政治会议解决，或者是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其最后命运。

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说，如果共产党拒绝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或是提出要进一步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中止谈判，并撤走会谈区的警戒部队。但他们又说，如果证明必要的话，这种决定本应由华盛顿而不是由克拉克或哈里森做出。

为说明政府为什么不支持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说，它不是我们在反对强行遣返问题上的根本立场问题，而且不会影响对朝鲜以外的任何支持。它不是一个我们可允许谈判破裂的问题。只有在共产党拒绝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和谈判终止的情况下，才会马上释放所有不愿被遣返的俘虏。

毫无疑问，李承晚及其政府对最后提案中作出的让步尤其是对将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移交给遣返委员会的条款将感到非常失望。所以克拉克和埃利斯·O·布里格斯大使受命在5月25日早晨会见南朝鲜总统时，向其说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的内容，并设法安抚其下面的人。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因为和共产党和解的任何努力肯定都会引起南朝鲜的强烈反对。即使能与敌方就剩下的问题达成协议，仍然无法保证李承晚将同意停火。

三、得 了 一 分

虽然与敌人达成停战协议有失去朝鲜战争中最坚决支持者的危险，但美国仍决心竭尽全力结束这场战争。5月25日，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会谈时，哈里森建议进行秘密会谈或行政会谈，并强调严禁披露会谈的内容。休会片刻之后，共产党代表接受了哈里森的建议。

哈里森在发言时，首先强调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强迫遣返的主张。随后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愿意在下述4个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即同意将不愿被遣返的朝鲜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延长解释时间，解释期限期满后将不愿被遣返的战俘的处理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解决；同意采取投票方式通过遣返委员会的决议。哈里森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与共产党方面5月7日提出的建议达成协议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接着列举了一部分仍有争议的问题。他提出不能用武力对付和威胁俘虏，所有看守部队和管理人员都必须由印度提供，解释期限不能超过90天，处理不愿被遣返的战俘的政治会议不能超过30天。因此，哈里森最后说，在看守部队接管不愿被遣返的战俘的管理工作120天以后，应将他们全部释放，否则就把这个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大会解决。

休会1个半小时后，南日和他的同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他们既不同意120天后全部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战俘，也不同意由联合国大会决定他们的命运。除此之外，他们闭口不谈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两种解决办法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前者仍带有“强行扣留”的性

质；后者则不合情理，理由是美国是朝鲜战争的参战国之一。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中的其他条款，南日表示尚需要进一步考虑，因此建议5月29日继续举行会谈。但哈里森坚持要敌人系统研究他提出的建议，并保证在6月1日之前做出全面考虑。南日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

为了强调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这一建议的重视，克拉克又于5月27日亲自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他在信中除了强烈要求金日成和彭德怀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提出的合理解决战俘问题的条件外，最后还用威胁的口气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无休止地和毫无结果地重复各自的观点。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两位将军不是不清楚的。我们真诚地希望，贵方对我方代表就有关停战协定所涉及的上述问题提出的建议迅速做出认真的考虑。如果贵方确有停战的希望，我奉劝两位将军不要坐失目前之良机。"

由于共产党方面借口所谓"行政上的原因"要求延长3天休会时间，因此一直到6月4日才再次举行全体会议。同时，韩国的会议代表崔将军曾公开表示反对5月25日的建议。在韩国政府的煽动下，整个南朝鲜出现了反对签定停战协定的情绪。尽管出现了这种不利趋势，但共产党方面仍表示准备缔结停战协定。虽然南日对联合国军司令部6月4日提出的建议进行了修正，但基本上未作大的变动。

共产党方面曾就中立国看守部队接受不愿被遣返之战俘管理工作120天后的战俘处理提出过如下建议："今后，凡是选择到中立国家去的战俘，都可按其个人的申请得到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红十字会的帮助"。哈里森认为，这个建议的含义不确切，没有指明不愿被遣返的战俘能否留在朝鲜。但共产党拒绝做出进一步说明。克拉克的上司对此发

表看法时，劝说克拉克对其采取认可的态度，并希望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要马上要求共产党方面做出进一步说明。

在华盛顿，国会和国防部的政策制定者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方面的建议是保全中国人面子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掩饰他们接受志愿遣返的真实用心。他们认为，除了允许接触拒绝遣返回国之战俘的解释人数和敌人准备派人南朝鲜的通讯员人数的有关条款外，共产党提出的方案是令人满意的。

在板门店举行的下两次会谈中，双方代表继续就最后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进行谈判。共产党方面提出1,000名不愿被遣返的战俘配10名解释人员，说要消除战俘头脑中对遣返的恐惧情绪，人少了不行。尽管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本意是将1,000名不愿被遣返的战俘的解释人数减至5人，但仍同意将其增加到7人。出人意外的是，共产党方面几乎未提什么反对意见就同意了这个数字。关于为战俘营的共产党人服务的通讯小队的人数问题，共产党方面认为，每个安置解释代表的地方由6人组成一个小队就足够了。如果将全部不愿被遣返的战俘集结在一个地方，则最多只需要2个通讯小队。

6月7日，参谋人员受命完成战俘处理参考条款之最后细节的修改任务。由于双方只在一些小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加之都有尽早达成协议的愿望，所以参谋人员很快完成了任务，第2天即6月8日就拿出了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的文件。

包括1952年至1953年冬天的长时间休会，在板门店的会谈帐篷内外经过整整1年零6个月的辩论，终于解决了战俘是否有权决定愿不愿回国的这个麻烦问题。不管在最后的文件中如何进行掩饰或否定，共产党都否认不了他们已在国际

上承认了反对强迫遣返的原则。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曾在这一原则于他们有利时执行过它，只是到了涉及其本国国民时才开始表示反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经过了长期努力和付出高昂代价之后才开创了这么一个先例。在保护这些共产主义的判离者的战斗中，有数千人伤亡。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对不愿被遣返的战俘一直是备守信用的，从而赢得了心理战上的胜利。尽管共产党俘虏通过组织反抗、骚乱和暴乱等活动来反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一主张使这种胜利的影响减少了，但在朝鲜开创的允许战俘自己决定是否回国的这一先例必将对今后的战争及其解决办法产生影响。由于反对强迫遣返的原则已被写进国际法中，因此今后出现类似情况时，便可以此作为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虽然共产党是否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再次让步还不得而知，但只要一被打开缺口，就至少会对以后产生重要作用。

四、遗 留 问 题

随着遣返问题的解决，就敌人方面来说，结束战争的道路上似乎已没有什么障碍可言了。但韩国政府方面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预示着前面还有严重麻烦。但为结束谈判，双方对这种威胁都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下面要解决的是另一个与停战协定有关的问题，即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确定。在1951年11月确定原来分界线的时候，曾规定其有效期为30天。要是当时已经完成停战协定其它条款的谈判，就不会再重新划分分界线了。另一方面，如果争议拖延到30天以上，则将在签定停战协定之前重新讨论分界线的划分问题。在刚达成战俘问题的协议之前，哈里

森将军曾向共产党方面建议：由于在过去一年半中，战线的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考虑维持原来的分界线。哈里森指出，这样做一来可以简化缔结停战协定的程序，二来可以加快缔结停战协定的速度。但共产党代表未对此表态，只表示他们将研究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

直到6月9日共产党方面才提出其看法。南日说，在不违反1951年11月协议精神的情况下，共产党方面要求对原来的分界线做一些修正，以便和目前的主阵地保持一致。但他接着又说，共产党方面愿意将分界线的修正工作推迟到签定停战协定之后进行。哈里森当即提出反对。他说，如果共产党方面希望就此继续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将马上奉陪。随后任命能干而富有经验的海军陆战队的默里上校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小组的组长，负责确定分界线的工作。南日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要求重新考虑共产党方面的建议之后，随即便宣布同意由参谋人员第2天立即着手实施上述计划。并任命朝鲜人民军的吴洪成上校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黄辰迟上校为共方代表。

6月10日夜间，敌人向驻守在朝鲜中部的韩国第2军正面发动了一次有限攻势，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改善共产党方面的阵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参谋人员于6月11日举行了会谈，谋求就新的分界线达成协议。争论主要集中于前线一些尚未固定的地段，即正在发生战斗的地方。默里在6月15日对其对手们说：“哪里有进攻，哪里就有反攻，反攻又会引起反攻。在分界线谈判期间，任何一方旨在改善其阵地的军事行动都容易引起这样的局势，即无限期地延长分界线的划分。我认为，最好是根据目前双方所控制的地段确定分界线”。

共产党的攻势于6月16日停止，因此参谋人员尚可以完成其任务。总的说来，双方争论已不激烈，并出现互相交换意见和互谅互让的气氛。这次谈判的成功表明，一旦共产党方面真的希望达成协议，他们是会改变主张和妥协的。在6月17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参谋人员绘制的分界线地图。南日表扬参谋人员几句之后，便指示他们接着绘制非军事区地图。

由于即将签定停战协定，因此需要尽快接受双方一致同意的充任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成员的国家。瑞典已在6月9日宣布愿意充任两个委员会的成员。瑞士则不如瑞典那么热心，瑞士政府提出，除非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交战国保证遵守停战协定的条款，他才会考虑派人到朝鲜充任上述两个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在反驳时向瑞士当局指出：韩国军队是受联合国军司令指挥的，因此联合国军司令完全有权和共产党方面进行谈判。另外，所有战俘也都是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收容的，而不是由各交战国收容的。经过一定考虑后，瑞士联邦委员会投票通过后才宣布同意充任两个中立国家组织的成员。6月13日与瑞士达成了协议，但双方都必须为其提供充分行使职能的条件。

6月初，韩国的种种行动表明，该国上下都有一种强烈反对签定停战协定的情绪。鉴于这种情况，克拉克将军和默里大使将印度大使召见到日本，向他说明，如果印度决定担任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将会面临哪些问题。由于韩国反对印度成为遣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反对印度部队进入朝鲜在这段时间表现得很明显，所以克拉克和默里认为，最好先让印度充分意识到可能出现爆炸性局势。尽管出现了种种不好的苗头，但印度仍于6月13日正式向美国国会表示，同意接受摆

在其面前的这一艰巨任务。2天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亦通过其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向美国国会表示，他们将愿意充任遣返委员会的成员。

解决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成员问题后，随之而来的突出问题便是何时和怎样将中立人员运往朝鲜。要将这些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集中在一起，当然要完全靠这5个中立国家的努力，而美国方面唯一可做的是希望他们尽快集结后来到朝鲜，以便停战协定一签字便可让他们承担起责任。在签定战俘参考协定之后的日子里，克拉克和他的参谋人员都感到着急和担心，害怕停战后监督小组和检查小组的成员迟迟不到来。要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和中立国小组不对共产党方面进行空中观察和检查的时间一长，他们就可能修建机场和储备战争物资等。6月11日，克拉克要求美国尽一切努力让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尽快到达朝鲜和行使他们的责任。因为只签署停战协定而无相应的监督检查，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消息令人失望。虽然国会正在千方百计地催促瑞士和瑞典政府尽快派遣它们的代表，但先遣小组要在6月21日才能出发，大批人员将在7月1日左右出发，而且全部都要乘坐美国的航班。由于这两个小组都要经过美国，所以7月8日以前到达朝鲜的可能性极小。据克拉克估计，他们到达朝鲜后还需要一周时间熟悉情况和适应环境。这就是说，检查小组至少要在7月15日才能开始工作。另外，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似乎也要在7月15日左右才能到达朝鲜。因此，瑞典和瑞士的代表早于此时或是晚于此时到达朝鲜将不会有多大区别。

6月中旬，克拉克又改变了他原先对签定停战协定之后

监督人员迟迟不能到来所具有的危险的看法。为了尽快签署停战协定，他甘愿冒敌人可能利用这个空隙期增加其军事力量的危险。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在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他出现这种180度大转弯的原因时说："现在看来，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可笑了。因为即使是中立国小组到了朝鲜并开始行使其职能，共产党方面照样可以随意破坏停战协定的条款，尤其是有关增加空军力量的条款。另外，即使是中立国组织发现他们在增加人员和物资，甚至包括增加空军的人员和物资，这类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也未必会再次引起战争"。因此，他要求在停火后的第20天开始进行检查。虽然华盛顿的美国首脑们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他的这个请求同样是相当幼稚的。

由于共产党方面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战争的结束显然已指日可待了。因此，6月中旬已明显地将注意力转移到签定停战协定的最后一道障碍。前面已多次提出，韩国反对签定停战协定的情绪一直在不断增加，到6月中旬已差不多达到了顶点，因此几度使联合国军的成员国感到焦虑不安。而临着可能签署违背这个年青共和国意志的停战协定，一向让人敬而远之的李承晚总统发现他处境危难，似乎需要他采取某些孤注一掷的措施了。

第二十章　一位唱反调的领导人

克拉克将军在其备忘录中作过这样的记述："在朝鲜停战之前的最后4个月的忙乱日子里，联合国军司令部几乎天天都面临着危机。我从来没象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到，要赢得满意的和平，即使这种和平为期不长，也要比赢得一场战争难得多"。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军司令所提到的上述问题中，大都是韩国政府及其精明的总统李承晚的行动引起的，而并非共产党的阴谋诡计所致。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这些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问题实际上是韩国动荡不安的局势引起，而且都不是第一次出现，但都给人增添了一种新的紧迫感。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共产党快接近于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韩国政府认为，必须在战争结束之前或者说在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之前，找出关系到其国家今后命运问题的解决办法。

从道理上讲，联合国军司令部是有权在不征得韩国政府的同意下签定军事停战协定的，但问题是这种协定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如果李承晚政府决定继续单方面作战，或是继续挑起事端和麻烦，一纸停战协定就不会有什么价值。一方面美国在朝鲜下的赌注太大，因此不会轻易撒手不管；另一方面韩国过去是靠美国的大量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才得以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而且今后会继续如此。很清楚，美国和韩

国谁也离不开谁。问题在于究竟李承晚是同意签定停战协定还是拒绝接受停战协定的条件。如果他同意签定停战协定，则很可能提出苛刻的财政和经济援助的条件；如果他单方面决定继续打下去，就会使联合国军遭受更重的伤亡和威信的进一步下降。因此，这是韩国的转折关头，明智或草率的决定将关系到韩国今后的命运。

一、不 安 全 感

处境危险和前途莫测是韩国反对签署停战协定的根本原因。由于美国和其联合国中的同盟国对积极继续这场战争已越来越不感兴趣，李承晚总统和他的高参们已经认识到，他们准备用武力统一朝鲜的希望将越来越难以实现。他们无法了解美国将对今后的远东事务承担什么责任，因此担心签定停战协定之后，美国很可能再次决定不把朝鲜划入他的战略区域之内，从而对韩国弃之不管。虽然停战协定规定还要举行政治会谈，但根据过去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有几个现实主义者相信这种会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呢？

从乐观方面来说，美国正在给予韩国财政和经济援助，因此能使他们解决物价暴涨的问题和开始经济复兴的任务。韩国陆军正日益扩大，训练比过去有素，装备也比过去精良。但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而且他们对美国的战后政策心里没底。这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一直是韩国领导人的一大心病。这就是韩国在1953年春为寻求安全而采取行动的背景。

其实，韩国的怀疑和不安情绪早有流露。2月，克拉克将军就听说韩国准备将其政府所在地迁回汉城。在为期三

年半的战争中，韩国政府所在地几乎一直设在釜山。由于战局的不稳定，一直无法在离前线太近的汉城重建行政管理和立法的职能机构，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反对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目标设立在汉城，以免再次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攻击。另外，正如克拉克在要求美国设法劝阻韩国不要将其政府所在地迁回汉城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韩国政府所在地迁回汉城，就意味着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民进入汉城和重新修建几十栋建筑物。

正当克拉克反对韩国将其政府所在地迁回汉城之际，韩国政府却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其指挥机关从东京迁到汉城。李承晚还要求联合国朝鲜复兴局这类经济复兴机构随联合国军司令部一起迁往汉城。克拉克一方面考虑到他身为远东司令的使命不能离开日本，同时还考虑到南朝鲜首都缺乏足够的住房和交通设施，因此拒绝了韩国政府的建议。克拉克认为，李承晚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是由于他对日本厌恶和反感。

美国的军政首脑们支持克拉克反对韩国将其政府机构迁回汉城的立场，所以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在3月初就此事会见李承晚时得到了后者将其政府各部部长继续留在釜山的保证。李承晚及其追随者希望通过将首都迁回汉城来稳定全国的情绪和他们对日本的嫉妒反映了他们当时的思想动向。

在经济战线上，韩国在1月中旬的新闻报道中宣称，战俘的伙食要比看守他们的韩国陆军警戒部队的好得多。美国新闻社援引这些报道后，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关注。他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欧洲遇到过与此类似的问题。当时由美国供给的德军俘虏的伙食要比看守他们的英军和法军士兵的好得多。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想知道在采取什么

措施缩小这种差别和能否由美国提供食品解决。

克拉克认为，韩国部队的食品补给实际上是由韩国政府负责的。但常常由于补给系统不健全和指挥上的失误，使韩国士兵得不到他们的配给定量。美国仅仅是提供制作饼干和罐头食品的原料。克拉克认为，许多韩国陆军士兵体质差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营养不良，而是新兵体格检查过程中未被发现的慢性病，如结核病。他特别提到，随着春天的来临，将得到更多的新鲜农产品。因此，韩国陆军的给养也会随之得到改善。同时，第8集团军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和帮助韩国陆军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

克拉克对韩国宣传韩国陆军和战俘的给养不一样的用意一直表示怀疑，他猜测韩国的目的是为了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财政援助。朝鲜战区后勤司令赫伦将军3月底的报告证实了他的这种怀疑。赫伦认为，韩国政府为了寻求更多的财政援助而没有准确估价它的国民经济收入及其逆差。因此，要加强韩国武装部队的建设和保持其经济形势的稳定，美国将不得不提供更多的援助。

4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做出搜集南朝鲜经济形势的一手资料的决定，并于4月9日指定亨利·J·塔斯卡博士对振兴朝鲜经济的方式和措施进行全面调查，然后提出美国应提供多少和哪些方面的援助。塔斯卡博士于4月中旬抵达朝鲜，对其进行了为期7周的实地调查后，于6月返回美国。接着详细而全面地汇报了南朝鲜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一些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他建议头3年要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并坚决主张在统一领导下重新组织美国经济界人士帮助韩国更加合理和有效地利用这笔资金。塔斯卡博士的南朝鲜之行，为美国打算长期向韩国提供财政援助提供了证据，并

起到了消除韩国对其未来经济的某些担心的作用。

在军事方面，成立了为韩国陆军征募新兵的机构，它对贯彻扩充韩国陆军的方针将继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前线伤亡不大时，每周可有7,200名新兵投入训练部队，这无疑会迅速增加整个韩国陆军的实力。据克拉克4月初的报告说，按新兵征集机构的速度计算，4月底可使韩国陆军的在编人数超过460,000名。克拉克仍不打算放慢这种补充兵员的速度，并要求准许他将韩国陆军增加到20个师约655,000人。按照现在的速度，可在8月下旬完成。到那时便可达到韩国陆军的最大编制人数。克拉克指出，要是他现在得到许可，他可以马上将完成训练任务的人抽回来，并按照情况的需要很快正式组建几个师。为了让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他还提出，当韩国陆军第17师的训练任务完成到一半时，他就能够让美军第1师撤离朝鲜。

2天之后，也就是在4月9日，克拉克就要求批准他正式新成立2个韩国陆军师。并要求陆军部用战区储备物资装备韩国陆军第13、14两师和为新成立的2个师提供足够的装备。尽管面临着停火的可能，但克拉克仍坚决主张继续执行将韩国陆军扩建到20个师的计划。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扩建后的韩国陆军将有助于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和美国军队最终从朝鲜撤离；如果战争停止，它又可以保卫韩国的独立。国防部长于4月17日同意克拉克将韩国陆军师增加到16个。陆军部参谋还通知克拉克说，将韩国陆军最大编制人员增加到655,000名的计划正在讨论之中。

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这种逐步扩充韩国陆军的方针使李承晚总统看到了进一步扩充其军队的希望，因此起到了消除他的疑虑的作用。但克拉克担心敌人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写人

停战协定的某些条款阻挠韩国军队的扩充。因此，他在5月再次要求批准他将韩国陆军扩充到20个师的计划。柯林斯将军支持克拉克的这一要求，5月1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同意将南朝鲜陆军增加到20个师、655,000人。最后4个师的正式组建任务将完全由克拉克负责完成。柯林斯提醒他说，某些重要装备如火炮等需要等到以后才能配备。

由于5月下旬韩国的形势日渐紧张起来，克拉克决定推迟扩充韩国军队的行动。当他6月初决定重新开始实施这一计划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他说：如果他决定继续扩充韩国军队，他必须向李承晚讲清楚，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实施这一计划中必须得到韩国的合作。

结果，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与韩国政府之间连续不断出现矛盾，另外4个师的正式组建终于被推到了停战协定签字之后。这样，也就因韩国政府不愿接受附加条件而耽误了韩国陆军的实力增加。当然，美国另外采取了措施，以增加保卫韩国安全的力量和为这个年轻国家最终担起保卫自己的任务而做准备。但军队的增加必须等待更加有利的时机。

韩国海军陆战队、海军和空军的伙食要比陆军的好一些。4月下旬，李承晚总统向克拉克表示，他对扩充韩国海军陆战队感兴趣。接着克拉克将此事汇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并对后者说，如果能给李承晚一个满意的回答，将有助于平息韩国的不满情绪。5月中旬，国防部长通知克拉克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同意将韩国海军陆战队的人数增加到23,500名，韩国海军和空军分别再增加10,000人和9,000人。

美国希望通过有计划地扩充韩国陆军和增加经济援助为韩国今后的安全和发展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但这毕竟是不够的，因为李承晚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最关心的是目前用什么

办法才能医治3年战争所留下的创伤。

二、友呼？敌呼？

在漫长的冬季休会期间，韩国还未公开反对签定停战协定。但在3月下旬，当共产党方面表示愿意恢复谈判和解决战俘问题时，韩国政府就马上意识到这会给它国家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

共产党提出建议还不到1周时间，李承晚及其追随者又再次发起运动，反对签署不满足他们条件的停战协定。并在4月初举行的韩国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美国不再提出任何有碍于完全实现朝鲜统一的方案。4月5日李承晚在庆祝韩国第2军成立1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他们要的将是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乘胜向鸭绿江边前进，而不是沿着目前的战线实现停火。第2天，汉城举行了有50,000人参加的集会，谴责签定停战协定，并提出了下列5个解决朝鲜问题的先决条件：1．承认韩国在联合国的席位；2．解除北朝鲜的全部武装；3．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朝鲜；4．同意韩国派代表参加讨论朝鲜问题的一切会议；5．联合国中的某些成员国停止对北朝鲜的支持。

韩国反对签定停战协定的运动已经达到了高潮，克拉克和他的顾问们也随之不安起来。赫伦将军提醒大家，对前面将遇到的顽强抵制决不能掉以轻心。当联合国军司令向其华盛顿的上司坦露他心中的不安和焦虑时，后者表示他们也正在密切注视这一形势的发展。

4月10日，50,000名学生举着无数“不统一朝鲜就血战到底”的标语在釜山全市游行，各级政府官员也一再呼吁用

武力统一朝鲜。正如赫伦将军在4月14日向克拉克指出的那样，韩国越来越反对签署停战协定的根本原因有3条：首先是出自于他们要求统一朝鲜的强烈愿望；其次是1950年遭受到的侵略使他们产生了不安全感；最后是由于面临着俄—中结盟的政治压力，害怕韩国今后再度遭受侵略时，美国不再出面援助。因此，赫伦担心李承晚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很可能轻率从事，因为李承晚总统似乎能够按他的意志去左右舆论。为了防止李承晚采取轻率行动，赫伦建议与韩国签定他所迫不及待的美韩安全条约，同意对其进行战后经济援助，支持它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朝鲜的统一和派代表参加政治会议。

虽然克拉克也象赫伦一样，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但他认为不应在受到李承晚的压力时与其签定双边安全条约。克拉克在4月18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时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的缺点之一在于：根据目前的方案规定，签定停战协定之后，李承晚可以任意使用韩国的武装部队，因为没有做出战后期间仍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的任何规定。另外，他认为，现在也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最好时机。

不出所料，克拉克果然没向韩国提出上述问题。4月21日韩国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支持李承晚向北朝鲜进军和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立场。3天后，李承晚又叫其驻华盛顿大使向国会转达了他的下一步决定。其内容是："艾森豪威尔阁下：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与共产党方面达成允许中共军队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李承晚就决定将韩国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因此，韩国军队将在必要时继续单方面作战。

李承晚的这一决定使华盛顿和东京惊恐万状，因为在今后举行的双方谈判代表全体会议上，韩国代表不合作的威胁

会更加严重。由于关键问题是韩国军队准备在何时退出联合国军，因此克拉克告诉柯林斯将军，他准备马上亲自去会见李承晚总统，以弄清他的军队准备在何时退出联合国军。如果李承晚愿意等到召开停战后的政治会议之后，就可以安排联合国的其他部队脱离战斗。这样，克拉克就可以通过限制对它的后勤支援而继续保持对韩国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如果李承晚在签定停战协定之后马上采取这一行动并开始对敌人采取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势必会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华盛顿很快作出了答复，要求克拉克把会见李承晚总统的时间推迟到布里格斯大使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件转交给他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想通过这封信打消李承晚的疑虑。他在信中指出，联合国军已成功地击退了共产党的侵略，并将继续为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而努力。但美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通过战争来实现后一个目标。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李承晚不要再给签定停战协定设置障碍，因为这样很容易使韩国失去它用极大代价所换取的一切。

4月27日，克拉克飞往汉城与李承晚总统进行会谈。克拉克在阐述他的观点时，“态度很友好”。虽然李承晚不动声色，但克拉克的话却丝毫也没有打动他。在会谈过程中，克拉克发现李承晚并未打算叫他的部队退出联合国军，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因为李承晚总统对克拉克讲，未和联合国军司令进行“深入细致和开诚布公的讨论之前，他的部队是不会退出联合国军的”。和李承晚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谈之后，克拉克觉得这个老家伙是在进行讹诈，未经过深思熟虑之前，他是不会擅自贸然行事的。

会谈中，李承晚着重强调的问题之一是中共军队和联合

国军是否会同时撤离朝鲜。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李承晚终于在4月30日做出了在采取某些防御措施之前联合国军队不能撤离朝鲜的决定。下面是他提出的部分条件：签定美韩双边防御条约；苏联入侵朝鲜时美国马上出兵援助；建立稳定的和平之前，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和空中防御；扩充和增加韩国武装部队的实力。

因此，李承晚公开提出用武力统一朝鲜和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显然是抛出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他知道要联合国军继续留在朝鲜帮助他用武力统一朝鲜，中国军队显然是不会离开朝鲜的。可是遗憾的是，他的讲话和他发布的新闻使他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了，除非是他做出重大让步。尽管他提醒过他的人民不要再采取过火的行动，以免让外国人将其说成为预谋活动，但游行示威仍接连不断地发生。

在与韩国政府的关系问题上，5月初又发生了另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李承晚和他的顾问们一再宣称，他们决不允许将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遣返到任何中立国家。5月7日，当共产党方面放弃将不同意被遣返的战俘强迫遣返出朝鲜的主张后，韩国政府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反对意见。共产党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在提出不同意遣返之战俘的处理方案时，都提出了以在朝鲜国土上驻扎看守人员和部队为前提条件。但韩国代表崔将军马上提出了修正联合国军司令部方案的反提案：如果选瑞典担任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和提供所有看守部队，并将这些部队全部集中于大陆南面50多英里的济州岛上，韩国政府才能同意由某个中立国家接管在朝鲜的不同意遣返之战俘的看管工作。

5月12日，克拉克再次拜访李承晚总统同他讨论韩国政府对遣返委员会的态度时，李承晚坚决要求不要将不同意遣

返的朝鲜战俘遣送到任何倾向于共产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次会谈中，李承晚问克拉克，有无让看守不同意遣返之战俘的韩国警戒部队释放他们而联合国军司令不予干预的可能性。克拉克提醒他说，韩国警戒部队是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因此，李承晚再没有纠缠这个问题。克拉克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同情李承晚的要求的，并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一签定停战协定之后就马上释放不同意遣返的朝鲜战俘。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只同意克拉克在开始阶段坚持这一立场；如果共产党方面表示反对时，应对此做出让步。但在韩国政府方面看来，这是形势趋于严重的一个明显表现，并且预示着今后形势发展的方向。

由于李承晚要求用武力统一朝鲜和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以及释放不同意遣返之朝鲜战俘的种种努力都未得到支持，因此他必然另有打算。在5月12日和李承晚会谈后，克拉克谈了他对这位总统的如下看法："我觉得李承晚已经意识到，虽然他提出了一些表示激烈反对的意见，我们仍会继续设法签署停战协定，只要这个协定不牺牲反对强迫遣返的原则。他目前所要求的是签定安全条约，争取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和让他的人民了解到他在停战谈判中是具有发言权的"。因此，克拉克认为，应尽快签定双边安全条约以满足韩国政府的这个要求。不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他建议李承晚给参加板门店谈判的韩国代表崔将军多增加几名行政官员，以加强韩国在谈判中的作用。李承晚接受了克拉克的建议，并于5月20日给崔将军派去了3名将官级的助手。

虽然韩国准备通过单方面作战行动来延续战争的威胁到5月初已经减小了，但第8集团军的参谋人员还是重温了在头1年韩国国内危机期间为在发生动乱时保护联合国军司令

部及其供给而制定的计划。由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签定停战协定后如何保证遵守它。这主要要看韩国军队和老百姓对李承晚要求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之呼吁的反应如何，以及韩国人民会给予他多大程度的合作。最严重的问题是在韩国陆军与共产党部队之间发生激烈战斗时将联合国军部队从前线撤下来。因此，已给各有关的一级指挥官下达指示，要求他们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5月中旬以后，顺利调解联合国军司令部和韩国政府之间的分歧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共产党拒绝联合国军司令部5月13日在板门店提出的建议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便准备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后主张：即放弃释放不同意遣返之朝鲜战俘的立场，同意印度担任遣返委员会主席和提供看守部队。但根据李承晚及其内阁成员谴责上述让步的严重声明来看，韩国政府是很难接受的。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共产党对重大问题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因此离韩国政府的要求实际上就越来越远了。

由于美国意识到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后主张会遭到李承晚的反对，所以华盛顿的官员们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私人信件的形式起草了一份声明，旨在使韩国政府相信，美国不会在以后抛弃它。并指示克拉克和布里格斯5月25日将其转交给李承晚后和他一起讨论。也许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同意签定双边安全条约，但因为韩国政府激烈反对签署停战协定，所以美国方面不打算就此进行谈判。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不愿与韩国签定双边安全条约使克拉克感到很纳闷，因为他认为李承晚对此是极为重视的。如果不同意签定双边安全条约，他们就别无其它办法缓和李承晚对美国准备做出的让步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5月25日，当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在板门店向共产党方面提出新的建议时，克拉克和布里格斯也于当日会见李承晚时向他披露了正在向共产党方面提出的条件。并接着告诉他，只要他接受停战协定中双方一致同意的条件并在执行过程中予以合作，美国就将继续给予韩国有效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为了确保停战后的和平前景，一旦宣布停火后，参加朝鲜战争的全部联合国成员国将马上发表一项对违反停火协定者进行"严重制裁"的声明。但在目前不考虑签定美韩双边安全条约，因为它有损于联合国在朝鲜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的形象，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向美国国会提出充分的法律依据。

这次会谈的后果几乎是可想而知的。由于事先未征求李承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最后主张之内容的意见，李承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做出了多大程度的让步也一直被蒙在鼓里，所以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只不过是将既成事实告诉他而已。同时，更为糟糕的是，克拉克和布里格斯不得不告诉他，美国不准备现在和韩国签定安全条约；如果他擅自采取妄为行动，就可能中断已经同意给他的各种援助。按照克拉克和布里格斯这两位代表的说法，李承晚所到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停火方案时，就象遭到了"惊雷轰顶"一样。他当即向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宣布，韩国决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停火方案，也不能象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做出任何予以合作的保证。但是李承晚却一再追问，是否准备将克拉克和布里格斯所提出的各点写进停战协定。

虽然当时还不知道李承晚会采取何种措施来挽回这种局势，但克拉克在刚一结束5月25日的会谈后就提醒他的上级可能会出现如下危险："李承晚很可能要采取公开或暗地释

放全部不同意遣返的朝鲜战俘的行动。如果他想要这么干的话，他是能够干得出来的，但我拿不出什么有效办法来应付这种局势。因此，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发生，将会给联合国军的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要想不受到共产党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盟国的指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本来我完全可以用美国军队去接替韩国警戒部队”，克拉克接着说，“但这可能会使本来已很微妙的事态愈加恶化。而且如果不同意遣返的战俘企图逃跑时，美国军队就可能陷入被迫用武力对付他们的境地。由于这些朝鲜人的唯一目的是拒绝重新回到共产党的控制下，要是美国士兵被迫用暴力手段阻止他们逃跑，那他们就实在是太不幸了。我已和我的下级指挥官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指示他们密切注视潜伏于战俘中的这种爆炸性局势。他们将在现有的条件下，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但仍可能远远不够”。

从5月25日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向共产党提出建议的这一天起到下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韩国政府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的谴责也一天比一天厉害。5月27日这一天的韩国报纸刊登了该建议的要求，这显然是在韩国政府授意下进行的。第2天，韩国外交部长在韩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做出的让步进行抨击，大会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李承晚。与此同时，板门店的韩国谈判代表崔将军也对以下3个条款进行猛烈抨击：即将不同意遣返的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将战俘一直扣押到政治会议召开或联合国大会可以对其做出处置决定之后，同意共产党人进入韩国境内。

向新闻界公布崔将军的声明一事，违反了全体会议的保密要求。虽然哈里森对崔进行了多方劝阻，但毫无效果。在崔将军宣布他不再出席任何保密会议和拒绝遵守保密规则之

后，哈里森别无他法，只好停止向韩国代表及其参谋人员透露保密情报。

随着韩国对立情绪尤其是韩国政界人士的对立情绪的高涨和从美国军方以及通过外交途径纷纷传来的各种不好消息，使华盛顿的首脑们开始对他们拒绝李承晚提出的签定双边防御条约的要求感到有些操之过急。5月29日，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同意由克拉克向韩国政府提出签定双边安全条约的问题，如果克拉克认为这样做可以扭转危险局势的话。第2天，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了这一决定。

这一迟迟决定只有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即没有得到李承晚马上接受的保证。克拉克和布里格斯一致认为，李承晚接受这一迟迟才做出的决定是肯定无疑的；但两人都认为，双边防御条约的签定应推迟到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5月25日提案作出答复和李承晚有机会对共产党的反应做出相应反应之后。

但在共产党尚未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提案做出反应之前，李承晚就给艾森豪威尔总统5月25日的信件送去了回函。令人不胜惊奇的是，这封信语调平和，只字未提在不同意遣返的朝鲜战俘和遣返委员会问题上的分歧意见，而是集中说明了要使韩国人民接受停战协定所必要满足的以下4个主要条件：第一，美国同意和韩国签署双边防御条约；第二，美国保证向韩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增强韩国的防御能力；第三，联合国军队和中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第四，朝鲜国土以外的美国空军和海军继续留在该地区，以便防止朝鲜再次遭到侵略。6月2日，克拉克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除所有非朝鲜军队全部从朝鲜撤出这一条外，他可以接受其他全部条件。但这个问题必须提到政治会议上讨论，除非是共产

党方面同意将其写入停战协定。克拉克没想到他们会承认李承晚的复函是令人鼓舞的和没流露出他有铤而走险的倾向。不过克拉克和布里格斯仍打算将其推迟到他们和李承晚再次会谈和下次全体会议以后。

第2天，华盛顿方面同意推迟访问李承晚的时间。柯林斯通知克拉克说，他和布里格斯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提出签定双边防御条约的问题。在6月的开头几天里，一切事情都是以共产党接受还是拒绝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为转移。虽然李承晚和联合国军司令部都希望敌人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5月25日提出的方案，但他们宁愿等到有把握时才采取下一步行动。

就在这一幕短短的插曲期间，出现了一个对后来事态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的事情，即李承晚任命他的亲信元容德中将为宪兵总司令。由于宪兵司令部受国防部长直接指挥而不受韩国陆军参谋长的指挥，从而将全部宪兵置于了李承晚的控制之下。

6月4日，当共产党方面表示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的绝大部分内容时，韩国政府再次掀起了反对签定停战协定的浪潮。这股浪潮正从两方面袭来。一方面是来自于李承晚下面的人，他们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发表煽动性讲话；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李承晚总统本人。6月5日，他在与克拉克和布里格斯会谈时，攻击停战协定是对共产党的迁就讨好，是共产党的胜利，是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步。而他对韩国今后要采取什么行动总是模棱两可不做出明确回答，并拒绝对签定双边防御条约后他是否就不再反对停战的问题表明态度。因此，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决定，在尚无比较合适的时机之前，他们对是否签定双边防御条约的问题也

不做出肯定回答。

6月6日，李承晚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其内容几乎和他4月30日写给克拉克的信的内容完全一样。他提出签定美韩双边防御条约之后，所有的非朝鲜部队同时撤离朝鲜半岛。但美韩双边防御条约必须规定：一旦韩国受到外来侵略时，美国保证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同时，美国的海、空军要继续留在远东地区。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韩国部队就将继续战斗下去。李承晚希望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团在板门店提出非朝鲜部队同时撤出朝鲜的问题，但要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共产党双方即将完成停战协定谈判之际来满足他的这一要求，已根本没有什么可能了。

李承晚发表上述声明后，艾森豪威尔总统马上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他在由克拉克6月7日转交给李承晚的信中表示继续支持停战谈判，并再次重申，美国保证在停战后继续给予韩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封信似乎没对李承晚产生什么影响。克拉克在这次与李承晚总统会谈后所提出的报告中这样写到："我从未见过李承晚象现在这样歇斯底里和反复无常"。李承晚在会谈时表示，他和他的人民是决不会接受停火的，而且从现在起他将完全按自己的意志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行动。但他拒绝说明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和何时采取行动。因此，克拉克不得不做出如下结论："只有李承晚自己才知道他会走多远。但毫无疑问，他会将这种讹诈一直持续到最后"。

6月7日，李承晚采取了第一批措施，宣布对整个南朝鲜实行所谓的"临时戒严"，召回在美的全部韩国官员。6月8日，战俘参考条款在板门店签定。此时，韩国的反停战运动亦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演讲和标语口号都贯穿着以下3

个主要内容：即统一朝鲜，释放反对共产党的战俘和用武力阻止准备接管战俘看守任务的所谓中立国家部队进入朝鲜。

正当韩国骚乱浪潮处于不断高涨时，泰勒将军访问了李承晚，并提出了缓和这一局势的条件。李承晚先对停战协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接着重申他准备单方面打下去。泰勒将军向他指出，由于韩国陆军的编制严重不足，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将其兵力配制到能够担负起保卫南朝鲜的任务。很显然，李承晚这时才想到停火和政治会议将为完成把韩国陆军扩充到20个师的计划提供时间。因此，他立即改变了语气，温和地对泰勒将军说，为了使朝鲜人民相信停战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他需要得到以下几方面的保证：１．最好将政治会议的时间限定为60天；２．和美国签定双边安全条约；３．将韩国陆军编制增加到20个师和发展韩国的海、空军力量；４．不准印度和共产党国家的代表进入朝鲜。但李承晚接着又说，对最后一个问题他尚未最后拿定主意，因此还需要认真想一想。泰勒得到的印象是，由于李承晚对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采取了极端立场，他为了摆脱困境和拼命想法给自己挽回面子，所以很有可能铤而走险。

在６月第２周中韩国发生了种种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李承晚在和泰勒会谈时为什么要采取那种叫人捉摸不透的态度。自从汉城的游行示威发生一部分中学的女生受伤后，他们便开始公开反对美国宪兵，虽然美国宪兵对这次流血并没有任何责任。但与此同时，许多朝鲜人已对战争感到厌倦，并且已经认识到单方面将战争继续下去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

６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致函李承晚总统，邀请李承晚总统到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一起进行高级会谈。据

传，虽然李承晚对此举感到高兴，但他仍以工作太忙为借口拒绝了。很明显，李承晚仍不准备进行谈判。但他邀请杜勒斯到朝鲜去访问，因为在朝鲜会谈他会占有心理上的优势，但遭到了杜勒斯的拒绝。杜勒斯提出了另一个方案，由全权代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S·罗伯逊访问韩国。6月17日，李承晚通知布里格斯说，能在朝鲜会见罗伯逊先生，他将感到高兴。

6月17日这一天，李承晚第2次召见布里格斯时，将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6月6日信件的复信交给了布里格斯。他在信中一方面对美国提出的援助和签定双边安全条约表示感谢，但同时又提出如果提供援助和同意签定双边安全条约是为了要他接受停火的话，则他是不能接受的。当天下午，李承晚向韩国第2军司令部的部分美军和韩国军官发表讲话时，对停战协定进行了猛烈的谴责。并重申韩国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

李承晚向韩国官员演讲时，再次隐隐约约地威胁和暗示，韩国将要采取阻止签定停战协定的行动。如果美国官方出面制止这种敌对或麻烦行动，则必然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由于同样的原因，李承晚也感到进退两难，因为他个人和美国很友好，并且对美国给予南朝鲜的帮助怀有感激之情。但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他又无法突然改变他对签定停战协定的反对态度。任何可以保全他面子的果敢行动都必然会使韩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虽然李承晚很难进行选择，但他又必须做出选择。

三、李承晚肯和

6月18日，李承晚宣布的决定进一步证实了克拉克的最坏估计。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表了这样一则短短的新闻公告：

"关押在朝鲜釜山、马山、伦山和尚武台等地的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大约25,000名反共产党的北朝鲜战俘于昨日午夜至今日拂晓越狱。

问题很清楚，这次越狱行动是由韩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手制造的，是他们秘密策划和精心布置的，是他们为这次大规模的战俘越狱提供了外援。担任战俘营看守的韩国陆军警戒部队根本没采取什么行动制止这次越狱。一切证据表明，这次行动是韩国看守人员预先和战俘串通好了的……。

在关押这些不同意被遣返者的战俘营中，美方人数很少，每个战俘营只有1名指挥官和几名管理人员。虽然他们尽全力阻止越狱行动，但由于韩国陆军看守和战俘串通一气，所以无济于事。由于参加这次越狱的战俘人数太多，加之又是在夜间，所以使用大量无毒的刺激剂也无济于事。被当场击毙的俘虏共9名，受伤的16名。美国人员无伤亡。

到今日下午1时，已有971名逃跑的战俘被重新抓获。

韩国陆军的看守部队已经撤离关押不同意被遣返者的战俘营地，美国部队正在进行接管。"

虽然美国的警戒部队迅速地接受了战俘营的看守任务，但形势对他们明显不利。因为在发生大规模战俘逃跑时，只准看守部队使用反暴乱措施而不得开枪射击。由于美国方面十分不愿意用武力对付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俘虏，所以只能使用无毒性的气体和其他一些非致死性的控暴方法。虽然在6

月18日的越狱行动中，有很多战俘获得了自由，但美国看守部队接管以后，这类越狱行动仍接连不断地发生，又有数百名俘虏逃跑。6月17日，这些战俘临时集中营内约有35,400名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但到这月底时，仅剩下了8,600名。他们获得自由的代价越来越高，在其逃跑时，有61人丧命，116人受伤。

李承晚通过单方面行动制造混乱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释放俘虏这件事合不合理，而是一心要通过这种突然行动对谈判施加影响。虽然克拉克早就知道李承晚随时都有可能释放不同意遣返的战俘，但他却仍对李承晚总统说，他对李承晚不遵守过去亲口向他做出的“在没有通知他以前，凡是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下的韩国军队不会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诺言感到“非常震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件重复克拉克的指控后宣布：除非李承晚马上同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签定停战协定的条件，才会考虑他提出的各种要求。

克拉克的指控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击中要害，因为李承晚做出的许诺是指韩国军队退出联合国军。自从李承晚任命元容德将军担任宪兵司令以后，他已将担任战俘营看守任务的警戒部队置于了他的控制之下，因为元容德将军只执行韩国国防部长和李承晚的命令，而不执行韩国陆军参谋长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谈到提前给克拉克打释放战俘的招呼问题时，李承晚指出：“要是我预先向你透露了我准备释放他们的消息，一定会使你感到为难的。而且，整个计划会被彻底打乱”。

尽管韩国政府打算释放所有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但李承晚并不主张动用军队，因为他和美国官员都不愿意韩

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根据克拉克提出的不要释放不同意被遣返的中国俘虏和全部共产党俘虏的要求，李承晚总统同意不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由于不知道李承晚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加之关押不同意被遣返者的战俘营中的微妙局势，使得6月的下半个月的形势非常不稳定。大部分逃跑出去的战俘都混杂在当地的居民当中，加之又有韩国当局向他们提供援助，因此要重新抓获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在韩国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联合国军与逃跑战俘暗中勾结的报道。因此，克拉克不得不在6月21日发表严正声明，否认他知道或支持释放不同意被遣返的战俘。

为了防止共产党方面进行类似的指控，哈里森已在发生越狱的当日即6月18日马上将此事通知了南日，并将责任完全推给了韩国政府。但是敌人根本不相信联合国军司令预先不知道此项计划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没就这项计划的执行与李承晚达成一致默契。尽管如此，共产党方面并未威胁要中断谈判；按理说，他们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相反，他们却提出了好几个真正击中要害的问题：即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够控制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吗？如果不能的话，朝鲜停战协定还包括李承晚集团吗？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又怎样保证南朝鲜方面遵守停战协定呢？共产党方面有权要求对上述问题做出答复，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根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因为只有李承晚才能够提供这方面的情报。但他对此似乎是置若罔闻。

6月20日与泰勒会谈时，李承晚总统对第8集团军司令尚未忘记对他6月9日提出的4点要求做出正式反应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因为他显然已经忘记他当时未准备向他们提

出正式主张。这次会谈时，他明确表示签定停战协定将使他获得进一步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彻底自由，但他拒绝说出他可能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一方面进行威胁，但另一方面又舍不得今后可以做成的交易。他这种复杂心理状态表明，他尚未把讨价还价的大门关死。

2天后，克拉克在访问李承晚时发现他的神情有些紧张，但是显得非常友好。克拉克和泰勒交换看法时，两人都觉得全世界对李承晚单方面释放战俘的不好舆论正在对李承晚产生影响。克拉克单刀直入地对李承晚说，他必须接受美国决心签署体面的停战协定和不准备用武力将共产党部队赶出朝鲜的条件。在谈到李承晚6月9日提出的4点要求时，克拉克说，第一，不应该限制政治会议的时间；第二，美国可以和韩国签定双边安全条约；但如果韩国侵略别国，美国决不同意对其进行援助；第三，同意扩充韩国军队；当谈到第4点即最后一点时，克拉克说，可以对战俘协定进行些修改，但声明这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剩下的8,600名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可以继续由联合国军看管，韩国代表将得到充分的机会向他们解释参照条款。向遣返委员会移交这批战俘时，可以将他们送到非军事区；当共产党的解释人员举行会议时，韩国代表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非共产党中国战俘可以移交给中立国看守，以便最后处理。克拉克对李承晚说，这样安排就排除了印度或共产党人进入韩国后方地域的问题。

接着，克拉克对韩国陆军的状况坦率地发表了意见。他认为，目前韩国陆军既无单方面进攻也无单方面防御的能力。因此，尚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才能担此大任。

克拉克发现，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李承晚听得津津有味，

而且对他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显得很感兴趣。克拉克认为，虽然李承晚不愿表态，但他让人可以很容易觉察他的态度。尽管他不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因为这意味他对分裂朝鲜的承认，但李承晚总统表示赞成签署停战协定。因此，克拉克马上向美国政府请示，他是否继续向李承晚提出他过去已经提过的建议。

在华盛顿的指示尚未下达之前，克拉克对他提出的有一条建议作了如下修正：即不将不同意被遣返的中国俘虏移交给中立国，而按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俘虏的同一方式将他们遣送到非军事区，将不愿意回国的全部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派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前往朝鲜，并通知克拉克，待这两位使者到达朝鲜后，和他们一起讨论停战协定的修改问题。美国驻远东的军事与外交头目和罗伯逊与柯林斯于6月24日在东京会晤，参加会晤的全体人员一致赞成应尽快签署停战协定。克拉克和墨菲认为，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明确保证李承晚将遵守停战协定的所有条款，敌人也会同意接受。

华盛顿在同一天举行的会议上，收到了这次会晤的报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的顾问们说，由于克拉克身临其境，最能对形势做出估计，因此应给与他充分的权力去缔结停战协定。6月25日向克拉克下达的指示说，只要他不在反对强迫遣返的原则上让步和不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强迫韩国接受停战条件，他可以按自己的意见处理其他问题。华盛顿的首脑们指出，对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问题决不要表态。但是，如果克拉克认为这样做有好处的话，他可以让韩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联合国军打算从朝鲜撤出。

庆祝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的游行和演讲结束之后，罗伯逊差不多天天与李承晚会晤。其主要任务是澄清可能破坏美韩团结的误解和向李承晚总统保证美国将继续保持与韩国的友谊和关心韩国的未来。但他很快发现，韩国政府深感忧虑的是，担心联合国可能对战争感到厌倦并可能准备牺牲韩国。正如罗伯逊在后来的报告中所说，美国及其盟国在释放战俘的问题上吃够了苦头，这次南朝鲜也捞到了担惊受怕的难受滋味。

在6月27日的会谈中，虽然李承晚承认艾森豪威尔总统满足了他提出的全部条件，但他要求马上签署书面协定，并且提出了新的条件和改变了他原来做出的保证。

在李承晚与罗伯逊继续进行私下会谈时，克拉克则根据他得到的许可努力加速停战协定谈判的进程。他在6月29日写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中，试图回答共产党所提出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指挥韩国陆军，但不能控制韩国，因为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谈到停战协定是否包括李承晚政府时，克拉克提醒他的对手说，停战协定只是双方军事指挥官之间达成的军事协定。由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得到韩国政府的合作，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和有关联合国成员国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取得韩国的合作和建立军事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证各条款的执行。克拉克建议双方代表团立即会晤讨论最后一些问题。

当外交谈判拖延到7月初时，克拉克和哈里森都变得不安起来。他俩认为，已经到了终止韩国政府发言权的时候了。克拉克将军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李承晚做出的让步已经到顶了。因此，应该让李承晚知道不会再对他做出任何让步了。根据他6月25日得到的可以让韩国政府看出联合国

军准备撤出朝鲜的许可，克拉克于7月5日告诉国防部长，他已经开始了对韩国施加反压力的行动。他召开了高级指挥官会议，一部分部队已开始移动，增加了看守战俘营（关押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的力量，放慢了向南朝鲜运送补给和装备的速度，中止了扩建最后4个韩国陆军师所需装备的装运工作。今后，还准备削减使用当地民工的各项工程。陆军和海军的活动旨在给韩国政府造成一种联合国军正准备从朝鲜撤走的印象。克拉克认为，随着联合国军准备即将撤离朝鲜的迹象的日益明显，肯定会对李承晚及其顾问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就在7月5日当天，克拉克所采取的上述措施中，有一项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泰勒将军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表示，如果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后韩国政府还决定打下去的话，他就从战线上把联合国军的部队撤下来。他接着又指出，第8集团军如同一部20个汽缸的汽车，是由电线和齿轮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如果联合国军一撤走，留下的韩国部队就得照此再造一部全新的汽车。这番话的含义非常清楚，即如果韩国政府要单方面将战争打下去，它必然要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韩国陆军的整编。

美国要继续进行停战谈判的决心是和罗伯逊耐心而机智地与李承晚秘密会谈相呼应的。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那样，“他日复一日地与这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但又顽固不化的老头子就他要一意孤行地将战争打下去的害处进行辩论。他向李承晚保证，如果李承晚能够做到通情达理的话，就一定会得到美国的援助”。李承晚担心停战后的政治会议无限期地开下去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会起到掩盖他们向南朝鲜进行反面宣传的作用。为了消除李承晚的这些疑虑

和不安，罗伯逊表示，要是果真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就会以“这是一种骗局和阴谋”为理由终止会议。

正当罗伯逊努力设法消除李承晚总统的疑虑的时候，共产党方面的联络官终于在7月8日对克拉克早就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要求作出了答复。金日成和彭德怀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战俘越狱逃跑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仍感到特别怀疑，而且对李承晚及其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猛烈的谴责。虽然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解释罗列了一大堆保留意见，但在最后一段里都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句子：“总之，尽管我方对贵方的答复并不感到完全满意，但考虑到贵方表示了争取早日签署停战协定的愿望和鉴于贵方做出的各种保证，我方同意双方代表团约定时间会晤，讨论停战协定的落实问题和签署停战协定前的重要准备工作”。虽然“同意”两字是转弯抹角地说出的，但共产党同意在韩国局势仍处于变幻莫测的情况下恢复谈判这一事实，说明他们是何等地希望早日签署停战协定。

共产党同意恢复板门店谈判和联合国军司令部针对韩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击措施，显然对李承晚产生了作用。因此，罗伯逊才得以在3天之后结束了他与李承晚总统的会谈。罗伯逊在7月12日离开朝鲜回国时，收到李承晚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赞扬罗伯逊助理国务卿的出色工作和“他宽怀大度的高尚精神”。李承晚还在信中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尽管他对签署停战协定会引起什么长期后果表示担心，但他不会在落实停战协定条款的过程中设置障碍”。

美国方面对李承晚上述许诺作出的反应是向他提出了以下5项保证：第一，同意在停战之后签署美韩双边安全条约；第二，保证长期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首期援助金额为

2亿美元；第三，如果政治会议在90天内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同意美国和韩国退出会议；第四，同意继续有计划地扩建韩国陆军；第五，同意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美韩双方就共同的目标举行高级会谈。

以上是美国方面做出的一些重大让步。只不过在谈判过程中，李承晚也放弃了他先前提出的许多要求。由于他同意不给签定停战协定设置障碍，因而也就放弃了坚持中共军队撤出朝鲜和签定停战协定之前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另外，只要朝鲜国土上不驻扎任何印度军队，他不再反对在解释期间把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和中国战俘送到非军事区。

李承晚的故事至此尚未结束。在停战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仍象过去那样地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比过去要小而已。由于他在做出不阻挠签署停战协定的许诺时附有许多保留意见，因此他仍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并有好几次使美国及其盟国感到忧虑不安。但自他在信中表示原则上同意缔结停战协定的条件之后，他支配停战谈判的时期已经过去。

李承晚这位老练的战士通过其斗争所赢得的一切都是难以一时实现的，因为他争取美国支持他用武力统一朝鲜和要求中共军队撤离朝鲜的计划均未如愿以偿。另一方面，他已经得到了美国同意签署美韩双边安全条约和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的保证；释放了战俘营中数千名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成功地限制了印度人和共产党人进入南朝鲜的国土。由于与共产党在板门店的谈判正面临着微妙的局势，所以为了不再发生不测事件和让李承晚保住他在南朝鲜人民中的面子，美国不得不在若干方面满足李承晚的要求。李承晚还向世界证明，韩国并非一个傀儡国家。但与此同时，李承晚为了阻挠签署朝鲜停战协定而采取的种种策略和行动非但未帮

李承晚的忙，反而倒使他失去了希望结束朝鲜战争和流血伤亡的世界各国朋友以及它们对韩国政府的信赖。韩国政府利用演讲、广播电台和报纸等群众性宣传工具煽动人民反对停战的情绪、组织和鼓动群众举行反对停战的游行示威。这些活动固然取得了一时的效果，但从长远观点看来可能会使李承晚失多得少。本来，美国是愿意以满足李承晚的全部合理要求作为他接受停战协定的条件的，但韩国政府为了公开向美国施加压力所采取的种种行动只能使美国难于做出更多的让步。现在回顾起来，要是李承晚当时通过外交途径，本来是可以得到他最后争取到的一切的，而且也不会给共产党看到联合国军各奔一方而幸灾乐祸的机会。因此，谁会相信他是在为其国家目标而献身！谁会相信他是在真诚地追求这些目标！当然，他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和做出的决断确实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攻势

正当联合国军司令部试图解除李承晚及其政府对停战的疑虑和担忧时，共军一直没有等闲视之。联合国军防线背后的动荡局势给敌人利用这些分歧获得心理上和宣传上的优势提供了机会。另外，尽管空军第5航空队一直在设法切断交通线，但战斗平静的冬季使共军能够集中弹药和物资的贮存和使其作战部队的编制满员。由于给养充足、装备精良和经受过战争锻炼的部队可以投入使用，所以使共军处于发动军事攻势的有利地位。如果共军对联合国军防线的攻击取得成功，就可能在全亚洲人的心目中普遍形成共军已在战争中赢得军事胜利的印象。假如共军采取这一方针，他们将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尤其是确定发起进攻的时机和选择攻击目标。除非是可以把这种胜利和缔结停战协定密切联系起来，就可以对共军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至于夺取地形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显然，共军要想实现军事胜利，就必须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否则，他们沿前线丢失更多领土的危险将比联合国军大得多。正如后来的形势发展表明，何时发起攻击和何地结束攻势可能是敌人1953年春制定军事计划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初　　战

4 月，当板门店的谈判代表在商定交换伤病俘虏和恢复全体会议的细节时，放慢了进攻速度。3 月的那种激烈战斗行动重新为冬季那种典型的小规模试探和袭击行动所代替。敌人很少以 2 个连以上的兵力发起进攻，经常是以 1 个连或不到 1 个连的兵力发起进攻。由于 4 月是解冻期，泥泞的地面有利于限制行动的规模，谈判的形势变化多端也是一个因素。根据第 8 集团军的情报报告，估计敌人将继续以部署在前线或接近前线的29个师实施积极防御，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发动全面的攻势。

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有一些影响，尤其是对战略性空中行动的影响。韦兰将军打算进行空中袭击，4 月中旬用B—29型飞机向鸭绿江口附近的杨市目标群发起夜间袭击，克拉克于 4 月12日批准了这个计划。由于正准备将伤病俘虏集结在该地区后运往板门店，所以他的上级决定推迟这次行动。他们不希望给共军任何不履行战俘交换的借口。准备在10天之后向平壤以东50哩的谷山设施发起的另一次袭击也因同一原因被推迟。

对于近距离的空中支援，谈判对其的影响不大。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只要有机会就继续向敌军及其据点发起攻击。

4 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们集中实施切罗基式任务，攻击炮火射程以外的目标。他们发现，在同一地区连续飞行数天可以使他们熟悉地形，而且有助于遏制附近地区的防空火力。显然，共军的炮手不能迅速得到再补给，一

旦他们发射完手边的炮弹后，只好坐下来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也没有。

4月21日，海军喷气机驾驶员得到了一次选择目标的机会，美国航空母舰奥里斯坎尼号上的飞行员选择了朝鲜东北面的咸兴公路桥作为攻击目标，并成功地摧毁了第2孔桥和损坏了第3孔桥。从朝鲜东北部铁路沿线的海军夜间战斗机巡逻队传来了一份有趣的报告，2架战斗机追击着敌人2列开得飞快的火车，一直到它们对开入一个不长的隧道里。火车从视线中刚一消失，只见一股蒸气和浓烟从隧道里涌出，表明2列火车可能相撞和遭到破坏。

随着伤病战俘交换的完结和板门店全体会议的召开，限制联合国军空军部队的重要理由不复存在了。由于会议表明，共产党不打算马上达成协议，所以克拉克批准了韦兰提出的如下要求，即通过轰炸北朝鲜的重要目标增加对敌人的空中压力。5月10日，8架雷电式喷气机不顾敌人强大的防空火力，再次轰炸了细湖发电站，但没有炸毁仍在发电的两台发电机。对杨市目标群的攻击计划因交换俘虏被推迟，直到5月10日至11日夜间由39架B—29型飞机向其发起攻击，8天后由18架B—29型飞机再次轰炸了这个地区。

这场战争中最富于戏剧性的进攻之一发生在5月13日。在平壤以北大约20哩处有一很大的独山灌溉堤坝，其后有一面积为3平方哩的湖。空军作战计划人员早就认识到，破坏灌溉堤坝将使北朝鲜的水稻受到严重影响，但从人道主义上考虑是不能轰炸这种目标的。然而，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稻谷成为军火和国际间的交换物，这一情况使反对炸毁水坝的意见减少了。由于水坝靠近新安江至平壤的铁路干线和横贯南北的主要公路，所以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目

标。结果，5月13日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的59架F—84雷电式喷气机分4批出动去摧毁这座水坝。头批出动的4架飞机的跳跃式轰炸只炸开了2300英尺长的水坝表面，第2批出动的4架飞机的炸弹落在了水边，第3批出动的12架喷气机是沿着水坝进行轰炸，第4批出动的飞机接近水坝的水边飞行，企图通过炸弹爆炸产生的水压摧垮水坝。飞机飞回了基地，但水坝仍照样屹立在那里。但在后来的一个夜晚，因受到破坏的水坝承受不住湖水的压力，洪水倾泻而出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破坏。6哩多长的铁路线和5座铁路桥被破坏或摧毁；2哩长的公路和5座公路桥也遭到了同样下场，建筑物、庄稼和灌溉渠被一泻千里的洪流洗劫一空。为庆贺独山任务的成功，空军第5航空队接着在5月15日至16日又炸开了位于平壤之北楚山上的另一个水坝。因此，切断了第2条铁路线和冲毁了3座铁路桥。5月21日至22日，企图破坏平壤地面的一个水坝的第3次尝试表明，敌人已做好了还击的准备。只要B—29型飞机一扔下炸弹，共军就把水位降低12英尺，以减低水压。后来的一次袭击迫使敌人将湖水排尽以便修复水坝。结果，虽然未遭到洪水的破坏，但储水都流得一干二净。平壤北面的铁路线直至5月26日才重新投入使用。因此，这可能给敌人的交通线带来了短期的压力。

共产党通过这次吸取了教训，因此在6月企图再次重获过去的胜利时，发现敌人迅速地将受到攻击的水库的水排放掉。虽然水库的水流走了，但避免了洪水灾害。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由于中共军队有了苏联制造的喷气式轰炸机，所以共产党的空军部队随时都可能进行报复。但他们要进行报复的一切努力均未成为事实。和过去一样，敌人还是将他们的空军集结在满洲里的大本营中，没

有打算真正地向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制空权进行挑战。

而共军则坚持他们过去常常施加的那种压力，即发动地面攻击。5月上半月很平静，此后敌人发动了一连串从连到团规模的有限目标进攻，其中18次是营或营以上规模的进攻。尽管前线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但仍无迹象表明共军要将战争的规模扩大成为全面的攻势。他们似乎主要是打算集中攻占前线一带的制高点，以改变他们在战场上和板门店谈判帐篷中的形势。

敌人在5月底向美军第1军的防区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5月初由塞缪尔·T·威廉斯少将指挥的美军第25师被调到第1军和美军第2师换防，很快地接替了前线的第1海军陆战师。新第25师的防区主要位于板门店东部和汶山里的东北部。在板门店东北和汶山里以北大约10哩处的一些地形不高的高地上，布防了许多称为内华达系统的前哨阵地。威廉斯将军于5月5日将守卫这些阵地和柏林与东柏林这两个友邻前哨的任务交给了赛里阿卡准将所指挥的土耳其陆军司令部配属部队。

土耳其部队的对手是中共军队第46军第120师的358、359和360 3个团。由于敌人在3月攻占了雷诺警戒线，除了例行的侦察和巡逻活动外，这一地区仍保持着平静。但中共军队所具有的从雷诺警戒线和附近的其它高地向贝加斯、埃尔科和卡森警戒阵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构成了长期的威胁，因此需要随时保持警惕性。

从战术上看，要是敌人控制了内华达系统将意味着他们能更好地观察位于其南面和东面的第1军的主要防御阵地。第1军认为这些防御阵地十分重要，所以命令土耳其部队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如果中国人决心要拿下前哨阵地，土耳

其部队的任务就是十分艰巨的，因为中国人离主防线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敌人的接敌路线比第1军的容易。

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停战谈判中提出其最后建议后，直到5月25日中共炮兵部队才开始向内华达目标群炮击。在以后3天中，敌人发射的炮弹数是越来越多，敌军部队在这一地区的运动也增加了。为了反击共军的密集火力，阿卡将军除有25师的炮火支援外，还得到了第1军和第1海军陆战师的炮火支援。第1海军陆战师坦克营的34辆坦克开入阵地，以给前沿阵地汇集成直接火力支援。

第1次攻击于5月28日傍晚开始，守卫前沿阵地的土耳其部队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和得到了充足的武器。到处都是有刺铁丝网、绊索、照明弹和地雷，自动武器的发射地对准着敌人的进攻路线。守卫在贝加斯、卡森、埃尔科、柏林和东柏林等警戒阵地上的人数分别为140人、44人、33人、27人和16人。

一阵猛烈的大炮和迫击炮袭击之后，共军第120师紧接着派出4个营的兵力，其中2个营向东面的主要目标贝加斯阵地进攻，1个营向南面的卡森和埃尔科阵地进攻，另1个营向柏林和东柏林阵地佯攻。最后1个营在傍晚前受命停止和撤出了战斗。

尽管用重型自动武器、轻型武器、火炮和迫击炮对贝加斯阵地进行袭击，中国人仍成功地攻占了高地上的一小块地方，并死死地坚守。土耳其部队派出1个加强排支援，他们及时赶到，帮助那里的守卫部队击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经调整后，中共军队再次派出大约2个营的兵力夺取这个阵地。由于弹药开始减少，土耳其第2营营长又将1个排和朝鲜勤务部队补充到待命的部队。战斗暂停一会儿之后，敌人

又发动了进攻，这次中共军队冲入战壕展开了肉搏战。

同时，中共军队在向卡森阵地和埃尔科阵地进攻时，又另增加了1个营的兵力，并逼近到土耳其军队的阵地前。土耳其军队用刺刀和手榴弹进行反击。营长先派1个工兵排，后又将工兵连的其它部队投入到守卫卡森阵地的战斗。午夜刚过，进攻的速度便放慢了。但观察哨报告，敌人正在集结第3个营的兵力，准备一起投入攻击。土耳其部队第1营和美军第35步兵团的火力支援帮助击溃了这个增援的敌军营。

中共军队对埃尔科阵地的连续进攻一直持续到天亮以前。在卡森阵地上的土耳其士兵1个接1个牺牲。剩下的少数人设法到了埃尔科阵地加入到守卫在那里的部队，但大多数都因中弹死在了战壕和地堡内。中共军队在清晨占领了卡森阵地。

确信中共军队决心夺取内华达前哨阵地后，威廉斯将军将美军第14步兵团的第1营调给阿卡将军指挥，以便后者可以将其预备队投入战斗。

敌人逐渐控制了贝加斯阵地的西北部，土耳其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大。为了挫敌锐气，土耳其军队发起反攻，以肃清高地上的敌人。接着他们和敌人展开了残酷的近战，终于慢慢将贝加斯阵地上的敌人消灭干净。

中共军队毫不气馁，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增援进攻部队，然后又发起进攻。他们一步步地向贝加斯高地移动时和土耳其军队发生了遭遇。这些不屈不挠的土耳其士兵寸土不让。5月29日上午，土耳其军队的4个排的兵力发起攻击，用刺刀消灭了贝加斯高地上的全部敌人。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一批又一批的人向土耳其人的阵地冲锋。因此，双方的伤亡急骤地增多。

争夺埃尔科高地的战斗从5月28日晚一直持续到29日早晨，因为敌人对留在高地上的土耳其部队增加了压力。阿卡将军命令第14步兵团第1营营长卡尔·E·曼中校派出1个连增援埃尔科高地，并在5月29日上午夺回卡森高地。B连从东南面靠近埃尔科高地，越过前哨阵地周围共军占领的地方，经过25分钟的战斗就夺回了卡森高地。

B连通过2个排进攻，2个排支援向卡森高地西面推进。在埃尔科和卡森高地之间，B连遭到重型自动武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击，进攻速度减慢，最后只得停止。B连向埃尔科高地撤退时，两次集结足够的兵力想从卡森高地上中共军队的火力网中突围出去，但每次都失败了，不得不退回。联合国军的大炮、迫击炮和自动武器既没有压住中共军队的火力，也没有把敌人从阵地上赶出去。

第3次攻击停止后，共军开始反击。他们曾6次从卡森高地向埃尔科高地发起进攻，有几次推进到手榴弹的杀伤范围内。B连在大炮、坦克、迫击炮和自动火力的有力支援下，每次都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埃尔科高地仍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下。

下午3—4点钟，威廉斯将军和布鲁斯·C·克拉克中将明显地感到中共军队仍准备继续进攻，直到夺取前哨阵地为止。贝加斯高地上只剩40多个人了，其中大多数都已受伤，埃尔科高地上只剩下20多人。在内华达目标群保卫战中，有150多人牺牲，245人受伤。另一方面，据估计，中共军队大约有3,000人伤亡。问题是，在两翼的伤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联合国军是要继续坚守前哨阵地，还是从上面撤离下来以便更多地保存联合国军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认为，前哨阵地已经达到了其推迟敌人进攻的主要目的，于是

在5月29日傍晚命令土耳其部队撤离贝加斯高地、美军部队撤离埃尔科高地。

双方的损失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为了顶住中共军队的顽强攻势，共发射了117,000多发炮弹和进行了67次近距离空中支援，以支援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敌人发射了65,000多发火炮和迫击炮弹，这是敌人在朝鲜战争中发射炮弹最多的一次。

敌人在联合国军司令部5月25日在板门店提出建议后所发动的顽强进攻，表明共产党已开始沿预期的停火线抢占有利地形。敌人显然未被伤亡所吓倒，当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时，敌人好象准备不惜一切地使用部队和精心贮备的弹药。

二、形 势 突 变

6月初，泰勒将军在密切注意敌人集结准备发动进攻的兵力时意识到，第8集团军防线的最薄弱环节是美军第1军和第9军的防区。正如他6月2日对克拉克所指出的，临津江和汉滩江以北的联合国军阵地不是选来增加防御强度的，而比较浅近的突破将迫使联合国军拉回到两条江的背后；如果敌人不惜代价的话，他们是能够将第8集团军的部队推回来的。如果这样的话，泰勒接着说道，他将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丢失了领地，二是进行代价高昂的反击以重新夺回阵地。泰勒已做好发起进攻的准备，已通知后备部队处于待命状态，第5航空队增加了照像侦察的次数，扩大了弹药的贮备量。但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在强大的压力面前，第8集团军能在目前的战线上坚持多长时间。

然而，共军并没有选择在第8集团军两翼的防守薄弱环

节发起进攻，他们首先是在第8集团军防线的东翼和中部发起攻击，因为这里是韩国军队集中的地方。6月1日敌人从韩国第12师、美军第10军手里夺取了离“香酒碗”东北4英里处的812高地，3天后又从韩国第1军手里夺取了铁锚高地。面对韩国军队的猛烈反攻，北朝鲜部队不顾严重伤亡，继续增援牵制部队。鉴于韩国军队的伤亡越来越大，联合国军决定停止为收复铁锚高地和封锁812高地的进攻。先对812高地周围全部阵地进行协调后，然后对北朝鲜军队所控制的1,000平方米的山头集中用重炮轰击和近距离的空中攻击。据联合国军司令部报道，敌人为了守住这个不大的高地，在6月7日至15日被迫投入了大约7个营的兵力。

6月8日就俘虏交换的参考条件达成协定后，共军发动了自1951年春季以来的最大攻势。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韩国军队的防御地段。共军从6月10日开始将其进攻重点从第8集团军防线的中部和东翼转向韩国第2军和西线上的第10军。

据后来报告，敌人采用的是常规进攻方式。进攻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并选择近似于预期目标的地形进行了认真的演习。在真正发起进攻前，先用火炮和迫击炮对目标进行轰击，然后以小部队迅速穿插以实施正面进攻。其它部队集结于目标的侧翼，直到强行突破时止。一旦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就会迅速地利用它。

敌人的目标是第8集团军防线上的凸出部。这条防线从金化东北大约3英里处开始，由此向东北至金城南面的高地后成水平向东延伸大约10英里，再向东南延伸大约13英里至汶登里村庄，最后一直到伤心岭的西北侧。其地势非常险峻，西部的高地约400—600米高，突出部分东端的高地高达

1,000米以上，所以这个防御地段的韩国军队要维持两侧的交通非常困难。共有5个韩国师守卫在这个突出部分的阵地上，即配属美军第9军的韩国首都师在其左翼，韩国第2军的第6、8、5师位于中部，配属美军第10军的韩国第20师在其右翼。韩国第3师为第2军的预备队。

韩国部队面临着中共军队的3个军。6月初，敌人已将中共68军调来并部署在60军和67军中间。另外，又将33师配属给60军，从而增加了战斗力。这样，敌人就能以在后方的类似地形上训练过的4个师的兵力向凸出部发起攻击。

在6月的头10天中，在中部前线的敌人似乎显得很平静。6月10日傍晚，突然发起猛烈的炮火。随后，中共军队以营、团的兵力向韩国第5师控制的地段发起攻击。共产党方面开始用68军和60军增加对联合国军防线的压力。中共军队突破前哨阵地后攻占了距伤心岭西北10英里的973高地和882高地以及部分主防线。6月11日，韩国第2军迅速将第3师的22团调给第5师指挥，以对付敌人的袭击。韩国第35团的所属部队为重新夺回973高地发起了反攻，但只赢得了部分胜利。敌人的部队马上又开始反攻，迫使韩国部队向973高地以南撤退了1,000米。22团的2个营试图在同一天收复882高地，并打算接近山顶和构筑工事。6月12日，韩国第5师用22团、27团和35团发起反攻，但未能将中共军队赶出这些高地。由于猛烈的大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火力，加上敌人不断增援其部队和反击韩国的先头突击部队，因此使联合国军部队无法收复他们失去的地区。

6月12日，中共军队向韩国第5师左翼的韩国第8师发起攻击，以进一步增加对韩国第2军的压力。位于973高地西北6英里的国会山地段是由第21团守卫的。共军开始以2

个连，后又增加3个连先后突破了该团的前沿阵地和主防线上的阵地。韩国第10团的2个营于6月13日清晨发起反攻，但未能回到最初的防线位置。当天下午，估计有2个连的敌人发起的另一次进攻，迫使韩国部队放弃了1个连阵地和进一步后撤。

第二天上午，中共军队继续以几个连的兵力发起攻击，以保持对21团的压力。虽然韩国部队击退了这些进攻，但在6月14日晚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开始，中共军队的1个加强营包围了21团的第3营，并分成独立作战的小股部队收复联合国军的防线。然后敌人以2个连的兵力进攻第1营主防线上的阵地，迫使第1营后撤。第3次进攻是由1个加强营发起的，并成功地包围了第2营。第21团剩余人员集结在防线的后面，建立了一道新的不长的主防线。

在韩国第5师的右翼，守卫882高地东南4英里处称为圣诞山地段的是美军第10军的韩国第20师，他们也遭到了敌人的进攻。6月10日，中共军队第33师的2个连攻占了圣诞山地区的1220高地要道上的1个连的前沿阵地。韩国第61团反攻时重新夺回了1220高地，但后来又丢失了。由于韩国第5师的前线形势越来越吃紧，所以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去收复1220高地。迹象表明共军打算坚守973高地和882高地。由于这两个高地位于从西通向1220高地的主峰，所以第10军军长伊萨克·D·怀特中将将韩国第7师和军后备队部署在韩国第20师的左翼。

当韩国第7师向北推进时，第61团曾几次努力减轻韩国第5师所受到的部分压力。由于中共军队迅速做出了反应，因此，每次进攻都遭到挫折。

6月14日，中共军队第33师再次向韩国第5师和第20师

发起进攻，迫使他们后撤到北汉江以南。这一撤退暴露了刚到达其防线的韩国第7师的侧翼。幸运的是，中共军队这次未能以足够快的速度组织起他们的进攻部队。在韩国第7师重新调整其前线阵地并和第5师所建立的新阵地连结在一起时，第10军的火炮和空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集中攻击了韩国第5师正面的敌军部队。在第5师的另一侧翼，韩国第8师也不得不于6月15日后撤1英里多，以便使其主防线和第5师的相连接。

韩国第3师的其余2个团于6月15日受命沿北汉江南岸守卫第8师东侧的防御地段，以便增加韩国第5师左翼上的力量。由于韩国第3师接管了防御阵地，所以韩国第22团重新归其原部队指挥。同时，韩国第5师被配属给第10军，负责北汉江的东部地区。于是，第10军马上努力加快对韩国第5师的补给和装备速度以及补充所损失的兵力。由于横向道路很少，所以调了12架H—19型直升飞机支援。这些直升飞机向前线运送了25万磅的物资。6月16日，韩国第11师由韩国第1军地区调到韩国第2军作为其后备部队。

后来的几天，战斗逐渐减少。在北汉江西部韩国第8师的防区，敌人6月16日越过了国会山高地东部2英里手指岭上的韩国第10团的前沿阵地，但中共部队于当晚脱离接触和撤退了。这一天，韩国第21团击退了敌人几次连规模的进攻。后来，在韩国第6师19团的支援下，韩国第21团发起反攻时敌人便撤退了。中共军队的2个连突破了手指岭东南第8师16团主防线上的阵地，但他们没有企图继续向前突破。到6月16日傍晚，敌人只是零星地向第8师的正面发起攻击。

以后2天，中共军队向韩国第20师和8师发动了几次较少的攻击，稍有些突破。6月18日，形势开始稳定下来，所

以第8集团军有机会检查9天攻势给其造成的损伤。

敌人迫使韩国部队沿着13,000米的前线平均后退了3,000米，并占领了北汉江东部的一些高地。中共军队这次攻势的结果，调动了韩国3个师来增援和反攻。在这次战斗中，韩国军队有7,300多人伤亡，共军的伤亡估计在6,600人以上。在联合国军的密切支援下，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一共出动了810架次。因此，战略空中计划被推迟。

沿第8集团军前线的其它地方，中共军队对美军第9军的防线发起了一系列佯攻，以保证在其主攻时充分牵制住第9军的力量。在韩国第9师的防区，中共军队第24军的第70师于6月11日以3个连向狙击岭上的前沿阵地进攻。第2天敌人2个连突破了飞镖岭地区及狙击岭以西4英里该师主防线上的阵地。这次战斗中，中共军队得到了好几个连的增援。在敌人停止攻击前，韩国军队有6个步兵连和1个坦克连。6月13日夜间，中共军队在同一防区内参战的是第70师的3个营，第2天参战的有3个多营的兵力。敌人每一次都没有守住他们占领的地方，在天亮前他们都撤回到自己的防线上。对飞镖岭的3天攻击，中共军队第70师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估计有2,200多人伤亡，其中被击毙的近2,000人。

位于韩国第9师左翼的美军第3师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6月10日，中共军队第74师不断向杰克逊高地东南2.5英里的哈里前哨阵地发起攻击。中共军队开始用1个连进攻，后来又增加了2个营，终于突破了防线。经过一次接一次的反攻，美军部队于6月11日上午开始出现在哈里前哨阵地上。当天夜间敌人大约用1个团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前次遭遇战的形式再次重现。6月14日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6月18日以2个营发起进攻，但最终结果都一

样。据第3师估计，敌人在攻占哈里前沿阵地的9天中伤亡了4,200人以上。

在铁原西北5～6英里的箭头防区（281高地）内，韩国第2师于6月11日采用了连规模的进攻。第2天，敌人以大约1个营的兵力夺取了白马山地区的3个前沿阵地，但并未占领很长时间，他们在第2天清晨又退回到自己的防线。

在中共军队大举进攻期间，美军第1军和韩国第1军的防区都十分平静，仅有一些小部队的巡逻和试探性行动。6月18日以后，整个第8集团军的前线又恢复到原来的平静状态。

就在这一天，李承晚释放了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因此，给停战谈判和军事行动的进程带来了前途莫测的新问题。假如共军发动的进攻行动如联合国军的部分军官所认为的那样是与最后几天战争的巧合，他们显然是为了在结束这场长期战争时取得政治和心理上的优势，韩国政府旨在推迟缔结停战协定的宣传行动肯定会遭到失败。如果停火被长时间推迟，共军的6月攻势就完全可能成为过去的历史，敌人在快结束战争之前可能会发动另一次攻势。因此，以后重新燃起战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由于韩国陆军最近一直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在今后的共军压力面前他们很可能不得不首当其冲，所以，它的战斗实力和可靠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敌人进攻期间，朝鲜军事顾问团的人员有大量机会观察韩国陆军在敌人猛烈攻击之下的进步情况。他们认为，中共军队进攻的规模和强度是敌人在战斗中最初取得胜利的原因。虽然韩国部队遭到了严重打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仍继续战斗，使敌人遭到许多伤亡。在敌人加强进攻时，他们迅速占据防线后面的阻击阵

地，以阻止敌人进一步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据朝鲜军事顾问团报告，韩国官员中有一种过分依赖某种通讯的倾向。因此，一旦这种通讯中断时，部队常常与友邻部队和支援部队失去联系，所以很难或不能与他们协同作战。“面子”问题仍继续在韩国军队中起着重要作用，朝鲜军事顾问团接着说，因为军官们不能迅速和如实地向其上级报告有使他们丢失面子的不利发展情况。第3，韩国的首脑们常常在更适合使用轻武器和迫击炮火力时，过份依赖火炮的火力。

朝鲜军事顾问团报告说，正在努力纠正这些缺点。

尽管韩国军队有这些不足之处，但与1951年春季时的情况相比，已显得成熟多了，战斗力也提高多了。在此过渡期间所受到的训练和所积累的经验正开始发挥作用。但韩国军队能否经受全面进攻的考验仍是一个尚待观察的问题，但他们的进步是无可怀疑的。

三、最后的考验

战场上的暂时平静于6月24日结束，共产党军队显然决心要全力注意防线上的几个韩国师。他们集中力量攻击防线东部和中部的防区，其用意显然是要向南朝鲜人表明，继续战争将是一宗代价高昂的买卖。

最先受到恢复军事行动之影响的是韩国第9师。在金化西北的飞镖岭地区，中共部队第70师先用2个连的兵力向韩国第29团的主防线阵地发起攻击，然后在6月24—25日夜间迅速用营规模的兵力增援他们。韩国部队击退了上述企图突破其防线的进攻，直至中共军队停止战斗和抬着其大约700名伤亡者撤退。在狙击岭地区，韩国守卫部队的战绩不

如前面的好。中共军队的1个加强连将他们赶出前沿阵地后再也未让韩国军队夺回。6月25日，中共军队企图再次攻占附近的1个前沿阵地，虽然韩国军队伤亡了240人，但他们牢牢地守住了他们的阵地。据第29团估计，在击退共军进攻的过程中，中共军队的伤亡人数是第29团的两倍多。

在临津江和驿谷川汇合处东南的美军第1军的防御地段中，许多前沿阵地都是由韩国第1师守卫。在这些前沿阵地的正面，敌人不断增加其车辆运输和火炮的火力使美国第1军警觉到，中共军队正准备在6月底发动攻势，但看不出其规模的大小。6月25日，中共第1军第7师的2个团，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向巴克、汉纳阵地和179高地发起进攻，并向其它5个据点发起佯攻。美国第1军命令韩国第1师坚守。尽管面对强大的敌人进攻部队，炮火仍开始封锁敌人接近防御阵地的路线。敌人渐渐地冲进了堑壕和掩体，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手榴弹此落彼飞。韩国部队被迫逐渐后退，敌人终于占领了上述几个山头。到6月26日清晨，中共军队攻占了巴克、汉纳前沿阵地和179高地。韩国第12团被调来增援韩国第15团，因为后者在战斗中首当其冲。他们在6月26日以2个营的兵力向巴克前沿阵地发起进攻；6月27日以1个营的兵力向179高地发起进攻。但均未能重新夺回这两个前沿阵地。

6月28日，中共军队向附近的皇后前沿阵地推进，并且突破了这个高地上的韩国阵地。虽然在同一天向皇后前沿阵地、179高地和巴克前沿阵地上的中共部队发起了反攻，但全被敌人击退。直到6月29日第1军军长克拉克将军决定停止收复失去的前沿阵地的行动时，敌人仍占领着这些阵地。

在这次行动之后，克拉克将军对远离主防线正面的孤立

阵地采取固守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由于前沿阵地与主防线之间的距离远和地形复杂，所以很难增援守备部队；而相比之下，敌人进行增援则容易得多。一旦敌人接近之后，火炮、追击炮和空中攻击就失去了作用，因为存在着友军受到打击的危险。因此，克拉克断言，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付出很大的伤亡，这种代价要比前沿阵地的价值高得多。

在韩国第2军和美国第10军的战场上，利用战争的平静期对被打垮的韩国第5师进行了整编。到6月26日已认为韩国第5师做好了再次参加战斗的准备，并仍调归韩国第2军指挥。与此同时，韩国第7师已接管了第5师右翼的韩国第20师的阵地。

6月26日夜间，中共部队第60军的第179师派遣1个团进攻北汉江以东的韩国第5师部队，派遣另1个团进攻通向1220高地的主岭上的韩国第7师部队。中共军队在猛烈的火炮和追击炮炮火的掩护下不断发起进攻，并不顾这2个韩国师的顽强抵抗拼命向前推进。由于韩国第5师拒绝撤退到第2道防线，韩国第7师亦不得不撤回保护其左翼。中共军队奋勇向前推进，力图突破1220高地西北面938高地上的韩国第7师的阵地。韩国第7师进行了好几天时间的反攻，以重新夺回938高地，但敌人一直拒绝放弃这个阵地。守在这个高地上的中共军队的人数不多，等到韩国部队靠近时，使用大炮和追击炮进行猛烈的轰击和进行大规模的反攻。经过几次较量后，韩国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大，所以美军第10军军长伊萨克·D·怀特中将于7月3日开始采取遏制政策。后方地带已做好防御的准备，直升飞机加紧运送物资和弹药，为应付新的攻击构筑新的防御工事。7月4日，中共部队为靠近1220

高地发起了2次进攻，但都被韩国第7师部队击退。

敌人军事行动的加强和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敌人旨在以华川水库为目标向韩国第2军和美国第10军的防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因此，怀特将军重新部署了他的部队，以便支援韩国第2军的右翼。他命令美军第45师从7月1日开始向西推进，以增援韩国第20师和韩国第7师的1个团。后者只负责守卫前线的一小段，受韩国第2军指挥。7月10日，韩国第20师接替了伤心岭地区的美军第40师，后者转移到西边，以加强第45师的右翼。7月1日从第9军调来美军第5团战斗队后使第10军得到了加强。在第10军调动其部队时，幸好其前线的战斗行动已减少到不影响其部队的重新部署。

为了加强其后方区域的力量和战俘营的安全，克拉克于6月底命令查尔斯·L·小达谢尔少将指挥的第24步兵师做好暂时从日本调到朝鲜的准备。通过空运和水运的第34团战斗队于7月8日到达朝鲜战区的后勤地带，第19步兵团于7月11日到达。第21步兵团也于7月12日到达釜山。

在7月的头几天中，共军很少发起大规模进攻，但第8集团军对以后的形势并不抱任何幻想。来自敌人防线后方的部队移动、繁忙的交通运输和物资储备的报告使各级指挥官都警觉到，共军正准备再次大举进攻。由于敌人反侦察分队的活动，所以很难弄清正在集结的中共部队有多少，但在金城周围的中部战线上集结的部队最多。

但共军最先是在铁原而不是在金城防区发起攻击。7月6日，中共第73师的部队通过中共第69师的防御阵地向箭头山高地上的韩国第2师的2个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在30多个小时中，这2个阵地上的韩国守卫部队不得不常常在近距离内击退中共部队。7月8日，共军再次集结力量发起进攻，

这天夜里他们发射了6,500发大炮和迫击炮炮弹，占领了其中1个主峰的北坡。韩国部队在7月9日发起了一次反攻，但未能将他们赶走，战斗仍时断时续地进行着。7月11日早晨，2个韩国连持续战斗了近3个小时才迫使中共军队撤退。在争夺箭头山高地的战斗中，韩国部队的指挥官调换了进攻部队。在7月11日的遭遇战中，他用4个营的兵力向敌人施加最大的压力和不断地调换新的部队。争夺箭头山高地的6天战斗中，韩国第2师有500多人伤亡，中共军队的伤亡估计略超出750人。

在猪排山地区，美军第7师在7月6日遭到了数量与其相等的中共军队的进攻。一支人数不清的敌军从猪排山的坡下向上进攻，强占了山顶的一部分。第17团马上派2个连增援前沿阵地上的守卫部队。在7月7--8日的夜间，美军部队发动了2次反攻，想把中共军队赶下山顶，但未成功。第2天傍晚敌人发起了反攻，美军第7师在7月9日亦再次反攻，但双方都未能把对方赶出阵地。7月10日，中共军队发动了一系列连、营规模的进攻，但全被美军部队再次顶了回去。

集团军司令泰勒将军、军长克拉克将军和师长特鲁多将军在7月10日夜间的会议中认为，中共军队不顾伤亡和继续坚守猪排山前沿阵地的明显意图超过了联合国军固守阵地的战术价值。第8集团军司令认为，最好是在夜间撤退。但提出撤退的第7师参谋人员指出，中共军队对白天发现装甲人员输送车向山上的部队运送弹药和补给已觉得习以为常。他接着说，因为运输车被封盖得严严实实，敌人无法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因此，用运输车白天撤退不但可以避免夜间行动的危险，而且可以将中国人蒙在鼓里。泰勒将军听了他提

出的上述论据以后，当即表示同意。

7月11日下午，运输车按过去的老路开上山后，部队便爬进车里。在开回的路上未发生任何事件。

第1军后来通过各种情报途径了解到，中共军队以为这些汽车是开往前线支援另一次进攻而没想到是撤退。一直到撤退了近2天时间之后，他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向前推进准备占领此山。但他们遭到了第7师炮火的猛烈打击，而且不得不设法通过埋有大量饵雷的地段。

7月10日在板门店恢复停战谈判和李承晚7月初的明显和解态度是共产党发动最后一次攻势的原因。由于敌对行动之最终结束已经在望，所以敌人面临着最后一次机会向全世界令人信服地显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再次教训日益壮大的韩国军队和改善有争议的防御地带位置。6月攻势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上述目的，但金城突出部的大部分地方仍掌握在联合国军手里。另外，韩国陆军部队虽然受挫，但并未被共军的进攻瓦解。也许这一次他们可能真正遭到中共军队的痛击。

7月13日傍晚，中共部队的5个军调入金城突出部周围中部防区沿线的进攻与支援阵地。美军第9军的韩国第9师与首都师和韩国第2军的6师、8师、3师与5师从西到东地部署于敌人的对面。

7月13日，火炮和迫击炮发射速度的加快进一步证实了过去从俘虏、逃兵、谍报人员和侦察兵那里得到的情报，即共军正准备以前线中部的韩国部队为主要目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夜幕降临之后，整个中共部队开始向前推进。在中共军队第68军的203师向守卫金城突出部左角的韩国首都师发起猛烈攻击的同时，中共部队第24军72师的1个加强团亦向韩国第9师的右翼发起攻击。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军队越

过友邻部队的前沿阵地投入进攻。到午夜时，敌军部队已在部分地方突破了1,000米长的主要防线。位于长期有争议的狙击岭防区的友邻部队为防止被切断而被迫撤退。整个夜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压力，双方都发射了大量火炮和迫击炮炮弹。

在邻近于首都师的韩国第6师防区，中共部队第68军204师的4个营向韩国第19团的1个连的前沿阵地进行了袭击，到7月14日上午他们便突破了该团的主防线阵地和包围了1个友军营。共军第204师的部队突破韩国第6师的防区后便调头向西参加对首都师的进攻。

在东面，中共部队派遣4个连包围了韩国第8师防线上的1个前沿阵地，另派1个营向金城突出部右角韩国第3师防区内的1个连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他们在进行主攻的同时向韩国第5师和第7师进攻，以达到牵制他们的目的。

到7月14日早晨，由于敌人不断增加对韩国第3师的压力，共军的攻势亦有所发展。在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下，他们以营进攻或2个营进攻突破韩国第3师的前沿阵地，攻入主防线的阵地。第22团和第23团虽然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攻击，但他们仍在阻击阵地上的第18团的支援下坚守阵地。敌人的4个连突破邻近的韩国第5师的防区后转到了第23团的背后。当双重包围的迹象变得明显时，韩国第3军便开始撤退。

由于中国军队突破了中部战线上的韩国防线和切断了各部队与其建制部队之间的联系，局势开始变得混乱起来。第6师、第8师和首都师的士兵发现他们在一起守卫据点。由于两翼和前后方的通讯中断，因此无线电和步行通讯员成了收发指示和情报的主要手段。兄弟团之间常常因失掉联系而

不知对方在采取什么行动。来自前线的报告不但常被延误而且内容一般也不完整，因为韩国陆军的指挥官们有一个习惯，即不愿报告有损于他们脸面的不好消息。

尽管不了解详细情况，但在中共军队发起攻击的第1天后，就能明显看出，敌人使用其6个师中的主力部队使韩国首都师和第3师的防区受到了严重损失。由于这两个师是守卫突出部的左右两角，所以韩国第6师和第8师的两翼处于被双重包围的危险之中。因此，泰勒将军在7月14日命令韩国首都师、第6师、第8师、第3师和第5师撤回到突出部底部的金城江防线以南。这样就可以拉直防线和缩小控制的前线范围。在执行泰勒将军命令的过程中，韩国部队的指挥官与他们指挥的一些部队失去了联系和控制，结果许多部队都未在金城防线停下，而且继续向南撤退，使第8集团军防线的突出部上出现了一个缺口。

中国军队攻势的激烈程度和决心迫使克拉克和泰勒决定从日本空运增援部队到朝鲜，以加强前线的力量。美军第187机械化团被仓促运到朝鲜，泰勒将军于7月14日将其配属给美军第2师。美军第2师接管美军第3师的阵地后，由机械化部队去增援韩国第9师的部队，从而缩小了韩国部队战场的范围并加强了正在撤退的首都师右翼的力量。同时，美军第3师开进首都师背后的阻击阵地以阻止敌人向前推进。首都师的部队通过第3师的阵地撤退到后方进行整编和休整。7月15日，第3师接管了首都师防区和对首都师实行作战控制。

在韩国第2军的防区内，军长金日坤中将将泰勒将军调给他的韩国第11师派遣到前方增援韩国第3师。韩国第6师从防线上撤退下来后和韩国第3师一起进行整编和重建。7月

15日，第8集团军将韩国第9师、美军第3师、首都师的其他部队、韩国第11师和第5师从西向东部署在前线上，以阻击共军的攻势。

7月16日，韩国第2军接到开始反攻和收复金城江防线的命令。这时，敌人已经放慢了攻击的速度，中国军队正忙于在他们攻占的地区内组织防御和补充他们在突破韩国陆军阵地过程中所遭受到的严重损失。

并肩进攻的韩国第11师、第8师和第5师于同一天发起反攻。他们突破敌人的抵抗向金华以东的金城江推进。7月16—19日，阻击阵地上的3个后备师即韩国第6师、第3师和第7师到达金城江南面的高地。7月19日，韩国第6师进入和接管了第5师的防区。在渡江和抢占金城江北岸的防御阵地时遭到敌人越来越猛烈的抵抗，不得不在7月20日后放弃这一努力。在战争的最后一周里，韩国第2军在守卫金城江防线时，没有受到敌人的很大压力。

虽然韩国军队取得了反攻的胜利，但中国军队仍突破了金城突出部和拉直了他们在中部战场上的防线。他们大约突破了6英里，他们的进攻威力切断和击溃了其对面的许多韩国陆军部队。为了阻止共军向前推进和重新夺取部分失守的地带，共有9个韩国师和美军师投入到阻击和反击战。敌人的攻势还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大肆吹嘘他们赢得了军事胜利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另一方面，敌人为持续这次大规模攻势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据估计，第8集团军使中国军队在进攻期间遭受的伤亡达28,000多人。

正当韩国第2军展开反攻时，共军对第8集团军防线上的几个分散点开始施加压力，试图在签定停战协定以前占领一些长期争议的高地和前沿阵地。对隐藏在这种压力背后的

原因很难进行推测，因为这些有争议的点都位于非军事区内，而且联合国军无论如何都要放弃它们的。结果，共产党军队只得于不久之后放弃这些他们所占领的地方。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星期，前方战斗再次平静到只进行小规模侦察和巡逻，双方都期待着尽快签署停战协定。

四、统　计　单

扼要地重复一下敌人在最后几个月中的活动，对估价停止敌对行动时的军事形势可能是有帮助的。

从4月至7月，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和板门店停战谈判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当双方都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时，敌人行动的程度则随着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而变化。从3月底开始，共产党在前方采取了逐步升级的攻势态度，和过去相比，表现了一种更加不惜一切地动用其军队的意向。

在4月底至5月初谈判进展极为缓慢时，他们再次放慢了行动的速度。在5月的最后几天中，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5月25日提出的建议似乎给在最近的将来实现停火带来了可能性，共产党又开始加快它的进攻速度。6月8日达成战俘协议后，共军从6月10—17日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成功地占领了一些重要的阵地，对越来越反对停战的韩国进行威胁，并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吹嘘其军事胜利提供了一次机会。

6月18日，李承晚戏剧性地释放了不愿被遣返的朝鲜俘虏，再次增添了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地面行动再次减少，直至7月10日恢复停战谈判。接着共军又发动了1951年春季之后的最大攻势，想更大规模地再次实现其6月攻势的

目标。

正如克拉克后来评论时所说："我认为，共产党发动攻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毫无疑问是为了严惩韩国，让他们知道进军北朝鲜并不象说起来那样容易"。

有一个事实值得引起一定的重视，即在大部分重要进攻战中，敌人总是用中国军队而不用北朝鲜部队，而进攻的主要目标又都是韩国部队。这说明共产党是想在停战之前改变北朝鲜和韩国军队之间的相对实力。如果这是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他们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从3月底到7月底，韩国地面部队的人数从537,350人增加到了590,911人；而在这4个月中，北朝鲜地面部队的人数仍不足260,000人。

下面的伤亡和炮弹消耗表生动地说明了4—7月战斗活动的激烈程度。

共军部队			联合国军	
日期	伤亡人数（估计数）	炮弹发数	伤亡人数	105毫米以上的炮弹发数
1953年				
4月	10,500	51,690	4,343	1,255,015
5月	16,454	99,340	7,570	1,747,718
6月	36,346	329,130	23,161	2,710,248*
7月	72,112	375,565	29,629	2,000,982

*在朝鲜战争中的最高总额

共军在7月两次创了炮弹发射纪录，一次是月最高纪录；另一次是10天最高纪录，即他们在7月11—20日共发射了197,550发炮弹。敌军部队随意使用火炮和迫击炮炮弹清楚说明，他们的补给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愿意发射必要的炮弹支援他们的进攻。即使经过6、7两月的大量消耗后，除了局部地方外，他们并不缺少弹药。

因此，在热战接近结束时，从军事上说，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虽然他们6、7月的伤亡很大，但在朝鲜还有100多万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在战争初期，他们一天只能吃上两餐饭，现在能一日三餐，服装也很充裕。虽然在战争期间敌人的交通运输系统不断遭到轰炸和扰乱，但他们一方面大量利用人力，另一方面通过伪装和采取各种阴谋诡计，因此不但使其部队继续保持在前线，而且能不断地增加储备。如果一旦需要，敌军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打一场类似于1951—1953年期间的这种有限战争。幸运的是，7月板门店谈判的进展至少在目前已消除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第二十二章　结　局

在韩国的一片抱怨声和预示着共产党即将发起前线攻势的大炮怒吼声中，7月10日恢复了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敌人同意恢复停战谈判这一简单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们将在前线发动攻势的严峻形势。自从李承晚总统释放不愿被遣返的朝鲜战俘之后，共产党方面本来完全可以借口联合国军司令部不信守双方已经达成的暂时谅解而终止谈判。但他们仍又回到了谈判桌上。虽然一时还难以断言，他们这次是打算利用谈判来发泄他们对上述问题的不满呢还是真心诚意地希望缔结停战协定，但至少不能完全排除后面这种可能性。如果共产党证明他们真的想结束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试验，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敌人对李承晚政府今后行动的种种担心。

一、再三保证

克拉克将军心中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数的。当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尚未恢复板门店谈判之前，他就向其华盛顿的上司们请示：6月底给予他不管得没得到韩国政府合作的保证都可以结束朝鲜战争的权力是否仍然有效。华盛顿方面7月8日的答复再次肯定了他的这一权力，但同时提醒他不要向共产党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强迫韩国政府接受停战的条件。

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直接向共产党保证：必要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将采用武力防止韩国军队破坏停战协定，克拉克只好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7月9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如果共产党方面非要哈里森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他可以告诉他们：如果发现韩国军队企图通过进攻行动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将马上停止对其的一切后勤和军事支援。但柯林斯将军马上提醒他说，国会反对做出类似的许诺，因为这样会限制克拉克的行动自由。因此，在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前夕，克拉克和哈里森发现，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因为他们对敌人必然会提出的某些具体而尖锐的问题，除了能做出含糊其词的答复和泛泛而谈之外，将别无它法。

在停战谈判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暴露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案的漏洞。南日在他首席发言中针对克拉克6月29日写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大做文章。他要求了解究竟采取了什么步骤去重新抓获被李承晚释放的俘虏和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止李承晚政府进一步采取类似的行动。他接着又问：停战协定包不包括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南朝鲜军队将遵守停战协定的条款可以提出什么保证？鉴于李承晚强烈反对联合国各委员会和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声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又如何保证这些人员完成其担负的战后职责呢！南日最后说：“要是停战协定不包括南朝鲜政府和其军队，纵然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同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实际上朝鲜战争是不可能停止的……。因此，为了确保停战协定真正成为一项有效的协定，贵方就上述有关问题提出具体而有效的措施，并将它们切实地付诸于实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回答南日提出的上述问题时，哈里森只能做出如下说明：

“我们认为，现在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下的南朝鲜军队，停战后将继续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他们将执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和按停战协定的规定从他们目前正在展开的非军事区中撤出。

至于克拉克将军6月29日致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尽一切努力遵守停战协定的条款。我们不能保证韩国政府将给予充分的支持，但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继续尽其一切努力争取韩国政府的合作”。

接着，哈里森提出由联合国军宪兵部队保护各委员会成员和红十字会小组的安全。后来他又利用存在着韩国反对停战的这种危险因素，趁机建议将全部不同意被遣返的战俘送到非军事区和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哈里森说，虽然这会大大增加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后勤负担，但遣返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非军事区工作，用不着为其安全担忧。他说，这个问题可在停战之后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解决。

在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的发言进行研究的时候，哈里森和克拉克亦在思索怎样在会谈中具体阐明他们的立场。共产党代表在会谈中的态度使哈里森受到了鼓舞。他报告说，共产党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是合情合理和中肯的，他们的态度是平和的和重事实的，而不是蛮不讲理的。鉴于共产党代表的这种合情合理的态度，哈里森和克拉克两人都认为，他们应在下轮会谈时提出比较具体的保证。他们认为，如果南韩鲜军队破坏停战协定，敌人有权了解联合国军司令部将采取何种态度。但是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仍不同意向敌人做出太具体的保证。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会和国防部的代表

协商之后通知克拉克说，虽然他有权停止对韩国军队的后勤支援，但最好只向敌人做出比较笼统的答复。他们建议做出如下的反应："只要是韩国陆军部队采取进攻行动破坏停战协定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不给予任何支持。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相信存在着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

在7月11日的会议上，共产党代表声称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头一天做出的说明是"矛盾百出"和"不令人满意"的。南日再次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对他提出的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但仍未如愿以偿。哈里森针对南日提出的要求指出，某一方采取哪些措施履行停战协定的条款是该方的内部事情，只能由这一方自己决定。接着他又重复了头一天国会和国防部提出的建议。但共方代表仍要求做出更多的保证，他们坚持由双方的指挥官命令其指挥的所有部队全面停止敌对行动。

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完全消除共产党对南朝鲜军队今后行动的怀疑，所以克拉克不得不另谋权宜之计。他发现李承晚7月9日写给罗伯逊助理国务卿的亲笔信中，声称他不会阻挠停战协定的签署。但罗伯逊指出，他已经答应李承晚总统在谈判期间不公开该信的内容。另一方面，罗伯逊不明白哈里森为什么不可以向共产党讲明，韩国政府已向联合国军司令部保证：停战以后，它将继续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密切合作。

7月12日，哈里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共方代表，并且对他们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及其指挥下的南朝鲜军队准备执行停战协定的条款。休会后，南日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声明是"很好的"和"有益的"，但仍然是极不完善的。此后，这轮会谈的"攻守状态"一直持续到结束，共方代表坚

持要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做出明确的保证，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对共方代表的要求置之不理，坚持重复那些已经做出的笼统保证。

共产党究竟是真的担心韩国的威胁呢，还是仅仅决定将这个问题推迟到他们的7月攻势结束之后，一时尚难以确定。克拉克和哈里森对这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仔细分析，因为李承晚向新闻界发表的蛊惑人心的讲话表明，这个老头子把停战协定仅仅视为一种暂时的停火而并非是长期结束战争。这显然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板门店发表的抚慰性声明背道而驰。因此，很可能引起共产党方面的怀疑。另一方面，敌人的7月攻势计划是要持续一定时间的。因此，即使李承晚保持沉默，甚至同意采取合作的态度，敌人在未完成这次攻势之前也是不会同意达成停战协定的。无论怎样，共产党都会利用对李承晚的行动的怀疑作为掩护，推迟最后达成协议的时间。

7月13日的会谈后，敌人显然是要等其前线攻势行动的结果。在这轮会谈时，哈里森对共产党方面前几天提出的问题作出了部分明确的答复。他告诉共产党代表，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将余下的全部不同意遣返的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一来可以消除他们的忧虑，二来可以防止南朝鲜政府再度将他们释放掉。联合国军司令部愿意为韩国军队遵守停战协定和撤离非军事区做出保证；同时，将保证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执行任务的各委员会成员及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安全。如果韩国军队违犯停战协定和向共产党军队进行进攻，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继续保持停战状态和不对执行进攻行动的韩国部队提供装备和补给支援。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赞成用武力保证韩国遵守停战协定，但敌人肯定明白，没有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援助，韩国的任何攻势都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

但是，南日仍不同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上述答复。他再次提到不同意遣返的战俘的逃跑问题，尽管时至当时已根本没有什么希望重新抓获他们了。南日接着指出，李承晚在最近几次关于不阻挠停火的讲话中提到，他同意限制在90天内停火，但停战协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停火时间。因此，他要求哈里森对此做出解释。哈里森反复多次重申，联合国军司令部承认没有规定停火的时间，并且将严格按照这一精神行动。

这一轮会谈结束后，哈里森坚决主张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休会，必要时甚至单方面休会，直至共产党方面意识到联合国军司令部不会再做出任何许诺或保证时止。哈里森认为，在以后几天里，共产党方面除注视其主要战场上的形势发展外，显然会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时间的战术。

7月14日，克拉克和他的上司同意了哈里森的主张，并且通知他说，如果敌人继续采取拖延时间的战术，他有权决定不参加第2天的会谈。7月15日，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向共方代表指出“贵方攻势的升级说明贵方没有达成停战协定的诚意”之后，便退出了会谈帐篷。但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长期休会之前，克拉克建议哈里森根据李承晚与罗伯逊会谈时所表明的韩国的立场向敌人做出比较明确的答复。克拉克希望向共产党讲明，李承晚总统已向联合国军司令部做出“他不会阻挠签署停战协定的书面保证”。但华盛顿的军政首脑们却将其改成了“必要的保证”。

结果证明，措词上的变动并未产生不同的效果。7月16日，共产党代表抢先提出休会2天。后来又要求休会到7月

19日，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敌人进一步巩固了前线的战果，而且顶住了联合国军在韩国第2军地域内所发起的反攻。

克拉克7月17日飞往朝鲜，在汶山里和哈里森进行协商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他们打算拒绝共方代表提出的重新抓获逃跑了的俘虏的要求和进一步就南朝鲜今后的行动做出保证。如果共方代表因目前的军事行动提出重新就军事分界线举行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表示同意，随后单方面宣布休会4天。华盛顿的首脑们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条件是共方代表同意提出签署停战协定的具体日期和要求重新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谈判。

7月19日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这时，共产党的攻势已经结束，前线的局势变得再度稳定。南日在发言时说，尽管共方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做出的保证仍不完全感到满意，但他们愿意就停战协定的最后一些问题进行谈判。他们将保留在停战以后的政治会议上提出被释放的战俘问题的权利。由于韩国政府拒绝让印度军队进入南朝鲜的国境，南日要求马上在停战谈判中解决将剩下的不同意遣返的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的问题，而不要留给军事停战委员会去解决。正如克拉克和哈里森所预料的那样，南日同时要求对军事分界线的问题重新进行谈判。但他对哈里森提出的确定签署停战协定具体日期的问题则避而不答。

联合国军司令部老资格代表宣布，瑞士和瑞典的先遣人员准备马上开始行使其职能，想以此让共方代表讲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派出的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什么时候到达朝鲜。哈里森接着又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5天之内即可就全部细节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他坚决主张在签署停战

协定后的12小时之内宣布停火。监督委员会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时开始行使其职能。在此之前，双方应负责被指定为监督委员会成员的安全。

共方代表同意暂时中止全体会议和参谋军官马上开始解决尚有争议的全部遗留问题。哈里森通知南日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将由美国空军的道格拉斯·W·凯恩斯上校接替达罗上校，与默里上校组成参加军事分界线重新谈判和修改停战协定的参谋军官小组；由美国陆军上校路易斯·C·费里德斯多夫率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官参加遣返战俘的会谈；由美国陆军上校约翰·K·伟伯率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小组参加有关军事停战委员会职能的具体规定和章程的会谈。

这次全体会议，即结束整个停战谈判的前一轮会谈一直到7月19日的傍晚时分才宣告结束。至此，一共举行了158轮会谈，历时2年以上，共方代表团的成员亦由原来的10人减少到2人，即南日和他的同乡人李相朝。尽管由于人员轮换使会谈偶尔失去了连续性，但主要问题最后都得到了解决，终于为和平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和过去一样，就细节问题达成协议的任务现在又落到了双方参谋军官的肩上。他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就纷繁的微小细节达成协议，因为这些细节问题将决定什么时候正式宣布停火。

二、收尾工作

双方还必须就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达成协议：第一，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第二，释放不同意遣返的战俘的地点；第

三，根据停战协定成立的各委员会开始活动的时间；第四，实际签署停战文件的具体程序。参谋军官即将开始上述问题的谈判，估计一直要持续到战争停止的那一天。

7月20日，默里上校和中共谈判代表黄晨迟开始进行分界线的修正工作。其中许多地段比较容易解决，因为这些地方很少或没有战争行动，所以容易确定接触线。但在另外一些地区，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了，原因是最近的战斗改变了前线的位置。由于双方都想尽量多占有利地形，因此争论也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有时双方要求得到的地段都超出了应该的范围，因为共产党方面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不可能同时去控制某一个特定的高地。但总的看来，会谈的气氛并不紧张，甚至还不时互相开一开玩笑。7月22日，默里企图通过提出一揽子折衷方案来结束仍有争议的几个问题，但共方代表黄上校仍然是过去的那种典型态度，只接受对共产党方面有利的那一部分内容。因此，默里上校向他指出："换句话说，为了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你不但不愿意接受，反而在会谈中向我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因此，双方的讨价还价一直持续到第2天凌晨才解决了全部分歧。接着默里和黄晨迟便开始绘制准备印刷和附在停战协议书中的地图。

在参谋军官还尚未开始讨论不同意被遣返之战俘的处理问题之前，哈里森和克拉克决定在宣布停战协定生效以前，先讨论共产党方面提出的确定遣返地点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指示默里提出协议草案的修正案，以便在7月22日的首次会议上进行讨论。修正案的内容是：建议将不愿回到本国的共产党俘虏移交给非军事区南半区内的遣返委员会。

共产党方面的老资格参谋军官朱龙上校原则上接受这个建议，但对需要另外提出修正案的主张不予考虑。他建议达成一项包括允许不同意遣返的战俘和管理人员进入非军事区的各条款的临时补充协议。共产党方面的草案同意双方利用已方那一半非军事区将不同意遣返的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和建立处理战俘所需要的各种设施。由于重要的是协议的实质而不是它的形式，所以克拉克和哈里森接受了敌人提出的方案。克拉克和哈里森提出，为了节约时间，补充协议可用打字机打好并经双方签字之后直接附在停战协定的正文后面，不要再进行铅印。共方代表亦表示同意。7月25日，参谋军官们便完成了起草工作，并命令翻译人员将其译成各方的文字。

在参谋军官会谈期间，共产党方面多次明显地表示，他们很想知道直接被遣返的战俘和准备移交给遣返委员会的战俘的确切数字。联合国军司令部只同意向敌人提供大致数字，拒绝向敌人提供确切数字。理由是：很可能在最后几分钟内还会出现某些变化，因此不向他们提供确切数字会少遇到些麻烦。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忠于己方和思家心切的俘虏留有部分变化余地之后于7月21日宣布：将有69,000名朝鲜俘虏和5,000名中国俘虏回到共产党的控制下。3天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又宣布了将被释放的不愿被遣返的俘虏总数，其中中国人14,500名，朝鲜人7,800名。但共产党方面显然已决意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他们准备释放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确切俘虏人数，其总数是12,764名，其中美军俘虏3,313人，朝鲜人俘虏8,186名。由于敌人提出的总数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做出的估计数相差不十分悬殊，克拉克建议接受共方提出的数字，并得到了其上级的同意。

由费里德斯多夫上校和北朝鲜陆军上校李平日领导的参谋军官战俘遣返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遣返战俘的速度。遣返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运输设备和双方处理战俘的组织管理能力。起初，联合国军估计每天可送1800名被遣返的俘虏和360名伤病俘虏到板门店。当费里德斯多夫将这个数字告诉李平日时，李马上要求每天送3,000名被遣返的战俘到板门店，外加360名伤病俘虏。实际上，联合国军司令部每天移交给共方的俘虏数要比它接受的俘虏数高达7倍以上，因为据李平日透露，由于缺少交通设备和共方战俘营的距离远而分散，因此他们方面每天只能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移交300名俘虏。7月26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宣布了对其能力重新做出的如下估计：即每天可向板门店移交2400名俘虏和360名伤病俘虏，但敌人仍坚持它原先提出的数字。按照这个速度，联合国军司令部大约能在30天内将其战俘营中全部愿回国的战俘遣返完毕，而共方的遣返时间将拖延到40天以上。

同时，伟伯上校和他的同事在7月20日为军事停战委员会行使其职能做准备的委员会讨论会上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拟定的章程及实施办法的方案。克拉克已选好远东司令部副参谋长布莱克希尔·M·布赖恩少将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老资格成员，并于7月20日在汶山里成立各小组的总部，所以在下一个月中，布赖恩将军便将其参谋军官集中在一起，准备停战协定一生效便开始行使其职责。

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基本上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但他们并无急于求成之意。他们同意军事停战委员会应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2天举行第一次会议。一旦会议开始之后，参谋人员便可安排其工作细则。

由于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确定停战协定的

生效时间的重要性便比较突出了。从一开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就提出，停战协定应在签字后的12小时内开始生效。但共产党方面却提出签字7天半后开始生效，因为他们估计至少要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周之后，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才会到达朝鲜和能够行使其职能。默里上校对此进行反驳时指出，即使监督小组不能在一周之内开始行使其职责，不增加军队的协议应在停火12小时后生效。7月22日，敌人代表声明，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解释在某些方面与停战协定的条款不一致，但他们仍同意接受。共产党方面在这一周内是否会严格遵守停火的有关规定尚难预料，但战斗再延续7天至少不会增加很多伤亡人数。

停火协定签字的最初日期订于7月24日，因为断定5天时间足以解决各种细节问题和具体安排。但下述棘手问题很快使这一选择显得过于乐观：解决分界线后要印刷分界线地图和进行审核；修建和布置举行签字仪式的房屋；在签字程序上出现的意见分歧。

在这次冲突中，敌人想利用正式签字手续的辩论最后力争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在最初交换可以采取的方式方法时，共方代表在7月20日说，鉴于南朝鲜的局势不稳定，他们认为双方军事指挥官亲自出席签字仪式和签字是不明智的。朱龙上校建议双方军事指挥官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先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再由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连署。

克拉克不赞成敌人提出的方案。他强烈地认为，双方军事指挥官应通过亲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表明他们的良好诚意，这样就可以提高协议的声誉。7月21日，默里要求共方代表改变他们的主张，但共方代表没向他做什么表示。因此，他在2天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试图向敌人保证，在举行签字

仪式期间将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保证双方军事指挥官的安全。默里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愿意增加警卫部队的人数，限制和认真审查允许进入会议区的所有代表，为共方指挥官到达板门店的沿途提供安全保障。朱龙上校指出，李承晚和韩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仍在继续发表反对双方军事指挥官亲自出席签字仪式的干扰声明。接着，他在回答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共产党方案提出的某些反对意见时说，共方同意先由双方首席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和在签字12小时之后开始生效。因此，如果在促成双方军事指挥官签字的问题上稍有拖延，就将难以保证事实上的停火。

在7月24日举行的联络参谋军官会议上，朱龙提出了第3个方案：如果不允许李承晚和蒋介石的代表进入会议区和将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代表人数限制在100人以内，而且不得有新闻记者参加，共产党可以重新考虑由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亲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克拉克最初对敌人提出的最后一种方案做出的反应是同意接受，尽管他知道不让新闻记者进入举行签字仪式的大厅，会使他们感到极不满意。泰勒在与李承晚总统会谈时，发现他并不希望派代表去板门店，因此排除了这一个潜在障碍。但克拉克对敌方要求经过进一步研究以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不打算象共产党所坚持的那样将韩国和国民党中国的新闻记者拒之于会议区的大门之外。如果敌方拒绝让他们出席签字仪式，他愿意先举行首席代表的签字仪式，然后再由双方军事指挥官连署。

在7月25日召开的联络军官会议上，默里上校代表韩国和国民党中国的新闻记者提出了几点强烈请求，但共方代表根本不予理睬。朱龙对他们在签字期间进入会议区的要求将

不予考虑。他宣布，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不让他们进入会议区，金日成的副手崔庸健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将于7月27日上午10点到板门店代表共产党方面签字。他接着说，否则，共产党方面将不允许任何新闻记者出席签字仪式。

敌方反对韩国和国民党代表参加签字仪式的强硬立场促使克拉克下了决心。7月26日早晨，他指示哈里森去板门店签字，以后由他在汶山里连署，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他在朝鲜的国土上完成这一任务。

在这一天下午的联络军官会议上，默里和朱龙终于达成了协议。允许每方350人进入板门店地区，但每方只允许150人进入举行签字仪式的大厅。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影师将包括在这150人之内。会场将分为均等的两部分，每一方的全部人员将坐在己方那一半的席位上。其他安全警卫人员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以防止发生骚乱。签字仪式将按原定计划在7月27日上午10时举行。

默里和朱龙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几乎没遇到多少困难。但默里企图简化双方指挥官签署的文件的交换程序的努力马上遭到了对方的怀疑和反对。在18份停战协定书的文本中，联合国军司令部只准备保留其中6份。因此，默里建议共产党方面送6份给金日成和彭德怀，而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把克拉克连署的12份文本交给共方保管。默里解释说，这样双方就只需要进行一次文件互换。但朱龙坚决要求双方绝对平等，即每方保留9份连署签名的文本，尽管他也知道采用这种办法需要进行两次文件互换。他在为此进行辩解时根本不考虑因此而耽误了时间的重要性，这使得默里反驳道："要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建议的主要意思是不是

说需要很长时间来互换文件呢”？朱龙对默里这番讽刺不予置理。为了结束这个问题，默里在7月27日上午同意了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建议。

三、重要的一天

7月27日这一天，虽然天上布满了厚厚的云层，低洼的地面上也偶有一些水坑，但太阳仍时而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狂风从板门店吹过，但并没有到处扬起一片尘土。从远处传来的炮声在这种背景中提醒着人们，战争并未完全结束。

近几天，对为举行签字仪式而修建的房屋又做了些增减性的调整。一是按照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意见，去掉了共方要求画在这座和平塔三角墙上的两只和平鸽；二是根据克拉克的坚决要求，为这座建筑物增设了一道南门。在最初的设计中，只设了一道北门。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全体随行人员非得经过敌人那边才能进入建筑物。

沿着进入这座塔式建筑物南门前面的大道上，站着一排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仪仗队。这是一支由韩国以外的所有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的人员组成的队伍。他们手上戴着清一色的白色手套，肩上披着绶带，头上戴着钢盔，显得十分精神，如同在那里铺上的一条彩带。在它的北侧，身着草绿色军装脚穿帆布鞋的共产党士兵正在忙着打扫北门周围的清洁。

在举行仪式的半小时之前，观众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已进入会厅抢占了位置，接着进入会厅的是双方被指定担任观察员的军官。联合国军司令部的

军官们不拘形式和随随便便地进入会场与共产党人规规矩矩整整齐齐依次步入大厅和就座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就象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那样按高矮顺序直挺挺地坐在他们的位置上”。

在大厅的最前面，其中一张桌子上放着9本蓝皮的协定书文本和一面小小的联合国旗帜，在另一张桌子上则放着9本栗色皮的协定书文本和一面北朝鲜的国旗。

9点57分，与会的各有关代表进入会场，就座于前排的位置上。当时针指向10点整时，哈里森将军和南日将军迈着轻快的步伐同时从会厅的南北两侧步入会场，就座于各自的桌子后面。他们俩人互未打一声招呼就开始在文件上签署各自的名字，双方的气氛都显得很冷淡。10时12分，签字仪式结束，这时哈里森才向对着他的照像机露出了浅浅的一丝微笑。在哈里森和南日起身离席之时，相互对视了一会儿，但谁也没有开口讲话。哈里森走出会议厅和新闻记者随便交谈了几分钟，随后便乘直升飞机飞往汶山里。南日和他的随行小组也坐上他们的苏制吉普车离开了板门店。再过12小时，停火就将成为最终的事实。

四、尾　　声

7月27日下午，克拉克将军由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和韩国陆军代表陪同在汶山里签署了蓝皮协定书文本。接着他在讲话中提醒大家，停战协定只是一项停火的军事协定，双方都在寻求解决冲突的政治办法。他警告说，在通过外交谈判达成一项永久性协定之前，联合国军不会撤出朝鲜，因此不应放松任何警惕性和准备。

在克拉克讲话的时候，前线的大炮仍在不停地怒吼着。地面活动虽已停止，但炮击一直没有停止。在监督委员会和其检查小组开始行使其职能以前，为了拼命阻止共产党的活动，联合国军的飞机在空中对北朝鲜的机场、铁路线和公路系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上一周的战斗中，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虽已加强执行它们的空中计划，但遗憾的是敌人利用签定停战协定以前的恶劣气候将一部分飞机调入了朝鲜。在海上，海军军舰炮轰高城之后，接着又对元山进行了最后一次轰击，从而最后结束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海上围攻战。当指针指向7月27日22点整时，整个朝鲜已听不见炮声，这场热战结束了。

停火能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在签定停战协定的头一天晚上，泰勒去通知李承晚准备第2天签字时，他似乎因这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快要结束而显得宽慰。李承晚总统7月27日在与克拉克谈话时告诉克拉克，他要向他的人民宣布，韩国将与停战协定配合；并准备向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宣布这一消息，以便使他们放心。克拉克也在他们谈话中告诉李承晚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马上向韩国老百姓赠送1万吨食品。要是韩国政府同意接受这批食品，可由韩国民间援助指挥部和韩国政府共同进行分配。克拉克汇报时说，李承晚听到这个消息时显得很高兴，并表示同意接受。

尽管出现了上述有利的迹象，但李承晚和他的助手们仍继续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停火的时间不会持续很长；如果政治会议失败，韩国军队可能再次诉诸武力。这些威胁究竟是出自他们的真心还是仅仅为了缓和韩国人民对韩国政府默认停火的不满意情绪，一时还难以估计。但他们对形势确有一种不安的表现。因此，如果要做到长期停火，就必须要消除

他们的这种不安情绪。美国的唯一希望是通过履行它向韩国政府做出的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保证能平息韩国政府对停火的不满和促使韩国的领袖们停止今后要恢复敌对行动的宣传鼓动。

由于联合国军的参加国不能相信李承晚的态度，因此对发表“如果共产党重新在朝鲜挑起战争将受到严重制裁”的联合声明感到非常犹豫不决，尽管这是它们过去一致同意的。只要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仍对李承晚的意图感到怀疑的话，它们就不愿公开承担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他们决定发布联合国军司令大约在签署停战协定一周以后将向联合国提出专门报告的警告公告来代替联合声明。由于不再单方面发表广泛散发的声明，所以克拉克在8月7日呈送给联合国的谈判总结报告中写进了如下内容：

“我们每个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家支持联合国军总司令关于缔结停战协定的决定。我们特此声明我们决心完全忠实地执行停战协定的条款，并希望本协定的其他各方也将同我们一样地严格遵守它的条款。

今后的任务仍很艰巨。我们将支持联合国根据它过去确立的一贯原则为公正地解决朝鲜问题和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而进行的各种努力。我们将支持联合国为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而进行的各种努力。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将忠于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继续自觉地承担我们在朝鲜的责任、决心真诚地寻求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我们声明，如果敌人重新恢复军事进攻，再次向联合国的原则挑战，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将再一次联合起来立即进行抵抗。对停战协定的这种破坏行动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战争的界线就很可能不再只是限于朝鲜了。

最后，我们认为，停战协定决不能有害于恢复或维护亚洲其他地区的和平”。

不管是用何种方式表达，反正许诺已经做出，而且被明确地写进了克拉克的报告。共产党方面是否重视这种警告，只有以后才能知道。但李承晚很可能会单方面做出决定，从而使双方陷入困难。同时，军事停战协定虽然为减少公开战争的代价提供了一项暂时的解决办法，但双方在停战期间都可能要力图改善各自的相对位置。

旨在防止联合国军或共产党军队在停战期间明显改善其军事位置的中立国组织很快就开始行使它们的职责，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军事停战委员会在7月28日举行了首次事务性会议，就在今后的会议中讨论以下4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部队从非军事区撤出；救助活动的实施；清除诸如地雷这一类的危险物；进入非军事区和在其内工作的人员的证件和识别标记。但共产党红十字会8月在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活动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这一刚刚开始的合作阶段很快遭到破坏。因此，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整天都是双方来回地进行指控和反指控。由于双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指控，所以成立了联合观察员小组，开始对非军事区的侵犯进行调查，并分别提出报告。

更重要的是，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及其检查小组也遇到了困难。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检查小组被安置在10个对外开放的港口，负责监视并报告人员的进出和作战物资的补充。在北朝鲜境内的检查小组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控敌人使用其他对外开放港口输入大量人员和装备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和规定。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只要联合国军方面严格遵守停火的规定，共产党方面就会继续增加它

们的兵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继续维持现状。敌人明目张胆地集结兵力究竟是为了进攻还是防御，还是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让时间来做出答复。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也遇到了困难。签定停战协定之后不久，南北双方便开始移交战俘。从8月5日到9月6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非军事区直接向共方移交了75,000多名战俘，敌方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移交了12,000多名战俘。联合国军司令部接着又在9月23日在非军事区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移交了22,000多名不愿遣返的战俘，共方在第2天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移交了350名不愿被遣返的联合国军俘虏。

共方没过多久就开始抱怨，向他们提供的劝说其不愿遣返回国的俘虏的设备不充分。因此，他们一直等到10月15日才开始其解释工作。从10月15日到12月23日即双方同意的90天解释期到期之日，他们仅仅进行了10天时间的解释工作。由于大多数俘虏根本就不听敌人代表的解释，所以在22,000名俘虏中，经过解释之后选择遣返回国的人数仅600多一点。其余的俘虏将继续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直至停战协定规定的120天限期期满之时再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部。1954年初，释放了不愿遣返的朝鲜俘虏，将不愿被遣返的中国俘虏用飞机和船运到了台湾，其中大约有86人在回国途中决定随印度看守部队去印度。

在359名不同意被遣返的联合国军俘虏中，有2名美国人和8名朝鲜人在120天限期期满之前改变了主意。另外2名朝鲜人决定随印度看守部队去印度。余下的于1954年1月被移交给共方。

美国战俘在被遣返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指控对方对他们进行干涉和对许多同意遣返的士兵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

磨。在1953—1954年的秋冬两季，美国战俘这种批评意见在新闻界中广为传播。但对500多名被遣返的俘虏进行调查时，仅有少许几个人被指控有不端行为。因此，国防部长决定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战俘咨询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该委员会起草一份新的武装部队行动准则，1955年8月1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字批准，希望该准则能防止再次出现朝鲜战争中的这种情况。

由于从未宣布战争状态的结束，也许可能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1953年8月末，联合国大会已表示欢迎召开停战协定所提出的政治会议，但一直到1954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的外长才同意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召开，除南非联邦未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外，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所有联合国军成员国家、南朝鲜、苏联、中共和北朝鲜的代表团全都到会。由于双方在统一朝鲜问题的态度上很快出现了根本分歧，所以除非一方完全让步，才有可能达成协议。联合国军成员国的代表建议在中共军队撤出朝鲜之后由联合国监督在整个朝鲜实行自由选举。共产党方面认为，由于联合国是交战的一方，因此，不能充当中立的国际组织。他们同意实行自由选举，但必须由双方派出对等代表组成的机构进行监督，这样他们就会拥有否决权。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代表认为，共产党的建议似乎只为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按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选举提供了前景。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辩论后，会议于6月中旬结束，双方都不同意接受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看来通过谈判实现朝鲜统一，在1954年仍和1948年那时一样，显得遥遥无期。

第二十三章　回　顾

朝鲜战争究竟有何意义？要对这场战争做出正确的估价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对它所产生的某些直接后果是不难看出的。

尽管敌人一再宣称，谁也没有在朝鲜赢得政治上或军事上的胜利，充其量可以说其结果是不分胜负，但这场战争却产生了好些重要结果。联合国在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前经受住了一次挑战。要是联合国不做出答复，就很可能引起灾难和最终的分崩离析。在联合国的旗帜之下，阻止了共产党的侵略和维护了盟国南朝鲜的独立，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干预朝鲜的最初目标。在和平受到威胁时，联合国将如何行使其职能的这一实际表现，极大地提高了联合国的声誉，并且为联合国以后再因这种需要而采取军事行动开创了先例。

虽然联合国的成员国并未设法给予一致的支持，但确实有21个国家派遣了不同兵种的部队支持联合国的决定。虽然其中大多数国家只派遣了数量很少的象征性部队，但单是他们参加朝鲜战争这一事实就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表明了他们对联合国的信赖和愿意严格执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朝鲜战争标志着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真正摆脱了沉闷的状态。

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也是对它的一次严峻考验。美国虽然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参加的时间比较晚，而且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参加的。但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其盟国中已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被披上了非共产党世界领袖的外衣。在敌人通过侵略南朝鲜进行挑战时，与新的强国地位相一致的迎战责任便天然地落到了美国身上。在美国准备参加这场战争之前，它再也不能依靠其它一些国家与侵略者作战了，因为现在只有美国具有承担这一任务的人力和物力。幸运的是，美国很快做出了用武力对付武力的决定。由于这一决定符合联合国的宗旨，所以起到了提高联合国声望的作用。美国极其迅速地诉诸武力向共产党表明，它已接受了它的领袖地位，决不会允许敌人肆意进行赤裸裸的侵略。要是不做出反应，就很可能重演希特勒长驱直入来因兰地区① 的灾难性事件。作为反共产党国家先锋战士的美国已经赢得了自己的声誉。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指挥联合国部队的作战过程中，远比过去只关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一直将重点放在欧洲，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将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了。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因为这个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都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派遣了部队。在战争的推动下，美国决定进一步扩大它的盟国体系，开始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缔结安全条约。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和南朝鲜等国家都在朝鲜战争期间或是在其结束之后不久与美国结成了防御联盟，后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国民党中国也与美国结成了这种联盟。朝鲜的经验证明，盟国有助于控制有利的世界舆论，它们在人力、物力和政治上的支援为寻求和平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朝鲜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美国与整个西太平洋和亚洲大陆的非共产

① 来因兰地区在今西德境内。

党国家建立了大量的政治与经济联系。

在远东，从朝鲜战争中出现了两个比过去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其一便是南朝鲜，它的武装部队在3年战争期间增加了6倍，在战争结束时其总数已接近600,000人。大部分部队都经过了训练和装备，其战斗效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战争结束时的北朝鲜相比，韩国的现有作战部队占有相当的优势。通过对现役军官和非现役军官队伍的进一步训练和培养，韩国部队最后就会成为未来抗击共产党侵略的主力，或者成为中共军队撤出朝鲜之后实现韩国统一之梦想的工具。

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很快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

朝鲜战争为美国和中国检验双方的勇敢精神和了解双方的实力与薄弱环节提供了机会。双方都发现，军事胜利的代价要比预计的大得多，要再次诉诸武力实现军事胜利的目标是极其困难的，谁都不会对此低估。

共产党中国的崛起还会引起一些与苏联今后在远东的作用有关的有趣问题。战争以前，俄国人对北朝鲜的事务实行了控制。中国参战之后，从表面上看来，苏联乐意向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提供大量的作战物资，并在联合国辩论中给于这两个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在谈判期间，北朝鲜人似乎是按共产党中国的旨意行动，不易看出苏联在其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逐渐强大和威望的不断提高，必然会对苏联

在远东共产党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随着北平影响的强大，莫斯科的声誉必然会下降。这种力量变化会引起什么长期后果，将取决于今后的中苏关系。虽然目前对今后的中苏关系并不能预测，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即共产党中国很快会提高它在共产党集团中的地位。自1917年以来，在共产党世界的舞台上，首次出现了争夺其领导地位的潜在对手。

从间接方面看，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都从长期的停战谈判中得到了外交上的好处。尽管美国没有正式承认这两个国家，而且美国代表是以联合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和签署停战协定的，但要驳倒美国已在谈判过程中给予了它们事实上的承认的说法却是很难的。同时，共产党在整个谈判中一直拒绝承认韩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合法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美国开创了反对强迫遣返战俘的先例，尽管这一胜利由于战俘营中多次发生反对甄别的暴乱而使之黯然失色。但美国对这种主张一直坚持了15个月之久，拒绝考虑其他任何条件的解决办法。后来又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哈里森1952年提出的全部释放拒绝遣返的俘虏的建议，正如李承晚在1953年6月释放俘虏一样。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这种既成事实的解决办法本来给共产党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因为他们可以指控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单方面行动，还可以避免因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而丢失面子。但在北平对这个建议进行研究以前，中国人对美国1952年这一行动的反应一直是犹豫不决的。

虽然反对强迫遣返的长期影响作用还可能是一个尚待观察的问题，但50,000名俘虏已根据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一立

场拒绝回到共产党的控制下这一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可是，这种保护拒绝遣返之战俘的人道主义的主张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第8集团军估计，为了保护他们的这种权利，在这15个月当中，联合国军方面有125,000多人伤亡；而敌人方面包括被击毙的、受伤的和被俘的在内，伤亡人数达250,000以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会提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即究竟是50,000名拒绝遣返的俘虏和被敌人监禁的12,000多名战俘重要，还是在前线作战的成千上万的士兵重要。在军事停战谈判中，是首先考虑在前线作战的人呢还是首先考虑被俘的人？这一直是一个很难决定的问题。相对地说来，和整个战争期间所蒙受的整个伤亡人数相比，这15个月中的伤亡人数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联合国军一共伤亡了500,000人以上，其中有94,000多人死亡。据估计，包括被俘的人在内，共产党方面损失1,500,000人以上。被消耗的经费就难以计算了，尤其是共产党方面的。据美国的一位专家计算，到1956年止，这场战争及其副产物已使美国耗去了830亿美元，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去的经费。

由于朝鲜的领地之争从性质上讲是次要的，没有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对参战国虽然是一种挫折，但在此种情况下，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很差的解决办法。但双方所寻求的停火和妥协结果并没有导致失意的一方寻求报复。尽管李承晚对停火可能不高兴，但只要他依赖于美国的军事援助，他则难以重新点燃军事冲突的战火。

除了上述国际性的变化外，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在朝鲜进行的这场非决定性战争中，美国再一次开始全面检修和加强它的军事机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很强大的美国军事机构每况愈下的情况得到了制止，并且已开始

对其进行重建和恢复。在这一方面，朝鲜的经验是有益的。没有打败敌人可以提醒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在未来的挑战面前，我们的国家不能松懈警惕性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停战协定签字后，没有任何人象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企图遣散武装部队，放下作战武器重新恢复战前的原状。朝鲜战争使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明白，为了随时对付日益增加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必须继续用大量的军费保持足够的军队和武器装备。战后期间拨出巨额国防预算便是尚未很快忘记需要备战的最明显的证据。

美国还从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困难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缺乏明确的军事目标给制定军事计划的人员增加了许多麻烦，因为所有的大规模行动计划都是根据应急情况制定的。随着战争的拖延，预算经费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战争的延长极需要实行短期轮换计划。轮换计划虽然极有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但却不是一种有实效的经济的解决办法。

由于政治上要千方百计地限制朝鲜战争，使得美国政府很难说服厂商转向短期的军工生产。由于转向军工生产需要大量的投资，加之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很高，所以厂商非常不愿意打乱其正常的生产程序。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需要在和平时期建立可以马上扩大规模的从事正常生产的军工生产基地。一直过了18个月到2年才将战区所需要的新产品投入生产这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军火生产的形势，而且只动员了很有限的工厂投入生产。民间经济几乎没有受到黄油和大炮政策的干扰。也许这仅仅起到了使美国士兵和人民容易接受美国能够如此耐心地在板门店进行谈判的作用。上述棘手问题终于产生了强烈要求通过直接行动或通过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让步来结束战争的情绪。

一、谈　　判

从很多方面来看，1951年7月开始的谈判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只要冲突的第1年里战场上的局势不稳定，向这场战争投入大部分兵力和担负支持这场战争财政负担的美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执行的政策。但在战争相持阶段开始之后，联合国军的盟国和韩国就不再一味地保持沉默了。在停战谈判期间，他们得到了私下或公开发表其不同意见的充分机会。由于联合国军的部分欧洲成员国对在朝鲜战争中的各种消耗感到焦虑不安，他们非常希望美国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需要上来。但在战争结束以前，要进行这种重点的转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兴趣是希望尽快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这样他们就可以致力于国内和殖民地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争取得到更多的美国经济与军事援助。韩国政府当然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停战就很可能意味着韩国要求统一朝鲜的希望破灭和美国关心朝鲜事务的最终结束。

由于来自上述两方面的压力的不断增加，美国不得不从中进行调解。从自身的利益来说，要求我们摆脱朝鲜的牵制，把注意力转到保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的主要任务上来；但保护南朝鲜和日本又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这两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一种可以同时达到这两种目的的公正解决办法。它在继续努力争取结束朝鲜战争的同时，又努力为韩国和日本建立一支足以担负起防御任务的部队，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有效地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扩充韩国军队的步伐要比扩充日本的大得多，但这

并不是美国方面的过错，因为日本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在选择重新武装的道路时非常小心谨慎。

在联合作战时，盟国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是屡见不鲜的。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目的千差万别，就一个共同目标达成协议只不过才是第一步。一般说来，根据当时的情况，都可能会同意必须阻止、遏制和打败敌人。但在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上出现争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使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全面战争，有时也可能出现激烈而紧张的争论。虽然朝鲜战争只是一场有限战争，但也决不会例外。

美国决定同共产党进行谈判后，既不按其联合国盟国的要求急于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也不因韩国反对停火而改变它的目标。幸亏在谈判期间敌人无意谋求朝鲜问题的军事解决，尽管为了尽快就停火达成协议，双方都向对方施加了有限的压力。但双方都避免采取特别激烈的措施。联合国军没有蓄意侵入敌人在满洲里的大本营，美国也没有全力推行对共产党中国其它地方实行严格军事或经济封锁的政策。敌人对我们设在日本的基地、甚至对拥挤的釜山港也没有采取敌对行动。由于双方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限制战争的发展，因此自然而然地对其军事行动加以了限制。

一些批评家抨击美国开始谈判的举动是操之过急。海军上将乔伊认为，美国对马利克1951年6月提出的建议迅速做出反应给人留下了美国特别希望或需要停火的印象，而且可能会被说成为一种软弱的表现。也许美国本来是可以采取一种比较缓慢而隐讳的方式来避免这种操之过急表现的，这样就不会让敌人在心理上和宣传中占上风。但能否在较短的时间里缔结停战协定毕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1951年夏天联合国军在开城和战场上的行动使人很快丢掉了敌人对联合国军的

停火要求可能给予了重视的幻想。

在开城参加过第1次会谈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和新闻工作者中，起初对达成停火协定的时间比较乐观。谈判开始后的第3天，海军上将伯克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最后写道："有希望在苹果成熟以前离开这里（指汶山里）"。但他在7月末战役快结束时写给其妻子的信中的最后附上了一句迥然不同的话："如果形势不发生突变的话，可望在1年左右离开这里"。了解共产党的要求和战术后，这位海军上将很快放弃了争取尽快解决问题的想法。

要是谈判只严格地限于军事问题，也许能够比较迅速地达成停火协议。原先美国是不准备讨论政治问题的，只限制代表团讨论与停火有关的军事问题。既不准备讨论台湾也不准备讨论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被成功地避开了。由于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实现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因此美国主张达成一项长期停战协定，共方对此亦未提出异议。美国关于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建议已为共方接受，尽管他们要求同时成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及其检查小组作为在非军事区以外执行监督任务的机构。令人感到不胜惊讶的是，共方竟同意将检查这一条款写入最后的协定书中，尽管附上了限定条件。他们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严格遵守其不增加非朝鲜部队和不从外部向朝鲜集结物资的诺言，谁也不清楚，但他们的确在纸上做出了保证。敌人不同意美方提出的建立跨度为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的要求，而建议将其缩小到4公里宽。另一方面，共方放弃了恢复三八线的要求，同意按接触线解决。由于美方坚持最终从朝鲜撤出非朝鲜部队属于政治问题，所以也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由于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难以截然分开，所以在讨论中

要回避这许多问题所涉及到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方面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清楚的，因此，他们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他们所支持的目标中捞取政治上、心理或宣传上的资本。谈判开始之前，李奇微就准确地预言过，敌人会进行大量的宣传演说，因此需要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具有极大的耐心。这些比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的政治经验丰富得多的共产党代表的表演完全证明了李奇微的预言。

但是在谈判中提出志愿遣返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和其全部政治意义的并不是敌人。共产党是希望实行交换全部俘虏的简单办法，是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决定坚持让俘虏拥有自决的权利。

敌人不愿承认会有大批人背叛共产党世界是不会使人感到惊讶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直接承认自由世界的生活要优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从停战谈判一开始，敌人对双方之间的任何细微差异都极为敏感。为了能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首次全体会议上使用的旗帜形成对应，他们迅速地赶制了一面旗帜；为了压倒联合国军司令部所修建的卫生设施，他们迅速地修起了色彩鲜艳的卫生设施；还从俄国进口了一辆专供南日使用的轿车，以便与海军上将乔伊乘坐的轿车相匹敌。他们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最后坚持要各方在 9 本停战协定书文本上签字。

尽管共产党方面极力否认他们是在讨价还价，但他们说的和做的完全两样。早在1951年春天，一位老资格的中国人曾就此向陆军最高统帅部提出过一些明智的建议。驻中华民国武官戴维·B·巴雷特上校也对与中国人讨价还价的危险提出过警告。他说，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其条件之后，平静而坚定不一地坚持其立场，虽然中国人可能会咆哮和进行

威胁，但他们终归会让步的。另一方面，要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出现软弱和犹豫不决，中国人就会继续讨价还价，直到他们获胜方肯罢休。巴雷特最后说，只有当他们不再咆哮并心平气和地和你讲话时，你才能肯定，他们已下定最后决心不接受你提出的条件。

这些意见的正确性都在谈判中得到了证实。共方代表不止一次地先让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提出建议，这样他们就可以接受其中对其有利的部分和争取得到更多的让步。最后，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拒绝再做出让步，他们就会提出反建议，做出一部分相应的让步。只要双方在数量相等的条款上做出让步，就可以达成一项折衷协议。凡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某一条款的最后提案中能够提出平衡的妥协条件并拒绝再进一步对此进行讨论时，就可以很快地形成结果。在敌方代表确信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之前，他们就会继续没完没了地拖延和争论。

正如巴雷特所警告的那样，共产党果然使出了他们的全部战术。海军上将伯克对共产党在谈判初期时的战术曾发表过看法。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不大量研究共产党的谈判战术，当他初次遇上这些战术时，对他必然会受到的粗野攻击决不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头一天晚上还是解方那旨在干扰谈判或争取得到更多让步的粗暴的恐吓和不堪入耳的谩骂与攻击；但在一夜之间当其准备解决问题时，他们又会突然采取温和、讲理和务实的态度。如果他们发现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做出让步，他们的宣传声势就会变得很小；如果局势于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

由于共产党的诡辩术使他们能自圆其说，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促成谈判成功的方法。和共产党在会

谈帐篷中的咆哮、诅咒、辱骂与蛮横无礼一样，歪曲历史、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在战俘营中制造事端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这是他们通过施加压力扰乱对方时所玩弄的全部手法。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因不冷静而动感情，就有可能酿成错误，因为在停战谈判桌上的冷战往往是与前方的热战相互配合的。

海军上将伯克在这场神经战中发现："当然，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不能带有任何个人的情感。情感毕竟代替不了谈判。象这样的谈判，唯有冷静地考虑每一步行动和每一个观点，拿出极大的耐心、沉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方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在一系列漫长的会谈中，只要我们表现出这些品质，共产党方面就会显得有些不安"。尽管共产党方面不断地进行挑衅，但乔伊和哈里森非常出色地表现了上述品质。除了极个别时候外，他们很少因敌人的诱惑而进行还击。

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成员中，除了韩国的代表外，其他人都受到了语言方面的限制。这虽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也是一件幸事。正是由于在翻译以前他们不懂共产党代表高声叱责的意思，加之在翻译过程中又失去了原话的部分粗野风味，故使原话的效果大大减弱。另一方面，在语意的理解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奇微将军曾经提醒过代表团注意这个问题，告诫他们尽量重视可能会出现的误解。由于双方的传统习惯、背景知识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因此对诸如"逻辑"、"理由"、"非正义"、"民主"等词语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照字面译出来只能把问题搞复杂。只有把这些词语仔细解释清楚之后，才能使对方真正明白它们的意思。

随着谈判时间的延长，双方代表团的调子开始越来越接

近。在双方的建议中，都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加上一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因为合理而富有诚意的建议是“通向和平的桥梁”是绝对不会错的。双方代表还随意使用象“你们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而我们的逻辑是合情合理的”这类句子。经过几周时间的会谈后，海军上将伯克就告诉他的妻子说：“我想，今后我们每个人在起草声明时，要不使用漂亮的形容词将是很难的，因为‘非正义的’、‘不公正的’和‘不讲道理的’等正在成为我们标准的口头禅”。

同敌人在语意上进行的这一番争议说明，为了研究译文中的每个词语的确切含意，在谈判以前，需要翻译参谋人员进行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以防发生错译现象。因为一旦敌人想拖延谈判时间，他们就会迅速抓住和利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小错误大做文章。

在停战谈判帐篷内进行的全部唇枪舌剑之战中，耐心和沉着似乎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法宝。因为只有耐心，他们才能忍受共方代表旨在抵毁对方不同意见而进行的攻击、诽谤和莫须有的指控等；因为只有沉着，他们才能在提出最后或最起码的意见时用不致引起误解的方式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令人信服地经受住了对方暴风雨般的辱骂、片面的指控和肆意的曲解，最后敌人就会提出一项较为可取的建议或甚至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的建议。作为一个民族之代表的美国代表们虽然常常受到过于急躁的指责，而且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情感，但他们在谈判中却表现得极为出色。

二、战 场

在后两年战争期间，战场上的形势是和谈判互相呼应的。联合国军首先对共产党1951年夏在开城采取的拖延政策做出的反应是向他们施加军事压力。随后所实施的有限行动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是联合国军在后两年战争中采取的最好军事努力。1951年10月，第8集团军使敌人遭受的伤亡总人数创了谈判期间的最高月记录，而且占领了很有价值的防御地形。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无疑是敌人决定恢复谈判的一个原因。

但是，联合国军的胜利也是来之不易的，人们不会忘记联合国军在这次攻势中蒙受了40,000人的伤亡这一无情的事实。因此，人员伤亡代价的大小成为以后做出军事决策时重点考虑的问题。1951年11月开始展开的“积极防御”和谈判的恢复就是这一观点的结果。李奇微和范弗里特之所以不同意和取消了1951年秋冬两季的几次大规模攻势计划，正是因为怕引起严重伤亡。

后来，有些观察员对联合国军1951年11月减轻对敌人的地面压力和确定临时分界线的明智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动将有利于敌人巩固他们的防线，而且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迫使共产党在板门店谈判中采取比较明智的态度的手段。

长期向敌人施加地面压力究竟能否迫使敌人很快地做出让步是一个谁也难以肯定的问题。因为尽管持续的严重伤亡可能会使敌人改变对谈判的态度，但人力是共产党最丰富的资源之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投入战争。但必须记

住，如果让这种攻势继续下去，就意味着第8集团军的伤亡人数也会急剧地增多。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占据一些地形而不是着眼于军事上的胜利，在美国人民的严厉批评面前，试问第8集团军又能将这种代价高昂的攻势持续多久呢？

很明显，1951年后期双方承认分界线的有效期为30天导致了事实上的停火，并且一直延续到1952年10月。1951年12月至1952年9月，双方的伤亡人数大幅度下降证明了这一事实。在此期间，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人数平均每月不到3,500，共产党方面则不到15,000（估计数）。相比之下，1951年10月联合国军的伤亡总人数近20,000，而共军的伤亡人数达80,000以上（估计数）。

由于双方在后两年的战争中都无意突破分界线的范围，所以战争本身只限于在10英里宽的战场上进行争夺。由于双方都注视着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所以前方的消耗战也一直毫无结果的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在大部分战斗中，双方都不愿仅仅为了夺取几个地形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已经证明这种战斗的代价极为惨重。在克拉克将军指挥下发起的那次地面攻势是一次远远超过原计划的冒险行动。对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和其防线纵深进行这次检验之后，克拉克一直是采取严格的守势。

只是在战争快临近结束时，地面战场才开始再度活跃起来。1953年春，共产党决定利用战场向谈判施加压力和为他们宣称在军事上的胜利做必要的准备。只要牺牲能使他们今后在政治上捞到好处，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用大量生命去换取几个高地。

联合国军在1951年后期和1952年大部分时间放弃大规模

地面行动是想用空中压力代替地面压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在空中战役中的英勇行动无疑使敌人受到了沉重打击，但由于战争平静期的后勤保障跟不上，因此未达到足以使敌人在重要的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程度。

双方的军事行动对停战谈判的进展究竟有多大影响是很难做出任何准确估价的。说明战场与谈判的相互关系要比说明战斗行动对停战谈判的间接影响容易得多。

但是，地面战争的相持的确产生了一些对其它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情况，如前方存在的士气问题。联合国军的短期轮换政策和在日本实行的休整计划虽然有助于恢复军队的士气，但正如泰勒将军在1953年5月指出的，下面这种因素很可能会使本来不怎么高的士气更加低落。

“这种因素产生于以其特殊表现形式反应在朝鲜的动荡不定和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形势。前线的士兵对政治目标没有多大兴趣，而且一般都不会对其做出很高的评价。他们需要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具体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就希望停火、解除生死之忧和脱离令人厌倦的战争环境。尤其对美国的士兵来说，延长他们占领或守卫固定防线任务的时间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徒劳无益和对最后结局猜疑不定的想法”。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缺乏明确的战争目标只能使士兵尤其是使各级军事指挥官越来越士气低落和失去耐心。

尽管在停战谈判期间缺乏明确的战争目标，但第8集团军却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在有几次战斗中，有几支联合国军的部队表现得并不那么出色，但这只不过是几种例外。观察员一直认为，由李奇微重新组建后经范弗里特和泰勒加强的第8集团军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野战部队。它不但经受住了防御战的考验，而且实施了有效的反攻。由于在战争的后半

期受到了战争升级的限制，所以第8集团军并未真正得到检验其攻击能力的机会。向北方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一律被取消，战争以防御的方式开始，又在防御中结束。

由于敌人的步兵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堑壕和掩体里，所以炮兵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范弗里特称这场战争是一场炮战。他对一位美国观察员说，他将击败敌人的90%的任务安排给联合国军的炮兵。通过向敌人大量倾泻炮弹，联合国军抵消了敌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和减少了我方的伤亡。这种办法在对付共产党采用"人海"战术攻占联合国军的阵地时特别奏效。一旦敌人钻出他们的堑壕和掩体，就会完全暴露在我强大的协调火力之下而遭到惨重伤亡。另外，反炮兵战、遮断射击与扰乱射击不但可以继续构成对敌人的压力和造成敌人的伤亡，而且能起到瓦解敌人士气和鼓舞联合国军部队士气的作用。

但是，只要共军部队继续守在他们精心构筑的野战临时防御工事中，他们就很不容易受到打击。1953年4月战场上处于相对平静时，联合国军炮兵部队向敌军发射了125万多发炮弹，但在这一月中各种原因引起的共军战斗伤亡人数据估计只有10,500人。即使所有这些伤亡都是炮击引起的，平均也要100多发炮弹才能使1人伤亡，何况并非全是炮击引起的。

联合国军炮兵的优势主要在于它有较好的射击控制设备和技术以及弹药的提供，而并不在于部队与武器的数量。在朝鲜的共军炮兵部队是联合国军的2倍多，而且在大炮的数量方面也占有较大的优势。而主要差别是每门大炮所发射的炮弹数量。由于联合国军的炮弹储备量比共军的多，加之补给系统的速度比共军的快，因此而具有较大的优势。在这方

面，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战役给予了有效的援助，因为它使敌人向前线运送弹药的工作受到严重威胁、速度大大减慢。通过限制敌人运往前线战场上的炮弹数量，空军部队有效地减少了敌人的行动次数和拯救了联合国军的生命。

控制朝鲜领空和海上要道同样使联合国军取得了其他方面的优势。这意味着敌人的全部补给都必须通过有限的陆上交道运入朝鲜，从而极大地加重了其交通线上的负担；而联合国军则可以任意使用海陆交通线为其部队提供补给。制空和制海权还取得了宝贵的心理上的优势，因为敌人从空中和海上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威胁虽然一直存在，但从未成为真正的事实。因此可以忽视共产党试图粉碎联合国军控制的挑战。这也许是纯粹的侥幸，因为象釜山这样的地区特别容易遭到突然袭击。

随着战争的逐渐平静，共产党军队的补给形势亦开始好转。尽管敌人的运输线遭到了联合国军的空中攻击，但敌人的弹药储备仍然增多了，射击技术也比过去提高了。在配合他们1953年6、7两个月的最后攻势中，他们的炮火准确而有力。

由于联合国军具有弹药补给的优势和掌握了制空权，所以共产党军队不得不构筑能够承受炮击和空中攻击严重打击的野战临时防御工事。在组织其防御中，为了能有效地避免受到严重打击，敌人部队不但挖了很深的堑壕和在其上面加上了坚固的覆盖物，而且对其阵地进行了精心的伪装。正如一位老资格的观察员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与第8集团军的士兵所构筑的大部分防御工事相比，他们构筑的防御工事则更加接近美国陆军野战手册所提出的规范标准。在大部分时候，除非是重磅炸弹或平射弹道武器直接命中，否则是难以

摧毁敌人防御掩体和火炮发射阵地的。第8集团军的许多部队都不如敌军如此认真，他们构筑的掩体和掩蔽部不是里面没有足够的支撑物，就是上面没有坚固的覆盖物。所以一场大雨之后，就会普遍发生塌方，这种情况尤以1952—1953年冬季前严重。

中共军队在过去是实行的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部队的移动迅速而利落。通过加强纵深防线，他们巧妙地守卫着阵地。在阵地防御中，他们仍是坚持运动战，常常在联合国军发起攻击时，他们迅速地后撤，待联合国军占领一些目标以后，他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反攻。

1952年底，美国第2师汇编了一本中共军队的作战资料，第8集团军认为值得翻印。以下是从中摘录的几段。

1．在进攻中，敌人特别善于利用地形。不管其部队人数多少，他们都实行机动，而且惯于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发起进攻。

2．在进攻中使用火炮和迫击炮支援时，中国军队紧跟在其火炮与迫击炮的弹幕后面。

3．采取积极的警戒措施和确保通迅的安全。中国军队在发起攻击前进行的猛烈轰炸常常使联合国军的通讯陷于瘫痪。

4．中共军队在防御中采用了相互支援的坚固支撑点体系。在其阵地之间的地带和通往阵地的要道上都得到火力的掩护。

5．中共军队的士兵能迅速挖成很深的堑壕，从而有效地保护他们不受到联合国军的全部轰炸。在炮击逐渐平息下来时，他们能迅速进入战斗位置守卫他们的阵地。

6．中共军队的巡逻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有着明确的目

的，即侦察联合国军阵地上的兵力和武器配备。他们还观察我军的巡逻路线和活动习惯，为他们设伏我方巡逻做准备。

7．敌人在巡逻中同样实行机动。中共巡逻部队常运动到我方巡逻部队的两侧和背后，试图对他们进行合围。

8．敌人尽一切力量打扫战场上的物资和处理他们自己及友军的死伤人员。因此，在战斗结束后，我方必须控制战斗的现场。

该报告在最后的小结中指出："中共士兵并不是超人。他们在其所在的小部队单位中受到了充分的大无畏的教育，这些部队的行动结果清楚地证明，他们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们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显示了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他们在没有联络飞机和通讯设备很差的条件下，面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和联络飞机，仍然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防御行动。从每次战斗之后他们搜罗战场上的各种杂七杂八的设备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勒紧裤带作战"。

除了上述这些令人赞扬的地方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敌人不但智勇双全，而且能吃苦耐劳。由于他们生长在连年饥荒不断的不发达的中国，所以能够以极少一点供给维持生活和忍受极度的艰难困苦。在一种生命被人视为一文不值的环境里，唯有吃苦耐劳才能使他们活下去。"勒紧裤带作战"的提法在许多方面都适用于中国人在朝鲜进行的全部努力。他们在与技术高度发达和在海上、陆上、空中、通讯、运输诸方面都占有优势的对手交战中，仍不惜用大量的人力守卫住了他们的阵地。在缺乏工程设备的条件下，蒋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人工劳动为美国飞机修建机场，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在朝鲜，中国人再一次地显示了如何用大量的人力来代替机械化。虽然从原则上讲这可能是一种

很浪费的不经济的办法，但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急办法和对抗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上的优势不但不能轻易地带来战争的胜利，而且根本不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

但这决不是说敌人是完美无缺的和中国人是什么超人。他们在发起进攻之前向部队宣布攻击的目标和在公开的会议上讨论作战行动常常会使一些认定从该次行动中活着出来的机会不很大的士兵开小差逃跑。联合国军有时从这些逃兵的口供中预先得到了敌人即将发起攻击的消息，因此有时间为“热情接待敌人”做好准备。正是在这种时候中国军队体系中还会出现另一种错误，即一旦下达攻击命令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让更改的。即使显然遇到了未曾预料的情况而不能实施时，部队指挥员仍坚持按原计划执行，不调动大家的主动性和不按实际情况取消作战命令，使敌在过去两年中受到了某些很惨重的伤亡，白马山战斗就是这种作法的见证。

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的优势或劣势都不是绝对的，如果再次发生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双方在作战中就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情况和产生出与第一次交战截然不同的结果。共产党中国疯狂般地努力加快工业化，可能解决他们技术上的一些落后问题。随着工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武器和战术也可能随之变化，双方的相对能力也会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未来的战争很可能证明与朝鲜战争有许多共同之处。由于新式武器和战术的出现，虽然很多军事上的经验已变得不再适用，但从朝鲜战争中获得的敌军方面的情况将有助于制定今后的计划和战略与避免再度出现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可能性。由于共产党想最终主宰整个世界的目标不可能改变，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朝鲜与共产党打交道中所得到的政治经验对解决今后的公开冲

突和在政治上回击共产党的种种企图都将是十分宝贵的。如果因为没有取得胜利就忽视或忘记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和谈判中通过千辛万苦而得来的教训，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附　　录

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地面部队人数

（ 1 ）

日　期	总　数	美　国[a]	韩　国[b]	其他联合国成员国[c]
1951.6.30	554,577	253,250	273,266	28,061
1952.6.30	678,051	265,864	376,418	35,769
1953.7.31	932,539	302,483	590,911	39,145

注释：

a：包括受美国陆军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人员。

b：包括受美国陆军指挥的韩境美军中的韩国士兵、韩国海军陆战队与接受训练的平民。

c：见附录1—（2）中各国派遣的部队人数。

(2)

国　　家	1951.6.30	1952.6.30	1953.7.31
总　　数	28,061	35,769	39,145
英 联 邦	15,723	21,429	24,085
英　　国	8,278	13,043	14,198
澳大利亚	912	1,844	2,282
加 拿 大	5,403	5,155	6,146
新 西 兰	797	1,111	1,389
印　　度[a]	333	276	70
土 耳 其	4,602	4,878	5,455
比 利 时[b]	602	623	944
哥伦比亚	1,050	1,007	1,068
埃塞俄比亚	1,153	1,094	1,271
法　　国	738	1,185	1,119
希　　腊	1,027	899	1,263
荷　　兰	725	565	819
菲 律 宾	1,143	1,494	1,496
泰　　国	1,057	2,274	1,294
意 大 利[a]	0	64	72
挪　　威[a]	79	109	105
瑞　　典[a]	162	148	154

a：只派遣了非战斗性的医疗队。
b：包括大约有40人的卢森堡分遣队。

战　　俘

（1）被遣返人数

国籍	小批交换	大批交换	总计
总计	6,670	75,823	82,493
北朝鲜	5,640[a]	70,183[b]	75,823
中国	1,030	5,640[c]	6,670
合计	684	12,773	13,457
美国	149	3,597	3,746
韩国	471	7,862	8,321
英国	32	945	977
土耳其	15	229	243
菲律宾	1	40	41
加拿大	2	30	32
哥伦比亚	6	22	28
澳大利亚	5	21	26
法国	0	12	12
南非	1	8	9
希腊	1	2	3
荷兰	1	2	3
比利时	0	1	1
新西兰	0	1	1
日本	0	1	1

a：包括446名接受训练的平民，其中有3名女战俘和18名男战俘。

b：包括60,788名男战俘，473名女战俘，23名儿童，8,899名接受训练的平民。

c：包括1名女战俘。

（2）不愿被遣返的战俘

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的			
处理	总数	中国	朝鲜
合计	22,604	14,704	7,900
回到共产党控制区 逃跑与失踪	628 13	440 2	188 11
在印度看守部队看管期间死亡	38	15	23
随印度看守部队去印度	86	12	74
回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区*	21,839	14,235	7,604

共产党方面控制的战俘				
处理	总数	美国	英国	朝鲜
合计	359	23	1	335
回到共产党控制区	347	21	1	325
随印度看守部队去印度	2	0	0	2
回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区	10	0	0	8

*：1954年2月19日完成全部处理工作。

停 战 协 定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

序　　言

下列签署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为停止造成双方巨大痛苦与流血的朝鲜冲突，并旨在确立足以保证在朝鲜的敌对行为与一切武装行动完全停止的停战，以待最后和平解决的达成，兹各自、共同、并相互同意接受下列条款中所载的停战条件与规定，并受其约束与管辖，此等条件与规定的用意纯属军事性质并仅适用于在朝鲜的交战双方。

第一条　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

一、确定一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便在敌对军队之间建立一非军事区。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以防止发生可能导致敌对行动复发的事件。

二、军事分界线的位置如附图所示。

三、非军事区以附图所示的北缘与南缘确定之。

四、军事分界线按照后述设立的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指示加以明白标志。敌对双方司令官在非军事区与其各自地区间的边界沿线树立适当的标志物。军事停战委员会监督所有设置在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两缘沿线的标志物的树立。

五、汉江口的水面，其一岸受一方控制而另一岸受他方控制处，向双方民用航运开放。附图所示部分汉江口的航运规则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规定之。各方民用航运在本方军事控制下的陆地靠岸不受限制。

六、双方均不得在非军事区内，或自非军事区，或向非军事区进行任何敌对行为。

七、非经军事停战委员会特许，任何军人或平民不准越过军事分界线。

八、非军事区内的任何军人或平民，非经其所要求进入地区的司令官的特许，不准进入任何一方军事控制下的地区。

九、除与办理民政及救济有关的人员及经军事停战委员会特许进入的人员以外，任何军人或平民不准进入非军事区。

十、非军事区的军事分界线以北部分的民政与救济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负责；非军事区的军事分界线以南部分的民政与救济由联合国军总司令负责。为办理民政与救济而被准许进入非军事区的军人或平民的人数分别由各方司令官决定之，但任何一方批准的总人数在任何时候不得超过1000人。民政警察的人数及其所携带的武器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规定之。其他人员非经军事停战委员会特许不得携带武器。

十一、本条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妨碍军事停战委员会、其助理人员、其联合观察小组及小组助理人员，后述设立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其助理人员、其中立国视察小组及小组助理人员，以及任何经军事停战委员会特许进入非军事区的其他人员、物资与装备出入非军事区与在非军事区内移动的完全自由。非军事区内的两地不能由全部在非军事区以内的通道相联接时，为往来于此两地之间所必经的通道而通过任何一方军事控制下的地区的移动便利应予准许。

第二条　停火与停战的具体安排

甲、通则

十二、敌对双方司令官命令并保证其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此项敌对行为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12小时起生效。（本停战协定其余各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与时间见本停战协定第六十三款）。

十三、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来达到和平解决，敌对双方司令官：

子、除本停战协定中另有规定外，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内自非军事区撤出其一切军事力量、供应与装备。军事力量撤出非军事区后，所有知悉存在于非军事区内的爆破物、地雷阵地、铁丝网以及其他危及军事停战委员会或其联合观察小组人员安全通行的危险物，连同所有知悉并无此等危险物的通道，由设置此等危险物的军队的司令官报告军事

停战委员会。事后，应清除出更多的安全通道；最后，在72小时的时期终止后的45天内，所有此等危险物须按照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指示，并在其监督下自非军事区内撤出。在72小时的时期终止后，除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监督下有权在45天的期间完成清除工作的非武装部队，由军事停战委员会所特别要求并经敌对双方司令官同意的警察性部队及本停战协定第十款与第十一款所批准的人员以外，双方任何人员均不准进入非军事区。

丑、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10天内自对方在朝鲜的后方与沿海岛屿及海面撤出其一切军事力量、供应与装备。如此等军事力量愈期不撤，又无双方同意的和有效的延期撤出的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有权采取任何其所认为必要的行动。上述"沿海岛屿"一词系指在本停战协定生效时虽为一方所占领，而在1950年6月24日则为对方所控制的岛屿；但在黄海道与京畿道道界以北及以西的一切岛屿，则除白翎岛（北纬37度58分，东经124度40分）、大青岛（北纬37度50分，东经124度42分）、小青岛（北纬37度46分，东经124度46分）、延坪岛（北纬37度38分，东经125度40分）及隅岛（北纬37度36分，东经125度58分）诸岛群留置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军事控制下以外，均置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军事控制之下。朝鲜西岸位于上述界线以南的一切岛屿均留置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军事控制之下。

寅、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但在下述规定范围内的部队与人员的轮换，担任临时任务的人员的到达朝鲜，以及在朝鲜境外作短期休假或担任临时任务后的人员的返回朝鲜则予准许。"轮换"的定义为部队或人员由开始

在朝鲜服役的其他部队或人员所替换。轮换人员仅得经由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进入与撤离朝鲜。轮换须在1人换1人的基础上进行，但任何一方在任何1个月份内不得在轮换政策下自朝鲜境外进入35,000名以上的军事人员。如一方军事人员的进入将造成该方自本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以来所进入朝鲜的军事人员总数超过该方自同日以来离开朝鲜的军事人员的累积总数时，则该方的任何军事人员即不得进入朝鲜。关于军事人员的到达与离开朝鲜须每日向军事停战委员会及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提出报告，此项报告须包括入境与离境的地点及每一地点入境与离境人员的数目。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经由其中立国视察小组须在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对上述批准的部队与人员的轮换进行监督与视察。

卯、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但停战期间毁坏耗损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得在同样性能同样类型的一件换一件的基础上进行替换。此等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仅得经由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进入朝鲜。为确证为替换目的而输入朝鲜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有其需要，关于此等物件的每批输入须向军事停战委员会及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提出报告；此项报告中须说明被替换的物件的处置情况。撤出朝鲜的将被替换的物件仅得经由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撤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经由其中立国视察小组须在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对上述批准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替换进行监督与视察。

辰、保证对其各自指挥下的违反本停战协定中任何规定

的人员予以适当的惩罚。

巳、在埋葬地点见于记载并查明坟墓确实存在的情况下，准许对方的墓地注册人员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进入其军事控制下的朝鲜地区，以便前往此等坟墓的所在地，掘出并运走该方已死的军事人员，包括已死的战俘的尸体。进行上述工作的具体办法与期限由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敌对双方司令官应供给对方以有关对方已死军事人员的埋葬地点的一切可能获得的材料。

午、在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联合观察小组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及其中立国视察小组执行其后述指定的职司与任务时，给予充分保护及一切可能的协助与合作。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及其中立国视察小组经由双方协议的主要交通线往返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总部与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时，以及往返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总部与据报发生违反本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时，给予充分的通行便利。为避免不必要的耽搁，当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或无法通行时，应准予使用替代的路线及交通工具。

未、供给军事停战委员会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及其各自所属小组所需要的后勤支援，包括通讯与运输的便利。

申、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附近非军事区内的本方地区，各自兴筑、管理并维持一适用的飞机场，其用途由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

酉、保证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与后述成立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及其他人员均享有为适当执行其职司所必需的自由与权利，包括相当于被认可的外交人员按照国际惯例所通常享有的特权、待遇与豁免。

十四、本停战协定适用于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敌对的地面

军事力量，此等地面军事力量须尊重非军事区及对方军事控制下的朝鲜地区。

十五、本停战协定适用于一切敌对的海上军事力量，此等海上军事力量须尊重邻近非军事区及对方军事控制下的朝鲜陆地的海面，并不对朝鲜进行任何种类的封锁。

十六、本停战协定适用于一切敌对的空中军事力量。此等空中军事力量须尊重非军事区与对方军事控制下的朝鲜地区，以及邻近此两地区的海面的上空。

十七、遵守并执行本停战协定条款与规定的责任属于本停战协定的签署人及其继任的司令官。敌对双方司令官须分别在其指挥下的军队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与办法，以保证其所有部属彻底遵守本停战协定的全部规定。敌对双方司令官须相互积极合作，并与军事停战委员会及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积极合作，以求得对本停战协定全部规定的文字与精神的遵守。

十八、军事停战委员会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及其各自所属小组的工作费用由敌对双方平均负担。

乙、军事停战委员会

（一）组成

十九、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

二十、军事停战委员会由10名高级军官组成，其中5名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指派，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派。委员10人中，双方各3人应属将级；其余双方各2人可为少将、准将、上校或其同级者。

二十一、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得依其需要使用参谋助理人员。

二十二、军事停战委员会配备必要的行政人员以设立秘书处，负责协助该委员会执行记录、文书、通译及该委员会所指定的其他职司。双方各在秘书处指派秘书长1人，助理秘书长1人及秘书处所需的文牍与专门技术人员。记录以朝文、中文与英文为之，三种文字同样有效。

二十三、子、军事停战委员会于开始时配备10个联合观察小组以为协助，小组数目可经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首席委员协议予以减少。

丑、每一联合观察小组由4至6名校级军官组成，其中半数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指派，半数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派。联合观察小组工作所需的附属人员如司机、文牍、译员等由双方供给之。

（二）职司与权力

二十四、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总任务为监督本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本停战协定的事件。

二十五、军事停战委员会：

子、设总部于板门店（北纬37度57分26秒，东经126度40分00秒）附近。军事停战委员会得经该委员会中双方首席委员的协议移设其总部于非军事区内的另一地点。

丑、作为联合机构进行工作，不设主席。

寅、采用其本身随时认为必要的办事细则。

卯、监督本停战协定中关于非军事区与汉江口各规定的执行。

辰、指导联合观察小组的工作。

巳、协商处理任何违反本停战协定的事件。

午、将自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所收到的一切关于违反本停战协定事件的调查报告及一切其他报告与会议记录立即转交

敌对双方司令官。

未、对后述设立的战俘遣返委员会与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总的督导。

申、担任敌对双方司令官间传递信息的中介；但上述规定不得解释为排除双方司令官采用其愿意使用的任何其他方法相互传递信息。

西、制发其工作人员及其联合观察小组的证明文件与徽记，以及在执行其任务时所使用的一切车辆、飞机与船只的识别标志。

二十六、联合观察小组的任务为协助军事停战委员会监督本停战协定中关于非军事区与汉江口各规定的执行。

二十七、军事停战委员会或其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员有权派遣联合观察小组调查据报发生于非军事区或汉江口的违反本停战协定的事件；但该委员会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员在任何时候不得派遣尚未为军事停战委员会派出的联合观察小组的半数以上。

二十八、军事停战委员会或其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员有权请求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至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本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

二十九、军事停战委员会确定违反本停战协定的事件业已发生时，须立即将该违反协定事件报告敌对双方司令官。

三十、军事停战委员会确定某项违反本停战协定的事件业已获得满意纠正时，须向敌对双方司令官提出报告。

（三）通则

三十一、军事停战委员会每日开会。双方首席委员得协议不超过7天的休会；但任何一方首席委员得以24小时以前的通知终止此项休会。

三十二、军事停战委员会一切会议记录的副本应在每次会议后尽速送交敌对双方司令官。

三十三、联合观察小组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该委员会所要求的定期报告，并提出此等小组所认为必需或该委员会所要求的特别报告。

三十四、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本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报告及会议记录的双份档案。该委员会有权保存为进行其工作所必需的其他报告、记录等的双份档案。该委员会最后解散时，将上述档案分交双方各1份。

三十五、军事停战委员会得向敌对双方司令官提出对于本停战协定的修正或增补的建议。此等修改建议一般地应以保证更有效的停战为目的。

丙、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一）组成

三十六、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三十七、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由4名高级军官组成，其中2名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中立国，即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指派；2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中立国，即瑞典与瑞士指派。本停战协定所用"中立国"一词的定义为未有战斗部队参加在朝鲜的敌对行为的国家。被指派参加该委员会的委员得自指派国家的武装部队中派出。每一委员须指定1候补委员，以出席该正式委员因任何理由而不能出席的会议。此等候补委员须与其正式委员属于同一国籍。一方所提名的中立国委员出席的人数与另一方所提名的中立国委员出席的人数相等时，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即得采取行动。

三十八、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得依其需要使用由各

该中立国所供给的参谋助理人员。此等参谋助理人員得被指派为该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三十九、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所必需的行政人员须请由中立国供给，以设立秘书处，负责协助该委员会执行必要的记录、文书、通译及该委员会所指定的其他职司。

四十、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于开始时配备20个中立国视察小组以为协助；小组数目可经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首席委员协议予以减少。中立国视察小组仅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负责，向其报告并受其指导。

丑、每一中立国视察小组由不少于4名的军官组成，该项军官以校级为宜，其中半数出自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中立国，半数出自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中立国。被指派参加中立国视察小组的组员得自指派国家的武装部队中派出。为便于各小组执行其职司，得视情况需要设立由不少于2名组员组成的分组，该两组员中1名出自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中立国，1名出自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中立国。附属人员如司机、文牍、译员、通讯人员，以及各小组为执行其任务所需的装具，由各方司令官按照需要在非军事区及本方军事控制地区内供给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得自行配备并供给中立国视察小组其所愿有的上述人员与装具；但此等人员须为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中立国本国人员。

（二）职司与权力

四十一、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为执行本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寅项、第十三款卯项及第二十八款所规定的监督、观察、视察与调查的职司，并将此等监督、观察、视察与调查

的结果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

四十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子、设总部于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附近。

丑、采用其本身随时认为必要的办事细则。

寅、经由其委员及其中立国视察小组在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进行本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寅项与第十三款卯项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及在据报发生违反本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进行本停战协定第二十八款所规定的特别观察与视察。中立国视察小组对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视察须使小组确能保证并无增援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进入朝鲜；但此项规定不得解释为授权视察或检查任何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或弹药的任何机密设计或特点。

卯、指导并监督中立国视察小组的工作。

辰、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军事控制地区内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派驻5个中立国视察小组，在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军事控制地区内本停战协定第四十三款所开列的口岸派驻5个中立国视察小组；于开始时另设10个机动中立国视察小组为后备，驻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总部附近，其数目可经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首席委员协议予以减少。机动中立国视察小组中应军事停战委员会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员之请求而派出者在任何时候不得超过其半数。

巳、在前项规定的范围内，不迟延地进行对据报违反本停战协定事件的调查，包括军事停战委员会或该委员会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员所请求进行的对据报违反本停战协定事件的调查。

年、制发其工作人员及其中立国视察小组的证明文件与徽记，以及在执行其任务时所使用的一切车辆、飞机与船只的识别标志。

四十三、中立国视察小组派驻下列各口岸：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控制地区：

新义州（北纬40度零6分，东经124度24分）

清津（北纬41度46分，东经129度49分）

兴南（北纬39度50分，东经127度37分）

满浦（北纬41度09分，东经126度18分）

新安州（北纬39度36分，东经125度36分）

联合国军军事控制地区：

仁川（北纬37度28分，东经126度38分）

大丘（北纬35度52分，东经128度36分）

釜山（北纬35度06分，东经129度02分）

江陵（北纬37度45分，东经128度54分）

群山（北纬35度59分，东经126度43分）

此等中立国视察小组须给予附图所示地区内及交通通道上的充分的通行便利。

（三）通则

四十四、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每日开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得协议不超过7天的休会；但任何委员得以24小时以前的通知终止此项休会。

四十五、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一切会议记录的副本应在每次会议后尽速送交军事停战委员会。记录以朝文、中文与英文为之。

四十六、中立国视察小组须就其监督、观察、视察与调查的结果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提出该委员会所要求的定期报

告，并提出此等小组所认为必需或该委员会所要求的特别报告。报告由小组全体提出，但该组的个别组员 1 人或数人亦得提出之；个别组员1人或数人提出的报告仅视为参考报告。

四十七、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将中立国视察小组所提出的报告的副本，依其收到的报告所使用的文字，不迟延地送交军事停战委员会。此等报告不得以翻译或审定的手续加以延搁。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按实际可能尽早审定此等报告，并将其判语尽先送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收到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有关审定以前，军事停战委员会不得对任何此种报告采取最后行动。军事停战委员会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员提出请求时，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及其小组的组员即须列席军事停战委员会，以说明任何提出的报告。

四十八、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保存本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报告及会议记录的双份档案。该委员会有权保存为进行其工作所必需的其他报告、记录等的双份档案。该委员会最后解散时，将上述档案交双方各 1 份。

四十九、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得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对于本停战协定的修正或增补的建议。此等修改建议一般地应以保证更有效的停战为目的。

五十、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或该委员会的任何委员有权与军事停战委员会任何委员通讯联络。

第三条　关于战俘的安排

五十一、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的释放与遣返须按照本停战协定签字前双方所协议的下列规定执行之。

子、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交给他们被俘时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难。遣返应依照本条的各项有关规定予以完成。为了加速此等人员的遣返过程，各方应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前，交换应予直接遣返的人员的按国籍分类的总数。送交对方的每一批战俘应附带按国籍编制的名单，其中包括姓名、级别（如有）和拘留编号或军号。

丑、各方应将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按照本停战协定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各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寅、为避免因并用三种文字可能产生的误解，兹规定为本停战协定之用，一方将战俘交与对方的行动在朝文中称为“송환”，在中文中称为“遣返”，在英文中称为“Repatriation”，不论该战俘的国籍或居住地为何。

五十二、各方保证不将任何因本停战协定之生效而被释放与遣返的战俘用于朝鲜冲突中的战争行动。

五十三、凡一切坚持遣返的病伤战俘须予以优先遣返。在可能范围内应有被俘的医务人员与病伤战俘同时遣返，以便在途中提供医疗与照顾。

五十四、本停战协定第五十一款子项所规定的全部战俘的遣返须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的期限内完成。在此期限内各方负责在可能范围内尽早完成其收容下的上述战俘的遣返。

五十五、定板门店为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必要时战俘遣返委员会可在非军事区内增设其他战俘交接地点（或若干交接地点）。

五十六、子、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该委员会由6名校级军官组成，其中3名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指派，3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派。该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的督导下，负责协调双方有关遣返战俘的具体计划，并监督双方实施本停战协定中有关遣返战俘的一切规定。该委员会的任务为：协调战俘自双方战俘营到达战俘交接地点（或若干交接地点）的时间；必要时制定有关病伤战俘的运送及福利所需的特殊安排；调配本停战协定第五十七款所设立的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助遣返战俘的工作；监督本停战协定第五十三款与第五十四款所规定的实际遣返战俘的安排的实施；必要时选定增设的战俘交接地点（或若干交接地点）；安排战俘交接地点（或若干交接地点）的安全事宜；以及执行为遣返战俘所需的其他有关职司。

丑、战俘遣返委员会对与其任务有关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时，须立即将此等事项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战俘遣返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附近设置其总部。

寅、战俘遣返委员会于遣返战俘计划完成时即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解散之。

五十七、子、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即成立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为一方，以及向联合国军提供其军队的各国的红十字会代表为另一方，所组成的联合红十字会小组。此等联合红十字会小组以战俘福利所需求的人道主义的服务协助双方执行本停战协定中有关遣返第五十一款子项所指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的规定。为完成此任务，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在战俘交接地点（或若干交接地点）对双方交接战俘工作进行协助，并访问双方战俘营以进行慰问及携入与分发慰问战俘及为战俘福利之

用的馈赠品。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并得对从战俘营至战俘交接地点途中的战俘提供服务。

丑、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应按下列规定组成：

（一）一组由各方的本国红十字会各出代表10名，双方共20名组成，在战俘交接地点（或若干交接地点）协助双方交接战俘。该小组的主席由双方红十字会代表按日轮流担任。该小组的工作与服务由战俘遣返委员会调配之。

（二）一组由各方的本国红十字会各出代表30名，双方共60名组成，访问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管理下的战俘营，并得对从战俘营至战俘交接地点途中的战俘提供服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的代表担任该小组的主席。

（三）一组由各方的本国红十字会各出代表30名，双方共60名组成，访问联合国军管理下的战俘营，并得对从战俘营至战俘交接地点途中的战俘提供服务。以军队提供联合国军的一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担任该小组的主席。

（四）为便利每一联合红十字会小组执行其任务，在情况需要时，得成立至少由小组组员2人所组成的分组，分组中各方须有同等数目的代表。

（五）各方司令官供给在其军事控制地区内工作的联合红十字会小组以附属人员如司机、文牍与译员，以及各小组为执行其任务所需的装具。

（六）任何联合红十字会小组的人数，经该小组中双方代表协议后，得予增加或减少，但须经战俘遣返委员会认可。

寅、联合红十字会小组执行其职司时，各方司令官须与之充分合作，并负责在其军事控制地区内保证联合红十字会

小组人员的安全。各方司令官给予在其军事控制地区内工作的小组以其所需要的后勤、行政与通讯的便利。

卯、联合红十字会小组于本停战协定第五十一款子项所规定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的遣返计划完成时即行解散。

五十八、子、各方司令官应在可能范围内尽速，但不得迟于本停战协定生效后10天，供给对方司令官以下列有关战俘的材料：

（一）关于最近一次交换的资料截止日期后逃亡的战俘的完整资料。

（二）在实际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关于在被收容期间死亡的战俘姓名、国籍、级别暨其他识别资料，以及死亡日期、原因与埋葬地点的材料。

丑、如在上述规定的补充材料截止日期以后有任何逃亡的或死亡的战俘，收容一方须按照本条第五十八款子项的规定将有关资料经由战俘遣返委员会供给对方。此等资料每10天提供一次，直至战俘交接计划完成时为止。

寅、在战俘交接计划完成后回到原收容一方的任何逃亡战俘须送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处置。

五十九、子、所有在1950年6月24日居住于本停战协定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以北，而在本停战协定生效时系在联合国军总司令军事控制地区内的平民，凡愿返乡者，由联合国军总司令准许并协助其返回军事分界线以北地区；所有在1950年6月24日居住于本停战协定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以南，而在本停战协定生效时系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军事控制地区内的平民，凡愿返乡者，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准许并协助其返回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各方司令官负责在其军事控

制地区内广为宣布本项规定的内容，并责令适当的民政当局对所有此类愿意返乡的平民给予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丑、在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军事控制地区内的一切外籍平民，凡愿前往联合国军总司令军事控制地区者，须准许并协助其前往联合国军总司令军事控制的地区。在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在联合国军总司令军事控制地区内的一切外籍平民，凡愿前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军事控制地区者，须准许并协助其前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军事控制地区。各方司令官负责在其军事控制地区内广为宣布本项规定的内容，并责令适当的民政当局对所有此类愿意前往对方司令官军事控制地区的外籍平民给予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寅、双方协助本条第五十九款子项中所规定的平民返乡及本条第五十九款丑项中所规定的平民移动的措施，应于本停战协定生效后尽速开始。

卯、（一）成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4名校级军官组成，其中2名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指派，2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派。该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的督导下，负责协调双方有关协助上述平民返乡的具体计划，并监督双方实施本停战协定中有关上述平民返乡的一切规定。该委员会的任务为：进行必要的安排，包括运输的安排，以加速并协调上述平民的移动；选定上述平民越过军事分界线的越界地点（或若干越界地点）；安排越界地点（或若干越界地点）的安全事宜；以及执行为完成上述平民返乡所需的其他职司。

（二）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对与其任务有关的任何

事项不能达成协议时，须立即将此等事项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附近设置其总部。

（三）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于完成其任务时即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解散之。

第四条　向双方有关政府的建议

六十、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3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第五条　附　　则

六十一、对本停战协定的修正与增补必须经敌对双方司令官相互协议。

六十二、本停战协定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正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级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所明确代替以前，继续有效。

六十三、除第十二款外，本停战协定的一切规定于1953年7月27日22时生效。

1953年7月27日10时以朝文、中文与英文3种文字订于朝鲜板门店，各文本同样有效。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　　金日成（签字）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签字）

联合国军总司令
美国陆军上将　　马克·克拉克（签字）

出　席　者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
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　　南日（签字）

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
美军陆军中将　　威廉·凯·海立胜（签字）